

罗 勿 回 忆 录

上 册

[印度] M. N. 罗勿著

罗 勿 回 忆 录

下 册

〔印度〕M. N. 罗勿著

K833.517



2 030 0225 9

罗 易 回 忆 录

上 册

〔印度〕 M. N. 罗易著

山东师范学院外文系

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 合译

南开大学外文系

山东师范学院外文系 校订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8年·北京

罗 易 回 忆 录

下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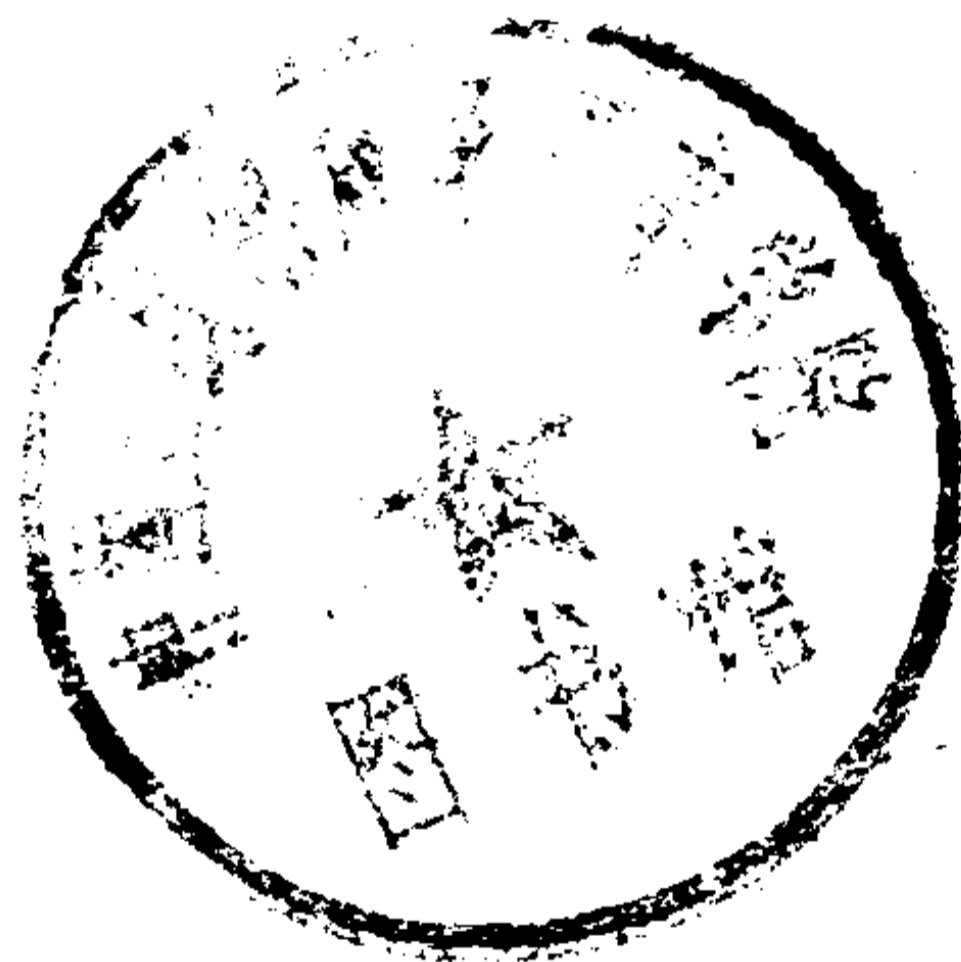
〔印度〕 M. N. 罗易著

山东师范学院外文系

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 合译

南开大学外文系

山东师范学院外文系 校订



商 务 印 书 馆

1978年·北京

**M. N. ROY'S
MEMOIRS**

Allied Publishers Private Limited, Bombay, 1964

内部发行

**罗易回忆录
(全二册)**

[印度] M. N. 罗易著
山东师范学院外文系
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 合译
南开大学外文系
山东师范学院外文系 校订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21 印张 429 千字

1978 年 2 月第 1 版 1978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17·210 定价: 1.65 元

出版说明

马·纳·罗易(1887?—1954),出身于印度孟加拉一个婆罗门家庭,早年接受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从1907年起参加反英的恐怖主义活动,曾于1910年被捕。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罗易为了从德国人手中得到金钱和武器来进行反英斗争,曾经奔走于爪哇、中国、日本等地,后来于1916年夏抵美国,1917年又到了墨西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罗易受汹涌澎湃的世界革命潮流的影响,1919年在墨西哥参加了社会党,不久又退出社会党而创立了墨西哥共产党。1920年,他以墨共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担任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成员,并以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列宁辩论民族殖民地问题、草拟民族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而名噪一时。他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担任过执行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并是共产国际设在塔什干的中央亚细亚局的三个负责人之一。1920年,他在塔什干成立了最早的印度共产党组织。1927年,他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到过中国,回欧洲后于1929年底因他同德国布兰德勒集团的关系被开除出共产国际。1930年底,他回到印度,1931年7月被捕,于1936年11月获释。以后他加入了印度国大党,1939年又成立了激进国大党人联盟,1940年竞选国大党主席失败。他在晚年时大肆宣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对抗

共产主义运动。

罗易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政治生涯以恐怖主义开始，以“激进人道主义”告终。他早期投机革命，混入共产党内，后来叛变革命，堕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叛徒，共产主义的死敌。他对印度和中国的看法同托洛茨基的路线极其相似。在共产国际二大上，罗易反对列宁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在大会发言中关于落后国家中“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列宁全集》，第31卷，中译本第211页），“在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和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中”，“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等正确观点（《列宁全集》，第31卷，中译本第129页）。罗易认为共产党人不应支持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只能单独发展他的所谓“阶级斗争”，即单纯地反对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斗争。共产国际二大以后，罗易仍坚持其反列宁的观点，并使之发展成为声名狼藉的所谓“非殖民地化”论。他认为当时印度实际上已不是英国的殖民地，而是一个“资本主义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印度资产阶级已“不再是一支革命力量了”，又认为由于英帝在印度实行新的政策，印度“民族斗争便失去了重要性”，“印度民族革命已经渡过了资产阶级阶段”，“印度并非处在封建制度下”等等。（引文见罗易所著《资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作用》、《过渡时期的印度》等书。）罗易的这些谬论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服务的。

在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阶段，罗易的错误观点起了很大的影响，他的一些著作曾被当时的印度共产党人当作“经典”。罗易的《补充提纲》原稿的一些错误观点，以及他的“非殖民地化”论，流毒至今，成为历来印度共产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源。1948年后印度共产党一度实行“左”倾冒险主义，把印度看成资本主义占优势的社会，实际上是“非殖民地化”论的复活。目前丹吉叛徒集团称印度是“中等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样是在贩卖“非殖民地化”的黑货。在印度，罗易的反动观点至今没有受到彻底批判，甚至还有人为罗易辩护。因此，弄清楚罗易的理论和路线的实质，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罗易的这部回忆录写的是他1915—1923年期间的经历，这本书对于我们研究罗易，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印度共产党历史，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本书是罗易晚年写成的，这时他已经成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凶恶敌人，因此，全书立场和观点是反动的，这些，希望读者注意分析和批判。书后附有V. B. 卡尔尼克写的跋，歪曲历史事实，极力为罗易涂脂抹粉，进行辩护，但它对罗易的经历提供了不少材料，因此也照译了。

本书原文为英文。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们做了一个汉英译名对照表，附于书后。

本书第一卷系由山东师范学院外文系翻译，第二、三卷由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翻译，第四卷由南开大学外文系翻译，全书的校订者系山东师范学院外文系。

序 言

马纳本德拉·纳特·罗易在他的印度同时代人物中，是无双的，或许在东方也没有人能和他匹敌。他阅历极深，很少有人能和他比拟。散布在三大洲上的十多个不同国家为他曲折的一生提供了背景。他在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伟大运动中都居于领导地位。他具有罕见的天赋和丰富的经验，这使他的洞察能力不断地得到增进和提高。当他处在有权威和影响的地位，并和现代历史中一些最伟大的人物交往期间，凡是经过审时度势，自信看来需要作这样选择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地选择冷僻的道路。他把异常坦率的心胸与对自由、真理的基本价值的坚定信念结合起来，能够接受新的思想并从新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他的一生的确是一次伟大的探索，一次坚韧不拔、目标明确的行军。尽管他的活动有时放慢步伐或遭到挫折，但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失败。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气馁或悲愁。他的一生以及他的理想，将是对后世的珍贵遗产，也是衡量他的伟大的真正尺度。

马纳本德拉·纳特·罗易的一生事迹或许永远也不可能叙述详尽。记叙罗易生平，是任何个人的才智都担当不起的任务。他未能继续写完他的回忆录，实为憾事，因为他的事迹中有些部分只有他自己才能讲述。这样的损失将永远无法弥补。我们中间那些有幸认识罗易和与他一同工作过的，还能记起

罗易在开始这项写作时是多么勉强；他妻子埃伦、他的朋友以及他的追随者们大力进行了说服和争辩，才克服了他的这种勉强。他的生活就是他的工作。他的思想、理想及工作已成为一体，因此，他很少谈到他个人。

纳伦德拉·巴塔查尔亚出生在孟加拉的乌尔巴利阿村（24-帕尔加纳斯地区^①）一个僧侣家庭中；他十四岁读小学时，就参加了孟加拉的革命运动，很快地成为那个运动中最大胆最勇敢的一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他乔装出国，想获取武器来推翻异族统治。为了完成这个使命，他旅经缅甸、印度尼西亚、中国、日本及菲律宾而到达美国。美国参战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他因而被捕。就是在美国的时候，纳伦德拉·巴塔查尔亚更名为马纳本德拉·纳特·罗易，这个名字他一直用到临终。在保释中他逃至墨西哥。他在墨西哥的时候，同战斗的民族主义决裂，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终于创建了苏联以外的第一个共产党，墨西哥共产党。罗易在墨西哥遇到了迈克尔·鲍罗廷，并很快就接受列宁的邀请去苏联。他到达莫斯科时，正好赶上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不久他就获得了列宁的称赞和信任，列宁誉之为“东方革命的象征”。他被选进共产国际主席团，并担任了共产国际东方局的领导人数年。1926年，他去中国，作为共产国际的专使指导中国革命。1928年，他脱离了共产国际，在德国滞留了一段短暂时间之后，于1930年回到印度——那差不多是他离开祖国觅取武器十六年以后的事了。

^① 帕尔加纳，是印地语译音，意为“包括几个村镇的地区”，“斯”标志英语的复数。24-帕尔加纳斯地区在印度加尔各答附近。——译者

他带着武器回来了，但那是另一种武器。他带回国的是一种理想和思想，是对自由、公正的信仰。这种信仰在动员印度人民起来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同时，也将唤醒他们去反对本国的剥削者。他的思想已超越了对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天真认识。马克思主义为他开辟的思想和价值观念方面的新天地使他坚信，如果自由要对他的千百万同胞真有意义，它就必须超越民族主义的范围。

可是，回国不到一年，罗易就被逮捕，并被判处六年徒刑。获得释放时，他参加了印度国大党；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由于在印度对待战争所引起的问题上态度不同，他与国大党决裂了。战争对他来说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民主与法西斯的斗争，而民主的胜利才是殖民地解放的先决条件。他脱离了国大党，并于1940年创立了激进民主党。他与国大党决裂，标志着开始脱离共产主义，发展他的超越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个思想家和活动家不久便融合成为一位新体系的创建人。他比任何人都更理解从事这种事业的局限性和艰巨性，并且不厌其烦地强调这一点。他的思想迅速发展，结晶成为一种社会哲学，即新人道主义；他继续发展并宣传这个主义，一直到他的生命结束。作为这种发展的必然结果，他所创建的激进民主党于1948年解散了。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出来的力量，大大地突破了帝国主义这个堡垒，我认为 M. N. 罗易就是清楚地领会到这个突破的重要意义的第一位印度思想家。他是第一个主张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问题必然要让位于民主主义对极权主义的问题的人，这是一个已被战后历史所证明并为许多人所公认的

事实。对于这次战争中发展出来的庞大破坏力的含义和它对革命思想、策略的影响，最先能有充分而清楚认识的人是极少数，而罗易却又是其中的一个。很明显，暴动已经过时；而另一方面人们已经感到投票箱是不适当和不充分的了。如果说人类的聪明才智遇到过挑战的话，这就是一个。在曾经支配过现代舞台的许多人早已被人忘却之后，人们仍会把这种功劳归于罗易：罗易接受了这个挑战，并且奠定了有效地应付这种挑战的基础。

我们在这里不可能概述他的思想。只要指出这一点便够了：人们由于维护个人第一、个人至上，无助和绝望的情绪在日益增加，于是出现了危机；罗易的思想就是针对这种危机的需要而作出的可靠的回答，他的思想并开辟了在公众生活中恢复理性和公正的前景。这种前景由于现代科学的成就而得到了加强；现代科学使得人们有可能对于人的道德行为采取生物学上的制裁。罗易重新估计了民主运动在不受强权政治恶劣影响时的潜力。他还无拘无束地重新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结果是形成了本质上是文艺复兴在 20 世纪中叶翻版的一种哲学，人类在文艺复兴以后的几个世纪中所取得的知识与经验曾经修改并丰富了文艺复兴的思潮。

罗易就是这样，开始时作为一个民族主义革命者，后来在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先锋队伍中度过了近二十年，终于作为一个现代文艺复兴的哲学家而达到他一生事业的高峰。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确实是杰出的成就，特别是对于一个从未进过大学或研究院大门的人，就更是难能可贵。但使得罗易在现代革命史上成为无双的登场人物的，是以下一些品

质罕有的结合：热爱自由、无可指摘的正直、忠诚坚贞、勇于坚持信念、对于思想以及其人道的含义怀有浓烈的兴趣、无条件地参加争取自由的斗争、却又完全超脱于这种斗争经常表现出来的权力政治的争逐之外，以及对于与他接触过的最普通的人们的心愿与忧愁的真诚关切。他身上具有普通人的气质；与他交往可使得最平凡的同志也感到生活尽管有丑陋缺陷之处，却是美丽的、令人兴奋的，而他们自己在生活不断更新的进程中居于重要的位置。没有一个领导人象罗易那样，不凭借任何种类的黄教就能解放出人的创造力。

罗易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最少关心自己。他唯一关心的就是他自己实现自由并帮助别人得到自由。随着他对自由的概念发展得更为丰富，更具有复杂的含义，他的政治哲学及政治活动也起了相应的变化。同样，他的“失败”（以实用主义含义来理解这个字）只能被看作是他的才智和道德的统一体的不可避免的结局。在别人将原则与迁就之间进行调和时，罗易则宁愿不要表面上的成功，以免失去他所要追求的真义。他在写给斯大林最后的一封信中讲的话构成了他一生事业的基本线索：“我不能听从这样的想法：在布尔什维克的道德词汇中可以没有公正、忠贞和诚实等字眼。”在这里讲话的是一个为了这些简单的道德宁可抛弃全球王国的人，一个寓伟大于善良之中的人。这个世界如果要成为适合他那样的人居住和成长的地方，就需要进行根本改造，这一点谁能否定得了呢？

罗易在探索中，说理是他接受下来的唯一指导原则。只有依照经验进行的说理能够解决人们的问题。他相信，一旦人们认识到这个真理，他们迟早总会接受它。这当然是一个

不能证实的设想，但它并不象乍一看来那样虚无缥缈。人类是可教育的，这是由于人类能够解释自己的经验，并能从经验中学习。罗易所作的一切，就是把原则从正规的理智教育扩大到人们相互合作的社会共同生活中去。道德只是指导人与人的关系的一套准则，因此罗易设想在一个合理安排的社会里，对道德的要求将与对自由的要求相一致。它们的确必须取得一致，因为按照罗易的想法，合理即意味着有道德，理智本身不过是用来寻求自由的一个工具；而自由按照觉悟的程度则是人类生存本能的表现。因此，他的见解中既有苏格拉底对于时代信仰的怀疑主义，又有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的信念。

这部回忆录涉及八年左右的时间，从1915年到1923年。材料的一部分原来在罗易创办和编辑的《激进人道主义者》周刊上登载过；有些也曾曾在其他刊物上刊出。手稿原来是由埃伦·罗易为出版社整理出来的，不幸她没有能和我们一道看到稿件刊印成书。她是在台拉登城的家里被谋害的，她遇难的悲惨情景使得在世的人心情更为悲痛。令人稍感慰藉的是，她的一个愿望，就是使这本书问世，终于实现了。这本书对于罗易的生平和事业的所谓形成期作了最好的介绍。

我们感谢出版者承担这项工作。在完成这项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是很大的。然而他们以非常的机智、办法和一贯的好意解决了这些问题。本书内的照片都是旧的、退了色的，复制很不容易。我们感谢各方作了努力，终于克服这些难关，并将这些年深日久而很稀有的照片刊印出来。

由于附有加利福尼亚大学编制的罗易的著作书目表，本

书的作用有了很大的提高。为此，我们对学校当局和威尔逊先生以及理查德·帕克博士深表感谢。

孟买大学图书馆长D.N.马歇尔先生应我们的请求，为本书编了索引，我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如果没有这些和许多其他朋友们的帮助与合作，这本书的问世是不可能的。其中，印度时代出版社迅速而出色地完成了印刷工作，博得大家的赞扬。在这里我必须向他们表达诚挚的谢意。

G.D.巴里克

孟买.1964年3月8日

目 录

序言.....1—7

第一卷 寻求一个理想

1. 在亚洲各地寻找武器1
2. 横渡太平洋.....12
3. 我的新生.....21
4. 一个使命的结束.....30
5. 我对美国警察和司法的体验.....37
6. 征服者、造反者、土匪与内战.....45
7. 睡女之城.....52
8. 墨西哥札记.....59
9. 在墨西哥的日子.....67
10. 墨西哥政界中的社会主义.....75
11.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82
12. 在中国购买军火的最后尝试.....91
13. 初遇匪徒100
14. 在墨西哥的美国激进主义者109
15. 墨西哥的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117
16. 拉丁美洲的门罗主义126
17. 国际象棋、社会主义与骑马..... 133

18. 谒见总统	139
19. 一个地区的社会主义国际	145
20. 墨西哥的办事方法	153
21. 一位未来总统的画像	160
22. 由代表掌权	167
23. 一次红色洗礼	176
24. 神秘的来客	182
25. 会见第一个布尔什维克	189
26. 迈克尔·鲍罗廷	196
27. 沙皇珠宝的故事	204
28. 在俄国之外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	212
29. 准备朝圣	220

第二卷 新的信仰

30. 横渡大西洋	229
31. 失去了光辉的国家	237
32. 终于到了柏林	244
33. 伟大的希望	253
34. 德国革命的失败	260
35. 内战和民族布尔什维主义	267
36. 柏林的一场不流血的战役	273
37. 德国共产主义老卫士	281
38. 左派共产主义	287
39. 在柏林的印度革命委员会	295
40. 一位令人难堪的同事	305
41. 共产国际的基础	312

第三卷 在圣地

- 42. 在莫斯科的第一天323
- 43. 世界革命的第二战线331
- 44. 布尔什维主义的女家长339
- 45. 新信仰的祭司长346
- 46. 初次会见列宁353
- 47. 在群众大会上首次演讲360
- 48. 共产党人的国际集会366
- 49. 盛大的庆典373
- 50.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家和人物380
- 51. 在殖民地问题上同列宁的分歧388
- 52. 对欧洲发动第一次红色袭击397
- 53. 革命转向东方404
- 54. 泛伊斯兰主义的垮了台的英雄们411
- 55. 泛都兰主义的策略419
- 56. 亚洲革命的策略427
- 57. 募集一支解放军的计划436

第四卷 革命到了亚洲

- 58. 在中亚的生活445
- 59. 反革命阴谋和恩维尔帕夏的下场456
- 60. 不流血的革命461
- 61. 革命革到后宫467
- 62. 真主的部队474

63. 寇松勋爵的梦魇	483
64. 在莫斯科的印度革命者	492
65. 印度临时政府被赶出喀布尔	501
66. 战时共产主义几乎毁灭了革命	509
67. 列宁号召退却	516
68.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525
69. 布尔什维克的黄金及其对共产主义运动所起 的败坏作用	532
70. 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539
71. 第一次会见斯大林	547
72. 向阿默达巴德大会提出的呼吁	554
73. 马克思主义对印度历史的解释	563
74. 共产党人在一起的生活	570
V.B. 卡尔尼克的跋	578
罗易著作目录	620
译名对照表	638

第一卷

寻求一个理想

I. 在亚洲各地寻找武器

在印度最终获得民族独立这个令人羡慕的目标之前的四分之一多世纪的时间中，有望早日达到目标的诱人前景，曾经召唤了一代青年进行多次无结果的冒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爆发的时候，流亡国外的印度革命者认为德国是希望所在。他们怀着极大的期望，纷纷奔向那里。到了1914年年底，我们在印度得到消息说，在柏林的印度革命委员会已经获得德国政府的允诺，答应供给印度独立战争所需要的军火和金钱。那个消息象野火般地传播开来，使得英国军队中的印度士兵也受到了影响。革命已近在眼前，虽然我们对未来的事情仅有非常模糊的概念；独立总算为期不远啦。我们设想共同目标不久即将实现，这使得几个秘密的革命组织调解了它们之间一向存在的不和。经过几次秘密会议，我们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建立了参谋部，由贾廷·穆克赫尔吉担任总司令。

最初活动经费的筹集任务分派给我，我很快地按照计划

完成了。接着我们便面临把订好的军火运进国内的问题。要把军火直接从德国运到国内当然是不行的。我们派了一个人去柏林，建议德国人在一个距离印度最近的中立国家中把军火交给我们。我们选中了荷属东印度，于是我在1914年年底前前往爪哇——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不到两个月，我回来了，带来了不多的款子；至于“金羊毛”^①般的军火已成泡影。军火并没有来到，因为如后来揭露的那样，整个计划是一个十足的骗局。

然而我们青年人的热诚、天真的乐观主义、特别是我们对德国的这种解放使命的信心，是不会那么轻易被压下去的。我们决定再试试；制订了一个新的计划；在1915年年初，我第二次离开印度去找“金羊毛”，下了决心不找到这个宝贵物资就不回国。我们傻乎乎地认为那个宝贵物资正在太平洋上某处的船上哩。事实是，我在十六年后才回到印度。

将来有朝一日我也许会谈谈我在那些年代的全部经历，不是作为个人的自传，而是作为那个时代的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此时此刻，我只想回忆一下M.N. 罗易诞生的情况，因为如果将来谈起这个经历的话，那将不是三十五年前一个天真青年缘木求鱼的故事，而是一个不同的成年人的经历的叙述。

用船偷运军火的企图失败之后，我第二次出国。这一次是按照一个新计划，准备把军火从中国陆地运进来。我将经由最近起义的阿博尔人聚居的东北部落地区，把军火偷运入境。与我到国外去搞军火的同时，由我们当中最有才智的人

^① “金羊毛”，源于希腊神话，指历尽千辛万苦寻找的宝物。——译者

领导的一部分同志则去东北边疆地区，鼓动阿博尔族和其邻近的部落再次起义；这次起义将从外边得到军火和其他物资的帮助。

我又努力从印度尼西亚得到海外援助。计划是利用在苏门答腊岛北端一个港口中被拘留的德国船只去袭击安达曼群岛，解放并武装那里的囚犯，然后把这支解放队伍送到奥里萨邦海岸登陆。正如许多别的德国大船一样，那些船是准备战时使用的装甲船只。每一艘上都有几尊火炮。船员是由海军官兵组成的。他们必须从拘留营里逃出，夺取这些船只，立即起航。原来留在每艘船上的骨干船员可以发动机器开船。还可以通过中国走私商人弄到几百支步枪和其他轻便武器及足够的弹药，由他们预先把军火弹药运到船上。这个计划失败了，因为德国人不愿冒这样大的险。直到最后一刻，买军火的款子还没有到手，而就在应该由德国总领事下令执行这个计划的那天，他却神秘地不见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设法从德国人那里榨出相当大的一笔款子汇到印度，以接济我们派往阿博尔的远征部队。

后来，我到了日本，心情很不愉快，但还是充满了希望。拉希·比赫里·博斯也在那里，负有与我相同的使命；他一定会帮助我的。但是令我非常惊讶的是，当时他认为我们解放印度的使命只有在日本完成了把亚洲从白种人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的更大使命时才能实现。我依然是一个十足的民族主义者，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是相信种族团结原则的。可是我忘不了日本是英国的盟邦，我们怎能在反对英国控制的斗争中依靠日本对我们进行援助呢？拉希·比赫里和藹地笑了，他笑我对

外交一窍不通：日本站在协约国一边参加战争，自有其目的；纵然印度革命者在日本受到迫害，日本也不会感到左右为难的。我们必须信任亚洲的领导者，耐心等待我们的机会。

这番话倒是十分动听，但并不使人增加信心。如果有了安全而舒适的政治保护，我们不妨就等一等，等到日本的迂回外交政策有了收获以后再说；然而在印中边界部落区等待着的同志们，既不安全又不舒适，我们能把他们丢在危险境地而不顾吗？何况我还没有得到拉希·比赫里已经享受到的保护呢。

我只得自作判断，拜访了中国民族主义者领导人孙中山；那时，他是在1913年7月被称为第二次中国革命的南京起义失败之后，到日本避难的。他更权威地阐述了日本负有解放亚洲使命的学说，并且英明地建议我们要有耐心和远见。在印度国内时，我们听到过这位伟大的中国领导人的许多事迹；由于热中于英雄崇拜，我们称他为下凡的天神(avatar)。和他见面以后，我却感到实难做到谦恭地屈膝礼拜；英雄崇拜是我多年的信念，现在这种偏见受到对抱有同一信念的同志们的忠诚的挑战；而且(如果不是有意识地)，还受到生来就是一个异端者的固有理智的挑战。我从入学就读以来，易于听信和不遵正统这两种倾向便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斗争着。但是这一回的具体情况却又有不同。

孙中山相信日本负有解放亚洲的使命。他认为，日本帮助其他亚洲人从欧洲列强统治下解放出来是符合日本本国利益的。除日本外，他相信美国，他的信念的依据是基督教。他竟然说亚洲人应该信奉基督教作为他们政治解放和社会进步

的条件。那时我还太年轻，不能对这些论点进行什么争论。我之所以呼吁帮助，其根据是亚洲团结起来反抗白种人这一共同的立场。

但是那位亚洲民族主义的先知先觉拒绝帮助印度反抗英国，严重地动摇了我对种族团结的信念。他的理由纯粹是机会主义的。他一点也不能反对英国人，因为香港是他在华南活动的基地。谈到他自己的国家，他则极力主张给日本人以自由活动的便利。论据是：让他们把欧洲列强赶走；然后中国和日本将在同文同种的基础上达成协议。这和我民族主义思想偏见很投合，但是与一般常识却有点格格不入。而且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也实用于印度：一旦日本把白人列强赶出亚洲，继中国之后，将轮到印度被解放；在此期间，我们必须耐心等待。听到这里，我不能不感到十分愤慨。

从那时（1915年底）以后，邻接缅甸和印度的中国云南四川两省起义，反对袁世凯称帝复辟的计划。这次起义被称为第三次中国革命。我自然认为这次起义是流亡在外的这位中国领导人鼓动起来的。我建议说，如果能从云南、四川越过边境运一些军火给我国人民，中国和印度人民将在争取自由的共同斗争中结成实际的联盟。孙中山建议我与驻中国的德国大使联系一下，要求五百万美元的款子来购买在云南、四川的造反者手中的全部武器弹药。这笔钱如果弄到手，他自信可以用它把袁世凯的支持者们收买过来，倒袁就可以成功。这样一来，第三次革命的目的就可以达到，那些多余的武器弹药将在边界某地移交给我。当时商定，我要立刻去北京向德国大使提出这个意见；如果我在那边把事办成，在接到我的信以

后，孙中山将派他的专使到云南去，按照我们的密约发布指示。以后，我将亲自到上海交款给孙中山，随即前往接收那些宝贵货物。他则会到上海去，以银弹向袁世凯展开进攻。

这个宏大的计划对于我的冒险精神具有极大的诱惑力。最后，或许是在几个月内，足够武装一支军队的武器在印度边境上出现的梦想，也许会变成现实。从我的观点来看，实现这一计划似乎是大有可能，因此我完全忽视了孙中山所谈问题的离奇性质。好多年以后，我对现代中国和它的多次革命的历史，有了一个更清晰的理解之后，才知道孙中山并不赞成第三次革命，因为它的领导者云南督军是著名的自由派哲学家兼政客梁启超的一个追随者。但那是另外一码事，在我写的《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中已作了详尽的叙述。

无论如何，我必须离开日本，中国是我唯一可去的地方。我从长崎登陆那天起，就一直受到严密的监视。我有一个在东京居住的人的地址，这个人将安排我去见拉希·比赫里。经过好多天煞费苦心的秘密准备之后，我才见到他。然而警察却完全知道了。警察局长来到旅馆，问我为什么访问日本，并问我见到了我的朋友博斯先生没有。我作了否定的回答，他以日本人所特有的客气而傲慢的姿态笑了。两三天后，拉希·比赫里的秘密使者告诉我，我将接到一个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日本的通知。如果我要避免实际被引渡到上海的话，就得马上离开这里。当然，我愿意这样做，但是怎样办呢？尽管拉希·比赫里和日本上层人物有些关系，但他既未给我任何指点，也未给我任何帮助。

我在日本再没有事情可做了。在此期间，我会见了孙中

山博士，作成了他提议的那笔交易。我非到中国去一趟不可，既然如此，那又为什么不马上走呢？起初我选择走陆路，经过朝鲜前往中国。要摆脱日本侦探，是十分困难的。第二天下午，我到那个最大的百货公司去。在入口处，就是外国人也得脱下鞋子换上布鞋，以免将街道上的泥土带到铺在这七层大厦里的楼梯、甬道、大厅的一尘不染的席子上。我没有折回去取我的鞋子，而从另一入口出来，一直奔向火车站。大约一个半小时左右以后，火车从下关驶出了。看来好象我已经成功地把四个跟踪者摆脱掉了。挂在他们脸上的难看的笑容一直使我心神不安。第二天一早，我渡海到釜山乘车去汉城，买了一张到沈阳的通票。我的计划是，在汉城离开干线，走到仁川港，然后渡过黄海到山海关或者天津。天津就是我的目的地。拉希·比赫里曾告诉我，卡德尔党^①的一位重要领袖住在那里的德国租界里。但是为了使日本人确确实实不再盯着我，我决定在路线上多绕一点圈子。我买好了去山海关的船票，却悄悄地在大连下了船，乘火车去沈阳再转车去北京。仲冬季节，黄海上的短途航行是颇为艰苦的。那是一艘日本货船；设备及饮食都很坏。在去北京的火车上，我才松了一口气，因为不再被人跟踪了。

我买的是去北京的票，但在山海关我就下了火车，在那儿住了一宿，换乘去天津的短途车。在站台上，一个英国人——战前时代的典型的殖民地恶棍——向我打招呼，“你好，怀特先生”（我在日本时用的名字）。我装作不理睬，好象他是在向别人说话似的，我想躲过去。他马上跟过来，用一种愉快的声

^① 卡德尔党(Gadr Party)，印度的一个革命地下组织。——译者

调说：“在你去你的目的地之前，是否可以用几分钟的时间陪我去个地方？”我问他，到哪里去？为什么？“到警察局去，我是英国警察长。”我在这以前就听说车站在俄国租界里；德国人就在穿过马路的前方。我想来一个最后挣扎，说道，“旅行之后，我很累了，我想直接到一家好旅馆去。再说，我认为我们所在之地不是英国的领土。”他变得客气些了，“那好吧，我懂我干的这一行。实在说，我不会耽搁你多久。跟我走一趟吧。”我们就走到街上，那里有一部汽车等着。

在警察局，他问了我一些例行的问题，最后说，“我恐怕你得在这儿过夜。我们将尽量使你舒适。我已从阿斯特旅馆给你定了饭。我们在等待日本的一些情报。”我知道我上当了，便冒险问他，“你是怎么知道我到这来的？”他笑了，“啊！日本警察的工作是有很有效率的。再见！”他走了，我发现我被关在很粗的铁栅栏里。不一会儿，门前有两个武装警卫来站岗。他们是两个印度锡克人；但过了一会儿，两个英国兵接替了他们。

象这样被关起来，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十分奇怪的是，在这种环境中，我总是一睡好几个钟头。早餐之后，警察长就来了。“你已准备好和我一道去领事馆吗？”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当然跟他走了。在汽车上，他透露说，我将被提到领事法庭。我问，“什么罪名？”他耸耸肩，“我们在等待报告。”总领事是一个具有贵族气派的老人，严肃地坐在他那高背椅子上。他愁眉苦脸，显然患有肝病，但是他在与我谈话时态度和善，很有礼貌。我是为什么去日本的？为什么我在东京会晤了臭名远扬的革命者拉希·比赫里·博斯的秘密代理

人？将来我想干什么？我装作懊悔的样子，回答说：我本来是打算到英国去读书的；由于战争，去不了了。但是我渴望到国外去受教育，到了日本，就遇到了麻烦。早先在船上时，一个同船旅客曾给我一个东京的地址，说我在需要时可以去找他。我不懂日本话，心想住在日本的一个印度侨民会给我一些帮助吧。过后不久，我才知道我弄错了。我受到警察的监视。我害怕了，很想回国，但又想在回国途中见见世面。因此我就来到了中国。现在我不打算在任何地方停留了；我要直接回印度去。

这位总领事注意地听着，看来是相信了我的话。我说完了，他转身面向警察长，问道：“你从日本收到新的报告了吗？”回答是很无情的：“没有，先生，但随时可以来到。”英国人对司法的观念挽救了我。“你不能无期地把这个青年人禁闭起来。”然后，他又转身朝着我，“你受到打搅了；在这里等几天，住在一个旅馆里，然后回印度去。这里许多地方正在进行着革命，你不要卷到里面去。”这很象是父辈的劝诫。我努力表现出驯服和后悔的样子，而又不禁有了一个非分的念头：“总领事能够慨允发给我一张护照，以便我顺利地旅行吗？”警察长对我的厚颜无耻怒目而视。那位老绅士的态度也变得硬了些。“不行，那不能答应；我还不知道你是否是一个英国臣民呢。”我不加思索地、机智地回他一句：“如果我不是英国臣民，你的警察怎么能够逮捕并拘留我呢？先生！”那老头儿显得有些慌张；他站起来说，“啊，那是法律上的微妙问题。”然而他坚持他固有的司法观点：不经审讯不得拘留任何人。警察接到命令：“在得到新的罪证之前，被告暂且释放。”

警察很恼火。他走出房间，我听到他在嘟囔——“这个老糊涂。”然后，他问我愿意到哪里去。我回答说，“到一家好旅馆去。”他说，“这儿只有一家。”随后又狞笑说，“可是，它在英租界里呢。”我装作若无其事回答说，我要到英租界去，我是英国臣民嘛。他叫来一辆人力车，吩咐说：“阿斯特里阿。”那是一家上等旅馆。我迫切需要洗一个热水澡，吃一顿好饭。然后，武装自己的第一件事是搞到一张本市的地图。下午，我乘人力车出去，到市内的中国街道走走，我的想法是到一处最接近一条小河的地点。德国租界就在河的对岸。但是另外两辆人力车紧跟着我。天快黑了；我走进一家较大的商店，逗留了好大一会儿，监视我的人感到很不耐烦，便到附近一个茶馆喝茶去了。我从一个边门溜进一条窄胡同，从那里向前走几步就到了河边。我顺利地走到河岸边，但发现要乘摆渡才能过去。我没有付船费的中国小铜币，就把一小块银子放在船夫手中。他笑了，把船撑开，把旁的乘客留在岸上等着。几分钟之后，我到达了安全地带。就在第二天，我和当地的德国领事馆接上头了。

计划失败了，原因是德国人没有诚意帮助在印度搞一个武装起义。而且，这是注定要失败的；纵然我能够完成协议中规定我要做的那一部分，孙中山的异想天开的计划也不会受到第三次中国革命的领导人的重视。然而，为时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正如德国大使所承认的那样，那个计划在战略上看来是值得深入考虑的。

袁世凯还没有来得及登上龙座就死了，在中国复辟帝制的希望烟消云散了。第三次革命已成为无的放矢；购买剩余

军火计划的可能性增加了。当我向德国人首先提出要钱的请求时，他们指出计划中的缺陷：我在上海把钱交给孙中山之后，怎么能够保证那个与我从无接触的人会把手中的武器在遥远的云南交付给我呢？当时我对于白人这样怀疑中国老练的领袖是否诚实的傲慢态度感到很气愤。不过，话又说回来，我想假如我能弥补计划中的缺陷，或许就可以打消他们不愿拿出一大笔款子来的顾虑。因此，我又进行一些冒险旅行，设法和云南领导人直接建立联系。

最后我回到北京，带来了一个具体协议，这个协议是在汉口与云南领导人派来的专使商定的，德国领事也在场。如果德国人愿意的话，不必由中间人经手，款项将由他们直接付给实际持有军火的人。后者将越过边境，在印度阿萨姆东北角部落民族地区交货。军火数量足够装备一个几千人的部队。还有一个附加的试行协议：一面继续付款，一面将由毗邻西藏的四川省首府成都的相当大的军火工厂定期向印度革命军队供应军火。穿过萨地亚隘口，有一条可以通行的道路。

到了1916年年初，在印度保卫英国政权的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武装力量了。驻在各处留守的基干部队中的印度军官都很想参加人民起义。在1915年年中，我们已经在全国各地与他们建立了联系。局势是非常适合于武装起义的。但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德国人没有实现诺言；我这才意识到他们从来也没有认真地想给我们象样的援助。德国大使承认，最后的计划是十分可靠而且在战略上是可取的，可是很遗憾，他没有支付那么一笔巨款的能力。对此，我提出质问，赢得欧洲大战中一次战役的胜利，在人力物力上的代价是多少？这位以

恩人自居的德国贵族没有想到一个非白种人的小伙子竟敢如此冒昧。他说我并不懂得自己所谈的事情。这句话更加使我火冒三丈。我说我很懂得，如果英国人失去了印度，他们也许会在欧战中失败。以五百万美元去赢得可能是决定性的一仗，这个代价能说是太高吗？我接着说，我当然不打算为了德国的利益去取得印度战争的胜利。谈到这里，我们的争论好象是结束了。

大使显得十分惊讶，他想安慰我。他建议我马上到柏林去，把这个方案提供给最高统帅和他的总参谋部考虑。分别的时候他问我：“告诉我，我的青年朋友，你真的相信没有外国的帮助和指导，你们能够统治你们的国家吗？”我气冲冲地顶了他一句：“你要想在将来帮助我们，就应该在现在帮助我们赢得自由，难道你没有这样的看法吗？”他以笑声掩盖了他的狼狈，他祝我成功，并问了另外一个问题：“象我现在接触到的青年人在印度共有多少？”我真诚又谦虚地回答说，我只是一大批这样的革命者的一个代表而已。

2. 横渡太平洋

当我需要德国的经济援助用以购买大批军火并运到印度东北边境的时候，德国驻中国大使是冯·欣策海军上将，后来他作了德意志帝国的最后一任外交部长。他告诉我，在战争时期，只有帝国总参谋部能够批准大宗的款项，他建议我前

往德国，因为他感到，从军事观点来看，我的计划值得一试，最高统帅部或许因此会给予财政上的支持。我对德国还抱有一点幻想，认为它对英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会抱有同情；与冯·欣策一席交谈之后，这点幻想也打消了。可是，我在中国或日本已经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可做，便决定碰碰运气，首先和德国驻美大使，最后和柏林的最高统帅联系一下。我也很想和流亡在美国的著名印度革命者结交，在国内时我们听到过许多关于他们的事情。然而横跨太平洋却是一个难题。我没有正式护照，而美国移民法对亚洲人又特别歧视。斯瓦米·维夫坎南达虽然在美国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旅游，但是并没有引起美国人对印度的重视。

我是按照德国大使的建议到柏林去的，因此他的部下和其他有影响的德国人都帮忙安排我横跨太平洋的旅行。我是藏在一艘美国货轮上的偷渡者，船员都是条顿血统的人。英国警察紧紧地跟踪着我。可是我还得先去上海。我从北京乘火车到汉口，再乘轮船沿长江到南京。为了摆脱一到上海就想对我下手的秘密跟踪者，我被送上了一艘停泊在浦口和南京之间的德国炮艇。我在艇上遇到巴格万·辛格，他是卡德尔党的领导人之一。他要去缅甸鼓动印度军队叛变的革命使命失败了，他也想回到美国去。他将是和我搭乘同一货轮偷渡的同伴。

我们作为艇长的客人，在一起度过一周时间。巴格万·辛格给我一种不安的感觉，在那不舒适的长途航行中，我将得不到一个称心的旅伴。这艘速度很慢的货轮将用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渡过太平洋。巴格万·辛格年纪五十上下，身

体很结实，他既沾染了许多美国“粗汉”的坏毛病，又保留着同样使人厌恶的本国各种习气。他很贪吃，一加仑一加仑地狂饮啤酒。我们在等待着一个从上海来的人，由他在开船之前把我们秘密地直接带到船上去。巴格万·辛格准备了一张要在上海购买食物和几箱啤酒的长单子，预备在上海买好，在我们上船之前先要把这些东西运到船上去。他准备作一个月的旅行，在此期间他显然只想吃喝玩乐。

最后，在一天晚上，我们被偷偷地送进上海，并且在凌晨时分被带到船上。从我们的住处来看，我们这一趟旅行是愉快不了的。我们被安置在船舵正上方的一个船尾小舱间里，坐在水手们的床铺底下。船刚一开动，一个老水手便跑进来说，英国警察上船搜查了。我们必须藏起来。他急急忙忙把床铺下边一块木板上的螺丝拧开，掀起木板。下面是个黑洞；我们得下去伏在里边。不幸的是进口太窄，我的同伴腰围太宽，不得不由两位身强力壮的水手把他塞进去。他们重新把板子装上，拧紧螺丝。我们被埋在漆黑的船肚子了。好象在度过了漫长的岁月之后，我们才感到强大的船舵已经旋转了。船终于开动啦。

我们从躲藏的地方被放出来，这时已经是大白天，船已到了大海上了。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畏惧的啦。我们的朋友——那位老水手，领我们上来到一小块有篷子的甲板上，那儿有一根粗大的舵链在围绕着一个巨轮转动。我们总算见到了阳光，呼吸到了新鲜空气啦。不一会儿，我的同伴认为是吃午饭的时候了；他拿出了一包食物和几瓶啤酒。他开始饮酒作乐，还嘲笑我摒绝生活享受。忽然间，链条停止转动；船舵慢了下

来；船停住了。老水手跑来叫我们下去，有人已经把那块板子打开。一艘英国战列舰打信号叫我们的船停住。我们再次被安全地埋了起来。但我的同伴不愿耽误吃饭；他把那包食物带了进来；几瓶啤酒只好留在外边了。等我们俯臥好了以后，我听到一阵包装纸的沙沙声，在黑暗中，我那好心肠的同伴递给我一个什么东西，他说：“先生，吃根香肠。”我还是个素食者，不理解香肠为何物。他嘟嘟囔囔，奇怪我能饿肚多久，他却开始吧唧吧唧地大嚼起他的食物来了。

不一会儿，头顶上有了脚步声和说话声，我们大吃一惊。一群人从梯子上走下来，到了水手们的小舱间里。我们能够听到他们讲些什么。有个人专横地说：“我肯定知道那些家伙在船上；他妈的！躲到哪里去了？”说话的人为了加强语气，把穿着沉重皮靴的脚用劲地踩在我们头顶上的那块木板上。同时我听到一声可怜的低语：“先生，这下子可完了！”我听了这话感到噁心，禁不住要笑出声来，可是，就在这时候，一些看不见的温暖液体把我的衣服弄湿了。我不得不在这样污秽的情况下挨过相当长的时间，心想这位革命英雄会不会已经怕得晕过去了。我们的好朋友——那些水手们，被殖民地凶暴的警官威吓了好一阵子。他们顶住了这场考验，我们的苦难终于解除了。那已经是下午相当晚的时候了。全船被严格搜查；每一件货物都挪动了位置。当然，这过程持续了好多个小时。

我们再次被允许回到上面那间小舵轮舱时，太阳正要落下去了。我的伙伴象饿狼般扑向食物，接连喝了好几瓶啤酒。我吃了点面包、牛油和乳酪。晚上空气非常清新，但巴格万·辛格仍然心惊肉跳。基本需要满足了以后，他焦急地问道，那

些畜生夜里会不会再来？年老的护卫天使又作了保证：不会来了，我们已经驶出领海，在我们抵达神户前这四天里，谁也不能碰一碰这条船啦；到了神户时日本人也不敢冒犯美国国旗。

开始的经历使我形成了偏见，我十分讨厌那个跟我一道偷渡的伙伴。再和他相处近一个月时间是难以忍受的。船过神户后，将在横滨停泊。那将是我逃脱的最后一个机会。我左思右想，船快到神户时，我决心离开这条船，希望能找到其他办法渡过太平洋。作为最后一步，我可以和拉希·比赫里联系。他也许能够帮助我在一条日本船上弄到一个舱位。

我们这艘船将在神户港过夜。抛锚时天色已黑，但是船并没有靠近码头。许多小划船聚集在船的周围。溜到其中一只船上，并划到岸上是可能的。我向我的伙伴提出了一个诱人的建议：“让我们乘一个划子上岸，到市里好好玩一玩。”他兴致很高：“对，路过日本而不到艺妓区去看看，真是遗憾。”我们去和我们的老朋友商量。他同意让我们从绳梯滑到靠近船舵的一只划子上，但是要我们在黑暗掩护下返回。平安上岸后，我向我的同伴透露了我的意图：“我不再返回停泊在神户的船上去了，因为我必须到东京去见拉希·比赫里，商量一些重要事情，等船到横滨时我再赶上它。”这当然是为了甩开那个讨厌家伙而编造的一片谎言。他迫不及待地去寻求夜间欢乐，所以我们便容易地分手了，比我所预想的容易得多。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急忙奔向车站，去赶第一班到东京去的火车。

我不愿冒险再去会见拉希·比赫里。千万不能让日本警

察发现我又回到日本来了。若再落入陷阱，我就逃不走了。我到了东京一家旅馆，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屋里，最后，想出来一个横渡太平洋的计划。在中国的时候，德国人给我弄到一张法属印度的护照。那是发给一个本地治里人去巴黎学习神学——一种无害的职业的。但作为一个正式的旅客，护照需经美国签证。我下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胸前戴上一个金黄色的十字徽，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去访问了美国领事馆。接待我的是一位青年妇女，她向我询问来意。听我讲完编造的故事后，她拿着我的护照走了。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问我是否仅仅是经过美国。我这个自封的基督教教士又编造了一个谎言：我急于尽快地赶到巴黎，参加神学院下学期的学习。几分钟之后，她拿着护照回来，上面盖了章，这个奇妙的印章给我打开了通往美国的大门，如果实际上不是通往天堂大门的话。当时我一定是喜形于色了。因为令我惊异的是，那位方才几乎扮演了我的教母的年轻女士竟和我握手，向我表示祝贺。到巴黎去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啊；她但愿能和我一道旅行。一个年轻的印度基督教徒会是个好旅伴。她是多么希望有那么一天，她能被派到巴黎领事馆工作啊。

我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我在半道上走进一家基督教书店，买了一部皮面细纸精印的《圣经》来装璜门面。我又到一家轮船公司，订购了两天后开出的一班船的头等舱位。这样，一切保证安全横渡太平洋的必要条件完全具备之后，我决定作点莽撞事——通知拉希·比赫里我在日本，正要动身经过美国前往德国。我取得了上次我在东京遇见过的一位印度商人的协助；他设法把这个消息传达给了拉希·比赫里的联络

人。长话短说吧，半夜里，我见到了拉希·比赫里，会晤后我径赴横滨，登上了一早启碇的一条船。

这是我第一次舒适的航海旅行。这船是一艘豪华的大型日本定期轮船。但在那些年代里，最快的轮船也要大约两周时间才能渡过太平洋，包括在檀香山停泊一天。从上海到神户并不是我第一次偷渡。在中国海来来回回——从爪哇到印度支那再回来，然后再从爪哇到菲律宾——都是以那种方式旅行的。那样的旅行不是经常愉快的，然而有时候也很令人兴奋——为了避过香港，在公海上从一只船乘救生艇转移到另外一只船上去。

以前我曾两次作为合法的旅客从马德拉斯横渡孟加拉湾到槟榔屿，然后又折回来，因为不需要护照。那时我还是一个阅世不深的青年；我对头等舱旅客的欧洲生活方式完全陌生；同船的人都是上流英国人——盛气凌人的军人、殖民地官吏、橡胶种植园主，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对待土著人的态度，如果说不是傲慢和难以接近的话，也是冷淡和以恩人自居。我自然感到非常不自在，在旅程中毫无愉快可言。

这次横渡太平洋的经验完全不一样了。在这些年中，我已经变成一个见过世面的成人了。虽然仍是一个素食者，可是我已学会欧洲人吃饭和穿衣的方式，以致在一群陌生人中间我并不感到尴尬。

但是，横渡太平洋的两周船上生活，在某种意义上说，真是如履薄冰啊。在头等舱餐厅里用饭的船上官员当然都是日本人。旅客多半也是日本人，其余的来自日本、中国以及其他东方国家的旅客几乎都是美国基督教传教士。有些人曾在印

度住过多年。由一个异教徒装作一个饱学的基督教神学家，或者装作一个渴望当高僧的温顺的新教徒，人们可以想象得到这是多么难乎其难。我隐约地预感到这种情况，就选了一个单床位的舱室。这样，大部分时间我可以躲开熙熙攘攘的甲板。但是那样也会惹人注意，除非我伪装晕船，可是我又耻于作假。在著名的波涛汹涌的中国海上颠簸，已经把我锻炼成一个能够吃苦耐劳的航海老手，我为我的顽强感到骄傲。在马尼拉和长崎之间这段航程中，连续两天，船颠簸得象一艘小轻艇，旅客中只有我一个人能在甲板上顶得住。

问题是我不能在横渡太平洋的两周航行中一直不露面。在餐桌上，我坐在这样两个人中间，一个是印度南方的青年女基督教徒，她是去美国进修师范教育的；另一个是在东京大学教哲学的美国唯一神教派的牧师。后者倒是一个相宜的伴侣，因为他谈起话来通常采用独白的形式。我只要专心聆听就行了；他的谈吐很有风趣，虽然他的神学有时颇为深奥。有一天，他用手指拨弄悬在我表链上的金黄色十字架，问我为什么佩戴那个东西。一个基督教牧师向我提出那样不虔诚的问题使我大吃一惊。我对于基督教内部各教派之间错综的差异毫不理解。我不知道唯一神教派的教徒不相信圣父、圣子及圣灵三位一体的说法，他们也不相信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故事。因此，我的回答还是原来的一套。他以他那特有的温和态度嘲笑我。我真的相信耶稣确有其人，并在十字架上受过难吗？我更为惊异了，我退居防御地位，并说我之所以戴十字架是因为它是最高理想的一个象征——为了一个理想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谈到这里，那位哲学教师开始了他的长篇独

白,他的那个独白与其说是表达了什么明确的意见,倒不如说是在那里沉思默想。

另外的那个伴侣就讨厌多了,虽然我十分相信,她并不是有意找麻烦,而只是要表示友好和殷勤。我和她都是印度人,虽然都背叛了印度的国教,但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我们交谈各自在印度度过的童年时代,这样就开始熟悉起来了。祖国文化统一而语言复杂,这一点给我帮了忙,使我能够解释为什么我是本地治里人却又不讲本乡语言泰米尔语的道理。我原籍是孟加拉,生在昌德纳戈尔。我以法国公民的身份,居住在本地治里只不过几年,目的是为了和法国更接近些。我这个四海为家的理论简直把格雷女士(这是她的名字)迷住了。事实上,我才知道她是个孤儿,由一个基督教组织抚养成人;她只会说英语,并且已经教英语多年了。她和一对老传教士夫妇一道旅行,象是他们的养女一般。虽然格雷女士皮肤是棕色的,但那两个体面的美国人显然不愿意自己的“保护人”和一个有色人士过于接近。但她对她自己的举止有很好的解释。她的肤色不但阻碍了她和白人旅客交往;就是那些日本人都都装模作样,象是上等民族。幸而,她并不注意这种歧视。除了她坚持要和我在一起的时间以外,我总是坐在甲板上僻静的地方,反复地阅读《圣经》。这是一个于我有利的做法。旅客们在窃窃私语,说我是一个肯定能够进入修道院的神学学生。

一天早晨,甲板上出现一派新气象。一天以前,日本旅客还都穿着他们的民族服装,虽然高级船员在就餐时穿美式晚礼服。可是那天清早,和服不见了;所有日本旅客都整齐地穿

上西服。格雷女士自己没有穿印度妇女披的莎丽，她讥笑日本人是沐猴而冠。我很同意她的看法；我一般也不喜欢日本人。这种表面上的变化是由于船就要到达檀香山了。下午，我们到达了那个美国文明的前哨。所有旅客都下了船，在那个快乐的城市里欢度一宵。哲学教师邀我下船，在海滩上漫步。我们回到船上，从甲板上远眺，我看到第一个美国城市灯火通明的景象，这一夜我过得十分安静。

3. 我的新生

在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菲律宾、日本、朝鲜、及中国漫游了一年半之后，我于1916年夏天在旧金山登陆。一个本地治里的新信徒横渡了太平洋要去巴黎进修神学，他是从《圣经》和悬在表链上的金色十字架恰当地装扮起来的。那时美国正在经历着战争歇斯底里的强烈风暴，一阵这样的风暴迎来了一位来自东方的不出名的客人。

第二天早晨，报纸上刊出通栏大字标题：“神秘的外国人到达美国——著名的婆罗门革命者或者危险的德国间谍”。我在屋里匆匆吃过早餐后，就从旅馆出去，投奔附近的斯坦福大学所在地帕洛阿尔托镇。在那里我结识了达纳戈帕尔·穆克赫尔吉，他才二十岁出头，就以诗人著称。他是我的朋友贾杜·戈帕尔的弟弟。他热烈地欢迎我，并建议我放弃过去，重作新人。于是，就在这天夜晚，在斯坦福大学的校园中，M. N. 罗

易诞生了。在美国西海岸两个月之后，我横跨大陆，在纽约城庆祝我在精神上及政治上的新生。

我实际上是以与德国联盟向英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革命民族主义”的专使身份来到美国的。沿着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尼塔杰的足迹，我是经过这里前往德国的。我的长期的冒险旅行在纽约停了下来，如果有朝一日我写《印度境外的印度革命》这样一部惊险但教育意义不大的故事书的话，我将叙述停在纽约的原因。不过，话得说回来，失望并不是糟糕透顶的事情，事实上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这次失望有助于我放弃那劳而无功的过去，过去之所以劳而无功是由于眼光不远啊。这次失望还有助于我窥探——仍然是迟疑不决地——那渺茫未来的新生活，这种新生活恰巧充满了大有可为的冒险事业、丰富的经验，并且最后也充满了失望。这是在一个新世界中令人振奋的旅程的开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保持中立的最后半年，对于到那个自由之邦去寻求对自己事业的同情和支援的印度爱国者来说，确实是一个困难时期。在那以前，他们进行反英宣传，曾得到美国各界群众的很大鼓励。象拉拉·拉杰帕特·雷那样的流亡者，可以和自由主义的报界及论坛随时取得联系。但他们中大多数人在寻求支援和联盟时并没有清楚的识别能力。结果使得印度的民族主义的宣传跟德国的宣传混淆到一块，从而逐渐被认为是违反了美国的中立。威尔逊政府在1916年曾以“他已使我们免于卷入战争”的口号在选举中获得胜利以后，但是不到半年便放弃了中立，因为中立不再是一种合算的主张了。在那个过渡期间，反德歇斯底里达到白热化；处在

那样狂热的气氛中，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反英宣传自然被贬为亲德。差不多在一夜之间，印度民族主义者就完全丧失了美国人对他们的同情；再没有人听他们要求人们拿出美国革命时代的反英传统的宣传了。在美国的印度民族主义者被怀疑为德国间谍，美国参战后，他们大批被捕，并且被当作德国特务受到审讯。

“鲁西塔尼亚号”^①被击沉的事件好象在狂烧的烈火中泼上油脂。大量的美国金钱处在危险中。如果协约国战败，就将全部丧失。以威尔逊总统为代表人物的美国理想主义，从一开始就把同情投向横遭普鲁士军国主义蹂躏的比利时，和被这个野蛮力量劫掠的法国。有权有势的实业界却赞成中立。不过，当德国潜艇妨害到有利可图的军火运输时，对和平主义的偶然支持便停止了，而且转化为主张美国参战，以挽救美国在欧洲的大量赌注。

1917年年初，又增加了另外一个因素，这对于美国的政治理想主义起到不可抗拒的作用。由于民主国家和沙俄结成联盟，威尔逊关于“使全世界的民主不受威胁”的口号就失掉了它的大部分号召力了。在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与莫斯科的野蛮行径之间何取何舍呢？假如俄国的蒸气压路机开到了来因河畔，欧洲的民主是否更安全呢？1917年2月，当俄国君主专制政体被推翻，一个自由民主政府成立之时，这些麻烦问题一夜之间就都消失了。因为新政权是在宫廷丑闻和政府极端腐败无能的混乱状态中产生出来的，它必然是虚弱的，不能抵

^① “鲁西塔尼亚号”(Lusitania)，英国轮船，1915年5月7日被德国潜艇击沉。——译者

抗德国的全面进攻。德国的战争机器在消灭了俄国之后，就会把它的全部力量投向西线；那时候，协约国的事业就不可挽救了。

在力量对比发生了戏剧性变化的情况下，“使全世界的民主不受威胁”的号召，听起来就更有迫切意义了。由长于精打细算的实业界所支持的政治理想主义，把美国舆论引向赞成积极参战，以驰援岌岌可危的民主国家。6月7日^①，美国向德国宣战了。在国会中唯一提出异议的是仅有的一位女议员，在议会无可挽回地支持“以战争结束一切战争”的主张时，她放声大哭了。

顺便说一下，这是对在美国的许多德国宣传人员和印度民族主义者的一个猛烈打击。在美国的德国宣传人员怀有这样一种妄想：两千万德裔美国人在疯狂反英的爱尔兰裔美国人的支持下，将起来造反——不让他们自己已经归化入籍的祖国和帝国主义协约国站在一边。在美国的印度民族主义者则急切地盼望英国失败，因此必然地坚信德国军队是不可战胜的，这与他们的德国朋友和保护人的幻想一模一样。但是被战争歇斯底里患者嘲弄为“半吊子”美国人的条顿血统公民，仍然忠实地坚持他们已经归化入籍的祖国的立场，这使那些指望他们另行其是的人大失所望。有个比喻的说法，血也许会浓于水，但是在现实生活里，血已变得很淡了。与原来祖国的感情联系，已让位于在新祖国的既定的利害关系了。实际的忠诚不是由感情决定，而是由为自己利害打算的人之常情所决定的啊。

^① 美国对德宣战的时间是4月6日。——译者

比失望更坏的事情正等待着在美国的德国人及他们的同盟者。德国宣传工作的头头们在外交特权掩护之下进行活动。他们的特务人员和印度革命者会晤，共同策划运送武器到印度去。整个计划中有许多虚假的成分。对于许多参加者来说，那简直是一个骗局。有一个名叫斯塔尔-亨特的美国人，从当时德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海军武官冯·巴本上校那里拿到一笔巨款，用来购买武器，并且租用一条轮船运到印度去。那船确实从加利福尼亚南部的圣迭戈港驶出去了。这是1916年的事情。整船的武器将要来到的好消息传到印度。我到爪哇去迎接这宗宝货，发现那所谓载着传说中的“金羊毛”的船，是艘空空如也的旧油船，它已被澳大利亚海军巡逻队捕获，开到新加坡去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许诺援助印度革命者的故事，有朝一日也许会再详细谈到。现在简单提一下，只是为了说明整个事情是多么虚假——冒险者赚钱，天真的印度革命者被愚弄。到1915年年底，我在巴达维亚遇到斯塔尔-亨特，他住在一家豪华的旅馆里，仍然受到德国谍报组织的信任。后来我又在墨西哥遇到他，他在从事其他同样性质的可疑事情。

在美国参战前几个月，美国国务院要求德国外交部召回冯·巴本。他被指控滥用外交特权，进行反对一个友邦的活动。很显然，德国宣传人员和与他们有联系的印度革命者的秘密活动已被美国谍报组织侦察到了。美国谍报人员无疑也参加了那些“密谋”。我有理由相信斯塔尔-亨特就是其中的一个。另一方面，许多德国间谍，有的位置还很高，对于发财致富的关心甚于帮助祖国赢得战争。我在爪哇遇到过两个这

样的人物，后来我在 1917 年夏天到墨西哥时，又见到他们两人在那里过着奢侈的生活。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知道的、不知道但可想象得到的——美国政府对于“印度人与德国人密谋违犯中立法”一事，在中立已经不成为争论中的问题以前，一直未采取行动。在对德宣战一周内，加利福尼亚州及纽约的许多德国间谍和印度革命者就被逮捕了。黄色报纸的消息闪电般传遍全美国，报道发现了“印度人与德国人的密谋”，说这种密谋组织在远东及东南亚各国都有派出机构。一天早晨，我在听完拉杰帕特·雷讲演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校园时，也被逮捕了。

我在 1916 年秋天到纽约时，拉拉·拉杰帕特·雷也在那里。他在前一年来到美国进行巡回宣传，他的口才赢得了自由思想的人们对印度独立事业的同情。象一位战胜的英雄一样，他取道伦敦回国。在伦敦他没有获得允许继续旅行，也不让他自己冒险继续前进。这种含有深意的威胁表明，他回到印度将被逮捕。因为怀疑他在美国的时候，已经和敌人建立了联系，有了密谋。和所有的殖民地民族主义者一样，他当然是亲德的；但他非常谨慎，不积极参加任何秘密筹划。他不愿冒被捕的危险，便回到了美国。他很气愤，反英情绪自然比以前更加激烈了。那时，在这自由之邦政治空气发生了变化，更为不愉快的事情正等待着这位反英的十字军战士。他那些有自由思想的朋友们对他冷淡了，因为他们认为任何反英的宣传，不论在报刊上写文章或是讲演，都是给德国帮忙。

这位老人感到孤寂，顿生乡愁，甚至连外国风味的食物也讨厌了。每次我给他做点印度口味的饭菜，他就很高兴。有

一天，他问我是否能做拉丝茹腊^①。孟加拉的文化影响了旁遮普人的口味，这使我感到自豪，于是就动手去做。在那个文明的野蛮国家里当然是弄不到印度三角豆的。在国内时，做这种食物是在牛奶煮开时加进一种酸汁。总之一句话，连我自己也很惊讶，实验居然成功了，那个老头儿欢喜得象个孩子。我们成了好朋友。可是我们的友谊不仅仅是建筑在研究吃这一方面。我们都是各自的道路上遇到过挫折的失意人。他盼望回到祖国，在死之前向群众大会作一次演讲；我呢，我盼望到德国去寻求援助，建立一支军队解放印度。我们彼此都满腹愁绪，在我们都无能为力的境况下惟有尽力相互劝慰而已。

我们在寻找意气相投的伙伴，当然已结交了一些新朋友——他们都是“激进分子”，一般美国人把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都叫作“激进分子”（共产主义者尚未诞生）。他们既不反英也不反德；他们是反战的和平主义者。其中有些是反帝的，虽然令我可笑的是，我听到他们中间一位唯一神教派的教授还坚持说殖民地没有经济价值。作为民族主义者，我们不同意他们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论；作为印度人，我们有我们的精神上的特质，我们强烈反对马克思唯物主义。然而，他们很同情附属国人民要求自由的愿望，这样就给拉杰帕特·雷提供了一个新的讲坛。听众很少；绝大部分的讲演倒不如说是讲演者在自我欣赏罢了。拉杰帕特·雷是一个演说家；我可不是，直到那时，我的全部政治生涯只是一个密谋者。

我们的民族主义意识赋予我们一个新使命；那就是驳斥

① 拉丝茹腊 (Rasgollas)，印地语，印度加尔各答的一种甜食。——译者

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并与马克思唯物主义进行斗争。为了与我们的对手战斗，我们感到有必要先了解他们的情况；我们的对手偏巧就是我们的朋友和同情者。我是分文不名的；拉杰帕特·雷买了马克思的著作和其他的社会主义经典文献。就我来说，这次学习不象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拉杰帕特·雷是讲坛上的干将了嘛。我的不长进不会影响他的热情。人生的关键时刻终于到来了；这也是一个十字路口啊。

一天，拉杰帕特·雷在一个社会主义者大会上结束他的讲演；他讲演的主题是支持这样一种学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劳动人民的经济剥削是多么荒谬，可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却仍然处在殖民统治之下。他的反英的激烈言论和对印度群众贫苦的生动描述显然感动了听众，到场的人都表示坚决反对各种人剥削人的形式。就在这时，忽然来了个大杀风景。大厅后排一位听众站起来提出一个问题。他首先表达了听众的一般意见，说大家都反对殖民剥削，都同情印度的合法愿望。接着他又代表所有的听众，想弄清楚“民族主义者对于结束印度广大群众的贫苦有什么打算？”讲演的和提问的人热烈地辩论起来。前者含糊其词地回答说，“啊，让我们首先成为我们自己家里的主人。”对方不满意这个回答，演讲的人就变得很不耐烦，很激动了。质问的人逼问他的观点，甚至以挑战的态度问道：“对于印度广大群众来说，被本国资本家剥削和被外国资本家剥削有什么差别呢？”拉杰帕特·雷勃然大怒，反驳说：“一个人被他兄弟踢一脚和被外国强盗踢一脚那是完全不同的。”听众惊得鸦雀无声。起初我和拉杰帕特·雷一

样,对那些流浪汉(这是对美国劳工运动中的极左派的一种贬称)的厚颜无耻感到愤怒;但同时也感到于心不安;我们这方面有些论点就是不对头嘛。猛然之间,我的心上闪过一道光芒;这是一种新的光芒。

我独自离开了那个大厅,心里仍然乱糟糟的,但我依稀看到了自由的另一种景象。我避开拉杰帕特·雷和其他印度朋友,常到纽约公共图书馆去读卡尔·马克思的著作,我在那些著作中发现了新的含义。除了它的唯物主义哲学外,我很快就接受了社会主义。唯物主义哲学是我在战斗中的最后一条壕沟,以后我还据守了很长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以来,我在以民族主义的观点写一篇批判和平主义的文章。文章的主题是,殖民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因此受奴役的人民的解放,特别是印度的解放,是持久和平的条件。从那件事以后,我所进行的研究使我怀疑以前在我的文章中对国际纠纷的分析是否仍站得住脚,以及从那些论点得出的结论的正确性。我又重新改写这篇论文,比原来的篇幅长多了。为了争取帮助以便能使它发表,我把原稿给一位第一流的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者看过。几天之后,我在激进的知识分子私人集会上遇到了他,他热烈祝贺我,说我以社会主义的观点揭露了战争的经济根源。我被欢迎加入那个团体成为新会友,成为第一位从印度来的会友。

在那以后不久,美国参战了。我逃往墨西哥,才免于监禁。我来不及看到我的第一篇社会主义论文刊登出来。在新的流亡中,我在一位教师的帮助下翻译那篇论文,用这样的办法来学习西班牙语。我的论文作为“一封给威尔逊总统的公开

信”发表，标题是，“通往世界持久和平之路”——这是 M. N. 罗易的第一篇著作。

4. 一个使命的结束

在日本，我遇到一位名叫古普塔的人，他自称是印度革命委员会驻柏林代表。他是从美国到日本来的，他秘密地同拉希·比赫里住在一起，也被日本政府命令离开日本。拉希·比赫里还结交了头山满，后者是经日本政府赞助的泛亚运动的理论家。那时头山满已经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了；后来他创立了臭名昭著的“黑龙会”秘密组织（法西斯恐怖组织）。古普塔告诉我说，要想在美国办成事情，非他古普塔不可；他说，驻华盛顿的德国大使甚至对不是经他引荐的印度人都一律不见。要真是那样的话，自然我也得要古普塔给我推荐啰。但是他又有了不同的主张：他认为我到美国去没有什么用处；我应该留在远东，必要的话，由他去华盛顿转赴德国，使在中国购买军火的计划获得批准。不过我在日本可不能久待，否则就要被发现，再次被逐；我再冒很大风险回到中国去也没有什么意思，而且我在中国暂时也没有什么事好干。由于这些正当理由，我不想改变到美国去的计划，而建议古普塔也回美国去，以便我借他的帮助去见德国大使，然后前往德国。他显然不喜欢我单独赴美，而且他急于在我之前横渡大洋。他居然劝我，万一我先他而到纽约的话，我不应去见任何人，要等他

到了纽约后再说。

正如我在前一章里叙述的那样，我在戏剧般的环境中在旧金山登陆以后，不得不隐蔽一些时候，大部分时间是在斯坦福大学所在地的那个小镇帕洛阿尔托度过的。我在那里遇到戴维·乔丹博士，并结交了其他重要的朋友和相识。后来在横穿大陆之前，我又访问了加利福尼亚州的许多地方。几个月之后，我才在纽约重新见到古普塔。这时他已改行，四十多岁的人了，还做一个大学生，住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宿舍里。他对于密谋活动已感到厌倦，指责柏林委员会当他在远东前线冒着生命危险时把他丢下不管了。古普塔解释说，他对我无力帮助了。当我问他谁接替了他在革命组织中的位置时，他耸了耸肩；而且显然没头没脑地对一位叫作查克拉瓦蒂博士的人说了些诽谤的话。

我在丛林般的摩天大楼中陷入了困境。时令已是深秋，马上过冬了，我只有一套中国绸衣，囊空如洗。我在横穿大陆的时候，象个呆头笨脑的乡下佬，两只箱子丢了一只；我仔细包装好的另外两套服装的裤子都在里头呢。

我在巴森特·库马尔·罗易家暂住了几天，他从本世纪之初就住在美国。虽然他自己不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但却和一些老革命，如布彭德伦纳特·达塔（斯瓦米·维夫坎南达的兄弟）和塔拉克纳特·达斯（他后来在战争爆发时赴德）都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巴森特·库马尔所向往的是在文学界觅得一席之地。他组织了泰戈尔在美国的第一次巡回讲演，又为这位诗人写了一本传记。他态度和蔼，但由于他并不比我富裕多少，因此建议我去向拉杰帕特·雷求援。

我在巴森特·库马尔·罗易家作客数日，那所房子的底楼就是在美国的拉姆克里什纳—维夫坎南达布道团的纽约分团所在地。当然我拜访了斯瓦米，并向他致敬。他邀我去参加他下一次的每周讲演会。那套房子的客厅就是讲堂。听众大约有二十人上下，大部分是年龄较大的太太们及几个老头子。太太们当中有几个已经起了印度姓名，披上了印度妇女的莎丽——姓名中都用了女神的名字。在印度的时候，我听到许多关于在美国传播吠陀教义的事情，所以我很重视参加在旧金山和洛杉矶的拉姆克里什纳—维夫坎南达布道团各分团的活动。到处我都见到同样的景象；这证明物质的西方还不会自赎罪愆，而要对印度的唯灵论的神示作出响应。这对于那些相信从印度来的传教士的人来说，真是大失所望的事情。

在大量的津津有味的谈论中，巴森特·库马尔·罗易告诉了我一些有关在美国的印度革命者的消息。那是交织着妒忌、阴谋、欺骗的令人泄气的故事。他证实了查克拉瓦蒂博士已代替了古普塔，成为柏林印度革命委员会的驻美代表，并警告我不要期望从那位新人那里能得到任何帮助。在我询问下，他补充说，柏林印度革命委员会成员间的争吵是这次人事变动的根源。

按照古普塔所暗示的线索，并参照从其他印度人方面获得的消息，几天后，我登上位于中产阶级上层人物住宅区附近的一所三层楼房的门前台阶。我一直按铃，但是无人开门。使我惊讶的是，这所房子的所有窗户都关着，不象有人居住的样子。我退回到人行道上，发现有一座楼梯向下通往地下室，空

房的看管人应该是住在那里。我就走下去敲门。过了一会儿，里面有人从门上一个小洞往外窥视。现在，我和一个披着肮脏寝衣的干瘪的人面对面了，他那乱蓬蓬的头发直往下滴油。我看他不是看门人，看门人总是黑人。一点也不错，他是我的印度同胞；然而我却是在寻访一位哲学博士呀！正当我感到尴尬之时，他帮了我的忙，他不很客气地往旁边一闪，意思是叫我进去。我走进去；门随即关上，并且仔细上了闩。我问查克拉瓦蒂博士是否住在这里，他咧着嘴笑了笑说：“请坐。我一直在盼望着你呢。”

那么，他就是那位神秘的博士了。我在纳闷，为什么他把地下厨房当作会客室；这幢房子的其余部分作什么用呢？谁住在里面？对，这些问题都与我无关。我问他，他接替了古普塔的柏林革命委员会代表职务是否属实。他把手指伸进摆在厨房案子上的一大瓶凡士林中，把一团油擦在他头顶上；然后点了点头，表示答复了我的问题。

这位博士给我的印象是，他不象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我也许是错误的；但是，如果他在革命运动中曾担任过什么重要职位的话，他的名字我不会完全不知道。我想，还是不告诉他关于在中国的计划比较稳妥。我单刀直入地向他提出我要到德国去，希望他给我进行必要的安排。他闭上眼睛，象是在想别的事情，然后问道，“为什么呢？”我为他的装腔作势所激怒，回答说：“我不是去游山玩水的；我有重要的信息带给那里的革命委员会。”这矮子从他那假装的半昏迷状态中醒了过来，又涂了些凡士林在头顶上，换了口气说：“好吧，好吧，让我们看看该怎么办。明天下午请再来一趟，我得向柏林请示

一下。”

指示一直没有来。我怀疑他根本就没有请示过。但是我到那里去过好几次，好容易才窥探到那所房子和它的居住者的一些秘密。后来我才了解到，那所房子里还住着另外一个人，是一个长着红山羊胡子的德国博士。他的姓名我忘记了。他大概是个医师，因为在华丽的广告印刷品中，那幢房子被描绘为一个治疗各种疾病——包括肉体的和灵魂的——的诊疗所。那些小册子的封面上有从一朵荷花中浮现出来的双生子图画。查克拉瓦蒂很少外出；另外一位呢，差不多总是呆在楼上，或许是在从事现代炼丹术的某种试验吧。

有一天我去那里，看到查克拉瓦蒂穿得整整齐齐，刚走出门。那德国医师走下楼来，请我留下，令我大吃一惊的是，他要领我上楼去。几分钟之后，地下室的门铃响了。那位德国医师跑下去开门。查克拉瓦蒂走了进来，摘下毡帽子，把一大块凡士林抹在头上，把帽子重新戴好，他未发一言又走了出去。难怪他被人称为油滑革命的油滑领导。革命上加油滑二字当然不对；但是这话的其余部分确是对那位博士的真实写照，革命若由这种人物领导，是不能当作真事看待的。

事实是，他和任何革命都毫无关系。但是他也不是一个恶棍。他倒有点象个怪人，受到吹捧便能做出一些令人讨厌的事情。他那个德国伴侣是这出戏的魔鬼。毫无疑问，他是从事间谍活动的，他设法把他的朋友提到无论凭资历或功绩都与之不相称的地位。柏林委员会怎么会信任他，还是个谜。他们毕竟没有什么发言权，最后决定权操在驻美国的德国特务头子手里。他需要一个傀儡，而由一个丑角来充当这个职

务再恰当也没有了。

那是一所陈设豪华的房子，与其说它是一所富人的住宅，还不如说它是一个高级俱乐部。广告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怀疑，但是又拿不出证据来说它有什么问题。最不相称的一件东西就是那位印度博士；那位德国人如果装得不象一位真的圣徒的话，也有几分接近。他和我一直谈论印度教的神秘主义，以及那双生子的神秘经历。我却对于保持这样一个机构的目的更有兴趣。名义上的居住者显然不住在那里。我只能猜测，这里很可能是高级人物的一个秘密聚会地点。这样一个地方必然会引起警察的注意，但是为了获得进一步侦查的线索，他们暂时没有惊动它。

虽然如此，不久我便对找人帮忙使我能去德国一事感到失望了。在此期间，我接触到了新人物和新思想。这个经历是我一生中的转折点，我在前面一章中已经谈过了。对革命的一种新理解和对将来前景的新看法，逐渐减弱了我到德国去的强烈愿望。现在残留在我心头的、使我继续前进的唯一动力是这种思想：国内的同志们或许仍在满怀希望地等待我的使命成功。

从印度来的消息太少。报纸需要几个星期才能来到，而且能收到的也不多。美国报纸很少提及印度。信件都要经过严格检查；凡是涉及革命活动任何新闻的信件在印度那一头就被扣留了。从一个渠道或另一个渠道透露出来的消息足以使我得到这样的印象：从我第二次离开印度以后不久到 1915 年年中，革命运动的大部分杰出人物不是被捕判了长期徒刑，就是作为政治犯无限期地受到拘留。极少数未被逮捕的都隐

匿了起来；从国外根本不可能和他们取得联系。由运动的一位领导成员(此人还活着，但在政治上已不活跃了)率领的一班人，按照原来安排应该已去东北边境筹划接收军火，并把它送往内地了。我未接到有何安排的消息。假如我那希望渺茫的任务能够完成，那些军火将交给谁，运到什么地方呢？放弃这个使命的想法使我感到我辜负了对我的信任，但是从实际的观点来看，我再继续进行这个使命也不会再有什么用处了。

在感情(对老同志们们的忠诚)和明智地选择一个新理想之间的心理斗争，使我感到苦恼。我不能忘记那位几乎使我盲目服从的唯一的命令。在我第二次离开印度之前，我曾亲自护送贾廷达去隐藏的处所，后来他在那里战斗并且牺牲了。那个老人在答复一个浪漫青年的不加思索的誓言——“没有军火我就决不再回来”时，他怀着真挚的感情说，“快点回来，不论搞到或者搞不到军火。”这话对我就是命令。他是我们的父亲，也是我们的总司令。

贾廷达的英勇牺牲解除了我服从他的命令的道义责任。1915年秋天，我在经过马尼拉的时候，已经接到了那个噩耗。那时我的反应完全是感情方面的：必须为贾廷达报仇。从那时到现在才过了一年。但在此期间，我逐渐认识到，我之所以敬佩贾廷达，是因为他是人类至善的化身；这一点或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那样认识的必然结论是：假若我为建立能够表达人间至善的社会秩序这一理想而工作，那么，也就是替贾廷达的被害报了仇了。换句话说，我可以抛弃过去的使命，良心上也致受说我背信弃义的责任，因为一个新的任务，不但符合我的感情而且符合我的理智。否则，失望和厌倦将诱使我

在结束使命的同时，也结束我冒险的生活。

5. 我对美国警察和司法的体验

一天晚上，我从拉拉·拉杰帕特·雷的演讲会回去的时候，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被捕了，这件事前面已经提过。那场面简直和埃德加·沃利斯写的惊险小说一样：六个彪形大汉从四围黑暗之中向我猛扑过来；两支手枪瞄准着我。大概他们怕我这个印度革命者是个活兵工厂，因此丝毫不存侥幸心理。我猛吃一惊，问道干嘛这样；回答我的虽不是猛踢一脚，却也是相当厉害的一蹴，同时一声叫喊：“快！”转眼之间，我被拖到最近的校门，并被推进一辆正在等候的汽车里。这是我对印度之外的第三个国家警察的体验，是对美国人的粗鲁的体验——使人不很愉快的体验。日本警察很客气，虽然是虚伪的客气，而中国警察呢——是啊，他们是中国人嘛。他们让我跑了，不是出于同情心，而是由于极端无能。

车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我在一个阴沉沉的巨大建筑物铁门前被押解下来，并被带着穿过一条冗长而又昏暗的迷宫式走廊；在行进中那阴森而可怕的寂静，不时地被那些逮捕我的人使劲吐痰的声音所打破。他们嘴里嚼着烟草，燃着的雪茄烟蒂一直挂在嘴边。到达目的地时，我感到又惊又喜。我被带进一间灯火辉煌、陈设豪华的宽敞屋子里。那些原先逮捕我的人都被关在笨重的门外。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现

在我被交给可怕的纽约地方检察官了。

美国地方检察官虽然是有司法官身份，但同时还兼警察局长，因此，如同法国的刑法管理制度一样，在被捕的人被提到法庭以前，要受到检察官的亲自反复讯问。正如我亲身经历过的，这样很成问题的程序，目的在于把嫌疑犯弄得疲惫不堪，以此诱使他作出矛盾百出的认罪口供。这显然是违反不应对任何人搞逼供信这个正当原则的。这个程序中最糟糕的方式是臭名昭著的“拷问”。这跟使被告受酷刑差不多，与凯斯特勒在其《光天化日下的黑暗》一书中所描写的俄国逼供方法十分相似。

啊，这是一种有趣的经验，虽然也有点痛苦。我还年轻，才二十多岁；多年的恐怖活动锻炼了我的神经。一开始是很愉快的。那短小精悍的地方检察官以典型美国人的愉快风度接待我。此人远非善类，他打算问我几个问题，并且他确信一个“懂事的东方人”会说出真情，一丝不漏。他打手势叫我坐在一把大皮椅子上，并拿出一盒花冠牌雪茄。在这最优秀人种的国度里短暂停留的期间，我发现昂贵的雪茄是有钱有势的标志，而价钱便宜又气味难闻的雪茄则是无赖汉的粗野象征。这两者都在美国审判犯人的私室里表现出来了。到深夜，我逐渐得知，这私室就是那可怕的“坟墓”——超现代化的纽约的中世纪监狱，在那里，在地方检察官的任意摆布下，每一个待审的囚犯都要受到“拷问”。

我坐上了那诱人的扶手椅，但拒绝了雪茄。我的东方人的沉静自若，看来已气坏了文质彬彬的地方检察官。他的面部表情变得冷酷起来。“你是怎样进入这个国家的？”听起来就

象一条毒蛇发出凶恶的嘶嘶声。但这并没有使一个惯于同英印罪犯调查部的德纳姆和蒂加尔特之流进行类似交锋的人感到惊慌失措。“过海来的”，我的回答惹火了这位现代审问官。“那不用说，但你是从哪里登陆的？”听到我回答说，我不是雇来给警察提供情报的，他咆哮了：“我什么都知道，不要以为你可以骗我。”我说：“那么找这些麻烦干什么？我在你的掌握之中，你愿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又说：“我本来以为美国是个自由国家呢。”他对我这个该死的有色人的傲慢态度一定感到吃惊。好象是要获得精神上的支持或肉体上的勇气似的，他回过头去看了看站在他身后的两个大汉，他们显然是职位较高的警察。他们狞笑一下，那变黑了的牙齿衔着味道难闻的雪茄，眼睛恶狠狠地瞪着我。“是不是把他带下去，带到别的家伙那里去？”长官点点头表示下令，我就又被押出去，到了那散发着纽约夏天臭热的走廊，并被带到“坟墓”的内部，那个埋葬活人的地方。那几个司法官的看门狗在一扇格子门前停了下来，门内蜷缩着一个小小的人体，很难说是死是活。他们嘲弄说：“瞧这儿，小子，这里躺着油滑革命的油滑领袖——胆小的家伙；他把什么都倒出来了。你装假没有用；到老板那里去，向他招认了吧。”在回去的路上，他们又说：“我们已逮住了别的家伙——黑色的、棕色的、粉红色的。他们都在那儿呢，不要执迷不悟了，老兄。”

“坟墓”是个活人被埋葬几天甚至几周的地方，我们穿过令人毛骨悚然的“坟墓”内部，在那里进行了夜间观光之后，又来到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堂皇的门前。这一伙人的返回，大概已由某种秘密装置事前通知了。门立即大大打开。在这半夜

三更的时候，地方检察官还是象晚上开始的时候一样狡猾，他的薄嘴唇已紧紧闭成残酷的曲线，但又咧嘴一笑，表示欢迎。他以手示意，让我坐在桌子对面的宽敞皮垫椅子上以后，懒洋洋地靠在他的椅子上，精心修剪过指甲的手指照例夹着雪茄。他慢声慢语地说：“好啦，马丁神父，要象个真的基督教徒一样行行好事，可怜可怜我吧；天已很晚了。你知道，我是个结了婚的人哪。”

我横渡太平洋所用的护照上记载着那个名字。我已把这泄漏秘密的证件销毁了，但却记得，轮船旅客簿上登记了这个名字。可是，我马上警觉起来，装出惊讶的样子，但片刻的犹豫却给目光锐敏的审问官以可乘之机。他改变了外柔内刚的做法，挺起身子，下巴几乎伸到大桌子的中间，以令人恐怖而冷酷的声音压低嗓门说：“我知道，你是个十分狡猾、叫人莫测高深的人；但你已经看到了你是在哪儿！你想怎么办？在‘坟墓’的殷勤款待和早晨的清新空气二者之间，你可以任选一种。”

我要设法结束这场折磨，就应战说：“好啦，先生，我看见过比你们的‘坟墓’好不了多少的监狱内部；你吓唬不了我，但是我愿意出去。我有一个使命。（我仍然信奉一个使命呢！）我从来没想到伤害这个国家。我只想为我自己的国家服务。对这一点你有什么可反对的？”他若有所思，皱起眉头；然后以相当友好的语气说：“嗯，你违犯了我们的移民法。”这是我插话的机会了：“为什么要小题大作呢？我很快就要离开你们国家的。”

他态度严肃，站了起来；更使我吃惊的是，他绕过桌子走

过来，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嗯，我想暂时放你出去。明天上午 11 时，你要到市政厅出庭由大陪审团审讯。”他更仔细地看了看他的阶下囚之后，又用相当愉快的声调说：“我想你是不会跑掉的。再见吧。”他随即转向背后的人，下了命令：“把这位先生带出去，送他上出租汽车。他要回家。”

外边走廊上的侦探发起牢骚来了；他们显然不同意长官的命令。然而，命令还是命令。不一会儿，新鲜的空气使我从麻木中清醒过来。这并不是一个愉快的经历；一旦我知道自己进了“坟墓”，我就没有抱出来的希望。一般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出得来，无论如何也不会这样快，这样容易。

在出租汽车里，我尽量追忆傍晚以来所发生的事情。这象一个恶梦。但这梦做完了吗？一定是完了。我开始考虑未来的计划。在我到达我所居住的城北区以前，天已亮了。报童们大声叫着：“印度人德国人密谋已被揭露！敌特分子受到拘留！”我买了几份报纸。其中一份刊登了这样的大字标题：“油滑革命的油滑领导人被监禁在‘坟墓’里。”第二天上午我出去拜访，了解到头一天晚上一些印度政治流亡者已经被捕。被捕的人当中有查克拉瓦蒂博士，他自称是柏林印度革命委员会驻美代表。这个侮辱性的但是生动的标题，可算是黄色报刊的杰作了，指的就是查克拉瓦蒂。这个我已在前一章解释过了。

第二天在约定好的时间，我来到市内最热闹的地区一座阴暗的、算不上怎么堂皇的大厦门口。那儿有一片好象是帽子构成的汹涌澎湃的海洋（那帽下的面孔分辨不清），它经由无数小川似的狭窄街道正向内陆奔流。这惊人的场面并没有

引起一个才二十多岁、仅受过不完全教育的孤独的外国人的注意。现在，四分之一多世纪已经过去了，根据当时所获得的经验教训来看，我还能记得那是受个人意志驱使的人群。也许这就是所谓美国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吧。一个人群由一大批人组成，每个人都抱有“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态度。可是谁也不能独立于人群之外；他必须在人群中过活，作为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受人群的法律或非法支配。个人意志审慎地在人群中寻求满足，但未必能常常办到，这就是现代文明的一个矛盾之处。

我站在审判厅门前，身在蜂拥的人群之外，却被巨大的人群活动迷住了，被它那非个人的力量弄得有些眼花缭乱了。一只沉重的手从后面搭在我的肩膀上；前一天晚上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的情景又掠过我的脑际。我又被逮捕了吗？我转过身来，看见一张熟悉的宽下巴脸堆满了笑容，原来是前一天晚上看守我的一个武装人员，我才放了心。他把圆顶硬礼帽推到脑后，把那老是叼在嘴上的雪茄，不用手帮忙从一个嘴角移到另一个嘴角。他大声笑着说：“哈，你在这儿，是个守信用的人啊。”我跟着他进了大楼，并被引进一间相当大的屋子。一排长长的楼座观众席遮住了一直到天花板的整个墙壁。所有的座位都被外面蜂拥而来的人群中的一部分人占有了——大多是衣着相当邈邈的中年以上的男女。燃着的雪茄发出来的呛人气味弥漫在这挤满了人的屋子里。看来他们既不是富人的代表，也不是知识界的代表，更不是上流社会的代表。我面对着的是美国的伟大民主的一个缩影。

地方检察官站在对面那堵墙根的桌子旁，板着面孔，威风凛凛。

他领我到一個特別的地方(那兒沒有被告席),用相當陰沉的聲音說:“這就是大陪審團。”我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確實是大。”根據我個人親身經歷所獲得的法政知識,一個陪審團應該是由六個明顯負有重任的、威嚴的人組成。我在印度受審訊時是沒有陪審團的,理由是,特別任命的富有經驗的法官不應受外行人意見的影響。(1931年,我回到印度以後,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實際上以這個理由駁回了我請求由陪審團來審問的申請。那“富有經驗的”法官判了我十二年的流放,以後由同一高等法院減為六年。)現在的問題是,面前有一個由二百人組成的陪審團,而他們對我的案子似乎一點也不感興趣,這個意外情況促使我申訴了自己的意見。但地方檢察官卻生了氣。幸亏他沒有因為我藐視法庭而對我起訴。可是他嚴厲地轉向我說:“我控訴你違反美國的移民法。”既沒有調查任何人證,也沒有提出任何物證。大陪審團就批准了起訴。我簡直弄不懂這是怎麼回事;地方檢察官宣布起訴,卻又命令在審訊以前釋放我,要我保證按時出庭。我並不需要在任何保釋證書上簽字。這一切都十分不合常規。地方檢察官宣布當時的判決:“你將再被傳訊;要在規定日期和時間出席。但我警告你,別想逃跑,你將受到嚴密的監視。”

我好不容易才勉強裝出一副憂郁的面孔。我從個人經驗得知,美國地方檢察官是個土皇帝。但是他的天真使我這個頑固的恐怖主義者覺得好笑,我為自己能夠巧妙地逃避外籍居民法律的制裁而感到驕傲。我離開了法庭,下定決心再也不上那兒去了。自投羅網還沒有成為一個革命者的美德。而且理由還多着哩。在甘地以前的時代,政治犯受到監禁並不

是国家对他们的款待，而是要经受多年的苦难，那是对爱国心的一种严峻考验。当然那个时期的革命者设法尽量不进监狱，虽然他们之中有些人并不在乎上绞刑架。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死刑比五年以上的监禁还要好些。在我第一次离开印度的前夕，曾因在保释中逃跑而丧失了一万卢比保释金，如果不跑，也许就要服无期徒刑了。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但是革命者并不缺乏这种勇气；他们是实干家。

我是在去德国时路过美国的。既然已经弄明白在美国不能从德国人或者从柏林印度革命委员会的代表那里获得达到这一目的的任何帮助，我便决定探索其他可能的途径。毗邻的墨西哥处于一种永远革命的状态，看起来是个有希望的国家。如果我不能继续前进的话，我就想在那里定居下来，并在那里积极参加革命。印度革命不再是我唯一的急务了。我正在学习把革命视为国际上的一种社会必需品。而且，我从在纽约的社会党熟人那里得知，墨西哥正处在社会革命前的阵痛过程中。的确，据报道，一位名叫阿尔瓦拉多的将军实际上已在玛雅文明的发祥地尤卡坦州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我刚刚改信的社会主义信念，还不足以反对爱国主义的信念：在史前时期印度人就曾设法穿过大洋，在墨西哥殖民。基于这个原因，我渴望到那里去的念头就无法打消了。

在印德密谋被揭露以前，我就有了斯坦福大学校长戴维·斯塔尔·乔丹给阿尔瓦拉多将军的一封信，这位校长是当时美国主要的和平主义者。此刻不走，更待何时。但在一个有色人种很容易被认出的国家里，怎样躲避开警察呢？在印度国内行之有效的方法在这里行不通了。我只有好歹试试

看,只有破釜沉舟才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很明显,首先得改换住处。我选择了一个居民稠密的地区;在往新居迁移时,我没有察觉到有人监视我。那么,那只不过是吓唬人吧?犹豫是不明智的。侦探也许已经断了线,但是他们可以随时把线再接上。因此,一天晚上我离开新住处,到了一家饭店。饭后,我从另一扇门出去了,叫住一辆正路过那里的出租汽车,叫向火车站驶去。事先我已得知,那天夜晚有一列火车要开往边界城市圣安东尼奥。列车要穿过南方几个州,但由于我的棕色皮肤,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第三天中午,火车到了边界车站。天气热得烤人;当我动身时,纽约还是大雪盖地呢。最后几分钟的困难是全靠厚着脸皮克服的。我到了格兰德河的彼岸,我纵情大笑,因为我把美国人唬住了。

6. 征服者、造反者、土匪与内战

自从上个世纪 20 年代的独立战争以来,墨西哥的历史一直是一部动乱的历史。共和国是在西班牙帝国废墟上由殖民的地主阶级建立起来的,那些地主以他们干瘪的血管里流着征服者贵族血液而感到自豪。他们对祖国造反的动机,是出于不愿向已在欧洲失掉权势和威望的破产君主国称臣纳贡。但就文化上来说,他们仍是属于欧洲的,他们作为殖民地统治者,十分骄傲自大,而不肯同他们永久定居下来的所在地的本地居民混杂在一起。

然而，以往的天主教君主统治，由小心翼翼地注意保护其西班牙血统纯洁性的殖民地贵族统治取而代之，这并不意味着给本地人带来自由。所以，早在1811年就在教区神父伊达尔哥和莫勒洛斯领导下开始的独立战争，一直是混血的以及纯印第安人血统的墨西哥人与自称为征服者（最初的西班牙征服者）的后裔殖民地贵族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后，墨西哥人才取得了胜利。

尽管征服者的后代排斥本地人，但是一个人数众多的混血种族终于出现了。他们以土生土长和具有强烈的爱国心而自豪；他们也吸收了18世纪的欧洲文化，这种文化鼓舞了他们争取政治自由和社会正义的理想。他们推翻了西班牙的统治后，又向以天主教教会特权阶级为后盾的殖民地贵族的霸权挑战。就象18世纪的法国一样，后者成了由非混血的印第安人贝尼托·胡亚雷斯领导的民主势力进攻的目标。当内战正在进行之际，墨西哥由于得克萨斯州问题卷入了对美国的战争。然而，民主势力取得了内战的胜利，胡亚雷斯于1861年初成为共和国总统。

同美国的战争，以墨西哥割让北方的包括现在的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诸州的广大领土而结束。但是即使在那时，墨西哥的民主势力也不能巩固其对殖民地贵族和天主教特权阶级的胜利。胡亚雷斯政府刚一成立，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就要求它对由民主的敌人控制的以往历届政府所犯下的暴行和罪恶负责。他们采取了联合武装干涉的办法，迫使胡亚雷斯政府接受一笔巨额赔款的要求，并把一个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政体强加在墨西哥身上。但胡亚雷斯进行了多年

的英勇斗争，于 1867 年把倒霉的马克西米连皇帝赶了出去。

这位解放者死于 1872 年，这个国家又陷入了内战，一直继续到 80 年代，西班牙征服者的后裔波菲里奥·迪亚斯将军在北方邻国支持下建立了一个名为共和、实则独裁的政体。

在迪亚斯的独裁下，法律和秩序统治了四分之一世纪。外国资本，首先是英国的和法国的，后来是美国的，都蜂涌而来。因为搞实业需要和平环境，在墨西哥投资的外国人就劝说各自国家的政府支持压制民主党派的迪亚斯独裁。另一方面，在迪亚斯独裁下，殖民地贵族也重新恢复了他们的权势。由胡亚雷斯领导的革命被断送了。墨西哥成了来自欧洲拉丁族国家的有闲大亨们的游乐场所。农奴和奴隶在封建庄园劳动生产出来的巨大财富被大肆挥霍，以致墨西哥城及其附近的游乐地区成了纸醉金迷、风雅别致的中心。几乎占人口三分之二的纯血统本地人默不作声地辛苦劳动着，但混血种的中产阶级却珍惜对革命的回忆，把它当作他们的遗产。他们曾接受过教育，吸收了现代文化，并受到进步的社会和政治思想的推动。1911 年，他们发动起义，在弗朗西斯科·马德罗的领导下，推翻了迪亚斯的独裁。这是一次有土地改革的自由主义纲领的民主革命，它得到了农村群众的支持。

迪亚斯时代的墨西哥是少数特权者的乐园。殖民地的封建庄园主以及外国资本家制造了混乱和无政府的恐怖状态，在一位名叫韦尔塔的将军领导下组织了反革命。马德罗受到美国武装干涉的威胁，而且不愿使国家再次陷于内战之中，他于 1912 年辞去共和国总统的职务。美国的直接武装干涉是

排除了，但内战却无法避免。韦尔塔是个暴发户，是个傀儡。他既没有获得什么群众支持，也没有博得任何武装部队对他的忠诚。其他追求政权的人物也出现在舞台上。冒险家们打着革命的旗号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土匪活动。埃米利亚诺·查巴塔和潘乔·比利亚是两个最出名的土匪头子，都一心想要登上共和国总统的宝座。

我到墨西哥的时候，内战几乎还在全国激烈进行。以贝努斯蒂安·卡兰沙将军为首的一派已经占了上风，并且刚刚在一年以前已在首都站住了脚，一些州长和军事首领对他表示了忠诚。卡兰沙本人是西班牙血统的地主，但他却宣称忠于胡亚雷斯和马德罗的传统。他夺权后立即采取的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召集一个制宪会议。从当时的全国情况看，议会是不可能严格按照正式民主规定来选举的。但从实效上来说，它还是符合民主原则的。议员中有相当大的一批知识分子空想家，不仅包括那些具有先进的自由主义观点的人；还有相当数目的自封的社会主义者，其中也有很少数的无政府主义者；后者当中有一位实际上就是共和国新根本大法的作者。宪法是空想家的产物，仓猝草成，而且从实用观点来看是有缺点的。但它却使社会正义的原则合法化了，如自然资源——主要是土地和地下财富——的公有制。

因此，《克雷塔罗宪法》第十七条必然成为地主阶级和教会的众矢之的，因为与中世纪的欧洲一样，教会是拥有广阔的地产的。外国资本家也是怨气冲天。在迪亚斯独裁的黄金时代里，这些外国资本家曾经获得不仅开采宝贵的石油矿藏，而且开采所有其他矿物资源的长期的（实际上是永久的）特权。

反动的本国封建僧侣和外国金融寡头政治集团组成了一个反对卡兰沙政权的神圣同盟。

另一方面，比利亚集团和查巴塔集团进行了反对卡兰沙政权的战争。他们——特别是后者——指出卡兰沙是个西班牙血统的地主，因而赢得农村大众对他们的支持。这样，卡兰沙政府便腹背受敌了。

我恰巧能帮助卡兰沙政府摆脱这个困境。这是我在实际政治活动中最初的经历。现在我认为，帮助卡兰沙政权本身的稳定，从而也就帮助了墨西哥的民主革命，而我个人从中得到的好处还要更多些。

在国际上，卡兰沙政权处于有利的地位。英国资本家受《克雷塔罗宪法》的危害最大；但由于欧战的原因，英国只能向墨西哥发出几份外交上的抗议照会。约束难以驾驭的拉丁美洲各共和国的任务已一致同意分派给美国。自由主义的威尔逊总统实际上于1916年已派遣海军陆战队占领了墨西哥的韦腊克鲁斯港。但从次年起，这个北方大国也因参加欧战而不能积极干涉墨西哥了，这样就给予卡兰沙政权以喘息的机会。可是国内力量的对比则对卡兰沙政府十分不利。在这一方面，我成功地帮了它的忙，而我自己则在实际政治活动中获得了宝贵经验。

即使在激进的自由主义的《克雷塔罗宪法》颁布以后，卡兰沙政权也不得不与两个可怕的国内敌人作斗争。那两个敌人都迎合土生土长的人的心意，迎合被剥夺了财产而成为穷人的贪心。潘乔·比利亚在几乎要爬上总统职位的企图失败以后，便堕落为纯粹的土匪。然而，他用装扮罗宾

汉^①的办法仍然控制着北方两个州。在一个财富为极少数人所垄断而绝大多数人却陷入赤贫境况的国家里，这个角色必然是深得人心的。他还享有战略优势，其后方受到美国边界的保护，他的游击队所需要的武器和装备都靠越过国境偷运不断地得到补充。但是政府军队不能把叛乱者赶到最北边去。因为每次不管多少叛乱者越过边界，美国政府就让卡兰沙政府负责。美国武装部队终于以平定匪乱为借口，长驱直入墨西哥的领土。

查巴塔是个更难对付的敌人。他不仅是个土匪，可以说他还有一种社会基础。他扮演的角色和德国农民战争时期再浸礼教徒的角色相似。他的纯印第安血统是他最大的财富。他是人民的儿子，不可能脱离人民走向腐败的政权境地，因此他从未失去中世纪英雄的光环。甚至在墨西哥境外，他也被当作是为封建奴役下墨西哥人民的自由而斗争的革命战士而受到欢迎。他确实试图在他的武装追随者所占据的地区建立某种土地共产主义。

这个试验的消息吸引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知识分子，组成了他的所谓智囊团。后来，其中一些人讨厌他的追随者所犯下的暴行，离开了他那位于多山的萨卡特卡斯州的阿卡狄亚^②。另一方面，为革命的急躁病所驱使，那位起草《克雷塔罗宪法》的无政府主义律师加入了查巴塔集团，他希望人民之子要比那位文明的封建贵族卡兰沙更加冷酷无情。在查巴塔

① 罗宾汉(Robin Hood)，英国民间传说中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译者

② 阿卡狄亚(Arcadia)，古希腊的一个高原地区。——译者

集团的土地公社的生活经验，又使那位性急的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的幻想破灭了。那儿的一切，与其说是自由，倒不如说是放纵；有着大量的野蛮残忍行径，却没有什麼社会正义。他再次投奔另一方，与我成了朋友。虽然经验已经使他成为一个愤世嫉俗的人，而我却仍然充满了远大希望；他则讥笑我的希望都是幻想。

正当潘乔·比利亚在遥远的北方扮演罗宾汉的时候，查巴塔集团则在穷人的帮助和纵容下相当自由地在墨西哥城四周流窜。他们已不再是一种危险，却很讨厌。他们袭击村庄，抢劫财物，被俘后则受到同样残暴的惩罚。

离墨西哥城约二十英里有个郊区叫做圣安赫尔，附近的树林子里有一座古老的教堂和一个荒芜的修道院。成群的人到圣安赫尔去度周末或者别的假期。但是那个离墨西哥城只有几英里远的荒芜了的修道院，据说是查巴塔集团的一个前哨。那位无政府主义的律师，对我的希望与墨西哥再浸礼教领袖见一次面的计划大泼冷水，但他同意陪我到圣安赫尔荒芜了的修道院走一趟，那里有他的部下最近的哨所。我们到了那里，连一个活着的查巴塔分子也没有发现，只有几具死尸吊在路边的树上。村民们以异常冷漠的态度对我们说，查巴塔分子两天以前袭击了这一带；其中一些被卡兰沙的部下俘虏了，吊死了。把尸体那样吊在树上，这是警告其他查巴塔分子的通常作法。以后，我从个人经验中逐渐得知，这恐怖的作法是非常普遍的。

但是我在上面谈的只是一个序幕。在略述了我生活和成长所在的新环境的历史背景之后，我现在要言归正传了。

7. 睡女之城

人们认为墨西哥人是一个尚武的民族，这是由于他们的国家是以阿兹特克人的战神墨克西特的名字命名的缘故。在西班牙人到来以前，阿兹特克人会统治阿纳乌阿克。墨西哥山谷称为阿纳乌阿克，意思是“水边之国”。从地形学来看，墨西哥山谷是十分有趣的。仅仅在六百年以前，这山谷还是一群海拔八千英尺的湖泊。有着五十万人口的阿兹特克帝国的首都，以巨大的石头建筑物装饰着，屹立在许多岛屿上。现在的墨西哥城本来建在阿兹特克首都的旧址上，后来它被西班牙侵略者完全摧毁了。

但自 16 世纪以来，地质上发生了异常的变化。许多湖泊的湖床上升，形成了一个山谷，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就在这个山谷里。水流从干涸了的湖泊往下退，聚集在两个剩余的湖泊里（索奇米尔科湖和查尔科湖），构成了城南约十英里的著名的“水上花园”。

一到星期日和其他假日，水上花园就呈现出一片欢乐的节日景象。成千上万的人们乘着拥挤的电车从城里涌了出来，在用花环盛饰的明轮艇里欢度这一天。这一带鲜花多极了。墨西哥山谷位于热带的北部边缘，所以草木是繁茂的。即便在近岸的水面上也覆盖着密密丛丛的花草，在一望无际的碧绿中夹杂着一簇簇五颜六色的花朵。

水上花园水边的散步场所是墨西哥人寻欢作乐、打情骂俏和结友作伴的最富有代表性的地点，身穿艳服的姑娘们唱着流行的西班牙歌曲，由她们的殷勤伴侣弹着吉他伴奏着，其中一些青年冒着把船弄翻的危险，情不自禁地跳起舞来。有时灾难确实发生了，生气的小姐们快活地尖叫着，她们被人从浅水里捞了起来，一个个象落汤鸡似的。

水上花园被称为美洲的威尼斯，但两者有极大的区别：一个是各方面都未能出俗，另一个则是野趣天成。我十分喜爱附近这块地方和这种充满人性的气氛，因而常和西班牙朋友们到那儿去。他们称我为“忧郁的印度哲学家”，因为我的性格使我不能参加打打闹闹的逗乐场面。

来到他们国家后不久，我就发现了墨西哥人之所以被称为尚武民族的另一个可能的理由。他们显然很喜欢穿军装并携带武器，但这种爱好只不过如同儿童的喜爱玩具，我是经过一段时间从亲身经验中才明白这一点的。一个军官有时会在路边甚至在客厅里从枪套里拔出手枪来，放它几枪，那不是为了杀人，而是为了在与朋友们争论得难解难分时，用来强调自己所提出的论点。

中世纪的决斗习俗仍在流行；但敌对双方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总是要向空中或者向屋子的天花板放几枪，然后互相拥抱接吻。首都的街道上挤满了穿军装的人。在一个将近十年一直处在内战的痛苦之中、而且就在几英里以外内战还仍在猛烈进行的国家里，这是很自然的。但在这些武装军人中没有多少人是墨克西特的崇拜者；阿兹特克族的战神已被他们忘却了；但是他们的和平象征“白色的睡女”依然还在，跟她

在西班牙侵略者把战争带给阿纳乌阿克以前一模一样。

世界上第二个位置最高的首都墨西哥城，海拔七千四百英尺，位于被两个高大山脉——瓜达卢佩山脉和內华达山脉——所环绕的盆地的东南端。瓜达卢佩山比墨西哥城高不了一千英尺，该山因为有天主教墨西哥的守护神“我们的瓜达卢佩圣母”的教堂而成了圣山。一个有着光荣回忆的老教堂矗立在城市附近，据说她曾创造了从寸草不生的岩石里取水的奇迹。由于她为穷人创造了奇迹，圣瓜达卢佩便特别受到受惠人——大多是纯种的本地人——的崇拜。墨西哥城还受到阿兹特克族自然教的另一个神的保护。

在城的东南部高大得多的內华达山脉（白雪覆盖的山脉），顶峰上有波波卡特佩尔火山和伊斯塔西乌阿特尔火山。当阿兹特克族统治那里时，它们是作为防守阿纳乌阿克门户的天兵矗立在那里的。现在这两个火山都成了死火山；但前者的名字（“冒烟山”）表明，六百年以前它还是一个活火山。如果说，前者是这样更恰如其分地象征着传说和神话给它安排的角色，那么后者就必定是浪漫、诗歌和爱情的对象了。这个字眼的意思是“白色的”或者是“睡着的女人”；语言学家对那形容词的含义意见纷纭，这争论也许永远不会休止。这个字眼表达的意思有些难懂。它象征一个女人，这是无疑的；但那形容词的含义则纯属想象。不管专家们的意见怎样，“白色的”肯定是更为恰当；而且这两个形容词都把景色充分表现出来了。

从墨西哥城遥望，伊斯塔西乌阿特尔峰就象一个仰卧的妇女；既然永远有雪覆盖，她就是白色的；静静地躺在那儿，她

一定是睡着了。多少世纪以来，这一对山峰产生了许多传说和神话，并且使诗人的浪漫主义想象活跃起来，当然更使墨西哥山谷美上加美了。

“我们的瓜达卢佩圣母”的教堂在当地自然教的女神面前完全黯然失色了，那女神体现了热带终年积雪的奇迹。这景色象征着现代墨西哥的文明——被西班牙征服者所强加的天主教，周期性地受到本地异教爆发出来的挑战。自从伊达尔哥和莫勒洛斯（这两个人都是教区牧师）时代以来，反对教权主义一直对墨西哥革命起着主要的刺激作用。

在昔日迪亚斯的美好时代里，内华达山可以说是墨西哥的国立公园。寻欢作乐的欧洲人携带着一切足以供给他们既舒适又奢侈地享受自然之美的物品，成群结队到山上去远足。在上山的路上，有设备完美的政府休养所和私人旅馆。革命以来，这一切都改变了。“白色的女人”在安眠，“冒烟山”在守夜。内心忠于异教传统的墨西哥人大概是高兴的。他们对国立公园感到自豪，但对传说中的男神女神的住地却怀有敬意。它不再遭到奢侈无度的外国人的轻浮举动的亵渎了。革命已办到了那一点；我在那儿时，通往民族之神家室的各处入口都已受到纯血统的查巴塔分子的保卫。我想登上白雪覆盖的山峰，人们警告说，离首都还不到二十英里的山坡上就有土匪出没。有几次我往上爬了一段路，但不敢再冒险前进了。我对异教的本能的同情体现在我对“睡女”崇拜得五体投地这一点上。这景色象征着一种古代文化的传统，纯洁而宁静，但已死亡了。

几乎在山谷的所有地方都可以看到这两座山峰。但它们

正对着我所住的房子的阳台；我在墨西哥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这房子里。这是一个国际密谋中心，共和国总统也参与了这个密谋；在那儿，我与第一个向我传授革命信念奥妙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建立了友谊；而且就在那儿，除俄国以外的第一个共产党诞生了。我多次试图从这所房子的阳台上给二十英里以外的“睡女”拍照。有一次我偶然成功了；我还是一个没有经验的业余摄影师呢。那张珍贵照片的放大象在时髦的弗朗西斯科·马德罗大街一家照相馆里挂了几年，它几乎盖住了整个一面墙。

人们可以看出，对“睡女之城”的回忆是怎样萦绕在我的脑际。我不是民族主义者；任何一个国家对我来说都跟其他国家一样有好有坏。我阅历越深，越发感到一个国家要是没有充满偏见和地方观念的居民，那该多好啊。墨西哥可能是个例外；我自己也不能确切地说明为什么。也许这是一种由于对“睡女”的入迷而产生的“神秘的体验”吧。

我不是诗人，不能写一行诗来描绘她的美丽；事实上，我一生中从来不能理解什么是美；但人们告诉我，美是一种不可理解的东西；它是感觉到的，主要是在想象中感觉到；或者是从想象中创造出来的，然后就有人为之倾倒。算了，我对这点是一窍不通的。然而，我已为“睡女”所迷惑，并且还为墨西哥及其人民的纯朴、狂放、野蛮、残忍和善良深深吸引了。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这个国家及其人民也许已经有了改变；但我感觉到，他们永远也不会变得面目全非。所以，如果我一旦必须到别处生活的话，我将去墨西哥。一切东西也许全都变了；但“睡女”依然还在；而“冒烟山”早就死了，它是不会吃醋的。

然而，我对墨西哥的倾倒不是血浓于水这一说法所能解释得了的。我的学历不深，但是，关于阿周那^①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来到墨西哥，他违背了自己的梵行期誓言而在那里殖民的传说，对我并没有什么吸引力。这个故事荒唐得令人难以置信。关于史前时期从印度向外移民这个更为似是而非的理论，即使假定从前有一个横跨太平洋的陆桥的话，同样也是荒诞不经的。当人类学相信人类一元论时，这种牵强附会的假说也许不可避免。在一元论理论背后下意识地存在着的创世说的残余信仰，在被科学知识的发展摧毁之后，史前时期的朦胧情况就大大地清楚起来了。以实验为根据的更可靠的人种多元论，排除了为解释在地球上地区相距很远但文化相似这一现象而不得不假设的荒诞不经的迁移学说。以信仰魔术、精灵论、异教和多神教为标志的几个顺序相承的文化发展阶段，可以归因于原始理性的发展，这是人类的一种生物学遗产。有了这份共同遗产，世界不同地方的原始民族的思想 and 行动便会多少有些相似。这个对史前时期的科学见解表明人类文化有共同的基础，并且产生了希望：世界大同的梦想总有一天是可以实现的。

我到墨西哥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才看到了真正的墨西哥。“日内瓦旅馆”是个奇怪的地方；由于与我同属英王臣民的加拿大同胞的盛情，我就在那儿住下了。那儿没有一点墨西哥的味道。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个称心如意的地方；它使旅客避开当地的污垢和臭味。但一小伙英美侨民，唯我独尊，不可一世，令人十分反感。旅馆老板和旅客都表现得好象不仅是

^① 阿周那(Arjuna)，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一位英雄。——译者

住在一个被围攻的要塞里，而且还必须保护自己免受传染病的侵害。他们大多数对革命的病毒是免疫的；他们对于在这个大城市的不卫生的环境里自然发生的肉体上的疾病，却是害怕得很，这个城市直到最近还处于内战的痛苦之中。他们都惋惜过去迪亚斯独裁的美好时代，希望那个黄金时代再来。

我在到达墨西哥的那一天，就有这样的印象：外国人虽然身在墨西哥，却宁愿生活在一种可笑的矫揉造作的环境里。那舒适的房间和洗掉旅途污垢的蒸气热水浴，是非常令人欢迎的。但这美国式的舒适生活并没有使我忘记，我是在一个据说具有鲜明的固有文化特色的国家首都里。我认为，文化大部分应包括在烹调上。这个信念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但我阅世日深，头脑里的单纯已受到很大的破坏。话虽如此，“入国问禁，入乡随俗”这一古老格言已在实践中证明是至理名言。我在墨西哥就要象个墨西哥人。所以我订了一份典型的墨西哥的饭菜。在“新拉雷多”，盛情的主人曾招待我吃过一种他们民族的饭菜。在“日内瓦旅馆”，我叫了我所知道的另外两种菜——玉米饼和辣椒肉。侍者本人就是墨西哥人，他惊奇地看着我，说：他只能用美国罐头来供应饭菜，或者是利比公司的，或者是海因茨公司的，名菜共有五十七种。我更加惊奇了，就问道，为什么要用美国罐头来供应墨西哥菜呢。侍者回答说，因为“没有一个客人吃当地饭”。于是我换了菜单，要了一盘牛排。

8. 墨西哥札记

我在墨西哥一个人也不认识；在去墨西哥以前也没有想与任何人建立联系。虽然不久我就很喜欢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颇有宾至如归之感，但我去那里并不是经过慎重考虑以后作出的抉择。我不愿在美国监狱里虚度年华，之后再被引渡到印度去，在印度等待着我的的是厉害得多的刑罚，因此我必须离开美国。既然横渡大西洋的打算没有成功，我只有在加拿大和墨西哥两者之间选择，作为唯一可能逃走的路了。在加拿大，我仍将逃不出英国法律的很长的手臂。因此，选择墨西哥是迫不得已之举。我急急忙忙就动身了。

到达那儿时，我并未感到四处无援；那儿的环境表明有人会助一臂之力的。给阿尔瓦拉多将军的那封介绍信是我具体地寻求援助的起点。我知道这位将军是边远的尤卡坦州州长；但是我可不知道实际上从墨西哥城不能直接到达那里。两地之间没有铁路可通。走陆路约有一千英里，最后一段还必须穿过幅员广阔的塔巴斯科州和恰帕斯州的荒原，这两个州沼泽多，山地多。通常的路线是穿过墨西哥湾；但船只大多数是美国的；它们从墨西哥的韦腊克鲁斯港出发，照例在墨西哥湾沿岸美国某港或哈瓦那停泊。这两个地方我都必须避开。有些墨西哥船直开尤卡坦州；但大都是不适于航海的小船。这些船很少载客。

由于这些原因，我本打算带着介绍信到阿尔瓦拉多将军那里去，并看看他的社会主义试验，这个打算只好放弃了。这

是令人失望的事情。我当然很想获得有关经济理论实践的第一手知识,这些理论即使还没有激起我对社会正义的觉悟,但已开始符合我的设想了。然而,后来我认识到,如果我真的到了美洲乌托邦式的“黄金国”^①,那会更加失望的。

尤卡坦州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对占该州总生产的百分之九十的剑麻的出口贸易实行州垄断。实际上也就是投资在那项工业中的美国资本的垄断。既然垄断是通过州来实现的,可以说是一种州资本主义,它必然是垄断性的。那时,我并不喜欢这个制度,因为它充其量也不过是改良主义而已。

布尔什维克刚在俄国夺取了政权,革命在大西洋的此岸引起了微弱的共鸣。所有的左翼社会主义者都得意洋洋,生活在一种充满着美好前景的气氛之中。他们都是自封的共产主义者。这令人震惊的气氛感染了我。就我的情况来说,这并不是在我身上的革命温度升高了几度,而是在我政治演化过程中的突变:从顽固的民族主义向共产主义的飞跃。在新改变信仰者的一般狂热之下,改良主义便成了一种该咒诅的东西了。

但是,正如我以后所认识到的,这飞快的进步是相当表面的。我的动机确实不是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当时我还没有产生去俄国的想法。把最革命的信念表示出来是一种感情上的满足。就文化方面来说,我仍然是个民族主义者;而文化上的民族主义是一种非常顽固的偏见。社会主义由于具有反帝涵义,才投合了我的心意。至于它的空想的或者人道主义的

^① “黄金国”(El Dorado),西班牙小说中的理想黄金国,相传在南美洲内地,富有金、银、珠宝。——译者

方面，对于那些已从《快乐寺院》^①吸取过革命灵感的人来说并不完全陌生。因此，社会正义的理想能够容易地与我所继承的价值体系（或者说我在那些日子里也许已经具有的生活哲学）结合在一起。在共产主义中，特别强调的是左翼社会主义的反帝涵义。因而我在两者之间的停留很短暂，从革命的反帝民族主义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是很短的。不仅我经历了这个心理过程，而且许多别人随后也经历了奇迹般的转变，从而败坏了共产主义。我也朝那个方向走了很远，但值得庆幸的是，我能在为时还不太晚的时候看到前面有致命的陷阱。我于是停下来进行思考，发现了新信仰的谬误。但这已是持续了几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旅程的终点了。这个旅程是从墨西哥开始的。

到尤卡坦“黄金国”的实际困难和对俄国革命的反应所引起的奔放热情，使我打消了去尤卡坦的“黄金国”的念头。我继续在墨西哥的首都呆下去，企图在那儿找到新的落脚点。为了打听怎样才能把介绍信呈给阿尔瓦拉多将军，我设法与国防部长见了一面，此人恰恰是共和国总统的女婿。这段经历使我熟识了墨西哥人性格的可爱处。为了答复有关他的部下的一个问题，一位内阁部长竟邀请一个默默无闻的外国人前去见面——这种事只可能在墨西哥发生。

我到作战部去，人们就是这样坦率地称呼这个地方的。墨西哥人不赞成虚伪。政府维持一支军队，是作为进行战争的工具的。因此，管理军队的部就应该称为作战部。墨西哥人

^① 《快乐寺院》(Ananda Math)，是印度小说家般金·查特吉(1838—1894)所著的一部小说。——译者

是直言不讳的。我受到了最隆重的礼节接待，并由武装卫兵护送着穿过铺着红地毯的走廊来到部长办公室。他佩戴着最辉煌的表示职位的勋章，显然正在等待来访者。他还兼任陆军总司令。他身体肥胖，个子颇矮，佩戴着一把军刀，这把刀与他的身材对比，显得特别的长。他威风凛凛，自然使得我有点害怕。但他笑容可掬，并热烈地和我握手，这使我很快就放下了心。他让我在一把有缎子软垫的金黄色椅子上坐下。我向这宽大的房间的四周看了一下。屋子里满是绿色和金黄色——这是仿效路易十五的格式。可以让我把给阿尔瓦拉多将军的信拿出来吗？这封信我是带来了；但是封了口的。部长毫不犹豫地撕开信封就读起来。我注意到他脸上现出一副满意的笑容。他告诉我，阿尔瓦拉多将军总有一天要来首都的，他一来，部里就会通知我。我想，会晤该到此结束了吧，于是站起身来要走。

部长也站了起来，以传统的西班牙人的斯文姿态请我再坐下，这种姿态墨西哥绅士们表演得精彩极了。他要在我离去以前向我保证，在墨西哥共和国，我是很受欢迎并且也是安全的。“安全”一词使我感到惊奇；他一定是注意到我面部的某些表情了，或者故意要使这个场面戏剧化，那些所有受到传统教养的墨西哥人都喜欢这样。“我的尊敬的同事——外交部长，已经收到关于你的通知。但是，先生，这是一个外交上的秘密，我不应泄露。我只想向你再三保证，你现在是在一个自伊达尔哥和胡亚雷斯时代以来一直在为自由而斗争的国家里。你在这儿是自由而安全的。”这一次他先站起来，表现出高贵、几乎是威风凛凛的气派。他走在我的前面，把我送到

大门口，那把很长的插在鞘里的军刀在厚厚的地毯上拖着。他亲手把门打开，恭恭敬敬地把我送出来。

整个这件事看起来象一场喜剧。我出来走在走廊里，之后走到街上，一直在尽力领会这次戏剧性经历的意义。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明显，这个太子——人们这样开玩笑地称呼这位军队首领(卡兰沙总统没有儿子)——了解我这个人，他通过外交渠道知道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外国人将要到达。这使我感觉到我竟有了国际上的重要性。这番经历使我得到的更重要的感觉是，我是在朋友中间了，没等多久，我的这种感觉就增多了。

第二天，我收到本市一家大报的编辑的一封信，据说此报是政府的非官方喉舌。来信十分客气地询问我是否愿去他的办公室访问。信中还对这一不妥当的要求作了解释：因为我住在一个不方便的地方，所以写信的人不便来访。

我觉得事情渐渐复杂起来了。形势耐人寻味，看来更有趣和更有刺激性的遭遇在等待着我哩。我来到这个新地方还不到一周，人地生疏。但人们知道我已经有了地位很高的朋友。如果我不是个天生的怀疑论者的话，这段经历实在会使我又相信天命了。

可是，在约定好的时间，我还是去拜访了《人民报》的办公室，会见了那位编辑。他是一个高个子，身体相当结实，年龄早已过了中年。他举止庄重，有长者之风。或许他已有象我这么大的孙子了吧。我喜欢这一回见面改变了上次会见的那种虚情假义。但上次那个人是内阁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而这次会见的这个人仅仅是一个新闻记者，虽然后者在民主

制度中也许更加重要。

互相寒暄了一番以后——这次寒暄并不象普通墨西哥人那样过分——那位编辑再次请我原谅他没有登门拜访：“你在我国是客人，而且我们墨西哥人又是好客的民族，虽然他们说，”他与其说是辛酸倒不如说是嘲弄地补充说，“我们是落后的民族。”我接过话尾回答说：“唔，先生，我们是风雨同舟啊；我们的国家也遭到傲慢的白人帝国主义类似的污辱。”这位沉着镇静的长者使人产生了信任感。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在我离开他的办公室前这两个小时内，他知道了我的全部情况，而且他的同情心显然是诚恳的。“我们将再一次见面，”他说。“经常见面；但你必须从那家旅馆里搬出来，在那儿不安全。”这话耐人寻味，但他不愿多说，我感到好象是在长者面前，即使不服从也得尊敬。在我离开以前，他请我去他家吃饭，并见见他的妻子。同时，他要给我找一个更适合于我居住的地方。

几天以后，我从“日内瓦旅馆”搬到本市的一个被称为“罗马侨居地”的高雅住宅区的一幢小房子里去。但在那旅馆暂住的最后几天里，发生了另外一件预料不到的事情，它导致了老关系的恢复。我已注意到旅馆的客人是分成两伙的。实际上有两个餐厅。经过个别询问，我才知道有一些德国人住在这个旅馆里。他们大多是从远东或美国来的。他们一来，这家旅馆就变成了战场。英美的客人把这家旅馆看成是他们的领土，不能容忍敌国侨民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但墨西哥是个中立国；德国人也毫不示弱。那个旅馆老板加拿大人的爱国主义，也没有大到宁可失掉一宗可观的买卖，也许会惹起当局

的干涉，也要把德国赶走的程度。他巧妙地把旅馆实际上分成了两半，每个交战团体各得一部分。作为一个英国臣民，我在协约国那部分膳宿。但第一天过去以后，人们告诉我，那里不供应本地饮食，我就不去公共餐厅了，而吩咐把饭送到我的房间里。我也不常去旅馆休息室和客厅。我这种孤傲态度一定被人注意到了，所有同住这一旅馆的人对我的态度自然都是冷淡的。甚至旅馆老板好象也在避开我。

在我熟悉墨西哥的情况以前，这境遇是不好应付的。因此，一天午饭以后，人们都回屋午睡了，我听到有人轻轻敲门，就相当吃惊。打开门时，使我更加惊奇的是，一个德国寄宿者小声问道，他是否可以进来。我还没有来得及说话，他已经进来了。他为他的冒昧闯进说了许多道歉的话；但他有一个重要的口信要带给我。在和我说话时，他绝不能被对方任何人看见。当他诚恳地低声说话时，我认出了他就是总逗我笑的“荷包蛋”之一——他们是住在旅馆内德国人部分的一对形影不离的人，个子都很矮，穿着也相同；他们的软布帽使我不知怎么地联想到荷包蛋。我在纳闷，那另一位到哪儿去了！过了几分钟，当我送客人出去时，我发现他的伙伴在走廊的那一头，显然是在放哨。

这是个地地道道的密谋，它使我回想起以前在本国度过的美好日子。这口信说，我以前在爪哇遇到的两个朋友正在墨西哥，愿意再次和我取得联系。他问我：当天黄昏之后我顺着一条街道前行，让一辆过路汽车把我接上去，行不行？我机械地表示了同意。这位来访者显然有些害怕，匆匆地离去了。当然，我无须乎尽什么义务。我没有作庄严的允诺，可

以去，也可以不去。但这有什么坏处呢？我记得作战部长曾保证说，我在墨西哥是安全的。这也许仅仅是一种好客的表态。不管怎么样，我想象不出有任何可能的危险，就决定去会见爪哇朋友。我可以想象到他们是谁。

后来我逐渐得知，英美特务机关曾煞费苦心地要绑架我。英印罪犯调查部的头子德纳姆曾到旧金山去处理“印德密谋”案。一个从印度派出来追寻我的老同事在上海被捕了。他被安排在这个案件中作证，说我是密谋的主犯，这事传遍了整个远东。我在报纸上读到这则消息。这使我有痛苦；在本国时我对那家伙是十分友好的，并曾一块儿参加过一些勇敢的“革命活动”。即使是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情况下，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他那固有的幽默感。总之，残酷的革命和严格的清教徒生活并没有完全消灭他身上的人性。我简直不能相信他会成为叛徒。但他的确就是叛徒。十五年以后我回到印度时，得知他象许多别的老革命者一样，成了某种托钵僧。从那个时候起他就算死了。

旧金山的审讯已经结束，但我从可靠方面得知德纳姆还在美国，他决心要抓住主谋，并把他带回印度去。就是他指使要绑架我。人们告诉我，他如今已来到了墨西哥。

9. 在墨西哥的日子

晚上，我到了约定的地方。那是本市住宅区的一条街——宁静、平坦、清洁，两旁树木成行。墨西哥城的夜晚是可爱的。我悠闲地走着，深深地吸进从积雪盖顶的火山轻轻吹来的使人心身爽快的空气。但我思潮起伏，满脑子是这几天和近几个小时的奇怪经历的记忆。我有些茫然，不知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一辆大旅行汽车神秘地、静悄悄地赶上我，停了下来。车门无声地打开了，我上车后，坐在开车的人旁边的前座上。车子开动以后，我转过头去看看是否还有别人在里面。两个“荷包蛋”坐在那儿，半沉没在垫子厚厚的宽敞座位里。谁也没说一句话。车子走了不远，便来到一处地方，开车的人下了车，招手让我跟他走。“荷包蛋”都留在车里。

我们走近一个临街的大门，门悄然无声地开了。不一会儿，我们来到一个陈设十分讲究的客厅。我的伙伴没有什么必要地把他穿的厚大衣匆匆脱掉，让一个穿着号衣的仆人灵巧地接住，并把他的海军军官帽子扔到一把椅子上。他刚到中年，体大肩宽，头发黄里带灰，眼睛呈铁青色。总起来说，他的形象给人很深的印象。他把门推开，以军人的姿态站在一边，生硬地鞠着躬，邀请客人进去。这是一个天花板相当低的很长的屋子，墙上嵌着磨得发光的深色木板，地板上铺着厚厚的地毯。

我们一进去，有两个人便从屋子那头的厚皮垫椅上站了起来。我认出来这两个人是德国官员，曾到过爪哇，安排向印

度运输武器。其中一个为陆军军官，我想大概是个上尉；另一个是殖民行政部门的高级官吏。前者据说是帝国总参谋部的密使。人们从有钱有势的黑尔夫里希兄弟都拍他的马屁这一点来看，可以想象前者是个重要人物。黑氏兄弟在国内的长兄是德皇的最后一任财政部长和德国国家银行行长，后来沙赫特接替了他。黑尔夫里希兄弟拥有绝大部分德国在远东的权益，可以说是中道衰败的德国帝国主义的拓荒人。他们打算提供资金策划计谋，为在印度煽动一次武装起义，使英国陷入困境。

在墨西哥重聚使我们都很高兴。老朋友互相问候以后，他们对主人作了这样的介绍：“‘德意志号’的指挥官冯·柯尼希。”那一个北欧巨人再一次喀嚓一声立正，生硬地向一个下等种族的代表鞠了躬。但这是战争时期，恋爱和战争是不择手段的啊。

在著名的“德意志号”潜水艇第二次冲破英国的封锁，载着贵重的化学染料到达一个美国港口后不久，美国就参战了。这艘德国潜水艇被俘获，船员被拘留。舰长不在船上；他设法逃掉，象他的许多同胞一样，在墨西哥避难。

在开始的重聚寒暄和介绍之后，我们就坐下来谈正事。酒早已预备好了；但我婉言谢绝。从爪哇来的朋友们会记得，我在那儿也是这个样子。我已不再把不喝酒的习惯作为道德高尚的象征来自豪了。清教徒的习俗和别的许多偏见正在渐渐消失。但我仍然不喝酒，因为在此以前喝酒的机会并不太多。

我们交谈了自从近两年前在爪哇分手以来各自的冒险活

动，然后这位舰长——在此期间由于他对祖国立下了人所不知的功勋而获得了令人羡慕的铁十字勋章——要我谈谈我想交给总参谋部的那个计划的具体细节。他说明了他为什么提起这个问题的原因：德皇的枢密顾问官冯·某某不久就要到墨西哥来，他以全权大使的资格来全面检查美洲城市和远东的外交和特务人员的活动情况。根据他的报告，柏林最高当局将颁发命令实行他在报告中建议的事项。这种信任使我深受感动。我就略述了一下我已不再很感兴趣的计划。他们听说驻在中国的机构并不理解我的计划的重要性，而且所给予我的必要帮助在他们看来也微不足道，他们三个人都勃然大怒。

他们三人用我听不懂的德语热烈地谈了一会儿，然后那位海军上校问我为什么不从纽约到柏林去。但我怎么才能到柏林呢？“在‘德意志号’第一次返航时，我本来是可以把你带走的。”我实在感到是个损失——主要不是因为失去了去柏林的机会，而是失去了乘坐那艘冲破封锁、三次横渡大西洋的著名潜艇的惊心动魄的旅行机会。但我怎样才能与他取得联系呢？当然，通过大使馆嘛！我可从来没有这个念头，但当我带着这样重要的使命在等待机会横渡大西洋时，那位海军上校一定已考虑到这点了。

所以，对于德国提出帮助解放印度的诚意和严肃态度我没有能够考验到底，是由于纽约领导人的滑头所致。我把这痛苦的思想埋在心底；这是不能与外国人共同分担的。我对他们已经失去了信心。纽约的那所神秘房子的奇怪居住者很有些可疑，但我无法设想那个骗子在欺骗我，以及那个计划

会有什么问题；但他却知道他正在背叛自己自以为代表的事业。不错，我没有告诉他有关计划的任何事情；但是他是知道我从印度老远赶来，并且带着一封给印度革命委员会的重要信件要到柏林去的啊。他有责任通知德国大使馆，但他显然没有这样做。

不过话又说回来，此时我是怀着一种感激的心情回顾这次欺骗的。对于我个人也许还有别人来说，这是祸中得福。它标志着我一生的转折点。它帮助我从死胡同里走出来，使我逃脱了参与德国阴谋而被遗弃的印度人的悲剧命运，我在柏林遇到的这些人就象博物馆里的一件件展品一样。当时强大的德军已经崩溃了：最高统帅已从被推翻的帝国逃跑了；革命已扫除了旧政权的残余；可是，德国虽然仍受着战争创伤的痛苦，仍挨着饿，新的思潮却已在搏动，一次新的文化爆发正在兴起。对那些在战时群集柏林、希望依靠德国皇帝的帮助来解放他们国家的印度革命者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什么意义。甚至在1920年，当俄国红军的大炮在附近的东方地平线上隆隆作响时，那些在国外的年老无用的印度革命老战士却定居在中欧一带，嘲笑社会主义，不相信俄国革命会继续下去。如果不是那滑头领导人的欺骗，我就很可能处于被历史摈弃的这一奇怪行列之中。

那时在墨西哥，我知道我已被一个骗子欺骗了，十分生气，决定不通过柏林印度革命委员会及其变节的代表，而利用与德国最高统帅部建立直接联系的机会，以达到报仇的目的。如果那个即将到来的密使能使柏林批准这个计划，我就回中国再作尝试。我离开中国已经一年多了。情况可能已有了变

化。因此必须赶快建立联系。为了这个目的而提出的财政援助，我是同意接受的。这太需要了。我所有的那一点钱，在我到墨西哥城的一周内实际上已花得精光。大部分付了旅馆费。这笔意外的收入来得正好。我们约定几天后再见，然后就分手了。我们不应频繁见面，但要通过中间人保持密切联系。在没有人护送的情况之下，我自己走了出来，按照他们事先讲过的那样，我向左走到另一个路口，那儿有另外一辆汽车等着我。不用告诉地址，司机就把我送回了家。我想，这就是德国人的办事效率了；但是采取这一切阴谋办法真有必要吗？这得等着瞧了。

第二天，一个打扮得相当时髦的墨西哥青年来访。在互相讲了些老一套的笑话之后，他拿出《人民报》编辑的一封信，请我务必晚上光临，和他以及他的夫人聚餐。送信的人会陪我前往；顺便提一句，他是一个受过教育的聪明伶俐的青年，如果我需要的话，他可以成为一个良好而可靠的私人秘书。可是在昨天晚上以前，我还不知道怎样付第二天的饭钱，又怎能雇得起一个秘书呢？上流人物给予我非同一般的待遇，是不是误认为我可能是个乔装的有万贯家财的印度贵族呢？多么荒唐的处境啊！我送走那年轻的客人，请他晚上来找我。

那天晚餐使我第一次体验了墨西哥的家庭生活和社交生活。这不是正式的宴会。另外还有两位客人，一位非常有趣，另一位的出席则意味深长——他们是一位年轻的女士和一位相当愚蠢的青年男子。当然，我首先被介绍给女主人：“某某夫人。”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慈母般的家庭主妇，身穿黑绸缎衣

服，头上戴一个质地优良的镶花边大面纱（西班牙妇女的传统头饰）。我尴尬地向她致意。那夫人从她丈夫那里获得了暗示，用西班牙语说了些令人惊愕的话——“为您效劳，先生，这幢房子是属于你的。”要是我第二天搬进来，她又该怎么办呢？但这个表示并不是要认真兑现的，只不过是一种无限好客的姿态罢了。

至于那两位客人，那年轻女士是一个月刊杂志《现代妇女》的编辑。这是墨西哥这类杂志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一种。我看她不象个女学者或妇女参政运动者，倒象一个放荡不羁的女性。她的时髦之处明显地表现在抽黑烟卷上，她把这些黑烟卷插在发针的环孔里，必要时顺手就取出来。我后来才知道，在卡兰沙成为共和国总统以前，她当过他的私人秘书。为了表彰她的功劳，卡兰沙把她提拔到社会名流的地位。她本不配编辑任何文学杂志，但异性的魅力使她在自己的周围吸引了一伙寻求公众赏识的青年作家。他们当中有些人竟然写诗，很明显是献给她的，却作为她的作品发表了。我在墨西哥的早期，经常看见她。好吧，这儿就不必赘言了。

那个青年男子大概是为护卫她而来的。但他本人在社会上也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他是外交部长的兄弟，虽然自己只不过是个银行职员和全国网球冠军。他非常愚笨，却能说几种外国话。承蒙他的栽培，我学会了打网球，那是我以前认为男子汉不屑为的运动。他为他的学生感到骄傲，因为不久我就能在球场上与冠军好好地赛一场了。很明显，他今天应邀为护卫“现代妇女”（我这样称呼她，别人也跟着叫，她自己喜欢这个称呼）而来见我，这并不是偶然的，当时我就怀疑

到这一点，我的怀疑第二天便得到了证实。

席间和饭前饭后的谈话相当杂乱，而且时常中断。两位女士都不会说英语，而我只能用结结巴巴的法语同女主人交谈。“现代妇女”甚至连法语也不会说，而这种语言几乎成了所有墨西哥知识分子的国语了。我本人没有受过宴会和客厅礼节的训练，但我感到我们三个男人不应该老是谈一些妇女们听不懂的话。使我感到很奇怪的是，那另外两个男人，虽然死板地拘泥习俗，他们对于说句客气话“对不起”就把女士们撇在一边，却丝毫也不在乎。尽管如此，大家都不感厌烦，直到午夜我们才分手。“现代妇女”在饭后很活跃，用西班牙语与她的护卫者快活地谈起话来。女主人明显地感到有些不安；但我使她放心，虽然我听不懂他们的谈话，我却欣赏这种语言的声音，我真的很欣赏。他们的谈话绝大部分是“现代妇女”讲的。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那根放在发针里的黑烟卷在晃动着，她使那个青年男子想插句话都插不进来。

在我们离开以前，主人把我带到一旁，问我能否为《人民报》写一些关于英国统治印度的文章。“你知道我国也是个殖民地国家：我们的祖先起来造反，墨西哥人民推翻了西班牙的统治。不幸的是，甚至过了一个世纪，墨西哥仍然没有真正的自由。我们仍在进行独立战争。因此，墨西哥人同情你们，并且会从对你们的国家及人民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了解中获得教益。你知道，我们也是印度人，我是纯血统的印度人。”我木然地看着他——一副黝黑、清秀而聪明的面孔，那是任何最好类型的印度人可能具有的一副面孔。我同意写文章，但指出我对西班牙语一无所知。他再三安慰我，说我会很快克服这

个困难的；同时，今天早晨拜访过我的那位青年会翻译这些文章的。就这样，那位青年便被任命为我的私人秘书了。第二天早晨，那青年来问我，给《人民报》写的第一篇文章准备什么时候翻译；并坦白地告诉我，他打算买一部新打字机：奥利弗牌打字机是整个拉丁美洲最流行的式样。我感到事情是在被某只看不见的手推动着。对于天命的信念差不多早已被我的常识粉碎了，但是这一次它却忠告我对即将到来的新发展要小心谨慎。

但是，上天似乎下决心要恢复我对他的忠诚。下午，我头一天晚上见到的外交部长的兄弟费尔南德斯先生来说，他的银行收到一位客户的通知，要付给我一万比索。比索是墨西哥的货币单位，价值等于美元的一半，那时墨西哥货币是最稳定的。卡兰沙政府已废除了纸币；通用货币是银比索和五、十、二十比索的金币。这一切都是我的新朋友、那位银行职员告诉我的。

第二天，银行的一个听差给我送来一包每枚是二十比索的金币，我给了他一个收据。上天真是大慈大悲啊，虽然我不可能因为看到我简直没有开口便送上门来的闪闪发光的黄金就增强了我的泄了气的信心。

10. 墨西哥政界中的社会主义

我在墨西哥的时候，那里还没有政党。为数众多的派系为夺取政治权力而斗争；但这些派系都是围绕着一个什么人，这些人多半都是军人。领导 1911 年革命的马德罗，是当过短期的共和国总统的唯一文官。然而，大多数起事人员或革命领袖都发表了纲领性的宣言，呼吁人民集合在他们各个不同的旗帜之下。每份宣言都大书特书某种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他们的共同解决办法就是分配土地。

在封建制度的情况下，百分之九十的人民靠土地谋生。农村大众的普遍贫困和大量农业劳动者的长期失业，使得当兵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职业。所以任何反对现有政权的运动都采取了军事叛乱的形式，而且反对派的领袖不是军人就是自称为将军的人，因为将军的呼吁会得到将要当兵的人的更大响应。将要当兵的这些人都是渴望得到土地的农民和失业的农业工人，他们自然更强烈地受到分配土地的诺言的吸引。

多年的内战，堕落为纯粹土匪的叛乱头目（包括一些主要人物）的所作所为，使中产阶级中那些进步和民主的人士感到厌恶。他们也深深感到必须进行一次彻底的土地改革，但却不参加由怀有政治野心的将军们所进行的争夺军事霸权的武装斗争。“革命”和“革命者”这两个词已经名誉扫地。由于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中大部分人的厌恶和冷淡，任何政党都产生不出来。争夺权力或竞争霸权的那些集团，都以各自头目的名字来命名。例如，支持当时已建立起来的政权的人们

就被称为卡兰沙派；其他两个主要叛乱集团分别被称为查巴塔派和比利亚派。各派的积极追随者由武装叛乱集团的军人或者小头目组成。

自从1911年革命以来，卡兰沙是第一个任期较长的总统，又是第一个建立立宪政权的人，这个政府的权威已受到国内大部分地区的承认。1916年，召开了一个制宪会议来制订共和国宪法。以后选举了一个议会，定期举行会议。按照宪法精神制订出来的一套法律正在取代临时革命政府的法令。在国民议会里有派别；但它们不是政党。多数派称为“卡兰沙派”；另一个由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律师、教师、医务人员等）组成的组织松弛的派别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但它却不是一个反对派，其中一些议员也称自己为卡兰沙派，也就是说，是现政权的支持者，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是国民议会议长。墨西哥宪法是模仿美国的，政府成员不参加议会。因此，行政部门不向立法机构负责，议会只是个空架子。不过，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已非军事化了。几名杰出的文职人员被任命为重要的部如外交、财政、教育、卫生部的部长。

左翼派别同样是无定形和无组织的，感情上是由无政府主义和工联主义支配，这和整个拉丁美洲是一样的。但是经过一些调查，我才知道有一个与国会雄辩家有别的社会党，他们也自称为“社会主义者”。领导人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律师，他是国民议会议长的密友。

我在墨西哥住了几个月，学会了能够用西班牙语进行日常谈话以后，就到社会党的办事处去，实际上就是深入虎穴探虎子。伊格纳西奥·桑蒂瓦涅斯的朴实的家就是党的办事处。

他留着稍长的夹杂着灰色的黑胡子，大概是要模仿社会主义的先知吧。他听见我自我介绍是一个对社会革命运动感兴趣的外国人时，便问我是否就是在《人民报》上发表一些非常优秀文章的作者。（使用言过其实的形容词是西班牙语的一种特色——一种不可以从字面上来理解的谈话方式。）对我来说，在这些文章里写些什么曾是一个问题。我对这个问题解决得对我有利；现在我看出，这些文章也达到了向墨西哥城那部分爱好批评的并且真正进步的读者作自我介绍的目的。

在思考在那些文章中要说些什么的问题时，我回忆起拉拉·拉杰帕特·雷在纽约一次集会上演说的情景。我又想起了在我来到墨西哥后短暂时间中遇到的新受教育的中产阶级人士，他们假装很想了解更多的有关“神秘的印度”的情况，而不是我想说的那些事情。我试图暗示他们，印度是一个单调、贫穷而不是梦想、美丽的国家，但这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兴趣。

直到那时为止，我结识的墨西哥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人物大多限于“现代妇女”的求爱者。从一个小团体的态度不能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但我已有一个模糊的印象：那部分不关心政治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人士，因为忠诚于法国的文化传统，还是亲协约国的。他们觉得同情反英情绪是背叛了他们在文化上的忠诚。这使人回想起美国自由党党员的情况，他们既不发表拉杰帕特·雷的文章，也不让他发表演说，其论据就是任何反英宣传就是帮助德国。不过，在一个即使相信印度立场的正义性，也不能对印度有所帮助的国家里，我看不出进行反英宣传有什么意义。另外，墨西哥人民贫困的严酷

景象并不下于印度。要告诉墨西哥人关于印度的贫困及其原因，英国的剥削等等，这一切实在是徒劳无益。事实上，我在墨西哥认识到，民族独立不是任何国家的万应良药，这是我在中国时未能认识到的。

这些想法在我的脑海里引起了一个问题，这也为更好地理解印度历史提供了线索。在印度过去一千年的历史中，为什么它一再成为外国侵略的牺牲品？为了对这个问题寻求一个满意的答案，导致我“发现了印度”。尽管那时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非常肤浅，它对我还是有了用处。在文章中，我把印度的过去和现在描绘成一幅阶级斗争的略图。印度大众的贫困是英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经济剥削的结果。因而，印度大众的解放不但需要推翻英帝国主义，而且需要推翻构成外国政治统治的社会基础封建家长制。其必然结果是，印度需要一次社会革命，而不仅仅是民族的独立。

社会党的领袖对我的文章很感兴趣，因为就他所知，这些文章还是第一次没有把印度描绘成一个幻想世界，而是一个非常象他本国的国家。他又说，别的党员也读过这些文章，他们要求他同作者联系，邀请作者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讲话。这些文章是不该登在资产阶级刊物上的。我对他们的赏识表示了感谢，并且说明通过《人民报》的编辑就可与我取得联系。不行，一个社会主义者不能请一个资产阶级分子帮忙。可是，我们已经见过面了，而那次见面是为社会革命而斗争的战士之间最重要的牢不可破的国际团结呀。

我觉得自己好象就在卡尔·马克思本人面前。那盖到硬白衬衫的假前胸的胡子，那支撑着破旧黑外套的精心爱护的衣

领的硬赛璐珞领圈，那大义凛然的知识分子书房内的单调家具——这一切合到一起，造成了对于一个劳而无功的空想家的可悲信念和热情来说很适当的气氛。我确实很受感动；我对世界无产阶级的历史性任务和战无不胜的力量的信念尚在动摇之中，还处于理智上接受的阶段；现在这种信念在这位墨西哥的卡尔·马克思的象征性人格感召下，有了感情上的共鸣，从而使我的信念增加并巩固了。

分手以前，我踌躇地问道，国民议会议长是否是社会党的成员。我这种想法使这个保持无产阶级信念纯洁性的人吃了一惊。“不，我党是一个革命党；我们不相信议会改良主义。”“当然不相信；我只是以为，他也许是个熟人吧。”老人的声音变得柔和起来：“啊，唐曼努埃尔，我当然认识他啦，是同行；一个资产阶级政客，但是好人。你想见见他吗？”我不想表示出有与革命行列外任何人交往的愿望，从而损伤我轻易得来的名声；但是这位墨西哥的卡尔·马克思并不象无产阶级革命的预言家那样偏狭和刻薄，他坚持认为我应该去见唐曼努埃尔，并要由他来安排一次会晤。不久以后，我逐渐了解到，当时由二百名工人组成的全体党员，差不多都激烈信仰无政府主义，他们怀疑他们的领袖是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怀有秘密地进入议会的野心。

两天以后，我收到一封惊人的信。那是一份邀我参加社会党执行委员会会议的请帖。令人惊奇的不是信的内容，而是信的式样。这是在一个老式打字机上用红油墨打的，结尾不用通常的套语，而是用的这个惊叹语：谨致革命敬礼！通过邮政这样向我致敬的这个人的签名虽然很讲究装饰，但显然

是不想让人看懂的——几个艺术花体字一直延伸到信纸的底端。以后我才知道，这种希奇古怪的签名方式是常见的。我的“秘书”对我的赤裸裸的签名(如他所说)感到泄气极了。他居然想教我起码用几个环与圈来装饰一下我的签名，使它看起来象一个名人的签字一样。可怜的小伙子，他最后只好不要我这个坏学生了。他一定怀疑我是否确实是个名人。我安慰他说，由他经常在他为时所打的信件上代我签名好了，这就弥补了我自己签名的朴素无华。我记得他惯用两三个圈圈环绕他的签字，以一个向下的螺旋线收尾，作为签名的装饰。

正如在请帖里所说的那样，桑蒂瓦涅斯傍晚来找我一起去开会。会议在党的书记家里举行，这个地方离上流社会的“罗马侨居地”很远。我不仅对我的衣著感到局促不安；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也许对我身上可能带有的资产阶级社会气味不满吧。我不能不穿这套衣服；但如果说在我身上有任何“罗马侨居地”的气味的話，也已被无产阶级的环境完全淹沒了。象所有的大城市一样，墨西哥城也有其光明与黑暗、美与丑、富与贫两个方面。这种对比也许由于自然环境显得更加强烈；人为的贫困的丑恶正冲着大自然的笑脸洋洋自得呢。

社会党书记从事印刷业，但却不是雇佣劳动者；他然自是很自傲的。他有一个小印刷所，就在他住所的一间屋子里。我们走进去，发现约有六个人聚集在同一间屋子里。书记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体格强壮的青年，他以天生的含蓄态度来欢迎陌生的客人，递给我一份四页印刷品——最新的一期党报《斗争》，这刊物是由他自己一手印刷发行的。报纸的全称是《阶级斗争》。我注意到，屋里其他几个人手里都拿着这份报

纸，一定是在我们到来以前他们就在读了。我粗略地看了一下报纸，以示礼貌；由于我那时掌握的西班牙语很不够，即使借助词典的帮助，也要花费好几个小时才能读完它呢。

然而，老桑蒂瓦涅斯从他那资产阶级爱体面的心理出发，必定已经注意到我很难为情，便插进来为我解围。他对我作了一番详细介绍。我表达了要更多地了解别人，而不是要别人了解我的愿望。委员会由九个委员组成：除了桑蒂瓦涅斯和一位学校教师以外，全都是纯血统的无产阶级。每一个参加会议的人都是典型的混血墨西哥人。桑蒂瓦涅斯解释说，这不是委员会的正式会议；他们聚集起来是为了欢迎我。我表示了谢意，并希望能对共同的事业有所帮助。我一定是看了看自己的衣服，因此本能地为我的非无产阶级的外表表示歉意。一个喜笑颜开的中年人，留着乱蓬蓬的波浪式黑发，看样子是个狂热的人，走了过来，他把手搭在我的肩上，说道：“我们不在乎你的衣服；大家都希望穿这样的衣服呢。”大家快活地笑着，围在我的身旁，很明显是要使我这个尴尬的客人感到无拘无束，象在朋友中间似的。我确实感觉这样。

当我们快要分散时，我踌躇地问桑蒂瓦涅斯，是否大家能一块到近处去喝杯咖啡。令我极为欣慰的是，这个邀请被接受了。我们就到中国人开的小饭馆，后来那里便成为除俄国以外的第一个共产党的诞生地，我的意思是说，一年以后在那里产生了成立共产党的念头。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我必须使我的马克思主义比得过社会党领袖们的强烈的无政府主义和荒谬的工团主义信仰。我们往往讨论到黎明，然后去中国小饭馆。店主人醒来，装出甚为恼怒的样子，但还是端出咖

啡和热饼，让我们吃早饭。

我们第一次去中国小饭馆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工团主义之间的值得纪念的战斗。一些别的客人也参加了热烈的讨论。一份报纸在轮流传阅。桑蒂瓦涅斯解释说，这家晚报刊载了耸人听闻的消息，说墨西哥与美国关于《克雷塔罗宪法》第十七条（这一条宣称所有地下财富都是国家财产）的争论已达到不可能和平解决的地步；说美国的武装干涉因此已迫在眉睫。由于那天整个晚上我们都沒有涉及任何政治问题，我就问道，如果这种危险成为事实的话，社会党将采取什么态度；如果可能的话，打算采取什么步骤来制止这种危险。书记十分激烈地开了腔：“两个资产阶级政府之间的争吵与无产阶级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关心这个问题。”如果干涉的危险发展成为战争，威胁到墨西哥的独立，他们还能置之不理吗？全体齐声作了断然否定的回答。这使我大吃一惊。这就是社会主义？但我还并不准备战斗。我们分手了。桑蒂瓦涅斯在路上说：“这就是我们的困难。他们都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老人的声调有点悲怆和失望。此刻我无论说什么也不能使他振作起来；但我决计为社会主义而进行这场斗争。

11.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自从重逢以来，我和德国老朋友见过好几次。他们把我介绍给外交界和当地德国团体的领袖，男的女的都有。德国

人不象英国人那样孤傲，他们在墨西哥社会里随随便便地与当地人交往。所有在墨西哥的德国人都遵循在外国居住必须学习该国语言这一优良惯例，他们除了说英语以外，也说西班牙语。

其中有一位和我认识后，逐渐友好起来。他是一位七十多岁的学者，在远东住了二十多年，是一所日本大学的语言学教授。但是他的毕生使命却不是这个。他来到远东，目的在于编纂一本五国语言的词典——汉语、日语、德语、法语、英语。在那些年代里，他一直在为这本不朽巨著孜孜不倦地工作，而且还需要好多年才能完成。当他的毕生使命由于日本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而中止时，他非常伤心。德国人深信日本会忠于其精神上的盟国。而且即使在日本公开加入错误的一方以后，这两个天然盟友之间仍有某种秘密关系存在。

但格拉马茨基博士(这是那个老语言学家的名字)却很苦恼，焦躁地等待战争结束，以便回到日本继续他的工作。听说我到过远东，于是他询问我是否懂得那些语言。我为我不懂那些语言进行辩解，因为汉语很难学嘛。这位年老的百科全书编纂者却使我吃了一惊。他说，这是最容易的语言。他在语言学上的才能使我相当感佩，因此我请他教我德语和法语，尽管我是个不好的语言学者，他却教得非常之好。只有西班牙语我在几个月里便学会了，并达到相当水平，足以使用这种语言第一次向公众演说，并且写了我的第一本书。

他的经济条件不怎么好，一直未能找到合适的住处，我就邀请老博士和比他小三十多岁的妻子住用我的一部分房子。他的好太太很会理家；但那老头儿不久就使我感到厌烦了。他

是一个典型的普鲁士教授，反动透顶。一天，他告诉我，如果我想正确地学习德语，我必须熟悉日耳曼人文化的精髓。他还说，印度文化与日耳曼人的文化很相近，因此我应该受到日耳曼精神的强烈感染。我当时还没有完全脱离文化民族主义，因此那位普鲁士教授博学的讲述使我在感情上引起了共鸣，虽然在理智上我的这个反应使我自己也感到不自在。

第二天，博士提议在德语课上要我听一首他自己写的诗——一首散发出日耳曼人文化精神的诗。我热烈地欢迎这样一个让我增长见识的有趣的建议。他这首诗是对德皇的歌颂和对民主世界的激烈谴责。民主世界把德皇看成凡人，要把他从那骄傲的皇座上拉下来。诗句我已经忘了；当时我也不想保留一份。但我记得那比喻是，查理曼大帝和鄂图诸帝的后裔、战争之神德皇威廉二世的巨大身影投射在鲜血洒遍的荒漠上。这里另一幅画面则是一个具有一双充血眼睛的老人，血管几乎要从太阳穴里爆出来了。我生怕造成中风，要由我来负责。但那位好太太恰好在这时出现，把丈夫带走，放在浴桶里，打开了冷水龙头。以后我逐渐了解到，批评德皇或者反驳这老头儿，都会使他激动起来，而只有冰凉的冷水浴才能把他沸腾的热血的温度降下来。

与一个随时都可能死于中风的病态狂热者住在一块儿，真是一种磨难。我又不能把这个老人扔到街上去。日久天长，他逐渐了解到我竟是一个反对印度—日耳曼文化传统的罪人，我们就谁也不理睬谁了。这种无法忍受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19年年中，那时我遇到第一个俄国布尔什维克。他是在奇特的情况下到达墨西哥的，他的境况很窘。我须助他一臂

之力，于是我请那一对德国老夫妇搬出去，这样才可以把那位手头拮据的布尔什维克舒适地安排下来。

我与在墨西哥的其他德国侨民的接触就不那么令人讨厌，而是很有教益。开始的时候，我被社交界的妇女捧为名士，觉得相当尴尬，我想她们是在尽她们的爱国主义责任吧。但过了不久，我试图在这奇怪的环境中用生硬的态度掩盖我的尴尬，竟然很有成效。这种不值得称赞的举止，看来在很长的时间中一直是我心理上的护身甲。我最近读到一位前英国共产主义者写的一本书时，才认识到这一点。在20年代初期我们两人都在莫斯科时，我对他是很了解的。他把我描绘成他所见到的最傲慢的人。我不知道我是否值得这种恭维（书中的描述是贬抑我的）；但如果我不是傲慢的话，也确实一直是颇为生硬的。我在初接触到现代思想和现代文化时，表现出一种自卑心理。但经过一定的时间，经验教育了我，使我变得宽容和谦逊起来，这才磨去了我那尚未成熟的个性的棱角。

德国驻墨西哥公使馆参赞的妻子是个美国人，她把我置于她的庇护之下。她和她的丈夫都很年轻，当他丈夫担任华盛顿德国大使馆秘书时，他们就相识了。两个人都很有修养，他们的家是德国和墨西哥社会名流聚会的地方。一天，冯·舍恩男爵偕同男爵夫人来访，邀请我到他们家吃茶。当然我为女主人亲自驾临邀请这一殊遇而深感荣幸，同时我也感到很好奇。我毕竟不是如此重要的一位人物呀。然而，我喜欢这位德国外交官和他的美国太太。他的美国太太抱怨当地英美上流社会人物粗暴无礼，竟因她嫁给一个德国人而拒绝与她来往。多么不公平啊！她并不是嫁给一个外国敌人；他们是

在美国参战以前结婚的嘛；她不能因一艘德国潜水艇击沉了一艘美国商船而与他所爱的人离婚嘛！男爵露出了愉快的笑容，赞许地看着这位既漂亮又年轻的妇女的绯红的脸。但他又立即微皱眉头，咬着嘴唇。美国政府干嘛不早几个月参战呢？她用高跟鞋踩着地板，好象要强调这一点。那么她现在就不会受这样的屈辱了。这是那个性急的昔日美国小姐考虑欠周之处，这句话显然触痛了她的德国丈夫。

我无法想象，为什么她将心灵上的忧伤倾吐给一个陌生人，而这个人又不可能帮她的忙，甚至都不能用合适的语言和表示来安慰她。当时这场面很尴尬。那青年男人明显地感到很不自在。突然间她笑了起来，抓住她丈夫的胳膊，说道：“我是在进行报复啊。”然后，她又转向我说：“墨西哥所有的好人都在我们家里聚会，我要你去参加。”她的笑容使得我无法拒绝这个邀请，然后她走了出去，身材颀长，姿态优美；男爵呢，他那仪表并不十分出众，和我握手后跟着出去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位普鲁士贵族由于这个在生人面前受辱的场面，心中一直隐隐作痛呢。

同一天下午，当我到他们家去吃茶时，一见面，他就为他的妻子的举止表示歉意。我吃了一惊；没有什么要道歉的嘛；恰恰相反，她把我这个陌生人当做知心朋友，使我不胜荣幸。这使那位年轻的外交官放了心，于是他以充满抒情诗的语调介绍了她的夫人。她是华盛顿社交界最出众的人物。她不是以女承继人的身份来赢得这个受人艳羡的地位的，她靠的是自己的魅力和智慧。她的这些特点，使她在美国首都社交界获得不寻常的成功，因为在那里财产是一切价值的尺度。在

美国，有钱的女继承人蜂拥进入华盛顿社交界，在外国外交官里的欧洲贵族中寻找夫婿——这就是用美元换头衔吧。但德国文化，就象印度—雅利安文化一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有教养的普鲁士贵族决不会出卖他那尊贵的标志。某某小姐（他让他夫人用了娘家姓氏）也不会被一个男子的地位或头衔所吸引。她在华盛顿外交界是这样出名，本来可以嫁给任何一个大使；他又匆忙地补上一句，当然是单身汉。“我们爱上了，结了婚。”

当我们两人正在私下谈话时，女主人突然出现了，她训斥了她的丈夫，说他光顾自己谈话，使东方来的贤人无法开口。她确实很有魅力。她具有美国人的开朗性格，但在她身上还有某种不同凡响和令人起敬的东西。她曾在—所著名的美国女子大学受过教育，她显然并没有只是在校园里卖弄风情消磨了四年光阴。她曾经打算从事—项职业，但极为可能的是，美貌给她赢得了更舒适的生活地位。她真是俊俏得惊人。那位德国贵族真可能为了财富和美色而出卖他的头衔。他的选择就说明了他的观点；他的确也是一个有优雅情趣和浪漫理想的人。这件无法容忍的事情不仅仅来自—个方面；德国人竟也怀疑这姑娘是美国间谍。正如她在邀请我的时候所抱怨的那样，她确实处于—种非常困难而屈辱的地位。在这件事上男爵坚持不让步，迫使那些猜疑的德国公众向受到损害的姑娘赔礼道歉，从那以后，她便轻而易举地赢得了侨民皇后的骄傲地位。

她又来了一次神经质的爆发，使我非常难堪。“我今天上午淘气了，”她说，“请原谅我吧。……”她向她丈夫说道：“你

知道，我是爱你的。”那位高贵的外交官几乎要流出眼泪来了。对我来说，这可是一件新鲜事——亲眼看到这么露骨的纯真情感的流露。但我当时太幼稚，领悟不了这种体验。而现在我能领悟了。皇后下了命令，于是我们就跟着她到别的客人那里去了。

就是在那儿，我与大学校长卡萨斯先生认识了，他以律师为业，但从气质上和所受的教育来看；他却是个哲学家。他是巴黎大学的毕业生，自然是亲协约国的，而且他毫不掩饰他的同情。然而，他却给冯·舍恩男爵夫人的沙龙增添了一些光彩。这个亲法的卡萨斯先生傲慢地无视客人们的情绪，无休止地向那些埋头研究烦琐形而上学的德国人阐述他们所无法理解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看到卖五金及买咖啡的人与一位老院士进行智力交锋，真使我目瞪口呆。

一位在大学里教西班牙文学的西班牙人也常到男爵夫人的沙龙来。我是他的学生，因为我曾进入大学，以提高我的西班牙文水平。有一天上课的时候，他朗读了《熙德之歌》^① 史诗的一节。这是充满激情的朗诵。我们第二次相遇的时候，我赞美了《熙德之歌》，也赞美了他的朗诵。他则谈到一些古代印度的充满灵感的才智。卡萨斯先生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他说：“如果印度撇开它的神秘主义并从伏尔泰那里学到才智的话，那它将得到无穷的好处。”对这两位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不过是一场斗智。但对我来说，则激发了我去阅读塞万提斯和伏尔泰的著作。在此以前，我仅仅知道他们的名字，

① 《熙德之歌》(The Song of the Cid), 西班牙文学中最古的史诗。——译者

塞万提斯我甚至还是第一次听说哩。当时《熙德之歌》对我来说，确实太古雅啦，欣赏不了。

德国侨民团体中的老前辈是一个五金商人，他嘲弄亲法的卡萨斯先生说：“要不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爱好学问的话，伏尔泰的天才可能还不会被人们注意到。”卡萨斯反驳道，桑絮西^①对凡尔赛来说不过是个拙劣的模仿而已。在男爵夫人的沙龙里的这种谈话，引起了我对欧洲文化的好奇心。这就把我引导到国家图书馆去了。一天又一天，我越来越痛苦地感觉到，过去我学得太少，太无知识了啊！

这个富有的德国五金商人的妻子是个艺术家。她想给我画像。她向我解释我必须怎样做才能使她满意——一连几天，每天上午要到她那里去，象个傻子一样坐上两个小时，这时我就问她，为什么她要找这些麻烦。我的意思是，为什么她要给我添这些麻烦。我们已经成了朋友；但我们迟早要分手，也许永远不会再见面了。她想保留一个纪念品。照片就行了，我回答说。她显然对我不懂得照片和画像的区别感到惊异；画像是艺术品啊。什么是艺术？她简单地作了解释，并答应在给我画像时再详细解释。我又好奇起来，同意在几天之内象傻子一样每天去坐上两个小时。一个漂亮的阔太太给我画像，用来挂在她的沙龙里，这念头使我感到非常得意。

使我又惊又喜的是，她并不要求我像个塑像那样一动不动地坐着。相反的，她在工作时不断地谈话，并且也设法使我讲话。过了两天，冰块打破了，我加入了由她开始的谈话。这

^① 桑絮西 (Sans Souci)，法语，意为“莫愁宫”，在德国波茨坦，为腓特烈大帝所建。——译者

些谈话是对艺术的讨论。我的看法引起了她的反感；但她没有表示出来，而是尽力来教育我这个在有教养的德国人士中被捧为名士的粗人。

实际上的功课从音乐开始。巴勃罗·卡萨尔斯正在墨西哥。我要不要去参加他的音乐会？我拒绝了，因为对我来说，音乐是一片乱七八糟的吵闹声。我认为声乐如何呢？我对声乐的看法不那么过激。卡萨尔斯的夫人是个歌唱家。我同意让她试一试。一个身穿歌唱家传统服装的女人呆板地站在那里，用她的喉音耍弄着各种花腔，并没有使我受到感染。但卡萨尔斯的大提琴演奏，却在我反对音乐这一偏见的盔甲上刺了个洞。但是在—位波兰钢琴家给我上了一堂富有实效的课程之前，我仍然坚持了一段时间。

我们讨论了一会儿以后，他告诉我：“不要企图弄懂；音乐是不能从理智上来欣赏的，开始时就不能这样。它是被人感觉到的。”他让我在钢琴前坐在他的身旁；他把两只手的手指伸展在键盘上；做梦似地什么也不看。在我还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时，已经发出了可怕的闹声。我感到我的整个神经系统有一股震波。钢琴家在发疯似地抖动着他的头发，手指在键上飞快地动来动去。他的双手又猛击了一下钢琴，才停了下来，好象陷入了梦境。然后他看着我，问我感觉怎样。“不要思索——你感觉怎样？”我的固执让步了，承认身体上有了感觉。“这就是音乐。”他洋洋得意地说。我动摇了；偏见向偏爱让了步。但我还得弄懂为什么音乐只能感觉而不能理解。以后我才弄懂了。

茶会解散前，女主人命令我：“明天来吃饭。”冯·舍恩男

爵悄悄对我说，德国公使阁下愿意见我；我对接受赴宴的邀请会不会介意呢？当然不介意了，我回答说。见见公使阁下是我的荣幸。我正在学习礼节呢。同时我还感到奇怪。德国人真的要恢复在中国购买武器的计划吗？

12. 在中国购买军火的最后尝试

除公使外，那两个德国老朋友也来参加了宴会。这显然不是一次交际性的宴会，而是秘密的事务会议。我们刚吃完饭，女主人就退出了，冯·舍恩男爵把我们领到吸烟室。大家都点着雪茄，我则抽起纸烟；白兰地酒传递了一圈。公使首先谈话。对于恢复那项在远东不幸未能完成的十分重要的工作，我的准备工作进展得怎样？我在美国时曾和一些印度革命者接触过；他们当中有些人必须尽快到中国去。我还想派个使者到日本去，以获得拉希·比赫里的合作。关于这件事，有一个印度革命者要来见我。

公使然后问道，我是否接触过在墨西哥或在美国的中国革命者。我一个也没有接触过。他提出要使我与一些可能很有用处的人联络。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因为我对于能否找到一个合适的印度人并没有把握。于是决定由一个中国商人带着我写给拉希·比赫里的信，马上到日本去。但是，在差不多可以肯定这封信已没有什么用处的时候，我就想办法与在云南的人直接联系。那位中国商人在印度支那有些商业

上的老关系；必要时，他甚至可以到云南走一趟。

但在此期间，还应该通知在中国的德国人对这件事采取行动。为此，某某博士（殖民地官员）要去远东，他在那里有许多关系。他应不应该与我在日本的朋友接触呢？我觉得很奇怪。一个德国人在战时怎样能够进入日本呢？我得到保证，自有解决这样问题的办法。猜想这位绅士将以别国公民的身份带着假护照去旅行吧，这对我并不新鲜。然而公使却把秘密告诉了我：“日本不是我们的敌人。”不久以后，我才逐渐知道了更多的国际阴谋活动。现在决定博士应该赶快动身，我拿到更多的资金，可以自由掌握，以便派出其他秘密使者。

自从在爪哇那些日子以来，我从未发现德国人这样爽快地花钱。不管他们慷慨的动机是什么，而我却面临一个道德问题。德国人为了那个目的提供了金钱，我应不应该接受比实际需要花费的更多的金钱呢？我记起了德国人利用那些可以收买的印度革命者的事情。他们一共有几十个人，大多属于卡德尔党，德国人发给他们几支手枪和每人几百美元，派他们到马来亚各土邦或暹罗—缅甸边界去闹事，这些动乱可以被德国报刊宣传为反对英帝国主义的起义，用以保持国内的士气。那些受德国阴谋诡计欺骗的印度人，怀着极大的希望去执行雇佣军的任务。他们以为卡德尔党从遥远而安全的旧金山发出号召，驻扎在英帝国外边不远的印度军队就会叛变。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在路上就被逮捕了，一直被囚禁到大战结束。极少数比较勇敢的冒险家到达了目的地，被抓起来绞死了。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况，那些预定要起义的士兵竟出卖了革命使者。被德国阴谋诡计欺骗了的印度人的悲剧故事还将被人讲

述。但这出戏的最后一幕已在旧金山法庭审判“印德阴谋案”时期演出了。有一些受到控告的印度人是在远东被捕的，其中有一个人用枪把卡德尔党的首领打死在被告席上，为那么多受骗的死者报了仇。

对德国人的无情行为的回忆，使我良心上得到了安慰。在中国我就曾亲身经历过这种事情。当我实际上能在印度边界购买大量军火时，他们拒不给予财政帮助。既然这样的机会以后不可能再碰上，我干嘛不为将来早做准备呢？再说，既然德国人看来乐于尽他们自己的责任，我可以再一次认真地试图执行这个计划。但是这一次，我可不该完全听从他们摆布了。如果真有机会再到中国的话，在回去以前，给我自己准备足够的资金是明智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在印度，为了搞到钱，我们经常结伙抢劫，结果常常杀死一些无辜的人。目的证明了手段的正确：这钱是用来促进革命和自由事业的。我现在仍在从事这同样的事业。因此，我就下了决心。

在一个星期之内，我必须把大约五万比索储藏起来，全部都是金币。那时我住在城市郊区的一幢房子里。房子前面，玉米地一直伸展到一座顶峰满是积雪的山脚下——这座山距此十五到二十英里。查巴塔集团就在山坡上的森林里出没无常，不时袭击远离城市中心的地方。谁也不知道，在玉米地里干活以作还债的农民中有多少人那个可怕的土匪头子的侦察兵。但我喜欢这幢房子，它的位置很好。整个地平线从东南到西南是一片平野，壮丽宏伟的“睡女”高卧在那里，由她的骄傲的伴侣在不远的地方护卫着。

虽然如此，这些不断增加的意外之财使我采取了一些警

戒手段。我搞到一支好步枪和两支毛瑟手枪，并养了一条狗——那只上等阿尔萨斯种黄狗，它一直是我在墨西哥的回忆中最生动的一部分。它那响亮的吠声常常在开阔的地平线上回响着。它以为别的狗在向它吠叫，就狂怒起来，叫得更厉害，声音也更大了。它就睡在我床边的地板上，正冲着开着的门。我深信，这凶恶的家畜会把任何可能闯进来的人撕成碎片。我的身高是六英尺多，而它用后腿站起来，把前脚爪放在我胸口上就能舐着我的脸。它刚满一岁，突然死于肺炎。从来还没有过任何死亡曾给我带来这样无法弥补损失的痛苦呢。以后我就不再养狗了。那个给它治病并把尸体带走的兽医提议要把熟好的皮子给我送来。想到在我面前有我最亲密的朋友死亡的影象，我实在无法忍受；它是充满了生命力的啊！

我得到了一件十分奇妙的东西，一只铁保险箱；它给我带来的安全还不如麻烦多哩。那是一个不用钥匙的新奇复杂的小玩意儿。要打开它，你须转动一个小转螺，在标度盘上组成一个联合数字。那称之为钥匙的联合数字，是可以按人的愿望随时改变的。但那些数字却不能写下来；必须记在心里。我从来记不住数字。人们可以想象得到我的困境。我违反规定，常常把联合数字写下来，天天变动数字。然而，财富带给的苦恼并没持续多久。革命的事业不再是在遥远的他方。而且我这个负担被一些印度革命者解除了一部分，他们一定认为，战利品的一份应该合法地归他们所有。

我的第一个心事是给国内的同志们捎个信去，让他们知道我还在努力，而且是有希望的。作为有希望的证据，我想为那里的准备工作寄些钱去。我已失掉了联系。但拉希·比赫

里说他经常与在印度的人们联系。我便决定依靠他的合作。相当于两万卢比的钱通过德国公使所介绍的中国商人送给了他，要求他采取措施，安全地汇给在印度的某些人。德国人向我担保，那位中国密使已经汇去了款子，并且正在前往印度支那的路上，要与云南省长取得联系。几年以后我才逐渐知道，这笔钱从来没有到达准备汇往的地方。甚至在今天，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也不想知道。

我没有完全依赖那个中国密使，我和在美国的一些印度革命者接上了头。其中一位来看我，并报告说，曾经在中国住过的几个卡德尔党党员，准备带着分派给他们的任何使命回中国去。我对这些自告奋勇的革命者是怀疑的。极为可能的是，他们想离开美国，因为在那儿他们有可能被捕。但那位来见我的绅士本人不能去中国，因为他已与华盛顿上层人士取得联系，并且正准备在美国搞一个强大的亲印运动。我从任何地方可能搞到的金钱，最好的用途就是为他的运动提供资金。他在华盛顿得有一个人员充足的办事处，得请参议员们和外交官们的客，得为宣传花钱，而他自己还得到处旅行。

因为我所掌握的金钱是为特殊目的使用的，我不能把这些金钱用于他的运动，因为对他的运动的重要性我实在很怀疑。他一听就火了，威胁说要写信到印度，揭露我的背叛。他并不是一个老流亡者。我在印度就认识他。以后他到美国去学习，受到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影响，大搞阴谋诡计。我在纽约见到史沫特莱时，她是一个豪放不羁的无政府主义者，她在担任拉杰帕特·雷的秘书时曾对印度发生了兴趣。

既然这位年轻人不打算做与我们计划有关的任何事情，

我便建议他呆在墨西哥。不，他必须回到美国首都从事自己的工作，但要取道旧金山，并派两个准备完成那项使命的人到中国去。他带走了两千美元旅费。他从第一个美国边界车站给我写了一封信，把我大骂了一通，他直接到他的目的地去了。在旧金山的那两个人也根本没有去完成他们的革命使命。

那热切期待着的重大事情发生了：德皇的枢密顾问官负着秘密使命已经来到。几天后我就见到了他——一个新型的德国人，具有知识分子和文官的风度。在那以前，我见过的所有德国人，不管他们是什么身份，举止总是多少象个军人，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年轻时代曾受过强制军事训练吧。这个德国高级官员很容易被认为是个有教养的英国人——属于牛津大学学监类型。他毫不摆架子。很自然，我从一开始和他交往就感到无拘无束。他丝毫没有流露出恩人般的慈善气派，那样的恩施气派常常会引起我的气愤。

我们第一次见面，没有谈到正题。大部分时间是他谈德国形势，但他不象一般德国人那样信口雌黄。匹马单枪与整个世界作战不容易啊。他说了些非难德国盟国的话。假如没有东线的发展，美国的介入很可能已使形势大大不利于德国；俄国二月革命以后，东部战线实际上已经崩溃了。克伦斯基打算重整士气低落的军队是不会成功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的和平宣传正在使帝俄的军队瓦解。德国现在必须完全按照俾斯麦的格言向东挺进。德军将势如破竹地直抵高加索；目前已经进入乌克兰了。然后向前推进一步就可以击败在印度的英国人。他低声说着，一点也没有被一个当代亚历山大

所向披靡的军队这样的画面所激动，他心目中显然就有这样的画面。

他转过脸来眨了一下半闭着的眼睛，他说：“帝国总参谋部对你的计划一定有强烈的兴趣。”我还没有来得及说话，他就变换了话题，好似自言自语地说：“为了在西线再维持一段时间，我们必须抄美国的后路。墨西哥必须成为作战基地。必须鼓动卡兰沙总统，必须帮助他领导拉丁美洲起来反对门罗主义。在美国和加拿大，我们必须组织广泛的破坏活动。”

我们约定好再会面的日期以后就分手了。我终于弄清楚在墨西哥的德国人所以举止如此异常的原因了。在印度捣乱可以配合他们赢得欧战的宏伟战略。这简直象快要淹死的人在捞稻草。我早已失去了认为德国不可战胜的神秘的印度一雅利安的信念。然而，参加国际阴谋是使人感到兴奋的。我必须选择自己的活动舞台。去协助建立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拉丁美洲同盟的想法很有吸引力。这有可能提供机会影响拉丁美洲各国政府，首先是墨西哥政府，使它们认为在群众的积极支持下采取某些改良措施来巩固它们的地位是有好处的。按照这条路线首先在墨西哥发动了宣传，其结果是，在整个拉丁美洲，谈论社会主义成了风尚。在那以前，这些国家的左翼运动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它并不重视国家主权。因此，人们对抵抗美国干涉漠不关心，不管这种干涉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在两个资本主义政府之间又有什么好选择的呢？群众的麻木不仁削弱了对外国侵略与和平渗透的抵抗。上流人士对社会主义的广泛谈论，表明必须把群众吸引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的觉悟有了提高。我不知

道这对我的新近支持的事业是有益还是有害；但是，我不能推脱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部分责任。

然而，关于我最近的将来的决定，却是在与德国朋友第二次会面时作出的。这次谈话也是由枢密顾问官以他那特有的平静朴实的态度开始的。在中国购买军火的计划不能耽搁。签订合同已经一年多多了。筹集必要的资金不会有什么困难吧。海军上将冯·欣策（我在中国时，他是德国驻华大使）已经回到柏林担任外交部长了。他会立即指示他在北京的继任者出卖德意志东亚银行的部分冻结资产的。但是任何事情必须有我在场才能办理。卡皮泰因·Z先生（我在爪哇时的一个朋友）以帝国总参谋部代表的身份，也要回到远东听凭我的差遣。在这笔军火交易需要的全部资金筹齐以前，将有五万美元由我掌握作为动身旅行前的准备费，这次旅行会有风险。最后一句话是枢密顾问官带着明显的关怀说的。但是，一次新的冒险的前景对我却有吸引力。

几天以后，与他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会晤，使我开始了我下一阶段的政治生涯。公使馆举行了一次正式宴会。我正式在这种场合露面是难以解释的。但我收到冯·舍恩男爵夫人的一封神秘的短笺。她说晚上晚些时候要来找我，亲自带我去参加一次重要的集会。她在约好的时间单独一个人来到我的住处，我就更加惊异了。她好象预料到我会吃惊似的，把门随手一关，俏皮地对我说：“不要象只吓破了胆的兔子；我既不是美国间谍，也不想叫你和我私奔。”然后她恢复了严肃，让我赶快起身。她要把我带到公使馆去。至于没有收到正式邀请这件事，我就不必介意了。我是作为特别客人到那儿去赴宴

的。“你从护送者的人选来看，就可想象到其重要程度了。”她以开玩笑的口吻又补上一句。

一辆豪华的轿车在公使馆的一个便门停了下来，转眼间，我们来到了一间灯火辉煌的屋子。这一切是多么象侦探小说啊。我还没来得及从惊异中清醒过来，枢密顾问官就走进来了。他对我的杰出护卫者的贡献一再深表感谢。她回答说：“不用谢啦！我要去跳舞啦。”还没来得及交谈，枢密顾问官就挽着我的胳膊说，他想把我介绍给总统。说话间，我们穿过了一个走廊，我们面前的一扇富丽堂皇的大门打开了。我们走进一间非常大的屋子，里面摆设得极为华丽。这儿有一位留着相当长的花白胡子、穿着洁白的夜礼服、仪表十分尊严的绅士，当我们走近他的时候，他站了起来。这就是墨西哥共和国总统唐贝努斯蒂亚诺·卡兰沙将军阁下。这对于我是太突然了，一时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话好。总统伸出手，以低沉悦耳的声音，用西班牙语说，“晚上好。”作战部长已向总统谈到我；某小姐（“现代妇女”）也谈到了我。我愿意在这个国家里住一段时间，共和国总统很高兴，并且再三向我保证，他们会使任何对墨西哥人民怀有同情和善意的人感到十分舒适自在。我非常感激，此刻总算已镇定了下来，用适当的话表达了我的谢意。

枢密顾问官接着说下去。他已及时向总统阁下报告了我的使命，总统阁下欣然允诺给予我旅行所需要的一切便利。假如我回到墨西哥，总统阁下将慨然接受我在有关筹划拉丁美洲同盟活动方面的帮助。

总统再次握着我的手，祝我“晚安”和“幸运”。在外面的走

廊里，枢密顾问官对我说道：“让我们在这儿也说一声‘再见’吧。我明天就要离开这里，路过阿根廷回国。祝你一帆风顺。”

13. 初遇匪徒

不相识的和未见面的朋友们都来帮忙，为我重返中国寻求军火的冒险旅行作周密的准备。我真是百感交集：我本无心冒险；习惯势力迫使我接受了这个冒险，但仍是缺乏信心。对于这个曾经吸引一个青年革命者的理想并使他为这幻想奔波了一年半之久的使命，我已不再相信了。但新的自由理想的吸引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完全抛弃原有计划的程度。不管怎样，决定已经做出来了：如果我的新冒险成功，国内的同志不仅会获得武器，而且会获得一个为之战斗的新的自由理想。我没有去考虑这个新理想是否对他们有吸引力。怎么能没有呢？我们都怀有同样的鼓舞穷人和被蹂躏的人的朦胧愿望嘛。般金·查特吉的《快乐寺院》是我们受到鼓舞的共同源泉。我们从中找到了革命的理想。事实上，我们已经把那出戏剧中杰出人物的角色在我们当中分配好了。剧中的杰出人物都是印度的托钵僧。我们已经立誓要继承他们的事业。我们设想在布拉马普特拉河上游的某个地方建立自己的“快乐寺院”，用我们的理想争取人民，武装人民，在一支无敌的解放军率领之下深入国内——所有这些使我感到，如果我的使命成功的话，我不仅要带着武器，而且要带着新的革命思想回到印度。

为了避免途中经过美国，我决定走海路。日本的南美航线运载上流社会旅客的船只，每月一次到太平洋沿岸的某个墨西哥港口。我必须赶上其中的一班轮船。但还有一点必须当心的地方。这些船只通常也在旧金山停靠；偶尔也有不停靠的。我必须选择不在旧金山停靠的船只。我在日本登陆，甚至呆下去都不会有什么困难，因为我携有一份半官方性质的墨西哥外交护照和一封给横滨墨西哥总领事的介绍信。要他通过一家日本银行帮助我办理财务。困难在于如何到达太平洋沿岸最近的墨西哥港口。到曼萨尼略的铁路最后一段通过一个土匪侵扰的山岳地带。火车运行并不正常。其他太平洋沿岸港口则更难到达。而且我要搭乘的船也不一定在小小的曼萨尼略港停靠。为了装运烟草，才有船去那里。附近烟草的生产是十分丰富的。

虽然铁路穿过查巴塔集团的区域，但是去太平洋沿岸的第一部分旅行，也即是主要部分的旅行，还是比较安全的。瓜达拉哈拉是太平洋岸斜坡上最重要的城市；火车正常运行。每天有一列客车在军队护送下从首都开往那里。这个距离并不太长；如果路上不发生严重事故的话，拂晓开出的火车，天黑以前就能到达目的地。我这次旅行的第一段路程平安无事。乡间是极其野蛮的地区，是游击队活动的理想场所。难怪没有办法把查巴塔集团从他们在这些丛林密布的崇山峻岭中的隐匿处赶走。

黄昏以后不久，我们的列车到达瓜达拉哈拉。早已有人告诉我该住在什么地方。这是西京（人们这样称呼这个城市）最好的旅馆。我到了墨西哥的心脏地带了。在前几年的革命

和內战期间，沒有几个外国人敢冒这样的风险，深入到这个骚乱的地区。一座富丽堂皇的大教堂是西班牙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唯一纪念物。甚至征服者的家族也都无处可寻了。殖民地贵族为了躲避內战的危险，已经跑走了。周围是水果种植区——称为墨西哥果园。城市街道两旁种植着许多巨大的芒果树，这种树在森林里更是到处皆是。此外，还有柑桔、柠檬之类各种各样的水果，也许在其他国家都很少见到。

瓜达拉哈拉是个舒适的地方，真是幸运极了。我必须在这儿停留几天。下一段路程将由军队护送。地方卫戍部队司令事先已下达指示，要尽早把我送走。他告诉我，护送队照例要先出去清除铁路沿线的游击队；也就是说，进行实际作战。然后我就可以更安全旅行了。路程不远；一般说来，火车只走四到六小时。他的计划是，在一个正规护送队扫清了铁路沿线以后，立即把我护送过去。因而，我必须做好随时动身的准备，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说不定会在半夜三更。实际情况恰好正是如此。

午夜后不久我们就动身了。这很难说是一列火车——一辆机车拖着两辆转向车，其中一辆装满了士兵。那天已预先派出去两个护送队，第一队沒有遇到什么就过去了；第二队遭到了攻击，但进攻者被击退了。预料他们不会很快就折回来，要利用这段短暂脱离接触的时间，使我们这一小队人赶快通过。但由于对路轨情况沒有弄清（它蜿蜒在陡峭的山坡上），火车不得不开得很慢——一小时不超过十五到二十英里。灯熄掉了，所有的玻璃窗子都放了下来，因为子弹打破的窗玻璃碎片比子弹本身更为危险。当然，谁也不能睡觉。护送队队长下了

命令，一听到外面有枪声，所有转向车上的人都要蹲在地板上。我们都用毛瑟枪武装起来，以备万一土匪真的上车时使用。但在这最后一刻到来以前，一直由护送转向车的士兵们来对付进攻者。

东方地平线上，天已破晓了；再过两三个小时，我们就要到达目的地了。突然，黎明的寂静被枪声打破。火车猛地一颠，突然刹住了；士兵们从他们的转向车跳了下来，站在我们车的两边用枪瞄准。我把毛瑟枪的扳机扳上，把枪放在窗户口上。队长喊出了一声命令，子弹向树木繁茂的山坡两边齐射。但是没有回响。我们静静地等着敌人的下一步行动。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敌人好象已经退走了。同时，黎明的朦胧已渐渐消失，天已大亮了。向西望去，可以看见太平洋了。火车开始向山下滚动，两个小时就到了曼萨尼略。

这是一个小港，实际上是个废港，它地处热带，白天热得很。海上只有一些渔船，没有别的来往。除了那些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圣迭戈港与巴拿马之间每周一次的沿海班轮以外，远洋轮船很少在这里停靠。据预料，日本的南美航线的一条轮船要在这里停泊，装运大宗烟草；但是谁也没有把握。两天以后，往南开的沿海轮船就要到了。搭乘这条船旅行，就能赶上在萨利纳克鲁斯的日本船。萨利纳克鲁斯是在曼萨尼略以南大约三百英里的另一个墨西哥海港。既然根本不能肯定那条日本船是否在曼萨尼略停泊，我就不想在那里无限期地等下去了，于是决定去萨利纳克鲁斯赶乘那条船。

搭乘一条相当大的美国轮船沿着海岸航行是愉快的。乘客寥寥无几。第二天，船在阿卡普尔科停靠了几个小时。这

是世界上最优良的自然港口之一——一个大而深的海湾，周围几乎全为高山环绕。一座白色大教堂，面对着海港的狭窄入口，高高地屹立在山上。教堂离海港很远，周围山腰上又无人居住，有谁到那孤独的教堂去祈祷呢？即便有的话，也不会多。从前，这是一个修道院，专收犯有小罪被判处苦行赎罪的修女。这个修道院于上个世纪 60 年代被胡亚雷斯集团关闭，几百名堕落天使被释放出来了。

萨利纳克鲁斯是一个小港，但很重要。有一条铁路线从该港穿过太平洋和墨西哥湾之间的特万特佩克地峡这个狭长地带。其距离不会超过一百英里，大致与巴拿马地峡的宽度相同。原先，特万特佩克地峡曾被选为开凿大西洋—太平洋水道的地点。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原来的计划放弃了，而选中了更往南的一个地峡。墨西哥政府不准备损害自己的主权。以后，一个日本公司与墨西哥政府交涉，要求建造一条穿过特万特佩克地峡的平行的运河的特许权利。大概是华盛顿的压力破坏了这个计划。

虽然狭窄的内陆极为肥沃，覆盖着繁茂的热带植物，居住着最俊美的土著种族，可是海岸地方却都是沙质荒地，日日夜夜被穿过地峡的疾风扫荡着。我是从那条特殊的船下来，在那里登陆的唯一的人。船在这个小小的港口里只停留了几个小时就南下了。打听了一下，我才知道还没有那只日本船什么时候能够到达这里的消息。我必须在一个四围都是沙丘的小旅馆里无限期地等下去。这地方对着浩瀚无涯的太平洋，夜晚非常爽适；但白天总是狂风怒号，尘埃沙砾漫天飞扬，呱哒呱哒地不断落在白铁屋顶上，打在窗户上。

旅店老板抱歉地解释说，萨利纳克鲁斯并不一直就是这样一个荒芜的、几乎是个见鬼的地方。以前在美好的迪亚斯时代，横贯大陆的特万特佩克铁路的运输量几乎可与巴拿马运河匹敌。但现在一列火车每天来往一次就很困难了。一年左右以前，甚至连做到这一步也不可能。有许多地方数英里的轨道都被土匪掘翻了。虽然这一地区已经大体上平定了，但那沟壑的深处和丛林密布的山顶仍是顽抗的土匪极好的藏身之所，他们显然是得到俊美、温和而骄傲的特万南人的帮助和默许的。

我等了几天以后，有个消息说，那条预计要来的轮船从智利载着满满一船货物，已经从巴拿马直接开往檀香山，不到萨利纳克鲁斯来了。下一次航行定在一个月以后。我要等那么长的时间是不可能的。另一个办法是搭乘一星期左右就将来的向南开的船，一直到瓦尔帕来索，并搭乘同一条船再回来。这是个异想天开的办法。这真是一次令人又烦恼又失望的经历；但它也是一种宽慰。我突然觉悟到，我实在不想再作那种劳而无功的事了。墨西哥在召唤我回去；我在那里结交了新朋友，找到了新兴趣，并已计划开始新的政治生涯。另一方面，重返旧日冒险的道路实际上已经关闭了。前进的困难和返回的愿望促使我下决心往回走。我必须冒险乘坐火车穿过美丽的特万特佩克旅行一趟。

路程大约有一百英里，一个白昼便可到达。每天开一趟火车，当然是在护卫之下了。这趟车很容易搭乘。这是一列长长的火车，多半由货车组成，两辆载乘客的转向车挂在尾端。这种倒置的安排是由于土匪关心的不是杀人，而是战利品，

如果货车挂在车尾的话，他们袭击的目的便是要截断货车。大约中午时分，火车正沿着一个几乎是藏在枝叶茂密的大树林里的深谷中行驶。突然，前面有枪声。火车刹住了。护卫队正在追击一群伏击火车的土匪。这是一次小接触，不超过半个小时就结束了。我们的火车继续向前行驶，一会儿我们看见九个刚被杀死的人体悬挂在树上和电线杆上的可怖景象，大家都感到高兴。

一会儿，火车到达一个不小的车站，这是周围地区的行政和商业中心，非常安静，秩序井然。站台上挤满了水果商贩，大都是衣著漂亮、非常俊俏的妇女——身材颀长，亭亭玉立，脸盘清秀齐整。男子也堪与匹比。这是一个外貌出众的种族，但正趋向灭亡。特万南人是同族结婚的，骄傲的性格使他们不愿与劣等种族混血。大自然惩罚了这种唯我独尊。近亲繁殖减少了出生率，这特殊的种族终于在走向灭绝。死亡的阴影竟会笼罩着美丽的特万南人，我想这是多么可惜啊。

另一端的终点站墨西哥港^①，与萨利纳克鲁斯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是一个繁忙的海港，位于发源于恰帕斯州多山沼泽地的那条河流的入海口。乡下人用船装载香蕉和菠萝，顺流而下，卖给港口的批发商，再从那里用船运到韦腊克鲁斯或美国的海湾各港。这儿离韦腊克鲁斯很近——约六十英里；但没有铁路可通。人们必须搭乘一条运水果的墨西哥船旅行。听说就在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就有一条船要启航，我连忙去赶这班船，终于登上一只肮脏的小船。船舱里装着超重的香蕉，甲板只比水位高两英尺，同样还挤满了人、家禽家畜，其中还

^① 墨西哥港 (Puerto Mexico)，现名夸察夸尔科斯。——译者

包括装在笼子里的鸟儿。因为我是头等舱位乘客，设法搞到了一个相当不牢靠的折叠式躺椅，椅子上的帆布十分难看，令人作呕。不久我就被堆积如山的各种旅客行李包围了——箱子、包袱、篮子。一条狗蹲在我的脚旁，一只鸚鵡在我头顶上部发出尖锐刺耳的叫声。但是，想到第二天上午这折磨就会结束，船一解缆，臭气和闷热就会被新鲜的海风吹掉，我就从沮丧的情绪中振作起来了。

快到午夜时分（遵守时间不是墨西哥人的一个坏习惯），那条二百吨位的船老朽的发动机轰隆轰隆地响起来了，喘着粗气。它离岸了，把它的沉重负载很厉害地震动了一下。过了大约一个小时，船遇到了大风，看来要刮成暴风了。那样一条小而靠不住的船是不敢进入深海的。但船长担心被汹涌澎湃的海浪冲撞在海滩上，便尽量大胆地把船开得离海岸远一些。风暴越来越强了；甲板上暗淡的煤油灯被吹熄了。我们都陷入黑暗之中，只能从不断颠簸着小艇的滔天浪峰所发出的磷光来消除一些忧惧。妇女们吓得尖叫，男人们在咒骂着，我身旁的那只狗也狂吠起来。真是乱翻了天。海浪涌过甲板，晕船成了传染病，甚至连狗和鸚鵡也未能幸免。我看这可怜的拖轮随时都会翻掉。焦虑似乎使我免除了这种传染病。（我向来是不晕船的，甚至那著名的中国海也没有使我翻过胃。只有一次我晕船了——在地中海，它当时就象一片绿玻璃。）我不知道这折磨持续了多久。除了那仍在发怒的海的咆哮声和风暴的刺耳尖叫声之外，甲板上静悄悄的——不是死亡的安息，而是精疲力竭的沉寂。突然，东方天空发亮了，巨大浑圆的红太阳从海面上升起。风暴平息了，虽然海上仍然是波涛滚

滾。脆弱的小艇熬过了六个小时的风浪——多么难以置信啊！

日光唤醒了那些由于疲惫而睡着了的旅客。他们开始查点人数和所带的东西。没有一个旅客丢失；但相当多的行李被冲走了。我们需要多久才能到达韦腊克鲁斯呢？船长都不知道，看来船是漂流得太远了。虽然这样，太阳给他指明了方向。大约正午的时候，他发现风暴已把我们的船刮到离韦腊克鲁斯很远的地方。船倒转头来，傍晚时分才到达韦腊克鲁斯。

这是我第一次访问墨西哥的主要港口。但我已经看够了风景，想尽快回到文明中去。时间已晚，那天晚上赶不上火车了。我去一家旅馆，一家很好的、有国际水平的旅馆；洗了个澡，饱餐一顿，便酣睡在一张干净舒适的床上了。早上，我出去游览了全城，后来，我又到过这个城市好几次。

从韦腊克鲁斯到首都的铁路线是安全的。火车正常运行，并且是按火车时刻表运行的。除了那条穿过安第斯山，从阿根廷到智利的铁路线以外，韦腊克鲁斯到墨西哥城的铁路线，据说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它从海平面一直上升到八千英尺的高度；它顺着纬度的上升向前行驶，启程于热带，终止于长年积雪的山脚下。乘夜车旅行，不能多看风景。但当我醒来时，火车已到墨西哥高原了；“冒烟山”在守卫着，象它在阿兹特克族时代一样守在那里，而“白女人”则在安眠。我好象回到了老家，感到很高兴。

14. 在墨西哥的美国激进主义者

在我离开首都的期间，几个印度革命者从美国各地来到了墨西哥。显然，那个携带两千美元逃走，并且扬言要揭露我作为报复的青年绅士已经到处宣传我发了一笔大财。这些新来的人已经及时到德国领事馆联系过，可是领事馆一点也不愿帮助他们。我回来碰到一些革命者，他们都很愤慨，以为我骗了他们，拿着脏款逃跑了。我许诺每星期发给他们每人几块“金砖”的津贴，才得到了他们的谅解。我们自己内部的人都把那相当于二十比索的金币叫做“金砖”。

可是，他们中间有一个人不以分得这样一份为数不多的“脏款”为满足。这人曾经一度是“柏林革命委员会”驻美洲和远东的代表。他自愿要到日本去，说在那里他认识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在他们的帮助下他会完成在中国要做的一切事情。他不同我商量，便直接向德国人提出了这项建议。德国人仍要他回来找我，因为所有和这个计划有关的人都已离开墨西哥了。我为了不使他再生是非，便不咎既往，同意他前往日本。他要多少钱呢？当然，这是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他的要求简直是大得惊人。我给了他一万美元，并答应他到达日本时再汇钱去。我给的这笔款远远超出了他这次旅行的需要。因此，他无话可说，只好接受了。他计划要经由美国前往，说那里有朋友会帮忙。但他离开两个星期后，我才接到他的一封信，说他曾回到墨西哥，并且警告了德国人，说我在欺骗他们。我不知道究竟是谁欺骗谁呢！反正所有我的德国朋友

都已离开墨西哥，我不能再欺骗谁了，也再不会被人欺骗了。

来到墨西哥的印度人中有一个是讨人欢喜的。他不是职业革命家，却与这伙人混在一起。他是个优秀的机械工人，因此，他在福特工厂工资相当高。他缺乏政治上的耐心，觉得墨西哥人都是傻瓜。他对我的新思想也不表示同情。对一个每天挣五美元的熟练工人来说，社会主义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他懒惰成性，不愿冒险再回底特律去，恢复他那待遇优厚的工作。他完全脱离政治，对我毫无用处。然而，他既已呆了下来，我就慷慨地一周一周地付给他几块“金砖”。他呢，便装扮成休假的商人，倒也心安理得。

两年半以前我负着使命离开了印度，现在实现这使命的最后尝试已经失败，这就明确地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涯的那一章。我认为我在最近的将来不能为解放印度作出什么贡献了，便决定专心致志地从事新领域的革命活动，这种活动即使不能马上成功，也能有令人满意的希望。

我回想起曾和社会主义者领袖们进行的谈话，谈话涉及他们对于墨西哥宪法在国有化条款上冲突的结果可能引起美国的干涉所应采取的态度。这个问题应该作为我活动的起点。一方面这种活动会使社会主义成为一种有效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还会加强全国对于任何外国干涉的抵抗。人们还可以进一步设想，在每个国家这样一种国内力量对比的基础上，筹划中的拉丁美洲同盟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互相合作、共同抵抗北方大国霸权的强有力的国际工具。

不断发生革命和长年内战，这几乎是所有的拉丁美洲共和国家的灾难。大多数革命都是反对现政府的军事暴动，这

些政府大都不中那些已牢固把持国家经济命脉的外国财阀的意。这样人为操纵的革命，自然随即发生内战，这种内战又往往变质为盗匪活动，因为争论的并不是什么政治原则或社会纲领问题。只有职业军人和一小撮政治阴谋家才会对这样招致毁灭的冒险行动真正感到兴趣。而愚昧与贫困又迫使农村居民为那些军事冒险家源源不断地提供炮灰。

但是，城市中产阶级，由于他们的教育和高度文化水平，厌恶当前局势，因而对于军事暴动和政治阴谋都敬而远之。在这种情况下，力量还相当小的产业工人便受到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他们接受到的教育是：不要相信政治和政客，要避开政治活动。可是，很明显，城市中产阶级和产业工人分别具有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较远大的革命理想，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国民生活的条件，也是一个对外国财阀的侵略和阴谋进行抵抗的有利条件。各种情况的偶然结合，使我在偶然来到的这个国家里能够帮助创造条件，建立政治自由和社会正义。

新的活动领域选定了，活动形式也具体化了，我下定决心前进，对早年使命的失败并不后悔，对过去的一事无成也不感到遗憾。我必须尽早去见总统。由于我近来的冒险旅行不但他知道，并且受到他的政府暗中保护，可以推想，他肯定已经得到我回来的消息了。可是，现在没有德国人作媒介了，我必须直接请求谒见总统。在这方面，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现代妇女”的有效帮助，也可依靠《人民报》编辑来帮忙。同时，我还应该恢复同社会主义者的领袖们的联系，并和他们认真讨论关于在现有情况下促进社会革命事业的方法。我拜访了桑

蒂瓦涅斯，并在他的寓所里会见了两个年轻的美国激进分子。

为了逃避美国参战后不久实施的强迫兵役制，数以百计的和平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都逃到了墨西哥。他们被人骂成是“逃避兵役者”。依照他们各自的信念和倾向，有的打算参加查巴塔集团，有的打算到尤卡坦的黄金国去，其余的人则想碰碰运气，无论去哪里都行。可是，大多数激进的逃亡者终于涌向首都，聚集在那里了。

且不说他们的政治信念和社会理想多少有些接近，在逃亡者的行列里，美国的左翼新闻业，艺术和文学界都有相当重要的代表人物。例如，其中有诗人兼漫画家莫里斯·贝克、小说家欧文·格兰威治（后来以迈克尔·戈尔德闻名）、画家兼漫画家亨利·格林坦坎普和新闻记者卡尔·比尔斯（他后来由于写了不少关于墨西哥和西班牙的书而获得相当声望）。前三人和“逃避兵役者”中其他某些次要人物都是马克斯·伊斯门编辑的激进主义者文艺杂志《群众》的定期撰稿人；他们都属于格林威治村派——纽约的波希米亚^①。

我在社会主义者领袖的寓所那里会见了两个人，其中之一是查利·菲利普斯，他最近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组织和平主义者示威游行而获得了一些名声。他和一位同学一起被捕，这位同学是一位老教授的女儿。两人一同逃跑，安抵墨西哥。在这段惊险生活中，他们结了婚。查利是一个名不虚传的爱吵爱闹的青年。他在纽约就听到过关于我的事情，和我一见面就非常高兴。我也必须与其他伙伴们见面，自然还要会见埃莉诺。查利和我成了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放弃了和

^① 波希米亚 (Bohemia)，指生活放荡不羁的艺术家居住的地方。——译者

平主义，热烈地拥护阶级斗争，虽然在政治演变的过程中，他失去了埃莉诺——失去了她的身体，如果说并未失去她的感情的话，因为他把埃莉诺叫做一个伤心人的镇痛剂。他和我一起作为从墨西哥派去的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来，他以曼努埃尔·戈麦斯的名字成为美国共产党的杰出党员的时候，又出席了一次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

当天晚上，我应查利的邀请，在一个饭店会见了其他绅士们。欧文·格兰威治、莫里斯·贝克和亨利·格林坦坎普都到了，自然还有以女主人身份出现的埃莉诺。查利的大学生派头的亲热举动已近乎粗野，使我这个依然残存着清教徒严肃感的人大为不安。女主人的几乎是低音的特别深沉的音调更加重了她的特殊个性。查利注意到我对她的声音印象很深，便声明说，他首先爱上的就是埃莉诺的声音，其后才是她这个人。毫无疑问，她那非凡的声音总是吸引着别人的注意，但声音里还含有更多的东西。她沉静，有教养，但不很爱好政治。查利是她首先迷恋的人，然而他并不值得她如此爱恋。不久她便离开了他；他非常伤心；而她也并没有选择到一个更好的人。

在我初次和美国激进主义信徒们认识的那天晚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欧文·格兰威治。他是一个贫穷的犹太人的孩子，在纽约东部犹太人区长。早年的生活经验使他感觉痛苦，因此他被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破坏性信条吸引住了。在美国，无政府工团主义是由一般叫做“沃伯莱”^①的“世界产业工人联盟”代表的。他还在二十五岁左右时，便成了革命小说

^① “沃伯莱” (Wobbly)，摇摆不定之意。——译者

家，有点名气了。他的雄心壮志是要写一部高尔基的《夜店》那样水平的文学杰作，描写纽约贫民窟的生活。虽然他表面上爱冷嘲热讽，但实际上是个颇有宽容性格而一般说来又很引人注目的人物。从我们相见的第一天起，我就非常喜欢他，他似乎也非常喜欢我。因此，我们的友谊达到了这般程度，以至有一次我对他叙述了我少年时代在印度的一段插曲，他竟据此写了一部短篇小说，作为我们共同的作品在一个美国文学杂志上发表了。

莫里斯·贝克是同样可爱的。尽管他具有他们的波希米亚色彩：性格变化莫测，他的政治思想倒是倾向于左翼社会主义。在“逃避兵役者”中，大多数人出身于欧洲犹太血统，只有格林坦坎普是多少有些名气的非犹太人。从他的名字可以看出，他的祖籍是荷兰，因而他血管内是没有平民阶级血液的。在我们的波希米亚社交会的第一个晚上，他将多半时间都用来向埃莉诺献殷勤，她是犹太籍“逃避兵役者”团体里的另一个非犹太人。血实在是比年轻人的爱情之水要浓啊，她终于抛弃了查利，爱上了亨利，最初是为了科学目的做性的试验，其结果证明非常合意。

我们在一个意大利饭店里聚餐。饭菜不错；但当我拒绝喝一种深红色饮料时，他们大吃一惊；这种饮料是从一个外面用草套裹紧的大肚瓶里倒出来的。欧文遗憾地将我的一份饮料喝下去，他兴致勃勃地喝醉了。但他坚持说必须分清，他是高兴，而不是醉酒。我领会了他话中的含意，我那残存的陈腐的清教主义便不声不响地解除武装了。那天晚上，我虽然没有喝酒，但答应今后要逐步克服我的这个偏见。

散席以前，查利告诉我们一件趣闻。某一墨西哥将军（他不知道名字）打算创办一种日报，它将有个英文版面，现正在物色一位编辑。因为很不容易找到一个胜任编辑日报英文版的墨西哥人，而一个有身份的美国人或英国人又不愿意在本地人手下工作，于是有人便向查利推荐这个职务。他应不应该接受呢？从经济上说，这倒是一笔意外的收入，因为激进派“逃避兵役者兄弟会”正处于饥饿的边缘。但我告诉他们不应该为了每天的面包而损害信念；好在他们当中也没有人愿干那种事。最后大家同意，我们必须查明，是谁要创办这个报纸，并弄清他抱有什么目的。

几天以后，我们再次见面，把同时搜集到的情报汇合起来。原来是阿尔瓦拉多将军想创办报纸，为他担任下届共和国总统来争取支持。他的号召力是来自他在尤卡坦的政绩，因此，这份报纸的论调就将是社会主义的。但是阿尔瓦拉多将军考虑到美国的影响是墨西哥政治生活中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很想得到美国对他的野心的支持。美国对墨西哥的意见绝大部分是由实际居住在那里的美国人形成的。筹备中的日报英文版目的就是要争取在墨西哥的美国侨民对阿尔瓦拉多将军谋求共和国总统职位的候选资格予以同情和支持。大家感觉到，编辑这样一种报纸的责任是不可能和激进主义者反对美国财阀政治的信念一致的。但我指出，它的英文版不能和该报的社会主义论调相抵触，为此，英文版编者应该有自由活动的余地。尽管如此，探明这位野心勃勃的将军真正的意图是什么，这也许是有用处的，这项任务便由我承担下来了。同时，查利应该把这项工作接受下来，但商定这项工作要由一个

目标明确的激进主义者小组集体来做，小组成员包括我在内。

我同作战部长戏剧性的会见以后，阿尔瓦拉多将军象预期的那样，来到了首都，就在那次我会见了。当他听我说乔丹博士的介绍信由他的首长收下了而没有退还时，这位社会主义者将军便纵声大笑起来。总司令很想探听他的下属和美国的联系，而我带去的信没有透露出什么不名誉的关系，他感到很满意。恰恰相反，这封信不仅是对我自己而且也是对阿尔瓦拉多将军的推荐。幸而他们的信条是，和平主义者必定反对美国干涉墨西哥，因此，应该把和平主义者视为墨西哥的朋友。后来，我从其他方面了解到，阿尔瓦拉多将军对卡兰沙政府的忠诚受到了怀疑，因为他想当总统的意愿被人知道了。在墨西哥，政治阴谋是被人们公开谈论的。

这时，一个更强有力的总统候选人已经登场，这人就是奥夫雷贡将军。他已经得到美国的资助，这也是公开的秘密。他拥护协约国——在墨西哥居于领导地位的政治家中的唯一例外。后来，在1920年他果然领导了一次武装暴动，推翻了卡兰沙。因此，阿尔瓦拉多将军视他为政敌。他要办一个日报的目的，就是要和奥夫雷贡将军进行斗争。进攻的方向是要痛斥军国主义，主张及早恢复文官政府。换句话说，《墨西哥先驱报》（筹备中的日报将以此命名）将成为自由民主政见的喉舌。这些便是我从《人民报》编辑那里搜集到的情况。他甚至暗示，新的日报既然作为反对奥夫雷贡将军的工具，就能够指望总统给予资助。他指示要让新日报的英文版告诉美国舆论界关于墨西哥问题的真相。

形势已清楚了；根据我的报告和推荐，激进派“逃避兵役

者兄弟会”的影子内阁同意由查利接受这项任命。我则承担撰写有关“门罗主义”连载文章的任务。在许多有才干的人集体工作之下，《先驱报》英文版从一开始就造成了影响。上面登载了才气横溢的漫画、诗歌和短篇小说，都具有普遍的号召力。表现在社论中的政见，先是和平主义，然后就越来越激进，就象糖衣包着的苦药丸。查利采取咄咄逼人的亲热劲，使得那位将军的亲信，主编先生，实在无法招架；开始，主编还是难以接近而好管闲事的。不久，英文版便决定了整个报纸的论调，而《先驱报》就变成激进主义观点的喉舌了。

15. 墨西哥的马克思主义 和无政府工团主义

1917年年底，墨西哥和北方强邻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德皇密使的访问加强了德国的影响。由德国帮助新近建立的一个强力无线电台保持着柏林和美洲之间的密切联系。墨西哥城不仅成为德国宣传中心，而且成了对美国和加拿大进行大规模战略破坏的指挥所。为了抵消德国的影响，美国增加了对墨西哥的压力，加紧了反对卡兰沙政权的舆论宣传。那时候虽然仍然处于内战痛苦之中，但是还有很大的出版自由。主要的日报显然接受有关外强的津贴，正进行着一场对卡兰沙总统的攻击。卡兰沙政府的中立政策被谴责为亲德，墨西

哥的民主政治无日不受到煽动,使其抛弃中立政策,站到协约国一边的光荣位置上去。亲协约国的报纸由一个已入墨西哥国籍的意大利新闻记者领导,后台是奥夫雷贡将军,将军几乎毫不隐讳地在准备发动一场反对卡兰沙政权的武装叛乱。

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冲突,因在宪法中有关国有化条款这个重要问题而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墨西哥政府坚决认为,新宪法已经废除了以前给予外国公司关于开发矿藏、特别是石油的特权。美国则在没收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还对宪法的合法性提出异议;换言之,也就是藐视墨西哥人民的主权。但是墨西哥政府却准备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与之妥协,即在迪亚斯执政时给与的特权,自新宪法公布之日起失效,墨西哥政府将另发给原有外国公司以新的租约。美国拒不同意这点。因此,墨西哥政府便以石油是国家财产为理由,威胁要禁止输出。人们可能怀疑有德国人在背后操纵。但是,墨西哥立场的合法性,却也无可厚非。妥协还是有可能的,墨西哥人由于处于较弱的一方,也急于妥协。但是他们决不会容忍外国商业公司藐视墨西哥的根本大法。

墨西哥最高法院已经受理一桩试验性的诉讼案。美国政府预料到墨西哥法院不会否定宪法,便威胁要派兵在墨西哥湾各港口登陆,以保护合法的商业,并防止专横的墨西哥政府进行干涉。美方的论据是,油田是私有财产;因此,禁止石油出口就是没收油田。美国政府一方面威胁要强行夺取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一方面又以阻止墨西哥土匪袭击美国领土为借口,派兵越过了北方的疆界。

不消说,墨西哥城群情愤慨;抗美情绪不断高涨。人们担

心在发生爭吵时，个别美国人可能会因此受到侮辱、甚至殴打。亲协约国的报纸替石油公司的反对行为进行辩护，并暗示说墨西哥政府的政策受到德国的暗中支配，这就更在公众的怒火上加了油。在那种紧张的气氛之中，出现了一次温和的反美示威运动，这件事值得在这儿扼要叙述一下。

著名黑人拳击家杰克·约翰逊因为跟一个白人妇女结婚，最近被迫离开美国。他在墨西哥避难，想得到政府的帮助，在那里为黑人建立一个农业聚居地。同时，他受到军队雇用，教青年军官打拳。

时髦的马德罗大街上的桑伯恩药房是英美侨民的社交中心。这个药房是一种特殊的美国机构。它是药房，兼售各种化妆品和糖果。可是，供应各式各样的冷饮又是这个药房的主要营业；一些高级药房都设有茶室、咖啡室和饭店，那儿聚集着上流社会的人物。桑伯恩的冰淇淋是享有盛名的。他们也供应优良的咖啡；墨西哥的奥里萨巴咖啡在世界上堪称上品。

我已经学会欣赏生活中的珍品，因此常到那里去。有时同“逃避兵役者兄弟会”会员一道；有时独自一人前往，静静地坐着，观察着另一个世界里居民们的奇特行径。一天下午，当我独自一个呆在那里的时侯，一个高个子、长得很漂亮的黑人由一个白人青年妇女陪伴着，走了进来。他们向周围张望，显然是想找一张空桌。后来在房里边找着一张空桌，就坐下了。那地方挤满了人。但我感到一种冷淡的气氛，我继续观察那对夫妇。他们坐了好些时侯，可是没有人来招待他们。最后，那位妇女招呼一个女侍者，同她交谈了几句话，那女侍者却耸

耸肩走了。受到怠慢的顾客显然很生气。但她的伴侣站起身来，在她那颤抖的身躯旁边巍然屹立，他尽量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挽着她的胳膊，一同走出去了。

我知道美国人开的饭店是不接待黑人的，甚至白人开的理发馆也不准黑人进去。但我们不是在美国。墨西哥人由于血管里流着混合的血液，是以种族上的宽宏大量而著名的。我不知道那个特殊的黑人是谁。我丝毫没有想到杰克·约翰逊会在墨西哥。无论如何，我不能不同情那一对受侮辱的夫妇；当我注意到周围傲慢的冷笑和格格的笑时，我的同情心更大了，甚至达到了愤怒的程度。

我正站起身来要走，决心永不再到这个地方来，这时，一群穿制服的人护送着那个黑人冲了进来。他们一进来，许多顾客立刻起身走了。这群人命令女侍者把几张桌子并在一起，他们坐下之后，就叫唤经理出来。一个胆小怕事而又假装神气活现的人露面了。这伙人群情振奋，同声高呼：“杰克，你向桑伯恩先生点菜吧。”原来，这就是著名的杰克·约翰逊。他咧着嘴，面有难色。经理叫来几个女侍者，吩咐她们侍候这群人。其中一个领头的人说：“小姐们招待我们；但桑伯恩先生，你必须亲自侍候杰克，你要对他所受的侮辱赔罪。”那经理还有点迟疑，于是，他们提醒经理注意，他是在墨西哥，在这里，黑人并不比最白的白人差。接着他们还严厉警告经理，如果他打算在墨西哥做生意，他就必须服从本地的法律，而在墨西哥，不管是什么肤色，任何人在法律面前都一律平等。

经理咬牙切齿地抑制着感情，走到食品室，拿了一个盘子，放在黑人面前。黑人站起来，面带宽宏坦率的笑容，这笑

容一定会使那个傲慢的白人感到无地自容。黑人同他握手说：“请原谅我给你带来这些麻烦，桑伯恩先生。”那群人离开餐桌，到了外面，遇到一群热热闹闹欢呼着的人。这不是什么反美示威游行，也不是什么民族主义分子感情的爆发。他们是朝这个黑人欢呼的，他们把他举到肩上。这是一次热爱正义的示威。一个人受过侮辱，只是因为他的肤色发黑。墨西哥人的仗义精神就是要维护人权和人的尊严。

除了很久以后偶然一次机会以外，我再也没有见到那位黑人。我觉得那次的情景必定也使他深受感动。我们正在募款出版苏联宪法的西班牙文译本。一天，欧文·格兰威治和我在街上碰见杰克·约翰逊。欧文拦住他：“喂，杰克，你对布尔什维克有什么反对的吗？”那个高个子黑人有点为难的样子，回答说：“不，我不反对。”欧文向他募捐，并说明了原因。杰克掏出一张十美元钞票，嘻嘻地笑着，祝愿布尔什维克顺利。

墨西哥公众生活在表面平静之下潜伏着不断增长的反美情绪，但是政府却很不安，左右为难。中产阶级对美国侵略虽然忿恨，但对外国武装干涉的威胁似乎漠不关心。除了使用军队以外，政府没有其他办法抗拒迫在眉睫的危险，而军队却又不大可靠。奥夫雷贡将军在武装部队中有支持者，这是人所共知的。由于无原则地进行内战，道德败坏已成了传统，金钱对职业军人能起重大作用；而奥夫雷贡将军的武器库里银弹多得很啊。

政府在失望中似乎急不暇择地到处寻求可靠的朋友。我受到邀请去参加“现代妇女”住宅里举行的一次茶话会。这不

是她的作品爱读者的例会，而是一次半官方的社交活动，出席茶话会的人中有外交部长和社会主义者国民议会议长。年轻的费尔南德斯也到会了，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哥哥，他哥哥待我象个老朋友。几分钟后，他把我拉到一旁，问我是不是还住在玉米地上的那所房子里。然后他面带外交官的笑容向我吐露说，各式各样的人都在注意我，劝我行动当心些。但是，我也不必担心；因为我的住房的位置关系，警察已奉命特别警戒了。

国民议会议长唐曼努埃尔已从他的朋友桑蒂瓦涅斯那里听说过我，他急于同我会晤，以便一同讨论墨西哥社会党的前途。唐曼努埃尔是一个直率的人，但也不摆架子。他开门见山地谈到正题。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许多自由职业的人都是如此。但是工人们在狂热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错误领导之下，不相信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社会主义要成为墨西哥政治上的一个因素的话，这两个重要的社会派别就必须联合起来。我同意他的意见，并问他和与他类似的人为什么不加入社会党。他冷笑着说：“有理智的人怎能和狂热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相处呢？”我说，他的朋友桑蒂瓦涅斯也许是一个例外，我们应该开会讨论改组社会党的问题。

现在轮到我来谈谈问题的实质了：“难道我们不能组织工人阶级起来对美国干涉的威胁进行抗议，并在最后进行抵抗吗？”“具体怎么做呢？”他问，显然他感到了兴趣。一次总罢工就能使石油工业瘫痪。为了对最后行动进行准备，应该在首都组织群众示威游行。他摇了摇头，好象毫无信心。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看不出这个政府和另一个政府之间有什么差别；

他们丝毫不肯出力来支持我们的政府。我认为，如果政府同情地对工人阶级的经济要求作出答复，是能够战胜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影响的。经过这样的讨论，作出了两个决定：第一，我们应当和桑蒂瓦涅斯以及几个被推选出来的社会党领袖举行一次会议；第二，我必须谒见总统，呈交一份政府劳工政策大纲供他考虑。

外交部长也来加入我们的讨论，好像是官方来批准我们的决定似的。唐曼努埃尔向外交部长介绍了我的发动民众来抵抗美国侵略的计划。这位外交部长在性格上，以及在教育方面，与其说象西班牙人，还不如说象法国人。他显然想设法使这个计划得到合情合理的批准。他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相信民主政治和社会正义。从他对于象我当时那样一个初次从感情上倾向共产主义的空想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作出的轻率判断的态度来看，他那出于理性的态度或对信仰的表白都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尽管如此，被这样的高级人物视为知己，认真对待，真使我自觉很了不起，这种感觉却抑制了我的坚决的革命见解的热劲。

第二天，我同“逃避兵役者兄弟会”讨论这件事，当然，仅仅在内部，即在《先驱报》英文版的编辑委员会内讨论这件事。我们既然在墨西哥避难，难道不应帮助一下主人吗？我的美国朋友们都是“红色”革命家，不承认石油大王们的威吓。但是他们也不想支持另一个资产阶级政府。由于他们拥护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宁愿支持阿尔瓦拉多反对卡兰沙。我认为，当前不是要在墨西哥两党或两个人物之间，而是要在外国帝国主义和墨西哥的民族独立之间进行选择。无产阶级无祖国；

国际社会革命者怎么能够支持工人阶级的一个敌人反对另一个敌人呢？我在理论上同意这一点，但是我坚决主张，无产阶级为了准备夺取政权，必须在这个特定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把自己作为一个决定性因素组织起来，现在正是这样做的最好时机。

查利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没有理论上的固执观念，他接近革命政治主要是从感情出发。为了感谢殷勤的款待，我们必须帮助墨西哥反对外国的威吓，这种思想很投合查利的心意。他以他那特有的急躁情绪宣布说，我们大家都必须加入社会党，并且把它建成一个革命的群众组织。其余的人也同意了，不过思想上还有些保留。贝克和格林坦坎普是波希米亚式的空谈革命家；他们不大关心政治。欧文·格兰威治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者。他相信社会革命，但不相信国家与政治组织。所有这些分歧都必须在将来辩论清楚。目前大家都是战友——一齐战斗，各行其是，为了被掠夺和被剥削群众的社会解放，我们必须团结一致。我们都在墨西哥，就必须同当地工人阶级接触，参加他们的组织和他们的革命活动。

这样决定加入社会党之后，我们拜访了桑蒂瓦涅斯。他几乎欢欣若狂了；我们加入墨西哥社会党会使它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组织——这是它历史上的一个大喜日子，在党的群众大会上庆祝这一天再合适不过了。我建议说，首先应由党的执行委员会开会接纳我们为正式党员；然后，在群众大会上介绍新党员。

我趁此机会说道，别的社会主义者，如国民议会议长和其

他类似的人，都可以入党，如果党把眼界放宽的话。桑蒂瓦涅斯连忙捍卫他的既得利益：那些机会主义的国会议员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轻视工人阶级。我踌躇地劝告他要谨慎行事。与那些人一起讨论一下合作的可能性有什么害处呢？何况这种合作还会大大增强党的力量和威信。假如在危机出现之时，党能发挥作用，它就肯定会成为政府所不能忽视的一个政治因素。接着我又大胆暗示，政府也许愿意帮助党发挥这样的作用。

桑蒂瓦涅斯律师精明能干，领会了我的暗示。他问我是否已见过唐曼努埃尔。我承认见过，并说我还见过其他人。他放弃了小党领袖的宗派态度，很热情地询问，唐曼努埃尔是否提到过卡萨斯先生。这一回是我吃惊起来了。怎么，这位大学校长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吗？我夸下海口说：把那些人交给我吧。如果党的执行委员会能被说服放弃宗派主义，那些人就都会加入社会党，而且政府对工人阶级迫切的经济要求可能采取同情的态度。工人阶级主要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有关系，因此劝使他们同意，肯定是不难的。

墨西哥的那位卡尔·马克思的灰黄色面颊上微带红晕；他的眼睛在厚厚的眼镜片后面闪闪发光。这么一来，他也许不会虚度此生了。

16. 拉丁美洲的门罗主义

到墨西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聘请一位西班牙语教师。通过《人民报》编者的推荐，我请了一位有点上了年纪的人，他在国立“埃斯库埃拉”（大学）教西班牙语。他的地位相当于印度的一个教授。但在墨西哥，高级中学称学院，那里的教员称教授。专科学院则称“埃斯库埃拉”，只有系主任称“马埃斯特罗”^①。因此，我的西班牙语教师没有学衔，虽然他占有大学里一个高级讲师的地位。他为人谦虚，收入微薄，思想守旧。他常常谈起迪亚斯的黄金时代，哀叹革命造成破坏和浪费。但是，他却采取一种哲学家的超然态度；他不关心政治，蔑视革命领袖。

他特别悲叹祖国的文化退步，引用未完成的歌剧院来说明他的观点。他又谈到欧洲丰富多采的大歌剧和芭蕾舞团，它们经常于每年冬季访问墨西哥城。迪亚斯为了使他的都城名副其实，在他当权的最后年代，批准一千万比索建造一座歌剧院，堪与欧洲最上等的歌剧院相比。建筑师和熟练工人都来自意大利。但是，这个足以夸耀的大理石建筑物仅仅完成一半，革命就爆发了。我在那里的时候，这个建筑物仍然屹立在城市中心的一个公园里，隐藏在林立的建筑架子后面，作为迪亚斯时代已逝光荣的纪念碑。大歌剧和芭蕾舞团再也不到墨西哥来了。

另一方面，斗牛这个大型的民族娱乐，也被卡兰沙政府当

^① “马埃斯特罗”（maestro），西班牙语，意为教师。——译者

作残忍而野蛮的东西禁止了。墨西哥城的斗牛场，也是在迪亚斯时代建筑的，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斗牛场——一个园形体育场，能够容纳三万五千人。假如歌剧院的未能完成可视为文化退步的一个证据，那么，禁止斗牛肯定就是一种与此相反的进步啦。但是象我老师那样的人，是只知哀叹有闲的富人过去的业已凋谢的荣华，他们是不能理解努力建设一个民主未来的功绩的。

1918年初，巨大的斗牛场给派了更好的用场，表明革命并没有把文化和迪亚斯的独裁一起摧毁掉。意大利的大歌剧和俄罗斯芭蕾舞再次来到了墨西哥城。一座歌剧院不可能在一个短时间内建成，革命政府又不愿剥夺人民的艺术享受。斗牛场就为了这个目的开放了，接连多日，天天客满，有三万多听众倾听卡鲁索在一个巨大的希腊剧场歌唱。我永远想象不到人的声音竟会成为那样的东西。同卡鲁索的庄重嗓音相比，我觉得帕夫洛娃的舞蹈和整个芭蕾舞就显得相当浅薄而轻浮了。我对伟大艺术的鉴赏还是很幼稚的。

一个粗壮的男人穿着浅色的薄贴身衣，在舞台上跳来跳去——我看不出这其中有什么艺术。这也许是熟练的体操吧；那么，为什么不到马戏场去看更加灵巧的这种表演呢？事实上，我的艺术爱好同芭蕾舞格格不入。我能耐心看完的芭蕾舞，仅仅是每出俄罗斯歌剧的第三幕。甚至在那时，使我感动的并不是舞蹈——妇女用足趾旋转，象陀螺似的——而是音乐和乐队的吹拉弹奏。

我已经提到，学了一些初步语法课之后，我就在我的优秀教师帮助之下，用译书的方法来学习西班牙语。这本分量不

大的书是我还在美国时写的，取名叫《持久和平之路》。我在墨西哥又增写了稍长的一章，论及门罗主义的起源及其在大约一百年间实践中的发展。这项工作使我有机会相当广泛地研究美洲的、特别是美国独立战争以来的历史。这是我获得的一种很有用的知识，它大大有助于我的政治思想的发展和对于当代世界形势的理解。

门罗主义于 1823 年系统地提出来，是遵循乔治·华盛顿关于不介入外交纠纷的指示，它要求欧洲列强也表示出相应的态度。美国第五届总统托马斯·门罗在致国会的咨文中说：

南北美洲大陆已采取并维持了自由和独立的地位，因此今后不得被视为任何欧洲列强进一步殖民地化的对象。

那是 1823 年。中南美洲国家已在前十年至十五年间，一个一个地摆脱了西班牙的奴役。但因为欧洲的反动势力已被神圣同盟所复活，人们担心西班牙也许会企图恢复它在美洲的殖民地。

这样，门罗主义最初是对欧洲帝国主义发出的“不许干涉美洲”的信号。一百年来，它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它的最新解释则是使美国置身于国际联盟之外的孤立主义。这好象是一团快要熄灭的火焰最后又突然燃烧起来一样。

1923 年，美国借助于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干预欧洲，支持德国的反动势力，从而为法西斯主义的终于兴起创造了条件。

另一方面，在过去一百年中，门罗主义的实际运用已经使美国在新大陆建立了实质上的保护关系。美国借口防止欧洲人的殖民，在军事上一再干涉中南美洲。墨西哥是美国的近邻，在这方面是最不幸的受害者。除了许多局部的武装干涉外，美国对墨西哥进行了两次主要的战争，兼并了包括现在得克萨斯、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三个州的广阔领土。

直到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美国的力量一心放在国内。甚至那个时期以后，美国还是一个债务国。外国资本，特别是英国资本，在其惊人的工业发展过程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在那时期，美国不能插手中南美洲的经济生活。到了19世纪末，美国已经完成了对大陆上直到格兰德河以北的征服之后，便着手征服美洲。门罗主义所建立的政治保护关系，适合于金融渗透实际上就是经济垄断的需要，并使弱小邻邦的政治独立徒具形式。其政策的一部分就是促使革命和内战不断发生。泛美主义和泛日耳曼主义或日本的共荣圈主义，本质上没有多大差别。

我书中所写的论门罗主义这一章，首先是在《墨西哥先驱报》上作为连载文章发表的。这篇论文引起了相当的哄动，为我在很有地位的墨西哥人中赢得了许多朋友。“现代妇女”告诉我，唐贝努斯蒂亚诺^①对这些文章印象很深。它们不只是解释历史，而且还引申出一个政治结论：必须结束美国的保护。为了这个目的，应该组织一个拉丁美洲同盟来反对美国发起的泛美会议。德皇所派的枢密顾问官在负着鼓励这样一个运动的使命来到墨西哥以前，我就已经发挥了这种思想，这

^① 唐贝努斯蒂亚诺 (Don Venustiano)，即卡兰沙总统。——译者

思想很受卡兰沙总统的赏识。他对我极其友好的态度，大概是基于这种看法决定的。

为了庆祝我的第一部著作出版，“现代妇女”举行了一次社交茶话会。不仅她的初见蓓蕾的作品的吹捧者们出席了，而且象卡萨斯先生这样的知识界名流也赏光驾临。几位将军、部长和高级官员也到了场。来客中还包括国民议会议长和几位左派政治家。但是在“现代妇女”的客厅里从来不可能有严肃的讨论。她摇动着那插在发簪里的黑色香烟，一定得占住舞台的中心。对她来说幸运的是，没有人向她竞争。妇女们是不参加这样卖弄才华的社交集会的。

一位经常写诗当作“现代妇女”(显然是他的情妇)的作品发表的诗人，作了个爆炸性的简短演说，说“神秘和智慧古国的忧郁哲学家”已经到来，以激发拉丁印第安人的精神，使其再一次爆发出壮丽火焰，以驱散美国保护的阴霾，从而提醒墨西哥人忆起曾带来解放信息的莫勒洛斯、伊达尔哥和胡亚雷斯的光荣传统。他所引用的比喻实在无法列举，以上仅是一段不成功的复述而已。但是他的演说最惊人之处则是他那富于感情的颤抖声调。看来举座都得到了极深的印象，只有卡萨斯先生例外，在他那蓬乱黑发下面的宽大面孔上，我看出微微的一丝冷笑。我倒很喜欢这点。至于其余的人，你能想象到，军刀在穿制服的将军们的刀鞘里格格作响；外交家们板着冷淡的面孔；部长们满脸呈现出政治家讲求实用的神情；政客们则脸上堆笑，表示赞许；而女主人的其他随从人员呢，我看妒忌得脸都发青了。

演说刚完，她就走到她那诗人崇拜者跟前，握着他的手，

抑制着感情(那人已经结了婚,天主教是不许离婚的),用哽塞的声音说:“好极了。”那男子感激得几乎要跪倒在爱慕者的脚下。

粗俗不堪的“现代妇女”把这种高到云天的紧张情绪降到地面了。她一刻也不能把舞台中心让给任何人,甚至连那位尊敬的诗人也不行。她在和他握手的同时,斜瞟他一眼表示奖赏之后,就开始了她自己的表演:她抽出一支黑色香烟,竟有六个人争先恐后地去给她点火;她一向不愿让任何人亲昵地去替她把烟卷从发夹上取出来。现在轮到她演说了——一段简短的演说,只用了几句话,但是很有条理的几句话,就说到了要点。新书的作者必须引见给共和国总统。为了为那个仪式作准备,她要将一部经过作者题词的赠阅本亲自送交给唐贝努斯蒂亚诺。人人欢呼赞成;这次又是卡萨斯先生,他几乎令人觉察不到地摇了摇头,表示勉强俯允同意。会散了,人们陆续散去。卡萨斯先生来到我跟前,发牢骚说:简直是无聊的感情用事。这件事应当交给人民来批评和判断,他们是能够形成明智的舆论的。这话听来颇有道理。我愿意就这个题目在大学里发表几次演讲吗?

我真是受宠若惊;但在此同时,我一想起作演讲就打了一个寒噤。直到那时为止,我从来没有作过一次公开演讲。这不是我们密谋革命活动的一个部分。我们从来不相信讲话可以干革命;我们要的是更有力的武器。我已克服了那种早年的偏见,但是在讲台上永远不会取得成功。在墨西哥,我真的学会了公开演讲,不过只对有限的听众,如在党的会议上、党员大会上、工会会议上等等。在去俄国以前,我没有在任何

群众大会上发表过演说。

可是，我接受了卡萨斯先生的邀请，几天之后，在大学里发表了我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全体学生和所有教师都参加了。我是用西班牙语讲的；在老师的帮助下，我先写出了讲稿，他对他的学生似乎很满意。第二天，我的胆量更大了；我没有念讲稿，而是凭记忆讲的。

我一共作了五次讲演。最后那一天，卡萨斯主持讲演会，并作了简短的总结发言；他说，这是对美洲近代史所作的最新解释，提出来供大学师生作批判性的研究。这位博学的来宾对于历史有独特的研究，从而得出了大胆的、引起争辩的结论。如果他是正确的话，那么，凡是赞成这种判断的人，必须充分地意识到自己应负的责任。拉丁美洲的解放者们确实是伟大的人物；我们必须重视他们的业绩。但是，在当今世界上要为解放而斗争，就必须开辟新的道路。我认为那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提示。在学术讲座上不可能说出更坦率的东西了。但这一点是明确无误的；国内知识分子的老前辈已经敲响了社会革命的警钟。

我感到(多少有点自以为是吧)，我可以为发动一场社会革命而作出贡献了，便非常高兴。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它标志着新的一章从此开始了。

17. 国际象棋、社会主义与骑马

我的西班牙语教师是墨西哥的国际象棋冠军；国民议会议长唐曼努埃尔是他的对手。我甚至在印度当学生的时候，就在业余时间玩过这种游戏，并且想学好它。这是受到我爱好的唯一室内游戏。我认为玩牌纯粹是浪费时间。幸而，我的西班牙语教师不是一个势利小人；他是国家冠军，但并不觉得经常跟象我这样的业余爱好者下棋会有损他的尊严。

我不再需要上西班牙语课了；可是我仍旧喜欢这位老人一周来三次，他也乐意来。国际象棋代替了西班牙语，成了我的功课内容。唐曼努埃尔不时也来参加；这使我得到难有的机会观看两位大师斗智，以此学习这种游戏。我认为唐曼努埃尔更有才华一些，他在努力模仿当时世界冠军卡帕夫兰卡^①的棋法。另一位则是稳扎稳打，几乎总是以耐心磨掉对手的才智而取得胜利。唐曼努埃尔先使用开局让棋法，随即迅速摆开他的更有力的棋子，准备全力进攻。在比赛的开始阶段被对方将了一军之后，唐曼努埃尔似乎挫了锐气，而对方便得以随心所欲了。对方却不急于反击；他首先关心的总是在一个固定位置上用车护王。凭着那种防御战术，他设法挫折了对方进攻的锋刃。此后，便是比耐心和争时间的问题了。

唐曼努埃尔的棋虽然经常是失败多于成功，可是他那种风格很投合我的脾味。然而，不管我什么时候想试一下，甚至

^① 卡帕夫兰卡 (Capablanca)，古巴象棋手，1921—1927 年的世界象棋冠军。——译者

在我的有力的棋子还没有随意走动以前，冠军就赢了。一天，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其实也并不十分意外。只是我忽然心血来潮——想孤注一掷，阻止冠军以车护王。我开始的几着棋必定是不按常规的，很幼稚的。那位冠军毫不在意；显然，他认为我在漫无目的地走动棋子，便没有忙着去建立坚不可摧的防御，以护其王。

为了给我的黑象打开道路，我牺牲了一个马。那冠军察觉到犯了错误时，已经晚了半秒钟。我听见他轻声地说“输了”，而且不断重复说这句话，我感到很奇怪。我怎么会赢呢，我自己还完全莫名其妙，虽然我已经达到了战术的目的：我那黑象的位置使对手不可能用车保护他的王。我说，甚至到了这时我还看不出我已赢了这局棋，这时大师便自己认输而结束了比赛。我尽量为他辩护，当然不是表示我比他高明，而是探讨在最初几着棋取得战术地位的基础上，可以采取的各种进攻的方法。

那位冠军表面上高兴地认了输，但我能看出他心里是不太舒坦的。他坚持说，这不是一种侥幸成功；进攻经过精心安排，至少最后五着棋是预先仔细考虑过的，是针对对方所有可能的对抗手段考虑过的。他补充说：我不再是一个生手了，能够自己赢棋了；除非犯了我不可能再犯的那种错误，我是绝对不会输的。他把我大大吹捧了一番。因此，我从一位老师那里得到了两张文凭，一张是西班牙语的，另一张是下象棋的。

第二天，唐曼努埃尔来祝贺我打败了冠军。我真心诚意地谦逊了一下，不承认自己有什么本事，只不过是侥幸取胜而已。但他还是克制不住他那兴高采烈的样子，我猜想，这与其

说是为了我的技艺，倒不如说是因为他的劲敌失败了。可是，他提出要我再一次使用原来的棋法，同他对一局。我们两个下棋；冠军在一旁看着。我很紧张；但我的那一手又成功了。唐曼努埃尔非常高兴，冠军终于遇到了一个敌手。我却不这样想。不管下得多么好，我可不能把下棋当作我的职业。在一段时间内，我们确实经常下棋，而且我常常赢。但是冠军无疑还是好得多的一位棋手。他知道许多变化；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耐心在实践中去研究这些，并且发展对付对方的棋法。然而，那一次智胜我老师的开棋组合法，一定是十分高明的。两年以后，我用这个棋法在莫斯科和阿列金下成平局。那时他还不是世界冠军；我也没有想到同我下棋的这个人下一年就会打败卡帕夫兰卡。

象棋热很快就过去了。编辑《先驱报》英文版是一件饶有兴味的工作。那时我已积极投入社会党的活动。我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党的机关报《战斗》改为一种八页的定期周刊。所需的一些经费，我不难节省下来。从党的书记那里买来一个小印刷厂；又补充了一些新机器和新铅字，这便成为党的财产了。老桑蒂瓦涅斯很高兴；事情终于有了发展。那时候，党的内部连夜进行狂热的讨论。社会党是不那么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我愿意将讨论圈子扩大，便提议将我们讨论的各个主题印成小册子。这样，党在印刷厂里的投资便发挥作用了。在出版了大部分是我自己所写的六种小册子以后，我建议社会党发表一项宣言，召开一次会议，以便组织一个工人阶级的大党。

大概是在 1918 年年中，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消息传到

美洲，激起一切梦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人们的想象。夺取政权不再是一个幻想了。所以，那个宣言号召组成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作为夺取政权的工具，这不能被看作是异想天开而不予考虑。实际上掌握政权也许可能成为现实的这种想法，已经动摇了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先入为主的在理论方面对于国家的反感。宣言得到了普遍的响应，以至首次登载宣言的那一期《斗争》重印了三次。各州也有了响应，人们纷纷来信要求出席会议。

社会党执行委员会开会，筹划会议的组织工作；有些委员显然感到意外。他们认为这样做太不自量力。这将是一次规模很大的会议。组织这次会议可不是闹着玩的。哪里来的钱呢？我再三使他们放心，在这方面用不着担忧。为着人民的事业，钱是能够筹划到的。但不应着急；会议必定会成功，它标志着工人阶级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在本国和拉丁美洲的政治生活中出现。每一件事都必须很仔细地计划——同预期的代表通信，大规模的宣传，草拟决议，等等。大家都充满了热情，但是没有一个准确地知道他实际上能干什么。因此，会议任命我为党报的编辑和党的宣传主任之后就结束了。我还接受委托负责从其他拉丁美洲共和国争取兄弟代表来出席会议。“逃避兵役者兄弟会”已宣布他们愿意作为美国的兄弟代表来参加会议。

在筹备在墨西哥召开一次国际社会主义者会议的狂热气氛中，一天，唐曼努埃尔负有外交使命来访。总统将高兴地接见我。第一次在德国公使馆的接见，可以说是非正式的。这次将是在总统官邸的一个正式集会上接见。政府的重要阁员

都会出席，我被邀请留在那里吃午饭。唐曼努埃尔告诉我，总统已密切注意到我改组社会党的活动，并且对于它的结果很感兴趣，特别对关于中南美洲各国的兄弟代表出席会议的问题更感兴趣。然后他透露说：我可以指望墨西哥的外交和领事代表在这方面予以合作。当我知道这次宴会不会是一次呆板的官方宴会，而可能是一次有效果的接见时，我松了一口气。

墨西哥共和国总统居住在查普尔塔佩克古堡里，那古堡建筑在离城五英里一个美丽公园中的土丘上。连接公园和城市的宽阔大道是美洲的爱丽舍田园大街^①——展览最时髦物品的所在。沿着林荫路并行的马道一直通到公园里面，公园的富丽堂皇的楼阁里有丰富的茶点供应时髦的骑手们。自从倒霉的马克西米连皇帝和他的皇后夏洛特的时代以来，人们一直看见有些世界上最好的马在这条著名的查普尔塔佩克马道上走着、跑着、奔着。每一个著名的欧洲人士总有机会在这儿被列为杰出的骑手之一。

在墨西哥历史中，马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马本不是美洲的原产。西班牙人首先把马带到墨西哥。拥有那些奇异的动物，对于他们征服殖民地帮助不小。人骑在比他们自己强壮得多的动物背上，在迷信的阿兹特克人看来，就象下降的天神一般。虽然没有理由设想，新世界的土人是从印度横过白令海峡来到那里的，但墨西哥马的祖先肯定是亚洲的。撒拉逊人^②

① 爱丽舍田园大街 (Champs d'Élysees), 巴黎最繁华街道之一，与凯旋门相对。——译者

② 撒拉逊人 (Saracens), 中世纪欧洲人对信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的称呼。——译者

把马带到了西班牙，西班牙征服者把马的后代带到了新世界。本地繁殖的墨西哥马比它的阿拉伯祖先小一些。但是它们都是优良的动物，而且几乎每一个墨西哥人都是好骑手。

我已把墨西哥当作我的第二故乡，因此必须学习他们那个民族的娱乐。我一向喜欢骑马，并希望能够骑得很好。但是我从来没有很多的机会。离开印度以前不久，我在加尔各答广场上学过骑马。那时，我是一个逃亡者，在那些日子里，我大部分时间过着逃亡者的生活。我料想，清晨广场上没有人，一定不会遇见讨厌的家伙。然而，我想错了；在第三天或者第四天上，我看见了德纳姆，当时的罪犯调查部特别分部主任，也在那里骑马。我骑马的练习就这样突然中断了。因此，在墨西哥又有了机会时，我便热切地抓住不放了。但是，我不喜欢加入在查普尔塔佩克马道那儿上流社会人士的骑马表演，他们大多数是外国人。经过几天的练习，觉得自己在马鞍上很有把握了，我就喜欢到野外去骑马。墨西哥人骑马采用西班牙式，两腿充分伸开，踏着长镫子。我觉得这种骑法比英国式舒服得多。墨西哥的马鞍也比较舒适；人坐着安稳得多，骑马专家可以松开双手，因为他能把缰绳挽在马鞍前部的前桥上。因此，我骑上“银王”（这是我经常租用的白马的名字），由我的狼狗伴随着，每天早晨骑好几英里，访问整个城郊，一直骑到内华达山脉的低坡，我在村民中还结识了许多朋友。

我在那里的时候，古老的光荣已黯然失色了；可是每到下午，查普尔塔佩克林荫大道上便活跃起来了。成行的汽车，载着艳服盛装的交际妇女，由穿着漂亮军服的绅士陪伴着，热闹异常。墨西哥城里稍有地位的人物，谁也不能脱离公共场所。

总统自己也不例外。每天下午晚些时候，他那黑色轿车便从古堡大门开出来，驶往市区，再返回来。开车全程时间大约需要半小时，总统忙着高举礼帽，彬彬有礼地向那些参加上流社会人士骑马表演的无数社会名流致意。

18. 谒见总统

谒见的前一天，唐曼努埃尔来通知我，他将于上午 11 点来找我。然后，他有点不好意思地建议说，我应该适当打扮一下。他谅必已经注意到，我从不因特殊的需要而随俗穿衣。当我说我没有准备不同的衣服供一天几次更换时，他提议立即领我去找裁缝，二十四小时之内就能把我打扮得相当漂亮。做一套按特殊式样裁剪的新衣服是不该反对的；但是我不喜欢过于重视按照习俗进行打扮，我更不愿意好象被人带进后台去化装以备登台表演似的。我说：如果总统对我有足够的重视，他不应该介意我的穿着，当然也不要臭气难闻；我的衣服是可以见得人的，就在本城很讲势利的德国社交界里也算够不错的了。我在美国时很穷；但自从来墨西哥，做套象样的衣服还是做得起的。

同我的好朋友唐曼努埃尔的小小风波，固定了我以后一生的格调。我从不穿早礼服或晚礼服；尤其讨厌硬领。多年以来，全欧洲的朋友都熟悉我穿的灰色法兰绒服装和褐色外套。我仍然认为那是男子穿的最舒服的、最能见得人的服装。男

子穿着晚礼服，特别是那时代盛行的各种长尾服，好象猴子一般；他们跳起舞来，摆动着长尾巴，十分可笑。

对于我的任性，唐曼努埃尔采取了十分温厚的态度。他在怀疑我是不是一个乔装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有朝一日，我也许会留着那著名的大胡子，口含血刀出现哩。他开了个玩笑岔开话题，说这将是一次重要的会见，他不愿由于对琐碎小事的疏忽而使会见受到损失。唐贝努斯蒂亚诺到底是个西班牙贵族，对于行为举止必然有拘泥习俗的思想。为什么我们不在小事上让让步呢？唐曼努埃尔的明智使我受到感动，于是我为我的糊涂任性向他道了歉。

他提醒我，这次谒见是按照在“现代妇女”的茶话会上我和外交部长的谈话安排的。为了争取工人阶级的信任，总统希望在措施方面提出个具体建议。很明显，唐曼努埃尔本人也很想知道我的建议是什么。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我简单叙述了行动计划：社会党要召开公开大会，对美国扬言要进行干涉提出抗议；会上要通过一个决议，号召举行群众抗议示威游行，并呼吁民主的中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携起手来，坚决保卫共和国主权及宪法；象唐曼努埃尔那样的民主派领袖，应当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公开赞同抗议；学生和教师都应当参加示威游行；最后，军警不应干涉。在首都举行示威游行后，如果外国公司无视墨西哥法律的话，社会党应派使者去组织石油工人罢工，以阻止石油的开采、提炼与输出。工人阶级主动开展对外国干涉的群众性抵抗，就能促使政府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同时，政府应当支持工人阶级的经济要求，以资鼓励。

唐曼努埃尔预料这个计划会投合总统的心意，不是因为总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是因为他会把这当作一个实际的政治问题。总统主要考虑的，不会是侧重于协助开展对国外干涉的民主抵抗方面；而是要使他的政府得到群众的拥护，以便巩固他的地位，与象奥夫雷贡将军那样的政敌相抗衡。总统特别急于要通过揭露奥夫雷贡将军的这一事实来使他陷于孤立，这个事实就是：他已答应在登上总统宝座后立即废除石油法，以获得美国对他的保护。奥夫雷贡是面积广大而又十分富饶的索诺拉州的州长，这个州和美国有数百英里的共同边界。州内有若干现代化的大农场，都为美国人所拥有，他们还掌握开采矿山资源的特权。奥夫雷贡作为索诺拉州州长，同由得克萨斯石油大王达荷美领导的一个有势力的美国商人集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总统自然很想把他的敌手从这个有利的位置上撤换下来；但是他又不敢这样做。这位野心勃勃的将军，依靠美国的支持，可能举起叛旗，在国家几乎还没有从前一场内战中摆脱出来，就又重新把它投进另一场内战中去。一个群众性的反美运动将是有效的战略；它将得到联邦政府最充分的、虽然是秘密的支持。

唐曼努埃尔讲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在索诺拉州有一个学校教师，他有政治野心，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他在一些美国农场中组织了农民罢工，因而得罪了州长，但由此也获得了相当的声望。卡兰沙自己是一个封建地主，对这样一个人的政治活动自然表示不满。但是这一次，政治战略的考虑又占了上风。考虑结果就是鼓励这个有野心的学校教师自己提出作为普选候选人，去竞选索诺拉州州长。这种鼓励只能通过改组后成为

群众组织的社会党作为媒介来进行。当提到这个学校教师名字的时候，我回想起他曾热烈地欢迎筹划中的社会党会议，并且应允将率领索诺拉州一个大型代表团出席这个会议。这人就是普卢塔尔科·卡耶斯，后来他不仅真成了州长，而且继奥夫雷贡之后高升到共和国总统的职位。其间，他还当过卡兰沙政府的劳工部长。卡耶斯是墨西哥最富有吸引力的人物之一。以后我还要写到他更多的事情。我最后一次会见他是1925年在巴黎，那时，他作为墨西哥共和国第一任文人总统正在欧洲参观访问。回忆起过去我们在墨西哥的岁月，他说：他仍保留着他那张由我作为党书记签名的社会党党证呢。

在约定的那一天，由唐曼努埃尔——他的官方职务是国家立法部门领导人，陪伴着把我引进了查普尔塔佩克堡的宏伟客厅。西班牙历任总督的巨幅金框的肖像悬挂在客厅的高墙上，他们统治这个富饶的国家已经数百年了。在我头脑中产生的第一个思想是：我到那里是代表被剥夺的群众，向高贵统治者的光荣世家的不幸子孙提供帮助与合作的。我对自己的这个决定感到非常满意：不佩戴任何标志崇高地位的徽章，而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穿得同一般老百姓一样，来参加会见。另外一个思想也掠过我的脑际：假如命运的车轮向不同的方向转动，我也许已在柏林等候德皇欣然赐予谒见了。早在两年前，如果真有这个机会，对我来说，可能有更重大的意义。现在，我站在这么多的贵族阴魂出没的大厅里，想到自己选择了这条民主的道路，觉得很幸运。不错，马上就要接见我的的是一个封建地主；但他的官方身份是一个民主国家选举出来的元首，并且他急于要争取普通人民的帮助和合作。这肯

定是实施民主政治的一个好机会。如果错过这个机会，便应该由搞民主政治的领导者负责了。我很可能应负一部分责任。在那些日子里，我并不相信民主政治。总之，还没有等到我的努力产生结果，我就过早地离开了墨西哥。其余的人本来是可以坚持到底的；但卡兰沙政府被推翻了。民主阵线还太幼稚，不能挽救局势。既然从中取得了经验教训，如果今天再有机会，我的做法就不同了。不过，我对政治已经厌烦；如果民主政治再有机会，那我希望别人来把工作做得好些。

我们被领过穿堂，来到一个门前。门一打开，我们就进入一间大屋子，这屋子可以望见公园里的树梢。我的同伴把我介绍给总统和几位部长，他们中除两个人以外，都穿着军装。总统穿着条纹裤和早礼服。桌上已摆好了饮料——有各种各样酒，都不是烈性酒。唐贝努斯蒂亚诺和我站在一个高高的窗户旁边闲谈，手里端着酒。那时候，我已经学会享用这种奢侈品了。他谈到我在西部和南部各州的往返旅行，并对遭遇土匪的事开了个玩笑。要使一个只有几条较好公路和破旧铁路的山区得到绥靖，是很困难的。然后，他用自信的口气补充说：只要北方强邻不加干涉，情况不久就会好起来。

谈话就这样巧妙地慢慢引到干涉的威胁上去。其余的人一直在那里站着倾听。当时他们都表现出激动的样子，说了一些气愤的话。我完全同情，而且表示相信墨西哥人民一定会维护他们的荣誉和主权。出于感谢我所受到的款待和保护，我愿尽一切力量为我的寄居的国家服务。总统和所有在场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祝贺我已成功地提醒社会主义者注意，他们也是墨西哥人，必须对祖国克尽其责。我感谢他们，说我对寄

居国所做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工作竟受到他们的赏识。但我又鼓足勇气说，对于那些不认为祖国属于自己的人民宣传爱国主义，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接着，我连忙补充一句：所有的国家都是这种情况；墨西哥也不例外。那位仁慈的贵族反驳说，把土地分给债役制农民是墨西哥革命的目的；但是土地改革还不能全面实行，因为这几年来好干涉的外国人一直在煽动内战。这时唐曼努埃尔低声对劳工保护法问题发了几句牢骚。总统回答说：立法机关首脑的任务是想办法使正义公平的法律得到通过。然后，他转向我说，他要任命一个劳工部长。依我看，社会党人中有谁适于这个职位？我请求给我一点时间让我考虑一下；我想，在此期间唐曼努埃尔也许会推荐一个人的。在那年年终以前，卡耶斯就参加了联邦内阁，当上了劳工部长。

过了一会儿，除唐曼努埃尔和外交部长以外，都离开了。膳司报告午饭已经备齐，我们四人就进了餐厅。席间和饭后饮酒间的谈话都谈到了关键问题。总统同意了我的计划，唐曼努埃尔也热烈支持这一计划。外交部长一向是个沉着的人，他不时地插话，要求注意外交上的困难。我们继续讨论关于拉丁美洲同盟的计划。总统建议派一名干员出去联系，并问我是否想访问其他拉丁美洲共和国。这个意见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我要等到社会党开会时才能作出决定。这一点总统是理解的；就我个人来说，知道他不会坚持要把这个筹划中的同盟置于官方控制之下，我感到很放心。最后，我冒昧地询问，中南美洲各国的墨西哥大使馆、公使馆和领事馆是否会帮助我们与那里的社会主义者领导人联系，使他们有可能来这里

参加会议。外交部长看了看首长，然后笑着点头表示同意。在这件事上，我必须另找时间去拜会他。

那次谒见持续了三个小时之久，它收到了比我的希望大得多的效果。唐曼努埃尔只晚走了一会儿，就赶紧到客厅里追上我。他满面笑容，顺口说出：一切都很顺利，现在我可以全力执行我的计划了。唐贝努斯蒂亚诺会光明正大地干到底的。

坐在从古堡行驶下来的汽车中，我问为什么对于一个无名的外国人这样完全信任和赞助呢？唐曼努埃尔解释说：正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必要时，我可以成为外交上的替罪羊。在万不得已时，政府会对我造成的一切麻烦推卸责任。在我的屋门前让我下车时，他以严肃的声音再三保证：“唐贝努斯蒂亚诺永远不会出卖你；他的高贵的侠义精神你是知道的。英美强烈要求引渡你，他已经拒绝了。”

19. 一个地区的社会主义国际

1918年12月，墨西哥社会党召开第一次大会。除了来自共和国各州的几百名代表外，许多中南美洲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的领袖也都聚集在这里，讨论了拉丁美洲同盟的计划，并建立了一个组织委员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律师、教师、作家、诗人、新闻记者——都是为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热情战斗者，但是在他们中间一个产业工人或农民也没有。这个奇怪

的事实，不是沒有引起我的注意，不过，我当时忽略了它的重要性。墨西哥代表团的成分绝大多数是粗俗的劳动群众，很可能是这种情况将我的上述体会压低到我的下意识之中了；只是在多年以后，由于许多其他的经验使我的认识逐渐成熟，我才拨开我最初具有这种新信仰时的迷雾，重新忆起那个体会来。

在墨西哥代表中有油田工人，有些是很熟练的机械工人，还有纺织厂的男工女工、矿工、码头工人、铁路工人和汽车司机；另外还有手工业工人以及少数小商人；许多人来自乡村，他们不是普通劳工，而是现代化大农场的监工。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如教师、作家、艺术家、医生、律师，多半来自首都。州代表中还包括许多中小学教师。精通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很少；产业工人大多数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教育水平一般相当低。但他们都是热情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革命的热烈信仰者。他们对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尊敬，跟对马克思的尊敬沒有区别。但是马克思这位新社会制度下理想世界的伟大缔造者，已开始博得所有的人的最大赞美。

一位热心帮忙会议组织工作的美国兄弟代表，提供了仅有一年历史的俄国十月革命传奇式领袖的一张相片。这张相片享有的光荣地位，与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与工团主义的先知们的地位相当。约翰·里德刚从苏联回到纽约，他对“震撼世界的十天”^①作了感情奔放的叙述。在墨西哥“革命的逃避兵役者”当中有些人是他的老同志；这些人早就写信给他，要

^① “震撼世界的十天”，指十月革命的十天。1919年，里德把那十天的情况撰述成书，并以此为书名。——译者

一张列宁的照片和一封致准备夺取政权的墨西哥无产阶级的电报。

会议在欢欣若狂的气氛中开幕了；但是上帝的选民，即墨西哥的无产阶级，却没有在那里接受武装起来的号召，这个号召是伟大十月革命的历史性文告的精髓，它是通过它的诗人般的历史学家传达过来的。有些比较直率的无政府工团主义代表很不高兴，他们讥讽地说：会议厅里的座位是为“资产阶级政客”保留的。但是为了讨好我这位受到信任来组织庆祝这个墨西哥社会革命史上节日的“印度同志”（革命同志这样称呼我），会议筹备委员会已向我所推荐的许多人发出了邀请书——这些人具有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们积极参加会议，将会提高社会党的地位，并且促进拉丁美洲同盟的计划。他们当中有大学校长、几位其他学术界人士、国民议会议长、一些议会议员、一位老练的新闻记者和许多资历较浅的记者、作家、诗人和艺术家。

假若无产阶级真的极端不信任阶级合作，那么他们在欢迎革命的无产阶级代表的同时，竟如此明显地表现出对资产阶级的同情，就真是一个鲁莽的举动。只有“现代妇女”没有列在我的名单之内，她若出席，那就成了压垮负载已经过重的骆驼的一根草了。但我猜想，那不是由于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的庸俗表示出愤慨，而是由于他们对待妇女的中世纪的态度，这种态度在社会革命最热烈的拥护者当中还是很普遍的。

可是，就凭那样一层薄薄的糖衣，一粒苦药丸终于吞下去了。我虽然有些提心吊胆，但实际上我觉得“饥饿的孩子们”

还是幸福而骄傲的；这次有名的聚会就是承认信任具有重要意义。即使最坚定的革命者也并不总是不受奉承的响影的。我第一次进行重大政治活动尝试获得成功，连我自己也感到得意洋洋。但是会议还没有安定下来开始工作，便被会场外面沸沸扬扬的人声搅乱了。我们不准备上演没有丹麦王子的《汉姆雷特》^①；无产阶级不能真的被人遗忘了。多亏美国来的波希米亚式的革命逃亡者具有戏剧才能，舞台管理才搞得非常成功。他们把占领大街这个最重要的角色分配给革命阶级去担任。革命就在大街上，而不是在会议厅里进行起来了。

代表们冲出去，有身份的人则在后面跟着，都去欢迎查利·菲利普斯和欧文·格兰威治所领导的群众示威游行。一幅列宁的巨幅画像高高举在前头，后面红旗和花彩如林。红旗上面写着（当然是西班牙文）口号，十分引人注目：“打倒美帝国主义”，“石油是墨西哥人民的”，“拉丁美洲共和国革命同盟万岁”，“布尔什维克万岁”，“墨西哥苏维埃共和国万岁”。我感觉查利的热情未免太过分了。可是，能够说服绝大多数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提出上面口号中的一些口号，参加示威游行，这就是一个成就。

依照事先安排的计划，社会主义鼓动者们已从市内偏僻地区集合了一群群“饥饿的孩子”，并带领他们参加市中心广场的群众示威游行。一座宏伟古老的大教堂位于广场的北面，这是为了满足征服者基督教徒的虚荣心，由墨西哥无数的异教劳动者以奴隶式劳动建成的。东边是一座凌乱而丑陋的建

^① 《汉姆雷特》(Hamlet)，莎士比亚的悲剧。没有丹麦王子的《汉姆雷特》，意即去掉了最主要的人物。——译者

筑物——国家大厦，它曾经是骄傲自大的西班牙总督金碧辉煌的官邸，现在成了共和国政府所在地。在广场的群众大会上，有几个人演说，其中包括查利·菲利普斯。虽然他的西班牙语说得结结巴巴，但他却是个无比的煽动家。当一个美国人叫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狂热笼罩了整个大会会场。

查利在完成了这个功绩之后，便提出要求（当然是代表特定的听众）：在群众这么有力支持的鼓舞下，卡兰沙总统应当采取措施，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以巩固革命的反帝阵线。同样，依照事先的安排，总统出现在国家大厦的阳台上欢迎群众，并宣称：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他愿意听从。在大教堂这边也能够听到的诺言，震惊了虔诚的革命群众。然后，革命群众将被带领着沿市区的大街向会议厅走去，传信给在那里开会的代表们：工人阶级凭着革命的意志和力量已经获得了胜利。

查利是这一天的英雄。代表们争先恐后地抢着把他抬进会场。代表们鼓掌欢呼，选举查利为第一次会议的主席。在发表即席演说以前，查利宣布，发生伟大十月革命的国家发来了一份贺电：那里克伦斯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权被推翻了，俄国的工人和农民解放了，与会人员听了全都站立起来。英雄崇拜者变化无常的态度真让人吃惊。一年以前，当我还在美国的时候，在那些居住在或常去华盛顿广场（纽约的波希米亚）的美国激进派人士中，克伦斯基的威望高入云霄。这位天神如今倒了，以前的崇拜者便辱骂他嘲笑他，现在他们崇拜新的英雄列宁了。而在一年以前，列宁只不过是个实力难测的

竞争者，人们几乎还不知道他的名字。

大会上，无产阶级代表和资产阶级客人，都一样着迷地倾听来自彼得格勒的、实际是由约翰·里德在纽约写的贺电。当主席读完那份伪造的文件时，大家都热烈鼓掌欢迎，并高呼口号：“伟大的十月革命万岁”，“列宁同志万岁”。一个新的上帝和一种新的宗教，要求革命无产阶级为革命事业献身。我也加入了这些寻求理想社会的信徒们的行列。

因为在充满着激情的气氛中，无法处理具体事务，会议主席讲话以后，就暂时休会了。在第二次会议上，兄弟代表发表了演说——有阿根廷的一位律师，秘鲁的一位诗人，哥伦比亚的一位教授，等等。墨西哥特邀代表宁愿作保持沉默的观察员，只有国民议会议长，这个已经宣誓了的社会党人，作了简短的演说，看他的样子，大概是代表大家，重申他们对自由与社会正义的信念。我注意到大学校长卡萨斯先生使劲地点了点他那个大脑袋，表示热烈赞成。参加会议的无产阶级者的脸上，在那以前还一直带着猜疑的愁容，现在却变成愉快的微笑了。

一个身材魁伟、不修边幅的州代表冲到讲台上，大会主席还没有来得及制止，他就开始用洪亮的声音演说，祝贺贵宾们凭着他们的明智，作出了历史性的决定，抛掉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沉船，跃入暴风雨的革命海洋，加入了无产阶级的行列。这真是一个典型的墨西哥闹剧；演讲者奔回听众当中，一会儿就和国民议会议长、社会党人唐曼努埃尔紧紧拥抱，互相亲吻起来。什么清规戒律都打破了，放荡的感情至少暂时压倒了阶级意识的顽固偏见。到处是握手、拍肩、拥抱和亲吻。当查

利要求大家齐唱《国际歌》时，群众的情绪达到了高潮。墨西哥人是一个喜好音乐的民族；人人都引吭高歌。西方音乐与诗歌两者有所不同；一个人不知道歌词一样能唱出曲调来。我是唯一不喜欢音乐的人。甚至多年以后，我也还是不能参加唱《国际歌》呢。

开始这场闹剧的州代表就是普卢塔尔科·埃利亚斯·卡耶斯，他是北方索诺拉州的一个乡村学校教师。他在墨西哥的政治天空里流星般地升起，是从这次大会上戏剧般的姿态开始的。卡耶斯在性格上是一个宣传鼓动家，但他是受过一些教育的人，聪明而又具有首创精神，因而适于当领导。我为了大会的筹备工作曾同他通过信，现在又和他本人谋面了。

大会选出了执行委员会和办公人员之后就宣告闭会。墨西哥社会党从此不再是一个局限于首都的、不起作用的小团体，而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了。但是无政府工团主义幽灵依然阴魂不散。按照新党章，这个扩大的组织应该叫做墨西哥社会党。无产阶级从内心里对于这个带有民族涵义的名称是反对的。他们争辩说：社会主义既是国际性的，社会党就不能受某一个特定国家边界的限制。经过许多争论以后，终于以玩弄词藻的回避方式找到了一种妥协办法。选定的替换名称叫做“墨西哥地区社会党”。假托的理由是：“地区”一词是地理方面的，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性质并不矛盾。似乎为了强调这一点，一致同意把我这个非墨西哥人选成了新党的总书记。

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设立一个委员会，负责尽速召开一次地区的国际会议，以便组织拉丁美洲同盟。这个委员会

由中南美洲共和国的兄弟代表，再加上几个墨西哥人组成。我作为发起这个计划的墨西哥社会党总书记，也被选为召集委员会的书记。它的总部将设在墨西哥城。在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关于计划中的拉丁美洲会议和同盟的组成，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大多数代表赞成设立“地区的社会主义国际”。他们虽然承认，许多非社会主义者暂时会参加会议以反对美帝国主义，保卫自由和民主，但他们担心这个组织如果不由无产阶级革命者加以控制，就会产生机会主义的偏向。会上没有作出什么决议，只决定必须到现场调查可能发生的事情。为此目的，我应该作一次广泛的参观访问，但这得等墨西哥社会党改组的初期阶段过去以后才能进行。同时，中南美洲的代表回到各自的国家后，要设立地方委员会，主要是推广这个计划。

在州代表离开以前，执行委员会同他们开会讨论在共和国各州建立党组织的问题。在那次会上，卡耶斯比其他代表们高出一筹。他提议社会党要在索诺拉州领导一次武装起义，以搞垮奥夫雷贡将军在该州的统治地位，这使委员会大为震惊。有人指出奥夫雷贡统率着一支相当大的军队，并且据信还从美国得到帮助，卡耶斯就急躁而轻率地反驳说：正因为那个原因，联邦政府应该秘密支持他所组织和领导的反奥夫雷贡运动。

这是一个很令人兴奋的前景；但对一个尚未组织好的党来说，胃口不是太大了吗？“总书记同志，”卡耶斯私下对我说，“在墨西哥事情就得这么办。”他能否找出时间单独向我详细谈谈，以便我了解其根据呢？当然，如果委员会授权给

我，我是高兴和他谈话的。我得到了许可。就在这一天晚上，我便开始深入地了解这位四年以后就当上了共和国总统的乡村教师。

20. 墨西哥的办事方法

卡耶斯到我住处来吃饭。我的生活方式不全是无产阶级的；在富豪们居住的“罗马侨居地”的一所房子里，布置着绿缎覆盖的路易十五式的家具，这很难说是接待一位好出风头的当地人的恰当地方。但是，我没有别的地方，而且同卡耶斯的密谈又不能在全目睽睽及好事者能听得见的咖啡馆里进行。使我的四邻感到丢人的是，我没有雇用穿号衣的仆人——我最讨厌这种做法。我的主要管家人是一个健美的道地墨西哥血统的妇女。她是一个出色的厨师，负责全部采购工作，并在一个小仆的帮助之下，负责两层楼房八个房间的清洁卫生工作，这八个房间内摆满了在结构上易于积尘的家具。为了替自己的鉴赏力辩解，这儿得提一下，没有一件家具是我购买的；这所房子在租来的时候就已经陈设好了，事先我又没有来看过。

我告诉厨师玛丽亚说，从索诺拉州来的一位墨西哥绅士将到这里来吃饭，得准备一些最适当的菜肴。她尽力照办了，尽管客人似乎使她失望——一个道地的当地人在她眼里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我的激进派美国朋友们向她大调其情，

她却觉得非常光荣。但是我尽力不使任何人闹得太过分了，寓处的尊严总得维持嘛。卡耶斯显然很喜欢那多加干辣椒，精心调制的民族传统菜肴。玉米粉煎饼也是第一流的。

我想使这位从索诺拉州来的粗鲁的人情绪好一些。在前一天党的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他相当失礼，当时他话中带刺，说我是个外国人，不懂得墨西哥人办事的方法。但是他立刻感觉到他得罪了我，因为很多人气得胡子都颤动起来了。假若不是我不计较这种出于无心的冲撞，大家就很可能对这位索诺拉州粗野代表的出言不逊提出强烈抗议，也很可能会正式投“印度同志”的信任票。那样对于急性子的卡耶斯将是很难看的。他只不过是表现得激烈一些罢了。

饭后，当我们坐下来准备开始约好的谈话时，他首先谈的是，对他前天不可饶恕的（这是他所用的词语）行为，以西班牙绅士的传统方式向我请罪。我要他放心，说那根本算不了什么，于是他就全神贯注地详细解说他的计划，最后谈到这个计划将以委任他为索诺拉州州长而终结。这个说得头头是道的、精明而又天真的计划使我得到很深的印象。人人知道，当时的州长奥夫雷贡将军一心想当墨西哥总统；美国人支持他，因为他们不喜欢卡兰沙总统的外交政策。索诺拉州和美国有毗连的陆地边界。这个州的地理位置有利于在美国帮助之下建立反卡兰沙派的武装。因此，卡兰沙总统应该懂得有必要从这个战略位置上撤掉他的敌手。

我问卡耶斯，社会党在这件事情上能起什么作用？他的答话简直使我无法回嘴：难道我不是总统的私人顾问，不正是因为那个原因我才被选为社会党总书记的吗？这位墨西哥

政治家的机智真使我感到惊奇。实际上我几乎要承认前一天卡耶斯的作法是正确的了。他脑子里充满着这么多自己的想法，以至根本不让我有说话的机会；我只有倾听他对他的计划作满怀信心的解说。

根据奥夫雷贡是总统候选人这个似乎有理的借口，卡兰沙应该解除他的军队指挥权和索诺拉州州长的职务，这样，奥夫雷贡才可以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共和国总统竞选的活动。人们可以预料到，象奥夫雷贡这样强有力的人物会真的按照墨西哥的传统来行事——藐视命令，发动革命。对于这个可能发生的事件，卡耶斯也早有准备；假若联邦政府支持他的话，他能在人民的支持之下去组织反奥夫雷贡暴动。这样一来，显然他将成为联邦政府提名的州长。在我把他的计划提交给卡兰沙总统批准之前，他邀请我亲自到索诺拉州去看看那里的情况，以证实他的论点。

这个计划听来令人兴奋之极。但实行起来是不是超过了我的力所能及？冒险的精神还是占了上风。这个计划可能是异想天开的；但即使失败了，我又有什么损失呢？没有损失嘛。不论成败如何，我相信那只能使我从在印度想办而未办成的这样事情中获得丰富的经验。最糟糕的也不过是逃离墨西哥，另寻安身之所罢了。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两天以后，卡耶斯离开了首都。不久，我也将随后跟去。

我向党的执行委员会报告了我与卡耶斯的谈话，大家听了，欢蹦乱跳得象一群战马。社会党不再是一个由宣传家组成的小团体啦。要不了多久，它将领导一个真正的武装暴动，它的一个成员可能很快就成为州长，在那个州里当然要建立

起新的社会秩序。有两个身强力壮的工人是最早成立的小组成员，他们自告奋勇要陪我到索诺拉州去。他们的朴素无产阶级风度中流露出充满深情的关怀——他们担心我的安全。革命也许会化为泡影，但是我已结交了两个朋友。

为了不使奥夫雷贡阵营有什么疑虑，我们公开宣布：按照社会党会议的决定，新的总书记将巡视全国各地。纺织工业城市奥里萨巴、最重要的港口韦腊克鲁斯和沿墨西哥湾海岸的油田都包括在旅行日程之内。这些地方都远离索诺拉州，我只不过是附带地访问一下索诺拉州罢了。这样做为的是不引起任何怀疑。

我要去的那个地方是不容易进去的；到那里去仍然有危险。没有铁路直通那里，人们必须绕道美国，或者沿太平洋岸边从海上去。第一条路线比较安全，也省时间；但我不能走那条路线。一想起从墨西哥港到韦腊克鲁斯乘坐近海航船的那一路折磨，我也不愿意在太平洋沿岸再受一次折磨。能够采取的另一办法，是在军队护送之下通过陆地旅行。无论如何，我得先和地位较高的朋友们讨论一下卡耶斯的计划，而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至少要征得总统的默认，如果最后得不到他的同意的话。事实证明，事情比我所预料的容易得多。军队司令部热情地采纳了这个计划。奥夫雷贡将军已变得很危险，使人不能再容忍下去了。必须把他从索诺拉州撤换下来，他在该州能和美国人经常接触，还能使用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充分供应的金钱，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这个计划在政治方面的问题，必须和唐贝努斯蒂亚诺讨论一下。

和总统的另一次会见已经约定好了，我将向他报告社会

党会议上关于计划中的“拉丁美洲同盟”的讨论结果。眼下重要得多的另一个计划，可以在会见时顺便呈交给他。由于今后我将经常谒见总统，会见的礼节就免除了。我们在唐曼努埃尔的住所相会就餐，这件事甚至没有作为社交宴会公开宣布出来。

唐贝努斯蒂亚诺对卡耶斯的计划，自然比对我的关于“拉丁美洲同盟”进展相当缓慢的报告更感兴趣。当然啦，根据宪法选举出来的国家元首不能直来直去地谈论反对他部下的武装暴动计划。但是，他同意只要一个地区的法律与秩序恢复了，选举州长的群众运动就应当受到鼓励。他又说，由于奥夫雷贡将军的励精图治，索诺拉州一定随时都可以建立法治体制。联邦当局将命令索诺拉州进行选举，并指示奥夫雷贡将军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保证按照宪法进行选举的运动完全自由地进行。这就完全清楚了。总统对于宪法的正确态度，就是反奥夫雷贡运动的绿色信号。我正在学习墨西哥的办事方法呢。

几天后，联邦政府颁布一道法令，下令选举索诺拉州州长。其理由是，奥夫雷贡将军既然是总统候选人，就应该解除他的其他职务，以便他尽早从容地开始竞选活动。社会党立即宣布参加索诺拉州竞选的决定，并派遣其总书记，由执行委员会的两名老资格委员陪同，到当地去挑选最合适的候选人，并开展竞选运动。原来声称在全国视察中附带访问这个难以进入的北方州的遁词，就不再需要了。尽管这样，联邦政府有关部门还是劝告我，要远离港口或其他接近国界的地方。我在那里的安全是没有保证的。先前那些迫害我的人，大概还

在继续执行绑架我的计划吧。

我决定在地方陆军部队司令官所提供的军队护送之下，经由陆路直接前往索诺拉州。这条路线穿过中部富饶的阿瓜斯卡廉特斯和杜兰哥两州，有名的墨西哥银矿就在那里。其后，再经由雄伟的马德雷山脉，这条山脉被称为全国的脊柱，是北方索诺拉州和奇瓦瓦州两个大州之间的屏障。奇瓦瓦州仍被土匪头子潘乔·比利亚控制着。由于在本州拥有富饶牧场和大片铅矿、锌矿、银矿、冶炼厂的美主向他提供有力的保护，他占据着那里的要塞。阿瓜斯卡廉特斯州（意即热的泉水）高踞于马德雷山脉南部的支脉上，该州到处都有温泉。这里在殖民地时代，吸引了一些患痛风病的西班牙贵族，后来在迪亚斯时代便成为新大陆上流社会的游乐胜地了。

在五年残酷的内战中，这两个富饶的中部州都被毁坏殆尽。外国矿主们如此深入内陆，就不能指望他们各自国家的政府提供任何有效的保护，只好丢下值钱的财产逃命去了。惯匪们掠夺了这些财产，在内战造成的无法无天状况中捞到好处的只有他们这些人。直到最近，联邦政府才派兵驻守这些地方，中部矿区各州都慢慢地恢复常态。虽然冶炼厂仍然关闭着，但有些矿场已经开工，为附近不断增加的流离失所的贫困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

我那两个同事的无产阶级心怀中对于那些毫无保护的劳工同志充满了同情。他们坚决主张我们应该多停留几天，以便举行会议，组织工会，建立社会党的支部。我不知道当地驻军司令官对这样的“革命”活动会有什么反应；但与此同时，要反对那两位自封为劳苦大众解放者所提出的合法任务也是枉

然。他们两人是思想简单的狂热者，不能指望他们遵守革命政治密谋的细致规则。可是，在艰苦的旅行中休息几天也合我的心意。当这两位耿直的同志着手进行他们的革命任务时，我就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

四围是密林满布的山坡，在山谷里，有荒芜了的矿区村庄，有周围长满高草的突出地面矿坑井口，以及断墙残壁后面的机器已经生锈的冶炼厂，这里到处都有温泉。地方部队司令向我保证说：附近的土匪已经完全肃清，他们已经向北撤到马德雷山脉更高更难进入的山里去了。几天之后，我们继续前进的时候，就不得不进入他们进行杀人越货的活动地区了。

那位地方军事司令官四十五岁左右，人很愉快，是个纯血统的印第安人。他以典型的墨西哥人的风度，把我当作兄弟，当作革命事业的战友来欢迎。他表白了自己的信念，这就引出了我们之间的一场政治性谈话。在提到我的同事的活动时，我吞吞吐吐地表示希望司令官不要介意；我们一点也不愿使他为难。他把他那有力的上臂很漂亮地挥动了一下，打断了我的道歉，好象强调他那令人惊愕的叫声似的：“我干嘛要介意呢？我们都是布尔什维克嘛！”为了缓和一下这个局面，我装做毫不理解的样子。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我只是个社会党人。他的答复令人更加吃惊了：“我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但我是个布尔什维克，跟所有的爱国的墨西哥人一样。”显然他注意到了我迷惑不解的神情，那位令人料想不到的列宁追随者，用下面的解释使我醒悟过来：“美国佬不喜欢布尔什维克；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所以布尔什维克必然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也必然是他们的朋友。我们都是布尔什维克。”

自从那次值得纪念的谈话以来，过去了大约一年的光景，我才见到了第一个真正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他听说对他强烈崇拜的反响在他到来之前，就已经深入到墨西哥的原野，他感到非常高兴。但是我却有点模模糊糊的不安感觉。革命的国际团结能够这样降低到与热情划等号吗？多年的经验与回顾最后使我发现，热情与革命信念本来具有的原则这两者有很大的不同嘛。

21. 一位未来总统的画像

索诺拉州是墨西哥共和国第二大州。它有四百英里的陆地边界和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及新墨西哥州接壤。由于全部边界几乎都穿过沙漠地区，边境上没有有一个地方能够很清楚地划界，或者适当派兵驻守。结果是两边各种货物的走私都很猖獗。

美国在1918年，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国务卿威廉·詹宁·布赖恩（他是原教旨主义基督教徒）的影响下，才开始禁酒。但是这种被禁止的饮料销路甚广，特别是在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的畜牧场和矿场一带。因此，在划界不清的、守卫不严的索诺拉州北部边境两边进行着大量的酒类非法贸易。大量酒类通过加利福尼亚湾的一些小港运进索诺拉州。因为酒类在墨西哥不是违禁品，可以自由地从海湾港口瓜马斯通过铁路运到边境市镇诺加累斯。这条铁路穿

过州府埃莫西略。虽然经营这种有利可图买卖的是中国人、日本人和墨西哥人，但资金还是由美国人提供的。不久，这件事几乎引起了美国对墨西哥的武装干涉，但也附带地有助于卡耶斯的政治命运。

我这次访问索诺拉州时并没发生多少事故。这里人口稀疏；颇为荒凉。那时，埃莫西略不过是打扮得象个样子的村庄而已。有钱有势的墨西哥人都住在边境市镇诺加累斯。卡耶斯指出这种情况可以保证他的计划能够成功。这个大州南部的四分之三全是高山，肥沃的山谷里住着土著的农民，他们只求能够在那里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大量的矿藏资源尚未开发。美国人根据迪亚斯政权给予的长期特许权，占有了这些资源。走私之外的另一种大规模经济活动是畜牧业。大片牧场多半已为美国人占有，他们俨然以土地的主人自居。

在墨西哥城时，早就有人劝我不要冒险向北走得太远。我们走过本州的绝大部分地区，最后到达了州府。在那里举行了群众大会，宣布建立社会党的一个支部，并宣布它的领导人卡耶斯是州长候选人。他作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演说，要求根据《克雷塔罗宪法》把庄园和矿藏资源收归国有。他还要求停止军事统治，并尽快地代之以文官政府。在大会结束时，他宣称：如果他被选为州长，他将马上进行激烈的土地革命，立即把债役制农民从农奴的地位中解放出来。听众起劲儿地拍手喝采。

看来，群众对即将到来的选举并不怎么热心。我对于群众缺乏兴趣这一点表示很惊奇，卡耶斯听了便说：不会有什么竞争的，因为本州没有其他政党提出候选人竞选。这个精明

强干的政治家又笑嘻嘻地说：根据上述情况，他已经想出一个符合宪法选举的办法。稀少的农村人口大部分仍然受天主教会神父的影响。教会神父不喜欢军人，因为军官准许士兵抢劫教堂。但是自从光荣的胡亚雷斯时代以来，所有墨西哥革命宣传的反教权主义，甚至在遥远的村庄里也有一些微弱的反响。在索诺拉州更是这样，这里是 19 世纪 50 年代胡亚雷斯派同帝国主义者之间进行过多年残酷内战的地方。反教权主义的革命宣传感染了少数农村居民，他们受到农村教师的影响，而卡耶斯则是那些教师的首领。假若真的要选举的话，教区神父和学校教师将共同带领农村居民到投票站去投这位民主候选人的票。他再一次重复说：假若真的要投票的话，卡耶斯当选是有把握的，因为除了他以外没有别人会当选。他显然不相信还有别人会当选。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有把握；平民中没有人会与他竞争，但军队仍然控制着局势嘛。他们能够让一个公开反对奥夫雷贡的州长候选人轻而易举地赢得胜利吗？

我的疑虑第二天就消除了。在卡耶斯的邀请下，地方驻军的一些军官秘密地和我见了面。他们都是奥夫雷贡将军的部下，并对他们的首长怀有忠心。但他们都是布尔什维克，他们从卡耶斯那里了解到，墨西哥布尔什维克党已经建立，要对美帝国主义进行战斗。作为革命军队的军官，他们必须保证支持这个新党的候选人。和地方部队司令在阿瓜斯卡廉特斯州的谈话记忆犹新，我只是很高兴地代表墨西哥布尔什维克(?)党接受他们的保证。

我返回联邦首都以后很惊奇地了解到，当卡耶斯说“假若

真的要进行选举”这句谜语一样的话时，他并不是盲目乐观。正当阴谋策划把奥夫雷贡将军从他的根据地驱逐出去的时候，奥夫雷贡自动辞去了索诺拉州州长的职务，并把他的部队司令部搬到墨西哥城。这确实是一个大胆而又估摸不透的举动。《墨西哥先驱报》英文版派了一位代表去访问这位将军。他非常坦率；他很感谢唐贝努斯蒂亚诺解除了他的全部公职，这样他能够准备参加即将到来的总统竞选运动。他的政治纲领是什么？国内进行土地革命，国外与各国友好相处。他不相信德国将会赢得战争胜利，也不知道俄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因此，他眼前的计划是到外国去，以便获得第一手知识。这样，如果要他掌握墨西哥人民的命运，他将证实他自己是值得信任的。这是一个机敏的、富有外交辞令的、不承担义务的声明，只能引起一阵谣言而已。

惊人的发展在幕后进行着。奥夫雷贡将军建议总统委派普卢塔尔科·埃利亚斯·卡耶斯接替他担任索诺拉州州长。他的理由是，不会有什么竞争；因此干嘛还要选举的形式呢？这实际上就等于让位。但是奥夫雷贡要求一个代价：必须委任他为驻华盛顿大使。为此，他还提出了煞有介事的理由：不管欧洲战争的结果如何，美国将成为战后世界最大的强国；墨西哥最好与这个强邻建立友好关系。且不论是对是错，反正华盛顿对唐贝努斯蒂亚诺及他所信任的人是抱有成见的；因此，那些不同意他的外交政策的人倒是驻华盛顿的最好的外交人选；这种人很可能会重新得到强邻的信任。由于不能期望卡兰沙对这样重大的事情立即作出决定，这位圆通的敌手提议暂时调离自己，请总统给假并允许他到国外休息和治疗。

这真是棋逢敌手——每个人都想智胜对方。这件事从当时墨西哥政治生活的前因后果来看，实际上等于在敌手背后刺上一刀。奥夫雷贡在国内斗智暂时斗不过敌手，他希望到海外去碰碰运气。就卡兰沙这方面来说，他准备冒险让他的敌人远走高飞，到达他不能更好地控制国内局势的地方。他的座右铭是：要掌握现在，将来自有将来的办法。这是以贵族式的轻率来进行赌博，大概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我的革命决心的影响。最后，卡兰沙失败了——在我离开墨西哥不到两年以后。我没有把他诱入歧途；是他自己作判断、自己行动的。可是，假若我仍然留在墨西哥，我一定要支持他，死而后已。这位自负的老年贵族逃亡在外时被人杀害了，时年近七十岁^①。

奥夫雷贡将军已经辞职并被准假到海外去休息疗养，普卢塔尔科·埃利亚斯·卡耶斯受任索诺拉州州长。联邦政府宣布：既然没有任何其他候选人，举行选举就不必要了。《墨西哥先驱报》出了号外，把这个消息发表出来；社会党兴高采烈地纪念它的第一次伟大胜利。这一光荣应归功于卡耶斯的有勇有谋。但是党内的空谈理论家在纪念它时，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战胜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假若是那样的话，归根到底，光荣是属于我的了。我可不承认这点，这不是假谦虚，而是真心话。我是新近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我相信客观条件的力量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我也许是一个工具，但是不管怎样，事情总是要按照规律发生的。

卡耶斯是一只预兆暴风雨的海燕。自从他流星般地从地位很低的农村教师被擢升为州长以来，在大约几个月内，他已

^① 原文有误。卡兰沙死于1920年，只活了六十一岁。——译者

向他的支持者联邦政府提出了一个严重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或者是冒美国可能武装干涉的危险，或者是从国际斗争中撤退下来，那样将会损害毫不妥协的爱国主义的威信，必须在这二者之间进行抉择。

微贱的人物突然成为有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这在墨西哥不是没有先例。但是一个公认的社会党人被擢升到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第二大州的州长，则是一件新奇的事情。美国人在索诺拉州已经享有经济上的既得利益，例如掌握矿藏特许权和畜牧业，或者跨越国境进行酒类走私，因此任命卡耶斯为州长就象在公牛面前抖动红布一般，可把美国人气坏了。他们拿出美国西部荒野地区大汉的样子，咬牙切齿，大声骂娘。但是，卡耶斯对他们的冒犯行为，他们也感到毫无办法，除非这个“红色暴发户”给他们以可乘之机。而卡耶斯这一方面则一心想作出一些惊人的事情来证明他戏剧性地爬上高位是合情合理的。打击一下大家讨厌的美国佬，一定会深得人心啊。

美国禁了酒，于是沿着墨西哥边境一个个酒吧间便象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每天晚上，大批的彪形大汉从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矿区侨民聚居地和畜牧场赶来，出入于酒店和在酒店周围开设的妓院。暴行和下流活动越闹越凶，酗酒吵架常常闹到杀人。在任何文明的国家里，这样无法无天的事都是不能容忍的。但是，要制止这类事情，就得触怒那些从罪恶的酒类走私买卖中大发横财的人。酒类走私必须经过索诺拉州。因此，州政府有合法权限控制或者禁止走私。没有效率高而廉洁的民政管理，就不能有效地进行控制。于是州

长发出了一道禁令，禁止向边境酒吧间供应酒类，以免完全与美国的法律作对。卡耶斯认为他在道义上的这个正义行动，会被看作是睦邻友好的姿态。

那些从罪恶中发财的人当然火冒三丈；他们强烈抗议对自由贸易的专横侵犯，并呼吁本国政府保护美国公民在一个无法无天的国家里的合法权利。由于相信那个一贯召之即来的强有力的美国保护，这些酒类走私者公开藐视这个禁止他们贸易的命令。美国主子辞掉了中国人和墨西哥人雇工，宣布他们将自己护送从瓜马斯港到美国国境的酒类货物。运载违禁品的铁路也属一家美国公司所有。酒类走私者和铁路官员联合起来，向这个国家的法律挑战，实际上就是要求治外法权。

看来新州长太不自量力了。联邦政府对他帮不了多大忙，社会党的帮助更小。前者向华盛顿发出了外交上的抗议照会；后者发动无产阶级国际团结——号召国境那一边的同志们起来大造其反，反对资本主义的贪婪和帝国主义的专横。但这些都同样无效。绝望之余，卡耶斯从一个料想不到的地方得到了支持。名义上仍然在已被免职的奥夫雷贡将军统率之下的军队，倒到他这方面来了，他们把傲慢的美国佬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州长卡耶斯当时以将军的身份下令：在全州任何地方，只要发现酒类货物，就一律没收，并逮捕所有自称是货主的人或违抗执行法律的人。部队负责执行这项任务；这是反对宿敌的一次小小战争。军官们以痛饮免费酒来犒赏士兵的爱国热情。许多美国公民被捕了；也可能有几个被击毙；他们都携有武器。国境那边的黄色报纸登载了这次暴行的

故事。

祸已经闯下来了。多年来美国武装干涉的幽灵，又在全国投下了阴影。有效的抵抗是不可能的；而另一方面，还得想些办法来顾全面子。否则，联邦政府的弱点暴露了，就很可能引起叛乱。卡兰沙总统临机应变，使用出人意外的政治手腕克服了危机。为了酬答卡耶斯将军在短期州长任内的爱国贡献，卡兰沙邀请他参加联邦政府，担任劳工部长，并要求奥夫雷贡官复原职，稳定局势，以便使有关各方皆大欢喜。

22. 由代表掌权

卡耶斯戏剧般地被提升到联邦政府的部长，并没有使社会党以外的任何人感到惊奇。默默无闻的人物在军政界飞黄腾达，这在革命的墨西哥是常见的现象。一个国家在动荡不安时就会发生这样的事。天下大乱为所有的人都提供了平等的机会，虽然这种机会常常会被庸才抓到手里。但是偶然的出人头地总不能持久，特别是在政治秩序还没有建立，或者还没有一个得人心的党来保护庸才的时候。革命可以吃掉自己的孩子，也能产生信奉异教的人。卡耶斯就是革命的产儿。就他的情况来说，他原来默默无闻并非因为他是庸才，他原来没有出人头地也并非因为他的声誉受到贬抑。但是历史是偶然事件的巧合，因此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将军就也许会飞黄腾达，也许仍然是无名小卒了。

成功是衡量伟大的尺度，而比成功的伟人还更伟大的人物，据说是那些宁愿默默无闻也不愿为成功付出代价的人。卡耶斯肯定有他的长处，但是假若他没有得到因缘时会的帮助，他的长处也许不会把他提升到显要和掌权的地位。而机遇则是那些相信自己正在创造历史的浪漫主义者创造出来的。我曾经是这种浪漫主义者之一，这一点我必须服罪，虽然在那个时候我自称是革命者，瞧不起浪漫主义；我并不懂得，一个忠实的革命者就是一个浪漫主义者，革命便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冒险。

在卡耶斯作为墨西哥政治上预兆风暴的海燕出现在舞台上前几个月，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他起来掌权的道路早已由唐曼努埃尔为他铺好了。唐曼努埃尔很好地说服了卡兰沙总统，使他赞助我的政治试验。在第一次正式会见时，总统表示了他要委任一位劳工部长的愿望，并询问在社会党中是否有合适人选。很明显，那是一种姿态，表示他要正式承认新生的社会党，从而提高它在全国公共生活中的地位。若不是卡兰沙总统早有维护社会党的倾向，他本来毫无必要注意这位没有名的教师，而且当卡耶斯采取激烈行动、十分惹人讨厌时，总统可能对他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

奥夫雷贡原来的有利地位必须予以恢复，而北方的强邻对提升一个胆敢侵犯美国公民既得利益的暴发户，是不会高兴的。卡兰沙强烈反对美国；但他是西班牙殖民贵族，因此对社会主义革命，即使对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是不会真正同情的。但他是一个大胆的赌徒，他投下的赌注很大。他那勇气十足的机会主义，使我甚至在我会见那位极端革命的机会主义者

之前，就有机会按照列宁的革命战略去作相同的机会主义试验了。

我和卡兰沙的往来是一个有趣的经历。不同的年龄和我们在生活方面的不同地位，使我们不可能有正式的社交关系。虽然私人间的情谊没有培养起来，可是相互间的信任却发展起来了。在我侨居墨西哥的后期，我们在社会政治的惯例和外交规定所允许的范围内经常见面。这种惯例和规定，在一位资产阶级共和国总统与尚未获得威望的社会党总书记之间打交道时是不可避免的。卡兰沙那种君子寡言的态度，并没有妨碍我无拘无束地和他谈话。

多年以后，我渐渐明白，由于文化传统的相近才使这种不寻常的关系成为可能。这是“人贵则行高”的一个典型事例。在卡兰沙身上体现出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文化，这一点似乎与精神贵族的婆罗门传统是情投意合的。我的社会主义良心在进行激烈斗争，使我不承认这个来自经验的真理：我和一位封建主义贵族在一起觉得很自如，但那些粗野的同志们却老是使我感到难受。这倒不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势利作风，这种作风我打心眼里就讨厌。墨西哥中产阶级是认真遵循着资产阶级文化习俗的。我发现他们古怪、做作，有时缺乏真诚。真奇怪，这些竟被认为是高雅的标志，而资产阶级社会的死敌竟也学会了这一套。

例如“现代妇女”公开吸黑香烟，大家还怀疑她耽迷于其他放荡生活；但在同时，她却细致地模仿贵妇，让男人吻她的手，而不是握她的手。还有那些客厅革命家们，他们吟歪诗大反资产阶级，却热情洋溢地把她的指尖紧紧压到他们那显然

想得到更多东西的嘴唇上。由于人生失意而感到痛苦的所谓知识分子，大肆鼓吹无政府主义，但是他们拘板地穿着常是脏污的赛璐珞硬领，作为高雅的标记。每到礼拜天的早晨，他们就不顾他们的反教权主义，陪着虔诚的天主教妻子到教堂里去了。他们去教堂时必定穿上磨损了的条纹裤子，破烂的对襟褂早礼服，并戴上多年陈旧的高帽。黑鞋上罩着白鞋罩，黄手套拿在手里。这些加在一起就是经过伪装的革命侠义人士的全部常规武装了。甚至桑蒂瓦涅斯的马克思式的胡子也覆盖着同样马克思式的脏的衬衫假胸。资产阶级的高雅标记也渗透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了。社会党执行委员都穿着传统的节日盛装参加委员会，更不用说正式的社交集会了。

这些奇怪的经历，在我头脑里种下了异端和异教思想的种子，这些思想动摇了我新发现的信仰。虽然在我这个改变了信仰的人来说，盲目信从已使良心得到了宁静，使疑虑受到了压抑，但我永远成不了完全忠实的正统者。我在墨西哥期间在理论上离经叛道，可以解释说是由于对经典著作学习不够。社会正义的理想本身是有吸引力的。为了作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提倡者，人们并不需要吞下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我不是从政治上、经济上、而是从哲学上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几年以后，一位大名鼎鼎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如果要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作出任何创造性的贡献，那一定是在它的哲学方面；除了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以外，在此以前还没有一个欧洲人作出过任何贡献。他的这个意见，是在讨论我对于经济决定论的结论和文化对阶级或阶级对抗的关系所产生的疑问时发表的。

无产阶级革命者在学习传统习惯的惊人现象，并不仅限于墨西哥。使我吃惊的是，在欧洲也看到了这种情况，在那里，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主要是来自理智判断，而不是来自基本的感情。假若统治阶级在文化方面打下了烙印，无产阶级在文化方面也就必然是资产阶级的。这种说法好象是来自经验的真理，它排除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产生新文化、人与人关系的新形式以及新的道德观念的可能性。这种说法使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只有较古的、更自发的、较少因袭的文化传统才能使人们抵制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虚伪与粗野，才能使人们寻求不受任何阶级偏见限制的人类文化更丰富的形式和更崇高的理想。具体地说，我觉得一个在精神上从阶级偏见中解放出来的贵族，也许比最热情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者更无私，在文化上比狄俄尼索斯^①更不受约束的社会主义革命者。换言之，精神贵族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只有它才能为一个真正新的社会制度奠定基础。

这些非正统的观念经过多年才在我的思想里发展起来。在此期间，我根据我的新的信念认为，我和任何人一样，在政治上是一个坚强的社会主义者，并一天比一天更革命了。但是在社交方面和在朋友间的私人关系上，我努力按照我的异教观点办事；令人鼓舞的是，这种观点还传染给了别人。在墨西哥，我们建立了一个小规模的世界自由人团体。后来在欧洲，当我批评共产党朋友们的资产阶级习惯和偏见时，他们嘲弄我，说我比欧洲人还要欧洲人。我相信具有特色的欧洲文化在18世纪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那是一个精神贵族的时代，

^① 狄俄尼索斯(Dionysus)，希腊酒神，其特征之一是不受约束。——译者

它预告了后来发生的历次革命。19世纪是资产阶级时代；卡尔·马克思是一个资产阶级人物；因此，他的门徒和追随者也是资产阶级人物。

墨西哥社会党，说得更恰当些它的执行委员会，从它的一个委员被提升为联邦部长的惊愕中清醒过来了，它以典型的资产阶级方式为他举行宴会。有人想邀请资产阶级共和国总统参加社会党有政治动机的社交宴会，这一轻率行动被我制止了。在短短的半年期间内，事情有了惊人发展，这自然把野心更大的社会党领袖们的头脑都冲昏了。昨天还是无名的鼓动者（假若不是实际的流浪者的话），而今竟以时势的主宰自居了。他们当中有人甚至建议，应该邀请卡兰沙总统参加社会党，用以证明他的诚意。可是，在桑蒂瓦涅斯和唐曼努埃尔稳健势力的支持下，我设法阻止了这些激烈分子的轻举妄动，但又没有泼灭他们的热情。

唐曼努埃尔代表总统作为官方客人，参加了社会党的宴会。他在宴会后的讲话中，讲到在社会党会议以后不久，唐贝努斯蒂亚诺要任命一位劳工部长，并问过在社会党人中是否能找到一位合适的人选。他的讲话引起了雷鸣般的喝采。那位主宾听到这里好象有点泄气了。这样一说，他这次平步青云就不完全是由于他自己的功绩——不是对他短期州长任内的卓越政绩的报酬了。不知他是否认识到这是他自寻烦恼。可是，我还是说了几句话来缓和一下情绪。我否认自己在这件事上有任何功劳，并向卡耶斯保证，他是凭着自己的权利执政的，不会有人要求由代表掌权。我的诚恳谦虚的态度使卡耶斯感到满意，但其他的人们并不心悦诚服。信服也罢，不信

服也罢，反正卡耶斯是当上部长了。

一份保护劳工的、特别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资本剥削的法规纲要草拟出来了，当然是由部长和国家立法部门首长协商起草的。这个纲要在原则方面已被总统和全体阁员批准，我应邀与工会及社会党领袖一起草拟法案。正文将由法律专家和共和国法律官员定稿。提出的措施之一是使罢工合法化，以支持工人的集体谈判要求。这个消息泄露出去，全国的工业中心立即就受到罢工浪潮的冲击。罢工的要求多种多样，有合法的，有想象的，有强制的。这就是我那个时代的墨西哥。

在油田地区和出口这种战略物资的邻近各港口的一次大罢工，将会产生燎原的形势。欧洲战争已经到了决定性阶段。由于俄国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东线已经崩溃，德国孤注一掷发动了最后攻势，以图突破法国防线。在那个关键时刻，横渡大西洋的供应品运输稍微受到一点干扰，就会成为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几乎可以完全肯定，假若有任何停止从墨西哥外运石油的威胁，美国海军陆战队将会登陆干预。事实上，美国人也作好了应变准备，军舰正在坦皮科和韦腊克鲁斯港口外边巡逻。如果有人采取鲁莽行动停运石油，墨西哥政府只有丢脸，因为它根本没有力量足以阻止美国海军陆战队占领整个油田。

这是运用政治艺术的时候了。如何能够挽回危局而又不损伤面子呢？我提议授予劳工部长以紧急权力，要他立即赶到现场处理危机。卡兰沙不大敢放出工人的这只看门狗。这只看门狗能不能牢记，他只可以尽力狂吠，而不能咬人，我将

伴同他去，务必使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根据社会党纲领受到保护，但是又不能危害共和国的安全。总统得到了保证后，才签署了这个法令，授予劳工部长以狂吠的紧急权力。我们走到中途，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非常戏剧性的、非常墨西哥式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必须经过奥里萨巴——法国资本家占有的纺织工业中心。那里发生了一万二千工人参加的罢工。火车通宵不通；一清早，我就到市内去会见地方工会领袖，并向墨西哥城的社会党总部报告情况。地方党办公室人员告诉我说，听到劳工部长正路过这里，罢工工人代表团已到车站见他去了。我急忙赶回车站，看见一群高喊口号的人包围了部长专车；不一会儿，部长在门口出现了，开始了他那煽动性的演说。在演说中他告诉了狂热的听众，他已派人去叫雇主们的代表了，要他们告诉雇主，政府打算怎样保护劳工。

几分钟以后，工人们的这只看门狗在专车内恶狠狠地面对着两个衣着讲究的人。那两个人绷着面孔，看样子害怕了。这次会见时间很短，但是绝不愉快。那位带有将军军衔的部长，威风凛凛地站在来客的面前，一只脚踩在椅子上，大声吠叫：“墨西哥联邦政府不再容许外国资本家剥削工人，因此命令你们去解决纠纷，满足工人的要求。”雇主的代表嘴里叽叽咕咕，说这些要求不公平，很过分；他们宁愿关闭工厂。部长摆出一付要咬人的架势反驳说：“那样的话，政府就准备接管工厂。”那两个代表被傲慢的手势赶了出来。在短促的会见时间中，那位将军还从手枪盒里拿出枪来，把它放在桌子上。那手枪柄上装饰着一粒珍珠母。

我走出去，在车站月台上遇到了可能遭到牺牲的那些人。我很容易地就说服他们，使他们作了让步。当着他们的面，我告诉罢工工人代表团，雇主们已经暂时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因此，这次罢工应在次日宣布终止。为了最后解决纠纷，社会党将继续进行谈判。听众都为胜利拍手喝采，雇主们也松了一口气，与我握手。

卡耶斯对于他自己的表演非常满意。他已经把那两个家伙吓胡涂了，这样我才能够与他们达成协议。我不知道当我们需要对付一个更有力的、更嚣张的当事人的时候，这个战术是否还行得通。在我们到达坦皮科后的第一次群众大会上，卡耶斯讲述了他在奥里萨巴表演的故事。这使听众大为高兴，他们的情绪很高。直到那时为止，这地方还没有再宣布过罢工。在一次仓促召开的地方工人领袖会议上，我指出了鲁莽行动的危险性。谨慎的忠告使他们信服了，因为工人们实际上没有正当的抱怨原因，工资比全国其他地方都高。我替卡耶斯辩护说，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代表已经掌握政权；不应该使他作难。这仅仅是个开始。我们一定不要进行赌博。这番话都说到了点儿上。工人们的这只看门狗除了狂吠外没有必要再做其他事情了。卡兰沙政权渡过了严重的危机，社会党由于英明领导获得了威信与声誉。

23. 一次红色洗礼

自从胡亚雷斯时代以来，反教权主义就是一个主要的政治问题，但天主教会当时仍然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它支配着几乎全国人民的家庭生活。我在墨西哥的时候，甚至煽动叛乱的社会革命者（如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妻子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她们按时参加礼拜，并到忏悔室去。讲道坛上的说教她们实际上可以不理；但是忏悔室里神父用低声说的无论什么话，都被看作是愤怒上帝的准确无误的声音。即使命令她去打搅她丈夫的家庭生活，或者坚持用迷信做法去使他公开丢脸，忏悔的罪人也必须服从。教士们常用强迫的宗教规定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了。

《克雷塔罗宪法》提出了普选权；但侥幸的是普选并未根据宪法来举行。所谓侥幸，那是因为假如教会对妇女施加影响，那么妇女的投票就很可能推翻那个给予她们选举权的自由主义宪法。大约十五年以后，在西班牙果然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部短命的西班牙共和国宪法，第一次在欧洲一个天主教国家里给妇女以选举权。她们立即运用她们的民主权利，投票赞成恢复君主政体。新近获得选举权的西班牙妇女还不惯于作政治判断，如果不是神父们从全国各地的忏悔室里低声发出命令，她们是不会这样投票的。

墨西哥的民主制度总的来说并没有受到同样的反击。1920年推翻卡兰沙政府的奥夫雷贡集团叛乱，给予天主教会某些暂时的希望与安慰。因为他们反对全部没收教会在各地

的财产的威胁，并反对《克雷塔罗宪法》使教育与教会脱离的规定。但1922年卡耶斯当上了共和国总统，这段反动的插曲就完结了。他迎面痛击了自从西班牙征服以来一直原封不动的、最坚固的堡垒天主教会。

可是，甚至在卡兰沙时代，在教会仅仅享有半合法的地位时，它对于尚不稳定的民主秩序仍然是一个经常的威胁。神父通过忏悔室活动，煽动妇女反对她们的据知是敌视教会的丈夫。社会党主要成员都被列入了黑名单。他们当中甚至没有一个人赞成那些崇尚社会风雅的客厅革命家的伪善作法。但是他们多半都是工人，他们的妻子愚昧无知，又不识字。因此，她们满脑子是宗教的偏见，动不动就在神父的教唆下去折磨她们的丈夫。一个由于神父干涉而妨害家庭和睦的特殊例子，给我提供了一个获得有趣经历的好机会。

胡安·巴普蒂斯塔·弗洛雷斯是社会党执行委员会委员。他的职业是修鞋匠，他是一个中世纪欧洲型的强健的、快活的工匠，而不象一个忧郁的土生土长的墨西哥人。他身材高大而匀称，有一付漂亮的黑色面孔，再配上两撇象样的胡子，这看来更增加了他的大丈夫气概。事实上，在他那个社交范围的妇女都把他视为风流荡子。不论他在乱搞男女关系方面取得多大成就，当他必须和他自己的妻子打交道的时候，他那男性吸引力就不顶用了。她是城市混血种普通类型的妇女，不识字，总的看来是愚昧无知的。棕黑色的皮肤和面部特征说明了她土生土长的血统，而西班牙血统微弱的影响则表现在她迷恋教会方面。虽然她花费在圣母神龛旁边的时间比在家的时间还要长，但她在宗教上的顽固与迷信习俗使一

个自称无神论者的家庭生活相当烦人。弗洛雷斯相信，他的同志们也有这种看法，她已按照神父的指令把她丈夫快要折磨死了。由于这样的事情是在信仰天主教的墨西哥这个国家里所有革命者的共同灾难，因此弗洛雷斯也就不叫屈了。然而，不久这个虔诚的妇女便使她丈夫的生活发生了危机。

他们已有两三个孩子，另一个也快要出生了。作为对通过他那愚昧的妻子执行的教士暴政的无言抗议，弗洛雷斯已下定决心要求这个未来的孩子属于自己，这是他后来告诉我的。那几个大孩子都在教堂里正式举行过洗礼，为了避免家庭产生危机，这位不信教的父亲还是很勉强地参加了仪式。弗洛雷斯认为在仪式中有什么妖术，它已使孩子成为神父的终身奴隶，因此他下定决心要把一个孩子拯救出来，使他献身于社会革命和人类的解放事业。

孩子生了，举行洗礼的日子日益接近。在这关键时刻，弗洛雷斯好象又没有勇气了。他害怕在那个虔诚的泼妇面前说出自己亵渎神明的意图。他来征求我的意见，求我帮助实现他的决心。母亲宁愿杀死孩子，也不愿把他放在通向地狱的道路上。她将带着婴儿逃离家庭，两人共同去饿死在圣母的圣坛脚下。（对于落后的天主教群众来说，圣母玛利亚是最高神；基督是她的儿子，当然是低一级的、次要的神了。）弗洛雷斯如何能够避免这种丑事而又无须放弃他的决定呢？他也成了戏剧性的人物了。他宁愿自杀也不愿如此受辱。我表示对他十分同情，请他给我一定时间，让我考虑一下他这微妙的处境，并计划出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

美国激进主义者弟兄们和社会党执行委员会少数几个挑

选出来的委员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计划对教会暴政发动攻击。比较冒险的战士提出绑架小孩这样一个美妙的战略，把孩子从洗礼的妖术中拯救出来。但是考虑到在灵魂被救出以后，还有婴儿的肉体生存的问题，这个计划只得放弃。经过反复考虑，意见得到了统一，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搞一次假洗礼。在美国激进主义者中，有许多天才人物能设计并上演这出戏。事实上，就是这个主意激发了他们具有诗情画意的想象力，并鼓动起他们演剧的野心。但是开头的问题仍待解决：怎么说服那位保守的妇女，把婴儿带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参加洗礼呢？作为党的创始者老桑蒂瓦涅斯承担了这一艰巨的工作。他认为任何人都没有把握，他确信自己能够完成这项任务。

这个计划是要在我住所的客厅里举行一个假仪式。这出戏还需详细安排，脚色要分配好，记清楚，舞台要真实地布置起来。桑蒂瓦涅斯毫不费力地完成了他的准备任务。那位轻信而无主见的妇女十分相信这样一种说法：社会主义是拯救穷人的一个运动，当然会受到教皇的祝福。因此，“罗马侨居地”的那个不公开的教堂的神父已从教皇那里接到命令，要给她的婴儿施行洗礼，而这个婴儿是一个主要的社会党人的孩子。这一神圣命令的意图是象征性的；它向“罗马侨居地”骄傲的、富有的居民说明，天国属于穷人，属于温顺而忠实的人们。

那是一个略长的房间，有几个高窗可以看到街上，它很适合改造得象一个上流社会教堂中的一个不公开的私人小教堂。墙的四周完全挂上了红布。一张涂着金色的路易十五式

的桌子，在房间那一头靠墙放着，作为圣母像的台座。美国激进主义者演戏的才能，贯注在恰当安排的每一个细节里，生动的想象力模拟出了天主教堂的气氛。闪烁不定的蜡烛光影，催人欲睡的焚香气味，等等，一切都应有尽有。一部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用一块红绸很端正地包着，占据了圣坛上放《圣经》的地方。

查利是舞台监督，也是表演的技术指导。他把首席神父这个角色给了自己。幕启时，那就是说，当通往这间屋子（它在房屋入口走廊的一侧）的大门被招待员打开的时候，查利正站在神龛旁边，穿着一件恰如其分的黑袍，装扮得维妙维肖。除了他那个种族所特有的鼻子以外，他在各方面都象个被委派来拯救灵魂的福音传道人。那些绿色缎子作椅套的、涂着金色的椅子，象教堂里的座位一样，一排一排地安置在那里。这些椅子上坐满了社会党主要成员和他们的妻子，他们也都穿着深黑色衣服。

我的女厨师玛丽亚领着那位抱着婴儿的弗洛雷斯夫人来到这个房间，并领她向下走，从中间通道走到神龛跟前。屋子里其余的人看样子都很阴沉严肃，我却发现玛丽亚宽宽的漂亮面孔上闪烁着冷笑。她是一个异教徒，道地的当地人，尽管她没有缺席过每周的弥撒。但她总是避开忏悔室，她觉得没有一个神父不调戏悔罪的青年妇女。事实上，由于她是一个异教徒，她从来不受犯罪观念的折磨。

查利象一个炉火纯青的演员一样地扮演主角，他甚至用社会革命的福音书碰碰婴儿的前额，以背诵犹太方言的诗句来强调这个仪式，那位不识字的母亲一定认为那是拉丁文的

祝词呢。

当轮到要给那个救出了灵魂的婴儿命名时，意见很不一致。父亲想要他取名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多讲革命少讲感情的人则愿意选择列宁-托洛茨基这个名字。大多数赞成用马纳文德拉纳特。当然，神父有最后的决定权：他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但是这时他却需要有人提词。查利把胳膊举在婴儿头上，忍不住地想发笑，用响亮的声音宣告：“我给你命名为卡尔·马克思·弗洛雷斯。”大家都很满意。可是谁也猜不出那位可怜的、受骗的妇女心里有什么想法。另一方面，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感到高兴，以至神父的口头禅“阿门”竟淹没在雄壮的“社会革命万岁”声中了。

街上已经聚集了一小群人。这在那个受到十分尊敬和传统上就是宗教地区的“罗马侨居地”，是个奇怪的现象。但是大家都已经知道这所房子是各种神秘活动的中心——高级政治活动、国际阴谋、秘密外交、革命密谋。当会众出来走到街上的时候，人群散开了。弗洛雷斯带着他的妻子和孩子回家——他是一位业已拒绝将他的骨肉交给教会暴政的光荣父亲了。

那些演出成功的人们，不痛痛快地高兴一番是不肯散去的。格兰威治拿出几瓶意大利产的红葡萄酒，并宣告说：“现在让我们吃圣餐吧。这里是耶稣的血：玛丽亚，你去拿肉来。”她钻到厨房里，拿出几块面包和一大块干酪来，这些东西显然是按照指示事先准备好的。接着就是亦歌亦舞，一个快乐的夜晚，还吃了一顿有面包、红酒和干酪的晚餐。第二天清晨《先驱报》感情奔放地报道了这次红色洗礼。

24. 神秘的来客

1918年最后的几个月当中，惊人的消息不断地从大西洋彼岸传来。德、奥、匈在战争中打败了。德国的革命推翻了皇帝，他亡命国外。失败使德国军队土崩瓦解。奥匈帝国的空架子也倒了。古老的哈布斯堡王朝和甚至在俾斯麦以后还统治着日耳曼帝国各邦的其他古老王朝都一道崩溃了。最重要的事件是德国革命。10月间，当时自称为斯巴达克同盟成员的共产党人，企图夺取政权并建立俄国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共和国。所有党派，自君主主义者到社会民主党都联合起来反对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只要求以民主共和国代替君主国，而不愿意革命走得比这更远。共产党还太软弱，还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成功，而俄国又帮不了忙。假若革命再向前发展一步，胜利的协约国军队一定就要干涉了，象他们在匈牙利所干的那样。斯巴达克同盟的领袖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普鲁士军官野蛮地惨杀了，地方起义也被败军的小股队伍血腥镇压下去了。

共产主义革命在慕尼黑坚持的时间略长一点，但终于被拒不供应该城食物的信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农民消灭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在俄国的范例的鼓舞之下，几乎在中欧和东欧所有国家的首都都企图仿效在“震撼世界的十天”中彼得格勒发生过的事情。在布达佩斯，苏维埃共和国竟然建立

起来了，但不久也被推翻。

1919年最初几个月中，革命的风暴已经停止，让四年战争给弄得筋疲力尽的中欧在和平中医治创伤。在德国和奥国，骄傲而古老的帝国政体已经被由社会民主党人担任总统和组织政府的共和国取而代之了。制宪会议在魏玛开会，制订了德意志共和国宪法，它将成为以战争结束战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民主根本大法的典范。魏玛宪法确实是自由主义法律学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杰作。但是它还不足以巩固德意志共和国。经验证明，法律的文字既不能重建社会，也不能变革民族心理。社会民主共和国不能剥夺工业大资本家的权力，而普鲁士军人特权阶级虽然暂时没有军队可供统率，但仍然是原封未动的。旧制度的这两个堡垒都受到协约国的帮助与纵容，协约国认为它们是反对任何可能发生的革命的唯一保证。凡尔赛和会从已垮台的哈布斯堡帝国和罗曼诺夫帝国中分割出一连串的新兴民族主义国家，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以此来在欧洲和布尔什维克俄国之间构成一条防疫线。

初夏时分，欧洲革命退潮的波纹达到了一潭死水的墨西哥。一天下午，查利和欧文冲进屋子里，打扰了我的午睡。他们非常激动：一位俄国布尔什维克领袖已经秘密地到了墨西哥——一位真正的、活生生的布尔什维克，直接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土来的。虽然这个消息使我自己也够激动的了，但他们两人的天真热情，引起我故意提了个诙谐的问题：他们是怎样认出他的？他留着胡子，牙齿间咬着一把刀吗？他们没有理会我这个轻率问题。不，他的脸刮得很干净，穿着一套做得很讲究的衣服，只带着一根手杖，当然是拿在手里啦。我一本正

经地问道，他们怎么知道他是一位俄国布尔什维克呢？为什么他一直到墨西哥来呢？说到这里，我不禁毛骨悚然了：每个生人都值得怀疑。他可能就是英美帝国主义的间谍，是想用谎言来骗取我们对他的信任的。

我的猜疑态度使那两个传送重大新闻的人有点泄气了。他们大概期望我会跳跃起来，围着床跳卡尔曼努尔舞^①，他们还准备加入呢。不过，我对这个消息也很感兴趣，便要求他们坐下来，谈一谈他们遇到这个迷人幽灵的故事，这样我们就能够冷静地考虑一下怎样对付他和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了。

有一位服装体面的人，不太年轻，风度威严，一大早便到《先驱报》办事处来，打听如何才能见到 M.N. 罗易。看样子他象个外国人，但不是一个印度人，尽管肤色有点发黑。他说着一口漂亮的英语，稍微有点美国腔：但是他的仪态举止显然是欧洲式的。他说因有要事，两天以前他从美国到墨西哥来，他要和社会党总书记、那个印度人（他和美国人一样地使用 Hindu 这个字）取得联系。他的名字是布兰特温，现在住在闹市区的一所旅馆里。关于他自己，他不愿提供更多的情况。在查利和欧文这两个犹太人耳朵里，他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熟。那个时候，外国人的一般想法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都是犹太人。在问及他为什么到《先驱报》办事处去打听他想要得到的消息时，他的解释很有趣。当他正在寻找社会党出版机关时，无意中发现了有一种有英文版的报纸。他买了一份，想知道一些当地新闻；但他不懂西班牙语。他推测《先驱报》英文版的编

^① 卡尔曼努尔(Carmagnole)，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一支活泼轻快的流行小调以及按此曲调跳起的舞蹈。——译者

辑，不管是谁，一定是同情社会主义的，因此这个编辑很有可能认识社会党书记。他两眼盯着质问者的眼睛，挑衅地说——难道他说得不对吗？他起身要离开的时候，向周围看了一眼，看清了屋里确实没有别人，便走到那两个目瞪口呆的人跟前，小声说道：“请不要担心。我是一个朋友——从俄国来的。尽快地给罗易捎个信。明天这个时候，我再来一趟。”

欧文用诗人的想象力大声说：“唉！他真象一个耍蛇的！”两个青年人有这种感觉，不足为怪。对于他们来说，俄国是革命的天国，而布尔什维克就是神。作为在西半球第一个会见布尔什维克的人，那不是很大的幸运吗？我并不是完全没有被他们丰富的情感所感动，但是我不象他们那样地崇拜布尔什维克。能够会见一个俄国布尔什维克，得到一些关于那个遥远的国家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第一手资料，那一定是有趣的事情。但是他为什么径直来到墨西哥，而在许多人当中又偏偏要见我呢？他怎么知道我的，他知道我哪些事情呢？这些都是叫人迷惑不解的。可是，见见他也不会有什么坏处吧。我不怕耍蛇的，因为我不相信他们的魔力。但是提防一下可能发生的危险，还是聪明的。人们秘密地告诉过我，有人不止一次想绑架我。

于是作出了决定：第二天晚上我要在旅馆里拜访布兰特温先生。当他再来《先驱报》办事处的时候，就可以这样通知他。查利应该把他送到大门外。我将在马路的那一边等着他，看看这个从月球上来的人。乐天派的欧文取笑说：“要问他的容貌吗？你要是个姑娘的话，就会爱上他。”刚刚具有布尔什维克精神的查利，对于他朋友的轻浮和我那老改不了的

密谋习惯，都极为不满。仅从那个人的面貌，我可能发现什么呢？我反驳说，你说他看样子不象一个布尔什维克；当然，假如他在这个陌生的国土上确实有什么重要的工作，他就会化装来啦。我要弄清楚，他到底是假装的布尔什维克，还是一个真正的君子人。我又使我的两位朋友生气了；他们的革命忠诚受到凌辱，而且他们对东方人这种游移不定的别扭劲儿很看不惯。我们结束了这场讨论，分了手，在戏剧般的情况进一步发展以前，每个人都各按各自预先的设想在期待着。

布兰特温先生第二天上午在约定的时间访问了《先驱报》办事处。他得到了我的口信，高兴得很。这时，一件有趣但不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

查利下午很早就来到我的住所。他的样子很严肃。因为他压不下自己的革命热情，前一天晚上开完会以后，他就到旅馆拜访布兰特温先生了。当一个布尔什维克正在本城的时候，他怎能放弃和他交往的特权呢？在查利的头脑里既没有东方人的沉着，也没有密谋者的癖好。他是一个直来直去的革命者，当他看见另外一个革命者的时候，他认为这个人准和他一样。我要求他告诉我他们谈话的经过。他以胜利的神态说，他要告诉我一些有关我的极好的消息。布兰特温先生是列宁的朋友，他以列宁密使的身份来到了新大陆！查利怎么能把一个新相识当作知心人呢？难道天生有第六感官，不论什么时候碰见一个人就能认出是骨肉兄弟吗？这话使查利不高兴了，他滔滔不绝地大谈起会见的详情。

查利访问了布兰特温先生，并请他到外面去吃饭。旅馆餐厅是一个闷热的地方，而且查利不愿意被人看见和这位陌

生人在一起。他们就到我们喜爱的意大利饭店去，在那里，喝着意大利红葡萄酒度过了一个快活的晚上。查利认为这位布尔什维克是一个精通世故的人，并且是一个好伙伴。他的谈吐饶有兴味，也有教育意义；人们可以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都是关于音乐、绘画、戏剧、饮食方面的。关于美国他了解得很多，好象他一生都是住在那里似的。但是关于革命呢？他没有谈那方面的事情吗？当然，他想谈，但是公开这样作并不明智。那么，查利是怎样采访到布兰特温先生是列宁的朋友这样重大新闻的呢？啊，他确实谈过他的过去生活、革命活动和他的同事这一类的事情。人们从他所谈的点滴可以推测，他是一个高级布尔什维克，和列宁有密切的关系。我对查利易于轻信的态度很感惊奇，但是我什么也没说，以免动摇他的信心或者打击他的情绪。只是我对这位陌生人的好奇心增强了。好吧，几个小时以后，我就要和这位谜一样的人物面对面了。可是他为什么急于要见我呢？他真的是为了这个目的从俄国一直到这里来的吗？如果相信真是那样的话，这就会引起我的虚荣心；但我还不够那么崇尚虚荣。这个故事再叙述下去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问查利，他们前一天晚上是否谈到过我。当然，他们谈到了。布兰特温先生非常钦佩这位在外国公众生活中获得重要地位的年轻印度人。但是他一点也不愿谈找我有何事。他只是谈到这位年轻的印度人应该到俄国去；列宁会喜欢他的。虽然我对整个事情仍然怀疑，但我却也感到洋洋得意。到俄国去的想法和被伟大的列宁所赏识这件事，多么令人陶醉啊！

我急切地等着天快黑下来，全身好象得了一种热病。我觉得血液在血管里急流——期待着会见第一个布尔什维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对于此人是否真是个俄国布尔什维克，以及他明白地表示要见我这件事，我都不再怀疑了。他与我见面是不是他来墨西哥的唯一目的，这一点还有待证明。不管怎样，直到那时为止，他似乎不象还有什么其他重要的事情。

这天上午，当他从《先驱报》办事处出来的时候，我就盯住了他，跟在他的后面，一直跟到吃午饭的时候。他毫无目标地在那里闲逛，不看橱窗，只是注意行人，然后回到旅馆。他是一个有身份的人，而且具有相当显著的个性，可是情绪看来好象有些低落，特别是当他到邮局去，发现没有自己的信件时，更是这样。他显然是失望的，烦恼的。他是一个刚到中年的人，不超过四十岁，却不时地扶着手杖休息。我想走向前去，问他是否身体不适。但还是谨慎些好；我必须等到晚上。可是，我从模仿福尔摩斯的探险中往回走时，就已经很喜欢这个陌生人，很想和他相识了。不知怎么的，我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这是一个遇到了困难的好人。他可能需要帮助，可能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帮助。我想不出他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但是我知道，当时在墨西哥我能大力帮助任何有益的事业。很快地就弄清楚了，我和布尔什维克的关系，是从我在财政上帮助他们开始，而不是由我接受荒唐无稽的俄国卢布津贴作为搞革命的报酬开始的。

25. 会见第一个布尔什维克

晚上，我到布兰特温先生住的旅馆去。这是一个有过美好时光而今已黯然失色的地方。前厅虽然宽敞高大，但很暗淡，凌乱地摆放着老式家具，上面铺着肮脏破烂的粉红色缎子。四壁甚高，下半截都装饰着镀金框子的镜子，那些镜子不是开裂了便是尘封了。这里的整个气氛使人感到郁闷。一个显然有收入、很风雅的人怎么会选择这样的地方？也许，他这个外来客人不知道还有好旅馆吧。现在他一定在打算换一个地方。

我告诉门房想见谁后，他说道，“啊，那位罗马尼亚绅士！”我被带到二楼一个房间的门。我刚一敲门，门就开了。布兰特温先生吩咐侍者出去，然后走上前来迎接我。他温暖地握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松开。那温暖感不是来自体肤，我不知怎么的却可以感觉到。他大约比我大十二岁左右，体格相当健壮，但不比我高。最后，他松开我的手，扶着我的肩说道，“你很年轻呀。”我替自己辩解说，这不是我的缺点。他用句奉承话答复我：这是我的优点；我还有很多时间来实现我的梦想哪。

这又是一件令人惊异的事——一个布尔什维克竟称革命为梦想。他从我脸上似乎看出我迷惑不解的心情，因此和善地笑了，并让我坐下。这时候我注意到他另一个令人惊异的地方：他的言谈举止象一个比他实际年龄大得多的人。这是故意作态，还是革命者生活中的艰难困苦在他身上留下的痕

迹呢？不管怎么样，这个人的举止反正有些不自然，不是虚假，也不是欺骗，而是有点装模作样，象演戏似的，这种感觉使我不安起来。

我来的时候，他好象正在穿衣服准备去吃饭。刚才他吩咐出去的那个人必定是随同这个房间——更确切地说，这一套房间——一起雇来的临时仆役。布兰特温先生让我坐在一张弹簧破烂和垫套褴褛的扶手椅上之后，说了句道歉的话，就退入卧室去了。不一会儿，他披着一件华丽的丝质寝衣走了出来。这件寝衣只是更衬托出这间从前曾经精心布置过的客厅已被破坏了的美丽。如果他的外表真象大家想象中的布尔什维克，这间屋子就会被认为与革命后的俄国一模一样——粗笨的新统治者在旧秩序的废墟上大显威风。

房屋里出现了一阵难堪的沉默。他没有坐下，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我揣测他心中一定很不宁静。但是为什么？突然他在我面前停了下来，用一种厌恶的口气说，“这地方很脏，是不是？这些华而不实的破烂东西应该被无产阶级的满腔愤怒扫个精光。”这又是一件令人惊异的事——一个看来是十足的资产阶级人物竟然说出这样激昂慷慨的话。他又一次看出我在想些什么，并且使我感到更加惊讶的是：他竟然说，他不知道新世界会在什么时候建成，如果真的能够建成的话。而且，那不过是个涉及人们爱好的问题。

他向我道歉，说他请我坐的这把椅子上一定有臭虫。我开始感到全身都爬着臭虫，当然，这只是我的想象。可是，我怎么费力也不能从那把椅子的不舒服感觉中摆脱出来。布兰特温先生笑了，他帮我站了起来。冰块打破了，我们开始谈到

正题，也谈得更随便了。

他为什么想见我？什么原因使他来到墨西哥？他在来此以前知道我吗？他对这些率直的问题都避而不答，却建议等他在这个陌生国度里站稳了脚，再谈任何事情。那么他希望我在此期间为他做点什么呢？他的答复是既坦率又让人放心：“啊，让我们交朋友吧。我感到非常孤独，而且我遇到了一些困难。”我提议我们该去吃饭了。他马上高兴起来。“这主意好极了；什么东西也比不上一顿美餐呀。”我们是否要到一家意大利餐馆去？就是头天晚上他同我的朋友去过的那个地方。不，虽然那儿的酒菜不错，他就是不喜欢那个地方。那儿披着长发的男人太多了；他讨厌那些波希米亚人。我们一致同意到一家比较普通的、有法国风味的饭馆去。他喜欢德国风味的饭馆；但是那里没有。布兰特温先生又一次迅速走进卧室，这一次停留的时间稍长一点，大概在梳妆打扮吧。他这个人很讲究。我对于他的这方面已经有了不少了解了。

他不在的时候，我环视了一下这个客厅，发现桌上放着几份《盖尔杂志》。我对那个杂志相当熟悉，也熟悉它的编辑。这位编辑按照美国说法是个怪人。我在写我旅居墨西哥的这部分回忆录中，必须谈谈他和他的妻子，以便增加趣味。

在战争时期越境到墨西哥逃避兵役的大多数美国青年人，自称为和平主义者或根据良心拒服兵役者。他们多半是些怪人——素食者、唯灵论者、自然疗法者、裸体主义者，等等。其中有个叫盖尔的人。此人独具一格——他是“新思想教会”的福音传教士。他居然租了一间屋子，登广告宣传“新思想教会”教堂在墨西哥已经建立。每礼拜日上午他在那儿

讲道。从身体的外表来看他很适合这个角色——瘦高条，面孔苍白瘦削，留着尖梢的红胡子。如果他登上讲道坛时不穿那件燕尾的黑色早礼服，人家准以为是耶稣基督在山上讲道呢！听众从未超过十几个人。他的妻子扮演玛格达琳^①的角色，穿着飘垂的白色长袍，金发辫子垂在面颊两侧，虔诚地站在讲坛脚旁。每周一次的表演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因此，为好奇心所驱使，我去看了一次。我听说“新思想教会”的福音传教士还出版了一份以自己姓氏命名的月刊——《盖尔杂志》。

一天早晨，这对夫妇来访，请我去他们家喝茶。这件事情对我并没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我不能拒绝，否则对方就会认为我失礼，那就不值得了。盖尔先生侃侃而谈：说他们是和平主义者，由于宗教的原因，他们对印度的唯灵论深感兴趣，并且愿意聆听来自那个圣地的子孙的智慧语言。玛格达琳绯红着脸表示赞同。我受了两小时的罪，但也无法收回诺言。喝茶时间定在次日。我准时前往那里，在门口受到卖弄风骚的（我认为很没有意思）玛格达琳的迎接。她把一件宽大衣服胡乱地缠在身上，大概是当作印度妇女所穿的“莎丽”吧。她把双脚涂成红色，赤着脚走路，头上戴了一个白花扎的花冠。一切都象演戏似的。房间里充满了浓厚的烧香烟雾，透过烟雾能够隐隐约约地看到墙上挂着神像、圣者画像和先知画像。主人带我到一张似乎是个印度人的像前——一副漂亮的面孔，眉目分明，略长的黑发，背景是一道黄色的圈，我想那大约就

^① 玛格达琳(Mary Magdalene)，《圣经》中的人物，耶稣的忠实信徒。——译者

是光轮吧。主人虔诚地站在像前，问我是否有幸见过克雷希纳姆尔蒂阁下^①。他是谁？我的天真的问题使主人目瞪口呆，玛格达琳则几乎要晕倒了。主人怜悯我罪孽深重的无知，告诉我说：在西藏大圣的许可下，比桑特夫人挑选了一个聪明伶俐的马德拉斯男孩作为她的继承者，并送他到牛津去学习。

得啦，扯得太远啦，原先我只是答应来喝茶的，可是茶还没有影子呢。那对虔诚的夫妇显然失望了。我深信他们一定怀疑我是个骗子，根本不是印度人。我也表现出忍耐不住了，我说我要告辞啦。不行；我必须吃点茶点。玛格达琳端出几杯淡柠檬水。我愿意喝这清淡的饮料吗？他们是不喝茶的；茶是刺激物，对心灵的平静有害。接着每人分到一片莴苣夹心面包。人们不应该在晚上吃得太多。（美国小资产阶级称晚餐为“晚茶”。）“新思想教会”的福音传教士一直不停口地讲道，全然不注意别人的反应如何。虔诚的听道者永远只是玛格达琳一人。最后，我坚决地站起来结束了这场折磨。送我出来时，主人问道，次日上午他能否来访我，谈点事情，我有些好奇，便同意了。

第二天上午拜访的目的完完全全是为了尘世的事务。我能从墨西哥政府为他的杂志获得一笔津贴吗？这恬不知耻的要求使我吃了一惊。我否认自己有什么权势能同政府谈论这类事情，我说政府对他的想法不大可能有什么兴趣。为什么不可能呢？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他会进行反战宣传并在美国吹捧卡兰沙，因为他的杂志在那里有广大的销路。他还是

^① 克雷希纳姆尔蒂(Krishnamurti)，生于1897年，印度神秘主义者兼诗人。1925年，印度神学社领袖比桑特夫人宣称他是继承者。——译者

一个社会主义者，因此期望我能用由我支配的款子接济他的刊物。这蛮横的要求是一场彻头彻尾讹诈的序幕。如果我不帮助他，他将揭露我是个英国间谍，曾从德国人那里骗得一笔巨款。我忍住气，要求那个讹诈者乖乖地滚开，否则我就要叫警察了。我刚要拿起电话听筒，那卑鄙的家伙便溜走了。

从那以后，《盖尔杂志》成为对我恶意中伤的工具。我的朋友们都很有生气；他们想狠狠地揍这无赖一顿。美国激进主义者深信，他是被收买来进行宣传把我搞臭的英国间谍。我实在无法想象他为什么这么恶毒攻击我。我又没有伤害过他。好在很少有人认真看待他的这次活动，事情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

布兰特温先生从卧室里出现了，打扮得衣冠楚楚，准备出去吃饭。在餐馆里舒适地坐下后，他看了一下菜单，在点菜以前，却向我提出一个奇怪的问题：我带的钱够不够？他口袋里是空空的。为什么？在适当时候他会解释的。我向他保证付帐毫无问题，他这才点了一顿精心挑选的饭菜，还选择了一瓶长颈瓶的精美的白葡萄酒——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尝到英语称之为“霍克”的来因酒。

吃饭的时候，我很想设法找个空隙谈谈正事。奇怪极了，虽然此人行为怪诞，对自己资产阶级趣味甚为得意，我却对他不抱任何怀疑了。现在我很想搅扰一下他的思路。他不愿透露真情，我就再问到私人问题上来：他在来墨西哥以前知道我什么情况？他的干脆回答是这天晚上最令人惊异的话：什么也不知道。他已往从未听说过 M.N. 罗易这个名字。这岂止是惊异；简直是当头一棒啊。我泄气极了。我似乎模模糊糊地

认为，一位重要的布尔什维克从俄国直接来此要找我处理什么重要事务。肥皂泡破灭了，我马上恢复了平静，问他为什么到《先驱报》办公室来问如何能够与我见面。我的语气中一定含有一些质问的意思。他的回答完全文不对题，但却又令人放心。他与我见了面非常高兴，而且相信这次见面会产生重要的结果。他拉着我的手，并且紧紧地握住它。

但是我又追问下去：他刚到这个国家两天，怎么就知道我的名字，为什么他急于要见一个自己毫不了解的人。布兰特温先生笑了，说他在第一次见面时只是想消除他的孤独。这次合乎人情的接触所得到的温暖远比任何人在一个晚上所得到的多得多。可是，在我坚持盘问之下，他将谈谈他是如何找到我的，只是暂时不要问更多的问题。我们会有充分的时间谈论；何必着急呢？

他被迫在一个美国港口登陆。他熟知美国，也有许多朋友在那儿。但是长期住下去不安全。墨西哥是唯一的逃路。他和他的朋友们在墨西哥不认识任何人。他的一个朋友，社会党的一位领导人，曾经给他一个警告，这个警告最后倒成了发现我的线索。那位朋友告诉他，有许多年轻的美国激进主义者已逃到墨西哥；慢慢地他会与他们接触的。但是他必须避开一个名叫盖尔的人。

到墨西哥的第一天，布兰特温先生就找报纸看；报纸全是西班牙文的，只有一份《盖尔杂志》是英文的。他买了几份。看完之后，发现每期刊物中至少有一篇文章是谩骂 M.N. 罗易的，他被称为社会党的总书记。布兰特温先生根据事实材料进行了推论：他被警告要提防一个名叫盖尔的人；现在这可疑

的人正开展一场肆口谩骂的运动，反对一个担任社会党领导工作的人。那么，这位社会党人就是他这一边的人喽，他得跟他取得联系。可是用什么办法取得联系呢？他想，对这个国家的政治还不很熟悉，就直接到社会党的办公室去未免冒险。为了有利工作，他必须保持资产阶级的外表。《先驱报》杂志的英文版给了他一个线索，于是他跟踪前进——最后成功了。

天色渐晚。我们离开餐馆，步行回到旅馆。分手之前，我们约定次日一定再见。在什么地方？他不喜欢这家旅馆；那么他愿意到我家去吗？那儿绝对安全，他会高兴去的。我建议由《先驱报》的一个朋友去找他。不，他宁愿单独见我。我把地址写在一张纸条上，并劝他乘出租汽车。

我回到家中，依然如在五里雾中。这天晚上，与第一个布尔什维克见面的兴奋情绪使我久久不能入睡。我跟他消磨了整整一个晚上，丝毫没有弄明白他的来访目的；不过我感到不虚此行。现在我必须耐心地等待事态的发展。布兰特温先生显然是不会受人摆布的。

26. 迈克尔·鲍罗廷

美国朋友们自然迫不及待地要听我同这个神秘来客交谈的内容。但他们也有点妒忌。为什么我得到这些荣誉，而他们却被排斥在外呢？他首先找的毕竟是他们嘛，他们梦想社会革命已经梦想多年了。第二天我告诉他们，我同布兰特温

先生待了整整一个晚上,但我对他的来访目的还是没弄明白,他们显然觉得我是有意不让他们参与机密。我连忙向他们保证,不管那位新来者是什么人物,我与他们之间的交情仍将一如既往。或许是出于下意识的怀恨吧,他们对革命的轻信态度,似乎已一变而对来访者不找他们采取批评态度了。天生的无产者欧文说,这家伙简直就是一个资产阶级者,不是什么布尔什维克;总之,他架子十足,很不正派。

那位无产阶级诗人说了几句很动听的话,使得我们大家的情绪才好转过来。得了,这个人已经来了,看来正等着我们的帮助和友谊。除非明确证明他是不可靠的,我们就不能太小气了。他实在可能已处于危险的境地,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可不是吗,如果大家都知道有个苏联密使在这个国家里执行秘密使命,他马上就走投无路了。我们承他引为知己,感觉很荣幸,那么,我们就应耐心等待,他将来会如实相告的。在此期间,我们应保守秘密,免得他遭受危险。

我说最后这句话是冲着饶舌的查利说的,因为他会觉得,绝口不谈这样一个震撼世界的新闻是极其困难的。他不可能不对他要好的朋友至少漏出一点明显的暗示,当然,他同时还会警告他们不要告诉别人了。听了我的话以后,查利马上抗议,并且发誓要严格保守秘密。我考虑到应该对他谨言慎行的许诺予以奖赏,同时也为了消除可能产生的妒忌,便建议查利同欧文当晚9点钟左右到我这里来,以便与客人一起进餐。这样我将有两小时的时间,单独与那位客人面谈,从而探听出一些确切的消息。

天黑以后,布兰特温先生才到来,其实这种小心毫无意

义，因为高级的“罗马侨居地”的僻静街道上灯火通明。我从经验得知，长期养成的秘密工作习惯往往把事情做得过分一些。很明显，布兰特温先生已经意识到这第一个谨慎措施毫无必要，接着采取了第二个步骤。我正从客厅窗户往外看，看见出租汽车刚刚停下，一个身穿长大衣、把帽子拉下盖着面孔的人，跳下车来，跑步走进这个小小的院子。不等他按铃，我已经在门口迎接他了。布兰特温先生一边脱大衣一边说道，“这地方多么偏僻；谁到这儿来不可能不引起注意。”我叫他放心，用不着担忧，因为经常出入这所房子的任何人都受到尽可能妥善的保护。我也装起神秘来了，而我的密谋同伙却极力掩饰了他的惊奇神色。

我注意到布兰特温先生还没有付给出租汽车费，就问他是是否有意让车子等着。他说不是，只不过他认为要是在耀眼的电灯光下数钱暴露了自己，那就太不明智了。我是否可以派个佣人去付车费，打发那人走呢？我按铃叫玛丽亚来，请她去处理这件事。布兰特温先生从窗户里看见玛丽亚在大声地对车夫讲话，他认为她不应该当众卖弄风情，招惹一些人。我解释说，她是在责备车夫多要车费。

一会儿，汽车轰隆隆地开走了。我按照西班牙人待客的虚伪一套，请来客在“你自己家里”随意些。他的答复也同样带有讥诮意味：“那么你是不认为这些现代文明是传统的虚伪了？”在我们第二次见面不过几分钟里，我便感觉与那个神秘的陌生人更加气味相投了。他还未坐下来，站在房间中央，以佯为批评实则赞赏的眼光巡视着这间屋子。他仍旧拿着手杖，这使我觉得很不愉快。我认为象他那样的人拄着手杖显

得沒有礼貌。更使我生气的是，他用手杖指点着一个带有绿色缎套的沙发说，这不完全是个无产阶级的住处。我在反唇相讥的答复中也掩饰不住指责的意思：谁告诉过你这是无产阶级的住处呢？事实上，这所住宅是众所周知的共和国总统私人顾问的。那位好嘲讽的批评者听了这话以后明显地露出仰慕之情：那么，除了是社会党的总书记以外，我还兼有那个身份了？好啊，对于一个在外国的青年人来说，这的确是值得赞扬的呢！

这真象击剑比赛的第一个回合；两个互不相识的人都在摸对方的底。最后，我们坐了下来，饮料已经端上，气氛也缓和了。布兰特温先生似乎比较爱说话了，他说他想换个旅馆。那很容易；但是在比较高级的旅馆里，一个外国人如果不干点表面工作，不久就会受到人们的注意。在一个常常遭受外国干涉的国家里，生人是遭到怀疑的。布兰特温先生也认识到这一点；但他再也不能在那污秽的地方住下去了，而且那个旅馆的租价还格外昂贵。最后他大概会迁到一所私人住宅去；那时他必定要冒相当的危险，但是凭着机敏的掩护，危险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

我觉得，当机立断的时刻到了。为什么不在他作出永久安排以前，就邀请这位神秘人物住到这所房子来呢？那样我便有机会就近监视他了。令我非常诧异的是，他竟以毫不掩饰的宽慰态度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请。在此以前，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在待人接物方面相当古板，不大能够痛快地接受别人的礼遇。但在第二次见面的过程中，我对他的了解深得多了。他以一种最冷淡的态度说道，他接受我的邀请的确是颇不寻

常的。但是，正如前天他所谈到的，他遇到一些困难；现在他要把这件事解释一下，聊以表示他的衷心感谢。

他说，他到达墨西哥城时几乎不名一文，也不知道这困境会持续多久。任何人都能理解，一个骄傲的人坦率地说出自己的难处，是一件多么难堪的事啊。然而，这段使人不愉快的真情一经吐露以后，他似乎松了一口气，不再板起临时的庄严面孔，他纵声大笑，虽然还有些很难为情的样子。这样看来，我已搭救了一个自己对他毫不了解的、陷于困境的人喽。我还来得及收回诺言；他不会坚持要我履行轻率的许诺。我知道，他故意以轻率态度来掩饰他的窘迫。可是我想，这是该谈正经事的时候了。于是，我假装为他的献媚的话所激怒，并表示不会被他的言词所欺骗，我叱责了他；如果他原来的住处不合适，我可以设法给他找个较好的旅馆；但是，我热情招待的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我希望在更密切地相处时，他是令人喜欢的。假使我的希望落了空，我会毫不犹豫地要把这位不受欢迎的人赶上街。布兰特温先生第一次尽情地大笑起来，说道：“好极了，真是棋逢对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者对一个印度的唯灵论者！”然后他赶快补充说，他对东方并不了解，只不过在美国居住时，听说过印度人是一个信仰唯灵论的民族。

缺口打开一些了。他在美国居住了多久？他说话时真的略带些美国腔。他抗议说，自己从来不用鼻音说话来破坏“纯正英语”，虽然他在“天府之国”住的时间不短。1905年革命失败后他从俄国移居美国，一直住到1918年才回国。冰已打破了，但是我想，还是以不去追问更多的秘密为好。一方面显示

出自己不好打听，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互相吐露秘密，我对他谈了一些我同墨西哥政府的关系，同时暗示他，我恰巧能够协助任何有益的事业。关于钱的问题，他尽可放心；为了革命我早已储存了一笔款子。这一次，他的脑子里自然也会产生这个念头：应该谨慎小心，不要再问下去了。

门铃响了，布兰特温先生露出不安的神情。我向他保证说，不是外人，而是从《先驱报》来的朋友。他们是比我资格老得多的社会革命家；让我独占与列宁朋友的交往是不公平的。他们应邀前来共进晚餐。我这个策略是为了核实查利所提供的情报，当然这瞒不过布兰特温先生。他哈哈大笑说，“原来是查利传播了什么话啦。”他显然感到侷促不安。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骗人！管他去，真理日后自明。正在这个时候，那对孪生兄弟兴致勃勃地走了进来，气氛转变了。布兰特温先生又恢复了他那开玩笑的心情，问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在资产阶级客厅里都干些什么。欧文给自己斟了一杯酒，作为沉默的答复，然后声言酒是不分阶级的。查利马上支持他朋友的机智，毫无关联地说，列宁不是第一个使用德国金钱来接济革命的人：罗易在他之前就这么做了。我叫他们别说了，又叫玛丽亚开饭。

按照吩咐，玛丽亚已准备好一顿传统的墨西哥饭菜。她知道来的将是一位贵宾，便使出了全付本领。就我所知，她拿手的几样饭菜在墨西哥可算是首屈一指的。但是，布兰特温先生对这位女厨本人比对她的烹调术更感兴趣。为了这次不寻常的宴客，她也沒有因为对烹饪术的全力以赴而忽略了在卖弄风情上下功夫。事后，布兰特温先生向我吐露，当她宣

布“先生，汤已上席了”（宣布开饭的西班牙方式）的时候，他不知道是邀请他去拥抱她，还是邀请他去吃饭。饭菜做得太不合欧洲人的口味了；我告诫布兰特温先生必须学会吃墨西哥饭；否则就会饿肚子。玛丽亚是绝不让步的。他的回答很豪爽，只要是玛丽亚的手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毒药他也要吃下去。

饭后，我们又聚集在客厅里，查利同欧文听说次日布兰特温先生将搬来和我住在一起，都感到相当惊讶。天真无邪的查利无法抑制他的妒忌心，大声嚷道，“哎呀，你把这条大鱼拉上岸啦！”我安慰他说，这要归功于他用了诱饵哩，那条“大鱼”在一旁表示默认。我又答应查利，按照孟加拉的风俗，宰鱼时他将得到鱼头。可是，那个未来的牺牲品对我们的分赃计划似乎毫不在意。在随后的那段轻松愉快的谈话中，他给我们讲到俄国局势的梗概，但当我们迫使他说得再详细些时，他恳求等时间充足时再讲。夜已经深了。我让玛丽亚打电话叫辆出租汽车，并要那对孪生兄弟陪着布兰特温先生回旅馆去。约定次日晚上我去接他，他得作好搬出旅馆的准备。

我去时他正在等我，身边有两个大箱子和好几个手提箱。——一个做秘密工作的旅行者有那么些行李未免太多了。他稍带歉意地解释道，他的旅行目的和环境要求他必须有精心的伪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是对的。但是他显然做得有点过分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逐渐了解到，以秘密工作为借口，过着资产阶级的奢侈生活，是俄国一般布尔什维克的通病。这或许是自卑感的一种表现——在这方面无产阶级革命家与资产阶级标准比较起来是毫不逊色的。

不过我还是要来帐单,付了款,吩咐把行李送到楼下。当我们乘坐的出租汽车开动时,我注意到查利乘坐另一辆汽车,在马路对面尾随着。这个忠义之士想要帮助我安然渡过险关,据他推测这次行动可能会有危险。但他十分通情达理,走到半道,他认为我们已经到达安全地带时,便离开了。到了家,正在把行李运往楼上他住的房间时,布兰特温先生问道,在墨西哥外国人是否必须登记。假使要登记的话,他的名字叫格鲁曾伯格,是奥地利律师,在美国曾住过多年。我说不会有人来查问我家的住客,他便说了下面使我大吃一惊的话:不管怎样,别再使用布兰特温这个名字了。如果不需要向警方登记,就叫他迈克尔·鲍罗廷,他到新大陆来担任新建立的共产国际的第一任使者。

我和鲍罗廷的交往就这样开始了,他后来由于在中国的活动而成了一个有名的人物。自从我们在这奇妙的环境下相遇以来,一直到1929年我离开俄国为止,鲍罗廷始终是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虽然在政治方面我们经常争执得很激烈,象最后在中国所发生的那样。那是一种双方都互不抱任何谬想的人情交往。我们互相学习;一开始,我是受益者。他把黑格尔辩证法的复杂理论传授给我,作为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钥匙。我对印度特殊精神的残余信念,在我向他学习欧洲文化史以后便逐渐消失了。

27. 沙皇珠宝的故事

搬来后的第二天，鲍罗廷稍稍向我透露出一点他的访问秘密。他也告诉了我一些关于他自己的事情。1905年革命后，他从俄国移居到美国，一直在那儿住到1918年才回去。他在美国学习法律和哲学，以后在某所大学担任教学和从事研究工作。他不愿谈得更明确一些；我也没有追问下去。以后我从经验中才逐步了解到，他保守秘密虽然常常过分，但这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第二天性。最初，在国内外搞秘密活动的岁月中保密可能很有必要。但后来，大概为了引起人们的重视，便培养成为一种革命的美德了。

不久我便发现，尽管我的贵宾具有值得称道的卓越智力和文化教养，却是一个装腔作势的人。因为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我毫不掩饰我对他的品质和性格的评价。他却说，象我这种年纪，有点太爱冷嘲热讽了。

鲍罗廷是在美国结婚的。他的妻子和两个相当大的孩子还住在芝加哥。他显然很难为情地向我吐露说，他从一年前回俄国以来，不知道他家里人是怎样过活的。他如果返回美国，第一件事就是到芝加哥。但唯恐把这种恋家情绪表白出来，有损于他对革命任务的坚定忠心，他很勉强地说了一些话，这些话显然至少当时他是不想说出来的。他带着一大宗值钱的东西来到美洲，他说到这里又吞吞吐吐起来了。他本人不便随身携带，便委托给一个可靠的信使，交给芝加哥的格鲁曾伯格夫人。

看起来鲍罗廷所谈的那些话已经超过了他想谈的，而一言既出，就无法收回，他只好把我当做知心人了。他住在美国时，名叫迈克尔·格鲁曾伯格，这是他在一个希伯来牧师家庭降生时所取的名字。他又透露说，列宁认识他时，他用的就是这个名字。我对他越了解，就越强烈地感到遗传已在鲍罗廷的头脑里留下一个不易除去的印记。他生来就是一个犹太法学博士——一个聪明的诡辩家，狂热地献身于他所信仰的教条（布尔什维主义），却没有丝毫道德上的顾忌。他那刻苦养成的理智主义，使他成为一个愤世嫉俗的人。这种理智主义并不能完全消灭感情主义这一民族特性，虽然他能成功地控制住感情，只有很少几次他差一点哭了。这很少几次大都只是在他和我个人联系时，我每想到这一点便感到愉快，因为那种情况使我们在交往中减少了我的失望和他的痛苦，从而增进了我们的友情。

鲍罗廷在纽约登陆后，立刻被美国特务机关发现是个危险的外国人。他不能去探望他的家庭，否则就会暴露那位送交珍贵物品的信使。如果他去探望的话，他的家庭就会受到监视，而那位信使最后来交付珍贵的物品时，也会被人发现。他给他的妻子写了一封信后，就在纽约等待着，后来又不得不逃走以免被驱逐出境。那位信使到达他妻子那里时，要她马上写信报告他。她知道他已经逃到墨西哥了。每天他到邮局去，就是盼望收到她的来信。这件事情的叙述使我明白了，为什么当鲍罗廷在邮局发现没有他的信件时，他是那样的沮丧。两天前，他收到她的一封来信。那是一封诉苦的信。自从他去俄国以后，全家一直没有任何谋生之道。

我想，一次谈那么多足够了。这个自负的人显然有一段很不愉快的经历。他可能还有其他义务和革命任务，使他不得不放弃对家庭的忠诚。但是迄今为止我完全不了解究竟是些什么义务和革命任务。当前，他显然很想写信安慰他那仍陷于穷困之中的妻儿。甚至布尔什维克有时候也屈服于人类的弱点呢。我换了个话题，让那个痛苦的人在饱餐一顿、喝了几杯好酒以后睡一觉。第二天，我们一道去邮局寄了五百美元给格鲁曾伯格夫人。鲍罗廷起初试图反对，但是他在说我是个独裁者以后就让步了。

第二天晚上他继续讲下去。他说，我已经解除了他的最小的烦恼。他又连忙感谢我对他的支援，但他不能期望我做更多的事情。他还有更重大的责任，但在那位神秘的信使带着宝贵的物品露面以前，他是无法履行那些责任的。我说我不想打听那位信使的情况，但我表示，只要他大致谈谈他那更为重大的责任，而且假如我所支配的钱足敷应用，在他期望中的更大的财富到达之前，也许我可以帮助他去履行责任。我本能地感到那是革命的需要，而且我非常高兴能有机会至少部分地有助于满足这种需要。鲍罗廷对于我的援助能力抱有怀疑；但又不能拒绝我那显然是诚恳的提议，否则就对我失礼了。就这样，他进一步把我当作革命知己，谈了下面的事情。

1918年年中，俄国布尔什维克政府派遣一个贸易代表团到华盛顿。根据威尔逊总统派往俄国的特使威廉·布利特的一份对俄国有利的报告，美国政府给予苏维埃贸易代表团事实上的承认。从那以后，俄国爆发了内战，协约国积极干涉，支持了革命的敌人。布尔什维克俄国四面都受到封锁，那个

在华盛顿的贸易代表团同在其他国家的代表团一样，与国内断绝了一切联系。它暂时依靠美国朋友和同情者的经济援助来维持，但最后还是在一个费用浩大的、敌对国家的首都陷入了困境。

这个令人苦恼的消息传到了莫斯科。这是个有关威望的问题。只要在华盛顿的那个贸易代表团享有美国政府事实上的承认，那就必须送去足够的经费以维持开支。但是怎样送去呢？国际银行机构都拒不承认俄国新政权，也不让外交信使办理这项业务。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偷运。鲍罗廷在美国居住了多年，因此被挑选来从事这个孤注一掷的冒险。他必须把大量皇家珠宝偷运到美国。当然，这批宝贵的货物还得非法售出。那些收入首先用来解除贸易代表团的困境，其余用来资助美洲的共产主义运动。但在最后一刻计划失败了；鲍罗廷为了保全他的宝贵信托物，不得不暂时放弃它。他似乎很有把握收回它，不过那需要相当时间。目前他必须先汇一些钱给那些在华盛顿受困的人们。

我又一次抑制住了好奇心，表示我愿意帮忙，为革命事业作些贡献，希望以后再了解整个情况。鲍罗廷又惊又喜。他问我能拿出多少钱？他那样一个既有修养又守口如瓶的人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真有点轻率。我硬是要他说出个数目，并且向他保证这笔款子将能象邮件那样迅速到达华盛顿。第二天汇出了五万美元，并告知第一笔汇款收到后，另一笔同样数目的款项随即汇来。这是通过墨西哥外交渠道转寄的款子，非常顺利，几天之内我便完成了对革命事业的第一次贡献。

自从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来，俄国黄金运到世界各个

角落去，或远或近，以推动共产主义运动。可是这一次运送的方向却是相反的；为了资助找回鲍罗廷失去的皇家珠宝这个冒险行动，我在汇出第一笔款项之后，又连续汇去几笔较大数目的款项。

初步的经验看来已使我的客人相信，他设想在异乡也许可以取得我的帮助一事，已经侥幸成功了。虽然这很象谚语所说，快淹死的人连一根草也要抓住，鲍罗廷却认为他之所以能够发现我，是由于他逻辑思考的结果。每当讨论到这些论点时，鲍罗廷总是自命不凡，我则将他比拟为梅雷迪思^①笔下的“利己主义者”。他对这个比喻并不生气，因为在哲学上和嗜好上他都是一个享乐主义者。无论如何，由于对一个新友人的信任，他不再沉默寡言了，那位革命的同谋者变得爱说话了。当然，我也必须知道丢失皇家珠宝的整个情况，才好设法把它们找回来。

那时，苏维埃外交人民委员会同共产国际是密切合作的。外交副人民委员卡拉汗和共产国际书记安捷里卡·巴拉巴诺娃都是鲍罗廷的老朋友。他们选中鲍罗廷到新大陆去执行秘密使命。这使命就是私运价值一百万卢布（按照当时兑换率大约五十万美元）的皇家珠宝。那些宝石都缝在两个结实的手提皮箱夹层里。鲍罗廷带着提箱经由欧洲（用化名和假护照）到荷兰，地下的共产国际西欧局便设在那里。西欧局的委员——著名女诗人亨里埃塔·罗兰-霍尔斯特；著名的工程师拉特格斯；律师兼议会议员威吉库普——都是有影响的社会

^① 梅雷迪思(George Meredith, 1828—1909)，英国作家，《利己主义者》是其著作之一。——译者

知名人士。天文学家安东·潘尼凯克同作家赫尔曼·果特都是当时第一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他们的帮助下，鲍罗廷打算乘一艘荷兰船横渡大西洋，以避开当时非常严格的海关检查。

在维也纳时，鲍罗廷和一位曾在战败的帝国军队中担任军官的年轻奥国贵族交上了朋友。这个年轻贵族感到灰心、失望和痛苦，想离开他相信注定要毁灭的欧洲，而移居南美，在某个偏僻的庄园去寻求独居的宁静。他与鲍罗廷一道搭乘一艘荷兰货轮横渡大西洋，那船是驶往西印度群岛的库拉索岛去运回杜松子酒的。在途中，海地的美国海关官员扣留船只并进行搜查。鲍罗廷与其同伴作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被带下船去，拘留起来，进行审查。几天后，由于美国人的警惕性放松了，鲍罗廷设法逃出，乘一艘帆船到了牙买加。他又从那儿搭船到了纽约。他的目的在使自己招致嫌疑，这样就可使那位奥国退职军官得到释放。提箱留给了奥国退职军官，一旦他恢复自由获准旅行时，就可以把手提箱交给芝加哥的格鲁曾伯格夫人了。

在这期间，鲍罗廷打算在珠宝到来之前在纽约做好必要的安排，以便秘密售出。他在纽约有些老朋友。东部犹太人区便是社会党的社会基础。通过信仰社会主义的当铺老板的媒介，宝石可以偷偷运回阿姆斯特丹加工琢磨，准备在巴黎抛售。但是，刚在纽约登陆，鲍罗廷便被发现并被逮捕了。犹太人团体不仅向社会党提供由当铺老板与大西洋彼岸联络的秘密关系，而且还提供了聪明能干的律师。不久，鲍罗廷便被保释出来了。他接受了法律界和政治界朋友们的劝告，逃出美

国，到墨西哥避难。他没有向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吐露秘密，只是说这次他是负有重要使命回到新大陆来的，并说不久他们就会收到他的来信。他从海地出发最后一段旅途的情况，就足以说明为什么他到达墨西哥时已一文莫名。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如果要找到“革命财产”（我们一致认为，必须找到），那还会遇到更多的危险。鲍罗廷急着要派遣一个可靠的人到海地，探明那位奥国贵族是否还在那里，然后设法帮助他带着手提箱逃走，或者不管他默许与否，把手提箱偷走。

经过打听，我找到一个老党员，他受雇在一艘开赴西印度群岛的墨西哥船只上工作。在取得部分老党员的信任后，我探知那个水手是个具有钢铁意志而热中于冒险事业类型的无政府主义者。不到两个月的工夫，水手回来报告说，那个奥国人仍在海地，但是已经不再受警方监视了。他以隐士的身份住在海滨的一所茅屋里。水手的报告使鲍罗廷很烦恼。那个人为什么不去芝加哥送提箱呢？他不知道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因此不可能偷走那些宝贝。这一切简直叫人百思不得其解。我们必须另派一个人到岛上住一段时间，以便打听提箱的下落。经过几个月的惊险活动以后，终于发现那个奥国人被释放时，他把提箱丢下了，因为对于一个即将成为隐士的人来说，提箱并没有什么价值。

鲍罗廷当然十分恼火。不过，在此期间他还是制订了更大的政治计划，而目前美洲革命运动的经费，一部分是出自我所掌握的款项。这使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安慰。他在回到世界革命的总部时，可以写一份象样的政治报告了。我就是

报告中的一个部分。

找回珠宝的冒险并未马上成功；但鲍罗廷并没有托错了人。那位旅伴终于亲自将宝物带来了。他不是一个傻瓜。在和鲍罗廷一起旅行几周的时间中，他必定已经察觉出这个人的思想和关系。正如俾斯麦所说，在击败的德奥军队中有许多痛苦的青年军官都向往俄国。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他们是“民族布尔什维克”，甚至准备与魔鬼联合在一起报仇雪恨。我们不断地询问提箱，并且不惜一切代价要设法找回来，这件事必定引起了他的思考。任何人都不会为损失两只质量虽好但很普通的提箱就这样烦恼，而且冒很大危险要把它们找回来。那两只箱子一定有特殊意义和价值。那时候欧洲到处都流传着布尔什维克偷运皇家珠宝换取现钞的故事。那位贵族愿意忠于他那萍水相逢的友谊。岛上美国警察机关认为他是个怪人，而且他又取得当地黑人的信任。他打听清楚当他被监禁时，提箱一直被搁置在一旁，无人过问。美国海关官员们待遇优厚，不在乎赃物。于是，在他们的黑人属下的帮助下，他重新得到了那两只箱子，并搭乘第一艘轮船去一个美国港口。当局并没有去注意一个“神经不太正常的人”的行动。

这时我们已到了莫斯科。鲍罗廷将面临最恶毒的控告；在那个时候，“革命审判”是迅速的，残酷的。我对革命事业的第二个贡献便是拯救了鲍罗廷的生命。由于我的作证，他被免罪，并且不久格鲁曾伯格夫人打来了报告，确证那位旅伴终于送去了上述宝物。她接到通知，要她马上携带提箱到莫斯科。箱子里面的东西原封未动。要不然，那长长的死亡者名单上也许又增添了一个无辜的新鬼。但是，就连残酷的革命

队伍中也难免出现因果报应的审判。那个想把可怜的鲍罗廷置于死地而后快的人，因为我反对他那杀人为乐的行为，对我也耿耿于怀。多年之后，作为季诺维也夫的追随者他被枪决了。事实上，他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最恶劣的典型。

28. 在俄国之外的第一个 共产党组织

鲍罗廷的来访，要保守秘密是很困难的。我们不让报纸登载这条新闻。但是我们必须向某些社会党党员透露机密，因为要设法找回丢失的革命财产，不能没有他们的合作。一个布尔什维克的使者，作为总书记的客人来到了那个国家，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慢慢地从社会党的队伍里透露出去了。大家要求召开一次党的非常会议，来确定党对俄国革命的态度，并发表一个关于社会党加入国际机构的宣言。党的执行委员会特别为了介绍鲍罗廷而召开一次秘密会议，由我把鲍罗廷介绍给大家。在那次会上，鲍罗廷感到很为难，谢绝发表任何讲话。

我代表鲍罗廷说明了他的访问目的：这是一次探索性的访问，目的在宣布第三国际的成立，第三国际恢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用的“共产主义者”这个字眼，使它和改良主义者的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假革命左翼区别开来。新的国际成立

大会已于 1918—1919 年冬季在莫斯科举行。除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外，各社会民主党的左翼代表和独立的革命左翼团体的代表，如德国斯巴达克同盟的成员，都参加了共产国际代表大会，那次大会决定在全世界各国组织共产党。但是截至 1919 年年中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组成了共产党。忠于革命传统的墨西哥为什么不带头呢？这引起了极其兴奋的狂热反应。经我提议，决定召开一次社会党及其联合组织（同情俄国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特别会议，在俄国之外建立第一个共产党组织。

鲍罗廷非常高兴，想把那个消息发给世界革命的总部。他到美洲的使命正在开花结果。但是，如果没有墨西哥政府的帮助，那是办不到的。在那些日子里，俄国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不通邮政。传送消息去莫斯科的唯一道路是通过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因为墨西哥在那些国家派有外交使节。但是，除非共和国总统下令，那条渠道不能为我们的革命目的使用。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微妙的问题。出于机会主义的理由，或者为了阶级的团结，卡兰沙是亲德的。但是，我能期望那位殖民时代的贵族厌恶协约国而帮助布尔什维克吗？我决定采取抓角擒牛的办法。

德国失败后，卡兰沙总统处境困难。他在对抗强大的邻国方面已不再有任何盟国了。想要调解他和美国的关系，也已为时太晚。他已经破釜沉舟，他必须坚守阵地直到最后。奥夫雷贡在那个强邻的保护之下，准备公开发动战争。卡兰沙在这种绝境之下，可能欢迎与俄国新政权建立同盟。但是，俄国能够给他什么样的具体帮助呢？虽然如此，在鲍罗廷的

同意之下，我计划使他和卡兰沙总统会晤。卡兰沙欣然接受了出席宴会的邀请，在那次宴会上，我的一位最近来到墨西哥的朋友将被特别引见给总统。其他客人有国民议会议长唐曼努埃尔、大学校长卡萨斯先生和外交部长。

鲍罗廷在那个场面上应付裕如，他给总统和其他贵宾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他们会见了这位很有教养、自称布尔什维克的人，都感到惊奇不已。鲍罗廷声称俄国新政权完全同情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斗争，而且渴望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支援这种斗争。因此，只要共和国总统阁下同意，就应该在墨西哥建立共产国际拉丁美洲局。由我来主持拟议中的那个机构，组织对美帝国主义的抵抗。

卡兰沙眼见他梦寐以求的拉丁美洲同盟，将以另一形式成为现实。他不愿坐失良机，就请鲍罗廷向俄国新政府元首转达他的致意。对卡兰沙来说，他那种说法也许不过是句客气话。但他在外交部长和国家立法部门的负责人面前这样表示，也可以视为对俄国新政府事实上的承认。在事后的谈话中，那两位高级官员暗示说，本来的意图就是如此。

鲍罗廷觉得，他获得了一次外交上的胜利，这件事情将会提高他在莫斯科的威望。外交部长把总统在宴会上的客气表示视为开了绿灯，于是就给予鲍罗廷通过墨西哥驻荷兰公使馆与共产国际西欧局取得联系的便利。由于墨西哥政府的关照，他也能够经由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直接同莫斯科接触，事实上那些国家已同莫斯科新政府有了外交关系。鲍罗廷报告了他在外交上的成就和原定使命的失败，但也提到他正在尽一切可能去寻回失物，以及最紧迫的需要已经从当地的意外

财源中得到了解决。

当鲍罗廷向莫斯科写那份由我通过墨西哥外交部转发的报告时，他又恢复了那遮遮掩掩的习惯，有时近乎摆架子了。他从不把报告拿给我看，也不同我商议。我只能猜测他写的是什麼。我猜测的线索就是，他先前的沮丧和忧郁心情已被高兴和乐观的情绪代替了。现在，他经常谈到他在莫斯科的朋友，并且想象他们对他的报告如何反应：列宁会打电话给卡拉汗，询问在墨西哥的 M. N. 罗易这个人；或者列宁会通知巴拉巴诺娃，要她邀请这位印度的马克思主义者到莫斯科。

我对这些想法有什么感觉呢？当然很有诱惑力啰。但是，我也想给鲍罗廷来个同样报复，让他猜测我的意图。我假装怀疑我去莫斯科有什么作用。我到那里干什么呢？我留在墨西哥能为革命做更多的事情。工作开始了，必须干下去。成立一个共产国际拉丁美洲局对于革命是很起作用的。它能发展成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有效工具。我已劝说卡兰沙政府支持那个计划，并已做了许多艰苦的准备工作。我在这个当口离开墨西哥，很不合适。我不愿不忠于这个慷慨招待我的国家。欧洲大战一结束，美国人是一定要跟卡兰沙政府算帐的，因为他们企图以门罗主义为手段对美洲进行统治，而卡兰沙政府曾经从中作梗。卡兰沙之所以陷入现在的境地，我应该负很大一部分责任。最近的将来，他也许要为自己的生命及其国家的自由而战斗，我必须在这儿支持他。以往我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办事的；现在我能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继续干下去了。

改造社会党的计划还有待实现。我对那个问题不很乐

观,肯定有人要反对的。例如,卡耶斯就不愿因称自己为共产党员而使他继任共和国总统的希望受到不利影响。如果卡兰沙的态度公开表示出来,许多料想得到的对抗便会消除。但是,我们不能对他要求过分,那样做是有勇无谋,简直等于自杀。美国人对墨西哥的一个亲德政权曾经容忍下去。但是,一个同情苏俄的政权,对他们就会象摆在公牛面前的红布。欧战结束以后,美帝国主义一有借口就会对墨西哥实行军事干涉。

由于这些原因,共产党就不可能象社会党那样得到半官方的赞助。此时此刻,我也不愿意在改造社会党成为共产党的问题上,使社会党本身发生分裂。从实际效果看,在一个国家的特定情况下,社会党的纲领在革命性上并不次于共产主义者所鼓吹的纲领。因此,只要忍耐一些,手腕圆滑一点,再加上幕后操纵,社会党便可以避免分裂。那样的话,在俄国以外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从它诞生的那天开始,就会是墨西哥政治生活里的一个有力因素。

共产国际拉丁美洲局是社会党发起的,它沿用社会党的动员说西班牙语的美洲各民族起来捍卫国家主权和社会正义的政策,它虽未受到民主的墨西哥政府的公开赞助,但在物质上却受到支援——这样,共产国际拉丁美洲局就能成为一个促进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强有力的工具。美帝国主义毕竟是共产主义最大的敌人,甚至共产主义要想在东半球取得胜利,也必须先打倒美帝国主义。

我在为我的立场辩护的时候,鲍罗廷非常惊奇,而且毫不掩饰地表示钦佩。我们对这个问题一直讨论了好几天。他是

一个出色的健谈者和多才的辩论家。我猜到了他的心事，但他还要不必要地保守秘密，这使我很恼火。他知道他可以信赖我。但他为什么要旁敲侧击，而不直接告诉我他也许已经收到莫斯科对他报告答复的内容呢？他很可能已经接到指示，要我去莫斯科。我为我继续留在墨西哥的立场辩护，目的在于迫使鲍罗廷摊牌。我的狡猾策略到底奏效了；同时我也被自己的有力论点所感动。因此，鲍罗廷为了使我抛弃己见，接受陪他去莫斯科的建议，不得不多说了一些他本不打算说的话。他必须以那边有更为令人振奋的工作前景来引诱我。但他也希望我们必须把目前在墨西哥的工作计划完成之后才离开。我是为了追求更有诱惑力的冒险事业，他呢，为了报告原有使命的失败已从意外的政治成就中得到了补偿。就这样，我们对于将来的活动取得了默契，然后就着手建立除俄国以外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的计划了。那件事情本身就是国外的任何布尔什维克使者值得夸耀的。

进行计划之前，我同唐曼努埃尔商谈，并从外交部长那里得到确证：可以允许共产党存在，其条件是，避免一切可能使本国政府与北方强邻的外交关系引起纠纷的挑衅性活动。他进一步透露说：他的政府希望筹划中的共产国际拉丁美洲局将在拉美同盟的帮助下暗中发挥作用，以便促进拉美同盟目标的实现。那是一个明显的暗示：这番话要不是得到总统的同意，他是不可能说出来的。这就意味着，如果新的俄国政权指挥它在墨西哥的支持者采取合理措施，谨慎行事，那么两国间的合作就会得到保证，为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做好准备。

我和唐曼努埃尔还商谈了有关象卡耶斯那样人物的态

度，他们怀着机会主义的动机已参加了社会党，可能不会再前进了，否则就会不利于他们的个人野心。我更关心的倒是其他人的态度，他们对社会正义感的表白，毫无疑问是真诚的，他们加入社会党，不是出于自私的动机。社会党中的无产者，即顽固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党员，认为：已经到了分道扬镳的时候了；他们硬要对这一问题作出决定。我和少数几个头脑比较明智的人却有不同的想法。如果不要共产党成为政治上软弱无能的宣传团体，那就一定不要在它诞生之时因那些社会正义的忠实鼓吹者的公开反对而受到削弱。这些社会正义的鼓吹者也许对于赞成一个激烈内战的纲领还没有思想准备。唐曼努埃尔是许多社会党党员和它的同情者的领袖，我不想对抗他们。同时，他们不愿加入一个从事暴动与内战计划的组织，这也不能说成是反革命，或者小资产阶级的卑怯行为。

唐曼努埃尔答应帮助我摆脱那进退两难的困境。他同几个亲密朋友讨论了那件事情以后，将在一个有关小组里宣布：社会党在唐贝努斯蒂亚诺的同意下将改组为共产党，实际上仍继续执行旧的政策，虽然有时它的公开宣言的文字也许会激昂慷慨、令人动听一些。他向我保证：社会党改换名称，加入新成立的共产国际，是不会遭到公开反对的。

社会党非常会议开会时，由我担任主席。我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在墨西哥旅居两年半中第一次勉强同意出头露面。不仅左派中的激烈分子必须加以控制而又不惹怒他们；更值得重视的是，得向政府和许多革命社会主义的“同路人”保证：会议作出的词藻华丽的决议，并不真正标志同过去决裂。

议事日程的第一项就是研究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那个宣言提醒全世界工人阶级要想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的最初宣言中的响亮号召。所以，任何自称是忠于社会革命事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能拒绝赞同新的宣言。

我怀着真诚的信念辩论说：墨西哥社会党由于它的革命纲领的规定，不能不赞同《新的共产党宣言》；而变更党的名称的决议，也就是表示赞同《新的共产党宣言》的必然结果。两个决议都用口头表决方式通过了；不过也只是改变了党的名称而已。这个共产党依然遵守那个已不复存在的社会党的革命民主主义纲领。

这样，我们所担心的“机会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会反对的局面不再存在了。根据默契，卡耶斯被调离首都去处理紧急的行政事务。在充满无产阶级激情的狂热气氛中，“要人”的缺席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共产国际书记处发来的贺词是大会最精采的部分，那是鲍罗廷和我商议以后草拟的。它概述了共产党支持被压迫和被奴役民族反帝斗争的政策。那一政策在一年以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作了精辟的阐述。

墨西哥共产党成立大会既然已经宣布加入共产国际，自然决定要派遣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团的组成没有公开宣布。在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合法地到俄国去。但是，在党的执行委员会主要委员的赞同下，鲍罗廷一直坚持由我担任代表团团长。因此，按照先前的商定，我暂时接受不能继续充当共产党总书记这一请求，并选出一个代理总书记，但附有默契：我应当在

事实上继续担任那个职务，直到我果真出国为止，在此期间我要培养我的继任者。

大会结束后，鲍罗廷一连几天关起房门在打字，一打就是好几个小时。我焦急地询问他那神秘的写作到底是什么性质。他回答说：他正在写我刚刚创造的历史呢。在他给莫斯科的报告发走后的当天，他郑重其事地邀我晚上去喝酒。但是，若说是请客喝酒，他那样的神情就显得过于严肃了。这种不协调之所以出现，不多一会儿就弄清楚原因了。他顺口说出，他得赶快回欧洲，要我也随后跟去。那是莫斯科最近的指示，在党的会议召开前几周就已经收到了。那么，他为什么定要我猜测那样长的时间呢？无论如何，我是不能去的，理由已经说明了。他哈哈大笑说：“布尔什维克不准争辩，只有服从纪律。”他的神情立刻又严肃起来，补充说：“不要忘记你自己的国家。莫斯科就在你的征途上。”一个全新的景象突然闪现在我的脑际。这是我生活中的一个新篇章。

29. 准备朝圣

自从三年多以前离开中国以来，我和印度断绝了一切联系。在美国的时候，我还渴望实现我离家时所负的使命，因此多半跟印度人来往。但是，如前面所暗示的，这既不是一种有效果的，也不是一种愉快的来往。到墨西哥以后，我便和印度完全失去联系了。两年以来，可以说我没有得到一点消息，对

于国内可能发生的事情我全不知道。我也不太关心国内情况，因为我已经认识到我早年的眼光很浅。不管怎么说，坐在地球上与自己家乡相对的地方，悲叹自己未尽爱国天责，总是愚蠢的。我已选择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活动范围，去追求一种新的革命理想，而这段经历是令人满意的。

1919年夏天，我觉得我离开墨西哥的时刻已经到了，正如我离开我的故乡时一样。我在新的冒险事业的诱惑之下得出那样的结论，心情并不是轻松愉快的。墨西哥还有许多冒险的机会。局势正向重起内战的方向发展，看来对卡兰沙政权颇为不利。假设我有机会给他任何有价值的帮助，我肯定就留下了。凡是我可能做到的，即使我本人不在，也还是能够做到的。作为两年工作的具体成果，已经完成了那么多的事情。民主的中产阶级，跟工业无产阶级一样，对于国家的政治命运不再漠不关心了。他们有抵抗外国直接或间接干涉的决心。奥夫雷贡所领导的对卡兰沙政权日益增长的反抗，是得到美国既得利益集团的保护和物质上的援助的，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因此，自从1911年弗朗西斯科·马德罗^①倒台以来，再没有任何一个墨西哥政府比卡兰沙政府享有知识阶层的更广泛的支持了。这个成就主要应归功于改组后的社会党的现实主义政策。的确，群众的情绪与其说是支持卡兰沙，还不如说是反对美国呢。无论如何，那种情绪要左右武装夺权的斗争是办不到的。但它终于显示出了力量。尽管有美国的赞助和支持，奥夫雷贡掌权并不长久。在卡耶斯的领导下，

^① 弗朗西斯科·马德罗(Francisco Madero)，1911年10月—1913年2月任墨西哥总统，本书中的“1911年”可能有误。——译者

国民革命党接受了原先为社会党后来又为共产党所拥护的激进民主主义纲领。这就结束了奥夫雷贡的短命军事独裁，而在多年混乱之后给墨西哥建立了一个文官政府。

我已经帮助他们朝那个方向铺好了一段路，现在我留在墨西哥也不能再做更多的事了。如果我听从鲍罗廷的劝告，离开那个国家，除了满足自己的心意，另寻一个更广阔的活动范围之外，还可以附带帮助卡兰沙政权，提高其国际地位。但是，我必须清除许许多多的心理上的保留以后，才能采取断然行动。我想到这次回印度的途中，不仅带着武器，而且还带回了用那些武器去实现的一个明确的革命纲领，这个想法自然使我兴奋极了。能有机会访问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还可能有幸参加迫在眉睫的内战，这些也都是诱人的经历。

但是，鲍罗廷关于“布尔什维克不准争辩，只有服从纪律”的话，却使我生气了。他察觉出我的反感，便尽量造成印象，表示他是在开玩笑。后来当我坚持要求澄清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位布尔什维克便不得不为他的信仰辩护——党的不容争辩的权威和革命的职责使党员绝对服从纪律。在我看来，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信仰有一种宗教式的热情，同它的唯物主义哲学并不协调。我的布尔什维主义老师以慈祥的态度笑我太天真了，他同意把革命信仰的奥妙传授给一个自愿入门的人，并引导我去领略那革命信仰的哲学背景中错综复杂的迷宫。这是对我的婆罗门教传统的一个理性挑战，而且正如我不久所发现的，也是对仍然残存在我下意识中的顽固的文化上的民族主义的一个理性挑战。作为一个热诚的革命者，我

是自愿投师来的，但我也是一个有理性的人，一心要独立思考。一个天生的异教徒接受一种新信仰，即使是唯物主义与无神论的新信仰，要比《圣经》上所说的骆驼穿过针眼还困难。这是我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一次抗拒。

企图找回失去的珠宝不是一件很快就能办到的事。我们不得不耐心等待好几个星期，才来了一点关于进展或遭到挫折情况的报告。在俄国之外建立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的消息，除了在美国黄色报纸有骇人听闻的标题之外并没有引起更大的轰动，这倒是出人意料的。总的说来，在墨西哥的反响良好。甚至奥夫雷贡派的报刊，也没有试图引起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恐怖感，以便从中捞取政治资本。墨西哥的每次内战都是用土地革命的口号发动的。这也是共产党从社会党接受下来的当前纲领内的中心内容。除了编辑党的机关报和不时出席公开大会或秘密会议以外，我没有很多事情要做。我有许多闲暇。那些时间我都用来天天跟几个选定的朋友讨论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讨论则仅限于我和鲍罗廷两人。我们的讨论往往从晚饭后开始，一直继续到深夜。这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段时间。后来我的理智发展的基础，就是在我动身去莫斯科以前那几个月中奠定的。

我们时常中断讨论，遐想我们已经到了中亚。鲍罗廷承认他不知道划分欧亚大陆的乌拉尔山和乌拉尔河另一边的情形。革命以后，广大的中亚沙皇帝国和宗主国俄罗斯的联系被切断了。但是革命也一定会传播到那里，最后传播到印度边境。一种新的幻想，实现我在1915年初离开印度时所负使命的幻想在我的心目中展现出来了。我只是不愿经过东北路

线而愿经由西北路线回印度。我当然很想把好消息传送给印度的朋友们。但是却无法办到。令人苦恼的思想涌上心头：他们可能在干些什么？他们中间还有多少人仍然活着？直到几年之后，我才知道这些情况。

这时，我不得不打断浮想，强忍悲痛。眼前还有许多困难要克服呢。我一定不能忘记对墨西哥的责任。一个加强国际联系以抵抗美国敌对行动的计划，必须制订出来。横渡大西洋也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直接从墨西哥往欧洲去的客轮不多。通常的作法是先到纽约，再从那里搭乘横渡大西洋的轮船。那条路线对我来说行不通。即便第一个障碍设法通过之后，我还将面临通过协约国军队占据的中欧和西欧的困难。最后，还有通过协约国的封锁线才能到达莫斯科的问题。到革命国土去朝圣必须事先作出周密的计划。信仰之炽烈与热情之急切，都是无济于事的。

1919年秋天，经由斯堪的纳维亚和荷兰转来一个信息，邀请墨西哥共产党派一个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要求鲍罗廷尽早回去。他将在柏林等我。第二次代表大会定于1920年春天召开。为了尽量提前到达莫斯科，以便参加筹备工作，我必须在1919年年底前离开墨西哥。为了逃避逮捕，我必须绕道旅行，因此行程不能很快。所有参加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都要在新年之初秘密在柏林集合，在那里不定期地等着，再通过种种秘密渠道被运送过去。

送走鲍罗廷并不难。他假装生病，一直躲在屋子里。请一位医生每天来给病人医治。同时，他带着墨西哥的护照，越过边境进入美国。一个使者已经先去纽约，给他订购了横渡

大西洋的挪威轮船的一张船票。那些对鲍罗廷可能很注意的人们发觉那个布尔什维克特务已经悄然失踪的时候，他已经在了。在他离开墨西哥以前，我们和外交部长开了一个会。那位部长暗示，他会立即采取步骤，恢复两个革命国家间的正常外交关系，并希望不久就能接待新的俄国正式任命的大使。大约三个星期以后，从鹿特丹发来一个电报，大意是说鲍罗廷已经安全到达那里了。

我离开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茫然若失的感觉也越发强烈了。我到墨西哥来不过两年半，但是好象我从小就住在这里似的。我没有结交许多私人朋友。墨西哥人那富有传统色彩的华而不实，虽然不总是虚情假义，却和我的性情格格不入。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不能不为这样的事实所感动：墨西哥是一个非常好客的国家，政府的态度也是出乎意外的友好。我出于感激而尽的微末之劳，与此相比是很不相称的。而且许多地位很高的人待我都很亲切，很体贴，有感情。总之，那是一次丰富而愉快的经历。在某种意义上说，墨西哥是我获得再生的地方。说实在的，我到那里以前，已经开始对我早年的计划和理想感到不满。但是就在我逗留墨西哥期间，新的前景变得清楚了，对于过去一事无成的不满，已为一种把我引向前途有望的信念所代替了。这个转变比政治思想和革命理想的转变更大。我学到了一种新的人生观；我的内心发生了一次革命——一种永无止境的哲学革命。

人生观的根本转变使我能够克服对于使我获得再生的国土的眷念之情。自由的新理想不是在民族的或地理的固定界线之内可以得到的。要想得到它，必须在全世界进行斗争，整

个文明的人类都要参加这一斗争。我继续留在墨西哥再也不能有什么作为了。局部的活动范围有它的局限性。我从一个具有更大前途的更广阔的活动场所，仍然可以对这个曾经给予一个无依无靠的流亡者如此友好亲切待遇的国家、它的政府和人民有所帮助嘛。当然，在离开以前，我必须去看看卡兰沙，并征得他的同意。他还是和以前一样对人体贴入微，对于我想寻求一个更广大的活动天地的愿望表示同情，并祝愿我不久以后能再为我自己的国家服务。我重申我要一如既往地墨西哥服务的决心以及我对他本人的忠诚。我发现那个刚强自豪的老贵族稍稍有点沮丧悲哀的样子。也许他已经意识到他正在进行的比赛会输吧。但是，他还必须把那场比赛进行到底，死而后已。唉！他的结局的确是悲惨啊！尽管我在墨西哥尽的力量甚少，未能挽救那位老人的命运，但是，我尽的力量多少有助于使社会力量定型下来，这种力量在不久以后便把那个国家从内战的灾难中解放出来了。

不一会儿，老人平静下来，谈起正事。他对我的忠诚毫无怀疑，并盼望我在国外帮他的忙。我将以半外交官的资格，作为总统的使者到欧洲去。驻柏林大使是他的亲信。我必须去拜访他，讨论与苏俄恢复外交关系的问题。外交部将奉命为我的旅行做好技术上的安排。我的旅行要经过西班牙，那里的朋友将帮助我到德国去，因而不会发生任何危险。老人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抑制着感情，用一种稍微哽塞的声音说：“你还很年轻，不要拿命运去冒险。祝你成功长寿。”他突然地转身就走了。

几天以后，外交部长告诉我，12月初，有一艘西班牙客轮

将从韦腊克鲁斯启航，他已为我定了一个头等舱位。当然，一张化名的外交护照会及时准备好。他建议我提前两星期离开墨西哥城，在开船那天隐姓埋名地到达韦腊克鲁斯。关于其他准备工作，我必须暗中委托给几个党员。代理总书记后来证明是一个很可靠的人。我把一笔足够的巨款交托给他，可供党组织一年活动之用。大家希望在一年之中莫斯科方面会派人来建立共产国际拉丁美洲局。

五年以前，我怀着对革命和国际关系的天真想法，离开印度去寻找武器。后来的经历是惨痛的，许多幻想破灭了。我在美国短期逗留时，便痛苦地感觉到自己的无知，这种无知掩盖了从般金·查特吉的《快乐寺院》中得到启示的早期革命运动的社会理想主义，与该书也表示信仰的文化上的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那时我才恍然大悟，民族主义（不论是革命的或立宪的，文化的或政治的），主要依靠感情，因为它在理智上是软弱的。在国内和国外一样，民族主义所感染的是心灵，而不是头脑。它试图感动人们，而不是说服人们。在纽约时，我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不久便相当全面而批判地理解了当代历史上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结果我转而信仰社会主义了。但是，在根本的观点上，即人生哲学方面，却是依然故我。这一点在我和鲍罗廷的讨论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我从文化上的民族主义的观点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抵抗。那位布尔什维克辩证学家，用其敏锐的心理洞察力，毫不困难地指出：我是在为我已不复相信的观点进行辩护，我的观点纯粹是一种顽固的偏见。

我在离开我获得再生的那个地方时是一个虽然怀有新的

信仰、但在理智上自由自在的人。这种信仰本身就具有哲学上的弱点。我不再相信以没有经济解放和社会正义为内容的政治自由了，但是，我也认识到，理性自由——摆脱一切传统和权威束缚的自由——是争取社会解放的任何有效斗争的条件。不久以后，我也许能够用武器帮助印度的革命者。不过，我已丧失了对我在离开印度时原来所负使命的信念。我依然相信武装暴动的必要性。但是，我也懂得要更加重视从理智上来理解革命思想。对那种思想的宣传比武器更为重要。我怀着这种新的信念，开始走上了周游世界返回印度的道路。

第二卷

新的信仰

30. 横渡大西洋

1919年11月初，我从韦腊克鲁斯登上横渡大西洋的西班牙班轮“阿方索十三世号”。我带着墨西哥外交官的护照，护照上的名字是罗伯托·阿莱尼·比利亚·加西亚。我选择这个庄严的姓名，不是为了证明护照持有者是与外交官身份相称的贵族，这纯粹是巧合。按照正式手续，必须呈交证件，证明确有其人，才能签发护照。我是冒充一位同志的兄弟，这位同志就是继我之后担任墨西哥共产党总书记的那个人。他是一个混血儿，因此就用了这样的名字。一个古怪的英国人娶了一位墨西哥贵族小姐。这种混合血统对我正好合用，它可以解释我的蹩脚的西班牙语。那个固执的英国人不仅迷恋一位墨西哥社交名媛的美貌，也迷恋她的财富。但是他却拒绝学习有色人种的语言。他们在家里讲法语。

这次横渡大西洋的航行，除了开头那一段以外，与我四年前横渡太平洋的经历大不一样。在那些日子里，即使是最大的轮船，速度也不怎么快。“阿方索十三世号”尽管在西班牙

商船船队中是数一数二，但算不上是高级的轮船。它横渡大西洋一般需要十天。我们这次航行延长了两天，因为轮船在哈瓦那被码头工人的罢工给耽误了。它是预定要在那里停靠的，但只准备停靠几个小时，以便载上旅客和邮件。这短暂的停泊成了我旅途中的关口。这就是为什么要采取一切措施，对我乘这艘船旅行保守秘密的原因。

英美秘密警察要求墨西哥政府引渡我，遭到婉言拒绝之后，便想对我进行绑架。我在《罗拉特报告》^①中占着显要的地位，英国警察当然要缉拿我。此外更重要的是，我还是美国的一名“逃犯”。从各种实际情况看，古巴是美国的一个保护国。哈瓦那港仍在实施战时的搜查中立国船只的做法。如果我搭乘的轮船将在哈瓦那停靠的消息泄漏出去，那么我肯定就有被捕的危险。因此，韦腊克鲁斯港务当局曾交代船长，要他保护我，以免发生任何可能的危险。船长答应在哈瓦那停泊的整个时间，把我隐藏起来，不让别人看见。

罢工给我们带来了没有预料到的情况。我们的船与别的船一样，也可能要无限期地被扣留在那里。我不能多日不上甲板，而不惹人注意。第二天，我决定冒着很大的危险，设法与古巴劳工联合会书记取得联系。此人是个社会党人，我在墨西哥时，他曾不止一次访问过那里。罢工委员会在舷门布置了纠察队员。我设法与其中一人攀谈起来。我对罢工的同情赢得了他的信任。他捎了个口信给劳工联合会书记，说书记有一个朋友在“阿方索十三世号”上。这口信起了作用。书

^① 罗拉特报告(Rowlatt Report)，指1919年英国罗拉特委员会对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侦查报告。——译者

记当晚就上船来了。他大骂墨西哥同志，因为他们没有事先通知他，以便使我免遭被美国佬逮捕的危险。但他向我保证，只要船长愿意，我们的船第二天一早就可以起锚。纠察队员撤走了，理由是“阿方索十三世号”是只客轮，罢工者不想给无害的旅客增加麻烦。船长与港务当局接头，办了手续，我们便在黎明前开船了。

船上的人都对这件事感到奇怪。拉丁美洲的工人大多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他们一般不会对资产阶级旅客这么体贴入微。只有船长知道这个秘密，他却非常谨慎，守口如瓶。但有一个旅伴察觉到这个问题，他在一个偏僻地方一把拉住我，向我祝贺，并代表全体旅客对我表示感谢。他是墨西哥一所德国学校的校长，在四年战争之后，现正要回国度假。不久我发现还有一个同行的旅客也知道这个秘密。他是一位墨西哥外交官，一位真正的外交官，带着他的法国夫人前往维也纳。我与他素不相识，但他对我以及对我到欧洲去的使命，好象知道得很多。他比我大好多岁。他向总统的私人使节所表示的敬仰态度，把我弄得啼笑皆非。但这种俗套三两天之内便免除了，那位巴黎夫人在两名墨西哥外交官的协助下，竟成了漂流在大西洋上一周时间中的这个小小社交界的中心人物。

仅仅是在四年以前，我从本地治理出发，象一个腼腆的天主教见习修道士一样，作过比这次更长的横渡太平洋的航行。那是一次苦难的历程。但在这两次旅行中间的短短期间里，我经历了文化史上好几个世纪。我登上美国国土时，对这个国家的生活方式可说是一无所知。我对欧洲也是陌生的，但

在文化上，欧洲却不是我的“未知的土地”。我之所以前往美国，不过是想以此作为奔赴终点的一个中间站。我对这个国家并不感兴趣。我在那里逗留不是出于自愿，因此一有机会就离开了。我对它既不抱有反感，也不蓄意厌恶。但在精神上，我仍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那个世界我相信要比美国好得多，因此我在这个新环境中当然不能有所获益。现在我正要到欧洲去，我对世界已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因此，这次横渡大西洋的航行是愉快的，前景是令人振奋的，而从亚洲到美国的旅途却一直使我抑郁不乐。那时我是从熟悉的地方走向一个不熟悉的世界。现在是一次圣地朝拜；一路上我将有幸目睹资本主义欧洲的崩溃，也将看到革命的无产者象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①一样站了起来，在废墟上建设一个新世界。

我们在海上漂泊的国际社会是一个由墨西哥人、西班牙人和德国人组成的和谐集体。那位墨西哥外交官的法国妻子是协约国的唯一代表。她虽然因为婚姻关系成了墨西哥公民，但大部分时间仍然住在巴黎，她的丈夫原先就在巴黎工作。因此，她没有我们这个海上集体的亲德情绪。那些西班牙人尤其亲德。德国人打败了，但并没有失去他们的追随者的同情与敬仰。

然而，西班牙人的骑士风度，竟使得我们那位巴黎夫人甚至跟德国人在一起也感到无拘无束。我们船上有好几个德国人，他们都是被迫在墨西哥过了四年流亡生活之后回家去的。在这四年中，他们大多没有从被围困的德国得到一点亲人的

^① 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出自希腊神话，他因盗取天火给人类触怒主神宙斯，被锁在高加索山崖遭受神鹰折磨。——译者

消息。他们不知道,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是什麼,但肯定不是愉快的事情。不过这些人都还是嘻嘻哈哈,因而使得我们的船上生活非常活跃。

那位我在墨西哥见过面的校长,特别快活。他与我很亲热,对于我去欧洲的目的问长问短。我是不是要到德国?我打算走哪条路线?我最好不要冒险从法国走。为了替我着想,他告诉我,从巴黎到德国去的每条铁路所经过的边境车站,都被英国军队占领了。好象我不知道这些情况似的!不过,我应当感谢他对我安全的关心,他的好意我不能无动于衷,虽然他的态度有点象恩人似的。所有德国人依然看不起印度人,认为自己是印度人的保护者。他们谁也不相信他们祖国的军队真的被击溃了。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他们全都痛恨犹太金融家和社会民主党政客,因为正是这些人勾结协约国,出卖了德国。但是伟大的军事领袖兴登堡和第一流战略家鲁登道夫都还活着;德皇陛下也还没有退位;不用多久,他就会重返柏林。不可战胜的德国军队一定正在暗中准备一场复仇的新反攻。德意志爱国主义的怒火,终将烧死那些签署凡尔赛和约的犹太奸细和社会民主党懦夫。

每天晚上,这种胡吹瞎嚷,就在船上的吸烟室和酒吧间一直响到深夜。这是穷途末路的哀号;但是现在我意识到,这也是预兆灾祸的隆隆回声。白天,当条顿族血液的温度还没有被西班牙葡萄酒烧到沸点的时候,我那些德国旅伴(大多是阔绰的商人和富裕的农场主),还不那么黠武好战。他们的举止还是拘谨的,尽管有些生硬和傲慢。我那位当校长的朋友,是其中唯一的知识分子。除了哲学博士的学位以外,他脸上还

带着曾在大学深造的标记。这就是颊上的一块瘢痕。德国学生，凡在海得尔堡大学那类正统高等学府攻读的，直到20世纪初叶，还用长剑进行决斗。因此，脸上的一块瘢痕就成了知识的标志。不过也有人对此加以非议，认为那些瘢痕是人工制造的，所谓决斗也不会比啤酒店里的一场争吵更为杀气腾腾。这种说法已为事实所证明，因为那种被认为是进过中世纪学府才有的传统的知识标志，在大多数普鲁士军官的脸上也同样地发现了，而在真正受过教育的人中间反而极为罕见。

我认为，我到柏林在找到鲍罗廷之前，能有一个德国朋友是有好处的，因此，我在一定程度上把那位校长当作了知心人。我听他告诉我，所有的德国人都打算取道意大利和瑞士去德国，这与我原来的打算一样。但我宁可单独旅行，等待到了柏林以后再与我的德国朋友会面。我们无论如何得在拉科鲁尼阿分手，这是伊比利亚半岛西北角的西班牙的一个小海港。我们的船在那里靠岸，好让旅客登陆，搭乘火车去马德里。

那位墨西哥外交官和他的法国夫人将直接去巴黎。他们可以乘船一直航行到桑坦德再上岸。桑坦德离法国国境很近，那儿是西班牙上流社会人士常去游乐的海滨胜地。虽然马德里是我立即要去的地方，但我宁可绕远路；我也很想游览一下这个上流社会欢迎的海滨胜地，作为我抵达欧洲时看到的第一个城市。

在海上航行的最后两天，船上只剩了我们三个旅客。我们可以更随便地谈天，那位法国夫人出乎意外地发现，原来在她的旅伴中，至少还有一个人不是亲德的。她的丈夫也感到

愕然。那我是不是负有政治使命才到柏林去的呢？看来，他不知道我的路程更远，而亲德的思想感情对完成我的使命是不利的。我没有泄漏我的秘密，只是告诉他，我认识许多德国人，我对他们太清楚了，因此对他们过去的政府的动机不能再象我早年那样抱任何幻想。任何一个敏感的人，对于我们航行期间那种德意志爱国精神的庸俗流露，就不能不感到厌恶。我为帝国政权的崩溃额手称庆，我衷心盼望，总有一天能够看到一个复兴的德国——哲学、诗歌、音乐和科学的故乡，从普鲁士军国主义的灾难中解脱出来。

墨西哥外交官的夫人露出了笑容，这还是我在船上遇到她以来的第一次呢。在航行中，她一直戴着社交界贵妇人的优雅风韵的假面具，对那些殷勤的绅士彬彬有礼，又冷若冰霜，那些绅士中有些是德国人，可能正是她所深恶痛绝的。她知道我不去巴黎，大感惊异。一个人到了文明欧洲的首府的大门口，怎么能扭头而去呢？她愿意当我的向导，而且确信我在巴黎会感到十分舒适自如。几年以后，我发现她错了。我到了巴黎，我并不喜欢它。然而她为我的运气不好或错误选择深感惋惜。

船在拉科鲁尼阿停靠时，她的丈夫提议，我们到城里去吃饭。他知道那里有一家饭店，供应一种油炸鲜沙丁鱼。我们吃得很满意，酒也不坏。那是一个很普通的地方，在一条小巷子里，连我们从码头上乘去的破旧出租汽车都开不进去。饭后，我们坐了车在城里大街上兜风。街道都很狭窄，灯光异常昏暗，出租汽车在鹅卵石上行驶辘辘作响，颠簸摇晃着从一条街的路边石开到另一条街的路边石。拉科鲁尼阿肯定不是一

个值得向新来的客人介绍的欧洲城市。我们回到码头门口时，墨西哥外交官说，他的妻子终于带我游览过巴黎了。她听了勃然大怒。我不知道这话是挖苦还是恶意攻击。

桑坦德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来自偏僻的墨西哥，那徒有其表的繁华景象，简直把我弄得眼花缭乱，我感到这是欧洲生活庸俗的一面。白天，一望无际的金黄色沙滩上，点缀着无数躺在颜色鲜艳的大阳伞下的半裸美女。更使我惊讶的是，那些男人也几乎一丝不挂地在那里走来走去，虽然他们大多数人那裸露的身体，只能使那些还稍具审美感的女性也感到恶心。到了晚上，灯火通明的宽广的林荫道，富丽堂皇的旅馆，灯光闪烁的舞厅，以及罪恶的游乐场所，都挤满了欢乐的人群，他们似乎急切地要把人间的欢乐一下子享受干净，就怕明天享受不了。

我就象马克吐温的“在国外的老实人”一样，简直被弄糊涂了。我眼花缭乱，并不是因为我太天真了，而是因为我心中有着不安的感情：在我看来，拉科鲁尼阿比这个最古老王朝之一的海边都城更接近我心目中的欧洲景象。桑坦德吸引着暴发户——从欧洲最近的苦难中生长出来的令人作呕的肿瘤，因为那里一年中有几个月是西班牙王室的所在地。资产阶级的庸夫俗子可以在那里跟没落的王室和破产的贵族拉关系。

我在与欧洲第一次直接接触的三天中得到这种迷茫的感觉以后，我与那位墨西哥外交官就分手了。他的夫人对我急于离开充满刺激的生活这种冒失行径，提出了抗议。我只得道歉说，我必须按照日程，如期到达目的地。同时，我在马德里还有些事情要办呢。

31. 失去了光辉的国家

我坐上巴黎—里斯本直达快车，大清早就到了马德里。在这短短一夜的旅行中，餐车供应食物很丰富，使我感到诧异。西班牙仿佛是欧洲的世外桃源，并没有被四年战争弄得贫困不堪。这个国家曾经不可一世地拥有一个海外大帝国，而且还称霸欧洲。西班牙是个有光荣历史的国家；但它的现状堪虑，将来也无大作为。1919年，全欧洲的王冠纷纷落地，唯独中世纪正统的天主教王国的一个嫡系子孙，仍端坐在古老的王位上。在罗曼诺夫王朝、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索伦王朝戏剧性地消失之后，这个日薄西山的波旁王朝还能维持多长时间呢？但西班牙人似乎并没有感到那种阴暗的前景。一个国家的命运与统治王朝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马德里是我访问的第一个欧洲首都。这是一个欢乐的城市，特别是由于狂欢节——南欧天主教国家的民间春节——即将到来而显得更加热闹。商人和工厂老板发了战争财，他们挥霍无度，毫无吝色，以此来炫耀新近获得的财富。城里的主要干道波多德索尔大街两旁无数的咖啡馆和豪华的饭店，几乎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座无虚席。牛奶真是象水一样流掉，用来代替蜂蜜的亮晶晶的白方糖，扔得满地都是。谁要叫一杯咖啡，那么，一个侍者就会提来两个大水壶，把沸滚的牛奶

和热气腾腾的褐色饮料同时斟入杯内，泼在桌子上的几乎跟倒到杯子里的一样多；另一个侍者便把六、七块用纸精致地包着的方糖丢到桌子上。每一个客人总会留下几块，随后就都被扫到地上了。其他各类食物也是同样富足有余，浪费无度。一些纨绔子弟懒洋洋地靠在红长毛绒沙发和安乐椅上，吸烟，喝酒，玩多米诺牌，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这景象既令人厌恶，又令人入迷。到处是一片喧哗，乌烟瘴气，我一刻也看不下去。但是，在欧洲城市的心脏部分，却出现了那样一个东方的集市，熙来攘往的人群又都是西方的服饰，显得很不调和。这种情景吸引着我，因此我第一次在马德里停留的短短时间内，只要挤得出时间，总要到一个个咖啡馆去观光一下。

西班牙的确是一个半东方国家。从地理上看，它可以算作欧洲的一部分，也可以算作非洲的一部分。以狭窄的直布罗陀海峡作为边界，无疑不如以比利牛斯山为界那么壁垒分明。直到公元 13 世纪，中世纪欧洲“正统的天主教王国”的国土，一直还是幅员辽阔的阿拉伯大帝国的一部分。西班牙在靠掠夺美洲致富和它的王朝成为欧洲反动势力的盟主之前，就有过它的黄金时代。那时作为一个阿拉伯王国，它是学术与文化的中心，激励了现代欧洲文明的兴起。科尔多瓦大学是承袭希腊传统的阿拉伯文化大放异彩的地方，这种文化后来就为欧洲文艺复兴的先行者们所继承。西班牙就是东方与西方会合的地点。

后来，由于坚持信奉基督教，西班牙过去的光辉黯然失色了。它在中世纪是个强国，经历过一段征服殖民地的时期，后来就成为现代欧洲的死气沉沉的地方了。它江河日下，直至

今天。波旁王朝日益衰微，终于垮台，但在昙花一现的共和国之后，又出现了欧洲现代史上最长的军事独裁时期。

我对西班牙过去历史的兴趣虽然浓厚，但我的行程并未受到影响。我要去的那个地方现在动荡不安，但将来可望出现丰富多采的生活。但我也不只是路过这里而已。既然我已规划伟大的世界革命方案中占有一席之地，那么我就得在西班牙完成一个小小的任务。

共产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是徒有虚名。除了德国的“斯巴达克同盟”以外，没有一个组织派正式选举的代表出席会议。实际上是俄国共产党——直到革命之后，人们还只知道它是社会民主党中的布尔什维克派——宣布它决定建立一个共产党的世界组织。并向各国工人发布了“第二个共产党宣言”。甚至在大战期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还在流亡的时候，他们就认为第二国际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当时那些社会民主党投票赞成保卫各自的祖国，而不是按照它自己的决定，号召工人阶级宣布总罢工来制止战争。在他们的倡议下，欧洲各国左翼社会民主党人举行了两次国际会议，斥责右翼领导人出卖无产阶级，背叛第一个《共产党宣言》所宣布的原则：工人阶级没有祖国要保卫；他们一无所有，他们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在本国夺取了政权，便将着手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恢复它原来的纯洁性。共产国际既然拥有了俄国的雄厚资源，已无需乎仅仅满足于通过一些革命的决议了；它那时可以真的在全世界组织革命了。列宁以十字军战士的热忱宣布，为了推进世界革命事业，俄国无产阶级不惜牺牲一切。要不然，在一个国家里夺

取政权又有什么用处呢？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是宣布了成立共产国际的决定，第二次代表大会预定在一年半之后举行，它要把这个决定正式付诸实施。因此，这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为那些一无所有者的解放而进行的穷年累月的斗争史上的一个大喜日子。能参加那次会议是一种特权，也是一种光荣。但是我更幸运，我为这次会议的准备工作的组织上、纲领上和理论上都尽了一份力量。

沙皇制度的倒台，震撼了民主和自由世界。十月革命起初曾受到热烈欢迎，被看作旧专制政体崩溃过程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只是理论上的教条。实际上，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后的一年半当中，在革命的俄国，一切都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这就被旧的统治阶级分子所利用，他们通过大使馆受到外国政府的庇护，为所欲为。外国干涉势力支持武装叛乱去反对新制度，这就迫使业余性质的赤卫队改编成为一支临时军队。布尔什维克是在“和平、面包与土地”的口号下夺取政权的，他们不需要战争，除非战争被强加给他们。为了取得和平，进而实现他们的简单纲领中的其他两个项目，他们在傲慢的德国军国主义死硬派的威胁下，签署了屈辱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无产阶级专政并没有实行赤色恐怖，直到滥用不受限制的自由达到极点，以至危及列宁的生命时，情况才有了改变。

尽管恐怖是由于激怒引起的，而且也证明是正当的，但它却使民主和自由世界转而反对十月革命。欧洲的一些社会民主党虽然理论上是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但它们却都是在自

由主义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它们自相矛盾，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的正确性，指责十月革命的发展是俄国专制制度的表现。因此它们不愿参加重建的无产阶级国际，接受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领导。然而，十月革命却使那个奄奄一息的信仰获得了生气，那就是说，可以在坚强的少数人的领导下，组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列宁的党是职业革命家的党，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它为一部分人所向往。社会民主党分裂了，它们的革命左翼组成了独立政党，为新生的共产国际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第二次代表大会会有希望具有代表性。在第二国际中占统治地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到大战末期已经分裂了。它的左翼称为独立社会民主党，已同意派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法国和意大利社会党的杰出领导人，如法国的马塞尔·加香和保罗·弗罗萨尔，意大利的塞拉蒂，也可望出席大会。西班牙社会党领袖伊格列西亚斯是个很有声望的人物，他也是欧洲自由主义（这个名称来自西班牙文）的盟主，因此该党在国际上的威望，大大超过它在国内的影响。

我在西班牙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深入虎穴，找这位大人物打交道。如果伊格列西亚斯能被我说服，前往莫斯科庆贺共产国际的诞生，那么，敌视十月革命的自由主义反对派势必会军心动摇，土崩瓦解。但是，事实证明，单凭我的青年热情很难说服得了他。一个新改变信仰的人，尽管有强烈的信仰，却动摇不了古典理性主义的大山；然而，这种理性主义，按照我的狂热信仰来解释，只不过是反动统治文过饰非的虚弱表现而已。那位社会主义自由派元老，看到一个来自古代智慧之

国的小伙子，居然充当起嗜血成性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说客来了，他对这种奇怪的现象感到惊讶。不过我虽年轻却也懂得，温和的讽刺是一切始终如一的自由派的信念。诡辩是无济于事的。因此，那位老练的自由主义者伊格列西亚斯立即从原先的惊异中镇静下来，恢复了他固有的沉着。他露出仁慈的笑容，但仍带有几分忧伤的神色，向我表示，他对新狂热主义的牺牲者表示惋惜，然后把我打发走了。我义愤填膺，充满着对那个老糊涂的轻蔑感。我认为他确实是不可宽恕的。

但是我不能就此离开西班牙，我必须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物色几名代表。麻木不仁的理性主义者伊格列西亚斯没有听从我的劝告，接受新的革命信仰，但是这失败丝毫没有使我灰心。我还准备了第二手。访问一下巴塞罗那的无政府工团主义中心，必然会取得成果。但是在退而采取这最后一着之前，我必须寻求更可靠的新兵。那就是社会党的左翼。当我还在墨西哥的时候，我就曾与它的领导人有过通信联系。在俄国以外的第一个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他们就曾主动地送去兄弟般的贺电。他们事先已接到通知，知道我要到来。我先去拜访了伊格列西亚斯，他们很恼火，不愿与我公开会面。因为他们确信，那个老反革命会出卖我，西班牙警察会把我移交给直布罗陀的英国当局。即使对一个老阴谋家，这种顾虑看来也是相当牵强附会，没有什么根据。尽管如此，我还是和六、七个来自工人阶级的青年人秘密会见了好几次。他们告诉我，伊格列西亚斯在社会党内并没有什么威信，大部分人都会追随他们，参加共产国际。

我在西班牙的任务完成了，想立即继续我的朝圣旅行。

但是我还得在马德里逗留几天，等一封从墨西哥来的信，它将给我带来鲍罗廷的消息。这封信应按以前商定的电码书写。信如期寄到了，是用另一种密码写的；但附有一张由墨西哥共产党总书记署名的手写便条。他向我道歉，因为原来的电码本丢了，信是用新的电码写的，新电码本就附在信内！我很生气，但也无可奈何，只好一笑置之，随后我就出去买手杖去了。

办这样一件小事也不容易啊。我跑遍了波多德索尔大街，才找到一根与我的高身材相称的手杖。西班牙人是武士的民族。即使今天，他们也还是杰出的骑手。但是从我这次的劳累奔波来看，显然可以作出如下的推论：西班牙上层阶级的男人身高超过六英尺的不多。最后我总算在王宫附近的一家店铺里，找到了我所需要的手杖，便乘出租汽车赶回旅社。为了掏钱付车费，我把手伸进口袋。皮夹不见了。这是一个晴天霹雳。我所有的钱都在那个皮夹里。当然，我把现金都存入了墨西哥银行，它开给我支款汇信时，是留有副本的，这副本还可以在墨西哥银行找到。但这手续旷日废时，势必推迟我到达柏林的时间。而且在这期间，我身边分文全无。两千美金现钞也在失去的皮夹中；里边还有我最宝贵的东西——护照。我不能从墨西哥驻马德里的大使馆另外弄一张新的，因为我沒有可以证明身份的其他证件。我可以从当地新认识的朋友那里借一些钱来。但沒有护照，我就毫无办法。在当时，一个外国人必须每星期到警察局去登记一次，领取身份证。

皮夹在哪里遗失的，是很清楚的。我曾从口袋里把它掏出来付手杖钱。付了钱，我就上了出租汽车，那辆汽车就是

停在店门口的。最熟练的扒手也无法在我跨过人行道那只有两三步的时间内作案。在出租汽车里，它也不会从我的口袋里掉出来。丢掉钱袋的其他一切可能性都排除了，因此毫无疑问，我是把它丢在店铺的柜台上了。但它是不是还在那里呢？其他顾客，谁都可以把它捡去。瞎猜无济于事。我赶回店铺，冲了进去。我刚走到柜台跟前，店主就向我伸出手来，他手里拿的正是那件东西。我抓住皮夹，打开一看，护照还在里面。店主站在我的面前，满脸堆笑，指望我会感谢他。我兴奋极了，以至忘了立刻向他道谢，却做了个显然使他生气的手势。他的笑容消失了，脸色变得倨傲而严峻。他声音象锋利的钢刀一样，对我说：“请你仔细点一下钱，先生；西班牙人是不当窃贼的。”我感到惭愧，向那位委屈的恩人道歉，极力安慰他，并向他解释。可是，看来我的解释不能使他相信。任何人，凡不是处在我的地位的，谁能相信，一张羊皮纸会比两千美元还更值钱！

两天以后，我离开马德里，前往巴塞罗那，从那里我又搭船去热那亚。一路上，我再没有其他任务了。我取道米兰和苏黎世到达柏林。

32. 终于到了柏林

四年前，我就踏上到柏林去的旅途了。时至今日，柏林已经不再是我旅途的终点了。我在1919年底抵达柏林时，已不

再想在那儿搜罗武器了。在美国和墨西哥的经历，使我的革命观也发生了革命，在最近的将来我不想回印度去。

按照我的新信仰，革命是必然要产生的。任何个人都不是少不了的。革命的发生是新的社会力量作用的结果。新的社会力量的成熟是革命的客观条件。这个基本条件没有形成，就不能举行武装起义，因为那样做注定要失败。首先，必须把与现有制度相对抗的社会力量从政治上动员起来，组成革命的大军。只有到那时，才能谈到把准备为解放事业而战斗的战士武装起来的问题。

我们的旧革命观是本末倒置的。它认为武器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一旦出现了取得武器的机会，我们便相信革命已经临近。我们没有好好地考虑一下，使用武器的人如何征集的问题。地下党的党员寥寥无几，是不足以组成革命大军的。

新的革命观，以及对革命将如何发生的设想，使我觉得，我急急忙忙赶回印度毫无意义。从我所能得到的不多的消息看来，大战在经济上和心理上产生的影响，已使社会不满情绪在纯粹政治上的反英民族运动的表面下不断高涨起来。我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从远处观察印度的情景，我发现农村阶级斗争已普遍展开，这是由于大战期间农村所遭受的经济剥削加重了。我还进一步想象，当士兵带着他们在外国战场上获得的经验复员回乡之后，政治觉悟这个主观的革命因素，无疑将增强发展中的对社会不满的客观条件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新信念，向我揭示了印度革命发展历程的前景，两年之后，当我在莫斯科收集到足够的统计材料之后，我便立刻

写了《过渡时期的印度》一书，对这一前景作了描绘。

我还在墨西哥的时候就思考过，对社会不满的情绪在印度还刚刚开始，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凝成一股革命的社会力量。我相信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它是由战后的经济发展所形成的。但它不能靠政治来促进；未成熟的革命的政治行动确实可能使国家受到影响。我对纯政治的民族主义的有限目标，已经失去了兴趣。我开始相信，中产阶级的鼓动如果得不到群众运动的支持，就不可能有多大作为；民族独立只有作为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一个阶段时，才有可能取得。当这一过程在印度展开之前，我在墨西哥找到了一个能够作出成绩来的活动天地。这个经历除了使我目前得到满足以外，还将使我在印度革命到来时更具备参加革命的条件。

一个人偶然生在一个特定的国家，对本国的道义责任就得重于其他一切国家，这种偏见我已经克服了，因此我本来可以无限期地在墨西哥呆下去，如果不是受到去革命圣地进行朝拜的吸引的话。我在途中必须经过柏林，那里一度曾是我旅行的终点。但我到达那里时，它已经不再是印度革命者的麦加了；三年以前，它还是我日夜向往的地方呢。但它并没有使我失望，因为我对它不再有过去那样的要求了。

1918年年底，德国在西线发动的最后一次重大攻势失败之后，鲁登道夫承认大势已去，于是兴登堡就劝德皇求和。直到最近还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德国军队，在失败之后马上就土崩瓦解了。那个叱咤风云的战争霸王一直以武力恫吓欧洲，忽然变得胆战心惊，带着一笔相当可观的家私，逃到中立的荷兰避难去了。

在整个大战期间，德国的海军除了潜艇舰队以外，一直安然无恙地留在基尔港内。鲁登道夫在1918年10月初就已宣布，德军在西线已不能再支持下去了，因此海军参谋部决定，为了德国的荣誉，德国舰队要冲到公海上去，与英国舰队决一死战。德意志帝国海军的“决死巡航”被哗变的水兵阻止了，他们拒绝与军官一起“光荣就义”。舰队司令的旗舰升起了红旗。11月9日，哗变的水兵走到岸上，与工人一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革命揭开了序幕，便象野火一样烧遍了北方各大港口和工业中心。

同一天，柏林的士兵拒绝向示威群众开枪，并且参加了他们的行列。午后，大批的工人、士兵和水手涌向有最忠诚的军队守卫着的皇宫。卫士们放下武器，挥动如林的红旗，站到示威的革命群众一边。在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德皇退位并已潜逃的消息正式宣布了。

社会民主党在马鞍匠出身的弗里茨·艾伯特以及菲利普·谢德曼领导下，得到一些不受旧制度约束的自由主义分子的支持，准备把百孔千疮的国家暂时接管过来。就在这时，刚刚出狱的斯巴达克同盟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在皇宫的阳台上宣布建立俄国式的苏维埃共和国。这一戏剧性的宣告受到了群众热烈的欢呼，在柏林还从来没有聚集过这么多人的的人群呢。皇宫警卫队的一个军官撕下了身上的绶带，并把御用的一条红毛毯从阳台上悬挂出来。

这时，一队武装工人冲进国会大厦，在那里，最后一任帝国首相马克斯·冯·巴登亲王正在邀请艾伯特组阁，成立一个在皇太子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党临时政府。他们抓住谢德

曼，拉他出来向群众表态。斯巴达克同盟的领袖已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社会民主党人既然反对暴力和专政，他们就应该起来勇敢地进行反击。可是，在他的上级答应他的党要执行君主立宪政体的同时，谢德曼却宣称：“旧的、腐朽的君主制度已经垮台了。德意志共和国万岁！”

但是红色革命的惊涛骇浪席卷了首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怕得要死，就想了个主意，要把偶然诞生的年轻共和国迁往卡塞尔，战败的帝国军队司令部就设在那里。虽然鲁莽的鲁登道夫已撤退到慕尼黑，在那里医治创伤，并策划反革命的恶毒阴谋；但老狐狸兴登堡还留在卡塞尔，普鲁士军国主义骨干分子都聚集在他的周围，他们从远处注视着柏林方向不祥的发展。

革命之后的1919年，打了整整一年激烈的内战。我到达柏林的时候，凡尔赛和约已经签订，根据《魏玛共和国宪法》建立的秩序还是很不稳定的。一位马鞍匠出身的共和国总统代替了皇帝——这位皇帝不仅自己宣称他是从查理曼到腓特烈大帝的中世纪武士的高贵传统的继承者，而且还渴望着罗马帝国皇帝的地位。那位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菲利普·谢德曼爬上了俾斯麦的位置，当了德国总理。按照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协约国管制委员会驻在柏林，成了最高权力机关。全国各地都建立了这个权力很大的委员会的分支机构，强制执行对战败的敌人全面解除武装的条款。

不言而喻，那里普遍存在的社会气氛和心理状态是屈辱、失败和苦恼。物资极端贫乏，各种生活必需品一点也没有，这就是当时形势最突出的特点。这一特点由于下面的景象而被

衬托得更加突出了：在城市的上流社会地区，橱窗中的奢侈品琳琅满目；而周围却是一片凄凉，窗上的玻璃破了，墙壁上弹痕累累，街道上到处坑坑洼洼，破旧的有轨电车隆隆驶过，使整个画面显得更加不调和了。

特别触目惊心的景象是流浪街头的大批乞丐，他们穿着破军装，手足残缺不全，面孔给伤疤弄得简直无法辨认，从他们神经失常的各种症状看来，他们大多是患了“弹震症”。其中不少人不能讲话：有的是身体有病，也有的是为了避免乞讨的耻辱。他们只是沿着街道席地而坐，象一座无言的纪念像，似乎要让人想起战争的骇人经历似的。著名的胜利大道，夹在那两行中世纪条顿武士的塑像中间，显得多么不相称啊。可是正是这些武士的英雄故事，经过爱国主义历史学家的生花妙笔，竟成了鼓舞现代军国主义精神的源泉。这个城市的其他所有街道上的阴森景象，却一直在谴责这种罪恶。那些被抛弃在街头的正直人士当中，也有社会主义者和自称的共产主义者，他们除了残废的躯体和错乱的神经之外，已一无所有。更为勇敢的和更为愤愤不平的人在胸前挂上一块纸牌，上面写着：“我为祖国打过仗”。为了避免不许公开乞讨的法律的制裁，大家带着一些铅笔、鞋带之类小玩意儿，有的拿在手里，有的摊在面前地上，装作在叫卖这些东西。没有人相信这种非有不可的伪装，但是这些穿军装的乞丐仍然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地拿着那些表示他们遵守法律的东西。

我晚上到达柏林，时间已经相当晚了。市内灯光暗淡，遍地冰雪。满街的烂泥雪水掩盖着危险的坑洼。我要到一家指定的旅馆去，那是与鲍罗廷约好的。它名叫菲尔斯滕霍夫饭

店，是一家上等旅馆，位于波茨坦广场；那里是全市交通的神经中枢。火车站很大，但气氛沉郁，挤满了军官，有德国的，也有协约国的。德国军官怀着战败的耻辱，但又装出尊严的样子，有时还显得盛气凌人。协约国的军官居然能够容忍下去，虽然他们不总是那么很高兴，这使我大为惊奇。但一般说来，在各国军界之间总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礼貌。

我走出车站的时候，几辆破旧的出租汽车已被一些佩戴着大量金色穗带和绶带的军官占去了；柏林仍是军人寻欢作乐的所在，高级军官更是支配着一切。一个可怜的平民，而且又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外国人，那就只能雇一辆东倒西歪的马车啦；那匹马几乎已站立不住，瘦得皮包骨头，身上的毛也快掉光了。如果我知道去旅馆的路，又没有携带行李的话，我宁愿走着去。无情的鞭子左一鞭右一鞭，终于使那无可奈何的牲口相信，要使皮肉少吃一些苦头，还是蹒跚前行为妙。幸好那段路程很短，还不到半英里；我们的好马走了没有一刻钟就到了，于是我和我的行李就都被丢在一幢四层大厦的庄严的转门门口。

透过玻璃门向里望去，那宽敞的穿堂里挤满了军官。我踌躇了一会儿，便鼓足勇气走近门口，请穿号衣的男仆替我搬运旅行袋。他嘀咕道，这里没有空房间。说完，他轻蔑地把宽阔的后背转向我，让我这个卑贱的平民冒着得肺炎的危险，站在深及脚踝骨的雪水里。我冒火了，推开那个家伙——一个典型的德国军士级教练员，闯了进去。我走到帐房柜台前面，操着法语用相当大的声音说：“我是一个中立国家的公民，刚刚到达柏林。”我要求在旅馆里找一个房间。旁边几个衣冠楚

楚的先生们都转过头来，打量我这个硬闯进来的老百姓。其中一人随即向我跨前几步，询问我的国籍。他讲法语，但他显然是个德国人。我给了他一个简单的回答：“墨西哥人”，便掏出护照，当面硬塞给了接待员。那位军官偷偷看了一眼那份很醒目的羊皮纸证件，小声向接待员说：“你设法给这位先生安排一个房间吧。”接待员的态度顿时变了；他非常客气地向我道歉，表示今晚确实无能为力。如果我明天早晨来，他可以给我弄一个房间。他招呼一个服务员，要他帮助我解决当晚的困难。

我的保护人是个魁梧的中年人，穿着长外套，外套的翻领上饰有金丝带。他的举止彬彬有礼，和蔼可亲。他把我带到他的柜台那儿，问我是不是印度人。我答道：“是的，但我从墨西哥来的。”我不愿撒弥天大谎，这使我那位友好的对话人很满意。他低声说：“我们是朋友；不要担心；德国是不会被打败的。”他吩咐他手下的一个人把我的旅行袋拿进来，把它们保管好。我只需拿着手提包到附近的客栈去，那里可以给我安排一个房间过夜。天使圣彼得敞开了受伤的胸膛，我总算找到了一个栖身之所。强烈的仇恨从他那充血的眼睛中反映出来。他告诉我，协约国管制委员会总部就设在这个旅馆内。那些该死的外国人好象成了这个国家的主子似的。他们有权保留所有的房间；因此许多房间只得永远空着，以便随时满足他们的需要。经理当然不愿接待平民，除非是显要的人物。但是他会替我安排住宿的，还劝（不是要求）我交一些钱给他。接待员很穷，但还必须保持体面。我懂得他的意思。多少呢？我揣摸必须够两个人分的，于是就塞了一张五元美金的钞票

在他手里。啊，美元！他笑逐颜开了。他把我交给一位穿号衣的助手，让他带我到附近的客栈去。客栈老板娘接到的紧急任务是，必须把最好的房间安排给这位印度贵宾，他明天早晨就可以搬到菲尔斯滕霍夫饭店去住。旧秩序已从街上消失了，但它依然统治着德国人的心。

客栈里最好的房间也极简陋，幸亏勤劳的老板娘——一位和蔼的老妇人——把它收拾得还相当整洁。她也为德国所遭到的耻辱和灾难而伤心，它本来是一个强大、繁荣和安乐的国家呢。她噙着眼泪，抬头仰望着那还挂在墙上的褪了色的德皇肖像。我觉得很冷，瞅了一眼没有生火的壁炉。老板娘看出了我的意思，便诉起苦来，说炉子已有一年没生火了；没有煤嘛。可怜的人！她不懂得，德国遭到的灾难早在德皇统治的时候就已开始了！她还告诉我，热水是没有的——连一罐洗脸水也没有。但是她可以给我弄到一杯咖啡和一片面包，只是没有牛油；她几乎已好几年没看到这东西了。那种褐色饮料闻起来和尝起来都一点也不象咖啡。但它热气腾腾；我一口气把它喝干。这一宵就在两条破毛毯下焐暖冻僵了的身体。没有糖，只有一小片糖精。牛奶当然谈不到。那一片所谓面包，看起来就象一块灰色的泥土。这就是我在柏林的第一顿饭，不久我就知道，德国绝大部分人每天吃的也就是这些东西。这个骄傲的民族确实已过着苦难的日子了。

第二天早晨，我在旅馆柜台前受到的接待已大不相同。服务员向我行了军礼，通知我，我的行李已放在我的一套房间里。其实我要的只是一间屋子。接待员也向我立正致敬，把钥匙交给我，还吩咐一个侍者带我上楼。我走进电梯的时候，

遇到了昨晚帮我忙的那位德国军官。他象老朋友那样向我问候，还递来了他的名片——陆军上尉某某，与协约国管制委员会联系的联络武官。我的新朋友向我表示希望再见之后，便走开了。显然，他不愿让人看到他与一个外国人亲热谈话。留给我的一套房间在四楼转角上，从楼窗可以眺望波茨坦广场的中心。这一次看来又是护照给我帮了大忙。

33. 伟大的希望

虽然革命的无产阶级首先在俄国夺取了政权，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占卜图，这种优先权应该属于德国。英国作为最早的工业国，是社会主义经济学说的诞生地。卡尔·马克思的思想是在英国博物馆中孕育成熟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和人道主义的伦理观念，是从法国大革命的传统中演绎而来。但现代社会主义却是在德国达到理论上的成熟阶段的。一个有组织的社会运动首先在这个国家展开。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作了创新贡献的是伯恩斯坦、考茨基和希法亭，他们都是德国人。彻底接受革命理论的、在意识形态上具有阶级觉悟的产业工人，以德国为最多，其人数大大超过其他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德国国会中有一百一十一名议员是社会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二国际自然占有领导地位。

德国也是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毫

不妥协的形式——的摇篮。第二国际曾多次决定，在交战国发动工人的总罢工来抵制战争，它提出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你们失去的只是锁链。”大战爆发时，第二国际瓦解了。社会党支持了各自国家的政府。在法国，社会党领袖饶勒斯因反对战争被暗杀了。俄国杜马的十三名社会主义者议员（布尔什维克）中有六人因持“失败主义”态度而被捕，并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德国国会的一百一十一名社会主义者议员中，有十四人主张他们的党应投票反对支持战争。但其中只有卡尔·李卜克内西一人不服从党的指挥，他按照国际社会主义的原则投了票。李卜克内西被捕入狱，但在他的勇敢精神的鼓舞下，罗莎·卢森堡、弗朗茨·梅林和克拉拉·蔡特金领导了一次反对战争的群众运动。这几个人都是斯巴达克同盟的核心人物，那个同盟就是德国共产党的前身。

在1915年，反战运动壮大起来了。社会民主党的普通党员，特别是那些比较年轻的，对党的领导阶层的爱国主义政策的批评越来越激烈。他们向保卫祖国的政策提出了挑战，问道：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不是宣称工人无祖国吗？德国共产主义先锋战士们的英勇精神鼓舞了反战运动，而反战运动又对这些人的活动提供了群众性的支援。

1916年1月，现代共产主义的一些先行者自称为“国际小组”，发表了一个宣言，标题为：“主要的敌人就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发展，而当时列宁还默默无闻，在瑞士过着流亡生活。

德国反战运动的先例促进了欧洲社会主义国际左翼的形成。国际主义者在瑞士举行了两次会议（1915年在齐美尔瓦

尔得,1916年在昆塔尔),计划挽救社会主义,使之免于堕落为爱国主义。列宁在那两次会议上,都是少数派的领袖。与大家要求社会党采取统一行动来结束战争相反,他主张“用革命反对战争”,并与社会民主党,即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实行彻底的决裂。列宁反对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希望寄托在群众的自发起义上,他发展了自己的理论,主张由职业革命家组成高度集中的党,作为代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工具。德国共产主义领导人罗莎·卢森堡拒绝接受列宁这一理论,斥之为布朗基主义者的传统。因此,直到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取政权之时,列宁对德国的反战群众运动影响还很小,只是通过卡尔·拉狄克的媒介,才对很少几个知识分子产生了一些作用。

1916年,李卜克内西被征当义务兵。5月1日,他穿上了士兵的军服,出现在波茨坦广场火车站前面,向等待送往前线的部队发表演说。他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战争!离开军队!社会主义万岁!”敢于只身公然反抗强大的普鲁士军事当局,那景象是使人永远忘记不了的。它震撼了人心。反战运动扩大了。政府进行反击,逮捕了所有的领导人。但是迫害阻挡不住群众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的浪潮。地下工人委员会如雨后春笋在所有重要工业中心建立起来了。反战运动在士兵和水手中获得了反应。它瓦解了士气,预告了德国的最终失败。

1917年初,俄国出现了一幕幕引人注意的事件。惨重的失败使俄国军队军心动摇,协约国担心沙皇政府会单独求和。亲协约国的政客们为了更有力地进行战争,迫使沙皇逊位,从而打开了革命的闸门。布尔什维克也是“失败主义者”。列宁和他的一小群追随者,获准自由通过德国到俄国去进行鼓动,

立即结束战争。接替沙皇政权的亲协约国的政客们，指责列宁是德国的奸细。起初，甚至布尔什维克们也反对他。但厌战情绪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人们不惜任何代价普遍要求和平，列宁就此因势利导。彼得格勒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于3月27日举行，它呼吁“欧洲各国人民一致采取坚决行动，以促成和平”。

在推翻沙皇政权后立即发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是历史的必然；工人阶级一定会支持那个革命。在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试图夺取政权，那将是愚蠢的冒险。这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因此，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拒绝了列宁关于武装起义的要求。他只能孤军作战，他的理论就是俄国群众需要和平；人民的意愿必须实现，但是布尔什维克党如果不控制国家的政权，就不能实现群众的要求。列宁具有大无畏精神，因为他相信，不论在落后的俄国发生什么，德国已处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阵痛阶段，德国的情况将使俄国有可能越过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框框内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争取和平的自发群众运动，由于士兵纷纷离开军队而大为加强，它使布尔什维克越来越接近列宁的立场：如果坐失良机，他们就会被抛出政治舞台，反之，顺着强大的历史潮流前进，他们就将取得政权。对革命即将在德国来临的信念，使他们敢于当机立断。列宁的计划是用和平宣传来瓦解德国军队。布尔什维克相信，只要他们重新团结在领导人的周围，一旦俄国退出战争，协约国的工人阶级就会迫使各自的政府根据苏维埃的条件——“不割地，不赔款，以及民族自决权”——

进行和平谈判。鼓舞俄国革命唯一的因素，就是这种对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信念。

列宁相信，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根据地是德国。尽管他的巴枯宁主义或布朗基主义的激情使他热中于武装起义，并依靠自有主张的少数人（他的党），但他还是一个最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无限信任他的导师的预言。他不相信，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掌握的政权能够维持下去。然而他还是顽强地鼓吹一种明显的冒险主义政策，他深信这有助于德国的革命，而德国革命反过来又将帮助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巩固自己的政权。但即使到了那时，领导权仍将交给德国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世界的首都也将从莫斯科移往柏林。

列宁为自己的在俄国过早地夺取政权的政策辩护时说：“我们知道，卡尔·李卜克内西会取得胜利；我们知道，他会来帮助我们，德国革命将使我们摆脱一切国际困难，避免必然要发生的革命战争。但是德国革命需要时间。它需要准备和宣传，需要在战壕里结成的友谊，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①

苏维埃政府最早的行动之一，是成立一个在德国士兵中进行宣传的机构。每天由列车将印刷品运到前线。印刷品以李卜克内西的名义，要求德国士兵放下武器，与俄国同志建立友谊。然而，首先响应布尔什维克的和平建议的还是德国政府，它当然不是出于对他们的爱才那样做的。

美国参加了战争。大批的人员和物资从大西洋的彼岸涌来，增援西线。那时俄国军队已一蹶不振。纵使布尔什维克

^① 未查到出处，现根据回忆录原文自译。——译者

的和平宣传只是烟幕，那个新政权也不可能在最近的将来建立有效的军事力量。因此，把德国军队的一大部分放在东线已经没有必要了。德国应把那些军队调走，去坚守最重要的西线。

但是德国将军在与布尔什维克代表举行和平谈判时，并不想对他们宽大一些。他们的行径很象恶霸。苏维埃政府的法令赋予沙皇帝国的一切少数民族以自由分离权，德国人便利用这一点，要求承认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波兰和乌克兰的独立，以此作为缔结和约的条件。已经垮台的沙皇帝国的那几个省份，当时是在德军占领之下。它们独立后，即使不被德国正式并吞，也将沦为德国的保护国。在答复德国的要求时，苏维埃代表托洛茨基发表了一篇堂皇其词的演说，呼吁“所有的人”迫使掠夺成性的资产阶级政府在国际群众起义的压力下讲和。

布尔什维克党不能接受傲慢的德国将军们强加给他们的屈辱条件。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在布哈林和拉狄克领导下，主张以革命战争反对德国帝国主义，直至德国无产阶级起来革命为止。列宁虽然处于毫无希望的少数地位，但他仍坚持不惜任何代价以求和平。他在论战中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俄国已经沒有军队来继续进行战争了。他指责多数派违反人民的意愿行事。人民赞成和平；布尔什维克必须服从人民的命令，签署和平条约。他怎么知道人民赞成和平呢？列宁回答说，他们用他们的脚投票赞成了：瞧吧，穿军装的农民都丢下了枪，跑回家乡去领取革命分给他们的土地了！尽管列宁的议论是实事求是的，而那些鼓吹靠枪杆子和《共产党宣言》来

进行革命战争的人，却仍然在党的领导机关的会议上占有多数。但是列宁的现实主义精神，也使革命的战争贩子们的幻想发生了动摇。有一小部分人，人数与列宁那一派差不多，赞成托洛茨基的方案：“不战不和”。

德国人坚持他们的要求，实际上并吞了乌克兰。因此，布尔什维克中断了和平谈判，一方面宣称俄国拒绝签订屈辱的和约，但又宣布，它与德国已不再处于战争状态了。德国人的反驳是提出了最后通牒：要在四十八小时内接受他们的和平条件，不然，他们就要恢复军事行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除了接受列宁的劝导，签订和约以外，已别无其他办法。条约签字了，但德国军队继续向东推进，一直到了高加索山麓。他们的土耳其盟友从南方攫取了亚美尼亚。彼得格勒也受到了向前挺进的德军的威胁。和约签订后不几天，苏维埃政府中央就迁到莫斯科。这个城市不久就被来自四面八方的敌人——背信弃义的德国侵略者和协约国所支持的俄国反革命军队——包围了。

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那样危急的形势下召开了。针对左翼的批评，即屈辱的和约对苏维埃政府没有帮助，列宁重申了自己的论点：舍此别无他法。德国匪徒的进攻虽然无法阻挡，但是布尔什维克却赢得了喘息的机会。前景确实十分暗淡，以至连列宁也感到不能乐观。他预言将出现“许多曲折和失败”。但德国革命已近在眼前。布尔什维克无论如何也要坚持下去；时间对他们有利；不仅德国，整个欧洲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革命的大变革——“必然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具有神秘魔力的一个概念，在一切似乎都已毫无希望的

时候，它仍然支持着列宁的勇气。

34. 德国革命的失败

在布尔什维克被围攻的整整一年中，支持着他们英勇无畏精神的那个信念，不是毫无根据的。1918年11月，德国确实爆发了革命。但是布尔什维克的伟大期望落空了。

共产主义者和他们的同情者，把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责任，记在社会民主党内那些倒霉的领导人帐上。但是客观的历史家应该对他们作出比较宽大的评价。作为卡尔·马克思的追随者，他们也相信社会革命的必然性，怀着从资本主义剥削下解放工人阶级的理想。在1918年那些决定性的日子里，他们之所以那样行动，是因为他们相信，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解释。指责他们出卖无产阶级革命，那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合理的，因为多年来，他们一直认为，共产主义先驱者们所鼓吹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是与卡尔·马克思的教导背道而驰的。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冲突，根源在于它们共同教祖的教义里包含着矛盾。渐进主义是在革命不可避免学说中所固有的；它排斥共产主义的革命观。如果历史是确定了的过程，革命当然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将在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压力下崩溃，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社会主义。既然如此，又何须革命呢？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

们,其中有的还曾在自己的导师那里亲聆过教益,但是他们在现代欧洲文化的理性主义传统的指引下,得出了一个结论:那位导师鼓吹的暴力革命,与他的历史主义是矛盾的。但社会民主党人也自相矛盾。他们既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规模的暴力,又反对革命的暴力,默许对革命进行暴力镇压。

马克思和他那些更为狂热的信徒,头脑里老记着法国大革命的情景,幻想无产阶级的武装起义将推翻资产阶级国家。他们那是打如意算盘。在18世纪,那些奄奄一息的君主国的雇佣军队被群众起义打垮了,但是现代国家的军事力量比雇佣军的力量强大得多。在俄国,多亏军队瓦解了,坚定的少数人才得以夺取政权。沙皇的国家是个中世纪式的君主国,它腐败无能,又加被宫廷的宗派斗争所削弱。因此,俄国革命基本上套用了法国革命的方式。德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个帝国战败和覆亡之后,它的军队仍然继续存在。事实证明,在1918至1919年那个严重时期,军队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那是一支职业军队,军官都具有政治头脑,出身于传统的军人阶级。共产主义者反军国主义的呼吁,得到了被征入伍的士兵们的响应,但军官们对此却无动于衷。

柏林成立工人士兵委员会的消息——这个委员会控制了那个大城市多日——立刻传遍了德国和奥匈帝国。许多城镇都竞相仿效。武装暴动采取的是一年前布尔什维克起义的方式。起义者占领了公共建筑、火车站、交通中心和报社,宣布了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诞生。这对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是有力的挑战,他们只是想在柏林和各省省会成立看守政府,以填补那个政治真空时期,然后选出国民会议,宣布成立民主共和国。

为了安定起义者的情绪，社会民主党政府首脑弗里茨·艾伯特邀请李卜克内西入阁。他没有接受。于是，惶惶不安的艾伯特便采取一个步骤，这个步骤决定了共产主义概念的革命的命运。

军队战败了，总参谋部躲在遥远的安全地带，窥测着柏林和全国各地不祥事态的发展。艾伯特打电话给接替鲁登道夫的格勒纳将军，要求军队合作，以恢复秩序。另一个说法是，格勒纳主动提出，愿意与政府合作。艾伯特马上表示欢迎，就象快淹死的人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不论怎样，军队之所以介入政治领域，是因为他们相信，革命的威胁为复活德国成为一个军事大国提供了机会。他们的希望是：鉴于面临着共同的威胁，就连协约国也势必放弃全面解除德国武装的要求。因此，德国革命从一开始，就遭到了胜利的和战败的两类资本主义列强潜在同盟的反对。德国革命象在俄国那样取得胜利，希望是微乎其微。

战败的德国军队分散在欧洲大部分土地上。要遣散几百万军队，把他们有条不紊地送回家乡去，那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社会民主党临时政府根本不能解决这个难题。甚至连进行这项工作的机构的架子都没有搭起来。政府要求总参谋部合作，后者欣然承担了这个责任。这是在士兵中间恢复纪律，重新树立军官威信的机会。总参谋部秘密地发出了命令，在全国各地成立所谓“志愿服务团”（全部由退伍军官组成），其任务是维持国内治安，换句话说，就是镇压革命运动。“志愿服务团”的一个支队，大约有几千人，在柏林街头巡逻，枪杀示威的工人，还逮捕了工人士兵委员会中的一些人。在市内

纷纷散发传单，他们叫嚣要刺杀李卜克内西，要求对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实行血腥镇压。墙上有大幅招贴文件，内容是：“工人们，公民们！我们的祖国已接近毁灭；来拯救它吧！它所受到的危险不是来自外面，而是来自内部，来自斯巴达克同盟的成员。杀死它的领导人；杀死李卜克内西；杀死犹太人。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得到和平、工作和面包。”在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告诫文件上署名的是“前线归来的士兵”。

愤怒的浪潮汹涌澎湃。到处是一片混乱。恐怖的恶浪淹没了乌合之众的群众运动。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大会，拒绝了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出席会议。风向确实变了。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利用普遍的混乱和动摇，控制了大会。尽管这样，大会仍然强烈反对政府与帝国军队结成联盟。艾伯特辩解道，为了保护新生共和国的边境，这种联盟是必不可少的。兴登堡给他撑腰，从司令部发表声明：“军队支持艾伯特的政府，也希望政府履行它保存军队的诺言。”

大会之后，艾伯特立即命令柏林市郊一支卫戍部队的司令，把军队开进市内，驱散工人武装队伍。那些工人武装队伍当时保卫着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的大厦和革命群众占领的其他公共建筑物。帝国军队向那些革命群众筑有防御工事的建筑物开炮轰击。柏林在进行着血腥的屠杀。

当军队开始向革命进攻的时候，革命的领导人却没有能起来应付事变。李卜克内西是群众爱戴的领袖；他非常善于演说。他的演说慷慨激昂，引人入胜，还伴以独特的动作和勇敢的精神，但是，内容却缺乏一种思虑周密的理论和切合实际的思想。卢森堡才是斯巴达克同盟的首脑。

卢森堡原籍波兰，早在学生时代她就从事秘密革命活动，为避免被捕不得不逃离祖国。不久，这位年轻妇女就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崭露头角，被公认为第二国际左派的理论权威；当时，那个红胡子的俄国布尔什维克还被看作是狂热的危险分子呢。在理论上，卢森堡是考茨基的学生，但在革命实践中，她却采取了中间立场，介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的和平渐进主义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密谋方式（即后来被称为列宁式的共产主义）之间。那是骑墙派的立场。

社会民主党设想对国家实行渐进的改造，与此相反，卢森堡却提倡以政治性的群众罢工作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工具。这种理论的谬误，在德国革命的严重关头已变得十分明显。如果群众的政治性罢工是革命军队最后进攻的手段，那么，就应该有一个训练有素的参谋部来计划和领导这个进攻。尽管卢森堡的聪明是不容怀疑的，但她对革命实践的想法却没有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不然的话，她就会认识到，如果没有列宁的职业革命家的党，政治性的群众罢工就万无成功的道理。要完成推翻资本主义国家的目的，必须把政治性的群众罢工引向武装起义，而且必须有一个纪律严明的党来计划和领导革命发展的全过程，并最终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是布尔什维主义的精髓，是列宁在流亡瑞士的十年期间十分详细地拟订出来的。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主义、人道主义和民主的传统的否定，实际上也是对无产阶级争取社会解放的否定。但在俄国获得胜利的是列宁主义。在德国，革命的领导者企图在忠于西欧文化传统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及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

(它后来即被称为共产主义)之间搞调和。卢森堡是一个理论家;但在实际政治方面,她却让自己受到感情因素的支配。确实,德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多年来的政治活动,只是限于对右翼领导人展开批评,因此,在需要他们领导革命群众运动走向胜利的时候,他们却感到束手无策了。

卢森堡不愿支持社会民主党政府,也不赞成任何夺取政权的企图。她主张连续不断地开展政治性的群众罢工,认为那样就可以使阶级斗争尖锐化。这种革命策略的天真幼稚是一目了然的;它指望权力真空时期无限延长,直至工人阶级的大多数都将积极投入革命运动,然后不通过任何暴力,便把共产主义者拥上权力的宝座。它设想在这期间,那些反对革命的力量将是无所作为的。其实不然,他们早已把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确定为他们暴力的第一批牺牲者了。

卢森堡的立场的一大功绩,就是否定专政。即使共产主义领导人列宁获得了成功,专政已被列为革命信仰的基本原则的时候,她仍然反对专政。她毫不含糊地主张民主;但这必须是革命的民主,而不是徒具形式的议会制度。她想不出它应该具备什么形式;但她又不能走当时为她和她的追随者开放的唯一的民主道路。卢森堡是一个彻底的不合作主义者。她甚至反对共产主义者参加国民议会。不肯妥协的否定主义方针,使共产主义者脱离了群众运动。群众的热情不可能无限期保持下去。李卜克内西在革命爆发的当天宣布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始终只是乌托邦而已。同时,没有直接目标的运动,在军国主义恐怖下瘫痪了。恢复秩序的呼声在中产阶级群众中引起了反应。工人阶级陷于孤立了。

在那样沒有希望的局势中，社会民主党人所允诺的民主共和国，为防止旧制度的复辟提供了唯一机会。工人阶级的绝大部分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下转变了方向。共产主义者的孤立鼓励了艾伯特，谢德曼和诺斯克，后者参加了临时政府，负责与帝国军队联络。他们宣称，要以暴力回答暴力。那是向共产主义者发起全力进攻的信号。与此同时，一支相当大的军队悄悄地开到了柏林附近。1月9日，革命爆发后仅仅两个月，军队开进市区，事实上沒有遇到任何抵抗便占领了全市。

象火焰熄灭前的回光返照一样，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宣布成立以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另一个革命政府。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人们不许李卜克内西参与那个铤而走险的行动，宣称他们对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的冒险主义决定不负责任。他们与有组织的群众运动的最后联系破裂了。

几天以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被一小撮青年军官抓去，带到了部队司令部。他们遭受了残酷的摧残，确实是被屠杀了。他们的尸体四肢不全，几乎不能辨认，第二天发现漂浮在一条运河上。为调查这个案件成立了军事法庭，它的裁决是：罪犯们是在试图逃跑的时候被开枪打死的。这种暗杀具有象征意义，它也是对革命的暗杀；这次革命延续了两个月，继之而来的是恐怖、内战和反革命的一年。

35. 内战和民族布尔什维主义

1919年是革命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德国波罗的海集团军进抵彼得格勒郊区，甚至莫斯科也处于危急之中了。德国革命的失败，对于依靠伟大希望来支持勇气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釜破舟沉，退路已经没有了。布尔什维克既然已经取得了政权，就决心把它保卫到最后一息；他们怀着渺茫的希望，等待德国革命东山再起。他们执拗地相信，马克思的教义绝对正确，这信仰支撑着他们的希望。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得不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在俄国，内战业已开始。比较反动的一部分高级军官招募了几支雇佣军队，从四方八面向莫斯科进逼。德国军队仍占领着西部和南部各省。日本人从蒙古入侵西伯利亚。驻在波斯的英国军队占领了油城巴库，在格鲁吉亚建立了一个孟什维克政府。另一支外国干涉军从北冰洋岸的摩尔曼斯克登陆。1919年夏季，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之间的铁路线被切断了，邓尼金将军的哥萨克部队已到达莫斯科以南仅仅六十英里的地方。苏维埃首都确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尽管较远地区的一些据点还在坚持抵抗。例如，保卫察里津（现在的斯大林格勒），就是内战期间壮丽的事件。一支小小的卫戍部队，在斯大林的指挥下，对几乎占有绝对优势的敌人坚持抵抗了九个月。游击战争在全国各地敌占区的后方展开了。1919年2月，为了保卫革命，由武装工人临时组成的几营“赤卫队”，决

定改编成为红军。

在德国，内战也如火如荼。但是反革命恐怖扑灭不了造反群众的满腔怒火。在全国大大小小几百个地方，工人和士兵委员会接管了地方政权。为了全部消灭他们，军队必须开进所有的地方。工业城市的工人居住区遭到了洗劫。无数本地的革命领袖或在街头被枪杀，或在军事法庭上经过简单的审讯后，即被处决。

但是在乌云密布的欧洲地平线上，也出现了几缕银白色的光辉。早在4月间，巴伐利亚就宣布成立了一个苏维埃共和国，这便成了抵抗胜利的了的德国反革命的中心。但是它的寿命甚至还不到一个月。差不多在那同时，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联盟，在匈牙利也夺取了政权，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它的寿命较长——四个月，最后根据协约国的命令，罗马尼亚的一支部队开进去了。

然而，中欧的旧秩序已不能恢复。战争对经济的冲击已使旧秩序濒于毁灭。军事失败更使它陷于一片混乱。七拼八凑的奥匈帝国终于分崩离析，凡尔赛和约把它肢解了。德国也是那样，十多个君主国附庸随着霍亨索伦王朝同归于尽。职业军人阶级的狂热情绪可以建立一种恐怖统治，但不能使历史的时钟倒转。腐朽的社会制度的瓦解和精神的败坏，是不能靠暴力阻止得了的。

凡尔赛和约加深了旧社会制度的危机。年老一代的政客、官僚和高级军官，希望社会停滞不前。同时，他们玩弄阴谋，反对新政权。社会民主党政府不敢在和约上签字。军队大肆叫嚣，反对解除德国武装的屈辱条款。政府在条约上签

字,就可能失去军队的支持,而没有军队的支持,它连一天也活不下去。艾伯特向兴登堡请教。那个老狐狸回答道,军队绝对不能继续作战了,但他宁可作一个战士光荣而死,也不愿接受耻辱的和平。这样信口雌黄的话的意思就是:让社会民主党去承担那个签订屈辱和约的臭名吧;骄傲的军人要行动自由,要保持清白,以便有朝一日动员全国,打一场爱国战争。同时,他们希望,不论凡尔赛和约的条文如何,协约国将默许德国军队重整旗鼓,东山再起,以便使它成为反对革命俄国的缓冲力量。事实上,凡尔赛和约允许德国保留一小部分军事力量,这就使那支战败的军队的领导人,能够把它的军官骨干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

青年军官对他们的上级的这种随机应变的策略,感到不能容忍。解除武装就是使他们面对失业的悲惨前途。他们反对凡尔赛和约,主张发动一场民族解放战争。他们对凡尔赛条约的态度,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左翼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态度十分相似。他们建议对协约国占领军开展游击战争,对国内外敌人实施示威性的暗杀恐怖计划,推翻签订屈辱和约的共和国政府。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青年们酝酿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与俄国联合起来,共同对协约国作战,解放德国,以维护它的荣誉。推翻社会民主党政府,瓦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也是德国共产主义者的目标;因此,联合可以从国内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到国际方面。青年军官们寻求与革命无产阶级建立联盟,在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旗帜下,开展一场反对奴役德国的抵抗运动。

这种奇特的主义,在斯巴达克同盟中获得了不少信徒。

革命在军队的冲击下迷失了方向。如果敌人阵营中发生了叛变，有更多的积极分子投顺叛变的一方，革命就有了继续下去的可能。那是再好也没有的事了。马克思不是预言过，在最后的危机中，资产阶级社会的分解将保证革命的胜利吗？

当时拉狄克在柏林是一名政治犯。新的发展使他喜出望外。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签订之后，德国侵入俄国的时候，他也鼓吹过相似的抵抗方法。现在可以在德国应用它，以反对协约国帝国主义了。这一次列宁肯定不会象前一次那样反对了。在俄国，布尔什维克正处在不稳定的局面之中。如果协约国受到德国大规模抵抗运动的牵制，它们就不可能增援进攻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俄国白军了。俄国和德国在革命战争中的联合行动，说不定会使整个欧洲获得解放。拉狄克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府的代表。他的态度对民族布尔什维主义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死了，其他一些老资格的杰出领导人都在监狱里，斯巴达克同盟觉得自己已经很难恢复元气。但是，与斗志昂扬的青年民族主义者缔结联盟的可能性，向它展示了一个新的前景。在当时一片混乱和骚扰不安的气氛中，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鼓吹者们，对斯巴达克同盟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德国共产主义正在走向危险的境地，而当时军队正在准备一次强大的进攻，想推翻年幼的共和国。群众对这次进攻的和平抵抗，以及进攻的可耻失败，是德国早期革命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事件。大部分军官想与共产主义者联合，同时反对社会民主党政府，他们对共和国的命运漠不关心，

其中许多人还真的同情起义者。不论由于什么理由，总之，在那些具有决定性的日子里，共产主义者确实没有获胜的希望了。

早在1919年初，当社会民主党政府允诺“志愿服务团”在柏林城自由活动的时候，这个服务团就提议建立以艾伯特为首的独裁制度。但是总参谋部要慎重行事，控制住了那些急躁的青年军官。凡尔赛和约的缔结打破了德国军国主义分子的渺茫的希望：他们本来以为协约国会答应德国保留相当大的一支军队，用以对抗发生革命的危险。原来规定的军队人数是四十万，于是引起了他们的希望。那样就可以起用旧军队的全部军官骨干力量，建立一支高度专业化的军队了。但是数目被削减到了二十万，到1920年年中，又要再减少一半。那么小的一支军队，至多只能安排旧军队中百分之二十五的军官。两万以上在旧制度下占有特权地位的职业军人，将被解雇，从而失去他们的社会地位。不言而喻，这在军队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共和国政府负有在协约国管制委员会监督下，执行凡尔赛和约条款的责任。如果德国要拒绝这种强迫接受的和平条件，政府就要被推翻了。

西线的军队被遣散了。但是还有许多个师留在遥远的俄国，不受协约国管制委员会的约束。东线军队的指挥官们拒绝服从共和国政府的命令，不愿解散，也不交出武器。他们在总参谋部的秘密支持下，决定向柏林进军，推翻共和国政府，建立军事独裁制度。这一计划吸引了那些青年军官，他们本来就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要与共产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俄国结成联盟，以发动革命战争来维持德国的荣誉。那些人在东线

并没有被打败，他们成了柏林的前卫部队。这些东路军队正在向首都开来，名义上是要来交出武器，接受遣散。他们不能继续驻扎在俄国的波罗的海各省和波兰了。根据凡尔赛和约，俄国波罗的海各省及波兰都已成为独立国家，处在协约国的保护之下。这些军队也不能无限期地在遥远的乌克兰和南俄罗斯活动下去，因为他们与德国的供应基地的联系被切断了。因此，东路军队的指挥官们决定冒险行事；这确实是冒险，因为如果必要的话，协约国的军队会随时开进德国，强制执行凡尔赛和约。

到1919年底，在柏林流传着一本小册子，题目是《漫谈独裁》。它提出要社会民主党政府辞职，解散国会，在军队的监督下选举新的国民议会；同时，必须停止按照凡尔赛和约解除武装的工作。在这以后不久，一支典型的普鲁士军队，戴着有卐字徽章的钢盔，举着以前的帝国国旗，开进了柏林。它包围了政府的所有大厦，宣布成立一个新政府，政府首脑是东路军总指挥吕特维茨将军和一个名叫卡普的博士，他是旧政府的高级官员。

艾伯特总统向总参谋部驻柏林代表告急。他们断然拒绝援助；一部分军队决不打另一部分军队。他们建议艾伯特与叛乱分子谈判。后者准备接纳社会民主党的诺斯克作为他们独裁政权的傀儡首脑。社会民主党政府意识到，柏林的局势已无法挽回，于是流亡到德累斯顿去了，但是在那里，他们觉得仍有被当地卫戍部队拘捕的危险。流亡政府最后在南部的斯图加特找到了栖身之所，远远地离开了风暴中心柏林。恐怖和内战的一年，终于以反革命的暂时胜利而结束。这就是

我到达德国的时候所见到的情况。

36. 柏林的一场不流血的战役

1919年12月，德国首都的政治气氛和人们的心理状态，显出无法形容的紧张。到处充满着无所适从、惶惶不安的气氛。然而，公共生活仍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当然是当时环境所容许的按部就班。旧制度象纸糊的房子一样坍塌了；每个人似乎都已失去了对它的信念。但是没有新的东西可以填补这个真空。大多数人既不惋惜过去，也不对美好的未来存有丝毫幻想。他们需要拿出全身的智慧，勇敢地面对目前这个贫困、饥饿、迷惘和苦恼的时代。人们就象幽灵一样在街上往来来来。

在战争最后的岁月里，消费品，特别是吃的和穿的，已经供应不足。战争结束了，但物资仍很缺乏。大部分人营养不良，衣衫褴褛，愁容满面。一代儿童长大了，甚至都没有见过牛奶。没有糖，没有咖啡，也没有黄油。面包是配给的，每人每天两片，不知是什么做的，但决不是小麦。匮乏造成了一些奇怪的习俗：参加宴会的客人，自己要带着那一份可怜的配给品所谓面包和小小几片糖精。主妇待客的咖啡只是焙焦的谷类调制成的褐色溶液。我想起了西班牙的富足景象，甚至也想到了近邻瑞士的富庶。德国与之对比确是惊人的。对大部分德国人民来说，战争无疑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丝毫好处。他

们有千百条理由，一想起这次战争就感到难受。

不多久，我就发现，同一个城市却分成了两个世界——一个贫穷、破旧、阴暗；另一个却到处过着放荡的生活，骄奢淫逸，欢乐无度。市内的交通要道，繁华的坎弗斯丹登大街两旁，商店林立，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奢侈品，宽敞的咖啡馆陈设得富丽堂皇，漂亮的酒楼和舞厅直到半夜之后才开始营业。一到下午，交通拥挤，来来往往的都是最新式的汽车，咖啡馆里挤满了富裕的市民、时髦的公子哥儿、大摇大摆的官员，一个个都携带着与他们身份相当的女人。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些穿着漂亮的军装来炫耀自己的人；有的还挂着旧政权时代军人所渴望的著名的铁十字勋章，仿佛德国并没有被打败似的。这样分成两个世界的国家，变成了激烈的内战的战场，毫不奇怪。

在普遍混乱、恐慌和疑虑的气氛中，一个外国人是不容易找到栖身之所的。我要通过一位名叫爱德华·富克斯的博士与鲍罗廷取得联系。富克斯博士是一本有关社会风俗史的不朽著作的作者。他那部书详细地叙述了人类文化的黎明时期以来社会和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还坦率地讨论了性欲问题。没有一个私人或公共图书馆里找不到这本书，但是却不让夫人小姐们去阅读；然而每一个妙龄名门闺秀却都在偷偷地阅读这本坏书。

富克斯博士虽然是一位杰出的院士，但也是罗莎·卢森堡、弗朗茨·梅林和德国共产主义其他知识界先驱者的朋友，他本人实际就是斯巴达克同盟的一个成员。我所知道的所有的共产主义领导人——威廉·皮克，恩斯特·迈尔，奥古斯

特·塔尔海默，克拉拉·蔡特金，保罗·莱维——或被抓进狱中，或已转入地下。不管怎样，我去打听他们的消息那是危险的。鲍罗廷知道我会住在福敦霍夫饭店，但是他不知道我到达的日期。我别无他法，只好耐心地等待他来与我联系。

这时，我作了几次谨慎的尝试，想与富克斯博士取得联系。但看来他也很少露面了。有关他的行踪，我从几个最明显的地方——他在柏林的家、大学和公共图书馆——都打听不到一点消息。在不耐烦地等待着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我只得去办理一些财务上的事。为此，我去访问鲍罗廷介绍的一家私人银行。这位银行老板是个社会民主党人，他同情共产主义。我马上与他成了好朋友，在他家里我还遇见了伯恩斯坦，考茨基，希法亭，以及其他一些老战士，他们对他们的党所组成的政府当时面临的局势，都有些忧心忡忡。

我作为一个刚信仰共产主义不久的人，对那些人怀有很大的偏见。同时，他们那马克思主义大理论家的声望，却又使我肃然起敬；他们都那么通情达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批评既没有恶意，也不是存心寻衅。他们一方面对他们所说的李卜克内西的“轰动一时的事件”持轻蔑态度，一方面却又对卢森堡不胜钦佩。他们都相信，她永远也不会接受布尔什维主义——在他们看来，布尔什维主义只是一种新型的东方专制制度。确实，当时在德国革命的先驱者中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分歧还不十分明显。他们都同样是知识分子，抱着共同的理想——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作为具有高度文化和优雅趣味的学者，他们在私人来往和社会交际方面，都还保持着理智和人道主义的水准，没有受党派斗争的

影响。对立的信仰虽然使他们产生距离，而互谅互让却又使他们的距离得以缩短。

伯恩施坦很老了，几乎是双目失明。但是，他每晚都参加那位银行老板西蒙先生客厅中少数人的集会。这位老人永远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列宁就是他攻击的对象。他不相信布尔什维克能在俄国长期维持下去，说列宁是一个莽撞的冒险家，他的狂热思想势必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搞得一塌糊涂，他现在正在拿他的国家的命运作赌博。伯恩施坦一再慷慨激昂地说着下列这几句话，这些话与其说是恶意攻击，不如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哀鸣：“说我是修正主义者，这个狂妄自大的傻瓜。他是在糟蹋马克思主义；他才是头号修正主义者呢。”

当我被介绍给伯恩施坦时，他奚落我道：“那么，你是狂热的鞑靼人的新门徒了？”在西蒙的客厅里是无所谓保密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成三派，但三派的领导人都把西蒙当作心腹朋友。有一次伯恩施坦挖苦说，他在股票市场上替三派作投机买卖。他替三派都办事，虽然替共产主义者办的事多一些。

社会民主党是由强大的工会联合会提供经费的，后者经营着范围很广而又互有联系的合作银行。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大战末期从母体分离出来后，仍控制着一部分既得利益。共产主义者的秘密存在，需要他们在经费来源方面有一条合法的渠道。传说中的布尔什维克黄金，并不是直接从俄国运来的。它通过迂回的路线，主要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及荷兰；从俄国剥夺者手里没收来的财富就是在上述地方兑换成现金的。那些金钱到了柏林，还得再换成其他各国的货币，然后秘密送出。

德国马克在不断贬值。共产国际中央的经费必须以美元和英镑来保持稳定。所有这一切手续，只有通过银行才能够合法办理。

我终于见到了富克斯博士，与鲍罗廷取得了联系。他介绍我到电影明星埃纳·莫里娜的沙龙去，常上这个沙龙的都是共产主义者。我在那儿遇见了卡尔·拉狄克，他刚刚获释出狱，并被命令在一周内离开德国。他津津乐道地吹嘘说，与遣散的军官实行联合是十分可能的。他这个人短小精悍、生气勃勃，一刻也坐不安稳。他要说什么的时候，总是在那个大房间里走来走去，讲起话来活象在讲台上向群众发表演说；而且他不论什么时候都总想讲话。真的，他可说是占据着舞台的中心，把那个电影明星却弄得相形见绌了，那位电影明星显然是把他当作革命的化身来崇拜的。我发现在场的男人对拉狄克同样也抱有崇拜态度。这位俄国布尔什维克——虽然拉狄克实际只是加里西亚的犹太人——简直成了神圣的先知。

我对民族布尔什维主义是抱怀疑态度的，我总觉得它是异想天开。我自己有过教训，根据我的经验，民族革命只是一种笼统的理想。拉狄克似乎从我的沉默中察觉出我与他的见解不一致了。为了用形象的语言来阐明他的观点，他走到我跟前，把手搭在我肩上——我的肩膀竟比他的脑袋还高——对我说：“印度同志就是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化身，这个主义不仅将征服德国，而且还将为共产主义把整个东方都争取过来。”那时我还不能确定，他的意见究竟具有多少预言价值。我对那种值得怀疑的殊遇并不领情，对他说，至少对我来说，我认为只有民族主义情绪消亡之后，共产主义才可以成为

纯正的信仰。客厅中响起一阵轻轻的赞许声，但这位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却以高傲的态度对此置若罔闻，他认为这位东方同志的见解是错误的。他这种态度使我气愤，但我当时还是保持了沉默。

沒有多久，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肥皂泡便吹破了，斯巴达克同盟因此陷入危机，好不容易才渡过了难关。我对那种想入非非的信仰的怀疑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对此起了有益的作用。无论如何，我可能影响了恩斯特·迈尔。他当时已继卢森堡成为早期德国共产主义的理论权威。拉狄克返回莫斯科，将要被当作英雄一样受到了欢迎，因为他的口袋里装着赢得德国的计划嘛。列宁否定了这个计划，谴责民族布尔什维主义是荒谬绝伦的。他严格批评了反对凡尔赛和约的极端民族主义立场，认为那是轻浮的行为；列宁这一批评意见，后来在他写的著名小册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作了更加详尽的阐述。

1920年3月初，一部分德国旧军队企图推翻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差一点就搞成了。一天早晨，这支军队开进首都，沒有受到任何抵抗，便占领了一切战略要地。社会民主党总统艾伯特怕被捉住，带领着他的内阁人员，慌慌张张逃出了柏林。那是战后欧洲历史上最富有戏剧性的时机之一。我住的旅馆在柏林市中心（波茨坦广场），我从窗口看到一支典型的普鲁士军队，排成扇形向各个方向散开。不同阶层的人口目瞪口呆地站在两旁，仿佛被一个突如其来的灾祸吓傻了。这个大城市陷入一片混乱。

但是隔了一夜，就有勇敢的领导人出来控制局势，进行反

击了。正是在这紧张时刻，我第一次见到了威廉·皮克。起先，我当他是穿便衣的军官——他中等身材，不苟言笑，额头上边的褐色硬发更使他显得严肃。那是共产党的一次秘密会议。我是与恩斯特·迈尔一起去的；迈尔是个博学的知识分子，神态安详，说话温和。他接替了皮克，担任党的领导人。会议要解决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而且必须在天亮以前迅速作出决定。一件完全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德国劳工联合会是个有势力的组织，它的主席卡尔·列金发出号召向反革命展开抵抗；但是几年来共产党以及社会民主党的整个左翼，一直骂列金是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现在列金已经决定，天亮以后将宣布政治性的总罢工。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怎么办呢？是充当改良主义者列金的第二把手或第三把手呢，还是干脆在那关键时刻避不露面？迈尔主张走前一条路。皮克犹豫不定，于是建议与独立社会党（这是从社会民主党分裂出来的左翼成立的新党）商量。一个联合委员会在天亮以前发出了罢工号召书。皮克和迈尔在号召书上代表共产党签了名。

四天之中，这个大城市就象死一样的沉寂，商店关门了，工厂停工了，白天街上空空荡荡，夜间一切都笼罩在黑暗中。在第五天早上，我从旅馆的同一窗口眺望，只见一群戴钢盔的士兵向相反的方向开去，他们垂头丧气，默不作声。组织起来的劳工的力量战胜了野蛮的力量。这几天中，街上没有一个人，叛乱的军队甚至连开一枪的机会也找不到。能够目睹这一切是十分幸运的。它自然在我心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与迈尔和皮克的结识是这个场面的一部分。从那以后，

其中一位已被嗜血的母亲——革命吞没了，那也许因为他是个聪明的、真诚的孩子；另一位则获得了报酬，但主要不是由于他对这位女神的忠诚，而是由于他对她的那些祭司长们的巴结，这正好暴露了他在理智上缺乏独立的见解。

对保皇派军国主义反动势力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之后，改良主义者列金还采取了另一个勇敢的行动：如果得到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和其他左翼政治领袖的支持，那就很有可能巩固共和国，并终于会改变德国以至欧洲后来的历史。列金要求改组内阁，清除臭名昭著的诺斯克，以及另外一些在危急关头有十分不可靠的表现的人。共产主义者跟在独立社会党人后面，退出了联合阵线，拒绝支持列金的要求。在那次决定命运的谈判中，皮克是他们的代言人。要不是迈尔正好在这个关键时刻出狱，皮克可能已经把党引导到一条可耻的道路上去了。拒绝支持列金的改组内阁的要求，使党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了很远一段路。

列宁的干预制止了这一危险的倾向，他严厉谴责了给民族主义涂上红色的作法。幸亏斯巴达克同盟的老卫士那时出狱了。迈尔和塔尔海默接替皮克，当了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分子从德国共产党的队伍中被清洗出去了。

37. 德国共产主义的老卫士

卡普—吕特维茨暴动的失败是德国内战的一个转折点。列金想在工会直接控制之下改组政府的企图没有成功。但革命运动在德国的工业区又恢复起来了。这在来因地区，特别是鲁尔河流域，此外还有萨克森州都发展成为武装起义，持续了几个月之久。为了打败“鲁尔河的红军”，艾伯特和米勒领导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授权帝国军队的冯·泽克特将军组织国防军，这个由职业军人组成的军队后来就成为复活的德国陆军的核心，二十年以后它再一次蹂躏了欧洲。

然而，鲁尔地区的无产阶级暴动是一个自发的运动，它并没有政治方向。所有三个工人阶级党派确实都反对冒险。他们发出了一个联合宣言，号召工人放下武器，以免和国防军冲突。威廉·皮克代表共产党签了字。鲁尔的暴动成功的希望很小。协约国的胜利了的军队已有了警惕。事实上，冯·泽克特将军主要是由于得到胜利了的敌人的默许才能建立起国防军，而不是由于《魏玛宪法》在法律上所给予的许可。

德国中部的革命运动则孕育着更大的希望。海因里希·布兰德勒尔显露了头角。他不久便成为德国共产党的领袖，并且保持这个地位直到1923年第二次德国革命失败之后为止。布兰德勒尔不是平步青云上来的人。他的职业是建筑工人，他以一个高度熟练的工人的身份而上升到行业的上层。他年轻时，遍游欧洲各地，靠当一名中世纪式的学徒工维持生活。他曾在瑞士见过列宁，并在那里同布尔什维克流亡者一

起生活过。自从本世纪初以来，他就是一名积极的社会民主党成员，最后，他在克姆尼茨^①定居下来，把当地的工人组织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工业和政治团体。这个团体在革命爆发时，和共产主义者站在一边。当柏林军官暴动的消息传到克姆尼茨时，当地的工人在布兰德勒尔指导下，实际上夺取了那个城镇，并准备设防守卫。他们占领了市参议会，成立了一个工人委员会(苏维埃)，作为该镇的事实上的政府。他们把所有可能参加反革命的人都逮捕了起来，并缴了当地驻军的武器。布兰德勒尔计划向大工业城市来比锡进军。在那里同萨克森州其他城镇的起义工人会师，然后向柏林猛冲并加以围困，因为据说柏林已被波罗的海集团军占领了。

正当布兰德勒尔进行他的战略部署时，一位比他更引人注目的人物出现了。那就是马克斯·赫尔茨；他从萨克森高地的贫穷农民中募集了一支人数众多的游击队。当时，柏林的反革命势力被打败了。布兰德勒尔主张利用这个喘息的机会，在各工业城镇建立一个坚固的共产主义基地。他不同意赫尔茨的挑衅性活动，并把他开除出共产党。但是这位萨克森州游击队首领的传奇般的声誉已经在全国各地传遍。共产党总部决定派一个代表去亲自同布兰德勒尔会晤，并把德国中部形势的第一手资料告诉他。

马克斯·赫尔茨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和有关他的游击活动的有声有色的记述使我着了迷。我很想见见他，并就近观察他是怎么指挥作战的。奥古斯特·塔尔海默已经接替皮克当了共产党的领袖，他一反平常的冷淡的幽默态度，对我的浪漫

^① 克姆尼茨(Chemnitz)，又名卡尔-马克思城，在东德境内。——译者

主义习癖报以慈祥的微笑，并且安排了我的旅程。可是，这次我并没有见到马克斯·赫尔茨。我直到1928年才见到他；他在1921年被捕入狱，服满了七年刑期，于1928年到了莫斯科。我在克姆尼茨倒遇见了布兰德勒尔。

我同一位名叫古拉尔斯基的人一起从柏林出发；他是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刚从莫斯科来。鲍罗廷就是这样把他介绍给我的。但是他更喜欢化名克莱因，装作德国人。此人在外表上或智慧上都不如鲍罗廷，他是一个典型的东欧犹太人，服饰华丽，架子十足，对自己的使命讳莫如深。尽管如此，他作为皮亚特尼茨基的私人代表，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法国，都取得了比较重要的地位。皮亚特尼茨基在20年代初期控制着共产国际的地下组织，并且向各国分部发放少量的金钱。

布兰德勒尔和古拉尔斯基都讲德语，他们的话我是听不懂的。布兰德勒尔几乎不理睬我，但他的相貌和讲起话来好象发怒的叭喇狗在狂吠的深沉喉音，却给我以深刻的印象。他本人就象一只叭喇狗——大脑袋，面孔宽阔结实，躯干短小有力，显而易见是个驼背。他在很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建筑师的助手，曾从很高的施工架上摔下来，脊骨受了伤。心理学家说，一个人要是意识到自己身体上的缺陷，就会产生变态心理。虽然在初次见面时，我痛苦地遭到冷遇，但是后来我逐渐同布兰德勒尔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这个人除了极度害羞之外，没有什么不正常之处，他尽量靠着粗野的声音和明显的粗鲁态度来掩饰这一缺点。一个搞群众工作的人竟会害羞，这也许就是一种心理变态的表现吧。

在最杰出的共产党领袖中间还有一个驼背，这真是个少

有的巧合。那就是意大利的安东尼奥·葛兰西。我是在莫斯科见到他的。他不是工人，而是知识分子，一位哲学教授。他也极端害羞——比布兰德勒尔更甚。在私人场合他很少说话。他在法西斯政权初期被捕，坐了二十二年牢，意大利解放时获释，不久就死了。长期的监禁损害了他那虚弱的身体，但吓不倒他的志气。葛兰西在考虑了克罗齐甚至在他转变成为一个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人之后在进步的年轻一代中仍享有很大的威望这个事实以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面应当加以修改，才能向那些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人提供克罗齐所贡献的东西，甚至还要多得多。葛兰西留下了大约二千页的遗稿，这都是他在牢房里潜心研究的结果。这可能是到那个时候为止任何一位共产主义者在哲学思想上所作的最大贡献。

布兰德勒尔不是知识分子。他是合乎马克思主义文献理想的工人典型——他通过自学达到高深的水平，对于自己属于一个注定要建立社会新秩序的阶级感到自豪，对于自己以及整个无产阶级都充满信心。在20年代初期，和他一同担任共产党领导的人——恩斯特·迈尔，奥古斯特·塔尔海默，保罗·莱维，保罗·福尔利希——都是知识分子，对文学、艺术、法律、哲学、经济学都有很深的造诣。他们对布兰德勒尔的才识有很深的印象，他就是依靠自己的才识来处理一切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

我看着他同古拉尔斯基谈话，心里出现各种各样的感情。古拉尔斯基显然想要摆摆权威的架子。但布兰德勒尔对他并不怎么尊重；对于自己认为不重要的问题，就咆哮地说上三言

两语作答。最后，布兰德勒尔才有些注意到我。他是典型的欧洲无产者，从没想到共产主义竟还可能在殖民地国家里找到信徒。我对他的态度感到愤慨，在初次会见之后怀着一种反感分了手，直到1922年，他到莫斯科来，我对他已有了充分的了解之后，这种感觉还未消除。又过了一年，我和他为了准备第二次德国革命便紧密地在一起工作了。甚至在那个时候，我们在私交方面还不是友好的。我们之间似乎被一种捉摸不到的东西挡着似的。后来我才意识到，那是他的害羞和我原来的反感所造成的。直到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俄国人很不公平地把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他的身上，并把他调离党的领导职位时，我才主动消除了隔阂。此后，他被拘留在莫斯科达两年之久。当然，经过了那场经历的刺激之后，他只好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了。后来在1929年我们又在柏林相见，可说是彼此终于见到真心了。他原来是个最忠诚、最热心的朋友。

我和奥古斯特·塔尔海默的关系从一开始便是私人的友谊。他更象一个学者，而不象革命家，虽然他对工人阶级社会解放事业很忠诚。假使他不献身于革命事业，他在学术界本来可以上升到很高的地位。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人家要他和布兰德勒尔两人负起第二次德国革命失败的责任时，那个轻率的拉狄克就曾嘲笑他是生活在梦境中的典型的德国教授。批评是恶意的，但是说得还差不多。塔尔海默经常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缺席，但我们知道该到那里去找他。他常常坐在一个小咖啡馆里，面前总是放着一杯斟得满满的啤酒，聚精会神地在考虑高等数学里的某一个问題。但是责

任感使他走出抽象概念的梦幻之乡，转而同样热心地去考虑革命的理论与实际问题。除了数学之外，语言学也是他专门研究的学问。他在学术界被公认为研究帕尼尼^①的权威。除了布哈林之外，他就是共产国际运动的最高理论家；甚至在他被开除出党之后，仍然负有这个盛名。

塔尔海默是我到达柏林以后不久见到的第一位德国共产党领袖。我们是在爱德华·富克斯的家里见面的，凡是不常去埃纳·莫里娜的时髦沙龙的共产党要人都以该处为聚会地点。富克斯在柏林郊区松林中的家很象个小型的美术陈列馆，也象个文物博览馆。他是收藏多米埃原画最多的收藏家，颇引为自豪。他的藏书丰富的私人图书馆专门搜集有关艺术史和文化史的书籍。每间藏书室都有其独特的风格。总的印象是相当精致幽雅，豪华而不过分。富克斯对于自己那满满的酒窖更是得意非凡。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奢靡享乐之家，它还有带一点希腊风味。当富克斯把我介绍给塔尔海默的时候，塔尔海默从一张大扶手椅子里站了起来，眼睛还端详着他那灼热的烟斗。富克斯说：他从鲍罗廷那里听到有关我的事情的时候，他认为我应当首先会见奥古斯特·塔尔海默。一会儿恩斯特·迈尔也来了。他们三个人都讲英语，交谈的内容是一般性的。当时德国报纸上开始出现一些零星的关于印度不合作运动的消息。我的新相识都很好奇，他们很想多了解一些情况，以便知道在那个遥远的国度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无法就当时的具体形势方面给他们很多的启发。但是他们对于会见的这个印度人竟然不相信自己国家的情况和其

① 帕尼尼 (Panini), 大约公元前 2—4 世纪的印度梵文文法家。——译者

他地方有什么基本不同之处，显然感到惊奇。他们对于我迫切地了解德国的全部形势，也觉得有些意外。当我们在午夜分别时，大家已经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朋友了。

此后，我们经常会面，我被邀请去参加共产党领袖们讨论有关当时革命问题的秘密会议。我从那里得益不浅，不久就能够参加讨论了。塔尔海默花了很大的工夫把讨论会的内容给我翻成英语，并征求我的意见，然后再把它译成德语。他是党的领袖。保罗·莱维还关在监牢里，布兰德勒尔远在萨克森。由于他的态度，自然使我在共产党领导人的心目中占有了一定的地位。他们都以友好、亲善和尊敬的态度对待我。

38. 左派共产主义

社会民主党政府在战败的德军总参谋部的指教之下才敢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很明显，德军统帅部并不赞同青年军官联合俄国以继续战争的冒险做法。对于极端民族主义的青年来说，凡尔赛和约的签订，就是暂时压下了民族布尔什维主义。但两年以后，当民族主义青年联合共产主义工人以大规模的怠工破坏行动去抵抗鲁尔河流域工业区的法国占领军时，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火焰就又燃烧起来了。

拉狄克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一篇充满热情的演说，颂扬刚被法国人处死的怠工运动的领袖施拉加特。他把这个极端民族主义的代表描绘成为奋起反对凡尔赛和约

的德国人民的革命计划的化身，和约使他们的祖国沦为协约国帝国主义的一个殖民地。拉狄克代表俄国共产党讲话，博得了大会的掌声，全世界各地的共产党报刊都用显著的篇幅报道了他的演说词。我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赞扬反帝的民族主义所起的革命作用。我这篇关于施拉加特的文章，也由全世界的共产主义报刊以显著的位置转载了，这篇文章以及他们对我早期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活动的了解，使我在极端民族主义的德国青年中间很受欢迎。

在德国共产党内部，海因里希·劳芬贝格和弗里茨·沃尔夫施泰因这两个人对民族布尔什维主义作了详细的阐述；他们两人都是社会民主党的老党员。他们对党的领导人在战争期间以及旧政权失败和垮台之后所采取的政策感到厌倦，因此都参加了共产党。但在1918年的革命危机中和接着而来的整个内战时期中，斯巴达克同盟的政策也是软弱无力，摇摆不定的。卢森堡认为无产阶级夺取德国政权的时机还未成熟。而且，她还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武装起义的纲领。她相信，总有一天，无产阶级会起来反抗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转而给予共产党以有力的支持。到了那个时候，共产党合法地接管政权的时刻就到来了。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共产国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卢森堡这个见解的影响。

因此，那些富于战斗性的党员很欢迎民族布尔什维主义，而摒弃了他们认为是社会民主党传统的东西。劳芬贝格和沃尔夫施泰因在党内能号召一大批群众。当时党的领袖是威廉·皮克和保罗·莱维；他们在1919年10月海得尔堡第二

次党大会前夕，把这两位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代表人物开除出党。莱维承继了卢森堡的衣钵，虽然他的才能不如卢森堡。在所有的斯巴达克同盟的领导人中，他同卢森堡最接近，和她的见解完全一致。同时，由于他和拉狄克又有密切关系，他必定也同意拉狄克对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看法。劳芬贝格和沃尔夫施泰因曾在监牢里会见过拉狄克，向他提出一种联合极端民族主义者运动来进行革命斗争的计划，并取得了他的认可。这个计划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莱维把他们开除出党，是因为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否定他用合法手续夺取政权的策略。在海得尔堡党代表大会上，民族布尔什维主义以左派共产主义的姿态出现。大多数代表都把莱维和皮克所主张的政策视为改良主义而加以排斥。他们从党分裂出去，另行成立共产主义工人党，决心要为实现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克纲领而奋斗。

当我到柏林的时候，鲍罗廷已经离开，去参加秘密召开的海得尔堡大会了。他事后告诉了我那里的情形。我还知道荷兰的赫尔曼·果特是左派共产主义的理论领袖，这种共产主义就是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在一本小册子中所批判的“幼稚病”。这时，德国的内战加剧了，反革命在1920年3月不流血的柏林战争中受到了打击。鲁尔“红军”的组织者就是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党员。我是同情左派共产主义的，我想会见果特。他是个出名的作家，是共产国际早期历史中受人尊敬的荷兰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小组中的一员。其他几个成员是亨里埃塔·罗兰-霍尔斯特、安东·潘尼凯克、J. 拉特格斯和H. 斯内夫利特。我不能马上到荷兰去，但不久就见到

斯内夫利特，因为他作为代表取道柏林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斯内夫利特的建议，拉特格斯也到柏林来看我。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见到了罗兰-霍尔斯特。1922年我到荷兰去时又见到了潘尼凯克和果特。

亨利埃塔·罗兰-霍尔斯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是一个享有盛名的女诗人了；当时盛传她可能获得诺贝尔奖金。但是她的原著是用荷兰文，有的甚至是用佛兰芒文写成的，从来没有译成欧洲的主要文字，所以她的诗人名望主要局限在国内。她出身贵族家庭，嫁给了一个佛兰芒的贵族；她丈夫并不赞同她的政见。她是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一位代表，但从没有参加过讨论。由于双方友人拉特格斯和斯内夫利特的介绍，我和她的友谊就逐渐加深了。她支持社会革命事业主要出于感情，虽然她并不缺乏对共产主义的理智上的评价。不过她对马克思主义前的乌托邦主义更为熟悉。她作为一个左派共产主义者，是不赞成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因此，她从莫斯科回来后感到相当失望。此后，她就退隐居住在佛兰芒边界她乡间的家中。1922年，我在那里住了几天，结识了她的丈夫。他是个很有趣的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不反对，只是漠然置之。他同工人一起在农场里劳动，晚上时常和一些工人把时间消磨在酒店里，而不在家里吃晚饭。他们两人的关系与其说是夫妇，还不如说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虽然两人都生活得很幸福。他们并无子女。她象许多富于感情的共产主义者一样，拥护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后来就被开除出党。此后她就完全脱离政治，终于信仰天主教，

成了虔诚的基督徒。

安东·潘尼凯克是闻名欧洲的天文学家。他在政治上从来没有积极过，因为他只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面感兴趣。他住在希尔维苏姆天文台里面，活象一个隐士。我每次到荷兰去，都到那里看望他。果特是潘尼凯克的好朋友，潘尼凯克显然认为，受到列宁批判的左派共产主义比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机会主义，更加符合马克思主义。

拉特格斯是一位工程师，他参加过殖民地的工作，本世纪初在印度尼西亚住了几年。他对殖民地所受剥削的后果感到震惊，所以他回国之后就参加了社会党。社会党就是根据他的建议，而将注意力转到了组织殖民地的劳工方面，并把斯内夫利特派到印度尼西亚去的。拉特格斯革命前在瑞士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有过接触。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不久，他就到俄国去协助重建的工作。但在战争年代，在共产主义和内战时期中，无法进行多少建设工作。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拉特格斯肩负着设立共产国际西欧局的使命回到荷兰。罗兰-霍尔斯特和荷兰议会议员戴维·威吉库普都参加了那个西欧局。

拉特格斯对殖民地的革命运动特别关注，所以他在柏林时，找我讨论如何使共产国际协助解放被奴役的民族。他动员我，要我坚持把被奴役民族的解放问题放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议程的显著地位上。刚从印度尼西亚回来的斯内夫利特可作出席大会的代表，但这事必须由我提出倡议。拉特格斯本人没有参加那个会议。他在1921年回到莫斯科，是指出西伯利亚具有很大工业潜力的第一位工程师。经过了一

次考察旅行之后，他提出在库尔巴斯建设一个工业基地的计划，因为那里煤矿和铁矿连成一片，深达数英里的煤层暴露在地面上。那个计划建议专门招募外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工程师和机工来开发一个新的工业中心。拉特格斯亲自到外国去招募第一批人员来担负艰苦的准备工作。三个留学德国学习工程的印度学生，顾虑在国内找不到适当的工作，就加入了拉特格斯的开路先锋队伍，在西伯利亚开始进行发展工业的工作。

斯内夫利特是荷兰左派共产主义者这个小组中最热情、最吸引人的一个成员。他是把社会主义信息介绍到亚洲的第一人。他在1913年就到爪哇当荷兰商会的秘书，这是一个掩护。不久，他集合了一部分青年人，培养他们去组织一次工会运动和一个社会党。他被逮捕了，以阴谋颠覆荷兰政府的罪名受到审判。他承认犯了罪，但还为自己辩护。他在法庭上的发言是对殖民主义的严厉谴责，是为被奴役民族奋起反对荷兰帝国主义的权利而进行的辩护。他被宣判有罪，但是处分仅仅是驱逐出殖民地罢了；由于照顾到白种人的尊严，任何更严重的处分是不能加以考虑的。如果把他同犯罪的本地人关在一个监牢里，岂不是一件不得了的丑闻！

战争期间，他在留学荷兰的印度尼西亚学生中间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建立了一支有训练的骨干力量，准备回国后从事组织工作。他想到印度去，在那里成立一个整个东方革命活动的中心。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前，他一直希望能够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回到东方。他和我在柏林会面，商讨他的计划，并想取得我的同意和合作。他那显而易见的热情

深深地感动了我。那股劲头极象基督教传教士传播福音的热忱。我们成了挚友，甚至不让我们的私人关系受到后来政见分歧的影响。我通过他，结识了许多印度尼西亚革命运动的领袖，象萨马翁、苏达尔桑纳、坦·马拉卡、阿利明、哈达、沙赫里尔，这不过是其中最出名的几个罢了。他们多半都是荷兰各大学的学生；有些还是革命流亡者。我每隔一些时候，就到荷兰向斯内夫利特所组织的学习组作报告。他们中间的共产党员都把我当作自己的老师。实际上，组里面大多数人都是共产党员。

最后，斯内夫利特离开共产国际，成为托洛茨基的一名主要助手。纳粹占领荷兰时，他被逮捕枪决。

当我第一次在柏林和斯内夫利特相见时，他和他的朋友果特都同刚成立的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有密切的关系。通过他，我和这个新党的一些领导人接触过。他们大多数都是没有继承斯巴达克同盟传统的青年人。他们怀念着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卢森堡，但对她反对布尔什维主义一事并不表示赞同。他们痛恨保罗·莱维，因为他们认为他不是一位革命家，而是一个改良主义的议会雄辩家，他依靠同卢森堡的友谊正在毁坏年轻的共产党。但是他们对莱维主要不满之处还在于他承袭了卢森堡对俄国布尔什维克、尤其是对列宁的反感。他们还说，莱维认为改良主义的独立社会民主党比革命群众运动更为重要，他还把布尔什维克左翼从共产党中清洗出去，以便把独立社会民主党接纳到共产国际中来。据他们说柏林、汉堡和工业发达的来因地区的大部分共产党都参加了这个新党。

直到1920年年初，除了俄国之外，实际上还没有一个组织完善的共产党。虽然全欧的工人阶级运动总的说来是同情俄国新政权的，但是只有人数较少的左翼小组赞同布尔什维克的政纲。甚至斯巴达克同盟也不过是一个组织松散的宣传小组而已。在各个共产党赢得人民大众的拥护以前，就谈论仿效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去组织起义并夺取政权，这简直是痴人说梦。把各国的共产党作为群众组织建立起来才是当务之急。工人大众仍然是由社会党人所控制的工会组织起来的。要使工人同改良主义的传统实行决裂是困难的，这样就会鼓励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在共产党年轻的领导人中滋长。他们认为和与陆军有接触的极端民族主义青年结盟，那就容易夺取政权。结盟的事并没有实现，但青年人的急躁情绪却构成了左派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这说明共产主义还未成熟，正如列宁所描绘的那样，是“一种幼稚病”。但在目前，共产国际的组织者还不能排斥左派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他们当时都是俄国革命的最热心的拥护者，而且都急于想在自己的国家里学习它的榜样。

塔尔海默和恩斯特·迈尔都倾向于这种主张，但最后的判断要等到莱维获释出狱后才能作出。独立社会民主党当时赢得最广大的群众的支持，它正在考虑派一个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建议。莱维就是负责谈判这件事的。我们不应破坏他成功的机会。我对这位有望成为德国的列宁的人并没有深刻的印象。确实，他很聪明，是一个精明的律师、熟练的议会雄辩家。他很会为自己的问题作辩护，但多少有点靠压服。遇到别人反击时，他往往就大发歇斯底里。

他激烈地反对与左派共产主义者妥协的意见，把他们斥为“轻浮的冒险家”。当我指出，假如共产主义工人党派一个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谁都没有办法阻挡时，他就暴跳如雷；他就是不让那个代表团参加。问题就这样搁置了起来，留待莫斯科解决。

莱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他几乎同每个人都吵过架。不久，这位激昂的知识分子的德国共产党领袖的地位就被工人出身的布兰德勒尔取代了。莱维受到挫折，很感痛苦，他又回到社会民主党了。但由于他过去的行为，他在那里也得不到信任。1929年，他在柏林一幢建筑物的五楼寓所，从窗口跳楼自杀了。

39. 在柏林的印度革命委员会

虽然我对五年前离开印度时所负的使命已经不感兴趣，但既然到了柏林，我仍然想和大战开始后在那里成立的印度革命委员会取得联系。1914年年底，这个委员会的一位密使带给我们在印度的同志的消息说：德国政府愿意协助我们争取独立的斗争。这个消息当然使我们大为兴奋。我被派往荷属东印度去接收一轮船军火，并负责安排把军火运到印度海岸某处。

我们对柏林委员会成员的情况了解得很少，虽然他们自称代表印度的革命民族主义运动。除哈迪阿尔、维伦德兰纳

特·查托帕迪阿亚和布彭德伦纳特·达塔等少数几个人之外，其余的人在国内外都不曾积极地参加过这个运动。其中有些人同在美洲和在欧洲的反英宣传有联系。尽管这样，柏林委员会的成员都还是被印度国内的同志当作伟大革命家来敬仰的。因为他们能够在柏林取得一个交战一方的代表的地位，以便获得德国政府的支持，赞助印度反对英帝国主义，这个成就不小。这个委员会看来曾经提出过要起一个临时流亡政府的作用，而且相信会得到德国政府的承认。

委员会本身的这种幻想，再加上德国宣传部的欺骗，造成了一种不现实的气氛。委员会完全同印度隔开，在欧洲无法对于促进印度独立的事业作出什么贡献。德国是利用它来达到宣传目的的。这个委员会有些成员被派到土耳其，去担负煽动美索不达米亚的印度军队叛变英国的宣传使命。但是这个煽动性的号召收效甚微。失败的原因主要并不在于印度军队的忠诚，而在于宣传不起什么作用。总之，印军并没有叛变，而被俘印军的数目也不足以组成一支解放部队。大概由于这显然是个无效的计划(如果真有此计划的话)，所以土耳其人和德国人都对它不感兴趣了。没有任何这样的部队到过靠近印度边界的任何地方。这个委员会由于自身的组成和生存的情况，注定无法打开四外无援和无所作为的局面，不多久，它就因为领导成员间互相猜忌，发生内讧，而终于瓦解了。

萨罗吉尼·奈杜的兄弟维伦德兰纳特·查托帕迪阿亚是个活动分子。他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就参加了一个恐怖组织，萨瓦卡尔也是其中一个成员。萨瓦卡尔由于暗杀柯曾·魏利那样毫无意义的行动而被逮捕并被驱逐出境，送回印度。后

来，查托帕迪阿亚逃到法国避难。他在那里和卡马夫人与克利希那韦尔马结识；这两个人正在那里从事反英宣传。大战爆发后，查托帕迪阿亚移居柏林，这可能是出于自愿，也可能是应德国人的邀请。卡马夫人和克利希那韦尔马都自称是社会党人。他们没有跟随查托帕迪阿亚一起，与普鲁士军国主义实行妥协性的联合，来反对英帝国主义。他们自称社会党人，曾多次参加谴责军国主义并通过反战决议的国际代表大会。1924年，我在巴黎遇到卡马夫人。这位可爱的老太太依然是个反英的鼓动家；但在她的思想中很难找到社会主义的东西。那时候克利希那韦尔马已经逝世了。

大战爆发的时候，德国的大学里还有一些印度留学生。他们作为英国的国民，都算是敌侨，按理应当拘留起来。于是查托帕迪阿亚用免于拘留作为诱饵，劝他们加入他的组织。进一步引诱他们的东西就是在学业结束前授与博士学位。最初的印度革命委员会就是这样成立的。有个名叫穆罕默德·曼苏尔的人当选为主席；他是享受印度官费留德研究语言学的。因为德国和土耳其结盟，德国人和印度人打交道的时候，总是特别重视穆斯林。

战时曼苏尔博士在土耳其呆了一些时候。后来印度革命流亡者从美洲过来，参加柏林委员会，他就终于被挤到无关重要的地位了。在我到达柏林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两三年后，他带着他的德国太太在莫斯科出现，自称为共产党员。他原来在柏林委员会里的同事们怀疑他是英国间谍，虽然证据很不充分。然而，他在莫斯科并未得到信任。并且，我也无法弄清他到那里去的原因，只有让他自己想办法了。过

了几个月，他的老婆来告诉我说，他已被捕，而且不准她去看他。当然，她在危难的时候是来要求我去替他说项的。当时在俄国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被人怀疑为间谍了。甚至列宁都无法拯救一个因间谍嫌疑而被逮捕的人的性命。“契卡”（肃清反革命特设委员会）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就象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公安委员会一样。它是赤色恐怖的工具，残酷无情地行使权力。尽管这样，我真的干预了这件事，获准让曼苏尔离开俄国。他被押解离境，离开之前甚至都不准和我相见。此后，他在德国一直住到1930年，好象他并不太感激我把他救出鬼门关——进鬼门关是在俄国赤色恐怖时期被捕的间谍犯人无法逃脱的命运。

我于1930年12月回到印度，并于第二年6月被捕。在坎普尔监狱受审期间，曼苏尔博士作为原告证人确定我就是他在莫斯科遇到过的“M. N. 罗易”。他在几个月以前就回到印度，并已被聘为阿利加尔大学教授。风传曼苏尔博士所以能够获准回到印度并且得到教席，那是对他的工作的报酬。这事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反正那是无法证明的。不过他把受审的人确定为“M. N. 罗易”，是对我作出不利判决的关键。当我仍在坐牢的期间，曼苏尔博士就死了。我们不应当说死人的坏话，只能从好的方面来解释他的行为。

早在1915年，德国外交部就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去阿富汗，目的是为了消除英国在那里的影响，并在那里设立一个宣传中心，以鼓动印度闹事。计划是要在喀布尔成立所谓独立印度临时政府，号召印度人民起来反抗英国人的统治。德国的东方事务专家认为，这个印度临时政府的首领应当由王公

一级的人担当，才有代表性。维伦德兰纳特·查托帕迪阿亚足智多谋，他提出了一个人。联合省^①的哈特腊斯的王公摩晒陀·普拉塔普正在瑞士陷入窘境。他是在大战爆发前离开印度到欧洲旅行的。他同意来柏林，但要德国皇帝赐予接见才行。查托帕迪阿亚在德国外交部印度司的同意下，接受了摩晒陀·普拉塔普的条件，于是他到了柏林，并当选为印度革命委员会的主席。可是，他所妄想而曾蒙许诺的德皇赐见并未实现。德方的借口是这位最高统帅正在前方指挥作战。这位当选为独立印度临时政府总统而未就任的人只得到一个安慰奖；他受到了皇太子的接见。

印—德使团途经波斯到达喀布尔。为首的是德国外交部的冯·亨蒂希男爵。与此同时，阿曼纽拉已经干掉了他的亲英的父亲而登上阿富汗王位。他欢迎德国使团，准许成立以摩晒陀·普拉塔普王公为总统和以马兰拿·奥贝杜拉为总理的独立印度临时政府。奥贝杜拉从印度直接来到了喀布尔。虽然由于英国全神贯注在欧洲和近东的军事行动上，使阿曼纽拉赢得了所谓第三次阿富汗战争，但在俄国革命以前，他不能完全摆脱英国的影响。当时，在英国和沙俄的压力之下，他赶走了德国代表团，但仍然容许印度革命党短时间留在那里。俄国布尔什维克政府关于支持所有被奴役民族争取自由的宣言鼓励了阿曼纽拉国王，也提高了在喀布尔的印度革命者的地位。不久，俄国新政权的外交使团来到喀布尔。但是所谓的印度临时政府尽管得到了一切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它对印度境内的事态却不能施加影响。它的宣传活动只局限于

^① 现为印度的北方邦。——译者

鼓励边境各部落反对英国。

1919年，摩晒陀·普拉塔普王公离开喀布尔到柏林，与中央革命委员会磋商将来的行动计划。他途经俄国，在莫斯科受到列宁的接见。那次会见是很有趣的。我从列宁本人得到第一手的报告。看来摩晒陀·普拉塔普自青年时代开始就固执地相信自己是一个先知。当他在喀布尔的时候，还写了一本小册子，谈论他所谓的《爱的宗教》。他把这本书赠送给列宁并告诉他说：列宁只有按照书里面所阐述的原则去指导俄国新政权，否则革命就会失败。列宁答应要把那本小册子读一遍，然后再找那位先知发表他的意见。在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列宁劝告那位爱的宗教的先知到英国去传播他的福音。他又说：布尔什维克党人不相信上帝；只有当这位先知在自己的国家里取得了象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俄国所取得的那样成就之后，布尔什维克才会听从这位先知的忠告。

* * *

在维伦德兰纳特·查托帕迪阿亚之外，要数哈迪阿尔是柏林委员会最重要的成员了。从智力方面讲，他要高明得多，但他的情绪有些古怪，政治上反复无常。他从一个正统印度教徒变成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美国亚历山大·巴克曼和埃玛·戈德曼的亲密伙伴。不过，他的反英的民族主义热情仍占上风。因此，哈迪阿尔到柏林去参加了那里的印度革命委员会。不久，他和查托帕迪阿亚发生冲突，因为后者以德国人为靠山，把持一切。反英活动的规模很容易超出直接促进印度自由事业的范围。查托帕迪阿亚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物，精神饱满，喜好冒险。他秘密地在欧洲的中立国家之间旅行，

似乎对德国的特务机关帮助很大，因此他在柏林的印度人当中取得了优越的地位。正因为这样，他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就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哈迪阿尔。哈迪阿尔被捕，被当作敌侨拘留了起来。德国战败后，他逃到瑞典，写了一本耸人听闻的书，描述他在柏林的经历。

书中主要部分是他忠于英国的热情的表露。这究竟是哈迪阿尔在政治上摇来摆去的又一证据呢，还是经验教训使他获得了清醒的判断呢，这只有自己去推测了。总之，一个人能够在群众心目中成为不屈不挠的传奇式的革命民族主义者，他必定具有了不起的大勇。这种大勇却又使哈迪阿尔丧失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威望。后来他脱离了政治，退隐到乌普萨拉大学当了教授，就那样度过了他的余生。我从未与他见过面，但据我所知道的有关他的活动，就可以判定他是很有个性的人了。他搞政治是不适宜的，但当他终于找到了自己所喜爱的职业时，却又不幸短命而死。也许这是祸中得福。民族主义一旦成功，对于它的英雄缔造者和苦难的先驱并不是特别感恩戴德的，今天他们那些人正默默无闻地过着辛酸的晚年呢。

钱帕克拉曼·皮莱是柏林印度革命委员会中最有风趣的成员。我第一次到柏林时，并没有见到他。后来，在1922年，我发现他开设了一家东方古玩店。他原是特拉凡哥尔地方的一个孤儿，由一个英国传教士收养，后来带到英国去读书。但他在学习上似乎没有下过什么功夫；我始终不了解他是怎样同印度革命者混到一起来的。在他的身上缺乏革命者的气味。相反，他所有的想法都是保守的；正是因为这个原故，他能够在最反动的普鲁士保皇派中结交了几个朋友；冯·雷芬

特洛夫伯爵就是他的恩主。他得到这样的殊遇眷顾，因此得以在妒忌的查托帕迪阿亚面前，寸步不让，并避免了哈迪阿尔那样的遭遇。当我在1922年见到他的时候，从前他在印度革命委员会里和他一块工作过的那些人，大半已把原来的希望从德皇的德国转向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了。有的竟然自称是共产主义者了。皮莱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死硬派，他讥笑他以前的同事，因为他们有新奇的思想。在对待德国这个问题上，他甚至比最狂妄的保皇派还更蔑视新政权。凭借冯·雷芬特洛夫伯爵的眷顾，他竟然名列泛德意志民族主义党的会员——唯一享受这种荣誉的非白种人；而肤色黑得发亮的皮莱，对这种优遇感到洋洋得意。他懂得一整套的社交礼貌，这正是其他旅欧多年的印度人所缺乏的。他身穿一件黑色大礼服和一条条纹裤子，卷曲的黑发油光发亮，他站在他的古玩店中，本身就是最引人注目的展品了。他讲的德语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法语也说得很流利，因为他到柏林之前曾在巴黎住过。总的说来，他是在公开场合能说会道的典型人物，这一点就迷住了我。有空的时候，我就去他的店里或者他的寓所找他谈谈。他把我的关注引以为荣，他为了款待我，常常把他和上流社会的关系讲给我听。他这个人大言不惭，自吹和兴登堡、鲁登道夫那样的人都有密切交情，提到他们时，他都只称名字不称姓。

柏林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中，只有一个人在印度参加过革命运动，那就是斯瓦米·维夫坎南达的兄弟布彭德伦纳特·达塔。他是革命运动机关报《尤根塔尔》的编辑，在1907年曾被逮捕，判过徒刑。获释后，他离开印度到美国去。他那样做

既是为了逃避新的迫害，也是为了成名成家；当时大家都公认他那位更有名的兄弟用他的印度唯灵论征服了美国。可是他本人在那里却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才到柏林去加入了印度革命委员会。当我在国内还是一个年轻小伙子的时候，我曾把他当作一位受迫害的民族英雄来敬仰。他在国外多年的神秘革命活动使他更加有魅力了。可是当我在1920年初在柏林遇见他的时候，他很令我失望——活象一个大睡方酣的里普·范·温克尔^①。他在他那破烂的房间里接见我，仍然摆出一副傲慢和教训人的架势。他是那庄严的革命委员会在柏林的唯一的成员，因此他以这个身份要求我全面汇报我离开印度以后的一切活动。汇报的重点是，我从各地的德国政府代理人手中所领到的大量金钱。他要我说明那些金钱的用途。我不想惹恼他，答应过一些时候照办，想尽力将话题提高到政治水平上。他对德国国内所发生的一切和阶级斗争的谈论都不感兴趣；也不相信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权会维持长久。因此，他就嘲笑我去俄国的热望，说他自己从来也不想到那里去。可是一年之后，他却同另外的一些印度民族主义者到那里去了，又大失所望地回来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安慰这位落伍的英雄，答应把他所要的报告送给他。同时，我又请他在一家上等饭馆里饱餐了一顿，鼓励了他一下；闲谈话旧之间造成了一种亲密的气氛。

于是，我告诉他我和德国人以及在墨西哥的其他印度革命者交往的一些情况，我也谈到鲍罗廷的使命和我在那件

^① 里普·范·温克尔(Rip Van Winkle),是美国作家欧文所写小说中的主人公,曾沉睡二十年之久,喻作时代的落伍者。——译者

事上所花费的金钱。他强烈地反对我为了一个毫不相干的目的而动用印度革命党人的款项。我说应当优先满足一次实际革命的需要，但他并不为这种说法所动。不过，他倒感觉到没有权力代表那个业已寿终正寝的柏林委员会来对我施加虚假的威吓，于是只好勉强地放下了上司的架子。

不久，我发现这个柏林委员会并不是融洽的一伙。达塔也有不满之处，他不但抱怨查托帕迪阿亚盛气凌人，还责怪其他人，尤其是曼苏尔。他忠于早期革命民族主义运动的传统（那是受到殷金·查特吉的《快乐寺院》的启发），对穆斯林不信任。他也警告我要当心皮莱，因为这人和保皇军国主义党有关系，说不定会把我交给英国人。他们绝不会饶恕任何用德国的金钱来宣传社会主义和赞助布尔什维克党的人。在我嘲笑他的病态幻想时，他说我应当为查托帕迪阿亚已经不在那里而感到欣慰。我难道不知道哈迪阿尔的遭遇吗？我是知道的。但是此刻旧政权已被推翻，我在社会党人中已经结交一些朋友了。达塔对社会党人不大佩服，他一再抱怨说，他们除了阶级斗争之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我既然听到这么多有关查托帕迪阿亚的事情，当然急于要和他见面。但是他正在斯德哥尔摩。我要见他，就得到那里去。我本来是可以在去莫斯科途中顺路拜见他的。但是临行的时候，一条更安全的新路线开辟出来了。于是我便从德国港口什切青乘坐在那里停靠的第一艘苏维埃船只到列宁格勒去。

40. 一位令人难堪的同事

鮑罗廷告诉我说：我们想尽早到莫斯科去的计划失败了。原来打算由一个具有民族主义—布尔什维克色彩的德国军官协助租一架飞机前往那里。但是经过波兰的陆上路线已被新成立的毕苏斯基政权封锁了，那个政权正在对苏俄进行军事干预。由各协约国装备的波兰陆军，在法国魏刚将军的直接指挥下，已经开进乌克兰，并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反革命的分离主义政府。到列宁格勒去的海路也因北波罗的海和芬兰湾仍在冰封时期而断绝了。而且，除了极少数的几只瑞典船之外，还没有别的外国轮船开往俄国的任何港口。斯德哥尔摩可以说是被围困的布尔什维克俄国向西的唯一出路。不过，许多人要想从那里溜进去也是不容易的，因为那条路只是持有外交护照的人才能合法通过。

在这种情况下，看来我必须在柏林无限期地等下去了。瞻望前景，令人郁闷。鮑罗廷告诉我说，虽然我们旅行的计划落空了，可是他接到莫斯科的命令，要他马上离开。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烦恼。他也并不高兴，不过，后来我才知道，他感到不高兴并非因为把我留了下来，而是由于一个更为重大的原因。他在新大陆的使命失败，使他受到了怀疑。莫斯科的审问员不敢冒险，让他逃脱革命法律的制裁。他实际上是在监护之下，拿着外交信使的护照经过瑞典去苏俄的。古拉尔斯基代替他负责安排我的莫斯科之行。

不过我并不是唯一的这样搁浅的人。参加共产国际第二

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从各方到达柏林，他们也要被送到莫斯科去。其中许多人利用了各种各样的化装掩护和形形色色的方法进行违法的旅行。总的计划是让他们都设法到达荷兰，并自行向共产国际西欧局报到。然后由西欧局协助他们偷越国境到德国去。出人意料的是，一位印度代表也通过这个途径来到柏林。这真使我吓了一跳，但这是愉快的吃惊。他带来一封拉特格斯给我的信，信里介绍他是沙希尔博士。他是通过双方朋友的介绍经由荷属东印度到达荷兰的。为了答复我的询问，这位新来的人用下面的事情介绍了自己。

他的真实名姓是阿班尼·穆克赫尔吉。战前，他在德国留学，大战爆发时，他立即设法离开德国。他取道美国，于1916年到达日本，在那里一直等到第二年年中，才通过拉希·比赫里·博斯的帮助，得到机会同贝拿勒斯^①的希瓦·普拉萨德·古普塔一起出发回国。据穆克赫尔吉说，古普塔本来是由于拉希·比赫里的号召而到日本的，现又带着一项重要讯息和金钱回国进行秘密革命活动。两人都被逮捕，拘留在新加坡。不久，古普塔获得释放并获准前往印度。穆克赫尔吉经历了许多天使他筋疲力尽的盘问和间歇的拷打之后，警方才相信他同革命运动没有关系。此后，他得到准许在炮台旁边的海滩上散步。他利用所得到的这一点点自由，设法乘一只渔船逃走，又转到一艘中国帆船上，这才到了爪哇。他在那里改名为沙希尔博士，目的是为了能够装作马来人，以便和一些听到过俄国革命消息并受到共产主义福音影响的革命家取得联系。这个福音也打动了穆克赫尔吉

^① 贝拿勒斯(Benares)，地名，在印度恒河北岸，即瓦腊纳西。——译者

本人，使他打消了回家的念头，而开始一次朝拜革命圣地的惊险之行。他在一只荷兰轮船上，受雇为服务员，就那样到了荷兰，他拿着一封在爪哇的双方朋友的介绍信见到了拉特格斯。

他所说的事情很难令人信服。里面漏洞百出，很难自圆其说。然而，他是我所遇到的第一个印度共产党员。这对于我对他的信任具有强烈的引诱力。也许，他讲话缺乏条理是由于激动的原故吧。他是个热情洋溢的人，虽然可能有些天真——属于一种凭着想象力为了渲染自己惊险的经历而夸张到失实的人，他这样做可能没有包含什么不良的动机吧。最可能的是，警方确实相信他同革命运动毫无关系，才把他释放了的。但是他不敢回到印度，在那里肯定会有人怀疑他是出卖了党而获得释放的，因此他有受到革命党处罚的危险。其他遭受同样嫌疑的人都被暗杀了；革命的审判是残酷无情的。他不肯冒那样大的危险，便逃到爪哇，从那里设法到了欧洲。在爪哇的时候，有些人帮助了他，于是他便和他们结识了。

不过，我想，给他一次机会来证明他并不是象他自己所叙述的那样坏，这样做也许是有好处的。和他稍稍谈几句话，就发现他的共产主义仅仅是一种想去莫斯科的强烈愿望。我把它归因于好奇心或许是冒险精神。同时，我毫不动摇地下定决心，在还没有肯定他具有诚意以前，决不让他前往莫斯科。总而言之，他怎么能走得了呢？有这么多接受邀请的代表还在等待机会，我怎么能够提出要求让他优先动身呢？因此，我建议沙希尔博士先回荷兰等待指示。假使他想为共产主义服

务,而且相信应当把它介绍到印度去,那他就得抓紧机会尽早回到那里去。莫斯科之行问题甚多,会不利于他回国宣传共产主义。如果他想学习如何在印度组织共产主义运动,我们在荷兰的朋友是愿意给予帮助的。我的意图是和印度重新建立联系,以使用新的思想和新的理想去重新鼓舞那里的革命运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即将通过一个协助殖民地民族争取解放斗争的纲领。这个好消息必须尽快传到印度去。只要我们能再了解一些他过去的情况以增强我们对他的信任,沙希尔博士便可以作为这个福音的报喜人。他很是失望,直到我出发去莫斯科时,他还在柏林呆着。

大大出我意料之外的是,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沙希尔博士竟然以共产国际西欧局证明合格的一位印度代表的身份出现在莫斯科了。他给我带来一封拉特格斯的信,信中说沙希尔博士极为迫切地要参加会议,而西欧局认为最好不要使他失望;无论如何,亚洲来的代表越多,就更会加强代表大会的国际性。由于我是代表墨西哥的,他就作为唯一的印度代表而被接纳了。他和同样身份的不代表任何团体的个人一样,有权参加所有的讨论,但没有表决权。他认为这是对“殖民地人民的歧视”,他到处奔走,要各代表团支持他争取和其他代表受到同等待遇的要求。

这对我来说是个尴尬的局面;谁都不知道那位吵吵闹闹的印度代表是在自作主张,可是我又没有办法不让他去作一些令人讨厌的事情,纵使我真的想去阻止他的话。实际上我已试图阻止过他,但失败了。沙希尔博士是个不屈不挠、不知疲倦的人。人很肥胖,皮肤黝黑,脑袋很圆,两只眼睛充血而

凸出，他被人称做“印度式压路机”。他又要求每一个委员会中都要有印度代表参加。这个要求是获准了，但人选却落到我的身上。我在形式上是墨西哥的代表；但人人都知道我是列宁特邀的来自新大陆的“东方贤人”。不过，沙希尔博士维护印度光荣的第二个要求也是令我难堪的。因为人们很自然地会以为沙希尔博士充当了我的情报员。但是，他开头这种带幼稚气的妄自尊大给我所造成的难堪，比之不久以后给我所造成的难堪，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算不上什么了。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在列宁亲自主持下正在开会。大会的一位秘书踮着脚步走到他的身旁，跟他耳语了几句。他对这人打扰他的做法很不高兴，挥手叫他走开。但是那个人过了一会儿又回到会议厅来，随手把门轻轻关上，带着抱歉的表情一直站在那里等着。当他引起了列宁的注意时，他身后的门马上开了一点点，正好让一个人头伸进来，向列宁点了点头。这一次，列宁的脸色不是不耐烦，而是相当严肃，他站起来，请荷兰代表马林主持会议，自己迈着敏捷的步伐走了出去。一会儿，那个秘书走到我的跟前，凑近我的耳朵说道：列宁请我到隔壁的房间去一会儿。我走出去，看见列宁正在用很低的声音同一个又高又瘦、面孔丑陋的人谈话。列宁介绍说这位是“契卡”（这就是人们对赤色恐怖工具的称呼）的副主席彼得同志。这个名字很熟悉；人们在耳语中提到他都叫他“血腥的彼得”，这个名字本身就是恐怖。

列宁转身朝着我，问我对一个化名叫沙希尔博士的印度人穆克赫尔吉的情况知道多少。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使我吓

了一跳，于是我把在柏林所听到的故事给他简单地复述了一遍。他问我注意过那人在俄国的行动吗？我说没有。列宁显然不安地脱口说出，那人的行踪可疑，彼得想逮捕他。彼得咆哮道，那人一到列宁格勒就和一些有问题的人接触，后来回到那里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仪式时他又去看过他们。我说我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严重问题，并且答应替他们调查穆克赫尔吉为什么要去看那些人。彼得又说：沙希尔博士在莫斯科也与资产阶级人物结交。列宁插话说，要是把参加大会的唯一印度代表逮捕，那多难看啊；消息是会走漏出去的。我同意列宁的看法。在我担保之下，彼得勉强地同意暂时不去逮捕他，但对他要实行监视。

当我向穆克赫尔吉查问时，他承认曾去看过两三个住在列宁格勒的贵族妇女。为什么那样做呢？啊，他想了解她们对革命的态度怎样。她们是多么仁爱，又有教养，多么羡慕印度和印度的文明啊。所以，穆克赫尔吉第二次到列宁格勒时，他完全是出于礼貌再去拜访她们的。她们告诉了他莫斯科方面的一些和她们身份相同的人的姓名和住址，那些人他也不时去看望过。我把这事情报告列宁。他对这个解释似乎满意，只是怕在彼得那里通不过，但是，彼得会尊重我的愿望不去干扰穆克赫尔吉的。这是一项沉重的责任，不久还给我招致了更大的麻烦。

第二年，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由查托帕迪阿亚率领的一个庞大的印度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与此同时，我曾到中亚走了一趟，也赶回来开会。印度的代表拒绝和我发生任何关系，理由是我同穆克赫尔吉有联系，他们指责他

过去出卖了他们,后来又当了间谍。穆克赫尔吉的罪名是:拉希·比赫里·博斯叫他送消息给许多印度革命党人,而他把他们的名字透露给新加坡警察局,才保住了自己的性命。根据他的情报那些革命党人被捕了,并被处以绞刑。这个罪名很严重,但缺乏确凿的证据。如果为了抚慰那些控告人就抛弃穆克赫尔吉,那等于自动地把他交给“血腥的彼得”去任意处理。我拒绝那样做。在这个指控没有证实之前,把人命当儿戏是不公平的。但是,我不能不感到穆克赫尔吉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伙伴了。他或许是个叛徒,或许不是;但他显然是个猎取个人名利的冒险家。他的名利就是在共产国际运动中取得显要和荣誉的地位。我不想把他投到饥饿的狼群中(可以如此说);但是,他也不配当作同志来信任。

有一个时期,我叫他来替我的《过渡时期的印度》一书搜集统计材料。但是他不满足于这个不够引人注目的工作。最后,他要求到德国去,然后再到印度。我想这是摆脱他的好机会。如果他真的冒险回到印度,那么,关于他背叛的指控便会不攻自破了。他在1922年回到印度,在国内走走,也秘密会见了一些人;几个月以后,他又回到了德国。他是怎样到达印度的,又怎样回来的,那是一个谜,只有他自己明白。不过,他在德国共产党中还是交了几个知心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他又在莫斯科出现,想当一名不受我约束的印度代表。那个时候我多半的时间不在莫斯科,先到欧洲,后来又到中国。但是即使他荒唐已极地向人暗示说印度的革命党并不信任我,人们也不曾认真地重视他。要对我的代表性表示非议,根本是无的放矢。我除了代表自己之外,并不想代表任何人。

我是以个人的身份在共产国际保持我的地位的。

我始终不知道对穆克赫尔吉的指控到底有没有事实根据。我从来不想去进行调查。在流亡的革命党人中间，互相指控背叛或当了间谍，那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印度人也不例外。不过穆克赫尔吉的个人行为和他贪得无厌的野心毁了自己。在想尽办法钻到共产国际的总部中猎取高位的阴谋失败之后，他在莫斯科作了寓公。我最后听说有关他的情况是，他在列宁格勒当了教师。后来下落怎样，我就知道了。据说查托帕迪阿亚晚年，大概与穆克赫尔吉同时，也在列宁格勒的一个非政治性的部门就业。如果这两个人都作为革命歇斯底里的牺牲者告终，那么命运给了他们多么残酷的讽刺啊。查托帕迪阿亚确实应该得到稍好一些的结局。

41. 共产国际的基础

1919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会议已作为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载入史册。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的叫法。除了俄国人之外，只有三十二个代表参加，在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代表任何国家的有组织的共产主义运动。除了俄国人之外，只有美国的约翰·里德（他是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到莫斯科去的）和德国的胡戈·埃贝莱因是有些名气的人物。

德国革命的失败使巨大的希望破灭了。这也许给俄国国内的运动泼了冷水。巴伐利亚和匈牙利发生革命的消息传

来，鼓舞泄气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据说列宁从莫斯科城的一端赶到另一端亲自宣布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所谓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开会，发表了一项宣言，号召欧洲的无产阶级举行大规模起义，推翻那已被帝国主义战争动摇了基础的资产阶级制度。这个宣言就是对共产主义预言家们在 19 世纪中叶所写成并发表的鼓动性文件的解释。

原定要通过一项决议，按照马克思所组成的第一国际的样板和传统，成立另一个国际来组织预期的世界革命，但该项决议案却遭到德国代表的反对。这位代表是卢森堡的信徒，他阐明了她的观点，说德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候还未到来。不管其他非俄罗斯代表的感觉如何，布尔什维克党人是不相信革命会自发的。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革命必须由一个职业革命家组成的政党去组织。要组织和领导世界革命，党必须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就建立了这样一个起了世界革命组织者作用的国际性组织，这就是所谓的世界革命参谋部。但是直到 1919 年底，关于这个新共产国际大会开幕的筹备工作还做得不多。

布尔什维克党人既然奇迹般地渡过了内战和外国干涉的难关，所以就把全部力量用于巩固俄国新政权这一非常重要的工作上。他们甚至和新生的德国共产党都很少有什么组织上的联系。两国间的外交关系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签订之后恢复了。阿道夫·乔菲到柏林就任驻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大使。陪他一起去的有布哈林、拉柯夫斯基和拉狄克。他们的目的首先在于同德国的革命运动接触，

然后再扩大与其他欧洲国家革命的联系。但是身穿俄罗斯农民粗布罩衫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却住在沙皇大使曾经在那里过着奢侈生活的华丽的官邸里，走在菩提树大街上，和普鲁士军官摩肩而过，这种现象对于高傲的普鲁士军官来说，是不能长久容忍下去的。德国革命失败后的军国主义恐怖一开始，布尔什维克大使馆就被指控进行颠覆性的宣传活动，并被要求撤离德国。拉狄克原籍是波兰，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住在德国。他自称有德国公民权，拒绝离开德国。因此他遭到逮捕和监禁。他在监狱里鼓吹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并同那些不严肃对待苏德缔结同盟以对抗协约国的德国高级军官建立联系。

那个时候，新生的德国共产党仍然是软弱和纷乱的，还没有和莫斯科建立任何组织联系。布尔什维克最高领导既然反对拉狄克要把欧洲革命同苏德军事同盟连接起来的宏伟计划，便决定在柏林成立一个秘密的宣传和通讯中心，准备从荷兰的左派共产党手中把共产国际西欧局的职权接收过来。1920年春天，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国代表到达柏林。同时，除了德国左翼独立社会民主党之外，意大利的激进(多数派)社会党和法国的社会党都同意派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商谈他们加入新共产国际的问题。三者都是有影响的党派，各在自己国家的议会中拥有许多议员。他们的代表团可以合法地旅行，可以拿着正式护照经过波兰和瑞典。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和英国的代表也可以自己单独旅行。剩下来的那批暗暗集中在柏林的代表，则要设法通过秘密途径送去。

第一任布尔什维克大使馆的人员被驱逐之后，德国和苏俄之间的外交关系名义上还没有断绝。在柏林仍然维持着少数基干人员，红旗依然骄傲地飘扬在菩提树大街的一座距离协约国大使馆和德国总理衙门仅有咫尺之远的大厦的房顶上。这座大厦再加上它那相当单调的房前空地，看去很象一座堡垒。它的大门总是关着。面对着宽阔的林荫大道的窗户也老是关着，那条大道把皇宫和中世纪柏林的门户，勃兰登堡门连接在一起。密布着大铁疙瘩的沉重木门开了一道缝，好让带有特别通行证的神秘人物出入。比这更神秘的来客则使用比较隐蔽的进出口。使馆里面的办公室里正忙于工作，准备把代表们送到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去。在莫斯科伪造的护照和文件，用外交公文袋密封起来，送到了驻柏林的大使馆。

大约在5月中旬，驻柏林的大使馆接到了安捷里卡·巴拉巴诺娃的一封信，要我马上到莫斯科去。她就是共产国际的第一任书记。带信的外交信使在一家很小的公寓里和我会面；我是在鲍罗廷离开后才搬进那家公寓的。他自己介绍他叫鲍利斯·施利普金。他是个中年人，身体颇为结实，头发淡黄色，剪得短短的，是典型的俄罗斯发型。对于一个布尔什维克外交官来说，他的服饰有点过于考究了。

在那些日子及其后数年的时间里，苏俄政府的外交代表显然不屑于在自己无产者的仪表上点缀一些表示高贵的标记，诸如金镶边、晚礼服、早礼服，条纹裤之类的东西。曾担任沙皇外交官的贵族齐采林，也鼓励大家保持无产者的自豪感。这位苏俄政府的第一任外交人民委员，甚至在国际会议期间出席正式宴会，自己也绝不佩戴任何外交官证章。这种

革命传统在李维诺夫掌政时期被打破了。他甚至在政府的机关报《消息报》上发表文章，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他说：当和资产阶级政府打交道时，消除一切显目的标记是明智的。至于受托传递共产国际函件的外海信使，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受那个限制。可是，苏俄外交和国际共产主义宣传有几年是很难区分的。

施利普金是隶属共产国际的一位外交信使。他奉命去运送那些不能合法旅行的、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我不在那一批人里面，因为我仍然拿着墨西哥的护照。但是施利普金告诉我说，他是刚刚从列宁格勒乘坐革命后第一艘到德国港口的苏俄客轮来的。那艘名叫“苏维埃号”的轮船几天内就要从什切青起航回国。他要我搭乘那只船到爱沙尼亚共和国的首都累发尔^①，再从那里转乘火车到列宁格勒去。施利普金向我秘密交代说，船上将有一位重要的乘客和我同行，“苏维埃号”不载运其他的乘客了，这只轮船将再回来载运其余的代表。我有些莫名其妙；但最后终于得到了出发的机会，我还是很高兴的。

我在柏林的逗留是有好处的。我学到许多东西，交了许多新朋友，结识了不少人。我在离开德国首都之前，一连几个星期参加了许多会议；会上新来的代表们报告了他们各自国家的形势。大家的热情是可以钦佩的，乐观情绪也是十分惊人的。我亲身经历过德国革命垮台的情景，因此不同意这种乐观的看法：只要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敲起警钟，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马上就可以夺取政权。我从在德国几个月停

^① 累发尔(Reval)，今名塔林，是爱沙尼亚的首都。——译者

留期间所了解到的欧洲情况以及紧接着的发展前景来看，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没有殖民地民族的反抗来削弱帝国主义，宗主国内无产阶级进行夺取政权的英勇尝试就不会成功。要打败帝国主义，就必须在两条战线上发动进攻。我怀疑这是民族主义在情感上的回潮，但在同时，一般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偏狭性却触怒了我；因为这种人只同情殖民地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却不相信那种斗争在欧洲建立社会主义之前会取得成功。我不明白为什么革命不应当向东方传播，因之我决心赶紧进行开辟世界革命第二战线的鼓舞人心的工作。

“苏维埃号”是一艘经过彻底整修的中型客轮。船一出港，就有人引我到餐室，由船长和高级船员欢迎我踏上“苏维埃国土”。（在公海上，一个国家的轮船就是这个国家的合法领土。）船长是一位漂亮的年轻人，有一张白里透红的娃娃脸，显然是一个贵族子弟。由于这个原因，他曾当过沙皇海军军官，并参加过作为彼得格勒起义导火线的喀琅施塔得叛变。在航行中，他告诉我他所驻在的那艘战斗舰是怎样沿着涅瓦河逆流上驶，炮轰冬宫的。

不久，施利普金就把那位“重要的乘客”带进来了。她是一位服饰朴实而雅致的、年纪还轻的妇人，施利普金介绍她是萨杜尔夫人。全体在场的高级船员都起立向这位已经成为内战中一个二等英雄的夫人致敬。雅克·萨杜尔上尉是法国军事代表团的成员，那个代表团在俄国旧政权崩溃之后被派到那里去帮助临时政府把一些士无斗志、分崩离析的军队重新组织起来。当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的时候，他就倒向了他们一边，协助改组红军，被提升为托洛茨基事实上的参谋长。

他被法国军事法庭以私逃罪缺席裁判，判了死刑。他既然不能回到祖国，他的夫人就盼望着有机会到莫斯科去和丈夫团聚。

这次在南波罗的海的旅途是愉快而平静的。我们正在向有“半夜太阳”的地方靠近。那里要到半夜天才会黑，而再过两小时后，东方的地平线上就又被黎明的红霞照亮了。芬兰湾依然冰封。但船长自豪地告诉我们，“苏维埃号”是一艘很有力量的船，能够在几英尺深的浮冰地带破浪前进。不一会儿，我们便能看到它作的精彩表演了。我们的第一个停靠站就是位于波的尼亚湾入口处的芬兰港口阿波^①。只过了几个钟头，我们的船就到了赫尔辛基。乘客可以在这里登岸，转火车到列宁格勒。但是这条路线也是对共产党人封锁的：当时的芬兰是在曼纳林政权的恐怖统治之下；有一支德国军队拒不按照凡尔赛和约的规定解散并撤退，而在这里支持着这个政权。我们的轮船到达赫尔辛基的时间是半夜；大家都登上甲板，观看红色的朝霞驱散朦胧夜色的奇观。这在俄国船员来说是司空见惯，但对我来说却是传闻变成了现实。萨杜尔夫人兴奋极了。

早晨，轮船向着冰封的芬兰湾入口处冲进去，驶往累发尔。一大块一大块的冰，象几英尺厚的大玻璃块，被翻到船首的两边去。人们告诉我说：船正开足马力前进，可是它的速度每小时不过几海里。船的主要力量被用来打破冰块所形成的障碍；任何船只如果不能在这里开一条道路前进，就会被冰压得粉碎。再向芬兰湾前进，航行还会更加困难。船可能被冰

^① 阿波(Abo)，今名土尔库，是芬兰第二大海港。——译者

锁住，那就只有求助于破冰船了。我就是为了避免这种危险，才决定从累发尔转陆路前进的。爱沙尼亚对共产党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但是我作为苏维埃铁道人民委员罗蒙诺索夫（他是来累发尔开什么国际运输会议的）的随员之一，享有外交豁免权在那里旅行。萨杜尔夫人和我在累发尔登岸后，“苏维埃号”是否还会冒着被冰卡住不能动弹的危险而向列宁格勒继续前进，那不一定。假如芬兰湾里的冰场还非常坚硬，它就会回到什切青去接运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从而把他们直接送到列宁格勒去。那时，夏季来临会使冰块融化。

我们在下午很早的时候，就到了累发尔。这是一个很古雅的小市镇，它使我深深地想起了大约半年前登上欧洲大陆时的地点——西班牙的拉科鲁尼阿港。苏维埃的公使馆是一座很朴素的老房子，公使和馆员在那里欢迎我们。那位铁道人民委员就住在车站旁的客厅式车厢里。晚上，我们到那里和他会合，不多时候，到国境去的火车就出发了。罗蒙诺索夫是个兴致十足的老头儿，我想，他大概有六十五、六岁了。他曾在旧政权中任职，在新政权中自愿负起专家的职责，也许这是一种爱国行动吧。但他很高兴款待这位直接从巴黎来的贵妇。为了庆祝这一次集会，他准备了一席当时在俄国难以办到的酒菜；一瓶法国酒代替了伏特加。当他白天摆起这样的筵席时，他把窗帘拉了下来。因为车箱外面的月台上有许多眼睛瞪得圆圆的饥饿的人和—些十分朴素的革命党人。

第二天早晨，我们到达列宁格勒。我自然很想访问这个革命的摇篮。但是施利普金告诉我说：他奉命要把我直接送



2 030 0225 9

到莫斯科。他只能在这我到列宁格勒—莫斯科铁路的另一个终点站时，顺便让车子从市区通过。而罗蒙诺索夫的客厅式车厢则要卸开，转轨到别个车站。萨杜尔夫人愿意留在上面不下来，她显然很欣赏主人的殷勤款待。

我在施利普金护送下在市区里走马看花似地跑了几个小时。这个城市象一个有鬼出沒的地方。主要的交通要道上冷落无人。著名的涅夫斯基林荫大道的木铺路面到处都被人刨开了。仅只两年以前，这里两旁还林立着豪华的商店和宫殿式的寓邸。现在这些门面都钉上木板，关闭起来了。弹痕累累的冬宫是一片阴郁的景象。隔着涅瓦河，在对面不远的地方，依然屹立着“彼得和保罗”双尖塔教堂；这就是过去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看守着地牢的建筑物。在这个地牢里有数百个政治犯受尽了折磨。革命后这座牢狱空起来了。镀金圆屋顶的大教堂的大门敞开了。我出于好奇，向里面偷看了一下。几个老太婆正跪在祭坛旁做祈祷。武装的卫兵在斯莫尔尼宫的铁门前拦住我们；革命政府最初就设在那个宫里。

我还没有参观够这个革命的摇篮——它现在叫做列宁城，就得离开那里了。我们要赶到车站去乘上开往莫斯科的火车。我们坐一夜火车就到莫斯科了。



第三卷

在圣地

42. 在莫斯科的第一天

中午时分，火车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罗蒙诺索夫看了一下表说，完全正点。内战把俄国的铁路系统搞得混乱不堪。要过好几年，正常的铁路交通才恢复，行车才按照时间表。在1920年，整个铁路系统还专供军运，没有民用客车。谁都不能在车站买到票，坐火车到外地去。革命废除了货币，因此也就没有贫富之分了。只有拿着通行证的人才能利用铁路出差旅行。任何人要在饭馆里吃顿饭，店铺里买双长靴，或在城市里坐电车，都得出示劳动证。公共生活根据“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条革命的社会主义公正原则办事。

罗蒙诺索夫带我们出站时向我们道歉说，要做到各线的火车都定时开行，还需要几年的时间。他又带着自豪感提醒我们：俄国的铁路从长度看，是世界第二。不过有一件事已经做到了：在这条连接两个都城的铁路线上，每天至少有三班列车开行，而且都是正点。这时他放低了声音添上一句说，这个国家里的二号要人，每周三次乘坐这列载运我们的火车旅行。不过我们所享受的权利，还没有达到可以同他乘坐同一班次

火车的程度。任何一个普通人都不能那样。

后来我听说他所提到的那个令人敬畏的人物，是季诺维也夫。他每周在那两个都城间旅行三次，因为他是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又是具有最高权力的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他是一个头戴堂堂三重皇冠的人物（别的任何人都没有那样显赫的地位），自然就被认为是仅次于列宁的最重要的人物了。

共和国的政治首都已迁至莫斯科，因为列宁格勒面临遭受入侵的危险。一支强大的德军还盘踞在芬兰境内，离国境线只有数英里之远。沙皇将军尤登尼奇统率的白军，在德国波罗的海部队的支持与协约国的怂恿下，在1919年的夏天已经推进到列宁格勒的南郊。莫斯科深处俄国的中心，不会受到那样的威胁。不过由于莫斯科一向是封建与反动力量的中心，所以它的社会和文化的氛围对于建立新的革命机构极不适宜。中世纪式的围以城墙的克里姆林宫，是一个最不适于做工农共和国司令部的地点。

与此相反，列宁格勒是个现代化的城市。它周围是一片工业区，这是革命的社会基础。革命就是从那里开始，又从那里发展到全国各地去的。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不仅最先夺取了政权，而且还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新的革命政府。因此，列宁格勒的苏维埃和党组织在那个革命的国家里获得了崇高的地位，支配着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一个控制着列宁格勒苏维埃和党组织的人，就享有极高的威信并拥有巨大的权力。在1920年，这个人就是季诺维也夫，他很自然地相信自己在新政权的统治集团中仅次于列宁，一心想继承列宁担任最高领

袖。我到达莫斯科后不几天，便见到了他，当时我对他是否具有真正的伟大品质，适于他当时所担任的职位，不禁产生了怀疑。我对他毫无偏见。相反地，我和大家一样相信他是列宁的得力助手。但历史却证明他不配得到这种荣誉。我的初次印象往往不错，这是又一个证据。

施利普金领着我们出站。我终于来到莫斯科了，这个念头使我非常兴奋，以至我在路上仿佛如在梦中。旅途已经走完了，兴高采烈的情绪此时使我的敏锐感变得迟钝起来了，这倒是件好事。要不然，我亲身体验到的那种混乱、肮脏和单调的现实，说不定会使我灰心失望呢。一种新的制度总不能一夜之间便建成嘛。

车站前面有个广场，挤满了穿军服的人；瘦骨嶙峋的马拉着一辆辆破旧的四轮马车，冒着被那些不顾一般交通规则的汽车压碎的危险，在铺着鹅卵石的马路上东倒西歪地往前走。在发疯般急驶狂奔的车子上坐的都是军人，因此这种横冲直撞就更引人注目了。我设想这种鲁莽行为是权力感的表现，因为我根据生活经验懂得，权力感会使人对别人的生命漠不关心。一辆黑色大轿车开到我们前面停了下来，这时我才从最初印象（有些是意料到的，有的则没有意料到）所造成的迷茫中猛然惊醒。驾驶员穿着军服。罗蒙诺索夫打开车门让萨杜尔夫人上车。施利普金把地址告诉了他，车子就开动了。我们坐另外一辆放下车篷的车子跟在后面。在驾驶员旁的前座上，坐着一个手里拿着枪、面部表情严肃的战士。那辆重载的车子在石子路上高速度急驶时，上下颠动，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街道上一片荒凉景色，因为店铺的橱窗都钉上了木板。

似乎沒有人有人在闲逛；所有的过路人都象是去办事的。

不一会儿，我们驶过架在一条不宽的河面上的铁桥。那就是莫斯科河。我们的车子沿河开了一段很短的距离，就慢慢地经由一道铁门驶进一个宽阔的院落，这里好象是一所私人的很大的宅邸。鲍罗廷来到门廊，领我登上一座富丽堂皇的木楼梯，进入一套房间，这房间简直使我大吃一惊。这不是宫殿；但到底是谁曾在这样一所豪华的大厦里过着帝王一样舒适和奢侈的生活呢？鲍罗廷回答了我那默默沒有说出口的疑问。从前这里曾经是古契柯夫伯爵的市内宅邸。他是一个从事实业活动的贵族，在甜菜制糖业中有很大的股份，被人称为俄国“糖业大王”。革命废除了私有财产，“古契柯夫宅邸”就归国家所有；底层是副外交人民委员卡拉汗的私人寓所。上面一层楼留供显要的国宾使用。我还没有来得及把涌上心头的所有问题都提出来，鲍罗廷就把我带到一个高高的窗戶跟前，把粉红色的厚缎窗帘拉到一边。莫斯科河就在房子前面流过；对岸是一道高墙，墙的后面，有许多壮观的寺院塔顶和高耸的教堂尖塔，中间有几个巨大的金色圆顶在午后的阳光中闪闪发光。那就是克里姆林宮。它建于数百年前，当时是个城堡，但规模之大，完全象一个设防的大城市里面筑有围墙的内城。我已到了莫斯科，而且就住在克里姆林宮的墙外。

鲍罗廷住在邻近的一套房子里。他退了出去好让我准备用餐，开饭的时间是下午5时下班以后。晚上，我要去见卡拉汗，他就是我的东道主。晚餐与那幢房子成了明显的对比。在一个宽敞的房间里，四周的高墙都镶着红棕色的木板，可是摆在那华贵的桌子上的饭菜，却是白菜汤、一片黑面包和“卡

沙”^①(用一种暗黑色的碎谷粒煮成)。鲍罗廷用冷酷的幽默语气告诉我,最后一道菜是奢侈的佳肴,就连菜汤里那一丁点肉也不是常有的。那是供应所有政府机关的标准伙食。虽然水平还很低,大家一律平等总算做到了;但是既然内战实际上已经过去,生活水平是会提高的。

现在的局势同去年冬天反革命军队从四面八方一步步逼近莫斯科的情况相比,已经好得多了。食物不足,燃料也很缺乏,而气温又远在零度之下。一些农民表示同情,跑到克里姆林宫的大门口,给列宁送来一车劈柴。莫斯科所经历到的种种困难,主要是由于农村反对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国有化土地上的全部余粮,已宣布为国家所有。农民除维持其生存所需的东西以外,就不愿再多生产了。结果造成城市缺粮挨饿。莫斯科居民极为稠密,苦头也吃得最多。

卡拉汗是个年轻人,大概还没有过三十岁,对于他所担任的那个职务来说,年纪太轻了。表面上他是几个副人民委员之一,实际上是外交部的头头。齐采林要是不同他商量,就什么事也办不成。他是外交部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络人。然而,他的特殊兴趣是想同亚洲各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利用那个关系作为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媒介。他出生于美国,又是个最标准的高加索美男子。拉狄克有一次用很刻薄的讽刺语言,把他描绘成为苏维埃的一个最漂亮的蠢人。其实他并不蠢,只是不愿出风头罢了。也正因为那样,很少人对他有深刻的了解。在此期间,他所处的重要地位却使其他野心勃勃的青年人妒忌起来,企图对他进行毁谤中伤。也许由于他

^① 卡沙 (kasha), 即稀饭。——译者

的容貌非常漂亮，所以他讲究衣着，蔑视当时人们把穿得破破烂烂当成革命热情的风尚。那些妒忌他的诽谤者把他叫做资产者。在那些易动感情、重视无产阶级纯洁性的日子里，对一个人损害最大的，莫过于“资产者”这个字眼了。卡拉汗就其出身来说不属于工人阶级，他也不曾企图隐瞒他的非无产阶级出身。革命前，他是彼得格勒图书馆的一个管理员。他除了到办公室去，很少离开他的住宅，出去办公时，他照例总是穿着一件黑色的外衣，戴着洁白无垢的硬领。有人指责他说，他对那种表示资产阶级社会地位的东西特别欣赏，而对与人民打成一片的无产阶级实践却不那么喜欢。卡拉汗在反驳这种愚蠢的指责时说，白色的领子并不曾阻止他来到街垒参加战斗，因为他没有拿白领子去把他的脚踝捆起来。他的态度简直是不通时务，但是他始终认为，保持整洁习惯和穿得干干净净总比相信肮脏和不修边幅是革命朴素的象征为好。

饭后，我陪着鲍罗廷到他的房子里去。他必须继续进行一些非常重要的工作。两天前，巴拉巴诺娃交给他一项任务：把列宁最近写的有关“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的小册子译成英语。原稿是用俄语写的。我在柏林时就已经听说过这本轰动一时的小册子了。由于德语翻译不十分准确，出现了若干误解和错误的解释。英语和法语的译本必须译得好一些。既要谴责“左派共产主义运动”，又要不使那些持有那种主张的团体离心离德，从而损害共产国际的基础；即使最优秀的专业翻译家也不容易掌握这种辩证法。用辩证观点去处理“左派共产主义运动”问题——说得明白点儿，这个运动就是害了革命急

躁病和主张无产阶级的清教主义^①——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列宁的那本小册子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部共产主义文献。所有忠实的信徒都必须阅读并弄懂这一文献。在早期的那些日子里，共产主义的信念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情感，但也并不排除依靠理解。列宁的学说要求人们既要有信念，也要能理解。那是辩证的关系。可是，他是用一种很不精练的文体写出来的，这是他老想在一句话里装进许许多多的思想的习惯所造成的结果。所有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在那些狂热的日子里，往往是仓促行文，这就使上述文风更严重了。向速记员口授内容，代替了自己动笔。他们或是上讲台作报告，或是向速记员口授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他们当中有些人，例如拉狄克，有这样一个习惯：一边走来走去，一边进行口授。在革命初期那种狂热的气氛里，列宁的文风变得更加纷繁难懂，更加雄辩滔滔，尽管他一向是自己动笔。拉狄克对列宁那种保守的习惯挖苦地说：老头子根本没有学会用口授的办法写信。

鲍罗廷在翻这本小册子的书名时费了不少脑筋。书名按直译应为“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的幼稚病”；但那字对字的翻译就没有抓住辩证法的真髓。因为它给人的印象是，左派共产主义运动在书中受到彻底的批判。我建议增加副标题的形式，列宁同意这样做，并在以后所有的译本中都采用了。

钟敲十下，鲍罗廷提醒了我与卡拉汗约定会见的时间。我觉得时间太晚了，我弄不懂东道主为什么不能早一点接见我。他睡到快吃午饭时才起床，接着还必须处理一些公事，然后

^① 清教主义 (puritanism)，这里指象清教徒那样的刻板、机械。——译者

再到人民委员会去。那么现在去见他还有什么用呢？没有谈话的时间。鲍罗廷向我说明情况。外交部是在晚上办公的，因为齐采林宁愿白天睡觉。他习惯上允许各国外交官和记者在凌晨访问他。我们将陪同卡拉汗到外交部去，在那边还可以有很多时间谈话，也可以见到齐采林。那是一种意想不到的权利。齐采林由于向各个帝国主义强国发出激烈的照会，在全世界已极为出名，并成了全世界革命者喜爱的一个人物了。

卡拉汗站在宽敞的客厅中间，那客厅也就是他在家里的办公室。他穿着一件很考究的黑外套，里面衬着他那条著名的白领子。他留着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尖梢胡子。一头蓬松发亮的黑发，仔细地梳往脑后。他迎上来同我握手。他和我交谈几句有关我旅途中的情况之后，就建议我们马上动身。鲍罗廷充当翻译。卡拉汗当时还不会讲外语。一辆大轿车在门廊里等着；几分钟之后，我们便来到了外交部的大门口；当时外交部占用着莫斯科一座最大的旅社的一侧房屋。卡拉汗从他的口袋里拿出一张卡片给武装警卫看，警卫仔细地对比相片与证件持有人的脸孔，然后才让他通过栅栏。鲍罗廷和我只好等着；一直等到一位公务人员带来一份许可我们进入的通行证，并经警卫人员查明我们确属获得许可进入的人之后，我们这才走进去。

为了等候许可进入苏维埃的外交圣地，不可避免地耽搁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被带到了副人民委员的办公室。卡拉汗坐在放有三架电话机的大桌子正中一张宽敞的皮面扶手椅上。在我们进行谈话的那段时间里，他有时拿起两个话筒，同

时讲话。我很纳闷，要是三架电话机同时响起来，他该怎么办呢。

43. 世界革命的第二战线

卡拉汗坐在他那把宽阔的红棕色皮面椅子上，这把椅子以前一定是摆在“首都旅馆”的会客室里的。他隔着铺有绿色厚呢的大桌面递给我一大铁盒带有金黄色滤嘴的老虎牌香烟。这是苏联驻喀布尔第一任大使苏里茨寄来的。卡拉汗把这些香烟留给我，因为他认为这种商标具有象征性。鲍罗廷也为他的朋友的无聊举动帮腔，就毫无意义地添上一句：“是呀，上等的孟加拉老虎。”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好，就打开那装璜得相当华丽的盒子，里面装着格外粗大的香烟，并递给主人一支。他已经舒舒服服地倒靠在他那把安乐椅子里，正从一只盒子里拿出一根雪茄烟点着。他以完全信赖的态度告诉我说，这盒烟是从施利普金所带来的外交邮袋里取出来的。

不久之后，我逐渐了解到，在早期那些欢乐的日子里，革命外交当局派出它的外交信使，带出去的邮袋装着共产主义宣传文件，回来时则装满一袋袋更有用的商品，例如供人民委员抽的雪茄烟，供他们妻子用的化妆品和丝袜子。共产国际特别信使施利普金的主要任务，正如谣传那样，是供应季诺维也夫眷属的需要。不过，那个头戴三重皇冠的人却是个清教徒式的人物；他不喝酒，不抽烟。关于他的眷属的那些议论，是

沒有根据的。他在政治上野心勃勃，所以对自己的私人生活并不重视。也正因为这个原故，他的私人生活也可能是随随便便的。但在文化教养上，季诺维也夫是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他特别注意一定要使人们所知道的他的私人生活是严格符合传统标准的。

现在回过头再来谈谈卡拉汗，他对新运来的汉堡出产的雪茄烟很喜欢，就同他的朋友鲍罗廷共同享受这种特权了。他们用俄语谈了一会儿，这使我颇感厌烦。我就一个劲儿地抽我的“上等孟加拉老虎牌香烟”，同时也偶尔好好地端详一下那个坐在桌子对面、慢吞吞地一口一口地吸着长雪茄烟的人——一张很美的鸭蛋形面孔，肤色淡褐，点缀着一撮黑胡子，虽然修剪得整整齐齐，两边尖细，但有些卷曲；样子活象个移居到文明环境里来的青年基督。可是卡拉汗并不是犹太人。也没有传奇似的（当然很不可信）金黄色头发。突然间他站了起来，斜倚在桌子上，用俄语跟我说话。鲍罗廷为我们当翻译，

第一任苏维埃大使苏里茨已经申请解除他在喀布尔的职务。没有一个有文化的人能够在那样一种中世纪的气氛中长期生活下去。应该答应他的申请。我对于让鲍罗廷去喀布尔当新的苏维埃大使有什么看法？这问题提得出乎意料之外；尤其使我惊异的是，这个问题竟然会对我提出来。

卡拉汗解释说：鲍罗廷从墨西哥回国的时候，曾报告过我渴望与在印度的革命同志取得联系。苏维埃政府根据其著名的宣言，即支援殖民地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战争，准备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帮助我。但是整个中亚仍然是一片无主的土地，尚未为革命所征服。在此期间，与阿富汗维持外交关系就能提

供一条通往印度国境之路。苏维埃驻喀布尔的大使馆已做了大量的初步宣传工作。但那里的印度同志同国内的正在日益展开的反英不合作运动没有任何联系。我到那边去会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为了使我获得有效地执行职务的最大方便，驻喀布尔的新任苏维埃大使应该是一个对我的使命极感兴趣的人。

苏里茨看来搞不好与在喀布尔的所有印度革命者的关系。他们分成几个互相对抗的集团；而苏里茨却袒护一边，没有设法使他们联合起来。他说他没法使他们联合，并且很瞧不起在德国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所谓印度临时政府中的大部分成员。他们要求武装印度阿富汗边境的部落并从财政上给以援助，使那些部落能袭击英国的领土。最近在喀布尔又出现了由一位名叫阿扎腊领导的一个新的印度小组。阿扎腊是由柏林委员会派去在那批被土耳其人在库特-艾马赖俘虏的印度军队中间进行反英宣传工作的。大战结束时，由于他所担任的使命没有成功，就同一个名叫阿卜杜·拉布的印度老商人一道到阿富汗去了；拉布声称他同边境部落中一些有势力的人物有联系。阿扎腊自称是共产党人，反对临时政府的计划。苏里茨好象很支持他，并对在喀布尔的大部分印度革命者采取敌对态度；而那些印度人全是民族主义者。据说阿扎腊之所以愿意与苏里茨在一起，是因为他怕遭到狂热分子暗杀。

喀布尔的局势显然是严重的。那种局势必须大加改善才能使阿富汗的首都成为在印度采取革命行动的前进基地。卡拉汗认为，如果鲍罗廷出任新的苏维埃驻阿富汗大使，就可以

另起炉灶了。齐采林也赞成这个主张。在我亲自同列宁讨论了这件事之后，还必须提请共产党政治局批准。

自从鲍罗廷在墨西哥向我提出建议以来，我脑海里一直在设想通过俄国来恢复同印度国内朋友们的联系。不过这个想法还很模糊。在最近的将来，我更加关心的是有关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根据我的新的想法所提出的印度革命的类型，还须进行具体的研究。接着还要考虑用什么方法从物质上帮助发展这种新型的印度革命。因此，对于卡拉汗提出来的建议，我还不能立即作出明确的答案。这个计划很有吸引力，但我必须仔细思考，并与鲍罗廷讨论一下。

由于暂时没有更多的东西可谈，而卡拉汗也一定还有其他事情要办理，所以我建议当晚不要谈下去了，过些日子再碰头。卡拉汗站了起来，我想，大概要说再见了吧。可是，他的眼睛转向那个长长的房子另一头的大门。大门慢慢地开了条缝，一个头探进来，看样子是怕打扰屋里的人。应卡拉汗的一再要求，一个面带歉意的半夜来客迈步进来，看样子仍然活象一只受惊的兔子，他轻轻地随手把门关上，胆怯地走到大桌子跟前。他的副手给我介绍，这就是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同志。

欧洲外交界的恐怖情绪与他的名声完全连不到一起。人们万万想不到，这样一个温文尔雅、谦虚恭谨的人，在资本主义国家外交部长们的恶梦里，竟成了把其阴影投射到整个欧洲的传奇式的共产主义幽灵。在那些日子里，苏维埃政府时常发布外交照会，严厉谴责帝国主义的不公正行径，并预言它很快就要垮台。那些史无前例的外交文件的作者，通常被想象

是俄国许多狂热人物当中的一人：那些人是一批口含血刀的长胡子暴徒，刀上还滴着他们屠杀的天真儿童的鲜血呢。

我从不相信资本主义世界黄色报刊传播的这些恶意的故事。可是齐采林毕竟是个奇人。他中等身材，衣着不怎么考究，面孔很吸引人，留着一小撮列宁式的短而尖的红胡子，头型长而美，上面长着黄中带红的头发，有点秃顶了。齐采林是一个典型的具有高度文化的欧洲绅士，他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内在的高贵品质，因而对自己的外表就不加注意。但是，他不摆架子，很敏感。他总是因为有自己在场而表示歉意。然而，他的人格却放射出充满周围环境的东西。那显然是他的真诚、热心和完美的道德。他有一个理想，他以狂热者的信念去追求这个理想。但是这种信念是以理智上的信服为基础，它排除了盲信主义的庸俗、鄙陋和盲从。

列宁是理想的布尔什维克的原始模型。他的信仰具有保罗式的早期基督教徒信仰的特点——兼有柏拉图的理智主义与禁欲主义的精神克制。用这个尺度进行衡量，早期的布尔什维克也没有多少人够得上这个原始模型的标准；假若不是死神的仁慈的手过早地夺去列宁的生命，免去了他接受考验，我也不能确定他本人是否能够达得到。

根据大家所知，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任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就属于这种类型。我没有荣幸同他见面。我到俄国之前他就去世了。许多把自己的生命狂热地献给严格的革命理想的早期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后都没有活多久。看来他们的生命已在狂热地献身于伟大事业的烈火中消耗殆尽了。他们都患着这种或那种心脏病或肺病。

十分奇怪的是，“契卡”（红色恐怖的可怕工具）的组织者和第一任主席捷尔任斯基，却是另一种原始模型的布尔什维克。但在他的行为里面也没有什么真正出奇之处。那是狂热的必然结果；禁欲主义的精神克制会不知不觉地堕落为耶稣会的功利主义的伦理观。甚至在早期的与列宁同时代的一些布尔什维克身上也出现这种情况。但那是一种精神上的打击，没有几个人能够熬得过来。捷尔任斯基便是其中的一个牺牲者。他患有肺病；但对他来说，个人的道德观与他对集体主义的尘世宗教的狂热信仰之间的冲突，确实比结核菌更为致命。我之所以能够发表这样的意见，因为我有机会亲自结识他，虽说时间不长。他是一个不惜精力、忘我工作的人。丹东^①直到自己死亡的前夕，才感觉到恐怖的残忍。捷尔任斯基是个感情较多的人；每次他把一个人送上绞刑架时，他内心都为之痛哭。否则他可能会活得更长些。但人们可以想象，他并不想活下去，因为一个献身革命的人的生命就是这样一出悲剧。

无数地位低得多的布尔什维克都属于斯维尔德洛夫与捷尔任斯基的类型。他们的经历构成了俄国革命的大悲剧。然而，要是没有他们的牺牲精神和埋头工作，革命也许不会成功。我感到欣慰的是，我有机会荣幸地同那些历史的殉道者当中许多人见过面并一道工作过。齐采林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现代史上轰动一时，以后就无声无息地消逝了。对他，同时也对那些重视他所体现的文化和道德价值的人来说，幸运

^① 丹东 (Danton, 1759—1794)，法国大革命时代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
——译者

的是，他没有被以悲惨的嗜血面目出现的革命所吞没。他同其他接替他的那些人比较起来，革命性并不差；但他不愿为了前途飞黄腾达而损害他的有理性的见解。李维诺夫和维辛斯基都比不上他。前者相信，革命制度能够同资本主义现状和平共处，而后者则是个莽撞的煽动家。齐采林无声无息地在历史中湮没无闻了，因为他不愿意冒着使革命本身毁灭的危险来渲染自己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换句话说，齐采林不如托洛茨基等人那样了不起；而在另一方面，他的品质高尚，不屑于把自己降低到象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那样搞阴谋诡计和宗派斗争的水平。

关于俄国许多革命领袖的个人特点和历史意义，我花去了多年的时间才得出这一判断。我初次与齐采林那样传奇式的人物见面，就是最终使我得以构成上述判断的经历的一部分。初次见面的印象异常深刻，足以影响后来的判断。

卡拉汗给我做了正式介绍之后，齐采林用熟练的英语同我谈话。他对我来莫斯科感到非常高兴；殖民地世界正处于熊熊烈火之中；革命必须向东发展；世界革命的第二条战线必须在亚洲开辟。

我听了那些话感到十分满意，但我不太明白，亚洲如何才能光荣地执行分配给它的任务。当然，对现代预言家中的一员那种热情的乐观主义，我是怀疑的，但是说不出口。齐采林说，我们不久还要晤面，讨论由殖民地人民起义来帮助世界革命的巨大可能性。我对自己能受到传奇般的苏维埃外交人民委员的邀请，同他进行磋商，深感快慰。在印度做点工作便可促进世界革命事业的想法是非常富有吸引力的。我自己早已

有了那种想法；但还必须考虑出它的细节及具体形式。

齐采林同他的副手细声交谈了几句，跟我暂时告辞，他静悄悄地走出了房子，象他进来时一样。卡拉汗显然认为，需要对他的首长的行为作点解释。为什么他非跑下来同他的副手商量不可呢？谁也不知道；但是他下来了，而不是把他的下属叫到他的办公室。这一天在卡拉汗的办公室里举行的激动人心的会见结束时，已是破晓时分了。他对不能伴送我们回去表示歉意。他还得处理一些工作，这些工作也许要把他再留在办公室里几个钟头。这说明了为什么白天不能在他家里同他见面。

第二天，我进行了一番绞尽脑汁的思考，其结果是提出了一项开辟世界革命第二战线的计划。如果鲍罗廷被派去担任新的苏维埃大使，那么我就必须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束后立刻动身前往喀布尔。但我必须有足够的武器、装备和金钱供我随意使用，以便从边境各部落招募一支军队。这支军队要相当强大，不但足以袭击英国的领土，而且要能够占领其中某些地区并驻守在那里，作为进一步前进的行动基地。卡拉汗认为这个计划非常大胆，觉得必须提交革命军事委员会讨论，拟订详细计划。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当时正在前线。而他的副手克兰斯基则在莫斯科。我在需要时随时都可以去见他。不过首先我必须同列宁讨论这个计划。

鲍罗廷提出一个棘手的问题：为什么不可以把我派去担任新的苏维埃驻阿富汗大使呢？苏维埃共和国并不是一个民族的国家。任何人都可以做它的公民。如果把一个印度的革命者派到喀布尔当苏维埃共和国的大使，那么共和国在印度

的声望之大将是无法估量的。而且这样一个事实在整个东方都会产生反应。卡拉汗很欣赏这个想法，他不懂为什么不可以照此办理。至于我，当然罗，那简直使我着了迷了。在齐采林指出来之前，我并没有意识到还有一大堆技术上的困难呢。在列宁有时间去考虑这个问题之前，反正什么事也做不成的。

当时列宁全部精力都贯注于摆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面前的各项问题；另外，他还得为俄国新建立起来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操心。因此，开辟世界革命第二战线的计划只好等到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盛典举行之后再说了。

44. 布尔什维主义的女家长

我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就受到共产国际第一任总书记安捷里卡·巴拉巴诺娃的接见。这是在她办公室里的一次非正式会见。她邀请我到她私人寓所吃午后茶，寓所是在克里姆林宫墙外公园门前的一家小旅馆里面。

鲍罗廷陪伴我乘上卡拉汗的黑色轿车。途中（几乎是绕着那个大城堡走了一圈），他简要地描述了城堡各座不同建筑物的情况，并给我指点附近的历史遗迹。在通往著名红场的南面入口，也即克里姆林宫的主要通道的前面，矗立着一座双尖顶的古色古香的教堂。在那座老教堂的四周，到处都是具有金黄色圆顶和闪闪发光的拜占庭式尖塔的高入云霄的教堂，相形之下，老教堂成了一个其貌不扬的矮子。那就是令

人一想起来就胆战心惊的圣乔治教堂，它是伊凡雷帝建造的，大概是为了把莫斯科公国的守护神供奉在一个有利的地位，以便于守卫城堡的门户吧。许多阴险狡猾而又血淋淋的罪行，就是在那个城堡里面干的。

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猛攻克里姆林宫时，那座外表上并不吸引人的古代建筑，遭到了部分破坏。那个意外事件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但在高级的布尔什维克集团里却掀起了一场小风波。当消息传到彼得格勒时，卢那察尔斯基非常痛心地去寻找列宁，强烈抗议革命毁坏了一座古迹。他以退党相威胁，说那种故意破坏文物的行径如不停止，他就不同情革命了。据说列宁答应建造一座新的来代替老的，这样才使这位革命美学家的怒不可遏的心情平静下来。

在那些日子里，对于毁坏一座为了纪念中世纪暴君的暴行而建造起来的古迹，布尔什维克中是很少有人会感到任何内疚的。然而，圣乔治教堂却没有遭到毁坏。苏维埃政府发布了一项公告，命令保护在内战中剩留下来的一切古迹。宫殿改为博物馆，教堂改为学校。圣乔治教堂因为太小，不能用于上述社会用途，但它依然竖在那里，样子非常难看。它既不再作为神殿，也不是作为中世纪暴行的纪念碑，而是作为拜占庭建筑术的奇特式样保留下来。

革命放弃了许多它原来的信仰。它的意识形态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的狭小范围，只是方向走错了。在沙皇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把中世纪莫斯科的传统作为历史遗产，重新恢复起来了。历史被重新改写，创造出新的传奇故事。伊凡雷帝重新命名为伊凡大帝，作为民族英雄受

到称赞。他的残酷行为被视为是赤色恐怖的先驱而获得肯定。搞恐怖的目的是要把分裂分子从新生的斯拉夫国家中清洗出去，保卫这个国家抵抗鞑靼人的渗透。除了敏锐的官方历史制造家的这种发明创造之外，爱森斯坦用他的艺术天才给伊凡大帝建造了一座令人神往的纪念像，它几千次在银幕上出现，在千百万感情上受到抑制的人们的心灵里，激起对想象中的过去时代的怀古之情，借以把日趋衰退的信念的火焰重新煽旺。

我下了车，想仔细看一下圣乔治教堂。突然间，《国际歌》的曲调——革命无产阶级的赞美歌，响彻大广场。我四外观望，看看音乐是在哪里演奏的——那是从一个强有力的、显然不平常的乐器上发出来的。鲍罗廷对我的迷惑不解觉得好笑，就指着那个位于克里姆林宫主要入口处的大钟楼给我看。大钟上的时针和成年人的身材一样高，正好指在5点上。钟楼里的钟铃，其大小也与之相称。它正在响着，把洪亮的音乐传开去，宽阔广场四周一幢幢高楼发出回声，汇合而成一片巨大的音响。这个经验使你不能不深受感动。革命前，也用那些钟铃来奏沙皇的国歌。由于无线电播音的技术改进了，克里姆林宫钟楼上的钟铃每天奏三次《国际歌》，号召全世界工人起来反对贫穷与奴役，歌声在地球上任何地方都能听到。

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初几年，我还习惯于每天晚上收听莫斯科电台的鼓舞人心的音乐，乐声是越过喜马拉雅山从几千英里以外传来的。日复一日，不断传来红军在纳粹战争机器前面撤退的消息。莫斯科郊区情况十分危急；列宁格勒随时都有陷落的可能；乌克兰遭受蹂躏；有一个军在基辅全

部陷入重围；德军已进抵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山麓的亚洲大门。每天晚上，从克里姆林宫钟楼传来的音乐声，重又恢复了我对战争的最终结局的信念。突然，有一天晚上，希望的信息没有传来。第二个晚上、第三个晚上我接连收听，希望的信息不再来了。在同一个时间里，克里姆林宫钟楼的钟铃不播送《国际歌》，而演奏起新的俄国国歌了。这不只是希望的破灭；而是一个历史时期过去了；我对俄国革命的解放意义失去了信心。那是我站在红场深受我面前的钟声音乐感染之后二十二年的事情。在中间那段时间里发生了许多事情；对我来说，中间那段时间是从1942年结束的。

我怀着畏敬的心情默默地再坐上轿车，前往共产国际总书记那边进行我的初次访问；这次访问标志着我生活中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巴拉巴诺娃单独一个人在等待我们，我担心她会因为我迟到而恼怒。但是，如我不久前才知道的，在俄国，人们从不会迟到，因为任何时间都是用茶的时间。每一个家庭里，俄国茶炊几乎整天都在滚着，以便随时可以泡茶；而俄国人一杯接一杯地喝着淡黄色热茶，总是没有个喝够的时候。

一位爽快的中年妇女，在一间摆设得整整齐齐的小房间门口迎接我。她个子不高，身材较粗，不象亚历山德拉·科伦泰那样美丽迷人。科伦泰在革命历史的旅途上走过时，后面留下了许多心灵受伤的钟情人。巴拉巴诺娃虽然容貌平平，但她那极端愉快的姿态和乐观的性情，却大大地补偿了这方面的不足。但她的乐观性格并没有发展成为盲从。她从早年开始就献身于革命事业，是个布尔什维主义的老近卫军。然

而，她不會養成党内贵族老爷们的傲慢习气。就她来说，简单朴素的生活不是靠摆出俗气样子来表现的。在她看来，不修边幅并不是革命的美德；她也不装出一副愁眉不展的脸孔，作为下定决心要为理想而死的标志。

她说着流利的英语，领我坐到桌子旁边的沙发上。桌上放着一个闪闪发光的茶炊，在不耐烦地嘶嘶叫着。她立刻忙着去泡茶。泡茶的方法对我来说倒是很新鲜的。几滴茶汁从一个放在茶炊上面的小瓷壶里倒进镶银边的半平底玻璃杯里；然后再拧开铜壶的龙头，把热气腾腾的水装满杯子。女主人在每个杯里加上一块方块糖，又添上几片薄薄的柠檬；在那时，柠檬是难得的珍品。

俄国人喝茶从来不掺牛奶，可能是因为一掺牛奶，茶的味道就太淡了。他们通常也不喝高级茶。因此，照例要加片柠檬调调味。革命前，柠檬通常都由意大利进口。在内战的年代里，俄国的对外贸易停止了，柠檬就成了日常生活中最珍贵的必需品了。要吃柠檬，只有在黑市以百万卢布一个的难以想象的高价才弄得到；而且要想得到那种奢侈品还得冒坐监牢的危险。黑市是非法的，所以买者也好，卖者也好，经常受到“契卡”的兜捕。价格是沒有实际意义的，因为在那些日子里钞票毫无价值。一张票面一百万卢布的钞票被叫做一个柠檬，因为它只能够买到一个柠檬。

共产国际的总书记当然不会到黑市上去买柠檬。鲍罗廷从德国带来了一些，于是他的朋友的朴素生活，就会由于得到少量的无伤大雅的奢侈品而有所改善了。巴拉巴诺娃预料到鲍罗廷会责备她在一个浸透英国习惯、喝茶就得掺牛奶的印

度人身上浪费难得的几片柠檬，所以就很高兴地告诉他说，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大利代表团，会给伊里奇(列宁)和她本人带来满满一篓柠檬的。她开玩笑地许下愿心，要从她的那一份柠檬中拿出一部分，加倍回送给鲍罗廷。

招待喝茶之后，巴拉巴诺娃表示歉意(显然是对我表示)，说她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款待了。接着，她愤慨地问鲍罗廷是否看见过，某些商店的橱窗里展览着各种糕饼而一群群饥饿的人却在那里围看的可耻景象。如果伊里奇坚持要推行新经济政策，那将会发生什么问题呢？这位刚强的妇女摇了摇她的已有白发的头，表示对革命的前途担忧。

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又加上遭受封锁，结果国家情况更为恶化，已濒于经济崩溃的边缘。又过了一年，革命的俄国遭到一次范围极广的饥荒的破坏。列宁提出了停止前进，主张执行新经济政策，放松军事共产主义的严格措施。他几乎受到他所有的老同事和主要助手们的反对。巴拉巴诺娃就是其中之一。不过她的反对算得上最忠诚的反对罢了。尽管她在个人的特性方面是个刚强人物，同时在政治上又是个老一辈的煽动家，可是她并没有把自己的生活和党等同起来。她是个富于同情心的人，所以她与党内同志的关系并不完全不受个人情感的影响；那种关系确实存在着人情味的特征。她是十足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女家长。

安捷里卡·巴拉巴诺娃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老近卫军，在流亡的岁月里，她同列宁交往甚密。她大半时间住在意大利，因而被视为那个国家的社会党的最初领导人。安捷里卡不是个俄国人的名字。她的意大利追随者用这个名字称呼她，他

们对她的敬爱达到了崇拜的程度。这个名字不光有拉丁文的生气勃勃的意思。意大利社会党是第一个具有巨大政治影响而加入共产国际的群众组织。社会党跟着她公开对抗老牌右翼领袖屠拉梯的反对党。关于巴拉巴诺娃的私生活人们知道得很少,也很少谈到它。最轻浮的党内小广播,也只敢窃窃私语说什么要不是安捷里卡的个人影响,意大利最高纲领派领袖塞拉蒂就不会同屠拉梯决裂,别的就不敢说了。

巴拉巴诺娃确实是无私而敏锐的早期布尔什维克的一员。现在,经验把革命的理想国的种种丑恶现实揭露出来了,他们的良心平静不下来。她因为老同志们在党内争权力争地位而格外感到痛心。拉狄克回到莫斯科时,很想得到共产国际总书记的职位。季诺维也夫支持他。季诺维也夫很想拉拢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因此他想使拉狄克得到威信和权力。德国共产党人认为巴拉巴诺娃由于种种老关系,会重视意大利社会党在共产国际的组织中的作用,所以他们支持拉狄克担任总书记。巴拉巴诺娃厌恶这类阴谋诡计,要求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解除她的职务。可是那个野心勃勃、急不可待的拉狄克,等不及按照正规的手续把他提升到那个使他垂涎三尺的地位上去。他在共产国际总部里居然搞了一次小政变,把温文尔雅的巴拉巴诺娃推到一个很不重要的地位上去了。

不久以后,她在俄国就销声匿迹了。在列宁去世以前,她一直在斯德哥尔摩过退休生活,依然是一个忠诚的布尔什维克。接着发生的争夺党的领导地位的残酷斗争,使她的幻想归于破灭。由于德国、法国、意大利三国社会党的老资格领袖

不愿接受莫斯科的命令，共产党便采取分裂以上各国社会党的策略，那也使她很伤心。她同塞拉蒂的私人友谊和道德上的敏感，最终超越了她对党的依依不舍的忠诚。列宁的逝世突然打断了往日的个人联系，同时也毁坏了对教义的信念与对组织的忠诚的人性基础。她认为布尔什维主义已随列宁的逝世而死亡了，因此她又拣起对社会主义的早期信仰，到新大陆去刊印她那部题为《我作为造反者的一生》的自传。

45. 新信仰的祭司长

我们离开前，巴拉巴诺娃要我于次日到共产国际总部她的办公室去见她。列宁一篇重要文件的草稿放在她那里，我去时就交给我。那就是《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准备提交即将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原稿是用俄语写的。鲍罗廷在我到达莫斯科之前已经把它译成英语了。但他从未对我透露过有关这个文件的只言片语。他在国内比在国外更是严格保守秘密。我后来才知道，保守秘密是布尔什维克的美德，这种值得怀疑的特征却给他们造成极多害处。

当时共产国际的总部设置在一座宫殿式的私人住宅里，位于距克里姆林宫和市中心都很远的一条狭窄的街道上，原先一定是属于某个贵族或富商所有。在缔结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之后，德国派了一个大使带着他的随员到俄罗

斯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来了。可是莫斯科没有合适的房屋设备可供各个外国使馆使用；以前在沙皇时代，使馆都设在圣彼得堡。后来共产国际总部占用的这幢楼房就分配给德国大使冯·米尔巴赫伯爵了。

社会革命党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同布尔什维克结成联盟只有几个月，他们就把布尔什维克同德国缔结和约一事，谴责为背叛十月革命和出让俄国主权。于是社会革命党人进行了一次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运动，宣称无产阶级专政已被米尔巴赫专政代替了。社会革命党的恐怖主义传统故态复萌，该党的一个暴徒把德国大使在他的办公室里暗杀了。德国政府认为布尔什维克要对这一罪恶的暴行负责，并从俄国撤出它的大使馆全体人员。后来，新建立的共产国际的总部又搬进这幢有一段旧历史和一段新历史的空房子，那段旧历史已被忘却，但新历史则在人们的脑海里记忆犹新。米尔巴赫被暗杀的那间房子还封闭着，那张厚厚的波斯地毯上的血迹依然没有褪色。它被当作一种陈列馆，在武装人员的守护下供外国共产党人参观。一些参观者认为那是革命暴力胡作非为的纪念物；而另一些人则认为那是恶有恶报的现场：满怀复仇心的德国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就是罪恶的化身；把他杀死，是正义的行为，人人都可以干这种好事。

尽管我是一个国宾，但我无论如何不应使用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车子来对共产国际总部进行正式访问。在那些日子里，谁也没有车子，不但有权有势的党的官员没有，政府的高级官员也没有。莫斯科的全部汽车都属市苏维埃所有。地位极高并享有特权的人物，也只有使用权。在中央汽车库（也称“汽

车基地”的队长那里，有一份由莫斯科苏维埃开的名单。那份名单上的任何人需要坐车时，都得给汽车库打电话。党的领袖和政府高级官员，每人都有专车。指定给列宁的是一辆罗尔斯·罗伊斯型老式汽车。还有几辆是专供共产国际书记处成员使用的。其中一辆归我使用。那是一辆老式的菲亚特汽车，样子很不好看，但马力却很足，跑起来几乎象个火车头。当时莫斯科的街道多半是用鹅卵石铺成的，而俄国的汽车司机老是喜欢用最高速度开车，因此重一点的汽车坐起来更舒适一些。我喜欢舒适而不讲究华贵美观，所以那辆老式的菲亚特汽车一开始就分配给了我。它在石子路面上作远距离奔跑时，一边咆哮，一边颠簸前进。每次越过街道及转弯时，我总怕发生交通事故，因为开军车的驾驶员过街和转弯是不减低速度的。

幸而街道上行人并不拥挤。成年的男人大部分都在前线，身强力壮的妇女代替他们在工厂工作；那些工厂都在市郊。在苏维埃首都数目仍然众多的非无产阶级居民，则象吓破了胆的兔子一样躲在家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引诱他们出去，甚至连店铺的橱窗他们也不去看一看。在街上闲逛或在公园里散步，会被视为是逃避生产劳动的社会责任；而受到这种怀疑的人，一般容易遭到危险，引起义愤而受到革命制裁。

这辆老式的菲亚特汽车拐了个弯，开进一条狭窄的街道，在一幢两层的、红色石头建筑的大楼前面颠了一颠就停了下来。在几级阶梯上面有一个关闭着的、精雕细刻的大木门。大门里面的两个穿着红军军装的武装卫兵把门打开。当我踏上门槛时，他们就在我的前面用两把刺刀交叉挡住。刚好这时

另一部汽车也在路边停了下来，我听见有人上了阶梯，他高兴地喊道：“同志们，别开枪！”说话的人是拉狄克。他在我的背上拍了一下，问我是否已有通行证。他一听见我作了否定的回答，便摇头说：“安捷里卡把事情弄糟了。”我认为那样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尽管如此，哨兵还是移开了那道令人生畏的障碍物，让我同拉狄克一道进去；他似乎在共产国际总部里面已被承认为最高的权威。他领我到总书记办公室的门前。办公室对面是一个高大宽敞的中央礼堂，米尔巴赫就是在里面的一间房子里被暗杀的。拉狄克用他的长烟斗敲了敲门，便离开我，沿着宽阔的大理石楼梯跑到上一层楼去了。巴拉巴诺娃本人还没有被逐出办公室。她那自封的接替人已经实际上接过了权力，有一个独立的办事人员班子和机构了。当时存在着两套权力机构——一套是事实上的，一套是形式上的。我听从了形式上的权力机构。

从我们在柏林初次晤面那时起，我就觉得拉狄克不是我所喜欢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同他的交往更加密切，我终于承认他的天才，高度评价他的功绩，但我从未放弃自己原先对他的偏见。他华而不实，缺乏坚定的理智上的信念与一贯的见解。他的长处是具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幽默感。这使他获得声誉；在革命的最初几年中，他在党内的声誉是相当高的。但此中总免不了含有恶意，尽管他也能够自己嘲笑自己。他由于缺乏领袖的品质，加上又不是布尔什维克的老近卫军，所以只好靠随风转舵，以求实现他那贪得无厌的野心。可是他并没有成功。尽管他于1921年被选进党的中央委员会，票数仅次于列宁，但他从未进入拥有无限权力的政治局。如果不

是拉狄克在不止一次的政治危机中暴露出了他那个人忠诚是可疑的，他很可能就获得斯大林的信任了。他没有什么道德上的顾虑，所以他能够做到残酷无情；他为了满足政治野心，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的反复无常的性格，会使他在那条著名的斯大林主义者的冒险的曲折航线上逍遥自在地航行。可是他把自己估计得太高了，卖弄聪明也太过分了，到头来落得个鸡飞蛋打。他的最后垮台，并不象不少老布尔什维克的情况那样，是由于政治信念所造成；而是由于错误的政治判断。他随风转向的次数太多了，弄得任何一个政治集团都不敢相信他。拉狄克是作为最卓越的共产党记者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宫廷弄臣而载入史册的。

巴拉巴诺娃在她的办公室里不如在家里那样活象个天使。我进去时，她一直在桌子旁边坐着，点头示意要我坐到对面的椅子上。在官场的气氛中，前一天这位迷人的女主人却摆出了一副尊严的样子，表示出她是两次国际会议的著名的组织者和办事效率很高的书记；那两次会议宣布了共产国际的成立。她聚精会神地阅读文件，整整一刻钟没再理会我。我越等越不耐烦，一直等她把文件推在一边，抬起头来，露出显然满意的笑容，这才消除了我的不安。她还是没理睬我，又拿起了电话筒，要总机接通克里姆林宫。她用俄语通话，最后听到她提及我的名字。她在便笺上写下了一条简短的记录之后，就放下电话筒，同我谈话，开头她表示歉意，接着秘密告诉我说，我来到的那个时候，她正在阅读意大利寄来的一份最新报告。报告中带来很好的消息，她必须立刻告诉伊里奇。意大利社会党最高纲领派（多数派）已经明确作出决定，派出

一个以塞拉蒂为首的人数众多的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接着，她毫不掩盖，自我满意地加上一句说：尽管博尔迪加搞宗派主义，本巴奇言行放肆，但是她的努力还是成功了。那两个人都是意大利共产党的领袖。

她突然转变了话题，通知我必须在一小时内——即在十二时半，去见列宁。她刚才在电话上已明确地跟他定下了这次晤面的时间。在去克里姆林宫之前，我必须阅读《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草稿。当然，初次会见是不会认真讨论的。列宁正热切地等待着我的到来；当她在电话里告诉他，说我现在就在她的办公室里时，他建议立刻会见。巴拉巴诺娃那一副尊严的很不合适的假面具不见了，她又恢复了天使的样子。她带着一副守护神的慈祥的脸孔，用母爱的语调说：“年轻人！你有理由引以为傲；但要冷静一些。祝你幸福。”这句话给我以深刻的印象。我始终逐字地记住了它，从未忘记这一警告，并且十分珍惜着这位天使的祝福。

巴拉巴诺娃从她桌子的抽屉里取出几张纸递给我看。这就是那个要创造历史新篇章的文件的英译本。这时她又恢复了她那一派正经的姿态，象一个教师吩咐学童似的：在我去见伊里奇之前，必须退到房子那一头的角落里去阅读文件。我也象个学童那样，照吩咐办事。文件的标题页左上角有一个简短说明，首先引起了我的注意。“罗易同志：请提出批评和建议。”弗·伊·列宁在上面签了字。这的确是一杯使人陶醉的酒，但那个天使的警告依然在我耳边响着。我尽力在读那个文件，可是我太激动了，无法集中注意力。再过不到一个小时，我就要同我们时代的、也许（当时我是这样想的）是历史上

的最伟大人物见面了。他在两年前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流亡者，但他以无与伦比的大无畏精神，夺取了世界舞台的中心。我的想象飞翔到克里姆林宫里去了，那个人的形象出现在我的面前了。我曾经看过列宁的照片和肖像，心中早就有了他的形象。一个伟大的革命执政官，怎么会有那样谦虚和宽容的精神，竟在文件上写下了那样一个简短说明？收件人是个小人物，因此他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例行的客套和虚伪。巴拉巴诺娃的秘书过来告诉我说，到动身的时候了。他要和我一起去办理一个外国人进入红色禁城应办的正式手续。

在克里姆林宫的大门口，我的同伴向哨兵出示卡片。一个军官立刻走出来，要验明我的身份。他用一个手指在名单上顺序划下来，并点了点头。手续并没有就此完结。下一步是挂电话给列宁的秘书处，请示是否批准让某某人进去。我在过去沙皇通常在那里举行加冕礼的宫殿的入口处，受到了接待，现在苏俄人民委员会就设在这座宫殿里。在入口处受接待，并不是享受特权的象征，而是一种安全措施。任何一个新来的人，不管他怎么显赫，只有在最严格的但也是经过周到考虑的警戒之下，才许进入那个至圣所。武装卫兵布置在通往二楼铺有红地毯的宽阔大理石楼梯的顶端。我们走过了几条长廊和几个大厅。但我几乎什么东西也没有注意到；我立刻就要同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他的追随者尊之为新信仰的祭司长——见面和谈话了，这种激动人心的期待已把我的脑子占满了。

46. 初次会见列宁

人民委员会主席办公室的入口，由一批秘书守卫着，为首的是一位年岁较大的妇女。她平易近人、容貌平常、衣着简朴，她显然凭着毫不外露的威信，胜任愉快地工作着。列宁的私人秘书处由大约十余人组成；他们占用的那间大房子里，非常肃静。那位头发灰白的主任每当需要同她下属的任何同事谈话时，就静悄悄地从一张桌子跑到另一张桌子去。他们都是尽可能用低的声音讲话。除开那位主任之外，谁也无权进入列宁的办公室。获得受到如此重大信任的地位不是普通的人。在布尔什维克天堂里的这位温和而相当平凡的圣彼得是个老党员，是在莫斯科大家都熟识、大家都尊敬的人物。

通往列宁的秘书处的那条路，要经过一个经常空着的设备齐全的接待室。从来不让一个被约定会见的人在那里等着。列宁没有不遵守时间的习惯；这种举世闻名的、已成为民族特色的习惯被布尔什维克继承下来了。遵守时间好象已被暗暗列入遭人讨厌的小资产阶级偏见之列。越是著名的领导人就越不遵守时间。人们总是以领导人职务多、约会忙来说明那是正当的。季诺维也夫在这方面打破了所有领导人的记录。他有好几次使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会议或代表大会的执行委员会为等他等了几个钟头。

只有列宁是个例外。就对待时间的态度这一点来说，他最不象俄罗斯人。他每天接见许多来访的人，但他的接待室却总是空着，原因即在于此。会见的时间一般很短，常常只

给一点时间，例如九分钟、十三分钟或十七分钟，限定多少时间就是多少时间。在每一次特约会见结束前两分钟，玛丽亚同志（秘书处主任）就按一下电钮，列宁桌上的一个小灯泡就亮了。列宁遵守时间的声誉绝对不许受到损害。玛丽亚同志发出了信号之后，就引进下一个来访者；如果后面没有人立刻跟上来，她就会自己拿来几张文件放在列宁面前。因此，内部有人讲笑话说，玛丽亚同志对待伊里奇就象对待学童一样。

我走过了那间空空的接待室，被伴送到秘书处去。秘书处的工作人员都在埋头工作，所以没有注意到我。但布尔什维克天堂的圣彼得却是时刻警惕着。她站起来，向挂在壁上的大钟瞟了一眼，一声不响地走上前去把她的下属同事的任务接替过来；就是她的那个下属把我从克里姆林宫的门口带进来的。她领着我走到一个金碧辉煌的高门前，轻轻把门推开，刚好可容一个人通过；于是她就点头示意让我进去。我走进进去，大门随即又无声地关上了。

那是一间长方形的大房子，有一排高高的窗户朝着宽阔的院子，院子周围是克里姆林宫的其他侧厅。天花板几乎高上了天。那间房子实际上是一无所有；只有地板上铺着一条厚地毯。一个光秃的头顶，低低地俯在房子正中间的一张大桌面上，那情景立即把我的注意力吸引住了。我很紧张地向桌子走去，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希望自己不要造成一点干扰；那条厚地毯很同情我，它没有使我的脚步发出声音。从门口到桌子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在我走了还不到一半距离的时候，那个非凡的脑袋的主人站起身来，敏捷地迎上前来，伸出了右手。我已站在列宁的面前了。

他几乎比我矮一头，他把他那撇红色的山羊胡子翘到几乎达到水平线的位置，好奇地端详着我的面孔。我感到局促不安，不知道说什么好。他说了一句开玩笑的话，使我摆脱了窘境：“你很年轻嘛！我还以为是个长着白胡子的东方贤人呢。”我初来时的紧张情绪消除了；我找到几句话来抗议他瞧不起我二十又七的年龄了。

列宁笑了，显然是想让一个怀着敬畏的心情的崇拜者安心。我正在经历一次伟大的事件，因此对于周围琐事无暇顾及，然而我仍然对他那副幽默的样子有很深的印象；那种样子时常使一个狂热者的严肃表情变得轻松起来。这就证明一般人的下列看法不对：他们认为在列宁身上，铁石的头脑牢牢控制着一切，窒息了他的同情心；认为这位伟大的革命家是一部完全没有一点人性的顽固的机器。他那副幽默的笑容中并没有愤世嫉俗的意味。列宁是一个彻底的乐观主义者。他不但毫不动摇地确信，马克思主义是最终的真理，而且也同样地坚信它不可避免地要取得胜利。他把预言家的热情与福音传教士的献身精神结合起来了。要不是这样，当布尔什维克看来很少有可能保持政权几天或几周之久的时候，他就不会一个人起来反对他的全体追随者的顽强的反对意见，而主张夺取政权了。在那个关键时刻，指导列宁的主要是信念，而不是理智；那不是对历史宿命论的世俗上帝的信念，而是对人创造历史的无穷能力的信念。列宁在他一生中和现代史上的决定性时刻，是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者行动的；而那种非凡的勇敢行动将他推向伟大的高峰，使他在人类历史上的不朽人物中占有一个位置。

丹东和列宁是现代两个最伟大的革命家，丹东也是浪漫主义者。当伪善的理性祭司长的妒忌心把丹东送上断头台时，法国大革命的领袖被杀害了。列宁象他的伟大的前辈一样，在历尽艰辛、为时还不太晚之际，也以大无畏的精神要求采取温和做法。列宁没有与他旗鼓相当的人；尽管托洛茨基在他逝世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很想效法罗伯斯庇尔的狂热行动。因此，要不是自然死亡的残酷之手，使列宁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他很可能已把革命的道路转到更有成效的方向上去。新经济政策就是信号。那个政策如果开展下去，本来可能防止后来那样重新采用恐怖与强制手段的做法，这种做法毁坏了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理想。但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左的反对派迫使斯大林扼杀了列宁的丹东主义精神。那两个想当列宁继承人的竞争者，合在一起对俄国革命所作的贡献，就跟罗伯斯庇尔对法国革命所作的贡献一模一样。

对列宁的品德及其在革命史中所占地位的这些想法，是在我初次会见列宁之后的许多年中在我心中逐渐形成的。但这种思想的根源，却可以追溯到最初会见时的印象上去。这位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投下不祥阴影的人物，实际上同他的令人悚然生畏的名声完全不相符合。独裁权力的王冠很难扣到他的头上。他的举止行为，他的说话方式，都一点也不象独裁者。他非常谦虚，那不是矫揉造作——矫揉造作为的是显示优越感，很叫人讨厌。他说话坦率，态度友善。多年来他一直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无可争议的领袖。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人曾多次与他意见不和。但从来没有一个人曾经梦想过取代他的地位，去作党的领袖。他不只是领袖，而且是导师——布

尔什维主义的祭司长。对党内老干部来说，他们是他们的朋友兼哲学家。他们都热爱他。

列宁从他政治生涯的早年起，就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内部一直同各种小宗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他同右翼领袖们的论战，充满了硫磺火药味儿。他详细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成为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一支铁一般的部队这个具有威胁性的理论。但他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行动却始终是民主的。当他不能说服中央委员会同意他的意见时，他就把问题提交到一般党员那里去讨论；而在那些日子里，并不存在操纵党组织并制造那种一般党员都赞成领袖意见的官僚机器。1917年7月，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中大多数人拒绝了列宁关于必须号召武装起义准备夺取政权的建议。于是他就返回芬兰的隐蔽所去，在党的机关报《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详细阐述他的论点。不到两个月，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就集合起来，提出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

列宁在党内讨论时一向都是以生动的论据，透彻地阐明他的观点。他认为新生的苏维埃政府应该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他用以支持这一观点的论据是：士兵已经用他们的脚投票赞成和平了。怎么用脚投票呢？就是从前线逃跑了。他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为新经济政策辩护时说：“我们现在必须学会做革命管家的工作了。”他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详细阐明他的论点，指出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是一支革命力量，但又警告说：“但不要把民族主义描绘成红色的。”

列宁在帮助我摆脱了开始会见时的局促不安和神经紧张

之后，又坐到他的桌子旁边的座位上去，请我坐在他对面的靠背椅上。在他转身走向他的座位去的时候，我把他这个人好好地看了一眼。直到这时，我才清醒安定下来。房子很高，人就显得特别矮，他好象是个矮子了。他那个大脑袋十分适合他那令人不易判断的身材。我们之所以说他的身材难以判断，因为列宁并不是个矮子，他大大高过五英尺。我认为有五英尺四英寸。另外，他有个习惯使他看上去比他的实际高度要矮。他走起路来总是弯着腰，头部不向左右转动；同样的，也不抬起眼来看前面的东西。他的那种姿态说明，他甚至在走路时也集中精力思考问题；而他那快速的步伐，似乎同他心脏的迅速节律是一致的。他好象经常处于万分忙碌之中，仿佛敏锐地意识到他的任务重大，而随他支配的时间却很有限。人们也许很想知道，他是不是已经预感到他的寿命不长。他急于要把各种事情迅速地处理妥当，所以他就限制了那个权力极大的政治局委员们的讲话自由。在他那个时候，政治局只有七个委员。每周例会时，任何人发言都不得超过两次，第一次十五分钟，第二次五分钟。尽管他的脑子很敏锐，但他的发言是谨慎的，有时甚至是缓慢的。除了向群众做报告以外，他讲起话来就象教师在教室里讲课，或者象律师在法庭上为一个案件进行辩论那样。

列宁回到他的座位之后，身子向前靠在桌子上，他的闪闪发光的杏仁眼注视着我的面孔。他满面露出幽默的微笑。我感到完全无拘无束了，好象我在那张桌子旁边坐惯了，不是在一个伟大人物、一个强有力的独裁者的面前，而是愉快地同一个老朋友在一起。的确，那也可能是慈父对儿子的亲切微笑，

因为他作了好事，而且答应还要作更多的好事。我一想起巴拉巴诺娃向我祝贺时所说的话，就感到有点茫然，但她的慈母般的警告，在我的脑海里依然记忆犹新。

列宁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沉思。鲍罗廷已经向他报告了我在墨西哥的种种活动。我必须谈得更详细些。那是一次异常有趣的革命战略的实验。说老实话，我的确不愿意把那个已有很好的开端的工作抛开。可是，还有更迫切的革命任务，我们必须把它摆在首位。还要过一段长的时间，革命才能在西半球成功。不久的将来，在墨西哥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各种条件可能成熟起来。但美帝国主义跟过去一样仍在伺机进行干涉。目下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于东半球；亚洲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广大群众必须动员起来，组织到一个巨大的革命运动中去。我在墨西哥的经验对此具有极大的价值。我在实践中已经预见到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所应采取的革命战略的理论，那个理论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提纲草案中已经提出来了。我看过那个提纲了吗？没有，我抱歉地回答。因为那个文件是在我访问它的作者之前刚刚给我的；但我一有时间一定就立刻看这个文件。“那好，我们得再一次见面来讨论它”，列宁添上了这么一句，并说明他对殖民地国家的情况很不了解。因此，他在起草那个后来成为革命运动史中的里程碑的文件时，需要我的合作。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必然是有助于说明殖民地国家的历史和当前的情况。

那个小灯泡发出了信号——列宁往后面一靠，说会谈应遵照玛丽亚的命令结束。幽默的微笑重又出现在他的眼神里。我站起来告别，发现列宁已走到我的身旁。他抓着我的手臂，

领我向门口走去。门已开了，让一个长着一头黑色鬃发、面貌敏感的小胖子进来。他穿着一条宽阔下垂的裤子和一件柔软的白衬衣，衬衣的领子不是用领带而是用一条黑丝带结住。他挟着一个装得满满的公事皮包。列宁把我介绍给那个新来者。他就是季诺维也夫同志，他轻轻地和我握了一下手。他的手既小又软，象妇女的手一般。他用很高的声调说了几句话，希望我不久能去看他。

在外面的秘书处里，一个青年正在站岗看守三个大箱子。我后来才知道，那三个箱子里分别存放着季诺维也夫所担任的三个高级职务的重要文件。

47. 在群众大会上首次演讲

1920年初夏，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大部分代表都到达了莫斯科。他们经由各种各样的，合法的和非法的路线，登上旅程；有的经由瑞典和芬兰，有的从德国由海上来到列宁格勒。那些没有合法护照的人，大部分偷偷地经由波罗的海各国或从陆路通过加里西亚前来。还有相当数量的代表来自与俄国毗邻的各亚洲国家，例如土耳其和波斯。从远东通往苏俄的道路，被一支深入西伯利亚内陆的日本军队所封锁。可是，一些中国代表和日本代表仍然设法取道蒙古而来。还有一个朝鲜代表也从那里来了。

1920年夏天，实际上世界各国都有道路通往莫斯科。欧

洲所有的国家都派出了代表。美洲也派来了代表，其中包括了几个拉丁美洲国家。几乎世界上的一切语言，都可以在苏俄首都的街道上听见。

棕种人和黄种人遇到的白种人，不是盛气凌人的帝国主义分子，而是朋友加同志，他们急于要为殖民主义的罪恶行为赔罪；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呢。还有少数黑人；有些来自美国，有两个来自南非。对他们来说，自由地同白人混杂在一起，甚至公开同白人妇女跳舞而没有被私自处死的危险，这还是一种新奇的经验。事实上，对俄国妇女来说似乎黑人最有吸引力。也许这是对比越大越好相处的一例。

意大利代表团是最大的代表团。它在会场里与其说是以人数取胜，还不如说是以嘻嘻哈哈、吵吵闹闹出众。它也是最不纯的，其中包括社会党、共产党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各派学说上的分歧，被淹没在拉丁民族的深深的情感里。现在，他们联合起来支持现代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并热烈地希望这个革命扩展到其他各国去。社会党人由留着银白色胡子的塞拉蒂领导，他得到米兰的一位哲学教授的有力帮助。热情洋溢的尼科洛·本巴奇和猖狂的阿马德奥·博尔迪加率领着共产党代表。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首领是个十分漂亮的那不勒斯人，看来他对情场上的追逐比对世界革命问题更为向往。他除了跑上讲台发表激烈的演讲之外，总是被一群女随员团团围住。

所有的代表都住在一家旅馆里。那是一座新建的三层楼房。我以国宾的身份住在莫斯科河上糖业大王一座宫殿式的宅邸里。不过也分配给我一套旅馆房子，以便于我参加共产

党人的国际集会。在任命我为苏俄驻阿富汗大使那个棘手问题还悬而未决的期间，我一直保留两处住所，直至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束为止。白天我都是呆在旅馆里，夏令季节的白天要到晚上 10 时以后天才黑下来。我在旅馆里同当时所有的共产党领袖结识了，还同其中一些人交上了朋友。几乎每天上午都有一批批的代表被邀请到莫斯科郊外旅行，去参观那些改为儿童之家的贵族乡间别墅，和改为疗养院的那些松林中的宫殿。同时也组织参观红军营房。代表们每到一处就代表他们各自国家的无产阶级，向伟大光荣的俄国革命致以兄弟般的祝贺，同时还赞扬革命在如此短促的时间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当然，没有一个人不谴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世界煽动俄国内战，并保证世界无产阶级一定要捍卫第一个工农共和国，惩罚他们本国的罪犯。用各种外语发表的演讲，全都译为俄语。与会群众都凝神静听，热烈鼓掌。这对一个被围困在堡垒里的人来说，是希望的福音，也是帮助的诺言，苏俄在 1920 年实际上正是如此。

五一节那天，我在群众大会上演讲，这不但是我在俄国的首次演讲，而且在我的一生中也是第一次。印度国内早期的革命民族主义同群众没有关系。在群众大会上演讲，不是我们活动的一个部分。我们乐意把各种恐怖行为告诉人们并以此自豪，而蔑视发表一通毫无用处的演讲，以及通过几条未被承认的决议的可悲做法。在我设法寻求武器而未获得成功的岁月里，我没有机会去做公开演讲。我对革命和政治活动的思想，在我逗留美国期间发生了变化。可是我在那里居留的时间太短了，无法把那种新思想付诸实践。在墨西哥，我就

有了这种机会。我第一次接触了群众革命运动，并用讲话来作为革命的政治活动的一种形式。可是我早期不愿做演讲的那种抑制，是不容易克服的。我的德摩斯梯尼^①式的潜在能力，还没有在公开讲坛上受过考验。我不敢在委员会会议室或小礼堂之外演讲。

一个人如果有这么一段背景，他在被邀请到一个规模肯定很大的群众大会上做报告时，自然就要神经紧张起来了。那将是一种新鲜的体验。在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节目表上有两个项目：上午，党的领袖和政府的首脑检阅游行队伍；下午举行群众大会，由某些前来参加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发表演讲。这两个项目都将在克里姆林宫正门前面城墙外的红场上进行；《国际歌》的曲调就是由那个正门上的大钟奏出来的。

这个受围困的城市的严酷气氛，部分地被那些从黎明起就不断拥向红场的人群的暂时的轻松愉快的情绪驱散了。青年人列队行进，雄赳赳地唱着革命歌曲。最动人的场面是长达一英里的穿着军装的士兵行列，领头的是唱着著名红军歌曲的一支部队，他们的歌声与后面行进的数千只脚的步伐声合拍地构成节奏。在领头的一支部队唱出了每节歌之后，背后行进的部队就接着齐声合唱乐曲的副歌：“我们是自由的战士；我们是人民的儿子。”一股强大的声波掠过一英里长的行进行列，从遥远的地平线上发出了回声。只有一小部分临时召集起来的红军参加了1920年五一节的示威游行。大量的

^① 德摩斯梯尼 (Demosthenes, 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 雅典的演说家和政治家。——译者

红军正在全国不同地区的许多战线上作战，而主要部分则集中在西线上，由托洛茨基亲自指挥，他们要把革命旗帜插在欧洲的心脏。当战士们开往前线作战时，他们到处都在唱着红军歌曲。在革命早期非常流行的另一支歌曲，它的歌词是一首歪诗。歌词是这样的：“我们的机车向前开；公社的前面没有车站。我们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但有枪支握在手里头。”列宁不大爱好音乐。但他十分喜欢这首革命歌曲。这首歌曲大概是某个士兵在他的联队搭乘的一列由一个老火车头拉着慢慢行进的列车上创作的。

列宁站在专为五一节建造的高高的观礼台上，把右手举到他的布帽沿上。他的两旁站着除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外的党的政治局全体委员，那两个人一个正在西线，另一个在位于伏尔加河下游的被围的察里津城内，指挥着筋疲力尽的守卫部队。来自莫斯科城不同地区的游行队伍，汇合到红场西面的入口处。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作为红军的国际旅，获得特殊荣誉，带领着游行队伍进入红场。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俄国士兵；再后面是来自无数工厂的一眼看不到边的工人队伍。每一支游行队伍都在观礼台前稍停片刻，向领袖们致敬。领袖们一连几个钟头立正站着，直至那些集合在红场入口处的大批群众都很整齐地通过观礼台为止。树林般的红旗，在海洋般的人头上飘扬着。在红场上的人群走散之前，红日已挂中天，残留下来的一小块冬天冰雪，正在融化成为雪水。

节目的第二部分，定于下午5时开始。群众要吃点在那近乎饥荒的困难岁月里还能够得到的东西，需要用一定的时

间。即使最高度的革命热情也不能对饥饿满不在乎。然而，在大会规定开会的时间之前，红场上老早就又挤满人了。在当时那种形势不稳的情况下，个别的男女，不敢单独行动，都乐意成群结队而来以求安全。那些被推选到大会上发表演讲的国际代表，都集合在观礼台下面，等待要来主持会议的季诺维也夫等了一个多钟头之久。最后他终于来了，敷衍塞责地对他的迟到表示歉意，就登上观礼台，信口开河，发表了一大通演讲。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的革命演讲。我对那样的表演感到惊异，但在同时，对于我是否能够仿效，还很怀疑。考验立刻到来了，那是一次决定性的考验。

当季诺维也夫提到我的名字，大概是要介绍紧跟在他后面面向大会发表演讲的人，这时广场上掌声雷动，掌声又不时为呼口号的声音所打断。他退到后面，请我到 he 站的那个地方去。我是没有准备演讲的；我对在这样的场合应该说些什么才合适，心中也是不清楚的。但我并未怯场。刚好相反，在提起我的名字时响起的掌声，却神秘地给了我巨大的自信心。这次大会上没有扩音器。这种对于在讲台上作演讲具有很大价值的机器设备是无法得到的。我把声音提高到最大可能的限度。我的声音就是在场地最远的角落里也可以听见。后来人们对我恭维说，那是除托洛茨基外很少有人能够达到的一种技巧。我在讲台上开始我的初次演讲时，并没有按照俗套的虚伪调子，宣称自己代表千百万殖民地被蹂躏的人民，也没有说我带来殖民地人民要与俄国工农进行团结起来这种设想出来的口信。我作自我介绍时，说自己是一个最近才转信共产主义的人。这个人已经来到了胜利的革命国土，被吸收为它的

忠实战士之一，并从经验中学会如何把社会解放的信息带给殖民地人民。我用英语讲话，广大群众中听得懂的人很少。我的开场白获得台上少数听懂英语的人的掌声。鼓掌声机械地在全体听众中得到响应。演讲的其余部分，在十分钟之内结束，那是对我那个出发点所作的详尽阐述。译成俄语的讲话，引起了自发的鼓掌，重复了好几次。季诺维也夫照例伸出他那滑腻的手和我一握，表示祝贺。当翻译的是一个年轻的俄国犹太人，曾在英国住过多年，他表现得很聪明，很有眼力。他称赞我说出了一些新颖的东西。我看到听众作出的反应，尤其高兴。

48. 共产党人的国际集会

1920年7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几乎都已到达了莫斯科。拨给他们使用的旅馆十分拥挤。后到的只好被安置在别的地方。在芬兰、波罗的海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半岛上那些毗邻国家里，共产党是被禁止的。从那些国家来的代表，只能秘密活动。否则他们回去时就会有生命危险。凡尔赛条约根据威尔逊的被统治民族的自决原则，建立了一些新国家；在那些国家里，没有什么自由可言。那些国家的大批的革命流亡者，纷纷到苏俄来避难。他们分别同他们国内的地下组织保持联系。以前的沙皇政府一向在流亡国外的俄国革命党人当中布置暗探。那种做法也为这些

分离出去的各国政府所仿效。它们在流亡到俄国来的共产党人中间也设有暗探。因此，从那几个国家来的代表要特别小心。他们在偷越国境时，如果被识破，就要被击毙。

在这些流亡和提心吊胆的共产党人当中，我结交了许多朋友。著名的波兰女作家万达·瓦列斯卡娅就是其中之一；她后来于1941年苏联红军解放波兰时担任波兰临时政府第一任主席。她是一个杰出的妇女；那时已不很年轻了，却仍然引人注目——亭亭玉立，有一副匀称好看的身材、俊俏聪慧的脸孔，还有那开始变灰的漂亮的金黄头发。她的朋友瓦列斯基，当时是波兰共产党的领导人。但由于他曾经是罗莎·卢森堡的亲密战友，所以年青一代的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都反对他；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由一个在公开场合自称为勃兰特的才情横溢的青年所领导。在代表当中私下传说，这个波兰共产党崛起的领导人，是一个在沙皇手下担任过要职的富裕贵族的儿子。勃兰特的贵族出身，从他那吸引人的外貌和讨人喜欢的态度就表现出来了。他曾在德国的一所大学研究过数学和哲学。尽管在理论上分歧，万达和瓦列斯基还是很喜欢那个青年的。他们两人自己同样是受过高等教育和具有很高文化修养的人。然而，瓦列斯基同那个与他争夺领导权的青年比较起来，恰恰形成一个对照。年纪较大的瓦列斯基爱讽刺别人、衣冠不整，而且装出很粗俗的样子。这种讨人嫌的外表，却掩盖着一个饱经风霜而变得老成起来的聪明人。

我在从波兰和波罗的海诸国来的共产党人中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有人私下传播，说我不同意列宁那个民族主义是一种革命力量的观点。虽然人们把被统治民族的自决原则归功

于威尔逊总统，其实那个原则最先是由列宁宣布的。因此，布尔什维克政府承认了波兰和波罗的海诸国在革命后有权利从俄国分离出去。在分离出去的国家里，共产党备受镇压，白色恐怖十分猖狂。当地共产党人吃尽了苦头，他们觉得自己是被俄国同志出卖了。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重申了自决原则。列宁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能起革命作用，因而应当受到共产党人的支持。我是不同意他那种观点的。波兰的卢森堡派共产党人，常常开玩笑说，我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而列宁却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一批青年妇女被派到各国代表团担任译员。她们出身上层阶级，都曾在时髦的女子学校学习过；那些学校里传授着各种欧洲语言。她们除了应作的工作搞得令人很满意以外，大多数都长得很吸引人。尽管出身于资产阶级或贵族家庭，但她们都是热心的共产党员。要不然，她们就不会被挑选来担任那种除表面上的翻译工作以外还具有重大信任问题的任务。她们被派到外国代表的领导人那里进行侦察，为了达到那一目的，她们就要借助那些人的贪色之心（如果不是爱情），来取得他们的信任。这种令人厌恶的做法，导致了一些幸福的结合，但一般只是胡搞一阵，有的还造成了伤心的悲剧。这些妇女中有些是风流人物。她们一般都出身贵族家庭。这些资产阶级人物总是缺乏勇气和与旧我决裂的精神。对这种人来说，突然转变到共产主义是一种假象。她们乐于接受这样丢脸的职务，是希望赢得某一个外国代表的爱情后，也许可以找到逃出俄国的机会。破落贵族的末路王孙是出于激情才接受共产主义的。其中有一位爱上了勃兰特，而她却在说服自

己相信自己是以一个遵守纪律的布尔什维克党员的身份来对他进行侦探的。

“她的父亲在革命前是一个省长。他曾把他的两个女儿送进圣彼得堡的叶克特林斯基学校,在那里,贵族的女孩子有机会从陆军和海军学校的学员中找到她们未来的丈夫。她非常漂亮,可是瞧不起她本阶级妇女们所培养出来的那一套传统的优雅风韵。她那顽皮姑娘的行为,扰乱了那个学校里流行的故作正经的风气,使别的同学很有反感,并且引起老师的义愤。任何时候,任何一个贵族子弟学员和青年军官,在节日舞会上请她跳舞时,她总是故意怠慢;而那种舞会就是为了给那些女孩子在婚姻市场上一个显示她们的机会而举行的。有一次,她竟然在跳舞厅当众给了她的舞伴一个耳光,因为他说了句蠢话。他在她耳边悄悄地说,她跳得象只蝴蝶。她经常津津有味地向她的朋友们谈起这个故事,每次她总是用这样愤慨的感叹来结束:“真是想入非非!居然叫我是只蝴蝶!这个白痴!”她是个高个儿,身体很结实;就在那种时髦的学校里,她的衣着也是随随便便的。”

革命爆发时,她才十八岁。一些军官在她学校门口向群众开枪。群众回转身来,扑向那些军官,把他们闪闪发光的肩章撕掉。那种行动是由前线哗变士兵表示不服从命令开始的,这在革命初期已成为十分常见的事。罗拉从她房间的窗戶看到那种情景,就冲出去参加到人丛中去;几分钟后,她被举起抬到临时搭起的讲台上,向群众发表演讲,对那些得意洋洋地穿着可笑的军装、浮躁而轻率的傻瓜们所受的耻辱大喝其彩。她演讲时兴奋极了,但她还记得她在第一次公开演讲

中所用的那些字眼。一个贵族的女儿在大街上，实际是在街垒中，参加了造反的群众，自是非同小可的事。这件事立刻引起了当地革命委员会的注意，几乎一夜之间，罗拉成了讲台上极孚众望的人物了。

后来，在内战期间，她被派到乌克兰；德国人正在那里酝酿一场反革命的分离运动。罗拉被挑选在敌后进行特工活动。那是出生入死的冒险行动。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中最勇敢、最忠诚的党员，才敢自告奋勇地承担这项任务。罗拉从那次冒险回来时，变得比从前更加调皮、更加结实了。为了给以应得的休息，她被挑选担任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的译员。她德语和法语都讲得很流利，还能讲一点意大利语和英语。作为一个信得过的、确实经受了烈火锻炼的党员，她受命负责监视所有其他的译员；她们大部分是因为会说外国话又长得标致而被选用的。

由于我同勃兰特的友谊，我对罗拉很了解。她同这位俊美的波兰青年的爱情是短暂的，可是他们确实互相关心。每逢勃兰特表示他的感情时，她就嘲笑并规劝他：“小伙子，过几天你就要回到毕苏斯基的地狱中去。难道我会那样傻陪着你一道去？”然后，好象要证明她是一个多么坚强、冷酷无情的革命者那样，她总要加上一句：“可别相信我。你不知道有多少男人，头一天晚上还跟我同睡一床，第二天早上却发现他已死了。”我亲耳听她说过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话，这些话谁也忘不了。革命是一个严酷的女神。她把最狂热的崇拜者放到最严峻的考验中，使他锻炼成为硬心肠的人。但是罗拉并不是那么道德败坏的人。在她那刚强外表和经常外露的讥讽态度

里隐藏着由于阅历较深造成的敏感心灵。她跟勃兰特相处得很愉快；但他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就离开了，当然不能把她带走。我不知道他们俩曾否再见过面。后来我也没有再见到勃兰特。可是我和罗拉的友谊一直继续到1925年，那时她被派遣出国担任某种秘密工作。我们是亲密的朋友。我同她一起，第一次看到俄国一出歌剧——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的《伊戈尔亲王》。那一次我看得眼花缭乱，目瞪口呆，它终于消除了我反对音乐的偏见。

除了意大利代表团以外，所有重要的代表团，特别是德国和法国的代表团，都来晚了。他们终于到达以后，还要同他们秘密地进行许多谈判。争论之点是关于接受加入共产国际的著名的二十一个条件的问题。这些条件由季诺维也夫起草。提交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批准。争论的内容是，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时，第二国际由于没有统一的领导而瓦解了，由于战争所造成的危机，爱国主义压倒了国际主义。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人数众多的社会党当中的强大左翼，同情俄国革命，并且想要参加这个新成立的国际组织。但是如果凑在一起而又不服从严格的统一领导，它们可能使这个国际组织陷入困境。提出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个条件，正是为着保证不致发生此种危险。另一方面，如果那些大党不参加进来，共产国际就只能由一些小集团组成，它不能对各国工人运动发生什么影响。这是俄国人和来自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社会党领导人之间的一场斗智。

多亏巴拉巴诺娃的影响，同意大利人的分歧终于缩小到一个问题上：社会党在加入新的共产国际之前必须把以屠拉

梯为首的右翼驱逐出党。意大利代表团中由博尔迪加和本巴奇领导的共产党员坚持这一点，巴拉巴诺娃则希望取得列宁的支持，为塞拉蒂解围。因此，当德国人和俄国人相持不下，而法国社会党领导人马塞尔·加香和弗罗萨尔把他们的到达日期推迟到最后一刻的时候，轻松自在的意大利人已经忘记了他们的分歧，尽情享受俄国人尽量使客人满意的殷勤款待了。他们事先知道，这个处于被围困中的未来世界革命的总部，大概会缺乏生活上享乐的物品，因此他们随身带来了充足的东西——一盒盒通心粉、一箱箱意大利葡萄酒和许多干酪。每天晚上，在安捷里卡的房间里举行狂欢的宴会。她已经搬到代表所住的旅馆里，以便同她所敬爱的意大利人在一起。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头几年，喝烈性酒是被严厉禁止的。纵饮伏特加酒原是剥削阶级所恶意鼓励的，必须教育无产阶级摆脱那种恶习。但是，为了特殊优待客人，代表们所住的旅馆不受禁酒法的限制。意大利人不想单独享受这种特权，巴拉巴诺娃的房间对所有的代表都开放。

这对大家是一种恩惠。当局曾作出特殊安排，用可以得到的最好的食物招待代表们。黑麦面包以及鱼子酱、烧烤的禽肉，顿顿都充分供应。但在这种慷慨的款待中，也有美中不足之处。鱼子酱有臭味，肉则硬得再好的牙齿也啃不动。谁也想象不出供代表们享用所宰杀的是哪一类飞禽。从肌肉厚实、骨头粗大来判断，它们很可能是鹰或鸵鸟。比较爱国的共产党员装着津津有味地品尝那些肴馔。尽管明显地被啃不动的肉食难住了，他们还是想办法咽下那蘸鱼子酱的一片片的黑面包。鱼子酱毕竟是一种奢侈品。革命已使工人能够吃到

鱼子酱了。但是，在我初次接触这个革命的特殊战利品时，那脂肪发臭的味道使我难以下咽。从那以后，我怎么也没法迁就那种难得的奢侈品了。

在这个旅馆里，每天都有一些振奋人心的事情。有一天，由于匈牙利代表团的到达而人心大振。代表团中的贝拉·库恩、拉科西、卢卡奇、瓦尔加等人都是著名的受到迫害的革命者。在布达佩斯昙花一现的苏维埃政府垮台之后，他们被俘，监禁在维也纳。他们在监狱里住了一年之后，布尔什维克通过外交途径，用关在俄国的一批高级军官战俘进行交换，才使他们获得释放。匈牙利代表团于7月14日——攻陷巴士底狱的纪念日，抵达莫斯科。他们受到共产党人召集的国际盛会的欢迎，雅克·萨杜尔在欢迎会上领唱无套裤党之歌《卡尔曼努尔》^①。那个俊秀的青年英雄响亮的嗓子震动了全场；男女老少都跟着他一齐跳起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性舞蹈。这是8月初开幕的盛大庆典的一个适宜的序幕。

49. 盛大的庆典

对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们的招待和表示敬意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白天，招待他们到郊外他们所爱好的地方去参观游览。晚间上演歌剧、芭蕾舞和戏剧以款待外

^① 无套裤党 (sans-culotte)，法国大革命时期贵族阶级对激进的共和党人的蔑称。“卡尔曼努尔” (Carmagnole) 是法国大革命时的一种歌舞。——译者

国同志们。不但应当让他们看到新政权的各种成就，而且还应该让他们了解新政权正在怎样保存艺术作品和文物。莫斯科除了拥有国际上负有盛名的捷特拉科夫斯基美术馆外，还有很多建筑物，古典的拜占庭式和纯粹的东方式的建筑物配合得很好。直到15世纪，莫斯科还在鞑靼人统治之下。他们对莫斯科文化留下了影响的痕迹，不仅在音乐和建筑方面，甚至在社会生活方面也是如此；而纯粹的俄国文化模型——近代的和封建的，则是在莫斯科塑造的。圣彼得堡不过是开向西方的一个窗口而已。它是混合文化的中心。安娜·卡列尼娜是彼得大帝时代上流社会的人物；但是创造她的作者却是一个莫斯科人。托尔斯泰住在中世纪俄国首都附近的庄园里。

纯粹的俄国文化传统是母权制的。伏尔加河就是个女家长。斯捷潘·拉辛的英雄故事是和对伏尔加母亲的自然爱慕交织在一起的。俄罗斯人民向鞑靼的专制政治造反而受尽折磨的心灵，是通过那个故事发出呼号的。这种呼声甚至直到今天还在震荡着俄国人的心弦。布尔什维主义与其说是受到外来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鼓舞，不如说是更多地受到本国固有的反暴政传统的激发。中世纪对暴政的造反，曾把一个强盗首领当作解放者来欢呼拥护。那种文化传统必然有助于斯大林战胜他的敌手，那些敌手的思想则是由近代文明理想形成的。

外国人知道的俄国芭蕾舞，绝大部分是近代沙俄文化创造出来的。可是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名声更大。帕夫洛娃先是伺候圣彼得堡宫廷，后来也给有经验的西方观众演出。斯

坦尼斯拉夫斯基也是莫斯科人，并被公认是他那时代编剧和导演中最出色的大师。俄国芭蕾舞在被当作里姆斯基-柯尔沙科夫和波罗丁歌剧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之时，是它的全盛时期。歌剧是斯拉夫文化传统在音乐造型方面的表现。俄国歌剧的每幕戏，都是完全用人体的节奏动作来刻划它的主题的。甚至西方化了的柴可夫斯基，也不敢违背这种传统。芭蕾舞从一个完整的传奇经过提炼以后，变得非常矫揉造作，因此只能满足那些行家们的浓腻口味。

即使在国内战争最艰苦的日子里，当时莫斯科处于饥饿的边缘，又因燃料短缺，人们度着挨冻的严冬，戏院还是照常演出。那是人们整天的艰苦劳动后的唯一消遣。由于取消了货币，文艺女神的庙宇之门便不象旧政权时代那样，凡是付得起钱的人都可进入。娱乐和特权，只供那些为建设平等和自由的新秩序而辛勤工作的人享受。每个剧院的包厢和散座都分配给各机关——工会、共产党、莫斯科苏维埃、学校等等。他们也考虑到莫斯科大部分居民不属于那些机关单位这一事实，因此每个戏院都有一些票，拿到自由市场（也可以这么说）上出售。票数有限，都争着买。每天人们排成长队用惊人的高价争购那为数很少的几张戏票。

每一家戏院都留有若干座位分配给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在歌剧院和艺术剧院，原来有专为沙皇和他的宫廷保留的包厢。在新政权下面，那些特权和荣誉的座席，便分配给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了。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那些包厢便让给外国代表。但是大多数代表更喜欢到演出各种表演的露天游艺公园去。

在那些日子里，艺术剧院上演的是俄国和外国古典戏剧。切霍夫尽管肺病已进入后期，他还演出《汉姆雷特》和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他对后者作了新的表演。以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为蓝本的一种西班牙讽刺剧，也是由切霍夫主演的。在编导技巧和表演艺术方面，艺术剧院四个工作室里面进行着十分有趣的试验，那里的新的艺术家在那位大师的同意之下，而且在他的指导之下，抛弃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风格。

还有为鉴赏家举办的音乐会和深奥的室内音乐。代表们各人按照自己的兴趣欣赏多种多样的表演。这种兴趣和爱好不是民族的，而是个人的。有的英国人对里姆斯基-柯尔沙科夫歌剧的壮丽场面入了迷，有的意大利人却赞赏切霍夫对《汉姆雷特》的新表演。法国人去听贝多芬音乐会，德国人则要看各种露天表演。美国人以欣赏深奥的室内音乐来证明说他们偏爱爵士音乐完全不符合事实。

从各国来的主要代表人受到特别的尊敬。他们访问部队时，战士们授予其中的一些人以红军名誉军官的称号。部队送给他们适当的制服；在革命年代的艰苦日子里，那些制服是不讲究的。人们还没有忘记表示起义的信号之一，就是撕掉军官军装上作为特权标志的闪闪发光的肩章领章。在红军的初期，士兵和军官穿一样的军装。军官的级别是用挂在胸前的简单的红带子来表示。军官被称呼为“指挥员同志”。在他指挥下的单位愈大，红带子的数目也愈多。受到尊敬的代表对于他们所获得的荣誉感到自豪，因此都穿着不很合身的军装走来走去。到了夏天，长统靴便换上绑腿。生手不会裹得很好看，腿细的人更裹不好。没有经验的人走路时，绑腿时常

滑到脚踝，或者拖到地面上。看到那种近于丑角的动作，其他代表自然要大开玩笑了。

另外还有一种荣誉，就是授予莫斯科苏维埃名誉委员的称号。外国代表访问过的其他重要城市，也授予这种荣誉。在莫斯科那些获得此种荣誉称号的人，还发给一张名誉委员卡片。凭着这种卡片可以走到站台的前头，优先搭乘电车，在歌剧市场买戏票，也不必排长队等候。这种特殊优待便被利用来向那些无法获得机关戏票的偶然碰见的女朋友献殷勤。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开幕日期日益临近，代表们开始注意比较重要的事情了。各国代表团召开会议，为代表大会准备报告。大家对于从每一个国家的经济情况和政治局势来看革命的可能性，看法各有不同。对客观可能性的不同的估量，产生了对于革命斗争的组织方法和策略的互相冲突的意见。各代表团还忙于审议提交代表大会讨论和采用的提纲草案。

代表大会的议程在几个月以前就已经宣布了。在共产国际的最初几年中，没有通过什么决议。各项根本性的原则尚待澄清，种种理论问题尚待解决，政治行动计划尚待细心制订。采取的方法是对每一个问题准备提纲，并分发供初步讨论。参加共产国际的任何党组织或个人代表，均有对任何问题提出草案的权利。但是，各国的组织仍然分成各执己见、互相对立的集团，谁也无法采取主动。因此，主动权就留给俄国人了；在大会召开前几天，除了列宁的提纲草稿以外，没有别的提纲草案可以供代表们研究。其他的人一开始就放弃职责，这就为俄国人在精神上支配共产国际奠定了基础。随后，每一个问题的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都由俄国人讲，也就成

为大家接受的做法了。

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早就起草好并散发出去，可供代表们详细讨论。可是各个主要的欧洲代表团，对此都不感兴趣。战前社会党人忽视欧美以外的世界问题的传统，仍然非常牢固。列宁想同这种传统决裂，并组织一个把全世界都包括在内的新的国际。但是，欧洲各个新生的共产党想的都是自己国内问题，不可能具有列宁那样的远大眼光。东欧各国的代表关心本国的民族问题，但俄国革命和凡尔赛和约既然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它便成了一桩历史上和理论上的事情了。英国代表团对此颇感兴趣。然而，英国共产党组织尚未建立。英国代表团由汤姆·奎尔奇率领；他的父亲是海德门的战友。汤姆和蔼可亲，但是毫无能力。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列宁的提纲将会把常说的“白人的负担”转嫁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内工人阶级的身上。他受到了责任感的驱使，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来的代表亲密相处。（半殖民地国家这个范畴是列宁提纲中创造出来的。）但是，他同他们相处时，明显地并不自然，这倒不是他的过错。那些代表受自卑感的影响，误认他所表示的友谊，是以恩人自居。令他高兴的是，他发现至少有一个人对他的真诚善意有了正常的反应，因此我们成了朋友。我们的圈子由于把荷兰和美国的代表包括进来而扩大了。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业务性会议本准备在莫斯科过去沙皇举行加冕礼的大殿里举行。但是，以列宁的名字改名的革命摇篮必须享有光荣的地位。它被选为正式开幕的地点。这是一次盛大的庆典——现代史上一件最值得纪念的

事件。能够参与这个盛会是一种特殊的荣幸。三列专车把代表们运送到列宁城去。在车站，他们受到人数空前众多的男女人群的欢迎。这个伟大城市的全部居民几乎都出动了，他们走到大街上，排成队伍跟着代表们走向斯莫尔尼宫。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起义者就是在这个宫殿里成立他们最初的政府的。沙俄首都曾有过二百万以上的居民。战争和革命使人口大减；但在1920年8月，人口仍不少于一百万人。

在斯莫尔尼宫，代表们受到庆典的东道主列宁格勒苏维埃的盛大欢迎。在宫殿的台阶上拍了照片，列宁站在一群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中央，我凑巧站在列宁身旁。这群人里面包括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高尔基、捷尔任斯基和其他一些人。这并不是有意排列的。可是这张照片却具有历史性的重要意义。在若干年中，它曾被挂在各国共产党办公室里显著的地方。

午餐用毕，代表们走到代表大会公开举行开幕式的地方——歌剧院。开会前几小时，宽大的礼堂就已经挤满人了。这里的舞台尽管在平时上演俄国歌剧时足供五百人的合唱团使用，却装不下全体代表，因此只能挑选少数代表同俄国领导人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有两百种乐器的管弦乐队，演奏国际歌第一和弦作为先导引导他们登上主席台。全体听众肃立，全场震荡着那雄伟音乐的回声达十五分钟之久。从我所观察到的激动情绪来判断，每一个在场的人，必定觉得好象是在为解放世界被压迫者的战斗而向前进军。我不记得还有哪种音乐能够产生这样强烈的印象。

所有的发言听来都很平淡。季诺维也夫以列宁格勒苏维

埃主席的身份，首先致词。他是一个激昂慷慨的演说家。场面十分庄严，足以激起热情洋溢的演说。他无疑已尽了最大努力；但是会场的气氛已经被国际歌的音乐震奋得浓浓的，他那尖锐的声调就再也不能使听众有所感动了。音乐的高度效果引起了听众的沉思。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激动他们达到更高度的热情了。

马塞尔·加香是这次盛会的主要的表演者。他用古典的法国雄辩术，把想象力丰富的听众吹送到法国大革命的日子里。他好象从伟大的过去走了出来，欢呼一个有可能到来的更伟大的明天。列宁最后讲话。这是我第一次听他向会议演讲。他没有想用修辞或演说家的华丽辞藻来影响听众。但是他那严肃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讲话，破除了音乐的神秘魅力，使听众回到现实的世界。讲话结束时，掌声雷动，表明可以松一口气了。

50.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上的政治家和人物

代表们到列宁格勒的第二天，访问日程表排得满满的。上午，他们被带到城外十六英里一个叫做“沙皇村”的地方。那里曾经是皇室的乡村行宫，革命后改作一所儿童园。午餐后，大家到涅瓦河畔的冬宫及附近的博物馆去参观。接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集会——世界无产阶级的一些领导人向一个

群众大会作演讲。季诺维也夫主持了这个真正是人山人海的群众大会，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钟头。所有其他俄国领导人，头一天晚上已经陪列宁回莫斯科去了。在季诺维也夫讲话之后，我不得不经受作第二次公开演讲的磨难。说是磨难，确实不假，因为我再一次上台时，对于我应该讲些什么，心中完全无数。

我始终没有克服我在大庭广众中作演讲的怯场心理。即使我事前极力想好了要说的话，可是一上台，我讲的就走了样了，尽管不一定当场出丑或者是文不对题。这种在大会上即席演讲的习惯，使得人家恭维我是一个“鼓动演说家”，真是说得过分了。这种恭维我不但受之有愧，而且我也不想得到这种恭维，我讨厌这种恭维。我从来不羡慕群众鼓动家那种自己讲得忘乎所以，把听众弄得如痴如迷的伎俩。我认为演讲的人对听众应当比对自己更加了解。但是，在群众集会上，演讲者是很难预先设想到听众的要求的。因此我心里便定下一个想法。在开头第一句就把这种想法讲出来。讲演词的其余部分则是一种逻辑的推论。这与其说这是力求用修辞来打动听众，倒不如说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然而从掌声来判断，我一定是说了一些合乎时宜但是老生常谈的话。或者更可能的是，听众并没有注意听我讲，他们鼓掌只不过是条件反射罢了。这种感觉使我不安，使我不快。我希望他们能受到鼓舞，即使不能得到慰藉的话。代表们的专车将于夜间开车。我有充分时间去看一下著名的美国共产党人约翰·里德。他刚从他的家乡回来，住在列宁格勒。在莫斯科，我曾见过他的妻子路易丝·布赖恩特。她也是新闻

记者。她聪明、漂亮，是一个很有抱负的青年妇女，自然不乐意因为自己是约翰·里德的妻子而出名。她出版了一部有关俄国革命的书，以此来表明自己有权利赢得一些名气。不妨这样推测，她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人格，才不到列宁格勒来同她的丈夫相会。由于个人的原因，她丢不下她在莫斯科的新闻业务。

几天前，已经是午夜了，我从卡拉汗的办公室走出来，在新闻局局长的接待室里碰见路易丝·布赖恩特。象所有其他外国记者必须做的那样，她把电讯稿送到新闻局去审查。那是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们步行回到旅馆。她对新闻局的专横武断十分恼火。就在那天晚上，她的报道稿被删得面目全非；她申请到前线去访问托洛茨基，也遭到了拒绝。晚凉天气使她的心头乱火平息下来；她透露说，由于一些十分重要的原因，约翰已将横贯美国的演讲旅行取消，以便赶回俄国来。她敦促我到列宁格勒去看他；他将呆在列宁格勒，以便同季诺维也夫面商事宜。我会喜欢约翰的；哦，简直会爱上他；谁都这样，男人也不例外。但她并不忌妒，一点也不忌妒。她打算赶到列宁格勒去伴着他，以便拦阻那些热情而冒失的女人。

我发现里德独自一人在他的旅馆房间里。他把我当作老朋友一样热情地欢迎。我在墨西哥的出色的革命活动，他全知道了。我比他抢先一步组织了除俄国以外的第一个共产党。他想为美国夺得那个奖品。但他并不忌妒我比他占先一着。他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回到国内以后，必须把流动工人、世界产联工人和机会主义者纠集在一起——他们都

自称是共产主义者，而且都想赶浪头。曾经把克伦斯基当偶像崇拜的家伙，一夜之间变成了布尔什维克。这就需要仔细挑选；谁也不能带领一批乌合之众跟着列宁走上起义的道路。就有那么一种在理论上好钻牛角尖的人，他们不肯走近离街垒还有数英里远的地方，却是碰到机会就暗箭伤人。

大家都知道约翰·里德是美国共产党的无庸争辩的领导人。我不晓得别人有谁能作出他所说的那样的表现。他的话中并无怨恨之意，但有无辜受害的情绪。这个闻名的美国革命家确实象一个长得太大的孩子——高个子，挺结实，有一副漂亮面孔，对人非常亲切。难怪他的妻子几天前告诉我说，人们称他为迷人的人。我已经见过路易丝了，他很高兴。她一定很生气吧，因为他没有跑去找她，尽管他是很想去的。但是他还得再在列宁格勒逗留几天，在代表大会开幕时与季诺维也夫一道来。顺便问一下，我见过弗雷恩纳没有？见过了吧。他也猜想我见过了，但没有接着往下说。他很诚恳地和我握手并用力拍着我的后背，握手拍肩，都使我感到有些疼了。就这样结束了我同一位革命的二流英雄人物的初次会见。

约翰·里德是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他的著作《震撼世界的十天》为他赢得了地位。然而，他不是一个组织者，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美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需要一个更合格的领导人。路易斯·弗雷恩纳很想得到那个地位。但是，作为约翰·里德的敌手，他成功的机会甚微；因为约翰·里德由于自己的出色的新闻业务，受到俄国人的全力支持。经验使得弗雷恩纳很灰心。他没有积极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讨论。他生性谦逊、恬淡。既然不存在我

回到墨西哥的问题，鲍罗廷和我都在物色一个可以派到那里去继续工作的人。我们认为弗雷恩纳是个优秀的人选。他也觉得必须等待他的机会。在此期间，他不回美国也是明智的。因此，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束后，弗雷恩纳便被派到墨西哥去组织和领导共产国际拉丁美洲局。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过以后，我立即动身前往中亚，于是同西方失去了联系，直到1922年年中为止。当我回到欧洲时，我打算同弗雷恩纳接触，以便了解他到墨西哥后，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我听说他已经回到美国去了，但无法弄清他的下落。他的销声匿迹是由于有人使用恶毒的方法迫害对手，这种做法严重地损伤了共产党的领导人才。

约翰·里德于1921年在俄国逝世以后，弗雷恩纳就回到美国，他以为这一来可以夺到共产党的领导权了。他上次到俄国去没有带护照；因此他不能合法地再进入美国，只能秘密地住在那里。正当他处在那样不利条件下进行工作时，他还遭到了严重的控告，说他携带共产国际拉丁美洲局的一笔巨款，擅离在墨西哥的职守而潜逃了。显然，这种恶意的传说，是由于共产党内部派系斗争而散播出来的。弗雷恩纳也犯了一个错误：他没有事前取得必须有的莫斯科的批准就离开了墨西哥。共产国际总部的官僚主义者，对他的行为很不高兴，因而轻信了对他攻讦的谎言。看来这一段经历使他很痛心，这位最聪明的最早经历过这样经验的人也许是抱恨退出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后来，他用刘易斯·科里的化名写了许多篇关于经济学的论文，这些文章证明他的智力是优秀的。我不知道他是否也为自己的道德品质作过辩白。他曾一度主编过一

个教育机关出版的高级刊物，目前他是工人慈善协会的教育部主任。

选择沙皇举行加冕礼的大殿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大会集会的场所，是有象征性意义的。它表明工人阶级已经取代了旧的统治者。这种表示在于激发俄国人以外的共产党人在他们各自的国家里燃起同样的变革热情。对于这些遭受蹂躏的民众的代表来说，这是令人陶醉的经历，他们当中许多人在他们本国整日提心吊胆备受迫害。被压迫者夺取政权，剥夺那些剥夺者，已不再是梦想的事情了。皇帝的宝座已被砸得粉碎，堆放在俯瞰莫斯科河的一块露天地上。代表大会主席团的讲台，就在空地上建造起来。宝座的金色华盖还在那里，但已用红色幕布覆盖起来。在毗连的寝宫里，御床仍旧原封未动。有些不够严肃的代表，轮流躺上去试试究竟有多么舒适。在一个较小的厅堂里，摆着点心招待客人。宫廷筵席那样难以置信的豪华排场，不再重演了。但是，那里有充足的白面包、鱼子酱、火腿、干酪和精美糕点——在那些日子里，这些东西不仅在莫斯科罕见，就是在繁荣与和平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劳动人民也是吃不到的。

第一次全体大会选出了一些委员会，分别讨论各种提纲草案，然后向大会作报告。全体大会和各个委员会会议开会时都是用德、法、英三种语言进行。用其中任何一种语言发表的演说，都译成其他两种语言。因此，代表大会几乎持续举行了三个星期之久。组织工作效率很低；一直还没有建立任何机构。许多时间被浪费了。一批批的代表在宫殿里到处闲逛；有些则在各处进行非正式的讨论；懒惰或不爱交际的人则

呆在寝室里。

在代表大会举行以前不久发表的列宁关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的小册子和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个条件，是讨论得最激昂慷慨的两个题目。德国人、意大利人和法国人最感兴趣的是后一个问题。他们之中有些人是社会党党员，这些人在加入联合组织后仍不愿放弃自主权。英国人、美国人、西班牙人，还有德国人主要关心的是列宁关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的小册子。列宁把它说成是一种“幼稚病”，因此为它辩护的代表就滔滔不绝地发表激烈言论来给代表大会助兴。英国妇女参政运动著名领袖的女儿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的发言最为惊人。代表大会开了几天之后，她才到达。她一点儿时间也不愿浪费，一出车站就径直往克里姆林宫去。她一露面，就要求发言。当时的大会主席是季诺维也夫。大概为了礼貌起见，他允许她比发言人名单上的其他人优先发言。

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三十岁出头一点，体质瘦弱，中等身材。她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却是一个最热情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因此她蔑视议会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改良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几年中，以她为代表的纯粹无产阶级主义，在英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中是很受欢迎的。西尔维亚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就是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进行辩护、反对列宁的“老朽的改良主义”来的。当她对代表们发言的时候，列宁正坐在发言人讲演台的下面，他以毫不掩饰的惊讶表情看着她作雄辩的表演。为了强调她的论点，她一再用手指头指着列宁责骂。主席摇铃要发言人注意，分配给她的时间快到了。她置之不理。季诺维也夫站起来，摇

了第三次铃。西尔维亚转过头来，气势汹汹地对他说，这里不是资产阶级议会，她爱讲多久就讲多久。列宁格勒的独裁者很恼火，但也只好垂头丧气地坐到椅子上。全场听众哄堂大笑，并鼓掌喝彩。西尔维亚真的发火了，那张瘦脸涨红了，蓬乱的头发披在肩上；她继续讲下去。但是，她显然快要歇斯底里大发作了，她作了一个勉强服从的姿势，便跌倒在讲台的台阶下面。列宁赶紧跑过去，把她扶到他旁边的一个座位上。为了打破这种紧张气氛，并转移那些愤慨的听众的注意力，列宁示意季诺维也夫，会议要继续进行。下一个发言人被邀请上台了。列宁不声不响地把那位精疲力竭的青年妇女，从会议厅旁门带到毗连的一个房间去。

又是失望，又是痛苦，西尔维亚没等到代表大会开完就离开了。后来甚至当所有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人运动的领导人——汤姆·曼、威利·加拉赫、J. T. 墨菲、杰克·特纳等人——都清醒过来的时候，她还是沒有加入共产党。例如，加拉赫本是想来嘲弄别人的，却留下来作祈祷了。他争取当选为议员；几次失败后，终于达到了目的。西尔维亚却甘心当一个实际不起作用的小派系的头头，那个派系死抱住种种失败的主义不放。到后来，她就湮没无闻了，那时还相当年轻，但已浪费了过多的精力。她是被那种同个人无关的热情的火焰烧成灰烬的。我还认识的一些同样热情的人，他们到俄国是自找失望和痛苦来的；因为他们就不懂得乌托邦永远也实现不了。

另一个风头人物是爱尔兰工人领袖吉姆·拉金。他确实是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就是在加入了共产党以后，情况仍

然沒有改变。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为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治学说作辩护，而反对列宁所提倡的布尔什维克改良主义。但是，谁也沒有认真地看待他。他是一个粗大、笨拙的家伙，嗓门很洪亮，他的膂力大于脑力。在早期的日子里，一个人如果沒有一些才智，在共产主义运动里是不会有任
何重要地位的。爱尔兰代表团里面包括吉姆·康诺利的小儿子，他因为父亲的殉难而受到另眼看待。若干年中，他是规模很小的爱尔兰共产党的领导人，但是，据说他后来变成一个坏蛋。爱尔兰代表团的第三个成员是一个精明的青年人，他经受过“黑与棕”^①的恐怖的磨难。他经历过一些令人毛发耸然的事件。在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辩论中，他作了一次出色的演讲。他坚持认为，爱尔兰地下共和军可以发展成为一种农民起义，以对抗资产阶级的新芬党^②。

51. 在殖民地问题上同列宁的分歧

被统治民族的自决权的是由威尔逊总统所倡议而由凡尔赛和约所实施的，其目的在于拆散曾经是欧洲传统的反动堡垒的奥匈帝国。其实早在1914—1918年大战以前的若干年，

① “黑与棕”(Black and Tan)，指1919—1921年间爱尔兰展开民族独立运动反抗英国政府期间，英国派去镇压的军队，其所以称为“黑与棕”，是因为大部分军队戴的是黑帽子，穿的是褐色军服。——译者

② 新芬党(Sinn Fein)，爱尔兰的资产阶级政党，1905年正式成立。现在它主张南北爱尔兰统一。——译者

列宁已将此项民主原则列入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之内，可是这件事未为人们所熟知。布尔什维克党一夺取了政权，就立即把这个原则付诸实行，承认原在沙俄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各少数民族有权从社会主义共和国分离出去。那些从沙俄帝国割裂出去的新的民族国家，从它们诞生之日开始，就一直成为俄国工农共和国经常的烦恼；这些民族国家是由工农共和国产生出来的。甚至在德国被打败之后，大批普鲁士军队仍然盘踞在新成立的波罗的海沿岸诸国，被用来作为向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德意志共和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基地。当德国波罗的海集团军土崩瓦解，那些流亡将领失去了权势之时，分离出来的各国的文官政府就处于协约国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之下，变成了反苏宣传的中心。在法国的庇护下，“统一波兰”一心想要得到大国的地位，它并被利用来作为抵制布尔什维主义病毒防疫线的军事中心。

革命前，列宁坚持认为社会主义者应当支持处于俄国和奥匈帝国奴役下的少数民族的自治运动。但是那些少数民族中的社会主义者反对列宁的意见，他们的论据是，分离运动是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因而不能得到工人阶级的同情和支持。关于这个问题，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争论。波兰和波罗的海各省的党的领导成员，甚至在革命后还是不赞同列宁的意见。他们争辩说，由于承认被统治少数民族有自决权利，苏维埃政府就剥夺了他们的祖国享受伟大社会革命的利益；他们感到那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就会被遗弃给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任其随意摆布了；而民族资产阶级在协约国帮助下，已经攫取了那些分离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控

制权。经验证实了他们的担忧是有根据的；但是教条主义的列宁，是不承认这个错误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支持过匈牙利和波兰民族主义者的起义。他们的信徒必须忠于这个传统。革命以后，列宁出于机会主义和外交上的理由，他不是按教条主义、而是按一个实际政治家来行事的。为了赢得喘息的时间，苏维埃政府不得不按照盛气凌人的普鲁士军国主义者指定的内容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当时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各省都在德国占领之下。因此承认它们的分离权利，苏维埃政府并没有损失什么。不这样做就是教条主义者了。若不签订和约，就十分危险，因为和谈如果破裂，紧接着就是德国的入侵，而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甚至连抵抗几天也不可能。

列宁提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的目的，是想用旧的教条主义的道理来为那个政策辩护。在欧洲实行这种政策的一个必然结果，便是要求解放在殖民国家奴役之下的民族。在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曾经提出过这种要求。但是西欧殖民国家国内的社会主义者的心情很复杂。他们继承着 19 世纪自由主义的传统，同情附属民族要求独立的愿望；但另一方面又不能忽视殖民扩张十分有助于本国工人阶级经济状况的改善这一事实。因此，他们主张被统治的民族在帝国内部实行自治。

自从 1907 年日本社会党人片山和印度的卡马夫人出席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以来，欧洲主要帝国主义国家英、法和荷兰的社会党，一再通过决议，对殖民地人民的愿望表示同情，同时拥护逐步地和平地实行自治。英国工党领

袖，象基尔·哈迪和麦克唐纳以亲善使者的身份来到印度，弄得殖民统治者挺不愉快。在一些宗主国的议会中，也响起了要求对殖民地政府进行改良的呼声。

俄国布尔什维克谴责西欧社会党领袖以改良主义者的身份为殖民主义进行辩护的态度。列宁论帝国主义的小册子，发表于1914年大战爆发前夕，小册子坚持认为殖民扩张加强了欧洲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并且推迟了马克思所预言的资产阶级制度不可避免的崩溃。事实上，资本主义并没有按照社会主义先知者的预言把工人阶级弄得贫困化。那些很想得到客观而科学的历史学者声誉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不能不看到这个事实。这就鼓励了爱德华·伯恩斯坦的所谓“修正主义”，并导致了考茨基和希法亭拒绝接受专政的观念。甚至罗莎·卢森堡的名著《资本的积累》，在理论上也有“改良主义”的倾向。她也拒绝专政的思想，并且坚决批评列宁革命实践的纲领，特别批评把党作为职业革命家的高度集中的组织的想法。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所作的正统的辩护是这样的：修正主义者所依靠的是在帝国主义国家里出现的“工人贵族”。他坚决认为原先在马克思主义中没有预见到的这种新的反革命的社会因素，是殖民主义扩张的结果。对殖民地大众的剥削，产生了超额利润；把资本输出到劳动力极为低廉的国家，所赚到的利润比在本国高得多。这种超额利润的一部分，可以分给宗主国工人阶级中为数很少的上层分子，以取得他们对殖民主义的支持。列宁从对帝国主义的这种分析中得出结论说：殖民地人民起义成功，是推翻欧洲资本主义的一个条件。因此世界革命的策略应该把积极支持殖民国家的民族解

放运动包括进去。在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阐述了这种观点。在向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这个提纲时，他宣称社会党人的第二国际并不是真正的国际组织，因为它把亚非的被压迫大众排斥在外了。第三（共产）国际由于把促进欧洲国家以外的民族革命运动包括在它的纲领之内，将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组织——世界革命的参谋部。

在理论上说，这个提纲似乎是完美的。我也被它的外表所欺骗了。以此为基础的宣传，有可能削弱帝国主义国家中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和工会“贵族”的地位。共产国际煽动性的宣言肯定会使它在亚非两洲深得人心。但是，我对于这个在理论上似乎有理的纲领，在实践上又将如何，依然是放心不下。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将得到怎样的支持呢？这是一个方法问题。第二国际的决议，并不一定是不真诚的。但是没有实施的办法。在这方面，共产国际的地位就显然不同了。它的创立者和领导者——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大国统治者。因而它的决议得到有力的支持。那些决议能得到实施。列宁说过，俄国革命的历史性意义在于，它使得至少一个国家的资源可供推动世界革命之用。他甚至一度宣称，俄国无产阶级比其他国家先夺取政权，它也就赢得了为全世界被压迫大众的解放而牺牲它自己的特殊荣幸。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可以得到帮助，它们可以深信自己能为社会革命事业作出贡献。但是，在殖民地国家里，还没有类似的革命工具。那么，共产国际又怎样能够发展那里的民族解放运动，使其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呢？

我从列宁对我的问题的答案看来，他对各殖民地国家中各种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并不了解。在我们第一次讨论时，他坦白承认他对实际情况不了解，他采取的立场是以理论为根据的。他争辩说，帝国主义已经促使殖民地国家倒退到封建社会状态，这就妨碍了那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挫伤了当地民族资产阶级的事业心。从历史上说，民族解放运动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意义。由于社会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是由历史决定的，所以殖民地国家必须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才能进入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因此，共产主义者必须帮助在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下的殖民地解放运动，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是一种客观的革命力量。

我指出，即使在象印度那样最先进的殖民地国家里，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它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同封建的社会制度没有区别；民族主义运动的胜利并不一定就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主义运动在意识形态上是反动的。甘地扮演的什么角色，是彼此看法分歧的焦点。列宁认为，甘地作为一场群众运动的鼓动者和领导者，他是个革命者。我则坚持说，他既然是一个要复兴宗教和旧文化的人，那么在社会方面就必然是反动派，不管他在政治方面看起来是多么革命。我在回忆起自己的过去时，觉得普列汉诺夫关于俄国民粹派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著名论断，对印度的民族主义，特别对极端主义派和甘地主义派的民族主义都很适用。俄国民粹派和社会革命党人相信恐怖主义和斯拉夫民族的特殊天才。他们也攻击资本主义是西方的罪恶，它在俄国没有立足之地。他们呼吁年青一代抱着恢复古代的“米

尔”^①的目的，回到农村去。普列汉诺夫指出他们的特点是，在政治方面是革命的，但在社会方面却是反动的。列宁曾向普列汉诺夫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并因为写了一部书而首次引人注意；他在那部书里指出资本主义经济正在俄国发展，并且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革命力量，它是避免不了的。

由于我引证了普列汉诺夫的权威著作，动摇了列宁的理论上的看法。经过几次讨论之后，他建议由我去起草一个可供选择的提纲。我不愿意公开反对列宁。我们的讨论都是私下进行的。代表们窃窃私语，多半是怀着敬畏的心情，他们说，那个印度自命不凡的家伙胆敢怀疑列宁的智慧，并同这位论战大师交锋。但是，列宁的态度是异常和蔼和容忍的。起初，他对一个生手的天真似乎感到有趣。可是不久他就被我的种种论据打动了，而且不能辩驳我所引证的事实的可靠性。这也许是我一生中迄今为止的最有价值的经历了。我获得了受到一个伟大人物平等相待的非常难得的荣幸；列宁这样对待我，证明了他的伟大。他完全可以拒绝浪费他的宝贵时间，同一个小无足轻重的青年人讨论问题。那样一来，我将没有机会让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听取我的意见了。

最后，更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列宁居然提议，在一个专为研究这个问题而设立的委员会进行了一般性的讨论以后，他将提议把他的提纲和我的提纲一并提交代表大会以供采纳。于是我同意把我的批评见解和建议写成一个文件，但是我坚决主张那绝对不能作为一个供选择的提纲，而只能作为一个补充提纲提出来。列宁同意这样的意见，认为我们都正在探

^① 米尔 (Mir)，沙俄时代农村中的一种村社组织。——译者

讨一个新主张,在沒有实践经验以前,不要忙于作出最后的判断。我也表示同意,但心里却有这样的保留: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新主张。我十分相信我的看法,而列宁的虚心态度,更使我确信我是正确的。

我草拟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只打了一式两份。第二天见到列宁时,我把一份亲自交给他。他以非常浓厚的兴趣阅读了这个文件,并建议作一些字句上的修改;我欣然接受了这一意见。他显然感到满意,并且说,他作为委员会主席,准备把两份文件一起提交研究。我松了一口气。要是我自己站起来,同新信仰的祭司长的权威和智慧进行较量,那是很为难的啊。

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里的讨论也很有趣,虽然那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兴趣。显然,除了一个人(斯内夫利特)以外,所有的成员都觉得列宁所以提出我的提纲,纯粹是出于礼貌,他们会把我的文件撇在一边,不作任何讨论。但是列宁的声明却引起了轰动。他说,在同我作了长时间讨论之后,他已经对他自己的提纲产生怀疑;因此,他建议两个草案应一起研究,这样就使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尽可能做到在理论上正确无误,又实际可行。委员会的另一个委员格奥尔基·萨法罗夫显然是按照列宁的暗示,建议推选我担任委员会的副主席。我提出了反提案,并得到了列宁的支持,推选斯内夫利特担任这个荣誉的职务,书记一职则由萨法罗夫充任。

这两个人担任这些工作都很合适,也很称职。那位荷兰人是真正在东印度群岛住过的唯一的欧洲共产党人,他对那里的民族运动有第一手知识,并积极帮助发展了工人运动和

一个社会党——直到那个时候为止在殖民地世界中唯一的社会党。斯内夫利特具有独特的经验，也通晓马克思主义。他对讨论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被公认为是出席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中最出色的人物之一。萨法罗夫是教育程度很高的青年，已经算是布尔什维克党内的高级理论家了。他以土耳其斯坦代表的资格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他曾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被派到土耳其斯坦去组织本地党的机构。他笃信殖民地民族运动（特别在伊斯兰国家中）具有重要的革命意义。他在讨论中也起了出色的作用。

第三个经常发言的人是波斯代表苏丹·扎德。他除了肤色以外，都很象俄国人，不象波斯人。他在革命前就到俄国留学，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地下党组织，并住在巴库，在油田的波斯工人中进行革命鼓动工作。其人很健谈，有些学究气，以享有亚洲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荣誉而感到自豪。

在理论问题尚有待根据将来的经验得到澄清以前，委员会在讨论时就已经暴露出了列宁和我之间的一个实际分歧之点。我归纳了他支持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一般观点，并提出下列建议：为了使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社会性质在组织起来的工农压力之下实现革命化，必须组织共产党。据我看来，这是具体帮助殖民地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唯一方法。我坚持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害怕革命，将会与帝国主义妥协，以报答对他们那个阶级的一些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让步。工人阶级必须准备在紧要关头，把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权接收过来，并将其转变为革命的群众运动。我再一次引证普列汉诺夫的话，这给列宁以深刻的印象。在19世纪末叶，普列

汉诺夫曾经预言，俄国的民主运动要发展成为无产阶级运动，否则它就不会成功。

列宁把委员会讨论的情况，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作了报告，并建议同时采用那两种提纲。

52. 对欧洲发动第一次红色袭击

大会主席作了国际形势报告之后，摆在议程首位的是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荷兰代表斯内夫利特紧接着列宁起来发言。他用马林的化名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他用本国语演讲时很有力量，但是他是用德语向大会发言，他说德语也十分流利。他在委员会上用英语讲话，多数委员听得懂。在国际代表大会讲台上，他谴责他本国的资产阶级在印度尼西亚殖民地的苛政和暴行。话讲得激昂慷慨。荷兰人一般都是肚大腰圆。斯内夫利特是一个典型的荷兰人，胖得有点虚软，牛奶吃得不少，营养状况良好，面如满月，白里透红。他在台上讲着讲着就出现了西班牙或意大利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那样的愤慨情绪。

荷兰在中世纪晚期是西班牙帝国的一个省。后来它又成了近代欧洲第一个共和国的诞生地。帝国消失了，但西班牙人的某些性格特征仍然保留下来。信奉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热情的浪漫主义，与拉丁民族的易于兴奋的气质很相合。对加尔文派教徒顽固性的反抗，甚至在解放以后的荷兰还有表现。

以往的西班牙征服者，还留下另一种文化遗产。那就是犹太工匠和商人的自由主义。他们从“地地道道的天主教王国”中被驱逐出来以后，就迁居到新教的荷兰。他们在北欧传播阿拉伯人的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因此，首先在神圣罗马帝国坚如磐石的结构上打开一个缺口的就是荷兰。荷兰不仅是伊拉斯谟和以后的斯宾诺莎的故乡——两人都是以色列后裔中持异端见解的人，而且是皮埃尔·培尔那样的造反者的避难所。近代科学先驱者中就有不少是荷兰人。

这种传统所造成的文化气候，在荷兰抚育着无政府工团主义和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成长；前者在工人运动中发展，而后者则投合理性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心意。恩斯特·特勒耳奇是欧洲第一流的社会民主党理论家之一。另一方面，安东·潘尼凯克和赫尔曼·果特，则创立了具有特色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荷兰学派。这两种倾向在斯内夫利特身上都有。在理智上，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在气质上又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托洛茨基的戏剧性的个性和爱冲动的浪漫主义，与他的热情洋溢的性格是很相合的。当托洛茨基妄想组织一个对抗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时，斯内夫利特成为他的主要助手之一。到了晚年，斯内夫利特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劳工同盟的首领，那个同盟包括了荷兰的大部分有组织的工人。

参加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辩论的，再没有其他重要的欧洲代表了。列宁是第一个发言的，因此大家没有作什么补充，再说，大家对这个问题也缺乏真正的兴趣和确切的了解。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欧洲代表们急于转入议程上他们直接关心的其他项目。接着便对德国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激昂而

热烈的辩论；在后来几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中，这一问题也占重要的地位。德国革命是教条主义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如意算盘。德国革命迟迟不能成功，真是令人着急，要把这个原因说清楚，就必须找替罪羊。社会民主党当然是个罪犯。独立社会民主党——对其母体持不同意见的左翼这样称呼他们自己——的代表们，成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指责的对象。在1918—1919年危机期间，它的领导人没有以坚决的革命精神和对事业的毫不动摇的忠诚采取行动。他们是否准备承认他们的责任并在今后纠正他们的错误呢？如果不这样做，他们的党就不能被准许加入新的共产国际。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团中有老练的工会领袖、煽动宣传的老手和久经风霜而又善于演说的国会议员。国会议员克雷斯皮恩和迪特曼对德国共产党代表团领导人保罗·莱维打了一场硬仗。莱维老羞成怒，激动得象歇斯底里发作似的，在讲台上出了洋相。他当时穿一身红军军官的军装。当他在讲台上打着手势讲演的时候，他那顶有一颗红星帽徽的遮檐帽掉了下来，露出了那象炮弹头般的秃顶。裹扎得不结实的绑腿，也从他那又细又长的腿上滑到踝子骨。拉狄克当然走过去帮了他朋友的忙。可是，由于他自己过去不无瑕疵，加上他还梦想在德国搞机会主义的联合，因此只得谨慎行事。他转而依靠机智的谈言妙语，避免卷入争论漩涡。列宁不得不亲自出马，用他的杰出的富有煽动性的演讲，把他的对手一一压倒；那篇演讲有时达到雄辩术的高峰。最后，季诺维也夫火了，他要求深入虎穴走一遭。他要亲自出席独立社会民主党的特别代表大会，同拒不接受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个条件的机会主义领袖进行争

论。不久，那个代表大会在德国中部一个工业城市哈勒举行。季诺维也夫讲了两天话；可是只有少数代表投票赞成无条件加入共产国际。这少数人从他们的党分裂出来，加入了共产党。德国共产党终于成为一个大的组织。

在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上，法国社会党也分裂了，尽管它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两个代表——马塞尔·加香和弗罗萨尔，都建议接受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个条件。意大利社会党为了抗拒俄国人的发号施令，又重新团结起来了。不给参加进来的那些组织一点点独立性，这种政策的结果使得欧洲各个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成了跛子，基本上脱离了工人群众，尽管当时工人们都热烈支持并赞美俄国的革命。

除了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以外，俄国其他重要人物都没有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言，尽管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不时走了进来，有几个还参加了各个委员会的审议工作。他们的注意力正集中在国内紧迫的革命问题上。可怕的国内战争看来即将结束，但是经济情况却越来越坏了。国内大部分地区遭到内战涂炭；战时共产主义使得其余地区的农业生产下降到仅能勉强维持生存的水平。国内战争的余烬还在西伯利亚和土耳其斯坦的广大地区冒着烟，俄国的欧洲部分到处是十分严重的饥荒，它造成了大量的死亡，并进一步破坏了国民经济。

使地球上六分之一的土地从混乱的深渊中摆脱出来，是一项无比艰巨的任务，而共产党还得面对由于失掉它的两位最主要的领导人而被削弱的局面：乌里茨基被一个狂热的社会革命党人暗杀了，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任主席斯维尔德洛夫

死于肺病，那时他只有四十多岁。斯大林在遥远的伏尔加河下游被围困的察里津卧病垂危。托洛茨基的才干还没有用在解决经济重建的问题上。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在苏维埃首都的领导人有下面几位：布哈林，他还太年轻，尽管已被认为是党的理论权威；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加米涅夫，他才华并不十分出众，却是个优秀的行政人员，还参与外交工作；捷尔任斯基，最近推行的赤色恐怖的执行人，他干这事不是心甘情愿的，因此是个悲剧性的执行人；拉柯夫斯基，出生于罗马尼亚，在乌克兰的德国军队和叛乱者被打垮之后，他在那里组织并领导民政机构，因此有“乌克兰的列宁”之称。

以上那些人物以及地位低一些的人物——列赞诺夫、鲁德祖塔克、索科尔尼科夫、齐采林、萨法罗夫——偶然走进大厅，站一站坐一坐，随即象进来时那样悄悄地离开了。他们看来都很疲乏、忧愁，他们的精神被历史上任何一部分人都未担负过的沉重的责任压得振作不起来。他们是传奇式的人物，他们似乎生活在幻境之中，没有意识到在附近发生的任何事情，或者对那些事情漠不关心。虽然大家被共同的信仰团结在一起，同样地被共同的忧愁所折磨，但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个性。例如布哈林，在青春得意之中掩藏着哲学家洒落超脱的风度；他随随便便地和代表们混在一起，又玩又笑。捷尔任斯基和齐采林都很腼腆，不爱交际。加米涅夫彬彬有礼，但也表现出威风凛凛，架子十足。拉柯夫斯基虽然严肃而沉静，但待人确实友好。梁赞诺夫以权威自居，又好卖弄学问。索科尔尼科夫和鲁德祖塔克这两个人在外界不大出名，虽然在特权阶层中已有很高的地位；他们都沉默寡言。萨法罗夫在这

一群人中要算最年轻的了，他外表和行为都活象一个修道士。

议程上最后的一个项目是选举执行委员会；这个执行委员会在大会闭幕期间要经常召开会议。由于亚洲国家的共产党还没有组织起来，因此在由四十一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中，只分配给亚洲各国两个席位。大会秘书处准备的名单把我和波斯代表苏丹·扎德的名字包括在内。我谢绝接受这个席位，因为大会结束后，我很快就要离开，也许再也不回来了。按照我的建议，朝鲜的朴代表便被接纳了。

代表大会在充满热情和希望的气氛中闭幕了。当时红军在托洛茨基的英勇的领导下，已经把反革命匪帮打退了；那些匪帮在上一个冬季里，从东南两面逼近了离莫斯科不到六十英里的地方。乌克兰的分离运动，已被镇压下去了。俄国的欧洲部分差不多已全被解放了。革命就要向东推进，解放已经垮台的沙俄帝国的亚洲部分，向西则沿着以前的方向推进到革命的心脏地带。但是欧洲应放在首位。已经获得胜利的红军的大部分人马，在托洛茨基亲自指挥下，正在波兰边境待命西进，传播劳苦大众获得解放的消息。此时必须作出一个关键性的决定。波兰已经变成国际反革命的一个堡垒了。红军尽管在内战中获得胜利，可是仍然衣衫褴褛、装备很差。在向西进军的过程中，它肯定要遭到一支劲敌的攻击。福煦将军的亲信副手魏刚将军所指挥的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正在以华沙为基地，守卫着中欧的东门。托洛茨基是野战军的司令员；但是最后决定还得由列宁作出。他即将对红军发出进军的命令了。

这时，托洛茨基向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发来一份电

报，对未能参加会议表示抱歉，并建议国际代表团到前线访问，以便在一个决定性战役前夕，鼓舞革命军队的士气。托洛茨基的电报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大会随即通过决议，派遣一个国际代表团前往明斯克。我参加了这个代表团，第一次会见托洛茨基并听到了他的讲话。他的演讲技术是很高明的。这位以革命记者和写小册子的专家而闻名的人，穿着一身整洁的军装，意识到他白手起家缔造起来的军队对他的信任和崇拜。看来他完全象是一个天生的军人。这位有可能成为欧洲解放者的红色拿破仑，不用表情，不打手势，作了一个热情洋溢的演讲。托洛茨基站在讲台上，就象雕像一样巍然不动，他的演讲却打动了所有的人。

代表们轻松愉快地作出了保证，只要世界革命的大军发动正面攻击，中欧和西欧的无产阶级就立即在后方打击敌人。然后，他们便回到莫斯科，参加告别宴会。托洛茨基把他的司令部迁移到靠波兰国境更近的一个地方；局势是紧张的；但是在克里姆林宫的高墙之内却在严密保守着军事秘密。列宁通过一条直达电报线路，经常跟前线总司令联系。一天午夜，前线总司令向他报告说，他的一个急性子的野战军右翼的司令官，正在从东北面向华沙进军。魏刚将军已经命令他的军队应战，在这场战役中，双方兵力的对比十分悬殊，红军肯定要被打败。但是，这事却是祸中有福：华沙是防卫欧洲的中心，它的另一个方向却暴露出来，易受攻击。托洛茨基已经准备好了。他应该发出进军的命令吗？通过电线，列宁说出了决定性的一个字：“行”。事情已经决定了。这是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赌博。欧洲的命运处于千钧一发的关头。结果是布尔什

维克输了。法国将军魏刚经证明是一个更巧妙的拿破仑式的战术家。他让他的主要的进攻敌人兵临华沙市郊，同时把他自己的全部兵力部署在东北方面。然后轻而易举地打败了向其进攻的红军右翼，红军领导人当初担心的也正是这一点。魏刚的胜利之师迂回南下，攻击红军中央纵队的侧翼和后方。这是红色拿破仑一世的滑铁卢之役；中欧和西欧革命的希望破灭了，直到二十五年之后，红色拿破仑二世的胜利了的将军们才把它复活起来。

53. 革命转向东方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了一次正式会议，设立了一个五人的小组委员会之后便散会了。这个小组委员会被称为“小政治局”。它是共产国际的最高决策和执行机构，要经常开会的。

革命在欧洲遭受暂时挫折之后，必须向东发展。列宁宣称，欧洲并非世界的全部；伦敦和纽约可能会在恒河或长江一带遇到灾难。列宁的这番话将布尔什维克的低落情绪鼓起来了。已经覆灭的沙俄帝国的亚洲各个省份，将来仍要置于苏维埃共和国管辖之下。

这样看来，革命在毗邻的穆斯林国家中应该容易取得胜利了。那些国家受到中亚解放消息的鼓舞，将会起来反对欧洲的帝国主义。土耳其的基马尔已经树立了榜样，它肯定会

在整个穆斯林世界燃起熊熊烈火。印度的哈里发运动^①的微弱回声传到了莫斯科，鼓励了这样的见解：泛伊斯兰主义是一种革命力量，因此，应当作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个同盟军而受到欢迎和支持。我不同意这种看法；经过几天的讨论以后，列宁劝我等到获得斯大林的权威意见的教益后再下判断。红军的一支强大部队已派往察里津去解围了。斯大林尽管卧病在那里，人们期待他不久会作为国内战争最伟大的英雄之一回到莫斯科。在这期间，我到土耳其斯坦去了，直到1921年夏天才见到斯大林。

在“小政治局”的议程上，规划亚洲革命的战略占有突出的地位。我曾经谢绝过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选出的执行委员会的一个席位。但是，既然我还留在莫斯科，因此便被增选为这个具有最高权力的“小政治局”的成员。它通过了两项决议：（1）在巴库召开东方被压迫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2）在塔什干设立共产国际中央亚细亚局。

召开这个代表大会是季诺维也夫出的主意。显然，这只能达到鼓动的目的，但是单有鼓动不足以引起革命。我根据这种理由，反对那个主张。仅仅在有关国家特派代表进行审议的基础上，它不可能成为一个有资格作出行动计划的代表大会。其实，在那么仓促通知的情况下，甚至近在毗邻的各国的革命组织，也未必来得及派遣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它将成为穆斯林占压倒多数的油田工人和当地城市居民参加的一个很壮观的群众集会。为什么把它叫作代表大会呢？但是，这

^① 哈里发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印度穆斯林掀起的反英运动。它以维护土耳其君主哈里发的地位为理由，支援土耳其的反英运动。——译者

个主张很吸引人，很投合那些仍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西方代表们的好奇心。已经取代巴拉巴诺娃担任共产国际书记的拉狄克非常热心。约翰·里德的诗人气质，也被生动的想象力激发起来了。

在巴库举行盛大的群众反帝示威是一种象征性的姿态。在俄国国内战争期间，英印部队强占了这个丰产的油田。在他们被赶走以前只几个月的时候，二十二个被囚禁的共产党领导人，在里海海滩上被公开处决。这个代表大会将在一座纪念碑前举行；纪念碑是为了纪念在帝国主义暴行下牺牲的烈士建立起来的。作为象征性表示，计划中的这场表演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我所渴望的是更重大的工作——把盼望中的亚洲革命真正组织起来，那将加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地位。因此，我更重视设立共产国际中亚局的决议，那个局首先负责在土耳其斯坦和布哈拉推动革命，然后使之扩大到邻近国家，特别是印度。我心中迷恋的是自己的一套想法，坚决反对巴库代表大会的计划，我把那种大会描绘为毫无意义的宣传鼓动，恣意浪费时间、精力与物力，甚至把它叫作“季诺维也夫马戏团”。

尽管充当那场表演的主角对我是一种诱惑，但我还是拒绝参加那走向神秘的东方大门的壮观的骑马行列。对我的别扭劲，列宁宽宏大量地置之一笑；季诺维也夫为一个初露头角者竟敢同他的意志相顶撞而感到恼火；拉狄克则嘲笑我少年老成，过于认真。那样做也许不会产生什么持久的结果，但是为什么要放过在这出有声有色的表演中取乐的机会呢？这场表演一定会让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勋爵几个晚上睡不着

觉。卡拉汗本人也是一个东方人，他同情我的观点；但是齐采林试图委婉地劝说我，一连几个晚上劝到深夜都没有成功。鲍罗廷对于我直到今天还没有认识到纪律性是布尔什维克的最高品德感到非常生气。我是个急性人。我到中亚去的任务需要有一定的准备时间。那些日子里，在莫斯科办事快不了。我不打算为了到巴库去观看“季诺维也夫马戏团”而浪费更多的时间。比我自己显要而渴望参加群众行列的大有人在。不是少了我就不行嘛。让阿班尼·穆克赫尔吉以印度代表的身份去吧。他可高兴了，一路上吵吵闹闹，显得他很了不起。

索科尔尼科夫、萨法罗夫和我三个人准备组织共产国际中亚局。索科尔尼科夫当时担任一个高级军事职务：他是中亚土耳其斯坦前线红军司令官。他同时是苏维埃中央政府土耳其斯坦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的其他委员是：萨法罗夫，代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卡冈诺维奇，“契卡”（赤色恐怖机构）的彼得，负责民政；还有拉欣巴耶夫，他是土耳其斯坦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索科尔尼科夫还很年轻，可能还不到四十岁，但在党的工作上已作出非常显著的成绩。他是一个很英俊的青年，在流放期间，靠在一家巴黎时装店当橱窗设计师过活。可是他的才智又使他有资格担任地下党的机关报《真理报》的编辑，那正是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前夕的关键时刻。在国内战争期间，他由于曾经担任过一个重要的职务，而被委派指挥一支军队。如果德国的革命在1923年获得初步成功，这支军队就经由加里西亚驰援。后来，他到伦敦当了驻英大使，回国后担任人民财政委员。索科尔尼科夫的最大成就是把经过几年骇人

听闻的通货膨胀的苏维埃货币稳定了下来。当时没有黄金储备；索科尔尼科夫根据马克思的三卷《资本论》，把卢布稳定下来了。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功绩曾被说成这样的笑话：“切尔方尼兹”^①就是金钱。列宁逝世后，在党内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索科尔尼科夫支持了他从前的上司托洛茨基。由于托洛茨基的垮台，他在政治上从此就默默无闻，终于被他们的嗜血的母亲即革命搞掉了；他是许多那样不幸的儿女其中的一个。

共产国际中亚局的第二个委员格奥尔基·萨法罗夫是党内的才子。他是列宁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门徒，曾追随他的老师到国外去。他曾在法国南部靠当园丁谋生。革命爆发后，他回到国内，很快便赢得了博学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作家和卓越的新闻记者的名望。在国内战争的年代里，他作为著名的“宣传列车”的司令而周游各地，把解放的消息带到国内可以达到的最遥远的角落。列车上装备着影片、电影放映机和一部印刷机。车上还有全套的展览品。它曾召集成千上万的集会演出戏剧来招待好奇的观众，此外还出版了一种报纸。列车用好几码长的红色花彩和巨幅标语装饰起来。它在武装保卫之下向前行进，而宣传队的每一个成员也都携带武器，因为他们通过敌人战线时，常常必须战斗前进。

由于有那样的经历，萨法罗夫被认为是一个鼓动和宣传的权威，并被选进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会，他是迄今为止达到权力等级第二级的人物中的最年轻的一个。莫洛托夫当时还是一个不出名的党员，尽管他年纪比萨法罗夫大，他是那个令人敬畏的宣传列车司令的秘书。

^① 切尔方尼兹 (chervonez)，苏联 20 年代票面十卢布的纸币。——译者

1921年从中亚回来以后，萨法罗夫一度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首脑。后来，他在列宁格勒住下了，成为党的机关报的编辑。在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时，他是主要的参加者。在党内派系激烈斗争的那些年月里，他有几次投到托洛茨基一方去。斯大林胜利之后，萨法罗夫同他的上司季诺维也夫一起被开除出党。季诺维也夫表示悔改；萨法罗夫便又跟着他回到了党内。

在那个关键时刻，发生一件相当有趣的事情。1929年，共产国际当时的总书记孔辛嫩戏剧性地宣布说，由于我在德国共产党反对派的机关报上写了文章，我已把自己置于共产国际之外了。萨法罗夫与我有过多年的亲密之交。然而，显然为了表示他最近悔改的诚意，他写了一篇题为《罗易先生的末日》的文章，对我肆意进行谩骂。我也写了一篇题为《一个悔过叛徒的狂吠》的文章来反驳他。此事在形形色色的欧洲共产党人中间引起了极大的兴趣。

萨法罗夫是一个狂热者。他一度相信托洛茨基是一个反革命；不久他又深信斯大林正在背叛革命。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是热烈的，诚恳的。他狂热地下定决心要保全信仰的纯洁性和捍卫教义的完整性，到头来却断送了自己的性命；那时他还年轻，前程正大有希望。萨法罗夫是1937年清党中未列名的受害者之一。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过后不久，索科尔尼科夫和萨法罗夫匆匆返回他们在土耳其斯坦的工作岗位，那里的革命工作尚未完成。在他们离开莫斯科之前，我们召开了共产国际中亚局的首次会议。他们两人都要我当主席。我力劝索

科尔尼科夫接受这个职位，以免发生权力斗争。再则，我还要在莫斯科逗留一段时间。我到阿富汗担任苏俄大使的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关于帮助印度革命运动的问题，还没有想出具体办法来。我无意在没有获得充足的军备——进行革命的物资——以前便离开莫斯科。我在远东的一次类似的企图就曾遭到失败。那时德国人欺骗了我们。这一次我希望能取得成功。俄国布尔什维克是可靠的同盟者。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兴高采烈的日子过后，有一段松劲的时期。对资本主义欧洲首次进攻的失败，产生了一种消沉气氛。我必需耐下心来。这期间，报纸上大事渲染了在巴库的“季诺维也夫马戏团”的报道，以维持群众的热情和对未来的世界革命的信心。库丘汗在里海沿岸的一个波斯港口恩济利^①建立了一个革命政府；英军中一批在卡拉森开小差的印度士兵到达巴库时，也被当作代表大会的代表受到欢迎。由于波斯共产党人苏丹·扎德的动议，巴库代表大会鼓掌通过了一项决议，向在亚洲首次举起革命红旗的库丘汗致敬。列宁事后告诫说，“不要把民族主义涂成红色”，就是针对使季诺维也夫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愚蠢热情说的。

受巴库代表大会那个决议的鼓舞，一些充满热情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次要人物，确曾企图以那个土匪头子库丘汗为首，在里海沿岸一条狭长的波斯领土上，建立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不但把一些武器连同俄国军事教官和政治顾问一起送过去，而且还计划派遣一支红军在恩济利港口登陆。俄国的几艘炮舰确曾在该港出现，来吓唬一下那个被涂成红色的土匪

^① 恩济利 (Enzeli)，即现在的巴列维港。——译者

头子。齐采林及时地过问了这个问题，才挽回了当时的局势。那一支红军渡过里海，被转派到克拉斯诺伏斯克，守卫那条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里海以东的铁路去了；那条铁路曾被以马什哈德为基地的英印军队切断过几次。

把革命从俄国南疆倾注出去，这种可能性是泛伊斯兰主义两个垮台了的英雄所殷切期待的。他们会到莫斯科寻求庇护和帮助，以便恢复他们的地位。他们被安置在“糖业大王王宫”的两边侧厅里，我也作为国宾住在那里，尽管不如他们烜赫，却受到更大的信任。

54. 泛伊斯兰主义的垮了台的英雄们

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之后，那三个从1908年起就统治这个国家的人，逃到德国避难去了。可是那个同盟大国自己也已垮台，不能再对土耳其的流亡领袖提供任何保护了。共产主义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吸引力；不过俄国革命这件坏事也可能是一件好事。沙俄帝国的土崩瓦解，在泛伊斯兰主义垮了台的英雄们面前展现了一种新幻想：他们梦想有可能在中亚建立一个新的穆斯林国家。他们怀着重振他们在伊斯兰世界的声威或许有重新恢复政治权力的一线希望，再说呢，如今也只有苏维埃共和国愿意并能够为这些胆战心惊的流亡者提供庇护所了。

在青年土耳其党人早年的政治生涯中，巴黎就是他们的麦加。他们到法国去接受军事训练，也接受普通教育。他们都说法语，把它当作第二国语；一举一动也象文雅的巴黎人。后来法国跟土耳其的世仇俄国和英国结盟，他们就转向德国。德国的军事力量使统治老朽的土耳其帝国末期的三执政得到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保护者是帝制的德国，而不是法兰西共和国了。柏林—巴格达铁路把土耳其变成一座桥梁，德国军队通过它能够在几天之内就到达英属印度帝国的边疆。就这样，他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战略上成了德国的卫星国，青年土耳其党人也就失去了法国的同情。他们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不但触怒了美国的舆论，而且也疏远了整个信奉基督教的世界。所以，土耳其三执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本国出走时，已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了。

他们在德国有朋友和同情者；但是德国对于他们的垮了台的被保护人不能提供什么保护，除了在对反革命有利的混乱状态时保护一下以外。这些流亡的土耳其领袖，如果在德国过退隐生活，也许不会受到胜利的协约国的干扰。他们当中资历最深又最狡黠的泰拉特帕夏^①，便假装息影政坛，以待对德国有利的时机。他相信德国军事力量很快就能东山再起，到那时就会为他提供机会，恢复他在国内和在国际上的地位。

恩维尔帕夏野心最大，心里也最为焦急。那时他还很年轻，不象他的年长的同僚那样明智。此外，他还总担心自己

^① 帕夏 (Pasha) 是土耳其等国的高级官衔，下面的恩维尔帕夏、泰拉特帕夏、詹玛尔帕夏、基马尔帕夏中的帕夏，也都是官名。——译者

被暗杀或被英国人俘虏。贪得无厌的野心使得他想入非非，认为沙俄帝国的瓦解会产生一种可能性。但是，要想得到实现他的梦想的机会，他还必须玩弄外交手腕。他跟俄国人接近，建议在煽动中东穆斯林民族反叛英国帝国主义的计划中进行合作。他通过与在印度—阿富汗边界一带居住的穆斯林部族合作，将与印度、特别同印度的哈里发运动建立联系。他有把握争取到阿富汗国王阿曼纽拉的支持，并且不要多久，就可以在喀布尔建立他的司令部。为了响应他的号召，在以西北部边疆为基地的部族的军事行动的支援之下，印度将爆发一次大规模的起义，立刻把英国统治者驱逐出去。

俄国人看来是受了恩维尔帕夏外交手腕的欺骗。除了上层个别人之外，他们把印度的情况和革命的可能性看得太简单了。有许多人竟然相信印度是一个穆斯林国家。不管怎么说吧，土耳其三执政被邀请前往莫斯科了。泰拉特帕夏已经打定了主意；他没有去。詹玛尔帕夏却陪着他的年纪较小的同僚一起到了莫斯科。他说话不多，禀性谨慎。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军人，大概不象泰拉特那样期望着德国势力早日东山再起。另一方面，他有更多的理由，象恩维尔帕夏那样害怕被人暗杀；因为对屠杀亚美尼亚人他个人是要负责的。不过，他比较沉默，不肯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到莫斯科去，目的大概在于侦察，想观光一下，并亲身实际地判断到底有多大可能性。

他们到莫斯科来旅行，引起了怀疑。他们秘密地乘坐一架德国军用飞机。仍在拒不服从战胜国遣散的德国军队，对这两个土耳其领袖的冒险行动显然很感兴趣。在到达苏维埃

首都时，他们受到明显的冷遇；被安置在普通的地方，无人理会。为了做出以国宾对待他们的样子，这两个受到怀疑的客人被招待住在副外交人民委员居住的院落里。在莫斯科河边面对克里姆林宫的“糖业大王王宫”，宽阔的前院的两侧，有两座平行的侧厅。这两座侧厅原先是供办公用的。两位帕夏被安置在这简朴的两层楼房里，每个人和他的随员各住一座；他们的随员很不少呢。

他们很少出门，我注意到甚至这两部分人之间都互不往来。夏季里白天热得很，在那北方漫长的暮色苍茫时候，那些自成一统的宾客长时间地坐在各自的阳台上，俯瞰着宫殿院墙的大铁栅门。我从所住的中央主楼里挂着厚丝绒窗帘的窗户后面，细心地观察他们。恩维尔帕夏始终穿一身考究的军装，绷着脸，好象很不高兴的样子。他很少同一直侍候他的随员们交谈。詹玛尔帕夏身材矮胖，五十来岁，显得稳重，也更沉着一些。他穿一身便衣，相当愉快地在同他的随从人员聊天。这两个人尽管在性情上明显有所不同，但都很寂寞无聊，都意识到被人冷落了。人们对这两个已经垮台的大人物不能不抱有同情之心。鲍罗廷的冷嘲热讽使这种悲惨景象更添上了幽默色彩。

那些贵宾们认为自己是一种外交使团，正等待着人民外交委员的正式招待呢。在那种仪式举行以前，他们是不愿意在苏维埃首都的社会正式露面的。他们仍然生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因此，他们避免与别人往来，直到他们有把握认为公众承认他们的地位时才能出去。这种状况每推迟一天，都肯定会挫伤他们的感情。每天晚上，他们坐在各自的栖息

之所，眼看着卡拉汗出去理也不理他们。这不能怪卡拉汗；他很腼腆，但他这次明显的失礼是由于客人曾经表示，他们的地位和尊严要求齐采林以礼接待这样一个事实造成的。齐采林还不想立即不必要地使寇松勋爵动火。卡拉汗不愿意受人责骂，只好不理他的客人。鲍罗廷说，两个帕夏每一次看到卡拉汗匆匆忙忙坐上轿车不理他们时，都馋得直舐嘴唇。要是卡拉汗在他家乡被抓到，他们会把他杀死。卡拉汗是一个亚美尼亚人。

这种局面尴尬极了，需要有人打破坚冰。我对挨骂是有准备的，怕的是得罪人。我不能同时拜访两个人。先去访问哪一个好呢？詹玛尔帕夏年纪比较大一些，从远处观察，我还是喜欢他这个人的。鲍罗廷则认为，那个年纪大的看来通情达理一些，所以我应该去减轻一下恩维尔帕夏的受到伤害的虚荣心。他毕竟是一个典型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并被公认为伊斯兰主义的领袖。我不喜欢这种看法，但为了促进革命事业，便同意去搞搞外交。我也许要到一个东方国王的朝廷去当大使呢。

第二天，我拜访了恩维尔帕夏，当然事先是打了招呼的。鲍罗廷陪伴着我。我们受到东方式礼貌的接待，接着是一个很阔气的茶会，虽然举行得不是时候。这位闻名的土耳其领袖年纪不大，很可能不到五十岁。他是中等以上的身材，有些肥胖，但却不失为一个美男子。他穿一套紧身军装，讲一口漂亮的法语。他来莫斯科只是作短暂访问，还得回德国去。他不想抛弃他不幸的祖国的伟大盟国，他的余生将致力于维护两个国家的荣誉。要不是为了这种道义上的义务，他早已离

开战场，以闭门读书度过余生。

他摆着巴黎绅士的派头和姿势谈话时，他所戴的几只戒指上镶嵌着的大钻石闪烁发光。他那滔滔不绝的、有礼貌的沙龙谈话，因不时插入一些夸张说法而更加生动，使我无法转入正题。他显然不想同一个没有官方身份的陌生人谈正经问题。鲍罗廷扮演一个一言不发的旁观者的角色，可是我能看出，他对后来被他形容为喜剧式歌剧的这出戏感到十分好笑。我们走下阶梯时，他第一句话就问我，可曾注意到那位英雄穿着一件妇女紧身胸衣。当我对这个奇怪问题表示惊讶时，他说我对外国情况太无知了。

我们访问时并没有提起另一位帕夏的名字。但是第二天早晨，我却碰到一件有趣的意外事。年纪较大的那位帕夏，亲自来邀请我于当天下午跟他和一些朋友一起喝茶。我高兴地接受了邀约，那倒是一个无比优雅的茶会。詹玛尔帕夏没有养成他年轻同僚那样架子十足。他平易近人，举止文雅，这很难使人相信，他是要对屠杀亚美尼亚人负责的人。他并没有否认那个指责，只是辩解说，在一些互相敌视的居民进行一种军事行动时有这样的急迫的政治需要，这是情有可原的。话说得很坦率，起了释疑的作用。尽管如此，那个微妙的问题一直等到我们的关系搞得十分友好和熟悉以后才提出来。

但是，在第一次会谈时，他就谈到了工作。用过茶后，他让他的随员离开，随即单刀直入地谈到正题。我是受到俄国领导人的信任的。那些俄国领导人对象他那样的人，到底怎样看法？他们会信任他吗？我注意到他是用第一人称单数说话的，明显地是要把他自己同住在另一侧楼房里的那一帮傲慢

的人区别开来。我答应去弄清楚；可是他要做什么呢？他要为他的国家效劳。我得到提出那个关键性问题的开口机会了。他是否准备与基马尔帕夏携手呢？基马尔帕夏正在接受俄国人的援助。他的态度严肃起来了。这是一个困难的、微妙的问题，他需要考虑的时间。在这期间，如果齐采林答应正式接见他和他的同僚，事情就好办了。

土耳其新领袖同那三个旧统治者的关系并不融洽。那三个旧统治者败逃之时，基马尔帕夏撤退到安纳托利亚的要塞里，去组织武装，抵抗胜利了的协约国。在这种大胆的冒险行动取得了显著成功之后，他当然不会承认逃亡的旧统治者的权力了。其实，基马尔的起义本质上是反对青年土耳其党人统治下的旧制度的。它既不是一种泛伊斯兰主义，也不是一种泛都兰主义运动^①。那个起义不仅废除了土耳其的君主制度，而且也取消了伊斯兰的哈里发制度。青年土耳其党是泛伊斯兰主义的保护者。他们是衰朽的土耳其帝国完整的捍卫者，同时又是泛都兰主义者。除非他们同他们自己的过去和传统决裂，他们是不会对基马尔运动的激进民族主义纲领表示同情的。为了积极参加这个运动，他们必须忘记基马尔帕夏从前曾是他们的下属，而且为了使他们自己跟得上这种新局面，还必须接受他的领导。

人们很难期望恩维尔帕夏那样怀有极大野心而又顽固得令人难以容忍的人，会为了爱国主义而放弃他那宝贵的威望。可是和詹玛尔帕夏初次会见，却给人一个良好的印象，也许可

^① 泛都兰主义运动 (Pan-Turanian movement), 土耳其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沙文主义, 宣扬土耳其应当统治中亚说都兰语的人。——译者

以说服他采取实事求是的行动。俄国人已经明确保证支持基马尔运动了。要使他们转而赞助垮了台的泛伊斯兰主义英雄们，那是不可能的。几天以后，在接见当中，齐采林讲明了这一点。恩维尔帕夏听了很不高兴，他暗示说他想回德国去。我知道得十分清楚，这种威胁一点用也没有；即使他真的想走，也走不了。我让他去自讨苦吃，而把我的劝说的精力集中放在年纪较大、也更通情达理的那个人身上。我的努力获得了成功。詹玛尔帕夏同意立刻动身前往安纳托利亚，无条件地把他的军事才能和经验置于新的总司令基马尔帕夏的支配之下。这是一种很有度量的姿态，詹玛尔帕夏赢得了俄国人对他的敬重。他不象他那年轻的同僚，他并没有什么狂妄的计划去满足炽烈的野心。他必须在下列两条道路之中进行选择：或是无限期地流亡在外，埋没一生，同时还要为怕被人暗杀而心神不安；或是回到故乡，光荣地为祖国服务。他作出了明智的选择。

从高加索到达安纳托利亚，他必须通过一个无人地带。在那里，俄国人不能够为他提供任何有效的保护。因此，他的行程计划必须严格保密，特别不能让恩维尔帕夏和他的随从知道。我们所以要采取这样的非常防范措施，是由于詹玛尔帕夏亲自秘密地向我提出了这个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举行任何仪式的欢送会了。我邀请他吃茶，鲍罗廷也参加了。他将在当天晚上秘密离开莫斯科，对外则说他因感冒卧病在床，以掩蔽他的行踪。

用茶以后，他请我们抽高级土耳其香烟。我划起一根火柴递给他们。轮到我自己点烟的时候，那位高贵、肥胖的绅士

激动起来，俯身到桌子这一边，赶忙把火柴吹灭了。一根火柴不能点三支香烟嘛——第三个人要倒霉的！他不允许任何灾难落到他的新朋友身上。三人当中有两个人不信这一点，觉得好笑。第三个人对这种迷信却十分认真。他曾亲眼看见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两星期以后，在我去土耳其斯坦的前一天，“契卡”接到它的边界组织的一份秘密报告：在高加索与土耳其之间无人地带的某处，詹玛尔帕夏被一个亚美尼亚人击毙了。不是出于嘲讽，而是出于悲伤，我忆起了他满心要把我从灾难中拯救出来的情景。

不久，从德国传来了一个消息：泰拉特帕夏在巴伐利亚的一个游泳场里，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也是亚美尼亚人复仇行动的一个牺牲者。

55. 泛都兰主义的策略

恩维尔帕夏还要在莫斯科呆下去，这确实成了个难题。对于这个人，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因为他不象他的年长的同僚，他既没有得到人们的信任，也不受人尊重。他要回德国，是得不到同意的。如果他得到开展反对苏维埃政府宣传的自由，他几乎肯定是会干起来的；而他的主张在穆斯林世界中也许还能起作用呢。不过即使准许他回德国，他也不大想走。他不可能指望在别的地方得到更大的机会。德国的共和政府

看来已经站住脚了。非法的军事组织重新夺取政权的最后企图已被粉碎了。这个流亡在外的土耳其首领在德国一无盟友，二无官方保护，必将陷入困境，随时都有遭到报复的危险；这种报复不久便把他的几个警惕性不高的同僚置于死地了。他在绝望之余，与阿富汗驻莫斯科大使联系上了，他们经常进行秘密会谈。那是违反政治避难惯例的行动。但这个泛伊斯兰主义的首领尽管倒了台，却仍然处于特权地位。因此，俄国人不敢惹他，怕激起穆斯林世界的情绪。这种局面使我想起了那句关于蛇捕鼠的孟加拉俗话：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当时，我经常与齐采林和卡拉汗会晤，商讨我去喀布尔的计划。圆满地解决恩维尔帕夏的问题，显然对实现这个计划关系极大。这样一点点小事又不值得找列宁。我也还没有听到斯大林的意见。这个问题又不可能列入共产国际“小政治局”的议程。于是齐采林开玩笑地要求我在那场东方外交实验中试试我的才智。我同意采取扳角擒牛的办法。

一天午夜以后，恩维尔帕夏应邀与齐采林会见。他对于我也参加这次接见，显然感到惊讶；但又装作对我这个不速之客毫不在乎的样子。齐采林对于这种棘手的场面掌握得十分自如。他慢条斯理地向客人宣布：这次接见为的是向他介绍罗易同志；罗易同志不久以后可能前往喀布尔担任苏维埃政府的大使。恩维尔帕夏起初显然大吃一惊，但随即就镇定下来，称赞齐采林挑的这个优秀人选，并且说，那将给予寇松勋爵一记响亮耳光。可是齐采林并不理会客人的侠义精神，又告诉他：既然他也想到喀布尔去，可以和我谈谈他的打算。

这位自命不凡的帕夏象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他竟然被介

绍给这样一个人，真是命运的嘲弄——此人在这个国家里无权无势，不能满足他那个野心的要求。那位贵族出身的布尔什维克外交家机灵极了，一眼就看出了那位失望的客人的心情，便不动声色地消除了他对我那个职位所产生的疑虑。当然，我是否将以大使身份前往喀布尔还不能肯定，但那是次要的。我即将动身到塔什干去指导一些旨在推动亚洲各国反抗英帝国主义的活动，并将得到一切可能的帮助，以保证取得成功。将军阁下(齐采林讲的是法语)也怀着同样的目的想到中亚去一趟，因此还是把自己的打算跟罗易同志商量一下为好。这时，卡拉汗走了进来，把几份文件放在他上司的桌上。齐采林站起身来，暗示接见该结束了。我走过去对那位左右为难的帕夏说，我们住在同一座房子里，经常见面的机会还很多。他对我的态度改变了：不象先前那样冷淡了，也不摆架子了。临别握手时有了热情。齐采林彬彬有礼地把贵宾送出室外，然后对我说，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下一步就看我怎么对付那位先生了。

第二天早晨，恩维尔帕夏给我送来一份请柬，邀我赴宴。这一次是一个愉快的主人用盛宴来招待一位相当冷淡的客人。我在两个星期前与他见面时，他是盛气凌人，这一回丝毫不假向我大拍马屁了。他感到他的莫斯科之行终于有了具体成果，心里很是高兴。他一直在焦急地等待时机返回战场呢。“战场在哪儿？”我大胆地问他。他立即说出了一个苦心制订出来的计划。詹玛尔帕夏已到安纳托利亚去了，他听了很高兴。那个决定很明智呀。不过，不该让基马尔帕夏处于同英帝国主义孤军作战的境地；必须袭击敌人后方，以助他一臂之

力。印度是个关键地区。说着，恩维尔帕夏往椅子上一靠；他那张依然清秀但已开始发胖的脸孔堆满了洋洋自得的笑容。他期待着一位印度爱国者对他的计划作出热情的反应。我已经掌握了这个受我监护的人的脾气了。我装出一副不很合适的高傲神气，使他加深印象。阿富汗国王阿曼纽拉的态度怎样？他愿与我们结盟吗？我没有想到这样一个老练的政治阴谋家竟然一下子就进入了圈套。他毫不犹疑地摊了牌。他一直在和阿富汗大使商讨这个问题，而且对于阿曼纽拉国王的赞助感到满意。只要在物质上给予阿曼纽拉国王大量的资助，那位国王就会同意把阿富汗用作反抗英属印度的行动基地。然而，孤注一掷是个下策。一方面要把援助阿曼纽拉国王作为一种牵制性的行动，同时，还必须在东土耳其斯坦建立一个强大的基地，以便从那里对印度直接出击。俄国切不可公开插手那个从两路向印度进攻的宏伟战略计划。亚洲的解放是亚洲人自己的事。要是俄国人直接参与那项计划，英国就会开动可怕的宣传机器，挑动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情绪，反对不信仰宗教的布尔什维克。基于上述考虑，恩维尔帕夏制订了一项计划，要在东土耳其斯坦建立一个穆斯林国家，表面上对苏俄持敌对态度。在这个烟幕的掩护之下，他就可以在俄国的秘密支持下，立即建立起一个主要的活动基地，从几个方面来解放亚洲。

我听着他能言善辩地向我说明他的宏伟计划，心情是复杂的。这个计划听起来似乎有理，却激起了我的回忆。只不过几年以前，我也曾有过类似的想法，不过动机不同。我是出自爱国的动机，而这个逃亡的土耳其首领却显然怀有个人野

心和贪欲，虽然泛伊斯兰主义的理想也许会使他的个人动机变得高尚些。我用不着重新考虑，就会断然拒绝这种建立新穆斯林国的主意。这个计划在战略上的可能性非常渺茫。在政治上，它必然是危险的，实际上就意味着危险。这个计划的真实意图是很明白的，无非是想在刚刚垮台的土耳其帝国缔造者的老家，建立起一个更大的土耳其帝国的核心。在奥斯曼帝国崩溃之后六百年，恩维尔帕夏竟想重新扮演奥斯曼的角色。他寄希望于那些居住在中亚广阔土地上的突厥-蒙古人，那些人居住的地区直达里海东岸。他期望那些人会集结在他复兴泛都兰主义的旗帜下，这样他就可以从已经崩溃的沙皇帝国的领土中，为自己（也许还为自己的后代）瓜分出一个王国来。他为了实现这一野心而公然求助于俄国，而那又很明显是一个背叛的计划；叛徒是不可能成为亚洲的救星的。

至于以阿富汗为行动基地，推动印度革命活动的计划，倒有些成功的希望。大战期间，俄国人曾帮助阿曼纽拉国王摆脱英国的影响。一旦英国人腾出手来，他们很可能力图恢复自己的地位。万一出现那种情况，阿曼纽拉国王一定要依赖俄国人给予更大的援助；这一点俄国人已经答应过了。因此，与那个自诩为土耳其新王国的缔造者相比，这位国王倒是个更可靠的盟友。前者一直在玩弄阴谋诡计，显然是要把阿曼纽拉国王拉过去，支持他的不可靠的计划。然而，要抵消他的鬼把戏并不难。恩维尔帕夏无法向阿富汗国王提供任何具体利益，而俄国人已经给予实际援助，并且答应继续支援。阿富汗国王不是突厥-蒙古人，他不大可能受搞复兴活动的泛都兰主义的支配。他也不是个狂热的穆斯林。他在位的时间虽

不长，却在治理国家方面表现出精明的才干。他是能够看出恩维尔帕夏的野心会危及他的地位的。

因此，我同这个危险的土耳其人打外交交道时，应力争拖延他在东土耳其斯坦建立穆斯林国的计划，另一方面又要毫无保留地采纳他关于利用阿富汗的建议，以免引起他的怀疑。当时我必须当机立断，立刻作出这个初步决定。我说，大的计划必须提交上级审查，特别要提请军事专家研究。对此，恩维尔帕夏不得不表示同意。这时，我还要进行另一个计划；我十分乐意能同这么一位伟大的军人和杰出的政治家进行合作。我这一着果然击中要害。我的对手在这场外交游戏中，的确舒坦极了。他认为自己已经取得第一回合的胜利了。小人总是被捧垮了的。

我把谈话的情况向齐采林作了汇报，卡拉汗也在场。他们都认为我干得不错。但下一步棋怎么走？为什么不让恩维尔帕夏到当时正处于混乱之中的东土耳其斯坦去呢？“契卡”可以监视他。用这样的策略，就可以使他远离阿富汗。假如他到喀布尔去，而阿曼纽拉国王又不按他的背信弃义的计划行事，他就必然要玩弄阴谋，反对国王。要是他建立新的穆斯林国家的企图不能得逞，他先从阿富汗王国下手是有好处的。那样，他就很有可能网罗那些狂热的毛拉^①与他合作，阴谋推翻那位现代化的国王；他竟然允许王后不戴面纱就在大庭广众之中露面。

在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形成这些想法以后，我们一致认为，在沒有请示列宁以前，不能作出任何决定。无论如何，派我到

^①毛拉 (Mullah)，对伊斯兰教学者的一种尊称。——译者

中亚甚至更远的地方去，必须经过布尔什维克党政治局和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批准。不管对恩维尔帕夏问题最后作出什么样的决定，那个计划都会符合解放亚洲的总战略。要是他被迫回欧洲去，也许要激起亚洲人的情绪。那些狂热地崇拜他的人会指责苏维埃政府竟把这位最伟大的现代亚洲之子交给英帝国主义惩罚，或者交给亚美尼亚暗杀者，听任他们进行血腥的报复。另一方面，要是让他无限期地呆在莫斯科等候，那也令人够为难的。卡拉汗很厌烦他院子里那些不受欢迎的客人。那伙人肯定是在搞黑市买卖，他们通过阿富汗大使馆同德国进行秘密交易。这种犯罪行为，在当时是要判处死刑的。当然，这样的事交给彼得处理，他也会很乐意。假若恩维尔帕夏就这样从莫斯科失踪了，很可能会引起国际公愤。齐采林不会容许出现这种糟糕的局面的。还是让这个碍手碍脚的客人到遥远的中亚去吧；他自己也很迫切地希望到那儿去嘛。在那里，他应当受到监视，虽然绝不会受到一点干扰。在表面上，还应给他以贵宾的礼遇与特权；但是关于他那个野心勃勃的计划的物质援助，只能停留在口头的允诺上。

在下次见他以前，我必须和列宁商议一下。齐采林将把情况向最高党政当局汇报。

两三天以后，我应邀到阿富汗大使馆参加一次宴会。恩维尔帕夏是主宾。举行这次宴会是为了欢迎一位新大使到任；他所接替的前任大使已调往柏林。这两位大使都是将军，新任大使是国王的叔父或堂兄。可是怪得很，这次宴会竟没有俄国外交部官员参加。恩维尔帕夏精通外交宴会的惯例，他晓得俄国外交部的人没来参加宴会是意味深长的，任何一

个局外人都会有所觉察。而我正好是唯一的局外人。他把我拉到一旁，偷偷告诉我说，这次宴会有意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为的是使有共同利益的人便于畅所欲言，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我感谢他对我的尊重和信任，但内心却极想知道宴会主人究竟打的是什么主意。显然，恩维尔帕夏和他们是一伙的。

这次宴会丰盛得很，道道地地的东方宴席。他们告诉我，宴会上的东西多半是直接由喀布尔运来的。当时在俄国能弄到的食品可说都叫人吃不下去。阿富汗大使和使馆人员毕竟是贵族出身，有的人还是皇家血统。为了同新的俄国政府保持友好关系，他们必须在这个国家继续呆下去，忍受生活上的种种不便。不过，要是他们愿意自己花钱，享受一下自己过惯的、由于他的血统而有权享受的那种舒适奢侈的生活，那对任何人也不会有什么害处。我默默地倾听着这种论述，觉得虽然很幼稚，但倒也满有趣味。恩维尔帕夏插嘴开玩笑说：“罗易同志已经是个布尔什维克了，可是本性难移呀。……哈哈，哈哈！”这话引得哄堂大笑。我本想回敬几句；不过我也不必公开撒谎嘛。于是我说：是啊，不管我的政治信仰如何，我正在追求我的理想，这就是解放我自己的国家，也解放其他受外国统治的民族。我非常感谢在座各位阁下的合作，感谢阿曼纽拉国王陛下的支持，感谢勇敢、热爱自由的阿富汗人民的国家对我的殷勤接待。我这一着又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我的矫揉造作的演说，使我在非常为难的情况下，既没有撒谎，又迎合了那样一种偏见，即亚洲人决不会同白种人真诚相处，不管他们是帝国主义者还是布尔什维克。

接着而来的坦白而亲密交换意见的结果是：恩维尔帕夏立即动身前往塔什干去参加一次秘密会议，我则必须利用自己对俄国人的影响，使他此行不至于引起任何猜疑。这又是一个幼稚的想法。我同意尽我的本分去作。

第二天，我见到了列宁。他有点不放心，但认为勉强行事也不好。就让那家伙走吧——让他产生错觉，误认为他的主人已经上当了。索科尔尼科夫和萨法罗夫已经到塔什干去了。我必须赶快去同他们会面。我们碰到一起，就能够掌握这个局面了。

我告诉恩维尔帕夏：我已经同列宁讨论过他的计划，列宁对勇敢的精神从来都是十分赞赏的。恩维尔帕夏听了很高兴。于是，那位新的奥斯曼帝国的自封的缔造者就这样启程干他的事业去了；他即使还不相信，至少也在期望着我会带着他所需要的军需物资随后跟来。

56. 亚洲革命的策略

俄国领导人对东方革命的发展想得很天真，因此，恩维尔帕夏事件使他们猛吃一惊。他们也许在幻想这样一种图景：殖民地人民群众会自发起来反抗，把帝国主义国家吓得胆战心惊。但是情况到底如何？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尽管讲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却是些空想家；他们不欣赏我的固执的悲观见解：不赞成以表面价值来估价民族主义的反帝运动，并认

为泛伊斯兰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反动势力。恩维尔帕夏的行径证明我所抱的怀疑态度是正确的。他仇恨英帝国主义这点不假，但他又是一个忠诚的泛伊斯兰主义者。谁也不会相信他是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家。然而，天真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却指望他会成为自己的同盟者。

经验打消了这种幻想。布尔什维克党人中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我为什么不同意列宁的下述论断：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不论其阶级成分如何，是历史上的一支革命力量，因而它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必须给予援助。恩维尔帕夏是中东和印度反帝运动与泛伊斯兰主义的偶像。但是他求助于苏俄，目的是为了阻挠亚洲革命向前发展。这个经验在制订亚洲革命的策略时是应当考虑的。诚然，当时进行的还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但是作为民主运动，它必须建立在可靠的社会基础上嘛。

我坚持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不会领导殖民地国家的民主革命，同时指出：即便在印度那样一个最先进的殖民地国家，反帝运动也不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资产阶级随时都会对帝国主义进行妥协，他们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剥削劳工的有利买卖中，是甘愿充当一名副手的。假如说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那么在近东各个穆斯林国家中领导民族主义运动的地主、僧侣就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恩维尔帕夏其人证实了我的理论。

布尔什维克认为泛伊斯兰主义具有革命意义，这个信念现在已经动摇了。但印度的起义是在印度教圣雄甘地和可汗兄弟领导下进行的。这难道不能证明，在殖民地国家里宗教

可以成为一支革命力量？我撰文分析了当代印度的社会结构，说明印度的资本主义经济比封建关系占有优势，因而它的社会条件不同于中世纪末期的欧洲；那时欧洲的革命运动是由僧侣和贵族领导的。诚然，宗教的感染力肯定能够鼓动群众，而且宗教也确实是不合作运动和哈里发运动的动力。但另一方面，宗教心理却也使群众屈从于宗教人士在俗世中的权力，接受现世的现状，认为那是上天注定的。这种社会文化的气氛因而也就障碍了民主革命的思想在群众中的发展。

不过，我也有我的幻想。我是一个刚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有着强烈的信念。印度的资本主义是在英国殖民经济的结构中发展起来的，它产生了革命的阶级。封建关系是殖民经济的社会基础。印度的资产阶级与社会现状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因此也就无法领导农民起来开展打破现状的运动。历史使他们不能起到欧洲资产阶级所起的革命作用。但世界历史又必须符合卡尔·马克思画出的天宫图。不管资产阶级是否愿意，印度都必须进行自己的资产阶级革命。推动历史前进的是社会进化中的客观力量。特定阶级的意愿或无能等主观因素是无关紧要的。由于印度资产阶级不要革命，那么就得越过他们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既然他们放弃职责，历史就已经把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光荣使命赋予无产阶级了。

我对印度形势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得出如下的结论：假若无产阶级不能掌握运动的领导权，民族主义运动最终必将与帝国主义妥协。齐采林认为我太悲观了；不过，他的乐观看来是建立在如意算盘的沙滩上。我这个新信徒的热诚信念

给列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实际的思想是很想寻找一个具体的办法，来解决如何援助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个显然十分复杂的问题。

我认为，在千里之外是办不成任何具体事情的。我们必须在国内建立一个组织，通过它来影响那尚未定型的运动。谈到援助，我们必须先弄清楚给谁援助，怎样援助。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一个行动基地，地点离印度边境越近越好。第二步是要同国内一些有势力的人物取得联系，与他们研究进行民主革命的途径；可以先通过书信往来进行讨论，然后举行会议。采取这些初步措施以后，就可以逐步形成一个核心，建立一个有明确革命目的的组织，推动那个尚未定型下来的群众运动，并在运动中起先锋作用。那个运动在甘地领导下正在发展，他们用的是“不合作”那样一个消极的口号。那个运动要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和积极的纲领，否则在遭到初次失败之后，就必然要解体。我提醒列宁，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如下的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我也是从他那里学到：为了领导群众运动逐步朝着一个特定的目标前进，极为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受革命哲学鼓舞的、有目的的革命组织。然而，这个决定因素在印度还不存在。因此，我们应当努力促成这种因素产生，其途径是在民族解放运动的面前展现出这个运动的客观愿望的具体前景。这个运动中更先进的分子因此就会认识到他们进行实际的革命斗争的意义，从而感觉到有必要联合起来，在运动中发挥先锋作用。

显然，那是一个长期的纲领。经验使我懂得要有耐心；而马克思主义使我树立起最后胜利的信念。我不相信甘地领导

的不合作运动会在不久的将来取得什么成就。不过，继续不断的动乱状态会使潜伏的社会势力活跃起来。必须将这股力量引上正轨，要有计划地开展宣传，使他们认识到自己进行实际的革命斗争的重要意义。在开始阶段，可以在国外设立一些中心点来开展这样的宣传。喀布尔将是进行初步行动、鼓动印度内部革命力量的最合适基地。

阿富汗政府怀疑我以俄国大使身份前往喀布尔的做法是否明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把我看做是“不受欢迎的人”，而是暗示这样做会疏远阿富汗与英属印度政府的外交关系。他们的顾虑是很有根据的。列宁也认为，为了对印度作出亲善友好的姿态，我不宜担任公职，以免受到约束。况且，作为共产国际中亚局的一名委员，我或许要在土耳其斯坦呆到当地革命取得成功的时候。虽然我急于要到达印度边境，与国内友人和同志们恢复直接联系，但使我更为兴奋的是，我即将参与指导广阔地区的革命的前景。这样，我不但可以从中取得宝贵的经验，而且中亚革命政权的巩固，就会使几个国家（其中包括印度）的边界地区发生革命。我深信革命不可避免；因此对于印度没有我也能进行革命，丝毫不感到遗憾。一旦时机成熟，印度就会爆发革命。到那时，我就想投身到革命之中了。

经过大家的同意，我到喀布尔去当苏维埃大使的计划取消了。在最后时刻，鲍罗廷也不愿到那里去了。一个布尔什维克是不能拒绝执行任务的。由于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被留在莫斯科了。拉斯科尔尼科夫被委派去喀布尔担任那个外交职务。他少年英俊，据说是一个宫廷贵族的私生子，

才用了那个贵族的著名的姓氏。他在任海军下级军官时，参加了喀琅施塔得起义，那次起义是彼得格勒起义的信号。国内战争期间，他晋升为伏尔加河小舰队的指挥官；那支舰队在黑海战役中击败了英国。

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妻子是苏俄革命中最杰出的妇女之一。她名叫拉丽莎·赖斯纳，是一位著名的大学教授的女儿。她在与拉斯科尔尼科夫结婚前，就在文学方面有点名气了。她还以美貌闻名；在国内战争期间，她是她丈夫的战友，曾经建立过伟大的英雄业绩。她竟然成了伏尔加河小舰队旗舰船首楼上的管理军械的准尉，经常在舰桥上代替她丈夫行使职权。夫妻俩的朋友们都打趣地说，她在家里当家，在黑海战役中打败了敌人。普通人都认为，英国炮舰指挥官被苏维埃旗舰舰桥上的绝代佳人迷得晕头转向了，打起炮来发发落空。“伏尔加之母”亲自出阵，把侵略军打退了。

拉斯科尔尼科夫被召回担任外交职务时，是波罗的海舰队指挥官。他到莫斯科接受外交人民委员会的指示，并和我商讨他在政治上的使命。我拜访了他们夫妇，我对那位几乎是传奇式的战争女神颇有敬畏之感。她确实很象典型希腊女神，但她周围没有神婢^①那样的侍者。他们的家庭生活十分简朴，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化的家庭；他们没有雇用仆人，女主人亲自泡茶招待客人。这位女主人的容貌确实十分出众，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她面前简直是黯然无光。在我有幸遇到的妇女当中，她是一位最完美的女性了。拉斯科尔尼科夫长了一

^① 神婢 (Walkyria)，北欧神话中沃丁神 (Odin) 的侍女，共十二个，奉命往返于战场上，引导战死的勇士的灵魂回到英灵殿。——译者

张娃娃脸，举止行动有些低声下气，与他那位夫人一比，他显得就没有什么丈夫气概了。不过，拉丽莎无疑是位忠贞的妻子，她不想把丈夫冷落一旁。但她又不能不出头露面，而拉斯科尔尼科夫正是要她出头露面引以自豪。他们显然是一对幸福的伴侣，共同经历了冒险的生活；他们展望着要在一块富有异国情调的土地上，再经历一番冒险生涯的前景，感到非常激动。拉丽莎要我告诉她，在不久的将来她要在怎样的境况下生活。她得穿上“布尔卡”^①吗？当然啦，为了让丈夫胜利完成任务，她什么都愿干。这是她的革命义务。这位女神是个布尔什维克，但她并非由于婚姻关系才成为布尔什维克的。她在革命前当学生时就入了党，那在当时是很危险的。

我自己也从未亲身体验过东方宫廷生活，因此无法向我的新朋友提供什么情况。然而，拉丽莎却富有诗人的想象力。她正在重读《天方夜谈》，以期对阿曼纽拉国王宫廷的气氛有所感受。她想知道，那位国王是否也有点象哈伦-阿尔-拉希德呢？不，据说他是一个现代化的人物。要是那样，他就不会介意她这位大使夫人在宫廷中出头露面了。拉丽莎红着脸儿，连她那迷人的红褐色头发的发根也红了；她坦率承认，她还略懂东方舞蹈。要是有机会的话，她想以舞蹈给阿曼纽拉国王助兴。当然，她丝毫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王后和“我的丈夫”都不该妒忌。拉斯科尔尼科夫双眼毫不掩饰地流露出自豪和敬慕的神情；他认为，拉丽莎曾经把英国舰队的舰长迷得神魂颠倒，她也同样会把那位阿富汗国王迷得如醉如痴。拉丽莎责备他太轻浮了，并且说道：是拉斯科尔尼科夫同

^① “布尔卡” (burkha)，穆斯林妇女穿的一种长袍。——译者

志率领的苏维埃舰队把英国侵略军逐出了伏尔加河，并在黑海战役中把他们击溃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极力克制自己的感情，使内心的喜悦不至于流露出来。拉丽莎替他解围，逗弄地骂他一句：“别那么傻里傻气的啦！”

我能遇到这两位杰出的人物，并和他们交上了朋友，真算是好运气。我经常拜访他们两人，几乎天天见面，直到他们离开时为止；他们是在我前往塔什干以前到喀布尔去的。他们在喀布尔呆的时间不长。因为恩维尔帕夏的诡计确实影响了阿曼纽拉国王，尽管不久以后，恩维尔帕夏自己也成了那些权力很大的毛拉的狂热的牺牲品了。这对忠心耿耿的年轻布尔什维克夫妇在喀布尔呆的时间相当短促，任务却完成得很出色。拉斯科尔尼科夫得到阿曼纽拉国王的极端信任，甚至有一次，那位国王竟然十分直率地承认他杀了自己的父亲，并根据这一点宣称他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拉丽莎也和苏里娅王后交上了朋友，还征得她的同意，跳了莎乐美舞以娱国王。

拉斯科尔尼科夫是个典型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他对印度当时的形势寄予极大的希望。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被选派到喀布尔去担任大使职务。临行前，他极力劝我催促实现给边境部族提供大量军火和金钱的那个计划，以便他们开展反英战争。这样做的结果，就会削弱英国人的力量，从而使哈里发运动得以推翻英国人的统治。这是我早就有过的想法，现在仍然对我很有吸引力。为什么不这样干呢？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可能崩溃，那样革命就会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上层阶级可能夺取政权，但民主力量也有同样机会取得胜利。无论如何，推翻现状总是建立新制度的先决条件啊。

我将这个计划提请列宁考虑和批准；未经他的同意，任何事情都是办不成的。列宁对这项计划很感兴趣。推翻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一个革命事件，不管在这个事件之后在印度马上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这个事件将在整个东方产生巨大的反响，而且会在英国成为一场革命的信号。但是，怎样才能对边境部族提供大量的供应，使他们足以同英军进行全面较量，从而为那个国家内部的起义创造条件呢？我们必须争取阿富汗政府的合作。那么，怎样才能合作呢？阿曼纽拉国王不是一个革命者。那人是精明得很，懂得自己可以佯作反英，从中取利。他采取这种投机政策，最后必然与出价最高的人进行交易；而英国人是能够出高价的。还要考虑到下面这个决定性的因素：归根到底，与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相比，阿曼纽拉国王和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者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列宁以异乎寻常的冷淡说出了他带有讽刺的意见之后，我接着问道：这些分析是否也同样适用于其他亚洲国家呢？比如，印度民族资产阶级是否宁愿与英帝国主义妥协，而不愿投入布尔什维主义的怀抱呢？列宁笑了，表示同意我的看法。我们不应抱有幻想，但革命的策略要求我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因此，尽一切可能争取利用阿富汗作为基地的计划必须进行下去，以推动印度革命。我必须详细拟出具体方案，提交党的政治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审批。

57. 募集一支解放军的计划

我的计划不是单单供给边区部落军用物资，使他们能够给英属印度政府制造麻烦。那是很容易办到的；但是我怀疑那样做会取得什么成效。欧洲的战争已经结束了。要不了多久，又有可能抽调英印军来守卫印度西北边区了。双方力量的对比会发生变化。谁也不能料定另一次边境战争的结局如何。

假定那些部落由于得到俄国的援助而占了上风，它在印度的反应也许是使英国人在印度的地位得到增强。象前几次一样，胜利了的部落几乎肯定会袭击邻近的印度村镇。夸大了的传说就会象野火一样蔓延全国各地，引起极大的恐慌。占印度人口绝大多数的印度教徒就会被一次新的穆斯林入侵的幽灵所吓倒，而把英国当作唯一的保护力量。这样一来，反英运动会遭到挫折。恐慌引起的另一种后果，可能是在全国范围内发生教派之间的风潮。假使被削弱的政权不能对付届时的局势，乱子就会越搞越大。由于缺乏专门组织起来的力量去夺取政权，要想恢复秩序并建立一个民主政权就很困难了。

当时出现了一个新因素，这一点已包括在我的计划里面。不断传到莫斯科的消息说：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其中包括许多受过教育的青年人，为了响应哈里发委员会的号召，纷纷离开印度到土耳其加入基马尔帕夏的军队。那是一种宗教性的泛伊斯兰主义运动。但它给我一个机会去同许多可能组成一支

军队的新兵接触；这支军队将为印度解放而战，而不是白白地为一个已经失败的事业去送命。

基马尔帕夏所进行的战争，既不是为了复辟奥斯曼帝国，也不是为了保卫哈里发制度。土耳其苏丹职位的废除，已经宣告了伊斯兰哈里发制度的结束。所以，印度的穆斯林正在为之作战的是一个已经失败的事业。无知的大众是被宗教的狂热发动起来的。但是受过教育的青年，也就是构成运动主力的那些人，是有其政治动机的。对他们来说，哈里发就是伊斯兰团结的传统象征。失去这个象征就必然瓦解泛伊斯兰运动，至少要挫伤它那狂热的锋芒。

当他们碰了钉子之后，印度穆加希尔^①中的有知识的人也许会认识到：他们老远地到土耳其为世俗的民族主义而战是没有意义的。然后，把他们编入一支印度解放军就有可能了。

我的计划就是在阿富汗招募、装备和训练这样一支军队。这支解放军将利用那里的边境地区作为作战的基地，并在雇佣的部落居民的支援下，进军到印度境内，并占领一些土地，然后应当尽快地在那里成立一个文官政府。革命政府的第一个宣言将提出在民族独立之后立即实行社会改革纲领。要号召人民在敌后起义，这样解放军就能够一步步深入国内。这个号召应当特别向产业工人和运输工人发出。解放区的全体成年人都要武装起来，有的从事保卫工作，有的用来扩大解放军。成立革命政府之时发布的宣言里所提出的社会改革纲领必须在解放区付诸实现，这样一来，人民大众就会热烈拥护

^① 穆加希尔 (Mujaheer)，伊斯兰教宗教法律的权威解释者。——译者

新政权。自由的具体远景将对大多数人民大众具有强大的魅力，并鼓励他们为争取自由而奋斗。全国各地的既得权益者也许会反对民族解放的革命涵义；但是，帝国主义势力已被世界大战削弱了，被人民起义动摇了，它已不可能保护那些妄图阻挡民主民族革命潮流的少数上层阶级了。

实行这个计划的必要条件是很明显的：要有足够的大量武器、野战装备、经过训练的人员和充足的经费。上述最后一项是经由共产党的建议得到人民委员会批准的。几年的内战差不多把军事物资都耗光了，我花了一段时间才把其余的项目凑齐。在托洛茨基不在的期间，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克兰斯基亲自抓这项工作。我们一伙人准备在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过后不久就从莫斯科出发。

第一个目的地是离莫斯科大约二千英里的塔什干。这段路程中的大部分地区直到前一年的冬天还被反革命军队占领着。乌拉尔河东面的草原上仍有白卫军的散兵游勇在那里骚扰。他们已成为一帮土匪，经常破坏铁路线，拦劫火车。我们这一伙人乘坐两列火车；一列由二十七节三十吨的货车组成，载运着军火（手枪、步枪、机关枪、手榴弹、轻炮等等），足够的弹药和军事物资以及包括几台无线电收发报机的野战装备。这列火车有两连精锐的红军护送，带队的是一个名叫约翰的彪形大汉。他在美国是一个移民劳工，曾参加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名叫世界产业工人联盟——这是美国劳工运动中最有战斗性的一个派别。革命后，约翰回到俄国，就立即投身到内战中去。但他拒绝参加共产党，因为他不愿损伤他那无政府主义信仰的纯洁性。他在内战中的英勇事迹证明了他

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忠诚，于是就被提升到受到信任和负责的岗位上。他到空军部队里当一名非常熟练的机工。他差不多有七英尺高，肩宽腰圆，横竖相称。他声音洪亮，说是巨人，丝毫不假。

另一列火车是这样组成的：两节货车满载着金钱（金币、金砖、英镑钞票和卢比钞票）；十节货车载着拆卸开了的飞机和一个空军大队的整套装备；七节客车载着空军大队的人员和一所军事训练学校的职员；再挂上一节特别客车供我使用。我们这列火车的指挥官是一位年轻的空军军官。他只听从我的指挥。我们这一列火车比一般火车护卫得更为严密。在客厅车顶上安放了几挺伪装起来的机关枪。装载金银货币和飞机的货车也采取了类似的防卫措施。

第一段的旅程到伏尔加河东岸的萨马拉（现在叫做古比雪夫），用了两天的时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急关头，苏联政府和外国大使馆都曾迁到那个城市。再过一天半，我们到了俄国的欧洲部分与土耳其斯坦交界的奥伦堡市。渡过了河面很宽的伏尔加河以后，铁路线穿过了俄罗斯大平原的最后一段。乌拉尔山脉的南部支脉和向南流入内陆湖里海的乌拉尔河，可以称为欧亚两洲的天然边界。在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和乌拉尔河之间的广阔边界地区的居民，绝大部分是亚洲人——鞑靼人、巴什基尔人和吉尔吉斯人。奥伦堡城可以说是欧洲人居住的唯一绿洲。它是沙俄帝国的一个省会，那里有很多俄罗斯人。从省长、驻防司令直到最低级的政府职员和军官都属于统治民族。革命使情况改变了。旧政权下的文武官员都走了。在1920年，奥伦堡尽管名字是欧洲式的，已

成了一个亚洲人的城市了。自从那时以来，这个地名也更改了。无论从种族上或从行政上来说，东方已经发展到伏尔加河的下游了。

在乌拉尔河的亚洲这边，吉尔吉斯草原向四面八方蔓延达数百英里。1920年，这里还是一片渺无人烟的地方。从奥伦堡到塔什干——距离一千多英里——没有一个地方够得上称为市镇。当地居民是游牧民族。俄罗斯殖民者都支持沙皇政权，他们已跟着溃散的白卫军一起逃走了。铁路沿线大站附近的集市都冷落无人，而这样两个大站往往相隔一百英里以上。在那样的长距离中间的地方什么也弄不到。

最难解决的就是我们那四个火车头的供水问题。每列火车是用两个火车头来拉的。另一个问题是要使这几个在奥伦堡调配给我们的旧火车头能够行驶一千多英里。在到塔什干以前没有地方能够调换火车头。我们不能不设想会发生两个以上的火车头被损坏的情况，如果发生那样的事故，大家就得在无边无垠的沙漠中搁浅了。那里虽然没有象戈壁沙漠的可怕的流动沙丘，但沙漠上稀稀疏疏地散布着的带刺的灌木，却是野兽和流为匪盗的亡命之徒最理想的藏身所在。

幸好燃料不成问题。实际上我们的火车头并不携带燃料。要燃料的时候就把车停住，一队士兵下车去砍一堆沙漠里野生植物的粗硬树根就行了。火车头里的空煤仓用来装上若干铁桶的备用水。我们路程中有大段大段的地方连一滴水也找不到啊。

我们的食品库在萨马拉得到了补充，最后又在奥伦堡加了一些东西。在那里，我们必须准备一个星期的食物。如果

一切都很顺利，其余的路程只要三、四天就可以走完了。但那几个破烂的火车头绝对不能使用过度。它们也许会坏得走不了。而在那渺无人烟的地方，又经常出事故。所以，这段行程的时间规定为一个星期。不管从哪里开往塔什干的火车，只要一个星期以内还不能到达终点，就得进行救援。我们这一次还不需要救援，因为我们准时到达了塔什干，刚好是在第七天傍晚到站的。土耳其斯坦战线的指挥官亲自欢迎我们，他已事先到了车站，命令一队装备完善的有力队伍，在薄暮的掩护之下出发去救援我们。

我们一路之上，白天热得烫人。这一路是走在广阔无垠的焦干的土地上，骄阳似火，残酷无情地烤着地面。连我那设备豪华的客厅车（有人对我说，那是皇室专用的特别客车之一）也抵挡不住那变化无常的气候的淫威。我们说气候变化无常，因为晚上就又冷起来了。除非我们幸运地经过一处泉水，我们就得几天喝不到清凉的水。沿线的大站一般说来都建在泉水附近，以便让火车头加水。但是在许多地方，泉眼被逃亡的俄罗斯殖民者用碎石堵住了。所以我们不得不寻找别的泉水。为了这个缘故，在行进的火车上布置观察哨，用望远镜察看四外的情况。凡是有泉水的地方，沙漠草木就不那么枯干矮小。我们发现这样的绿洲，就马上停车；有时候，这种绿洲距离车站还相当远。在架在列车顶上的轻炮掩护下，一支武装齐全的先遣队被派出去进行侦察。如果我们找到一处好的水源，我们就把那炎热的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消磨在那里。列车不能无人守卫，于是我们就分批去享受舒服的凉水浴，再带回大量泉水供以后几天饮用。有的时候，泉水只是一点一滴

地流出来。遇到这种情况,就只能补充一些饮用水了。

有一天,我们的观察哨发现东方地平线上有处地方象一个很大的野营的地方。那究竟是什么,大家的看法不一。有人认为也许有一群逃亡的白卫军扎营在那里。有人想象,那很有可能是吉尔吉斯游牧民族的一个居留地。负责我的列车的年轻空军军官很谨慎。他听从他的政治委员的意见,不愿冒险。我是个好奇的人,又是全部人马和我的政委的最高指挥官。但我不愿意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压制一个小心谨慎的下属的意见。当然,如果我能使全体人员都带到野地里,是不怕对付一伙逃亡的敌人的。但是做不到这一点。如果我们决定派出一个侦察队,并预先估计到敌人设下圈套的危险,那么就得把列车保卫好,以防备对方可能的袭击。因为如果派出侦察队,天黑之前不一定能回得来。那样我们就得在沙漠中停车过夜了。

约翰看出我很想借这个机会访问一个吉尔吉斯牧民的居留地,就替我想办法了。他是无政府主义者,不相信什么纪律。如果他沒有接到要他带领一个侦察队出发的命令,他也会单枪匹马到居留地去看看。他是直接受那位空军军官指挥的。我请求那位军官让他带一些人去。约翰高兴得象个孩子,卸下一部小卡车,一部摩托车。我们带了一桶汽油,以备急用。约翰命令六个士兵乘坐小卡车,自己摇晃着魁伟的身体跨上摩托车,率领那队人前往。我们关切地目送着他们,直到他们消失在遥远的灌木中。我们不时可以看到飘扬在卡车杆子上面的一面大红旗。他们用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这是在处女地上的越野行车;在这天然的公路上,就是开

汽车每小时也不过十多英里。

观察哨报告说，侦察队受到友好的接待。不一会儿，那面红旗在一个篷帐的顶上升起。又过了一会儿，约翰打信号来，通知我们放心。他们带回来了好消息，并说我们应当准备第二天早晨迎接吉尔吉斯一个很大部落的代表团。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们发觉整个野营一夜之间已经移到我们附近了。一共有五十三个圆形的矮帐篷，大大小小，都是厚毡子做的。红旗就在中央那个最大的属于酋长的帐篷上面飘扬着。这个部落共有男人、妇女和小孩三百多人。他们的财产有一群骆驼，一群绵羊，几匹小马和一队无轮大车。此外，还有几只恶狗。我在空军军官的陪同和约翰的护送下，到帐篷中拜会酋长。我们的政委是一位冷酷的“契卡”人员，仍然怀疑有人捣鬼。他寸步不离岗位，亲自站在列车的另一边担任守卫。几条人命还可以豁出去，但是无产阶级的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管怎么说，这些财产是极为宝贵的。

酋长是位慈祥的老人；他的随从是个满脸堆笑的青年，会讲俄语，这使我们感到惊奇。他曾在附近俄罗斯殖民者的居留地进过学校，后来又给一个殖民者（皮货商）当伙计。他听说爆发了革命，革命推翻了沙皇，并把征服吉尔吉斯人家乡的将军们赶走了。所以，这次革命就意味着吉尔吉斯人又可以做自己家乡的主人了。这个吉尔吉斯青年高呼“革命万岁”；他好象是个天生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整个部落都随声齐喊起来。接下去，是一整天的联欢活动，一次大宴会，他们把自己养的羊宰了几只。在乱哄哄之中，我注意到，近代机器文明的长臂已经伸到这个中亚游牧民族原始文化的绿洲来了。这个

部落的第一夫人的最宝贵的财产，就是一架光彩夺目的“胜家牌”缝纫机。

由于半路上这个愉快的插曲，我们到达塔什干的时间就晚了，以致引起索科尔尼科夫同志的不安。那就是我们在月台上握手时他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救援队在我们同友好的牧民接触的第二天便出发了。

第四卷

革命到了亚洲

58. 在中亚的生活

在车站的月台上，索科尔尼科夫以苏军中亚总司令的名义开始负责照管我们这一行人和带来的军事装备。在我们列车上当指挥官的那位年轻的空军军官，要在早晨去见他的新上级，请示怎样安置这些装备与人员。我们带来的金钱要存入当地的金库。

塔什干是我们旅途上第一阶段的目的地。计划中的解放军的基地就打算建立在那里。军队本身的核心还有待于形成。新兵的招募和训练也尚需一些时日。下一阶段准备在喀布尔建立前进基地，在印度边界建立作战基地，都需要先取得阿富汗政府的同意与积极合作后才能着手。这意味着要进行外交谈判，然而由于恩维尔帕夏诡计多端，谈判肯定是很费周折的。在此期间，我得履行我作为共产国际土耳其斯坦局委员的责任。这个局的设立是为了在已被推翻了的沙俄帝国的中亚各省推进革命，并巩固新政权。出于上述种种考虑，我将在塔什干无定期地住下来。

除了共产国际土耳其斯坦局总部以外，我还分配到一幢

房子作为住所。索科尔尼科夫下令在列车上的装备于上午卸下之前，还要对列车进行守卫，然后，他便带我前往我的住所。路上，他为我必须在这样混乱不堪的条件下住下来表示歉意。早先在夺取塔什干时，并没有真打什么仗。正规军已调到西线作战去了，所以革命爆发时，并没有什么武装力量防卫中亚的旧政权。一小批工人从一开始就轻而易举地夺得了政权。他们是当地铁路工厂和其他小工厂的工人，大多是俄罗斯人。沙皇官吏和俄国上层人士当即逃跑，临走之前毁掉了大量无法带走的动产。在城市的新区，几乎没有一所住宅可以住人。房子本身当然是不容易破坏的。破坏的是内部——家具毁坏了，水管砸破了，电线扯掉了。

我们一到分配给我的住房，就看见房子已被恣意破坏得不成样子，跟索科尔尼科夫在路上讲的差不多。他告诉我，这所房子之所以被选中，因为它比起别的房子还好住人一些。他本人住在帐篷里，那个帐篷就搭在分配给他的那幢房子的院子里。土耳其斯坦委员会（临时革命政府）其他委员的居住条件也并不好一些。在沙皇殖民帝国的这个首府，革命政权并不一定要在军事意义上打一场内战。然而，革命政权必须进行一场战斗：一方面要战胜旧政权遗留下来的严重创伤和紊乱无章；另一方面，还要克服当地居民群众的冷淡态度，这些居民对于少数人因受到新的自由幻想的鼓舞而表现出热情甚感不安；同时还得对付那些因怀疑新政权的意图而面有愠色的人，对付那些按捺不住敌意、企图煽动宗教狂热以反对布尔什维克异教徒的毛拉。

我们到达住所时，已是深夜了。塔什干城坐落在一片绿

洲上，夏天虽然很热，冬天却非常冷，气温降到零下好多度。我们到那里不久，就开始下雪了。以后的两个月里，这座城市和周围的沙漠就都被茫茫白雪盖上了。屋里阴暗、寒冷。电路没能在我们到达之前完全修通，大约还需要两三天才行。所需材料不易找到，熟练工人又非常缺少。几盏煤油灯，再加上一点不停闪动的烛光，怎样也驱散不了这所无人居住的房屋里的幽暗阴森气氛。黑暗似乎更加重了11月中旬夜里的刺骨寒气。巨大的瓷砖壁炉如同在阴冷昏暗中隐藏着白色幽灵，眼睛老在盯着我们。入冬好几个星期了，还没生过一次火呢。

有用的家具，如桌椅之类，实际上一件也没有，有的却是一堆又一堆蒙了厚厚尘土的地毯。据说那些地毯花样是最精致的。布哈拉的埃米尔^①的代表曾经在这所房子住过，并以典型的中东风格将屋里布置了一番，把价钱极为昂贵、尺寸不一、厚薄不同的地毯和挂毯铺在地上，挂在墙上。此刻，它们被堆叠起来，当床用了。

这是一幢房间宽敞、建筑得很讲究的二楼楼房，位于市区的主要大街上，面对着中央公园。我们尽了一切力量，使这所房子住起来舒适些。一小队工人花了好几天的工夫清理瓦砾。电路修通了；破裂的水管却换不上新的。所以洗涤仍然是个问题，更不用说洗澡了。井里打上来的水不能烧热，因为当时最缺乏的物资就是燃料。由于铁路运输紊乱，无法把煤从遥远的顿河流域运来。现有的数量有限的汽油是专供军队和政

^① 布哈拉(Bokhara)，苏联地名，在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埃米尔(Emir)，酋长的意思。——译者

府机关的汽车使用的。城市附近的沙漠里没有森林，只是周围草原上生长着一些灌木。在这座大城市里厨房用的燃料是少量配给的、疙里疙瘩的硬灌木根。我们享受特殊待遇，配给的燃料除了供一日两餐烧用外，还稍有富余。厨房里的炉灶是用大块石头砌成的，甚至在火灭后，还能够保持一点余温。我的下属工作人员，每天除了躺在床上靠层层厚毛毯挡寒以外，总是聚集到地下室来，在炉灶旁边围坐着。也许为了不失体面，我拒绝把办公室搬到厨房去；然而，入冬日深，室内气温已降到零度以下，我那个勇敢的决定也就坚持不下去了。

食物的供应也不足。我们领到的配给是黑面包、大米、羊肉、苹果茶和葡萄干。肉类往往不新鲜，因为冷冻的方法十分原始，那种肉是否可以吃，常常使人怀疑。发臭的肥羊肉一烧以后，噼噼作响，弄得满屋子都是呛人难闻的气味。臭气停在屋子的黑暗角落里，也钻到落满灰尘的地毯堆中，久久不散。在此后的许多年里，我一看到羊肉，甚至一提到它，就会想起那股令人作呕的气味。我们每餐的主食是臭的肥羊肉烧大米或“卡沙”（一种深棕色的粗粮），里面有些肉块。这种难闻难看的東西，点缀上几小块胡萝卜丁，称之为“肉饭”。另一种饭菜是吃面包加盐，用苹果茶冲下肚去。人们简直不敢设想那颜色发黑，质地湿粘的面包是用什么做的。且不提揉进了别的什么东西，里面的沙砾和沙子，甚至还有很细的泥土，反正是不少的。面包经常是酸的，有时甚至发了霉。然而，尽管有许多不足之处，它总比臭烘烘的羊肉饭好多了。

当茶喝的淡红色的热气腾腾的水，是用干苹果片沏的。

把一夸脱开水往一茶匙苹果片上一冲，水就变得血红。再用更多的热水冲淡些，这种饮料就叫苹果茶。这茶喝了，除了使人体内部发暖以外，再没有别的作用。闻上去它略有甜味，喝起来没有坏味。没有糖，无法使它变甜。牛奶根本没有；假设在饮料里加上牛奶，它很可能就凝结了。我们喝茶时加上一把葡萄干。附近盛产葡萄。

总之，生活很艰苦，却也充满了希望，它值得我怀着无限的信仰和热情去追求。我对这种生活安之若素，对自己作了这种选择一点也不懊悔。经验告诉我，在革命的道路上撒满玫瑰花，根本没有那样的事。而且，荣誉、名望、参加解放世代受蹂躏的人民所感到的欢乐，以及可以展望到的更多的大胆的冒险和更大的成就，都在增长我的经验，丰富我的生活。

共产国际土耳其斯坦局设在原俄罗斯帝国银行。这是一座又坚实、又精致的红石建筑，红石是从遥远的乌拉尔山运来的。它是地方政府的金库，革命爆发时成了起义士兵占领的公共建筑物之一。因此，它不可能受到破坏。它那保险库里存放的贵重物品以及整套富丽堂皇的房间都完整无损。保险库里有总督冠冕上的宝石和宫廷贵族以及殖民地富豪私人的贵重财产。此外还有大量的金块和大票面钞票。金库上了锁，贴上了封条，并且严密地被看守着，一直未受触动，要等待莫斯科下令如何处置。

选中这所房子做共产国际土耳其斯坦局的总部，带有一种象征意义：仿佛革命的贵重战利品已被置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监护之下，我则荣幸地成为这笔财产的保管人。由于土耳其斯坦局另外两名委员兼管了别的更艰巨的工作，所以指导

局的活动的责任事实上就落到我的肩上了，尽管我曾谢绝正式担任局的主席。局的每周例会在一间宽敞的房间里召开，那里原是银行行长的办公室。由于他那地位相当于帝国的总督，所以他不是将军便是王公。索科尔尼科夫和萨法罗夫参加每周一次的例会。我作为局的负责人，继承了那位被废黜的帝国显贵的特权，每天都登上他的宝座。这是名副其实的宝座——用贵重木材做成的精雕细刻的高背椅，装着深红色天鹅绒垫子。在红色衬底上，绣着罗曼诺夫王朝的金色的盾形纹章，椅顶上安放着一顶镀金王冠。有真人那样大的沙皇尼古拉二世肖像，镶在沉重的金光闪闪的画框里，悬挂在宝座般的椅子后面的墙上。然而那肖像已经被摘下来了，同其他贵重物品和艺术品一道放进保险库了。

起初，局的任务是同附近国家的革命者建立联系。必须使从外国来的侨民真正组织起来，以便将来在他们各自的国家里发展革命运动；但是我们没有直接同他们联系的门路。革命政权已经给布哈拉的酋长领地和基发的可汗领地以民族独立权。这两处地方联在一起构成了一片广阔的领土，从咸海一直延伸到印度西北端。在这天然屏障的后面，外里海区的辽阔平原一直是英印部队多次侵犯的地区。他们占据着霍腊散(波斯东部的一个省份)，并在马什哈德建有前哨作战基地。这个基地不仅防护着波斯的其余地区，使其不受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它还威胁着沿波斯边境数百英里之长的外里海铁路，并切断对新诞生的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煤与石油的供应。为了保卫这条性命攸关的供应线，就要采取军事行动，以逐退侵略者，但不经过独立的布哈拉的同意，那是办不到

的，而这种同意却又不是很容易得到的。埃米尔和他的朝廷并不因为我们给予独立而感谢我们。我们甚至无法向边境城镇阿什哈巴德的少量驻军派遣增援部队。因此，用宣传来分化英印部队便成为在中亚传播革命的先决条件了；的确，那对保卫和巩固那里的革命也是先决条件。显然，阿什哈巴德是计划中的革命行动的前进基地。为了探索开展工作的种种可能性，就有必要到那个地方去看一看。

在中亚有不少印度人，他们大都是经商的。由于革命，商业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一些干扰。私人贸易没有受到禁止；然而由于英印部队占领了霍腊散，也由于独立的布哈拉多管闲事的干涉，因此往来于波斯与阿富汗边境上的贸易实际上已经停止了。这样一来，印度与中亚之间的贸易就受到了损失。我到达塔什干之后不久，一个印度商人代表团找我来大发牢骚。但是假若布哈拉政府不改变它的阻挠政策，同时英印部队在马什哈德—基达公路上的军事运输不被清除，那我们是爱莫能助的，于是我要求印度商人与我们共同协作，计划对驻在霍腊散的印度部队进行反帝宣传。尽管他们表白自己的爱国精神，却又不那么热心提供实际帮助。他们建议我去找布哈拉的印度商人，因为那些人比他们更有钱，更有影响。同时他们要求许可他们取道费尔干纳返回印度。费尔干纳在布哈拉最东部，被吉尔吉特和奇特拉尔之间一条狭长的阿富汗领土把它与印度隔离开了。因为该地仍受狂热的毛拉领导的土库曼叛军所控制，土耳其斯坦政府无法提供保护，所以我劝印度商人要耐心等待。可是奇怪得很，他们宁愿在骚乱的地区冒险旅行，却不愿安全地留在新诞生的共和国的首都和其他

城镇。俄国人很不愿意惹这些“印度同志”不快，便劝他们到离新政府权力最远的地方，在那里等到前面的路途多少安全些可以旅行时再继续前进。然而，这些“印度同志”一旦摆脱了塔什干方面的保护性的和友好的警戒，竟不知怎么的都设法溜之乎也。后来我才明白他们这种奇怪行径的由来。原来，恩维尔帕夏的特务人员曾经对他们作出承诺说，如果他们离开土耳其斯坦，定居在那个新的伊斯兰教国，他们的损失将会得到赔偿。在中亚的印度商人，大部分是从信德来的印度教信徒，即所谓希卡普尔人。

在布哈拉的比较有钱有势的印度商人的态度并不更爱国些。他们不相信印度有可能解放，因此，他们不愿得罪英国人和英国在布哈拉的代理人。他们希望一旦俄国人的影响从布哈拉清除出去，便在霍腊散英印驻军的保护下恢复同印度的贸易。在我同布哈拉那些“印度同志”有了那段经历以后，英国人很有可能早已得知我要秘密访问阿什哈巴德了。果真是那样的话，就要设想他们会来绑架我。我们采取了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在沿边境的一些地方，我遇到了从英国军队开小差过来的小股印度士兵。他们大多是帕坦人，满腔热情地想到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去为哈里发运动而战。有些逃兵参加了巴库大会，但不能再向前走了。然而，那些人的经历并没有使留下来的伊斯兰教十字军战士的热劲稍衰。我和他们谈过几次话后，发现有少数人确实还是听得进道理的。他们答应要劝说他们的同志更加重视祖国的解放事业。

回到塔什干，我提议招募英印部队的逃兵，把他们编成一支有几个分队的非正规军，作为红军的辅助部队。它将在克

拉斯诺伏斯克—麦尔夫^①那一段外里海铁路线上巡逻，为驱逐英国侵略军的大规模进攻做好准备。这样，我们已向建立解放印度的核心部队前进了一步。

正当此时，我们得到的报告说，一大批印度穆哈吉尔^②步行越过了阿富汗，但在进入布哈拉时被土库曼叛军抓了起来。关于他们的人数，传说不一——少者二百，多达五千。根据来自喀布尔的新闻报道和电讯，总共不下三万人离开了印度，其中大部分是受了阿富汗政府布告的诱惑，布告说，阿富汗政府将无偿地分给他们土地和其他东西，以帮助他们能在一个独立的伊斯兰教国家定居下来。可是随后的消息说，阿富汗那个诺言并没有兑现。于是，印度的穆斯林移民打算前往土耳其，一部分人准备向北去俄国。假若以那些报道为根据，来到布哈拉的印度人很可能是一大批，适当的估计是约近两千人。即使如此，这对于计划中的解放军也是相当可观的增援了。

在此期间，我们继续进行原来的计划，即建立一支由来自英国部队的印度逃兵、波斯革命者和俄国共产主义者共同组成的非正规部队。这是红军的第一个国际旅，这个尝试是成功的。帕坦人由于具有在沙漠地带作战的丰富经验和天生的毅力，所以在训练使用较大而较好的武器时，效果良好。在英国部队中，这些武器是从不放心交给他们使用的。手里有支步枪便令人生畏的帕坦人，很快又学会了使用机枪和大炮。他们用机枪武装起来，分成小队如此频繁地在马什哈德—阿什哈巴德公路伏击英印部队，使得敌人不久就放弃了沿波斯边境设

① 麦尔夫 (Merve)，即马里。——译者

② 穆哈吉尔 (Muhajir)，伊斯兰教朝圣者。——译者

立的哨所。国际旅中的波斯人小队采用各种化装办法深入他们的国土，并在马什哈德以南的公路上骚扰英国军队的侧翼。

最初，印度支队是由内战期间长期打过游击战的俄国人指挥的。不久，一些印度人被提升为军官。这种经历在精神上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它使饱经风霜的印度士兵变成了新人，成为干练而自豪的军官。有关他们的经历的消息不可能不传到还留在英国部队里的他们的同伴那里，这就起了瓦解敌军的作用。逃兵的数目与日俱增，国际旅很快就成为一支强有力的红军辅助部队了。不但克拉斯诺伏斯克—麦尔夫铁路不再受到威胁，高加索的石油可以畅行无阻地运到中亚；而且英军在马什哈德的基地也终于陷入了危险的境地，从四面八方不断地受到游击队的威胁。另外，波斯人的革命宣传使附近的老百姓对外来侵略者充满了敌意，以致侵略军即使出高价也不能在当地获得粮食。游击队处处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在漫长的基达—马什哈德公路上扰乱侵略者的运输。不到一年的工夫，英印部队就撤离了马什哈德，英国人在波斯霍腊散全省的影响也就被清除了。

布哈拉虽然已被革命从沙皇统治下解放了出来，但它依然是使土耳其斯坦苏维埃共和国烦恼的根源。这里成了英国人阴谋反对中亚新政权的温床。在中世纪初期，伊斯兰教文化作为一种进步力量，曾受到布哈拉宫廷的保护。这一历史悠久的传统现在却被利用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一些上层伊玛目^①联名向中亚的所有阿訇发出呼吁，要他们参加在布哈

^① 伊玛目 (Imam)，某些伊斯兰教国家元首的称号或指伊斯兰教教长。
——译者

拉宫廷支持下召开的一个会议，来筹划对那些倡议分配土地给农民、借以诱惑伊斯兰教忠实信徒的布尔什维克异教徒进行一场圣战。然而，事情很明显，要推翻新政权是不容易的，因为它获得了群众的支持。只有大地主和上层阿訇那一小撮人才对新政权怀有敌意。像法国大革命时期一样，当旧秩序看来注定要垮台时，甚至同人民生活在一起的下层僧侣也参加了人民的起义。不过，那些伊斯兰教的卫护者们认识到，除非搞武装叛乱，圣战不可能取得成功。英国人被赶出霍腊散以后，就把他们对中亚进行军事行动的基地移到了奇特拉尔和吉尔吉特。首批足以鼓励那些有可能成为叛乱者的人的军火，就是从这两个地方经过多山的费尔干纳运进布哈拉的。

在 20 世纪初叶，印度副王寇松勋爵曾经力图对抗俄国在波斯、阿富汗和中亚的影响。二十年后，他做了英国外交大臣，俄国的幽灵依然缠着他，尽管那时俄国帝国主义已被工农共和国取代，工农共和国并不打算征服而是准备解放毗邻的亚洲国家。正像早先的皮特^①一样，寇松之流的帝国主义死硬派当然领悟不了这种变化的意义。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呼声是阻挡不住的。在英国人的怂恿下组织一次反对中亚新政权的暴乱阴谋终于破产了。群众是骗不了的。一边是面包、土地与和平，另一边是教士的祝福和到天堂去领赏的诺言，他们选择了前者。

然而，谁也无法预测宗教狂热可能产生的危险后果。如果不采取对策把阴谋的幼芽掐掉，群众就可能被信仰上的魅

^① 皮特 (Pitt) 指威廉·皮特 (William Pitt, 1759—1806)，曾任英国首相。——译者

力所动摇。我们已经认识到：布哈拉的解放是保证中亚新政权的安全和巩固世界上那个偏僻地区的革命的先决条件。

59. 反革命阴谋 和恩维尔帕夏的下场

中亚最后的一个反动堡垒不祥事态的发展并没出人意料之外。英国和阿富汗政府一直在搞阴谋活动。恩维尔帕夏的登场更促进了那一事态的发展。虽然他自己没有去喀布尔，他的代理人却成功地影响了阿曼纽拉国王。他们使国王相信，不要很久，伊斯兰教领袖凭他的军事天才就会在东土耳其斯坦募集一支强大的军队。国王既然失去了英国的保护，就得有一个新的盟友。这个盟友必须在布尔什维克党人与伊斯兰教卫教者之间进行选择。阿富汗国王毕竟是一个穆斯林，他没有选错，特别是考虑到恩维尔帕夏的密使曾答应他说，只要他参加拯救伊斯兰教的中亚的合谋，他就可以同英国人言归于好。

尽管俄国人对于这个密谋并非一无所知，他们却无意促使局势激化。废黜布哈拉的埃米尔并不费多大力气。恩维尔帕夏还只是搞搞阴谋，那是建造空中楼阁，成不了什么事。英国人还根本无力进行积极的干预。从政治上的考虑，布尔什维克党人也不愿马上动手。他们相信，只要运用巧妙的外交手段和迂回的政治策略把反动头目孤立起来，泛伊斯兰主义

就可以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反英运动。无论如何，决不能低估激怒伊斯兰世界的危险。布哈拉与中亚其他地方不同，它是伊斯兰教文化的传统发祥地。以共和政府代替埃米尔将不会遇到什么抵抗，因为共和政府可能获得群众的支持。但是那样一来，邻近的穆斯林国家会有什么反响呢？

共产国际土耳其斯坦局的一次会议曾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我极力主张不能无限期地推迟行动，要准备应变。如果允许敌人继续使用布哈拉广阔的领土作为他们宣传攻势的基地，谁也不能肯定整个中亚的容易上当的群众不对新政权产生反感。至于泛伊斯兰运动的革命作用，我对它一直十分怀疑。土耳其斯坦局中我的俄国同事们都是些严守党纪的党员。认为泛伊斯兰主义可能是革命的盟友，这是官方的政策。列宁在听了我的观点以后，确实有些动摇。但是只要莫斯科没有下达新的指示，原有的政策就依然有效。然而，我坚持主张必须弄清在场的其他负责同志的意见，并向莫斯科提出一份新的报告。任何政策都不可能永远不变嘛。我们必须时时进行调整，使之适应形势的需要。我们可能失去邻近穆斯林国家群众的同情，但不能因为怕冒这个风险便对近在眼前的危险漠然置之。

在一次较大的会议上，两种不同的意见愈加旗鼓相当。所有当地的共产党（非俄罗斯的）领导人都赞同我的意见。他们都是新共和国的政府成员。一些俄国人也站在我们这一边。会议决定要我去试探一下布哈拉和阿富汗政府的态度。我准备要求布哈拉政府许可我们派一支红军分队前去营救被土库曼人扣押的印度穆哈吉尔。营救部队必须经过布哈拉前往阿

富汗边界。我还打算向阿富汗大使询问——最好是当着恩维尔帕夏的面——他是否接到有关我携带军事装备和人员通过阿富汗领土的指示。这些装备和人员是用来在印度边境附近为解放军建立一个军事行动基地的。

我邀请阿富汗大使和他的比较重要的随从人员出席一次外交宴会。我到塔什干以来，我所居住的房子已经收拾得比较适宜于居住了，但还是很不适于举行节日的或正式的宴会。只要是稍微暗示一下，那些阿富汗人本来就会举行那样宴会的。他们没有什么抛头露面的机会，因此要抓住一切机会向当地居民摆阔气，来和革命新政权的贫困与简朴进行对比。大概他们希望偶尔显示一下那种悬殊状态便能散布对新政权的不满吧。

塔什干一座最豪华的旅馆，已经拨给阿富汗大使馆作馆址。他们得到各种特殊待遇。只有食品是例外，因为那时食品奇缺。那个旅馆位于塔什干城最时髦最高贵的地区。过去那里几乎清一色地住着俄国官吏和殖民资产阶级。革命后，那些人都跑掉了，他们在那个殖民地首府独占的区域已人去楼空。为了浮华奢侈生活而建造的房屋是不适于其他用场的；而最上层的土耳其斯坦人住在那种房子里也觉得不自在。他们自有另一种奢华和舒适的标准。阿富汗人自然喜欢东方风格，但是他们觉得随便享用旅馆里富于异国情调的设备也是自己的外交特权。他们想哗众取宠，却是徒然。政府当局考虑得很周到，他们劝说老百姓不要过于接近外交使团的客人。恩维尔帕夏作为国宾住在阿富汗大使馆，他欣然接受了邀请。

我的俄国同事们提出建议要以东方方式慷慨地款待客

人。我不同意这个意见，而坚持主张不应抛弃我们通常的革命简朴作风。在食品的质量和做法上做了些让步；自从我住到这幢房子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使用餐厅。这间高大而宽敞的房间活象个冷藏库。屋里一冬也没生过火。除非把修在厚墙里的巨大的瓷砖壁炉烧上三两天，屋里是呆不了人的，而那又需要好几大车宝贵的燃料。燃料运到了，为了举行外交宴会，屋子烧得热乎乎的。那些老式的炉子生了火，瓷砖和厚墙便可以将热量贮存上几天。可以说，全幢房子里的人都感激沾了外交宴会的光。

在东方外交活动中，谈话不能开门见山。在饭后谈话时，我问恩维尔帕夏他的计划进行得怎样了，借此把话题引到了我所希望的方向。恩维尔帕夏说，计划进行得很顺利；他过几天可能就要去喀布尔了。这真没有想到，可是他不肯再往下讲了。现在正是提出那个微妙问题的好机会，我该谈谈我的计划中的阿富汗首都之行了。又有一个没有想到的事情：大使说他已经接到喀布尔的指示了。他的政府将乐于欢迎我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客人，并将为解放印度的事业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为了免除我一路上带着完成使命所需物品的麻烦，阿富汗政府建议我把那些东西委托给驻塔什干的阿富汗大使馆，他们将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再把那些东西交给我。这个建议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一旦我到了阿富汗，我就只有完全听凭那个国家的政府的摆布了。这个令人震惊的建议的论据是，如果允许印度革命者通过阿富汗领土输送武器和军费，那么喀布尔同英属印度政府的外交关系将会紧张起来。这番话也许有些道理；可是，在另一方面，怎样才能保证把俄国人

给予的武器在印度边界上交给我呢？如果不能交给我，我就一点办法也没有。同时，我也不好断然拒绝这个显然是骗人的建议。那样做就等于怀疑阿富汗政府的善意了。外交关系还是必须维持的。于是我们便大谈友好，嘻嘻哈哈一阵，然后分手。我在近期内去阿富汗显然已毫无意义，在那里为印度解放军建立基地的希望是很渺茫的。

事态发展得很快。几天后，有消息说布哈拉的埃米尔带着几个随员秘密地离开他的首都逃往费尔干纳去了。差不多与此同时，恩维尔帕夏也销声匿迹了。根据驻喀布尔的苏俄使馆报告，阿富汗政府已经很有礼貌地要求一些印度革命者离开那个国家了。他们是在第三次阿富汗战争时，为鼓动部落居民反对英国人而来到印阿边境的。后来由于无法返回祖国，他们从那时以来便一直住在喀布尔。这些印度人当中有一些人参加过1916年成立的印度临时政府。驱逐这些朋友和政治避难者的命令，是出于外交上的考虑。喀布尔急于要同新德里恢复友好关系。

这些不祥事件几乎同时发生，证明敌人由于某种原因决定要使局势激化。这是一个时机不够成熟的决定，因为他们的地位还很虚弱。可是，我们却被迫提前行动了。红军向布哈拉挺进，并在那里建立了革命政府，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埃米尔既然外逃，国家便没有合法的政府了。这个真空必须填补起来。很显然，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有权利和责任一定不使中亚的大部分地区陷入无政府状态，否则必然会鼓励土库曼叛乱者长驱直入。埃米尔的仓皇外逃和恩维尔帕夏的神秘失踪，很清楚地表明了他们计划利用难于进入的费尔干纳山区

作为军事行动的基地和受英国人支持的那个反革命政府的所在地。同样明显的是，喀布尔也是那个计划的积极参与者。

占领布哈拉的首都和布哈拉西部平原是很容易的。可是要粉碎费尔干纳地区的抵抗，却必须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那是因为费尔干纳同阿富汗有将近二百英里长的共同边境，而且从吉特拉尔和吉尔吉特两处英国人的前哨阵地向这里进军也很容易。土库曼人是些骠悍的战士，装备与供应也十分良好。红军出动了两个纵队进行攻击，一个从布哈拉平原向东推进，另一个从东土耳其斯坦边境的安集延南下。后者是翻越高山隘口从侧面攻击的行动。当正面的进攻把叛乱者击退很远时，另一纵队猛袭了离印度边境只有几英里的敌人主要基地。我们在帕米尔高原上插上了红旗以庆祝这场艰巨的战役的胜利。我站在“世界屋脊”上，用望远镜隔着阿富汗一块狭长地带眺望印度。这块地带证明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猛攻叛军最后一个堡垒之后，我们在战场上发现了恩维尔帕夏的尸体。他穿着一身英国军官的制服。

60. 不流血的革命

布哈拉的埃米尔宫廷的反革命阴谋不是突然发现的。我们不断地收到情报；但是没有立即采取预防行动，因为俄国共产党人不愿做出有可能激起穆斯林各国反对苏俄舆论的任何事情。

布哈拉曾经是沙俄帝国的一部分。俄国革命后不久，即获准独立。这一步骤在伊斯兰教国家自然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俄国人不打算由于采取卤莽行动而浪费掉这一道义上的财富。从中世纪初叶起，布哈拉就是伊斯兰教文化的主要中心之一。布哈拉的埃米尔都自称是统治巴格达的先知者后裔的传统继承人。据说英国人曾有意承认这种权利。果真如此，那么野心勃勃的阿富汗阿曼纽拉国王就会反对承认布哈拉埃米尔为伊斯兰教世界的首领。于是，英国的外交活动不得不放慢步伐。要想捣毁布哈拉的反革命巢穴，俄国必须进行武装干涉。布哈拉本身还没有一个革命政党可以在援助下推翻旧政权，建立革命政府。

事实上，布哈拉还没有共产党人所期望的那种革命的社会基础。这个国家的工业极端落后，因此还没有可以组织和鼓动起来造反的工人阶级。农民也非常落后，完全处在阿訇的影响之下。按现代意义来说的资产阶级也还完全不存在。在布哈拉和其他几个小集市城镇里有一小部分商人阶层。显然，要使反对封建僧侣旧制度的革命看来像土生土长的自发运动，就得发动那个商人阶层充当革命的先驱。

我们一方面排除了以俄国军事干涉形式出现的任何预防行动，同时对于英国人和阿富汗人利用布哈拉为中心来煽动整个中亚的反动阶级反抗新秩序的危险也不能袖手旁观。针对俄国人过度地注意伊斯兰教徒情绪的那种似乎不无道理的做法，我指出，如果反革命势力在中亚得势，那里的穆斯林群众便会成为牺牲品。地主就会回来照旧剥削农民，狂热的阿訇就会恢复他们对群众文化生活的统治。我争辩说，这些

道理可以向伊斯兰教世界讲清楚，目的在于使他们明白，俄国迟早要在布哈拉进行的干涉是有道理的。革命的目的不是要废黜埃米尔，而是要保护整个中亚的伊斯兰教群众，防止封建统治阶级复辟的可能性。

其实，我们并没有把埃米尔看作是一个危险的人物。我们也不担心他那腐朽的朝廷会有什么了不起的行动。因此当听到埃米尔马上就要离开他的首都的消息时，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去拦阻他。把埃米尔和他那为数不多的随从人员一起扣留起来本是轻而易举的事，但这种做法没有什么用处。相反地，却有可能激怒伊斯兰教世界的情绪，因为埃米尔被认为是宗教的首领。把他和他的随从关押起来也没有什么意义，杀死那个无依无靠的老头子则是毫无道理的残酷行为。因此，我们还是听任他随便到哪里去吧。

由于我们充分认识到对布哈拉迟早总要有所行动，于是就在共产国际土耳其斯坦局的赞助下，在塔什干建立了布哈拉革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除了在布哈拉人中间进行宣传外，还要同布哈拉城以及其他城镇的商业团体取得联系。我们可以使商人阶层明白，将农民从封建统治下解放出来对他们是没有害处的。实际上，封建制度对商业设置了各种各样的限制。除了对埃米尔这个半宗教的人物在感情上怀有忠诚以外，并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会使商人阶层对抗革命运动。而当埃米尔逃往国外，擅离职守，不去保护王国及其臣民时，这种感情上的纽带也就断了。

革命委员会还要在广大农民中进行宣传，告诉他们，假如在英国人和阿富汗人的帮助下，中亚的这个新政权被推翻了，

地主就会卷土重来，夺回革命给予他们的土地。他们得在从未替他们办过一点好事的旧制度和革命的礼物之间作出选择；换句话说，就是要在埃米尔和革命所给予他们的土地之间作出选择。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们相信农民不会选错。然而，他们的确是愚昧无知的，因此，他们会很容易受阿訇的煽动而胡来一阵。我们适当地考虑了这种危险的可能性，并劝告布哈拉革命委员会不要作出任何会触犯群众宗教情感的事。想到法国大革命的经验，我们极力分化阿訇，把较贫穷的阿訇争取到革命一边来。怀着这一目的，我仔细研究了可兰经和其他伊斯兰教神学的经典著作。在公众集会上，我能够根据圣书的权威来论证革命的正义性。

我们原打算让布哈拉革命委员会在民选政府成立之前，作为一个临时政府接管政权，但在这个委员会的组成人选问题上却出现了一些困难。在塔什干的布哈拉商人中很少有人受过教育。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必须经历初等教育的严格考验，然后才能懂得他们使命的涵义是什么。幸好我们发现了一个名叫法伊祖拉赫·卡扎耶夫的年轻人。他是个富裕商人的儿子，曾远游彼得格勒学习新闻专业。他显然是个很有抱负的人，因为他不愿在他父亲的店铺里虚度年华，一心只想为自己的生活闯出一条新路。他的雄心是建立在相当程度的教育和才智之上的，这是好的。只是他年纪太轻了。在信仰伊斯兰教的东方，没有蓄着长胡子的人是不会受到尊敬的。可是法伊祖拉赫不但没有白胡子，而且根本就不想蓄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设法使他当选为布哈拉革命委员会的主席。他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而在布哈拉由于埃米尔及其随从外逃

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几个月之前，革命委员会就已开始行使职权了。

革命委员会同布哈拉各城镇的商人中的青年人建立了联系。他们中间有些人到塔什干来接受训练，将成为宣传者和鼓动者。我们通过他们向全国传播一个消息：在适当的时候，将召开建立人民政府的会议，希望商人团体派代表参加。分享革命果实的前景使商人阶层倒向我们一边，而且当他们知道有俄国人做靠山时，他们的胆小怕事的本性便消失了。

埃米尔逃跑的消息传来以后，共产国际土耳其斯坦局和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政府就召开了联席会议，研究形势，并计划立即采取行动。会议作出了决定，认为不能再停步不前了，必须建立新的政府来填补布哈拉的政治真空。具体地说，会议决定：布哈拉革命委员会应立即前往布哈拉城，召开计划中的人民代表会议，宣布旧政权的结束和人民政府的成立。我准备以顾问的身份随同革命委员会到布哈拉城去，并将在临时政府成立时也充当顾问。为了把事情办得万无一失，并作为预防突然袭击的措施，决定派一支由伏龙芝亲自指挥的红军小分队，紧跟在布哈拉革命委员会的后面，当时伏龙芝已代替索科尔尼科夫担任土耳其斯坦前线司令。

我们在一片兴奋与混乱的气氛中到达布哈拉；但那里并没有任何严重反抗的迹象。革命委员会一到，就立即邀请人民代表在几天之内参加会议。会议召开之前，革命委员会宣布它自己为临时政府并执掌政权。新政府的宗旨、目标和纲领都印成巨幅标语，张贴在城墙上。埃米尔早已叛国逃走，从而丧失了要求人民效忠于他的权利；封建地主的土地要没收，

分给农民；埃米尔的大量的私人财产被宣布收归国有，并将作为信托财产交由大伊玛目掌管。

在答应保护并增进被蹂躏的群众的利益，并向其他居民再三保证他们不会无端受到侵扰之后，临时政府的宣言进而解释为什么俄国军队进驻这里：俄国军队是应布哈拉革命委员会的邀请，来保护新成立的政府，以免遭受一切可能发生的危险的，而且一旦新政府得到人民的批准而掌握了政权，他们马上就会撤走。事实上，几天以后，伏龙芝和大部分士兵就从埃米尔的金库中取走全部黄金，返回塔什干去了。可是这个消息却被严密封锁着。

事先准备好的代表会议在指定日期召开了。代表中有少数几个宗教人士，但没有提出什么反对的意见。不过有人窃窃私议，说布尔什维克是不信真主的。人们普遍担心在新政权下宗教会受到迫害。为了应付这种局面，并保证临时政府人员一致当选，必须有所行动。在会议上讲话时，法伊祖拉赫·卡扎耶夫以真主和他的先知的名义发誓说，他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仍然和其他人一样，是个虔诚的穆斯林。他还对听众一再保证，俄国人并不打算在布哈拉建立一个共产主义政权。最后他号召组织布哈拉人民革命党，这个党的目标就是保卫俄国革命给予布哈拉人民的主权和独立。他暗示了外国干涉的危险，并提及埃米尔宫廷的反革命阴谋，从而讲清了道理。他的讲话博得了热烈的欢呼。会议结束时，好几百人抢着登记参加新政党。

正在这时，伊玛目在大清真寺塔楼上呼唤教徒们去做礼拜。这时情况有些紧张，因为绝大部分听众都急于去参加祈

祷，但是他们又拿不准这样做是不是符合新政党的纲领。我感到这是一个紧要关头，它可能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于是我就问会议主席法伊祖拉赫，我是否可以讲几句话。他欣然同意，并宣布说，有位印度朋友为了这个盛大的日子曾帮助他进行筹备工作，今天出席了会议，并愿意跟大家讲几句话。当我站起来时，会场上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我站起来不是要发表演说，而是要提出一个简单的建议。这个建议扭转了形势，保证了布哈拉革命的未来。我的建议是，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穷苦人民，与任何宗教都没有冲突。为了证明这一点，可以让会议暂停，以便所有与会者都能去做礼拜。然而我不得不说，请大家原谅我，我不能去做礼拜，因为我不是穆斯林。

会议结束时，选出了人民代表苏维埃(代表会议)。新政府将对这个苏维埃负责。会议以口头表决方式推举法伊祖拉赫为新诞生的共和国的主席，并委托他组织政府。法伊祖拉赫成了当时的英雄。

61. 革命革到后宫

若是没有恩维尔帕夏野心勃勃的冒险活动和埃米尔的仓皇出逃，布哈拉革命也许会是完全不流血的。土库曼人在多山的费尔干纳地区的叛乱虽然表面上是为了保卫埃米尔，但在布哈拉的广阔平原上却毫无反响。农民依然象往常一样安安静静种地，商人也还是太太平平地经营着赚钱的生意。由

于这两个阶级占布哈拉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新政府没费什么力气就控制了局面。我在那里暂时没有很多事情可做了。但在我离开之前，发生了一出悲喜剧，这也可以算是那个中世纪王国革命的一个最壮观的方面吧。

按照传统，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可以娶妻子多达四人。但埃米尔不是平凡的人，他是宗教之王。因此他把经文谕示稍加引伸，他的妻子就可以比传统许可的数目多出许多倍了。他的后宫里拥有大约四百名的妻妾。埃米尔一走，她们都成了无依无靠的人，无论如何，再没有任何理由留在那儿了。但是她们又无处可去，同时也并不急于自动离开那个安乐窝。这倒成了新政府一大难题。按照她们惯常的奢糜生活来供养这四百个寄生虫，开销就太大了。新政府也不愿意这样浪费从人民手里收来的金钱。

可是怎样处理后宫的这些妇女呢？法伊祖拉赫向我征询意见。我也感到问题有些棘手。我建议说，应当告诉她们：革命已经把她们从后宫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了，她们去哪里、干什么，都可以各随己意。但是她们不愿抛弃有保证的安逸的奴隶生活，而到那根本没有她们的位置的未知世界里去享受那靠不住的自由幸福。

这事显然需要采取果敢的措施。我建议革命政府发表文告，宣布解散埃米尔的后宫，释放宫中妇女。她们有权出宫，如果愿意，还可以再嫁。我感到这个文告对士兵们将是一种诱惑，因为后宫那些妇女都很漂亮，而且大部分是年轻的。文告还声明：任何想娶埃米尔后宫的妇女为妻并安家立业的士兵，均可授予一份土地和若干现金，以便从事耕种。可是那

些被遗弃的穆斯林贵妇偏偏不肯离开她们的养尊处优的小天地。

我们决定采取激烈手段来打破僵局。凡响应文告号召的士兵都可以进入后宫挑选自己的妻子，只是不准逞凶，不准胡闹。他们在严密的警戒下闯入了后宫，并未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那些穆斯林贵妇自然有如受惊的兔子，但这帮体强力壮的小伙子前来争夺她们的情景，想必给她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个年迈的老头子自然不能满足那些妇女性生活方面的要求；当这群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争讨她们的欢心时，这对于她们确实是一番新鲜的经历。最后是皆大欢喜——这些与世隔绝的女子心甘情愿地听凭高兴的丈夫将她们领走了。俄罗斯士兵也参加了抢夺，而且夺走了战利品的大部分。

后宫人去楼空以后，我想到埃米尔宫去看看。后宫的外观和内景形成鲜明的对比。从外表看，它活象一个土堡；里面的房间则象一些半山腰的岩洞。这些房间都只有一个入口，而没有窗子。但每一个房间里的陈设都很华丽。主要的陈设是地毯。那些被解放的贵妇当然不会留下衣服和珠宝等任何私人财产。但埃米尔却无法将他个人所有的财富随身带走。墙上挂着很多绸袍。其中一件很合我意。那是一件长袍子，身高六英尺的人穿上也要拖到脚踝骨，料子是极好的手织丝绸，上面有五颜六色的条纹。正当我称赞那件袍子的时候，引导我游宫的法伊祖拉赫便把它取下来，披到我的肩上。我刚要推辞，他就说：“总算给穷苦人劳动生产的这件宝贵的衣服找到了受之无愧的主人了！”然后他又开玩笑说：“这将对你的报酬，是布哈拉共和国赠送给你的礼品。”我不好拒绝；

走出宫时就披着那件袍子。

宫外有一大群人在等候，他们聚在那里围观这幕遣散埃米尔后宫妻妾的悲喜剧。其中有些爱挑刺的人希望看到政府官员及其顾问领着美貌超群的贵妇走出宫来。然而他们看到的唯一赏心悦目的场面，就是我自己披着原来埃米尔的华丽绸袍。法伊祖拉赫似乎觉得我获得这个报酬应该得到人民的同意，因此便发表了简短的讲话，说为了酬答这位印度同志对布哈拉人民解放事业作出的宝贵贡献，共和国政府把这件长袍赠给他了。我接着说，我要珍视这件宝贵的袍子，不是因为它曾装饰过埃米尔的御体，而是把它作为这个具有古代学术文化之邦的人民对我的深情厚谊的象征。

我抵达布哈拉不久就接到报告说，一批印度革命者被土库曼叛乱分子俘虏了，关押在奥克萨斯河^①上游某地。经调查后，证明消息可靠，并且还进一步了解到被俘的革命者受到土库曼人的极度虐待，如不赶紧营救，确有被杀害或饿死的危险。土库曼叛乱分子在布哈拉各地侵扰，因此营救那批印度俘虏需要一次小规模军事讨伐。幸而伏龙芝那时仍在布哈拉。我同他商量了这件事，决定立即派一支红军小分队乘一艘炮艇开往奥克萨斯河上游。

营救部队马上出发，并顺利到达土库曼人关押那些印度人的地方。他们的处境的确十分悲惨，竟被用很粗的绳子捆绑着，而且几乎快要饿死了，因为土库曼人扔给他们的那一点点粗劣的食物是根本不能吃的。讨伐部队返回布哈拉时，我还留在那里。被救的印度人衣衫褴褛，并且由于长期挨饿，行

^① 奥克萨斯河 (Oxus)，即阿姆河。——译者

动起来都很困难。首先要做的事，就是给他们安排舒适的房子并提供足够的衣食。在他们从那种悲惨的状况中恢复过来以后，我问他们是怎样来到这个国家遥远的地方而被捕的，原因是什么。说来话就长了。

1919年，同国大党联合反抗英帝国主义的印度哈里发委员会，号召印度穆斯林青年离开祖国到土耳其去参加穆斯塔法·基马尔帕夏的军队。这支军队正在为保卫哈里发而抗击英帝国主义。因为那些出国的印度人只有经过阿富汗才能到达土耳其，所以他们同阿富汗政府进行交涉，以求获得许可。阿富汗政府不仅爽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而且还用诱人的声明来鼓励出国的印度人。声明说：为保卫哈里发而去战斗的印度人，如果愿意在阿富汗定居的话，都可以免费得到土地。穆哈吉尔(为了宗教而出境的移民)的确切人数始终没弄清楚，据说在五万至十万之间。他们去参拜圣地的路线不仅要穿过阿富汗，而且还要横越波斯。但是消息传到印度说，俄国布尔什维克人对于为争取独立而战斗的亚洲人民十分友好，并愿对他们提供援助。因此，印度穆哈吉尔的计划是取道阿富汗前往俄国，再借布尔什维克人的帮助，从那里继续前进。为了弄清是否可以真正得到期望中的援助，某些出国移民领导人便同俄国驻喀布尔大使馆进行联系。这一举动似乎惹恼了阿富汗政府，而且引起了它的怀疑。此后穆哈吉尔便失去了行动自由，并且几乎是被送进了集中营。他们提出请求说，假使他们不能够到土耳其去，根据阿富汗政府的声明，就应当允许他们在阿富汗定居下来。但这个要求也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他们四外无援，处于绝望的境地。其中一些大胆的人

便起来反抗,决心不顾阿富汗政府的命令,继续向俄国边境前进。这是个大胆而冒险的行动。

他们要步行一百五十多英里,翻越兴都库什山的崇山峻岭。在行程最后的一段,前往一个常有过往行人的边境站时,他们迷了路。但是他们知道俄国边境就在北方不远,便穿过荒野继续前进,一直来到奥克萨斯河;这条河就是阿富汗与布哈拉的分界。阿富汗政府已经欺骗了他们。但布哈拉是个伊斯兰教国家,他们直接对付的土库曼人也是穆斯林。可是等待着他们的是另一次幻想的破灭。当他们向土库曼人打听到俄国去的道路时,他们被带到奥克萨斯河上游森林中的一片空旷场地上被扣留起来了。这是一次可怕的经历,但他们的宗教狂热使他们苦撑下来。对于我们营救他们,他们并不十分感激。

我们告诉他们,布哈拉已经建立了一个新政府。这个政府对他们是十分友好的,他们愿意在那里呆多久都可以。然而他们坚持要求立即把他们送到土耳其。这是一伙性情倔强的人,只受宗教狂热的支配;其实这股热劲早该被他们自己的经历打消了。他们之中有几个是受过一些教育的年轻人。我把他们领到一边,告诉他们:到土耳其去,一点用处也没有。因为穆斯塔法·基马尔有他自己的军队,加进几个未受过军事训练的印度人,并没有多大用处。我劝他们别好高骛远了,就在中亚定居下来,接受政治和军事训练,以便将来在印度从事革命活动吧。

他们中的多数人对于接受政治教育不感兴趣,他们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了,还有什么东西好学呢?但军事训练却有吸

引力。我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和他們联系之处了，因此就答应給他們安排军事训练，如果他們跟我一起去塔什干的話。这伙被营救的印度人总共有七十多名；其中同意去塔什干的有五十人左右。他們大都是只受过几年教育的年轻人。其余的则都是些未受教育的农民和城市贱民。这部分人或是受阿富汗政府骗人的提议所诱惑，或是被所谓在圣战中牺牲后就可能升天的说法吸引来的。然而他們都有无限的宗教狂热，左劝右劝都不能说服他們。他們仍然坚持要求把他們送到土耳其。因为别无他法，我只得把他們送到巴库去，他們从那儿可以继续前往安纳托利亚。我便同那些比较通情达理的人一起到塔什干去了。

在这些穆哈吉尔中有个孤独的印度教信徒。他的出现自然引起了我的好奇，而他的旅伴则对他抱有怀疑。他居然沒有成为宗教狂热的牺牲品，这是出人意外的。看来使他得免于难的是他那善良的仪容和沉靜的举止。我发现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是贝拿勒斯印度大学的硕士。总之人們都称他为某某博士(我已记不清他的名字了)。我很想探听出他加入穆哈吉尔的原因。他沉默寡言，不想回答我的追问。他很愿意陪我同去塔什干，虽然他从未表明对军事训练感到任何兴趣。最后，他向我透露说，他是带着某些著名印度领导人委托給他的重要使命来到这里的。但他对他的任务的内容却只字不提。他说他必須去莫斯科亲自把任务告诉列宁。我对他讲，除非我知道他的使命的性质，我不能送他去莫斯科。看来他是听天由命了，他说，那么他就留在塔什干等待时机吧。

过了一些日子，此人越来越难弄了，他威胁说，要徒步去

莫斯科。他不认识路，但他可以沿着铁路线走。显然，他有些精神失常了。因此，我决定把他送到莫斯科，不管他在那儿会遇到什么事情。后来他果然到了莫斯科，被安置在一所住有各种旅客的宾馆里，以后便被人遗忘了。过了一些时候，他就失踪了。据说有人在通往土耳其斯坦的铁路线上发现了他的尸体。很可能，这个可怜的家伙是因绝望而自杀的。这是个悲惨的故事，但我对他也是无能为力。我回到莫斯科的时候，他还呆在那里，并且大发牢骚，说列宁还未接见他。他对俄国人的诚意产生了怀疑。我还是那句话，如果我不知道他的使命的性质，我不能请求列宁接见他。大概由于绝望了，他终于吐露了他的秘密。他的神经极不正常，这点我是很清楚的，因此便决定不把他的秘密告诉别人。他的话牵涉到一些重要的印度领导人。他说，他们派遣他到莫斯科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对印度革命的军事援助。为了旅行的方便，他利用了哈里发移民这个机会。他的话是不可信的，因为那个特别有关的领导人是一个不相信武装革命的稳健派。

62. 真主的部队

那些极度贫穷的为了宗教而流亡在外的印度人被带到了塔什干。在那里要想解决他们的衣食住问题可不容易。在新成立的土耳其斯坦共和国首都，各种物资都很缺乏。第一件麻烦事情就是要找一所可以安置五十多人的房子。接到印度

“同志”到来的消息后，共产国际土耳其斯坦局在土耳其斯坦政府的帮助下，找到了一所合适的房子。这个城市新区的房子都不够大。给印度移民准备的房子位于新区和老区之间。这是一所平房，包括许多形状不同、大小不一的房间。当时仍是冬季。早在布哈拉就给印度流亡者发了冬衣。每人一套红军士兵军装。那棕色长大衣相当暖和。不过，还要想法解决房间取暖问题，至少还得生火一个月左右。当时在各种物资中燃料奇缺，而供给一所大房子取暖则需要大量的燃料。要取得燃料，必须取得政府的特别许可证，而职位低于供应人民委员的官员是不能签发这种许可证的，必须去和那时显要的官员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打交道。我想亲自去见他，以便保证尽快得到购买这种稀罕物资的许可证。但我的秘书兼译员——一个曾经长期在美国居住过的俄籍犹太人——觉得这样做法不太合适。就职级而言，我的地位比供应人民委员还高。我的秘书说，我写一封信就行了，他可以带着信去联系。我要他用俄文起草这封信，他于是写了一封使人心酸的信件，尽力描绘了印度同志的悲惨处境，信中并且说，如果那所房子不予以适当的保暖，他们可就要冻坏了。我问他有没有必要写这些东西，他回答说，“有必要，要写得带点感情才能打动人民委员。”

秘书拿着他起草的信走了，不到两小时就拿着许可证胜利归来，不但批准了供应燃料，而且还批准给每个印度同志一双“瓦尔尼基”（俄国人冬季穿的高筒厚毡靴）。他还捎来供应人民委员的口信说，为了使印度同志舒适一些，还可以供给一切必需品，还说，只要我给他打个电话，要什么东西马上就可

以送到。

沒多久就运来了两卡车木材，屋子里好几个高高的白瓷砖炉子都生上了火。紧接着发生了一场抢占最暖和的房间的爭吵。我预料许多类似的难题将会接踵而来，便建议从流亡者当中挑选三人组成房屋委员会，负责监督房间的分配并为大家分配食物。在那群流亡者中间有几个是受过相当教育的年轻人。我从中选出了三人，推荐由他们组成宿舍委员会。他们欣然同意了 my 建议，在分配房间时，应优先照顾年老的或者体弱的人。在流亡者当中确实有几位参加过保卫哈里发圣战的白胡子老人。他们在艰苦的旅程中居然能够越过顶峰积雪的兴都库什山而幸存下来，实在是个奇迹。委员会还同意只让那些老人和健康很差的人使用吊床。无论如何，每人都占有一张吊床是不可能的。然而，铺在地板上的大张羊毛地毯却弄到了，因此，大体说来，印度客人还是相当舒服的。

伙食也安排得十分满意——每日有一餐是所谓“肉饭”，其质量并不比我或其他高级党政官员在住所里吃的差。晚餐是“列皮奥什卡”（厚厚的、未经发酵而烤得很好的麦饼，在印度北方叫作“楠”）和荤菜，通常是“沙什利克”（烤羊肉串）。两餐之间，即上午和下午之间，还供给苹果茶加葡萄干（代替糖）。按照东方殷勤待客的标准，这够不上是十分精美的膳食。但在当时沒有人吃得比这更好了，而且这些客人的大部分在国内吃得也并不比这个好。尽管这样，沒多久就有人发牢骚了。除少数受过教育的人以外，其余的人都觉得他们是瞧得起我们才接受了我们的款待的。宿舍委员会替我免除了好多麻烦，我用不着去听那些毫无道理的抱怨和劳而无功

的事情了。实际上，那些人当中有十几名青年是很起作用的。

过了几天，我们不得不提出这一问题的时候到来了：为什么要带领这些印度移民到塔什干来。在布哈拉，他们大部分都希望接受军事训练。他们相信，在塔什干呆不了多久，他们大家就会携带大量武器和金钱被派回国去与英国人作战了。但我们得根据这些新兵的能力决定训练的性质。教会他们打枪，甚至使用一些更复杂的武器，那很容易；满足他们带着武器回国的愿望也并不难。但问题是：他们多数人拿了枪以后要干什么？同谁作战？为什么理想而战？

他们原是抱着为哈里发而战的目的是离开印度的。其中大部分人甚至连民族主义者都不是。不错，他们是反英的，但他们从来没想到英国人被逐出印度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因此我们觉得将多数移民武装起来之前，有必要对他们进行一定程度的初级政治训练。我们的计划不是要使他们改信共产主义，而是希望唤起他们最低限度的政治觉悟。说服他们放弃“哈里发万岁”的口号，转而采用“革命万岁”的口号，这也许比较容易。但他们应当懂得一些革命道理和如何去进行革命。为了这个目的，他们首先应该成为忠实的革命战士。当时我们正在考虑进行一场民族民主革命。但是，如果说那些移民中多数人并不是民族主义者的话，那么可以说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知道民主是什么。

我同那伙人当中少数受过教育的人讨论了这些困难。经过一番劝说，他们同意了我的建议：在训练印度革命战士的军事学校成立之前，印度移民应该先接受一段政治训练。武器是不难搞到的。事实上，我来塔什干时就带了一大批武器。

可是沒有可能把它们往前运到更靠近印度的地方。我们并不要求印度移民成为共产主义者。但是如果耍武装他们，我们就要保证他们的枪口是不会转向我们的。

问题很清楚，我们要想进一步在这些移民中做些有成效的工作，就必须将少数受过教育的人同那些狂热的群众区分开来。因此，我首先极力从政治上教育那少数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大多数人的反应还好，虽然有那么几个人结果证明是极为固执的。我感到极为惊奇的是；有几个受过教育的青年人比其余多数移民更加狂热。说也奇怪，其中一人最后竟然成了一个同样狂热的共产主义者。他现在仍然住在巴基斯坦某地，尽管有人说他已经脱离共产党或者已被开除出党了。他是个有病态的人——怀疑一切，狂信宗教。另外还有一个较为年长的人，他声称和穆罕默德·阿里有过亲密交往。他是一个蓄意捣乱的分子。他凭着他同印度哈里发运动领导人有联系这一事实，博得了那伙人的信任，并能随意操纵他们。他也还活着，据说在巴基斯坦身居很高的地位。

我同少数受过教育的那些人的关系比较亲密，引起了其他的人对我的猜疑和怨恨。前面提到的那两个人中的后一个人，便利用这种情况，暗中散布流言蜚语，说我企图使他们改信共产主义。他们中少数受过教育的人也确实转而相信共产主义了。因此，出现了可怕的骚动，但那捣乱分子是一个十分狡猾的阴谋者，不易识破。有一天，极度紧张的局面发生了：那一天那伙人中的大多数都提出要求，供给他们肉食的羊要当着他们的面宰。他们怀疑有人把穆斯林人不准吃的肉给了他们。这是毫无根据的猜疑，因为当时在土耳其斯坦生猪是

很难得到的。但激动的狂热者们听不进这些话。当宿舍委员会在其他几个受过教育的人的协助下极力进行解释时，那些人便把他们叫作叛教者，如果他们继续进行那样讨厌的活动，就要把他们撵出屋子。这是个难办的局面。把这伙人的大多数都赶到街上去，我也毫不在意，因为他们横竖没有什么用处。但俄国人在对待“印度同志”这个问题上很敏感，他们劝我要有耐心，坚持到底。我回答说，我对这伙蛮不讲理的狂热者再也忍耐不下去了，我不相信再坚持下去会有什么效果，俄国同志听了便建议让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主席——一个穆斯林——访问印度同志的公寓，同他们谈谈。这位主席自己也是个年轻人，身穿西装，没留胡子。不过，他的访问确实起了影响；毕竟他是政府的首脑啊！

访问后，他对我的难处表示同情，并自动提出要帮助我。他也认为这些印度移民多数是没有用处的，并建议我们只挑选少数有培养前途的人，让其余的出去自找生路。理由是，在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里，不劳动者不得食。他提议对那些愿意工作的人给予就业机会。当然，他的建议无法接受，而且必须严加保密。

在此期间，我继续对那少数受过教育的人进行政治训练，把那两个调皮捣蛋的家伙排除在外。为了安抚多数愚昧者，我们允许他们外出逛市场。这是一个冒险的作法，因为当时即使在塔什干，也到处都有敌人的间谍。他们可以利用印度移民的不满情绪，用很少一点钱便能收买他们。不久，我们就发现这样的顾虑不是没有根据的。我已处于十分微妙的境地，我得按照当时俄国对付敌特的办法来对付那些有敌特嫌疑的

人。我的处境之所以微妙，是因为俄国人一点也不肯伤害“印度同志”。

我对少数受过教育的人所做的初步努力所产生的效果，比我预期和要求的更大。他们多数人将他们狂热的忠诚从伊斯兰教转移到共产主义上来了。我丝毫没有对他们谈论过共产主义。我只是告诉他们，把英国人赶出印度之后，如果继之以本国的剥削者代替外国的剥削者，那就算不上是革命。我不得不给他们讲解革命的社会意义：要进行一场有价值的革命，就应该把印度的劳苦大众从他们当前的经济情况下解放出来。他们都是天生的理想主义者，欣然同意了我的见解，并且一下子便作出结论：如果革命是要解放劳苦大众，那么它只能是共产主义革命。当他们中一些人找我商量要申请加入共产党时，我很吃惊。另外一些人则问我为什么不在当地即时建立印度共产党。他们很热情，其用意是很好的。尽管他们当中有些人怀有功利主义的动机，但我还是不能给他们泼冷水。

不久，又有一小批印度人到来，加强了他们原来的那个队伍。这批人在喀布尔时就自称是共产主义者了。这批人的领袖是一个留着花白胡子的年老的毛拉，名叫阿卜杜·拉布，还有一个是印度南部的印度教徒，名叫阿札腊。他们一到这里，就被安排住在移民宿舍里。他们表白了自己的政治信仰，以此来要求特别照顾和种种特权。即使只有几个精明而使人信服的共产党人来帮助我应付相当困难的局面，我也会欢迎的。但是通过交谈之后，我发现阿卜杜·拉布是个骗子，而阿札腊呢，如果说他是个什么的话，那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但

先到的那批移民中少数受过教育的人很容易就受到了阿卜杜·拉布和阿札腊的影响；他们两人煽动了那些人的共产主义狂热。

移民宿舍里一场新危机的后果是：有一些同住一起的人开始公开议论共产主义，甚至说些贬抑他们过去的狂热的话；而其他大部分人现在仍然是那样狂热。人们往往谈着谈着就发生激烈的争吵，甚至互相殴打起来。为了维持秩序和保护少数派，我们不得不在宿舍附近布置一些武装卫兵。另一方面，那些建议组织印度共产党的少数人，由于得到了阿卜杜·拉布和阿札腊一伙人的支持，加强了力量；他们在阿卜杜·拉布和阿札腊一伙人的唆使下，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共产国际土耳其斯坦局申辩自己的理由。我尽力劝说他们，不要那么急。他们应该等返回印度以后再说。我还说，只有几个移民的单位自称共产党，是没有意义的。他们显然感到失望，我也担心这种经历会使他们气馁。我需要他们帮助我管理那些不好管教的多数移民。把那些人撵出去，给他们安排工作，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于是，我便同意了成立共产党的建议。我明知这个组织是徒有其名，虽然它也可以成为最终要组织的一个真正共产党的核心。一个名叫穆罕默德·萨菲克的青年人，他很有才智，而且受过相当教育，他被推选为党的书记。他是跟阿札腊等人一起从喀布尔来的。

共产党是组织起来了。但它应该怎样活动呢？共产党必须在群众中做工作。然而印度却离这儿很远。我们身在塔什干，不能和印度的群众接近。但我指出，在那些移民当中就有印度群众的有代表性的典型。回到印度后，充当先驱的共产

党员要面对群众的政治落后、普遍无知和宗教狂热等问题，因此，共产党员最好先经历一段学徒生活，努力感染这些近在身边、有印度群众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同意了我的意见，并作出了决定，他们应当努力劝说其他移民去听一系列的一般的政治讲话，作为他们进入计划中的军事学校的准备。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要去作那些讲话。除了穆罕默德·萨菲克以外，还有两个人也很有工作能力。一个叫肖卡特·乌斯曼尼。他是印度某大学的毕业生，很有才华。但他是所有那些人当中最狂热的一个，他自始至终坚持自己的主张。由于他在移民中是个公认的虔诚的穆斯林，大家都很乐意听他的讲话，并开始受到他的影响。另一个名叫阿卜杜拉·萨夫达尔。在印度时，他曾教过边境上的英国军官乌尔都语，但他自己几乎不懂英语。因为他是一个以教员为职业的人，所以他的讲话也很成功。乌斯曼尼几年后返回印度，成为共产党的一个重要成员。他是密拉特阴谋案的一个被告。萨夫达尔到了莫斯科，在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毕业，然后又在红色教授学院受到更高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最后他也回到了印度，隐姓埋名地过着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他想重返俄国，因此就又离开了印度。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在移民宿舍发表的讲话的主题是：他们必须尽快返回印度，为印度的解放而斗争。但单凭他们少数几个人，即使有了武器，也还是干不了革命。要革命，他们就必须争取成千成万象他们自己一样的群众。因此，在返回印度之前，他们必须懂得：为了争取群众参加革命，应该向群众讲些什么道理。一旦接受了这种基本训练，他们就可进入军事学校，接受使用各

种武器的训练了。等他们回到印度，赢得许多人对革命的支持时，大量的武器就会运送给他们。

他们自己的几个教友发表的谈话，从未提到“共产主义”一词，也没讲过不尊重宗教的话，从而安定了那些固执的人们的情绪，因此，“印度之家”（当时人们就是这样称呼移民宿舍的）的气氛变得平静了。训练他们使用各种武器的打算，看来是有吸引力了。

此后不久，军事学校成立了。随同我从莫斯科来的一批俄国军官仍在塔什干。组织军校的任务就交给了他们。美国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约翰被任命为军校校长，掌管训练工作。他把军校学员巡视了一番之后，讥讽地说：“我们要训练的不是一支革命的部队，而是一支真主的部队！”

63. 寇松勋爵的梦魇

在塔什干的印度军事学校的成立大会开得很隆重。出席大会的有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高级官员和土耳其斯坦共产党的领导人。根据我们事先达成的协议，俄国人不参加这次大会。采取这一预防措施是由于以下的事实：当时苏维埃政府正在同英国政府就恢复贸易关系问题进行外交谈判，贸易若恢复，苏维埃共和国长期受到的经济封锁就可以结束。寇松勋爵是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他对英帝国的前途是十分敏感的。他担任印度副王以后，“俄国人来到中亚”就象幽灵一样，

一直缠住他缠了多少年。沙皇政府已被新政权取代了，新政权从一开始就宣布了民族自决的原则，并谴责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然而这个事实对于不可一世的尊贵勋爵却是毫无意义。因此，切望结束经济封锁的苏维埃政府不愿去做任何可能破坏对英恢复贸易方面的外交谈判的事情。不过要治疑心病可不容易。年底以前，苏维埃政府收到英国外交大臣的一份咄咄逼人的照会，把塔什干印度军事学校说成是苏联企图侵略英帝国的证据。与英国新建立的经济关系如果破裂，将使重建俄国的艰巨事业受到损害，因此，塔什干印度军事学校必须解散。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对自己的力量和理想充满信心的革命者也不必担心丧失威信。当初若不是一些土耳其斯坦领导人那么年少气盛，局势也许不会这么快就发生变化。在军事学校开学典礼的大会上，他们一些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救世主式的讲话。那是一种革命初期的情绪。这些革命领导人还不懂得要谨慎和策略。“印度同志”受到热烈欢迎，他们被认为是呻吟在殖民主义奴役之下而终于奋起反抗野蛮的英帝国主义的一个伟大民族的代表。俄国布尔什维克不仅支持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而且在夺取了政权以后，立即解放了几百年来受沙皇专制制度压迫的数百万穆斯林。此刻是解放了的穆斯林向边界对面的同教弟兄伸出援助之手的时候了。经过塔什干军校的训练之后，印度革命者将把俄国革命的信息带回家乡去，这必然会鼓舞印度人民进行英勇斗争以推翻英国的统治。

几篇讲话都是这种调调。一定有人把这些讲话夸大其词

和添枝加叶地报告了寇松勋爵，打扰了他的清睡；而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又使他肝火上升，于是一怒之下，不但置外交礼节于不顾，而且把英国自身利益也忘到脑后去了。因为和俄国贸易关系的恢复对双方都有利。俄国的木材是英国采矿业所不可缺少的。俄国的其他商品，对于恢复受战争破坏的英国工业也很急需。另一方面，象俄国那样一个大国的经济建设，也为英国的工业产品提供了有利可图的市场，而俄国人又是很好的付款人。如果他们不能用实物支付，就用黄金支付；而黄金又必定会有利于英镑的稳定。

塔什干军事学校是绝不能存在很久了。第一批学员是些平庸之辈，只有少数人能够成为一支革命军队的优秀组织者和指挥员，他们懂得政治训练的重要性，而不急于穿军装、扛枪和上操。那些热中于这些军事活动的人，在政治上仍然是靠不住的。在他们受了使用武器的训练以后，我们该怎么安排他们呢？我们不可能把他们送回国去组成一支革命军的可靠核心。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希望从印度找来合适的人材，把他们训练成为组织和建立一支革命军队的人。

大部分热中于搞军事的学员学不会掌握比普通步枪更复杂的武器，而那些受过教育的少数人却能够接受较为高级的训练。其中一些人很快就学会了枪炮操作，这使俄国教官感到惊讶。然而学习飞行却是个热门。那时候，军事航空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也还没有达到高度发达的程度。我曾从莫斯科带来几架飞机，已经安装就绪，就可以飞行了，于是挑选了几名印度人去接受飞行训练。这就引起了普遍的争夺，人人都想学习飞行，大家对于“薄此厚彼”很为不满。他们抱

怨说：得到优先权的只是那些背弃祖宗信仰而接受了共产主义无神论的人。抱怨的根据是：那些被选拔接受飞行训练的都是教育程度最高而且也是最有政治觉悟的人。其实他们还都不是共产主义者。后来他们接受了共产主义，不是由于被迫，而是出自理智的信念。他们当中有三、四个人充分掌握了在塔什干所能够给予的初步飞行训练。后来，他们被送到俄国本部设备较好的训练中心。其中至少有两个人成绩很好，一个竟被公认为王牌飞行员。他被分派到列宁格勒的红军空军部队，在一次单机飞行表演中，由于飞机坠毁而牺牲了。红军对他的死亡表示了哀悼。另一个人的经历虽然并不那样壮烈，但同样是令人钦佩的。他获得了合格证明，受命负责俄国南部某地的一个空军中队，训练来自阿富汗和波斯的学员。他以后的情况以及他现在在哪里，我都不得而知了。

军事学校停办并不是坏事，因为没过多久，对付那些愚昧无知的、不关心政治的移民的危险就显出来了。我自己也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这些印度移民一旦进入军事学校，当然是不准外出，不准逛市场，尽管逛市场是他们喜爱的消遣。虽然不准外出，“印度之家”和市场之间的秘密联系并不能完全切断。那个自称是穆罕默德·阿里的亲信助手的人，既不接受政治训练，也不接受军事训练。他声称自己是个成熟的革命者，他没什么可学的了。他到俄国来的目的是为印度革命寻求援助，并考验苏维埃政府关于支持殖民地人民解放的宣言是否真有诚意。因为他不是年轻人了，我就对他讲了真情，我说，我到土耳其斯坦来的原意是携带大批武器进入印度西北边境，以便在那儿招募一支印度解放军。我又告诉他，这

个计划无法实行了，因为阿富汗政府不准我通过它的领土。当我告诉他，我不打算依照阿富汗政府的要求把我从莫斯科带来的武器和金钱交给阿富汗政府时，他感到十分惊讶。他认为这不仅是一个错误，而且还表明我这个印度教徒不信任伊斯兰政府。他当然是很轻易地忘记了阿富汗政府是如何对待印度的哈里发移民的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更大的捣乱分子。

一天，他告诉我，一个来自印度边境的很重要的使者到了塔什干，想见见我。我问人在哪儿，他说就住在“印度之家”。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竟被允许住在那里，这使我颇为惊讶。然而，我还是决定见见那个陌生人，但我拒绝在我的住处或在共产国际土耳其斯坦局办公室里接待他；我愿意到“印度之家”去看看他。这位引见人听了很不高兴，因为他想把那位来客带到高级寓所，借以表明他自己很了不起。我一见那个新来的人就起了疑心。也许我有偏见，尽管我说不上为什么。有些人和他一样也是无名之辈，我都是欢迎的嘛。此人个子甚高，是个典型的漂亮的帕坦人，他垂着黑胡子，裹着作装饰用的头巾。介绍人说这位是某某毛拉（我忘记他的名字了）。他还告诉我，这位毛拉在边境部落中很有势力，若能给他提供必需的武器和金钱，他就能招募一支人数众多的抗英部队。他正是为寻求这些东西而来的。由于我对武装边境部落去进攻印度一事并不特别发生兴趣，我便询问毛拉是否同印度国内的民族主义运动有联系。他回答得含糊其词。但是如果他不拿出表明诚意的证据，我是不能和他打什么交道的。于是我又问他，是否同喀布尔的印度临时政府有什么关系。多年来，

临时政府一直在边境部落中进行反英宣传，它的领导人是穆斯林宗教人士奥贝杜拉毛拉。虽然临时政府的宣传活动收效不大，但奥贝杜拉在印度西部是个受人尊敬的穆斯林神学者，而且被认为同印度哈里发委员会有联系。这位新来的人自称同喀布尔的印度临时政府没有联系，而且显然为了证明自己的立场是对的，还对临时政府说了一些贬抑的话。我最初的疑心更加重了。我得慎重行事。

我对他说，俄国政府对革命运动是愿意提供各种援助的，但我要弄清楚这个运动是真正革命的才行。然后，我又问他准备怎样把武器和金钱运到印度边境去。我预料到他会陷入我的圈套，但没想到竟是那么容易。他已经见到了阿富汗大使，大使遵照喀布尔的指示，愿意把武器转运到印度边境。至于金钱呢，可以通过某些在土耳其斯坦的印度商人转去。

很明显，这里有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不单纯是诈骗，而且是为了更阴险的目的。在采取任何步骤之前，我们必须设法进行审慎的调查研究。会见结束时，我向他保证说，对印度革命的一切援助都不难获得，但要找出可靠的方式方法把援助物品运到适当的地方。这位新来的人显然感到有些不快，但是他除了脸色阴沉之外，也没有别的办法表示他的不满。

第二天，我向土耳其斯坦委员会的“契卡”代表报告了这件事。由于当时的土耳其斯坦是敌人间谍活动的温床，因此，“残忍的彼得”以“契卡”的身份被派到塔什干来。他一听到我的报告，马上下结论说那家伙是一个间谍，但他又接着说，由于其他俄国同志的愚蠢的温情主义，他一时不能采取行动。我建议这事不必匆忙处理；那个人看来并不十分危险。这样，

我们可以从容不迫地进行调查研究，从而可能揭露出一个真正危险的阴谋。彼得同意了。他的特工人员报告说，那个假毛拉天天从早到晚都把时间消磨在市场上，并同那些有英国间谍嫌疑的印度商人厮混。他还常常出没于阿富汗使馆，但十分诡秘。

在此期间，我向喀布尔的奥贝杜拉毛拉打听那个人的情况。不管奥贝杜拉的政治观点如何，他还是一个公认的正直而可尊敬的人。他不会对任何人做任何虚假的或恶意中伤的报告。他的答复是通过两名印度临时政府的成员传达过来的，这两个人是因为有同情共产主义的嫌疑而被迫离开喀布尔的。奥贝杜拉毛拉的报告是：他对我要打听的那个人一点也不了解，而且从未听说过这么一个人。那两名从喀布尔来的印度临时政府成员一到塔什干，那位来自边境的密使就突然离开了“印度之家”。他为自己这一行动解释说，他打算到一些朋友家里暂住，在那里可以更舒服一些。但我还是得到了机会，使他与那两个来自喀布尔的朋友见了面。他表现得局促不安。虽然那两个人对他以老朋友相待，他却硬说不认识他们。从他们两人那里我了解到，那个人在喀布尔是个很有名的英国特务，而且深受阿富汗政府的信任。

根据喀布尔印度临时政府的两名成员的作证，彼得下令逮捕那个可疑的毛拉，但在我的请求下，逮捕是悄悄进行的。一天夜晚，他在从市场回来的路上被逮捕了。在他身上搜出了大量的印度货币。又发现他常常邀请印度军事学校的那些无知的学员到市场去，不但请他们大吃大喝，而且还同他们进行秘密的谈话。甚至还发现他向一些学员赠送金钱。接到这

项报告后，一天，我们让“契卡”特工人员辨认出前一天晚上接受金钱的那些学员，通过一些似乎有理的借口把他们叫到校外，进行了搜查，发现他们每人身上都有一些钱。

根据当时的革命法律，这就足以定案了。彼得不愿再听更多的要他慎重行事的劝告。他的职责是扑灭反革命。那个被捕的人被判处了死刑。但在我的恳切要求下，彼得同意不对那些已经查明与他有牵连的人下毒手。

实事求是地说，我觉得不如此做也别无他法。把那个人送走是不行的。他显然是一大帮歹徒中的一员。如果把他送回去，他就会在印度边境和印度国内进行恶毒的反俄宣传。但其他俄国同志对彼得那样仓促地执行革命法律的作法感到十分不安。然而，在他那个地位，他有自主权；甚至连整个土耳其斯坦委员会的裁决也不能撤销他的决定。他采取了令人不安的作法，那是难以收回成命的了。

但在执行这个判决上却出现了问题。罪犯将被枪决。彼得大概是为了将来免遭他人非难，就把罪犯交给了民政当局，让他们去执行那一判决。在此以前，莫洛托夫同萨法罗夫一起坐着为中亚带来革命信息的宣传列车已到了土耳其斯坦。莫洛托夫以土耳其斯坦委员会书记和该委员会与共产国际土耳其斯坦局的联络员的身份在这里留下来。他受命去处决那个罪犯，这样可以不至走漏消息。彼得很不耐烦，天天打电话问我那个英国间谍怎样了。我一点消息也没有，甚至连他押在哪里都不知道。我对那个案子已经不感兴趣了。我本来愿意把那个家伙放走，所有其他俄国同志也会同意的。但我认识到为时已经太晚了。不知什么缘故，所有知道这件事的

人似乎都认为，了结此事是我的责任。一天天过去了，人们都有些不安起来，因为如果走漏消息，就可能出现一种微妙的政治局面。我请求萨法罗夫帮我的忙。作为俄国共产党的代表，他在名义上是彼得的上级。他以他那特有的讥诮态度说：“多死一个人算得了什么？可是莫洛托夫仿佛害怕真主发火呢。”第二天，他派莫洛托夫来见我，要我给他下一道严格的命令，叫他立即了结那项工作。莫洛托夫来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处决那个被判死刑的犯人，他紧张地回答我的话，说得结结巴巴。莫洛托夫在升到党内很高的职位以前，一直口吃得很厉害。但他终于设法克服了那一缺陷。有人说他仿效德摩斯梯尼的榜样，虽然他并没有成为一名象样的演说家。莫洛托夫结结巴巴地解释说：杀一名印度同志合适吗？我相当严厉地对他说，首先，他不是什么同志；其次，有证据证明他是个敌特。我用断然的命令结束了这次痛苦的会晤：革命的判决必须执行；被判为敌特的人要立即枪决。于是那个胆大妄为的毛拉第二天早晨就被处决了。幸而，整个事件被严格保密，除直接参与其事的人以外，没有一个人知道一点消息。

然而，他的突然失踪在印度移民中还是引起了一些骚动。特工人员发现军事学校的那些落后学员正受到与已被处死的毛拉有过联系的印度商人的恐吓。那些印度商人对他们说，他们应当要求被送回印度。如果这个要求没有被批准，他们就该偷偷逃跑，会有人帮助他们的。很清楚，把有这样学员的军校再继续办下去，是毫无意义的了。这时，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要在莫斯科召开了。我即将离开土耳其斯坦去参加那个大会。但是我把这伙惹事生非的人交给谁呢？大约有十几

名受过较好教育的、有头脑的学员确实已经成为真诚的革命者和忠实的朋友了。他们听说我很快就要离开，都感到十分惊慌。在其他俄国领导同志的欣然同意下，我得到彼得的保证：在我离开期间，他绝不逮捕军事学校的印度学员。

64. 在莫斯科的印度革命者

在我离开塔什干的前夕，阿班尼·穆克赫尔吉从莫斯科来了。我事先不知道他来的消息。塔什干并不需要他。我本来已派他去参加巴库代表大会，条件是：他一回到莫斯科，就得动身前往西欧，在荷兰建立总部，以便通过海员的媒介和印度建立联系。所以，他的突然到来不仅是个意外，而且也确实是个麻烦。他自告奋勇地要承担我离任期间的军事学校工作。他也是一个热烈主张发展印度共产党和扩充党员数目的人。由于他与“契卡”打过交道，所以彼得立刻就得知他到塔什干来了。过去，由于得到列宁的仁慈之心的支持，我曾出面干涉，使彼得不得不大失所望地让阿班尼·穆克赫尔吉从他那血腥的魔掌里逃脱出来，对于那件事他还一直耿耿于怀呢。如果阿班尼·穆克赫尔吉那野心勃勃而暴躁的性情不加改变，他肯定不久就要招来是非。这一次又有谁能保护他免遭彼得的报复呢？萨法罗夫是极其憎恶他的。我临走之前见过彼得，恳求他要宽宏大量些。他对我大发雷霆，问我为什么把穆克赫尔吉弄到这里来？他是一定要捣乱的，如果那样，彼得

就一定会逮捕他。彼得要逮捕谁，那是毫不含糊的。我听了大吃一惊，就告诉他说，穆克赫尔吉已经答应循规蹈矩了，而且还有十几名有头脑的印度革命者，他们是会约束他的。

穆克赫尔吉恰好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离开莫斯科，并且是心甘情愿地离开的，这使我感到很惊奇。我一回到莫斯科，就知道了此中原因。

我到达莫斯科时，几位印度革命者以不复存在的印度革命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已从柏林到了那里。早先我在去莫斯科途中时，曾恳请在柏林的主要印度革命者前往俄国。那时，俄国是他们唯一的安全庇护所，并可望成为推动印度革命的一个可靠的工作基地。当时，他们似乎不相信俄国革命会持久；而且共产主义也不合他们的心意。因此，当他们终于改变了想法，转向世界革命的根据地时，我自然是非常高兴的。但是，使我大吃一惊的是，那几位先行到达莫斯科的柏林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却对我的友好态度表示相当冷淡。我从他们那里得知：他们只是作为革命委员会的先遣人员来的，而委员会的大批人员不久即将抵达莫斯科。我希望等待维伦德兰纳特·查托帕迪阿亚、布彭德伦纳特·达塔等老革命者来到时，关系就会改变了。我急切地盼望那些人早来。他们具有革命热忱和丰富经验，因此一定可以成为很好的战友、志同道合的人。

不久，他们全部到达了莫斯科，并宣布说：只有柏林印度革命委员会有权代表印度说话，该委员会已决定在条件有利时将总部迁到莫斯科。尽管这个宣言暗示我无权代表印度说话，但我仍然明确表示，我将全力支持印度革命者把总部迁至莫斯科的计划。毫无疑问，他们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再也找不

到比在莫斯科更好的条件了。但令人费解的是，这些新的来客不但想法躲避我，而且他们当中有些人竟然对我采取了公开敌视的态度。

其时柏林印度革命委员会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不管它在早期有过什么成就，但在大战末期，它已经分崩离析，实际上解体了。与其依靠那种传奇来发生影响，倒不如在新的环境下另起炉灶更聪明些。但是国外侨民的印度共产党在塔什干成立的消息，似乎使那些老民族主义革命者大为震惊，因为他们认为那个新机构是要与他们分庭抗礼的。如果我当时有机会见见柏林代表团的领导人，我就能够讲明情况，使他们满意。我并不赞成成立国外侨民的印度共产党，也不相信它有权代表印度工人说话，更不用说代表全体印度人民了。

柏林印度革命者代表团由十四人组成，其中包括维伦德兰纳特·查托帕迪阿亚、布彭德伦纳特·达塔、维伦德兰纳特·达斯·古普塔、马哈拉什特里安·克南科杰、古拉姆·阿姆比阿·汗·卢哈尼、纳利尼·古普塔。可是代表团的骨干却是一个美国人，名叫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我曾在美国见过她。当时她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她给拉杰帕特赖当了一个时期的私人秘书，因而她对印度似乎产生了极大的同情。当她得知印度著名的革命家都住在柏林时，她就在战争结束时到那里去了，在那些印度人当中，她成了非常活动的分子。

但是，来到莫斯科的代表团显然不是原来的柏林印度革命委员会。哈迪阿尔和查托帕迪阿亚本来是柏林委员会的两个居统治地位的人物，因此，没有多久他们便发生了冲突。尽

管哈迪阿尔也很强烈地反对英国，可是却因有充当敌人间谍的嫌疑而在德国被捕并受到拘留。德国投降后，他逃到斯德哥尔摩，写了一本书描写他在德国的经历。显然，那些经历使他感到痛心。他似乎成了英国对印度统治的辩护士，主张自治领地位，反对完全独立。他居然写了一些东西，虽然说的是大实话，但却不应出自一个革命的印度民族主义者之口。哈迪阿尔指出了为印度自由而斗争的战士们已经从英国学到了政治教训这一事实后，他宣称，如果印度是母亲的话，那么英国便是祖母了。这样自然使所有的印度民族主义者都大为愤慨。据说他写那本书是为了获得许可回到英国，然后再回印度去。但显然他并没有得到那种许可。他在瑞典住下去了，在古老的乌普萨拉大学教印度哲学，以度余生。这说明他的博学多才受到了重视。

柏林印度革命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哈桑·曼苏尔在战争初期就到了土耳其。他从那里回到柏林时，幻想破灭，满腹牢骚，并宣称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自称改信共产主义，使他在老同事中变得孤立起来了。他没有和他们一起来莫斯科，但后来他独自到了那里，无声无息地住了两三年。我已经谈过我和他交往的经历。1919年我到柏林时，布彭德伦纳特·达塔是住在那里的唯一的战时印度革命委员会的原有成员。其他成员都已经分散了。维伦德兰纳特·查托帕迪阿亚自己已去斯德哥尔摩参加国际社会主义大会，为印度的独立事业进行辩护。

因为感到那些来自柏林的印度革命者对我不大友好，我就不和他们来往了，免得产生我企图影响他们，或者阻碍他们

可能着手的什么计划的印象。但是他们大部分人和我甚至连话都不肯讲，这使我不禁痛苦万分，百思莫解。看来他们是在无中生有地怀疑我可能阻碍他们去会见俄国各方面的领导人，以便说明他们的情况。奇怪得很，他们竟首先急于去见齐采林。他虽然仍是外交人民委员，但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再说，他刚刚接到英国政府有关印度革命者在中亚进行活动的照会，自然不会认为在莫斯科接见著名的印度革命者是明智的。然而，他作为一个彬彬有礼的人，又不愿意触犯任何人的感情，因此，他还是同几位印度革命者进行了一次短时间的会晤。印度革命者好象对这次会见颇感失望，于是他们要求会见列宁本人。他们对这件事严守秘密，很可能认为我会从中作梗。我是从列宁本人那里得到了这一消息的。他打电话约我去见他。他向我询问了已经来到莫斯科的这些印度革命者的情况，以及他有无必要会见他们。如果他们来讨论印度革命工作计划的，那他们就应该去和共产国际商谈。列宁听说他们对我一点好感也没有，觉得十分诧异。尽管如此，我还是建议列宁见见他们，听听他们要讲些什么。列宁说我是处于一比十四的少数地位。我回答说，他晓得我并没有自称除自己以外还代表任何人。所以，从我这方面来讲，我与这些印度革命者并无冲突可言。列宁问我是否已与他们讨论过什么问题。当他听说他们甚至连话都不和我讲时，他感到十分意外。他显然很恼火，往椅背上一靠，对我说：“好吧，从他们当中挑出三个人来见我。”我告诉他，我不能那样作，他得直接和他们联系。

此后几天中，印度代表团非常焦急不安。列宁已同意接

见他们。他们接到通知，说列宁将接见由他们自己选出的三名代表。关于代表人选发生了争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比别人更有资格得到这一荣誉和优惠。我能通过纳利尼·古普塔了解所有这些情况，因为只有他一个人不对我采取敌对态度。在欧洲的印度革命者当中，也只有他一个人通过频繁、秘密的往来旅行，与印度国内的革命组织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他在印度见到过我的一些朋友，并从他们那里得知我在大战初期出国时所负的使命。他来莫斯科之前不久，曾又回到印度一次，那时他受命要与我联系。所以，我们两人从一开始就是推心置腹的。他告诉我：虽然印度革命者在会见列宁的三个人选的问题上存有争执，但关于在会见中要提出的问题，大家意见却是一致的。在查托帕迪阿亚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指导下，他们正在草拟一份很长的提纲，以反驳一年前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我所草拟的那个提纲。卢哈尼是一位曾到英国学习过法律的北孟加拉的穆斯林，此人很有才干，也善于词令。但因他不是柏林印度革命委员会老资格的成员，所以没有被选为会见列宁的代表。然而，代表们要提出的那份提纲却是由他起草的。其他人是写不出富有说服力的文件的。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查托帕迪阿亚的支持下，要求作为会见列宁的一名代表。她的要求遭到所有其他印度人的反对。最后，他们一致同意选资格最老的查托和达塔两人作代表。我忘记第三名是谁了；很可能是克南科杰吧。选他是为了免得有人说代表团是清一色的孟加拉人。

列宁客气而耐心地听完印度革命者的代表们的话以后，

建议他们去见共产国际书记，并说苏维埃政府不能积极参与任何推动别国革命的计划。印度革命者的代表们在渴望已久的会见结束后回去时感到极为失望，甚至十分愤慨。达塔脱口说出：印度革命者不能指望从布尔什维克那里得到帮助了，因为他们很想同英帝国主义和解。

然而，他们还是会见了当时的共产国际总书记拉狄克。他们来到他的办公室时，我正在那座楼房的另一个房间里。拉狄克当着他们的面给我打电话。我说请他原谅，我不能出面，原因他不久就会知道的。列宁已把印度革命者提交的提纲转给拉狄克了。拉狄克告诉客人：共产国际援助殖民地民族运动的活动，是受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提纲的约束的。但是，他又说：如果新来的印度同志不同意那个提纲，要求共产国际改变其态度和政策，那么在最近的将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他们还是有机会申辩的。印度革命者可以留下来参加那个大会，当然不是作为有表决权的代表，而只是以来宾的身份出席。但是如果他们提出自己的提纲，共产国际书记处将建议大会给予考虑。

这些印度革命者呆得很不耐烦，他们不想再在莫斯科浪费时间了。他们迫切希望恢复大战爆发以后中断了的积极工作。他们这次到莫斯科来，原指望得到帮助，以便回到西欧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拉狄克告诉印度革命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已建立了中亚局，作为促进东方国家革命活动的工具。在作出新的决定之前，关于印度革命活动的全部计划都要与共产国际中亚局商议拟订。拉狄克还告诉印度革命者，我是中亚局的成员之一，刚刚来到莫斯科。他建议他们同我

取得联系,讨论他们的计划。

与拉狄克的会见甚至比与列宁的会见更使这些人失望。为了缓和印度同志的情绪,拉狄克答应要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成立一个调查小组,听取印度代表团的情况说明,从而对整个情况进行调查。然而,这也沒有使他们都满意。此后不久,代表团的大部分成员便一个一个地离开了莫斯科。查托帕迪阿亚、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布彭德伦纳特·达塔、卢哈尼、纳利尼·古普塔和其他几个人留了下来。

负责听取印度革命者的说明并调查印度情况的小组是由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奥古斯特·塔尔海默、英国共产党的汤姆·奎尔奇和鲍罗廷三人组成的。查托显然是印度代表团的领导人。可是他不擅长讲话,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很想替他发言。但是,让一个非印度人开头谈印度问题是不合适的,于是这项工作就由卢哈尼担当了。他讲得很出色。他讲完以后,塔尔海默问道:新来的印度同志对与我合作是否有什么反对意见。在他问起我的意见时,我便坦率地说:得到新来同志的合作,我高兴极了。我又说:我没有说过我自己代表印度。如果新来的印度同志同意一项工作规划,并决定留在莫斯科接替指导活动的责任,我将听候他们调遣。这番话激怒了查托,他怒气冲冲地打断我的话说:“我们并不反对你,但是只要你还与那个手上沾满了许多印度革命者鲜血的、众所周知的间谍交往,我们就不能和你打交道。”调查小组对此大吃一惊。鲍罗廷建议说:如果查托帕迪阿亚同志想使人们认真对待他的话,他就得说得明确一些。他刚才提到的那个英国间谍到底是谁呢?查托示意卢哈尼回答这个问题。原来被告就是阿班尼·

穆克赫尔吉。据他们讲是这样的：1916年，阿班尼·穆克赫尔吉从日本回印度的途中，在新加坡被捕入狱。他并没有象他佯称的那样，是越狱逃跑的，而是被英国警方释放的，因为他供出了有关印度地下革命运动的情报。根据他的情报，不少人在印度被捕。有的判处死刑，有的被长期监禁。

在回答那个问题时，我向调查小组说明我是在什么情况下认识阿班尼·穆克赫尔吉的。我说，他的行为也曾经引起过我的怀疑；但是，只要还没有证据证明对他的严重控告属实，就宣告他有罪，那是不公平的。如果我撤销对他的保护，他就会受到最大的惩处。但只凭那么点含糊的怀疑，我是不愿负这个责任的。

为了结束那种不愉快的、而在当时当地又无法解决的问题，塔尔海默建议，我们还是恢复讨论新来的印度同志与我在政治上可能有的分歧吧。卢哈尼代表代表团回答说：他们不赞成在塔什干建立印度共产党，并要求解散这个组织作为与我合作的条件。我再次说明当时迫不得已的情况，并辩护说：印度共产党是在另一些人倡导下成立的，即使我劝他们解散这个组织，他们肯定是不会同意的。可是印度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寸步不让。

查托帕迪阿亚代表整个代表团向调查小组提出了最后通牒，如果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他们就立即离开莫斯科，因为他们深信印度革命者不能指望从莫斯科得到任何帮助了。

65. 印度临时政府被赶出喀布尔

柏林印度革命者访问莫斯科，对我来说是一段痛苦的经历。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们为什么对我那么不友好甚至怀有敌意。还在印度的时候，我就听到许多关于那些革命者以及他们为争取印度自由而做的工作的情况。我到柏林时，除了布彭德伦纳特·达塔以外，我知道名字的那些印度人一个也不在了。达塔给我的印象不深。事实上，他虽然在国外呆了很长时间，却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革命活动。1907年，他因煽动叛乱被捕并判处两年徒刑后，才在印度赢得了一些声誉。当时他是地下革命党机关报、著名的孟加拉《尤根塔尔》（新时代）周刊的编辑。他被释放后，到了美国，可能是为了避免因阿利波尔炸弹事件而再次被捕。在美国，他不是作为一个革命者出名的，而是作为斯瓦米·维夫坎南达的兄弟才出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象许多印度流亡者一样，他也到了柏林。由于他曾当过《尤根塔尔》周刊的编辑并坐过监狱，也由于他是斯瓦米·维夫坎南达的兄弟，这样一些声望使那些聚集在柏林的印度人对他颇为尊重。当我1919年年底在那儿与他初次见面时，我对他在政治上的幼稚感到惊讶。当欧洲遭受世界大战蹂躏的时候，他就住在那个大陆的中心地区，但既没有从大战中也没有从战后的德国革命中学到什么东西。他从未企图与在政府中取代了保皇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取得联系。事实上，他厌烦社会党人的阶级斗争思想，也不相信社会党人竟然会对印度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发生兴趣。

他除了从他的保皇派朋友和熟人那里学到对布尔什维克的厌恶之外，他对俄国革命的了解当然是更少的。因此他拒绝按照我的建议转移到莫斯科去。我对此并不感到十分失望，因为我认为他到哪里也不会有什么用处。

我到柏林时，查托帕迪阿亚已经离开那里了。他是柏林印度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我特别渴望见到他。他这次到莫斯科来，我非常高兴。他在人们心目中是个很有才华而又精力充沛的人，在欧洲曾度过多年动荡的生活。我原期望他能够成为革命工作中一个有用的同事。因此，他对我那样毫不掩饰的敌视态度使我如入五里雾中。后来我对他才逐渐了解：他对我并没有恶意，也没有任何理由怀恨我。他在莫斯科的态度主要是受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影响。

我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美国见面以后，她似乎一直对我怀恨在心。她是一个狂热的英雄崇拜者。当她拥护印度革命事业时，她似乎相信，钟情于著名的印度革命家，就是对印度忠诚的表现。据说，孤独的老人拉杰帕特赖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崇拜的第一个英雄。第二个英雄是一个年轻的印度人；我在印度的朋友们派遣他来同我联系。最后他到了纽约，并在那儿见到了我。我把他介绍给一些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小组，因为在那些日子里，唯有那些组织同情印度的自由事业。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那里与他相遇，她就爱上了这个比她自己年轻得多的男人。后来，我动身到墨西哥去，那个年轻的印度人也到那里和我聚会。他是一个热情的印度民族主义者，自然不赞成我在墨西哥的活动。他想在美国建立一个印度宣传机构，并且想弄到一些经费。我极力劝

他留在墨西哥作一些工作，那样可以从中吸取革命经验和政治教训。他拒绝了，而且急于要回纽约。他和我在一起的那一段时间里，他每天都收到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信，催他赶紧回去。我觉得一个年轻人迷恋一个年龄比自己大得多的女人是没有好处的。但我又无法说服他留在墨西哥。最后，他以欺骗手段带着一笔巨款离开了墨西哥。他一回到美国，就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一起创立了一个名为“印度自由之友”的组织，总部设在华盛顿。不久，他们二人因为冒充外国外交代表而拿不出应有的委任状双双被捕。我接二连三地收到他们的急电，催我寄钱去，以便请人为他们辩护。但我不准备浪费金钱去支持那毫无意义的冒险事业。最后，那个年轻的印度人和另外一个美国姑娘结了婚，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只好再去物色一个新的英雄了。著名的革命家查托帕迪阿亚很自然地得到了她的欢心。她来到了柏林，与查托帕迪阿亚同居了几年，那是人所共知的。看来是她挑唆查托帕迪阿亚对我产生恶感的。总而言之，她在到莫斯科来的这一伙印度革命者中是一个恶魔。如果没有她的影响，查托这个聪明而踏实的人的行为就会有所不同。经过了一定的时间，我了解到，在这伙印度革命者中，其他人都从心眼里讨厌她，因为她总说自己是一个热爱印度的人，比印度人自己还热爱。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我还是结识了这些人中一些次要的人物。他们大部分人完全没有政治头脑，对革命的概念也十分模糊，尽管他们自称是革命者。在德国，他们不是作点买卖，就是学习一种专业。他们在莫斯科的使命失败后，就又回到柏林重理旧业了。我从他们那里颇为高兴地得知，查托很

想会见我，并和我结交，但是史沫特莱却从中作梗。她总是处于歇斯底里的状态——病理上的歇斯底里，很适于做精神分析的对象。我恐怕她跟查托几年的厮混，已伤害了他那样一个有爱、有憎、有偏见、也有同情的正常人。

印度革命者是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前夕到达莫斯科的。那时外国代表到的还不多。尽管如此，“豪华饭店”（外国共产党人居住的地方）差不多已经住满了。印度人也住在那里。但是他们对当时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者心情激动的那些问题，并不发生兴趣。俄国共产党本身正在热烈地讨论国内建设问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讨论的主题。人们也在讨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工会的作用。印度革命者对这些讨论一概不感兴趣。他们唯一的活动就是在“豪华饭店”的长廊里走来走去，拉住别的住客，喋喋不休地讲述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是不公平的。这简直是江边卖水。共产国际的所有成员，无论是俄国人，还是非俄国人，都反对帝国主义，都同情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是怎样才能使殖民地人民获得解放，和将用什么样的政权代替殖民主义的统治。印度革命者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也回答不了这些问题。这样就给那些明白表示自己是印度自由的朋友的人留下了很坏的印象。他们没有兴趣去听印度人关于反对英帝国主义的诉苦，印度革命者就认为那是对他们事业的漠不关心。鲍罗廷常常用他那习惯的讽刺口吻描写这种情景说，长廊的另一端一出现“乌云”，共产主义的代表们就赶忙跑回各自的房间去了。

来自柏林的印度革命者提出的最后通牒没有被接受，于

是不久他们就全部离开了莫斯科。只有两个人留了下来——卢哈尼和纳利尼·古普塔。其余的人从来也不明确他们来莫斯科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但从他们的举止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是想对我代表印度革命运动的权利挑战。他们暗示的实际要求是：俄国要承认印度革命者的柏林委员会是印度的代表。他们这样做仿佛是企图冲破一个大开着的门，这真是白费力气，因为我从来没有自称我代表印度的任何组织。我是以个人的身份到莫斯科来的，不管我在那里获得了什么样的地位，那都是对我有功于革命的历史的承认。而且，我曾邀请柏林委员会把总部迁到莫斯科，来接替我一直在努力从事的工作。我也主动提出过，把自己置于委员会支配之下，为之效力，如果委员会同意我的建议的话。因为我并不反对柏林印度革命者的要求，所以他们想把我拉下马的愿望也就落空了。因此，他们就集中火力攻击阿班尼·穆克赫尔吉。事实上，他们一些人竟然到“契卡”办公室去，并正式告发穆克赫尔吉是受我保护的英国间谍。这个正式告发的唯一结果是“契卡”建议把穆克赫尔吉召回莫斯科暂住，以便加以监督。我毫不迟疑地同意了。

纳利尼·古普塔暂时住下了，因为他想和我讨论一下他不久即将返回印度的计划。我发现他是一个很有用处的合作者。正是通过他，我恢复了与印度一些老朋友的联系，并接触了负起组织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任务的其他一些人。古普塔建议我在西欧建立一个印度革命宣传基地。

卢哈尼看来曾经是查托帕迪阿亚的亲密伙伴。他是查托帕迪阿亚在印度调查小组的发言人。但是选择他担当那个任

务是因为他善于词令。很明显，他是按照查托帕迪阿亚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指示行事的。他极力讽刺自称印度共产党的那个塔什干小组，并嘲笑经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我那个提纲的中心思想。那个思想是：必须组织一个工农的党，充当为民族自由而斗争的先锋。

当古普塔告诉我卢哈尼也决定留下时，我感到非常惊奇。过了几天，鲍罗廷告诉我：卢哈尼曾经访问过他，并且说，他对那些柏林同事的行动感到厌恶，并已决定与他们分道扬镳了。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因此来征求鲍罗廷的意见。鲍罗廷劝他来见我。卢哈尼一听十分失望，他担心由于他与柏林那一伙人往来，我就会不信任他，甚至还可能存心报复。鲍罗廷要他来试试看，并向他保证，他会感到喜出望外的。事实正是这样，因为我是把他当作一个愿意悔过自新的人来欢迎的。他说他本来是准备回印度去的，但由于来到莫斯科而丧失了机会。现在他该怎么办？我建议他暂时留在莫斯科，在共产国际的情报部做些工作。他欣然同意了。

正当来自柏林的印度革命者离开莫斯科时，从苏联驻喀布尔大使那里传来消息说，阿富汗政府要求奥贝杜拉毛拉和他的所谓印度临时政府的同事们一同离开阿富汗。毛拉想取道俄国去君士坦丁堡，然后去麦加。他计划在那里建立总部，在印度穆斯林的朝圣者当中进行革命宣传，并通过他们和印度建立联系。苏联驻喀布尔大使奉命告诉毛拉说，他和他的同事们将在苏联受到热烈欢迎。他在苏联居住多久都行，如果想再到别处去也可以。

不久，又一批印度革命者来到了莫斯科，其中有两位临时

政府的成员——扎卡里阿和穆罕默德·阿里。这两个人离开喀布尔的时间较早，并陪同奥贝杜拉从塔什干来到莫斯科。另外几个人是同奥贝杜拉一起从喀布尔来的。他们都是穆斯林，但是其中有一个是印度教徒，他的名字叫西布纳特·班纳吉。他当初到喀布尔来是当学校教师的。

同时，阿卜杜·拉布和阿札腊也从塔什干移居到莫斯科。这两位老先生彼此都怀恨在心。早在喀布尔时他们就合不来。因此，他们只好分居在两所房子里。

奥贝杜拉报告说，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之后，阿富汗的阿曼纽拉国王和英国达成了谅解。阿富汗国王在英国的要求下，同时也为了向英国讨好，要求印度革命者离开阿富汗。奥贝杜拉讲的情况为苏联驻喀布尔大使的报告所证实。报告说，阿富汗政府也要求他本人离开那个国家。这是一个很意想不到的发展，因为阿曼纽拉国王一向装作对苏联政府很友好，而苏联政府也尽力帮助他。拉斯科尔尼科夫在他那有才干的夫人拉丽莎·赖斯纳有力的协助下，成了阿曼纽拉宫廷里的一个很成功的外交官，以至国王把心腹话都对他讲了。他们私人间的友谊很好，苏联大使和他的夫人常常被邀请出席阿富汗王宫里举行的私人社交宴会。在那些场合，苏拉耶王后就不戴面纱，苏联大使的夫人便表演舞蹈以娱阿富汗国王。那位非常漂亮的夫人不仅是个有才华的著名作家，而且也是一个有造诣的舞蹈家。在一次这样的宴会上，拉斯科尔尼科夫问阿曼纽拉国王对布尔什维主义有什么看法；他不怕同公开主张废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布尔什维克接触吗？国王微笑着回答说：“不；因为我也是一个布尔什维克。”

拉斯科尔尼科夫吓了一跳，以为只不过是一句笑话。但是，国王却一本正经地在他的耳边小声说：他也是杀了他的父亲才登上宝座的呢！

阿曼纽拉国王的转向和英国恢复在阿富汗的影响，使俄国除列宁以外每个人都大吃一惊。列宁早就预料到这种发展了。我在带着为了在印度边界组织一支解放军所需要的物资和人员离开莫斯科去中亚之前，曾经和列宁进行过多次谈话，其中一次我们讨论了阿富汗政府的态度问题。我的计划能否成功取决于阿富汗政府的同情与合作。列宁问我怎么能有把握得到那种同情与合作呢。我回答说：阿曼纽拉国王与英国人闹翻了，势必依靠苏联的支持才能保住他的地位。列宁怀疑英国人是否会轻易放弃他们的战略阵地而不竭尽全力把它夺回去。我问他所谓竭尽全力指的是什么。列宁说，他们将用金银炮弹轰击阿曼纽拉国王的城堡。当我建议我们应该首先使用那种武器作战时，列宁的回答很简单，却很有说服力：“英国人比俄国的新政府富得多啊。即使俄国新政府拥有沙皇的全部财富，也不能在贿赂这个或那个亚洲宫廷方面与那个从广大殖民帝国那里搜刮超额利润的占有者相抗衡。”当时我觉得列宁的话未免刻薄些，但是历史证明他说对了。

66. 战时共产主义几乎 毁灭了革命

来自柏林的印度革命者到莫斯科的访问是一段不愉快的插曲。这次访问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我对那些著名革命者的幻想，而且妨碍了我积极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也妨碍了我积极参加讨论由于战时共产主义的破坏而使新政权突然遭到危机的问题。由于托洛茨基主义者想利用建立军事专政的办法以便从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中恢复秩序，结果使那次危机更加严重了。

实际上在1920年年初，内战就以新政权的胜利而结束了。随着内战的结束，布尔什维克党内在重建被摧毁的国家经济的途径和方法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革命曾号召农民夺取土地，并在他们中间进行分配。苏维埃政府最初颁布的法令之一就是土地国有化。但在工业方面，并没有采取类似的措施。新政权建立后马上就颁布了一条法令，提出工人对个人经营的工厂实行控制。不久，厂主与经理同工人之间就发生了冲突。冲突的结果是一些工厂被本厂的工人夺取了。然而普遍实行工业国有化的先决条件还不具备。俄国经济绝大部分是农业，大规模的工业只不过是象农业经济汪洋大海中的许多孤岛。在两年内战期间，这些工业又进一步遭到了破坏而崩溃了。布尔什维克党不赞成孤立的工人组织自发地夺取个人经营的工厂，并指责这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行为。

在新政府成立一年以后，全俄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反对

这种自发地没收产业的做法。但战时共产主义在农村扩展开了，特别是在德国侵略者占领下的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由于运输系统紊乱以及贸易普遍瘫痪，城市与农村的联系被切断了，从而发生严重的粮荒。小批的武装工人从在经济上被包围的城市突然闯到近郊农村，没收比较富裕的农民所储藏的粮食。贫农受到煽动，也起来反抗比较富裕的农民，并参加了城市武装工人的队伍。这种做法是土地国有化的必然结果：土地既是整个国家的财产，其果实必须属于全体人民。新国家还没有能力实施这个原则。但它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就是革命的领导者。于是工人掌握了司法大权，而且采取了一种事实上等于向农民进行战争的做法。所以这种做法后来就叫做战时共产主义。

这种做法推广到全国其他地方，在它的影响下，苏维埃政府通过了一项法令，命令实行工业国有化。但战时共产主义加剧了城市的经济困难。富农将大量粮食烧掉了，把大批牲畜杀掉了，而不是交给国家。大片的土地荒芜，结果是全国普遍陷入了饥荒。尽管如此，在大量涌进党内的产业工人的压力下，苏维埃政权对于工业全面国有化这一问题还是采用了最不切实际的措施。在1918至1920年的两年间，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从二十万增加到一百六十万。同时，托洛茨基成功地把内战时期分散的游击队建成为一支有纪律的军队，这就助长了一种朝着相反方向发展的倾向。作为红军的组织者，托洛茨基对所有可用的人力获得越来越大的支配权。凡是同军队有任何联系的产业工人都要服从最严格的纪律。工会逐渐地也同样受到军事纪律的约束。工人自然对这种侵犯他们

新获得的自由感到气愤。当新政权在为其生存而斗争时，他们服从这些紧急措施。可是内战一结束，那些强有力的老布尔什维克领导集团在无产阶级的支持下，就反对这种日益增长的过分集权的倾向，因为这种倾向必然意味着威胁民主。人们怀疑托洛茨基有波拿巴主义的野心。由于他把成千上万的老沙皇时代的军官搜罗到红军中来，这就更遭到人们的怀疑了。以布哈林为首的所谓“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使用沙皇时代的将官，其理由是革命的工农共和国不需要一支中央集权的军队。这个共和国在其历史上极其困难的时刻，是游击队保卫了它的。现在在纪律的借口下，这些英勇的革命保卫者的自由却受到压制了。

列宁对托洛茨基在内战时期的伟大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又极力抚慰那些说托洛茨基有波拿巴主义野心的反对派。在多次的激烈辩论中，列宁压服了托洛茨基，把老党员安排在新的军队的重要位置上。有一次，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真的发生了冲突。当托洛茨基在东方前线的时候，列宁给他一封短信，问他如果把所有的沙皇将官和军事专家都赶出红军，而让有军事经验的党员担任指挥员，那会出现什么情况。托洛茨基把列宁的建议说成是“儿戏”。后来，他为他那个傲慢的答复辩护说，红军中的沙皇军官不下三万，他怎么能把他们全部换掉呢？

列宁本来期望俄国经济将在一个革命的德国的技术帮助下得到改善。但是德国革命的失败使他的希望破灭了。尽管这样，1920年12月的苏维埃第八届代表大会还是通过了列宁提出的电气化计划，作为工业建设的基础。应该建立新工

业以吸收复员军人，不应把那些曾在内战期间为革命而打仗的青年农民遣送回乡，因为在那儿等待着他们的只是饥饿和穷困；他们将被编成劳动大队，什么地方需要人力，就在那里使用他们。托洛茨基利用列宁这个计划来执行他的劳动军事化。列宁的原意是经过一段时间将红军改编为劳动大军。而托洛茨基则要征集国内全部人力，成为统一集中的军队的辅助部队。他的计划的根据是：如果说在一百一十万产业工人中只有八十万人就业，那么剩下的三十万到哪儿去呢？无论他们到哪儿去，从军事意义上说，他们就是逃兵。托洛茨基宣称，工人也象士兵一样，要强迫他们工作。他要求工会动员工人尽他们的义务。

托洛茨基的主张有其长远的经济含义。那就是拒绝接受列宁在党内草拟的并于1921年夏由党通过的新经济政策。托洛茨基主张生产资料的生产一定要放在优先的地位。那就是说，恢复国家经济必须从发展重工业开始。他的论证是：“只有在获得生产资料之后，我们才能过渡到直接为群众生产消费品。”但是托洛茨基想通过劳动军事化来重建俄国工业的主意行不通。士兵退伍之后，就都回家乡去了。

在召开第十次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以解决争议中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以及召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批准布尔什维克党的决议案以前，展开了一场热烈的公开讨论。驻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的非俄罗斯成员参加了这次讨论。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向俄国工人保证说，他们各自国家的革命即将来临；艰难困苦的俄国工人只要再坚持一些时候，即将到来的世界革命就会把他们解救出来。不管非俄罗斯的共

产主义者说些什么话来给俄国工人打气，1918年德国革命的夭折和继之而来的红军在华沙的失败，使世界革命早日到来的前景暗淡了。的确，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革命的危机，主要是由于这些令人遗憾的事实引起的。

对西方的失望使俄国工人的眼睛转向东方寻求新的希望。因此，在所有的公开会议上我便成了很受欢迎的演讲者。尽管我不愿意去助长一种新的幻想，可是我还是被邀请在许多会议上发表演说。但是我更愿意谈一些使当时一切有头脑而积极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感到焦急的问题。我同情所谓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反对托洛茨基那被人怀疑的波拿巴主义，但却暗中主张继续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左派共产主义在无产阶级群众中的影响可以从下列事实看出来：我竟然被印刷工人协会和红色普列斯纳区两个主要选区选进莫斯科苏维埃中去了；而红色普列斯纳区就是1917年第一次起义的地方。

我也参加了许多党员会议的讨论。我对反对派左派共产主义的同情使我同它的领导人布哈林的接触密切起来了。他是所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最受爱戴的人。尽管他最年轻，却被公认为仅次于列宁的理论权威。列宁把他看作是他的精神上的儿子。虽然列宁反对左派共产主义，他对布哈林还是温和又温和的。列宁对我的态度也非常亲切。他多次邀我和布哈林私下讨论所有有争议的问题。他毫不掩饰在某一点上他完全赞同反对派左派共产主义；即他们反对托洛茨基计划把国内全部人力实行军事化，并把一个统一集中的军队作为一种凌驾于党之上的力量。

在这样的私下讨论的过程中，我了解到那时列宁就已经

在支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了。当时除了党的核心领导以外，还很少有人知道斯大林。虽然直到两年以后，争夺继承权的斗争才开始，但这个问题早已潜伏在所有党的领导人的心中了。季诺维也夫由于和列宁在欧洲多年的流亡生活中关系极为密切，因此他认为自己是当然的继承人。这也是普遍的想法。后来，季诺维也夫在列宁的支持下当选为共产国际的主席，从而更加强了这种想法。不过，从一开始他就遇到两个难以对付的对手；而他的两个对手又是互为劲敌。这两个人就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托洛茨基认为必须实行军事专政，才能从内战和战时共产主义所产生的混乱中恢复秩序；而斯大林则主张建立严格的党的专政。

我既然了解到列宁几乎无限地信赖斯大林的见解与才能，当然就很想同斯大林结识。不久机会就到来了。我要在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共产国际土耳其斯坦局的活动和殖民地国家形势的报告。我把报告的提纲交给了列宁。自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在殖民地民族主义的革命潜力问题上，我们之间的分歧已经大大缩小了。但在甘地作用的评价问题上，即使到那时也还是不能取得一致意见。那时俄国才刚刚知道甘地的名字。列宁认为印度民族主义的这个新领袖正象中世纪欧洲伟大的异教徒一样，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我认为甘地的宗教和社会思想肯定是反动的，因而我们不能对他的作用作出这样的评价。我一方面承认，作为反帝运动的领袖，甘地在客观上是能够起到革命的作用的；可是我又争辩说，他也有可能走俄国社会革命党的道路。正如普列汉诺夫所描述的，那些人在政治上是革

命的，而在社会上却是反动的。象一个门徒求教于他的导师一样，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由反动的社会思想鼓动起来并带着蒙昧主义宗教信仰的反帝运动，在政治上能否是革命的。列宁看出我的怀疑难以消除，因此同意暂时各持己见，希望经验将能使我们得出正确的判断。

列宁在我给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附加了几点意见。但是他建议我同斯大林详细地讨论一下，因为那时斯大林是民族人民委员，而且被认为是这个问题的权威。几天以后，我见到了他，但他正是重病在身。我第二次见到他几乎是在整整一年以后了。那时列宁遴选他担任布尔什维克党的书记。

由于托洛茨基企图将国家全部人力军事化，特别是由于他主张这样一种理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会没有什么独立的作用可以发挥，它应该并入国家机器。这样就在工人中激起了广泛的不满。彼得格勒罢工浪潮此起彼伏，就表明了这种不满。1921年3月1日，停泊在喀琅施塔得的几只军舰上的水兵和当地驻军发动了叛乱。他们召集了一个市民大会，通过了一个包括党内各反对派的要求的纲领。这个纲领不仅反映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不满的农民大众的情绪，也反映了反对集中管理的工人的情绪。喀琅施塔得叛乱纲领包括下列要求：(1) 给予工会和农民组织的自由；(2) 在不使用雇工和用自己的生产工具经营的条件下，农民有使用土地的充分自由；(3) 用自己的劳力从事手工业生产的权利。

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对那种形势作出了反应，谴责这次叛乱是在芬兰庇护所的白卫军将官们掀起的反革命暴

动。对于这样一种危险的举动，决没有妥协的余地。党和政府下令使用全部军事力量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但是谁也不会忽略这一事件的不祥意义。它是个危险的信号。仅仅在三年前，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们曾经首先举起起义的大旗，那是十月革命的信号。而现在正是那些水兵，在许多工人的支持下，发动了反对革命政府的叛乱！不能把这个叛乱看作一次孤立事件。它的纲领明显地反映了整个国家的不满。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是轻而易举的事。但这次叛乱只不过是一种普遍蔓延的疾病的征兆；要医治这种疾病，就得用猛药啊。

67. 列宁号召退却

在那次严重的危机中，列宁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必须立即批准他所提出的新经济政策，作为补救战时共产主义所造成的损失的唯一措施。列宁早已预见到危机正在形成，于是他就拟订了新经济政策供党内讨论。列宁主张的新政策是号召在经济战线上退却，这必将产生深远的政治影响。那是极为严厉的措施，甚至没有立即把这一机密告诉普通党员。讨论仍然只限于在党的比较高级的领导中进行。可是热烈讨论的微弱反响还是传到了党员和群众的耳朵里。这就使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产生了新的希望，也使普通党员感到严重的忧虑。只是由于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坚定不移的信心，才保持住了无产阶级群众的士气。列宁永远不会背叛革命；的确，

他永远不会犯错误。这是大家的信念。

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正视这样的基本事实：农民阶级是经济形势的主导因素。农民的满意和忠诚是新制度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革命已把土地分给了农民。但是战时共产主义侵占了土地和农民劳动所生产的大部分产品，这就夺去了他们革命礼物的全部经济价值。如果农民不占有土地同时也占有他们自己劳动所生产的产品，那么，法定的土地所有权对他们来说就毫无意义了。

列宁以无限的耐心向党的领导人解释了所有这些显而易见的道理。可是那些人被无产阶级专政的想法迷住了心窍。经济自由不会使农民获得政权，夺取农村苏维埃并争夺无产阶级的最高权力吗？列宁这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面对着信仰上的教条主义了。列宁再一次成了单枪匹马的少数派；他的所有的追随者几乎都怀疑他的观点的正确性。托洛茨基以他的不断革命论带头反对新经济政策。他争辩说，农民在自由市场出售农产品会导致资产阶级的复活，这也就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毁灭。

我很荣幸地能同其他非俄国共产党领导人一道参加布尔什维克党高级领导人的讨论。我支持反对新经济政策的反对派。对我这样一个充满着革命浪漫主义的年轻人来说，新经济政策似乎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教义的否定。那时，我和其他许多人都没有认识到，关于革命后的经济建设问题，马克思一句话也没有写过。托洛茨基看来好象是保卫真正的信念和无产阶级事业的，这给我的印象很深。我也忽视了他要建立军事专政的企图。结果大家都说我是一个托洛茨基的热情赞

扬者和坚定的支持者。他也认为我是这样的人，从那时以后许多年来，他在争夺党的领导权的斗争中，都指望得到我的支持。可是我个人并不喜欢他，尽管我和他一样，都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后果感到忧虑。

喀琅施塔得的叛乱清楚地表明，党必须作出决定。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讨论不能无限期地进行下去了。这次叛乱使直到那时还反对列宁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明白过来了。这事对我也一样起了影响。

列宁告诉全党说，苏维埃国家面临崩溃的危险。苏维埃政府如果不对劳苦大众保证，政府一定注意他们的感情，一定满足他们的要求，这场灾难就不能避免。无产阶级没有农民的支持，便不能夺取政权。新政府要战胜危机以求生存，就得不惜一切代价重新获得这种支持。农民经济是不能用军事和恐怖主义手段使其工业化的。列宁承认托洛茨基在内战时期为革命建立了伟大功绩，曾经支持过他，以抵制党内对他的强烈反对。但是这种妥协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战时共产主义必须结束；为了恢复俄国经济，必须找到一条新的道路。

喀琅施塔得叛乱以后一星期，布尔什维克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了，列宁把他的新经济政策提交大会批准。他在这次会议上的讲演是一篇很有魄力的杰作。全场听了他的宣告都大为震惊。他说：农民群众在“还我自由贸易”的口号下已经起来反对苏维埃政府了。城市的中产阶级对农民表示同情。产业工人对劳动军事化和工会从属于国家机器的政策也表示不满。因此新政权的整个社会基础已经动摇了。

列宁的戏剧性的宣告给全党来了一个电休克疗法。反对

派放弃了各自的教条主义理论，党代表大会全神贯注地倾听列宁讲演。他的讲演实际上是在号召全线退却，并主张一种似乎是对资本主义妥协的经济，因而这就背叛了社会主义理想。列宁向“工人反对派”领导人施略普尼柯夫说，在国家现有的条件下，要建立工业，改变俄国经济的农业性质，并使工人阶级成为经济的主导力量，至少需要十年的时间。在这十年当中，如果农民和新建立的政权疏远起来，将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呢？列宁请求大家要有耐心，然后接着说：只要有一两年不发生饥荒，并有一两年使燃料供应正常，以便工厂开工，我们就可以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百倍的支持，而且可以从他们的队伍中提拔出比现在多得多的人才。

列宁坚持说，危机的背景是农民士兵的复员，致使千百万被遣散的士兵找不到工作，他们唯一的职业就是打仗。这一形势导致了盗匪活动。他说军队复员已经在全国造成重要的叛乱因素，这很可能被反革命所利用。无产阶级仅占极少数，而农民却占绝大多数。农业的混乱和农民的敌对态度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基础。

列宁在结束讲演时建议：布尔什维克党当天就颁布一条法令，废除强行征收粮食，并准许农民在公开市场自由出售他们的产品。这种自由必然会导致城市、乡镇中的小买卖的自由，并使战时共产主义曾企图在一年内消灭的那种自由交换商品的制度得到普遍恢复。

国际形势和国内情况使列宁相信，必须使革命来个急剧的转变。他在这方面总结他的看法时说：“三年来，我们已经懂得，指望国际革命，并不是指望它在一定期限内爆发，……

我们要善于使我们的活动同国内外的阶级关系相适应，以便长期保持无产阶级专政，逐渐消除我们遭受的一切灾难和危机。”^①

甚至在批准了新经济政策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之后，由劳动人民委员施略普尼柯夫和柯伦泰夫人所领导的所谓“工人反对派”仍然在党内坚持反对意见。“工人反对派”带有明显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倾向，它断然要求继续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它也反对党的最高权力。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失败以后，“工人反对派”打算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进行控诉。但在那个争论的问题送到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之前，就先提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秘密会议讨论了。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会议，因为它暴露出政治上的分歧也有个人关系的背景。

施略普尼柯夫首先出场辩论。他是一个很有头脑的讲演者，但不具备一个反对派领袖的资质。他详细论述了他以前提出的论点，即一切权力应该归于一个“生产者代表大会”。列宁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曾劝他要把“生产者”的概念搞清楚。如果这个字眼不是狭义地把无产阶级看作是特选的优秀分子的话，施略普尼柯夫是不能理直气壮地反对新经济政策的，因为新经济政策已承认了绝大多数生产者的权利。

由于托洛茨基的理论和“工人反对派”的纲领有不少类似之处，托洛茨基担心人家可能谴责他暗中支持“工人反对派”。为了洗刷自己，他在辩论的开始阶段就出来干预。他的整个

^① 罗易引用的这段话与列宁的原话略有出入；中间省略了一段话，也未用省略号。我们已根据《列宁全集》作了订正，并加了省略号。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2卷，第169页。——译者

发言并没有回答施略普尼柯夫的论点，而是对柯伦泰夫人进行攻击，主要是人身攻击。他说她是一个拿革命当儿戏的贵族妇人。托洛茨基不公正的攻击为柯伦泰夫人赢得了听众的同情，她凭着这种同情，进行了猛烈的回击。托洛茨基是个了不起的演说家。但是柯伦泰也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有说服力的演说家。被托洛茨基的攻击激怒了的柯伦泰公然指责他有波拿巴主义的野心。原来，“工人反对派”的纲领的目的在于反对托洛茨基把工人置于军事纪律之下的计划。

柯伦泰的演说弄得托洛茨基狼狈不堪，以致列宁赶紧出面来维护他。列宁以有说服力的论点答复了施略普尼柯夫。但是他却无情地抨击了柯伦泰，严厉地批评她是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柯伦泰虽然顶住了托洛茨基的攻击，但在列宁的言论鞭笞下垮了下来，流着眼泪离开了会场。

这个场面是相当戏剧性的。但是听众中没有什么人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两位革命领袖都要把重炮转向一个女人身上。大家开始七嘴八舌、交头接耳地议论开了。其中最有趣的是，过去列宁和托洛茨基都曾经向柯伦泰夫人求过爱，但都失望了。他们在进行报复。对感情放荡的托洛茨基来说，也许如此。但是要说列宁竟会让个人感情占了判断是非的上风，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过后，我有机会询问柯伦泰夫人本人这种传说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我之所以敢于问她，因为她对我很友好，并且曾经很坦率地向我谈过她的私生活。这个老于世故的夫人很可能是要使年轻人有所警惕吧，她听了我的询问便很慈祥地笑了笑说：“不要提起往事吧。对于我们革命者来说，一遇到

政治问题，私人关系就不在话下了。”她几乎不能掩饰她对托洛茨基的怨恨，可是却不肯说一句可能暗含着对列宁高尚品格有所责难的话。我可以设想，就她和列宁之间的关系来讲，那种流言蜚语正好把事实搞颠倒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柯伦泰夫人这样多情的浪漫主义者很有可能爱上了那位党的伟大领袖。列宁虽然人情味十足，却无动于衷。他的个人感情可能是强烈的，但他绝不允许它妨碍对政治或理论问题的看法。

然而我觉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那次历史性的会议上，这样对待柯伦泰夫人是不公平的。可是后来我在同列宁的谈话中，却不敢表示我对她的同情；我也不想对托洛茨基谈到她；因为就他的情况来说，那种传说可能是实有其事。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批准了新经济政策。但是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仍然存在着反对意见。结果引起了第一次清党。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后的一年当中，就有大约百分之二十五的党员被开除出党。不过施略普尼柯夫和柯伦泰夫人都未成为牺牲品。施略普尼柯夫被解除了政府职务，派往国外执行什么使命去了；柯伦泰也被分配去做外交工作。她是第一个获得大使职位的妇女。

我对新经济政策是否明智的怀疑，过了一段时间才告消除。新经济政策是一个退却，它很可能完全失败，最终导致投降。但经验证明，这种退却挽救了革命。我也同样相信，如果那时把新经济政策按照符合逻辑结论的方向进行下去，那么苏联的历史就会大为改观了。其结果也许不会是马克思主义者所梦想的社会主义，而可能是建立起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

这种制度将不那么残酷无情。残酷无情后来竟把苏维埃政府变为一个暴力和恐怖的工具，而不是扩大自由的工具。

布尔什维克党没有权力制订国家的法律。它的作用是政治的，而不是立法的。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只是向苏维埃政府提出的一个建议。如果苏维埃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就必须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按照建议来制订法律。

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那次难忘的会议是在夏季召开的。这是一次公开的会议，它是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党和政府的领导人都坐在台上。剧场广阔的底层的大部分都坐满了会议代表。宽敞的楼厅和一直上升到很高的天花板的六排半圆形的楼座都挤满了公众。可是还有好几千人容纳不下，他们聚集在剧场前面的公园里，倾听从扩音器里播送的大会发言。

苏维埃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宣布大会开幕。他以特有的慢条斯理的方式，一个字一个字地讲话，讲到较为重要的地方就加强语调。他在解释了这次会议的目的后，请列宁说明大会将要通过的新经济政策。

列宁轻快地走上讲台，闪光灯都集中在他身上，他在那高高的讲台上，个子显得矮了一些。雷鸣般的掌声对他表示欢迎，这说明他已赢得了战斗的胜利。

列宁的这次讲话并没有充满着理论上的论证，他的语调也不象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那样庄重、严肃。那次他是对同志们演说，而现在是向人民讲话。他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他在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所有论点后，便下结论说：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但无产阶级专政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个无产阶级。俄国的无产阶级在哪里呢？无产阶

级本来就是少数，而其中将近一半的人又在革命起义和两年内战中牺牲了。只有当新的一代无产阶级成长起来，无产阶级专政才会成为可能。而无产阶级的成长又以发展现代工业为先决条件。但是如果国民经济不能正常化，毁坏了的工业就不能恢复，新的工业也就无法建立起来。既然俄国的经济是农业经济，那么如果不解除农民的顾虑，使他们不再担心农产品会遭到没收，俄国经济也就不能正常化。新经济政策的目的就是给他们这样的自由，并使消费品自由贸易合法化。为了使农民能以竞争的价格在公开市场出售他们的农产品，这两项措施是必要的。

最后，列宁用一句他常说的、但含有伟大智慧的话打动了听众：“我们已经干了一场革命；现在我们应该学习革命的家务管理了。”^①

列宁干脆利落地结束了演说，他离开了讲台，安静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全场顿时起立，热烈鼓掌。会场外面的人群也高兴而宽慰地欢呼起来。显然，列宁的大无畏精神已经解除了压在人民心头的恐惧和焦愁。投票的形式几乎没有什么必要了，因为全体一致同意了列宁的建议。使我惊讶的是，我自己竟然也举起我那莫斯科苏维埃成员的红色卡片，赞成我原先反对的一项措施了。列宁坐在舞台的另一端。但他面带慈祥的微笑，望着我。托洛茨基也坐在附近，他愁眉苦脸，垂着头以掩盖自己的感情。他没有表示赞成，另外几个反对派的领导人也跟着他不表示赞成。

^① 未查到出处，现根据回忆录原文自译。——译者

68.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托洛茨基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报告是这次大会最精采的场面。大会主席的发言主要是谈论德国共产党内不和的问题,接着就是托洛茨基的报告,安排在议程的第一项。虽然列宁作了单独的发言,解释了新经济政策,并要求大会予以批准,但是托洛茨基报告的目的还将说明,俄国的危急局势和国际形势都要求按照列宁的建议实行退却。由托洛茨基作这个报告,真是叫人莫名其妙,但他是代表俄国共产党发言的,而报告的提纲也是由俄国共产党政治局起草的。如果托洛茨基拒绝按照这个提纲作报告,象他过去那样反对新经济政策,那他就会受到破坏党纪的谴责。既然他还要依靠列宁的支持,他就不会这样做。

尽管如此,托洛茨基的报告还是共产国际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运用共产国际情报局收集的大量资料,以无与伦比的口才描绘了一幅世界经济形势的生动图景。他讲了三个小时,先用德语讲,然后又把自己的讲话译成法语,最后,参加大会的俄国来宾要求他再用俄语讲一遍,他也照办了。他总共讲了九个小时,中间只有几次很短的休息。无论他用哪一种语言讲演,几乎所有的大会代表和俄国来宾都留心地听着,人们无须弄懂他在讲些什么,只要听着他那滔滔不绝的语言就能为之陶醉了。演讲者身着整洁的军装,一动也不动地站在讲坛上,活象一座塑像;这种风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托洛茨基的身高比中等身材的人要矮一点,但他一站到

台上就显得高了些。据说,在特殊的场合,他就穿上后跟较高的鞋子,那样就使他显得高一点。托洛茨基具有极好的品质。但他也是一个傲慢而自负的人。

这种局面颇有点不是味儿。一般说来,托洛茨基的报告应该是主席的开幕词的一部分。这个报告要概述一下世界形势,以便为各国共产党制订最近将来的战略和战术。这次之所以打破常规,是因为列宁想给托洛茨基一个机会,使他不失体面地放弃他所采取的反对新经济政策的立场。季诺维也夫却觉得那是列宁对托洛茨基的偏爱,那样可能会降低他自己的威信。因此,当他的对手以无比的演说技能把与会者弄得神魂颠倒时,他以主席的身份坐在台上,当然是很不高兴的。

在会议开幕时,大会选举了主席团以领导大会的审议工作。我是主席团成员之一,在台上坐在季诺维也夫的旁边。在托洛茨基讲话中间,季诺维也夫要求我在他不在时,代替他当大会主席,然后他就站起来,离开了会议厅。这种做法是不很妥当的。我相信参加大会的不少人能够看出这个举动是什么意思。季诺维也夫此人嫉妒心十足,他对这种情况是不会乖乖地忍受下去的。会议主席没有什么事情可做,那就与一名普通的代表一样了。托洛茨基陶醉于自己的嘹亮声调,也意识到了列宁对他的偏爱,所以根本没有注意到周围的一切。听众也都听得着了迷。会议没有受到干扰,进行得很顺利。唯一的间断是讲演者自己造成的。许多强力的闪光灯从近处照在他身上。当时正是7月,夏天的莫斯科有时还是很热的。大厅里济济一堂。托洛茨基一定感到很不舒服

了,他用手指在衣领周围划了一下,对摄影师大发雷霆:“你们干什么啦?难道想把我憋死不成?不要再瞎照了,否则我要踢翻你们的照相家伙啦!”大会主席终于有事可作了:叫摄影师离开大厅。但是他们在答应要求以前,禁不住还要再拍一个他们大概认为是非常吸引人的镜头。闪光灯又对准托洛茨基了,他眼睁睁地看着摄影师的这种暴行,毫无办法,他就转向大会主席,请求保护。我站起来,挥手叫摄影师走开。这个镜头看来使摄影师着迷了。经过这一小小的干扰,托洛茨基又专心一志地讲下去,再没有遇到麻烦。

报告的中心论题是:世界资本主义已经渡过战后危机,稳住阵脚来抵抗任何革命的进攻了。托洛茨基以丰富的统计资料说明了这一论点。其政治结论是:世界革命早日发生的可能性已不再存在了。因此,无产阶级也必须退到准备好了的阵地上,加强自己的组织,等待另一次世界资本主义危机提供的机会。按照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推算图,另一次危机是不可避免要到来的。托洛茨基在大谈其违心之论的同时,还试图暗示:他并不完全同意列宁推行新经济政策的主张。他暗示说:即使世界资本主义恢复了自己的阵地,也只是有个暂时的稳定而已,因此,无产阶级必须随时准备转入进攻,揭开世界革命史上的新篇章。

我不知道许多代表是否都觉察到了托洛茨基这种论点的细微差别。可是列宁肯定是看出来,当时他坐在前排,注视着托洛茨基讲话,仔细地掂量着他讲的每一个字。有时列宁几乎令人觉察不出地摇摇头,表示他不同意。托洛茨基一定也在注视着列宁。每逢看到列宁不同意的姿态时,他就急忙

停下来，巧妙地证明那些看来与报告的中心论题相反的话，实在都是为了强调中心论题才讲的。

托洛茨基在大会公开会议上所作的那个报告，事先曾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进行过讨论。当时就发生了热烈的争论。我坚持认为托洛茨基对英帝国主义形势的分析是错误的。事实上，就英国来说，战后的经济危机在1921年就达到了顶峰。所谓无形输出，是英帝国主义的基础。无形输出指的是国外投资的利润、英国航运业的收入以及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佣金。自本世纪初以来，无形输出一直维持着英国贸易的国际收支平衡。英帝国主义的这种稳定因素，在战后的年代里是每况愈下，到了1921年几乎达到了消失的地步。对这种趋势仔细地分析一下，就可以导致这样一个结论：英国国际收支差额在下一年将出现赤字。结果不出所料。这就激励我着手进行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写一本名为《英帝国衰亡史》的书。书名确实是抄袭而来的，但起得非常恰当。在1930年我离开欧洲之前，我一直与英国共产党党员休·拉思伯恩合作，从事这部书的写作。我们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但是我在不正常的情况下旅行时是无法随身携带那些东西的。我把那些资料装在一个大箱子里，留给了柏林的那家约定的出版商。但由于那是一家共产党人开办的商号，所以希特勒一上台，它就遭到了突然搜查。于是，多年来的工作成果，连同被纳粹分子列入黑名单的其他许多书籍和报刊都被付之一炬。

刚刚到达莫斯科的匈牙利人约瑟·波甘伊，也积极参与了对托洛茨基报告的讨论。他很聪明，觉察到这个报告是对

托洛茨基反对新经济政策的一种抵赖。几乎人人都知道，托洛茨基一心想要继承列宁做党的领导人，但他的野心却遭到了列宁最亲密的同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的反对。精明的政客波甘伊觉得，如果他第一次在共产国际的论坛上露面就与托洛茨基交锋，一定会博得很高的名望，同时也会赢得想和托洛茨基争作列宁继承者的那些人的信任。但是他做得太过火了，招惹了托洛茨基雄辩术的迎头痛击。托洛茨基以辱骂式的讽刺，奉劝波甘伊放谦虚些，并说如果他胆敢对俄国共产党政治局的意见吹毛求疵，最好先熟悉一下形势。

我对报告提出了修正，其政治结论是预期英国会早日爆发革命。但我又补充说，由于英国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共产党，这就又不能抱那种期望了。我要得出的政治结论是：英帝国主义的经济衰退排除了英美战争的可能性。托洛茨基在报告中暗示了英美战争是可能的，而且那也是共产国际多年来的一个信条。英美战争将是下次世界革命高潮的信号。由于世界革命的高潮不可避免，这个信号就是很需要的。

为了驳斥这种观点，我辩论说，英国宁愿与大西洋彼岸的亲戚结成同盟，也不肯对美国——一个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控制一切的经济大国——进行战争的冒险。而且血浓于水，英美同盟的可能性更大，尽管英国在同盟中只会是个小伙伴，因为这种同盟将成为保卫世界资本主义最坚固的堡垒。

托洛茨基似乎被我的论点感动了——他有这样的表现确实是罕见的。此人极端狂妄自大，除了列宁之外，谁也不曾感动过他；而那也不总是出于对列宁心悦诚服，而是为了投政治之机。可是，他却要我去看他，以便进行私下讨论。这是我第

一次与他面对面地相会。这次讨论是一次令人愉快的经验。毫无疑问，托洛茨基是个极有才华的人，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但我猜想他也不会没有演说家共同的弱点。这些人很重视使用语言的技巧，却不甚重视语言所表达的思想。那些为他的报告收集材料的人们竟然把我在讨论中所引用的有关英帝国主义形势的证据遗漏了，这使托洛茨基大为惊奇，他承认报告中有关英国的部分必须修改。由于托洛茨基是一个世界革命即将来临的狂热信徒，所以他不大愿意承认英帝国主义的严重危机促不成革命的迅速到来。世界革命能不能在帝国的外围开始？我对这一点是不能抱有任何希望的。不过托洛茨基对殖民地国家的形势是不太感兴趣。他是个很了不起的欧洲人。他深信下一次革命将在德国发生，然后那场革命将蔓延到欧洲其他地方。因为德国问题是大会议程上的第二个重要项目，所以我们也简单地讨论了一下。

然而，托洛茨基并没有对他向大会所作的报告进行很明显的修改。第二年，他出版了一本轰动一时的书，书名是《英国何去何从？》。那本书是他与我讨论以后写的。书的主题是：英国必须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走向社会主义还是成为美国的附庸。

虽然我们初次的私人讨论使我们互相之间有了更好的了解，也增加了我对托洛茨基的尊敬，但就我个人说来，我永远也不能和他成为知己。有这种莫名其妙的经验的人，不只我一个。托洛茨基从不培养个人之间的亲密友谊。他落落寡合，以虚荣和傲慢的盔甲来掩饰他那自愿的孤单。但除非碰上想要刺穿他那盔甲的人，他一般是不耍威风的。另一方面，

除非他对群众发表慷慨激昂的讲演并赢得他们的敬慕，他并不喜欢处于群众之中。人们都知道，在托洛茨基经历非常丰富的一生中，他只有两个私交——法国共产党人艾尔弗雷德·罗斯默和罗马尼亚的拉柯夫斯基；他们在俄国共产党的等级制度中都处于很高的地位。托洛茨基甚至和同他地位相当的人也不随便交往。在历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期间，俄国共产党领导人在经常举行的宴会上，都和外国同志打成一片；而托洛茨基却从未参加过任何那样盛大的社交宴会。终年劳累的共产党人都在那样的社交集会上休息、娱乐一下，托洛茨基则避不参加，据说是因为他不愿同别人一道喝酒。他不是清教徒，也不是绝对戒酒者。他不愿参加那种同志式的社交集会的娱乐活动，很可能是由于害怕“酒后失言”吧。这种判断对于托洛茨基的人品可能是一个不利的反映。他似乎是极力要隐藏些什么。他不建立私人间的友情这件事，也可以证明这种判断是正确的。

可是，我们第一次面对面的会见和私下讨论，使我们在政治上接近起来。虽然在很多重大问题上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他的人格却吸引了我。他正在匹马单枪地对抗着那些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强大的联合，这也使我对他表示同情。我这种态度欺骗了托洛茨基，他把我也当作他的一个支持者。就我来说，我觉得他对我的态度不象对其他人那样疏远，确实是很有感情的。这也许是我的一种错觉吧。

无论怎样，我认为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不和对革命是很大的不幸。除列宁以外，这两个人都是革命队伍中最伟大的人物——各有各的伟大之处。这两个人合在一起，就可

能继承列宁所留下的空位。在以后的几年中，我曾经极力使他们和解，但都失败了。最后，在托洛茨基一生的最紧要关头，我不得不拒绝支持他，这使他大失所望。这不是我个人的选择。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不得不按照原则作出抉择。

69. 布尔什维克的黄金及其对共产主义运动所起的败坏作用

在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取政权后满怀希望的年代里，为了促使欧洲所有国家的革命早日来临，苏维埃政府在那些国家乱花了大量的金钱。这种做法的依据是列宁的格言：无产阶级在一个国家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准备牺牲一切，以帮助其他国家的同志们进行不可避免的革命。

把大量金钱从一个国家送到另一个国家，是很困难的。新政府拒绝支付沙皇时期欠下的外债，又将外国在俄国的工业资产收归国有，因此，它在国外已丧失了信用。由于协约国的封锁而造成的贸易中断，使俄国无法出口商品，而这种商品交换本来是可以在国外积累一些财产的。沙俄的货币当时还在流通。但是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它已经贬值到几乎是一张废纸，因此也就不能在外国兑换了。苏维埃政府发行的通货是不兑现的纸币。印刷机印的新货币达到了惊人的数字，以致它的实际价值变得一文不值。苏维埃政府既然取消了以金钱作为交换的媒介，它发行的通货自然就没有货币价值了。这

种货币的流通不是作为交换的手段，而是作为宣传的工具。在票面价值很高的纸币上，用几乎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以鲜艳的颜色印上了世界革命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在对外贸易中断的同时，俄国在国外的国家资产也被敌对的资本主义大国冻结了。即使在这样困难的形势下，苏维埃政府还是能够输出大量的黄金、白银和硬币。不过大量的黄金运到外国港口自然会引起怀疑，很有可能被没收。在革命的最初几年中，新政府采用了一个非常新奇的办法来资助国外的共产主义运动。皇室的大量珠宝被秘密地运送到国外，换成现金。这种活动必须秘密进行，因为敌对政府会把珠宝看作是偷窃的财产而加以没收，这样的事情他们干过好几次。因此，这种做法虽然头几年还能蒙混过关，但后来就不能继续下去了。要想合法地转运布尔什维克黄金到国外去，必须等到与德国、然后与英国恢复贸易关系。

向国外运送大量金钱虽然有这么多的困难，而且对国民经济也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害，但确实是大大地促进了其他国家的革命事业。因此布尔什维克黄金的流入就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各国政府的梦魇。不过，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否能够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健康发展，还很难说。时间一长，它就对运动起了腐蚀和败坏作用。但开始时，它确实是在全世界发展革命组织的一种有力手段。

在俄国革命爆发及其以后的几年中，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都是人数很少的组织，对于各自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也很小。俄国在财政上的帮助，使具有高度热情和理想但几乎没有物

质来源的那些小的共产党发展成为大的、并能发挥有效作用的组织。他们第一次能够建立由领取工资的职员组成的机构。他们也能建立一个自己的印刷所，印发大量的宣传品。不久以前还是些微不足道的小团体的各国共产党，现在却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这给中产阶级中那些主张社会正义的人以深刻的印象。工人运动中各种各样的左翼分子也都聚集在这种新的党组织的旗帜之下了。

从以上事实可以合理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是没有布尔什维克黄金的流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不可能成为一股力量。但是这种形势有一个阴暗面，这在开始时没有引起注意。一点是，这些共产党变成了俄国的附庸。由于国内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重要问题，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抽不出很多第一流的党员来管理共产国际的事务。因此，这个任务就留给了二、三流的人物去担负。他们利用掌管金钱的大权，要求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卑躬屈节地服从他们一时的兴致和很不高明的政治领导。每个共产党内的大批领工资的职员势必丧失他们原来的革命理想，把党组织变成了官僚机构。此外，早期那种偷运沙皇珠宝非法变卖的做法，也使共产党领导人接触了一些可疑的人，而这种交往使不少人学坏了。事实上，受委托负责财政工作的非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不可避免地腐化堕落了。

我在柏林期间，会见了一家私营小银行的董事，要他把我手头上一笔数目相当大的英美货币兑换成德国货币。在他家里举行的一次社交会上，老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考茨基奚落他代表德国所有三个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投机倒把的活动。这件

事说明了由于需要而进行非法财政交易所造成的局面。

不久人们就认识到，以金钱接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这种早期的做法，不仅导致了腐化和道德败坏，而且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可是这种做法如果停止，又必然会伤害年幼的共产党的成长。大家觉得必须进行一定的控制。共产国际中央机构作了适当的改组。一个叫作国际关系部的秘密活动的新机构成立了。这个新的部门本来只是打算作为一个技术管理的工具；但是由于它是向国外共产党输送金钱的渠道，因此很快就具有与其职能很不相称的重要地位，几乎使共产国际的政治书记处都黯然失色了。

德国形势及德国共产党活动的问题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议程上占有突出的位置。德国共产党由于在德国中部暴动问题的争论而产生了裂痕。仍然以保罗·莱维为首的党领导谴责“三月行动”那一次地方暴动是不成熟的和冒险主义的行动。另一方面，认为暴动是正确的那一派指出那次暴动是经过共产国际俄国领导人批准的。无论怎样，共产党内的这种争论必须得到调解，否则党就要瓦解了。保罗·莱维已经在对抗俄国人的领导，并把布尔什维主义说成是亚洲的野蛮主义，对文明的德国工人没有号召力。人们觉得，在这种形势下，需要派一位有权威的共产国际代表亲临现场。于是作为共产国际德国问题专家的拉狄克就被选派前往德国担任党的实际领导人，以接替象保罗·莱维及其同伙那样持不同意见的领导者。

拉狄克一走，共产国际总书记的职务就空缺了。一位名叫奥西夫·皮亚特尼茨基的老布尔什维克参加了共产国际，

当了共产国际新成立的国际关系部的部长。尽管他实际上当了共产国际的总书记，但他并不具备这个职务所要求的政治威望与才干。自从一年前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以来，许多匈牙利共产党人以政治避难者的身份来到了莫斯科。由于只有他们真正搞过一次革命，而且在俄国以外居然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因此他们很有威信和名望。他们在国际上也是闻名的，尤其是曾经担任过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领袖的贝拉·库恩。因此，他是最有理由候选共产国际总书记职务的人。可是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一个成员被派到德国去了。最后，这个人选落到了如今名声很响的马蒂亚斯·拉科西的身上。他曾是匈牙利苏维埃政府的成员。拉科西升到这么高的位置，形式上虽然是俄国共产党政治局提名，实际上却是皮亚特尼茨基选中他的。此人无大才智，却以矜夸来掩盖他的庸才本质。拉科西和皮亚特尼茨基上台后，俄国共产党一些二、三流人物和国外的拍马逢迎之辈也都涌进了共产国际总部。结果是，为了发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而建立的这个组织开始变质了。

拉科西在他身边用了一大批秘书，借以显示他的重要性。这些秘书大都是德国共产党的年轻女党员。在具有批评眼光的人们看来，拉科西用这种稀奇的方法来显示他的重要性，并没有提高他的权威和声望。恰恰相反，这却使他变得荒唐可笑。当时有一种恶意的传说：拉科西修改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的理论，把社会进化分为三个阶段：母权制社会、父权制社会和无产阶级社会。风传这位共产国际的新书记主张，即使不在理论上，至少在实践上，“秘书社会”（the “Secretariat”）

将继“无产阶级社会”（the “Proletariat”）之后，成为社会进化的最后一个阶段。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了一件事，暴露了拉科西在精心养成的傲慢态度下所掩藏的卑劣品质。

那是在一次共产国际的“小型政治局”（最高执行机构）的会议上，要讨论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几位与共产国际没有正式关系的俄国重要领导人将出席这次会议。会议在全体外国共产党人居住的“豪华饭店”的前厅里举行。为了保卫会议秘密进行，门口布置了武装哨兵。一会儿，拉科西在几位私人秘书的陪同下来了。他刚走到门口，两旁的哨兵就把枪交叉在他的面前挡住去路，要他出示身份证。拉科西勃然大怒：普普通通的士兵怎能冒犯他的尊严？他大声说：“难道你们不认识我吗？我是共产国际的总书记。”他想推开卫兵，走进房间。但卫兵们摇了摇头，再次要他出示身份证。这件事引起了屋里人们的注意。布哈林走到门口，温和地劝慰那些认为自己在执行职责的哨兵，并请求拉科西出示身份证。布哈林强调他的请求说，屋里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必须向卫兵出示身份证才能通过。

尽管拉科西这样自命不凡，他却是皮亚特尼茨基的一个奴才。皮亚特尼茨基在很短的时间内竟成了共产国际那个机构的实际上的老板。在革命前的日子里，他一直从事于把国外出版的材料偷偷运进俄国的工作。由于他有这种经验，所以被认为是负责共产国际地下组织最合适的人物。然而分配给他的主要任务是掌管开支，不仅是中央机构，也包括其他接受金钱的国家。各国的全部共产党组织，都年复一年地派遣自己的代表带着来年的开支预算来到莫斯科。虽然这些预算

形式上要提交共产国际书记处，而且必须经它批准，但批准与否实际上全凭皮亚特尼茨基最后一句话。他被认为是俄国共产党政治局信得过的人。由于他掌管金钱，所以就专横地控制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机构。他组织了一个庞大的间谍系统，监视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他的特工人员都以“联络官”这个无害的头衔被安插在各国共产党的总部里。他们都是些没有政治才干的小人物，以前大都是俄国秘密恐怖组织“契卡”的小职员。可是他们那通常出于个人恩怨的报告，却毁坏了许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政治生涯。也是由于他们的建议，许多老练的领导人被撤职，代之以善于拍马谄媚的人。

事实上，皮亚特尼茨基在共产国际中起着很坏的作用。我坚决地反对他的工作方式，因此，从一开始就必然招惹了他的不满。但他假装把我当作他的一个宠儿。由于外国共产党领导人很想得到比正当需要还要多的金钱，因此，他们就把他们自己置于皮亚特尼茨基的控制之下。当时印度还没有共产党，而我在国外所能做的工作也不需要很多钱，因此，我只要求数目不多的经费，而且每到年底还能交回一部分钱，这就使皮亚特尼茨基大为吃惊。居然有人能够避开他的控制，这使他大为烦恼。可是，我有与俄国的高级领导人接触的门路，而且他们总是愿意听我的。就是由于这个简单的原因，皮亚特尼茨基才不得不对我装出一副友好的态度。但很明显，他是不喜欢我的，并且一再企图剥夺我对印度革命工作的领导权，而把这个任务授给英国共产党。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代表印度，因此我并不反对共产国际通过伦敦与印度联系的方案。不管怎样，这个方案并没有执行。唯一的结果是，共产国际拨

给英国共产党在印度开展工作的经费，比我以前所要求的超出了许多倍。虽然拨出的经费很少用于原来的目的，但却从来没有交回一文钱。

到了最后，我不能避免与皮亚特尼茨基发生冲突了。他控告鲍罗廷盗窃了沙皇的珠宝。那些珠宝是鲍罗廷偷运出来交给苏联在美国的贸易代表的。我已经叙述过鲍罗廷在墨西哥同我进行接触的情况。鲍罗廷已经对我讲了丢失珠宝的经过。在得到墨西哥政府的默许后，我煞费苦心地想把珠宝找回来并查明了鲍罗廷所讲的情况属实。皮亚特尼茨基向管制委员会控告鲍罗廷挪用和私吞公款，有一天，我被叫到管制委员会去作证。根据我的证据，鲍罗廷被宣布无罪。我从皮亚特尼茨基的魔爪下夺走了他的一个牺牲品，他是永远也不会饶恕我的。但这并不是由于我的作证，而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鲍罗廷无罪。他收到了住在芝加哥的他妻子的一封信，说有一位自称作过奥地利军官的人访问她，交给他三个崭新的手提箱，说那是鲍罗廷在西印度群岛中的某一个岛上托他保管的。鲍罗廷立即发电报让他妻子带着那些箱子前来莫斯科。箱子被砸开了，所有的珠宝都原封原样在里面。

70. 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决定撤销共产国际土耳其斯坦局，而由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部设立东方司，接管

在殖民地世界促进与指导革命运动的任务。以中亚为基地同亚洲各国革命运动建立联系的尝试既然证明收效不大，便决定责成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今后在他们各自国家的殖民地进行类似的尝试。在这方面，他们的活动要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司的指导，而东方司也应该得到帝国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的协助。在这种新的安排下，非洲、南美国家也和亚洲一样就都包括在共产国际的活动范围之内了。由于美国对新大陆的控制，南美被认为是一个半殖民地地区。

决定要我回莫斯科去主持共产国际东方司，以便使在中亚已经开始的工作继续下去。不过，我早已打算在撤销为发展印度革命运动而创立的中亚基地之后就到西欧去。为此，我谢绝了接任共产国际总部东方司的工作，并推荐萨法罗夫去担任那个职务。但是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需要同萨法罗夫商量一下，还必须弄清俄国共产党是否愿意解除他在中亚的任务。无论如何，我要到中亚去结束一下共产国际土耳其斯坦局的工作，解散印度军事学校，并且安排好那里的印度革命移民的前途问题。对于移民中的大多数人，我是不大关心的。可是经过一年来的努力，我终于把少数狂热的穆哈吉尔转变为一小批有觉悟的革命骨干分子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受到共产主义的强烈吸引，渴望在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接受进一步的训练。在考虑他们的前途问题时，我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在莫斯科建立一个亚洲各国革命者的政治训练中心。

列宁热烈赞成这个意见，并且劝我去找斯大林商量怎样付诸实行。在共产党人怎样处理少数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问题

题上，斯大林是俄国共产党内公认的权威。可是，斯大林当时身患重病，内战的艰难困苦使他的生命危在旦夕。至少在几个月之内，我不便去打搅他，同他认真地讨论政治和组织问题。

在革命初期，外交人民委员会起到了在国外进行革命宣传工具的作用。它在塔什干设有一个办事处，同共产国际土耳其斯坦局配合工作。由于外交人民委员会塔什干办事处实际上是在周围国家进行革命宣传的中亚基地的一部分，所以它也得关闭。因此，列宁劝我去同齐采林讨论今后的活动计划。齐采林收到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勋爵关于塔什干印度军事学校的照会后，建议把东方的革命宣传基地迁到一个比较方便的地方。他热烈赞同我的想法，即在莫斯科建立一个训练亚洲各国青年的中心，以便他们在各自的国家进行革命工作。他也认为我提出的从西欧同印度建立联系的那个计划可能更为有效。由于阿富汗政府的不友好态度，我们在中亚没有好多工作可做了。

1921年年中，印度不合作运动的消息传到了莫斯科。俄国共产党人对此欢欣鼓舞，认为印度正处于革命分娩前的阵痛中。不合作运动被解释为一场群众性的革命大动荡。尽管齐采林头脑冷静，遇事好疑，但也同样热诚地相信印度革命即将到来。在谈到我同列宁曾讨论过关于不合作运动的革命可能性，特别是甘地的作用时，齐采林说我过于悲观了。听了我为我的观点所提出的论点以后，他建议我写一份有关印度形势的综合报告，为俄国共产党提供情报和指导。这个报告应当包括对不合作运动的社会背景的分析。我同意写这份报告，

但要求让我从土耳其斯坦返回之后再写。在目前，为了说明我认为不合作运动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没有什么革命潜力这一观点，我只简单地概述一下当代印度社会的结构以及不合作运动的阶级成份。齐采林要求我在写出那份内容广泛的文件之前，先写出一份报告提要。那份文件后来成了我写的《过渡时期的印度》一书。

在塔什干，我毫不费力地就结束了共产国际土耳其斯坦局的工作，但是解散“印度之家”却是个难题。怎样安置那些印度移民呢？我向那些受过政治训练的、有头脑的少数革命者吐露了秘密，告诉他们设立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的计划。他们非常热情地欢迎这个计划，都渴望到莫斯科去。但是除了经过挑选的少数人以外，我不愿意把其他人一直带到莫斯科去。我仔细检查了塔什干军事学校的学员名单，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二十五人可以进计划开办的共产主义大学。

几天以后，在全体印度移民大会上，我宣布了关闭军事学校的决定，并询问他们打算怎么办。时间一长，他们那股前往土耳其为保卫哈里发而战的狂热已经冷却下来了。塔什干的印度人集中地即将被解散的前景似乎使与此有关的人们都惶惶不安。但是谁也不愿回到印度，投身于那里的反英运动。过不了几天，“印度之家”就要关闭了，他们怎么办呢？其中一些人打算在土耳其斯坦落户，做点小生意过活。另一些人，如果能得到一些金钱帮助的话，就想到波斯或者阿富汗碰碰运气，那些胆子更大的少数人则准备冒险穿过东布哈拉的无人地带，到印度的西北边境。

于是发给每人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钱。那些没有政治倾

向的多数人便按照他们各自的选择，分批踏上了归途。这是一段令人痛心的经历。但是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总不能漫无目的地把将近一百名的移民无限期地留下来啊。根据后来接到的报告，他们在回家的路上情况还不算坏。但是他们是不是确实到了家，到了家又都做些什么，我就知道了。根据我同他们将近一年的接触，我认为对他们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因此，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愿望回家或者随便到哪里去，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在留下来的那些人当中，我们挑选了二十二名到莫斯科去，进入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有三个人想参加红军，也得到了许可。那些被选派去接受进一步政治训练的少数人很高兴，因为他们摆脱了其余的那些人。到莫斯科去的想法使他们兴奋已极，他们决心充分利用这个意外的机会。

一年半以前，我怀着极大的期望离开了莫斯科。在中亚的那段经历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在那里，我为印度做不了什么事。可是我并不失望，因为我得到了直接为革命事业服务的机会。同时与印度群众各阶层代表人物的接触，也驱散了我以前的一些幻想，使我对他们有了实事求是的看法。我深信印度革命还是遥远的事，前面的路途还很艰险。只凭武器和金钱是搞不成革命的。革命的军队首先应当受到政治上的训练。自从1915年离开印度以来，我走遍了世界各地，才带着大量的武器和金钱到达了离祖国边境很近的地方。当初正是为了寻求那些东西我才离开印度的啊。可是当我能够得到充分的武器和金钱时，我却发现：如果还没有人愿意扛起那些武器，就去寻觅武器，那是无用的。我相信，假使我在中亚掌

握的那批物资能够运到印度边境，它们也很可能被敌人夺去，或者被雇佣的冒险家们所滥用，要不然就是弄丢了。因此，我是以失败的经验而不是以悔恨心情来结束我一生中动人的这一章的。现在，我必须寻找达到我的目标和帮助印度革命的其他方法了。

在离开土耳其斯坦回到莫斯科之前，我结识了一个青年。在我呆在俄国的整个期间，他一直与我交往甚密。一天，他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塔什干办事处前面走近了我，问我是否需要一名译员。我又惊又喜，因为我正需要这样的人呢。原先来到塔什干担任我的秘书兼译员的那个美国人，当我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时，曾陪我一同前往，但却不愿再回来了。因为我第二次访问塔什干为时很短，也就没有再找代替者。与我接触的这个青年人在许多方面都很卓越。我感到他在许多事情上将对我大有帮助。于是我请他陪我一道走走，以便我们把这件事情商量一下。

他年纪很轻，确实比他的外表要年轻得多。他身材矮小，留着略长的黑发和尖胡须。从他那高鼻梁和黑肤色来看，他显然是个犹太人。他自我介绍说，他家住在巴库，他就出生在那里。从一开始他就积极参加了革命，但不愿参加共产党，因为从信念上说，他是个神秘的无政府主义者。即使他愿意入党，他也办不到，因为他的父母都是资产阶级；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里。尽管如此，他还是参加了在巴库和附近地区打得很激烈的内战。好动的性情和冒险的精神驱使他四处奔波，最后他以记者的身份来到了塔什干。当我问他为什么来到中亚而不前往莫斯科时，他说他的梦想是去印度

帮助那里的革命。他听说塔什干正在招募一支解放印度的军队，他便赶来这里参军。既然他不能马上到印度去，他很愿意同我一道工作，如果我觉得他合适的话。

他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后来，我还发现他的德语和法语也讲得同样好。他没有出过国，外语是在学校里学的。他的姓是莱维特，为了隐瞒他的身份和犹太血统，他自称为蒂维尔。不上几天功夫，他的才智、诚挚与工作效率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就委派他作我的秘书兼译员。但是他是否愿意陪我去莫斯科呢？他说很高兴去，因为他没有机会到印度去，而他又不想在土耳其斯坦呆下去。

蒂维尔乐于做我的秘书和译员，并以那个身份前往莫斯科，这倒为我解决了一个难题。怎样把那二十二名被选拔进入共产主义大学的印度人送到莫斯科呢？我既不想亲自带领这支队伍旅行，又不能放手让他们自己去长途跋涉。乘火车旅行仍然是很危险的事。旅客们很可能在旅途中某一个地方搁浅。蒂维尔欣然答应负责赶着这群人到莫斯科去。他很高兴同这些印度同志们密切交往。

我同萨法罗夫和在塔什干的其他俄国领导人商量后，作出了决定：既然已经解散了军事学校，并已把大多数印度移民打发回家或者去他们愿意去的地方，我就应该先回莫斯科进行筹备开办共产主义大学的工作。蒂维尔得到我的消息后，将同印度学生一起随后赶到。遣送那么多印度人回去并发放给他们路费的计划是保密的。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到，他们在阿富汗或波斯将被英国宪兵当作去印度捣乱的布尔什维克奸细抓起来。我们的计划是把他们分成小批秘密送出，并指令俄

国边防军极端秘密地把他们送过边境。到了俄国边界的那一边，他们就只能凭自己的本领应付一切了。无论如何，不管他们遇到什么情况，我们是不负任何责任的。因为他们一再拒绝按照我们的意见，把他们自己训练成为聪明能干的革命宣传人员，而是自行其是。实际上，他们对于发给他们的金钱帮助是十分满意的，他们似乎没有料到会有那么多。

可是，我们在土耳其斯坦政府主持的一次公开集会上，还是宣布了结束共产国际土耳其斯坦局和解散印度军事学校的消息。由于那两件事都可能在邻近国家引起不利的反响，因此需要作一番解释。在那次公众集会上，萨法罗夫讲了话，说明为什么要撤销共产国际土耳其斯坦局：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国际不再关心亚洲民族的解放斗争了；而是因为经验证明这个机构不能有效地履行它的职能了。共产国际在各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分部必须在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中起积极作用。共产国际将督促各帝国主义国家分部尽其职责，这样就能更加有效地执行它帮助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纲领。根据这样的考虑，共产国际土耳其斯坦局的工作，今后将直接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接管。这一变动的结果，只会加强共产国际在促进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发展方面的活动。

我必须发言，说明解散印度军事学校的原因。我说，军事学校的设立本来是一个权宜的措施。既然一大批印度人偶然来到了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土，苏维埃共和国自然就得好好接待他们。他们都自称是革命者，因此我们觉得那样的款待有助于实现他们的目的。共产主义者认为，革命是一件好事，它必须有一个社会目的。因此，我们曾经想使印度移民认识

他们的革命目的。但是他们坚持要学习使用武器。我们不得不满足他们那个要求，以免他们对苏维埃共和国所表示的诚意失去信心。不过，这种权宜的安排在帮助相当多的军事学校学员认识革命目标和革命者的责任方面，还是起了作用的。在塔什干开始的这项工作，要在即将创办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更加细致、规模更大地进行下去。那些充分利用了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盛情款待的印度同志们，现在就要前往莫斯科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以便能够尽快返回家乡，重新开始必将获得更大的成果的政治活动了。

71. 第一次会见斯大林

1920年春天，我到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不在那里。内战还在俄国南部激烈地进行着。斯大林在内战中起了非常杰出的作用。由他指挥的位于伏尔加河下游的察里津的保卫战是内战期间一个重要的插曲。因此，察里津后来就以他的名字命名，称为斯大林格勒。当时苏联最大的钢厂就建立在那里，而德国未能夺取那个强大的工业基地，扭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缅怀斯大林早期的英雄业绩肯定会在情感上极大地激励着这座城市的英雄的保卫者，这座城市就是为了纪念斯大林的英雄业绩而建立起来的。如果说，斯大林格勒战役挡住了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逆流，那么，二十年前这座城市的保卫战则标志了内战的转折点。

察里津保卫战严重地损害了斯大林的健康；随后，他又奔赴西线，担任红军左翼的政治委员。那支部队在托洛茨基的指挥下，正准备穿过波兰向中欧进军。在那些日子里，除了党的核心人物以外，很少有人知道斯大林。在欧洲多年流亡的党的主要政治家中，他也不是很有名望的。他们在早期布尔什维主义的女家长安捷里卡·巴拉巴诺娃的客厅里聚会时，一提到这位察里津的英雄则呼之为“军人”，说他那样的人很可能要按照军人的模子来铸造党。但是他们判断错了。因为那时斯大林已在进行维护党的最高权力的斗争，而要求实行军事专政的则是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解释华沙城下失败原因的时候，他把责任推到由斯大林担任政治委员的左翼部队身上。托洛茨基说，左翼部队没有得到他的命令就冲到前面去了。不管真实情况怎样，托洛茨基的解释就是他们两人对抗的初次表现。

甚至斯大林在党内还是一个实力难测的黑马的时候，就已流传着他得到列宁信赖的说法。我从列宁那里得悉这种说法基本属实。列宁说，我和他在殖民地民族主义的革命作用问题上的分歧，还得找斯大林请教请教。但是我不能马上见到斯大林。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我到中亚去了，在那里一直呆到1921年的夏季。当我回到莫斯科的时候，听说斯大林已经回到首都，但病得很厉害。察里津被围时的艰难困苦——九个月的苦战中，除分配极少量的死马肉以外，再也没有什么食物——以及后来在西线的战斗生活，几乎把他拖到死亡的边沿。对于这样一个重病在身的人是不应该去打扰的。可是我很想见见他，不是为了和他讨论殖民地的革命问

题，而是为了向这位革命英雄表示默默的敬意。我的感情矛盾得很：关于他的传闻使我神往，而安捷里卡·巴拉巴诺娃客厅里的谈论却又使我对他很反感，我肯定不喜欢他。但是，我又不能不敬慕他。

我怀着这种奇特的心情访问了他在克里姆林宫的简朴住所。鲍罗廷陪着我，因为那时我俄语说得还不很流利。斯大林斜倚在一张沙发上，他和平常一样用很低的声音打着电话。不一会儿，他的一位秘书从他手里接过听筒，他就向后靠在沙发上，显然是个身患重病、精疲力尽的人。但是在他那副稍有麻点的脸上，双眼炯炯有神。鲍罗廷把我介绍给他之后，斯大林伸出手来和我握手。秘书在病人床边为我放了一张椅子。

“那么，你是看不出泛伊斯兰主义有什么革命意义了？”问题提得直截了当，使我大吃一惊。我声辩说，我不是来和一位第二天就要做大手术的重病人讨论政治问题的，他笑了笑，又回到原来的话题上。我问他是怎么得知我对泛伊斯兰主义的看法的。“从伊里奇（列宁的亲密同事都这样称呼他）那里。”我从中亚回来时曾和列宁讨论过哈里发运动；他指示我去见斯大林，显然他已经把我的意见告诉斯大林了。但是在第一次会见斯大林的时候，我避免争论这些问题。我的目的是想亲自衡量一下这个人物。过了十五或二十分钟，一个秘书走进房间，打断了我们正在进行的一般性的意见交换，他送来了克里姆林宫医院外科主治医生的通知。通知说，为了准备第二天早上动手术，病人晚上不要进食。为什么呢？秘书把电话筒送到病人手里，他用执意要求对方服从的口气低

声说了两三句话。鲍罗廷向我打了个手势：我们该走了，斯大林同志需要休息。斯大林坐起来和我们握手，带着他独特的微笑说：“这次手术做完了，我们必须马上再见面。”

我们一到了外边，鲍罗廷就问我是否听懂了斯大林在电话里说的话。我说没有听懂。原来克里姆林宫外科主治医生在电话里解释说，第二天早上的手术要用麻醉药，病人必须空腹。斯大林果断地说：“我不用麻醉药。剖腹时，我必须保持清醒，好看看里边是什么样子。”因此在局部麻醉的情况下，进行了一次肠部大手术。他的病情非常严重，因此人们怀疑病人动手术后能否活下去。

第一次会见斯大林后不久，我又到中亚去了。第二次见到他是在1921年年底我回到莫斯科的时候。这次会见是与成立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有关。斯大林的意见在党的上层领导内部已经成为决定性的意见。虽然他还不是总书记（这个职务是第二年才设立的），可是他在政府里有两个很高的职务。他担任民族人民委员，兼任工农监察人民委员。后者是个权力很大的职位。在革命初期，担任那个职务的人有权监督政府其他各部门的工作。很可能正是这个有控制权的职位给斯大林提供了晋升到党统治集团最高位置的机会。

第二次见到斯大林时，他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身体很结实。我面对的是一位令人难忘的人物：他身穿红军士兵的服装，麻脸上浮现出愉快的微笑，拿着烟斗抽烟。他把几支纸烟捻碎，连烟丝带烟纸一起装进烟斗。他穿着红军士兵的长大衣，戴着缀有星徽的鸭舌帽，看上去比他那五英尺六英寸的身躯高一些。他走到共产党总书记办公室那个宽大房间的当中

热情地接见我。我对这位被人称为有野心要使党军事化的人，心里依然有反感。但是他那种坦率的态度和明显的诚挚友好的举止，使我减少了几分拘束。他向我透露，伊里奇已经对他谈到过我；他也接到关于我作为共产国际土耳其斯坦局成员进行活动的报告。他认为把训练亚洲革命者的中心迁到莫斯科是个好主意，而且苏联东方（被革命所解放的沙俄帝国的亚洲部分）的学生也应包括在内，这样可以使附属国的革命者向各穆斯林苏维埃共和国的民族学习经验。萨法罗夫正在从中亚回来主持共产国际东方司的工作。东方司将领导那所新大学的工作，我将担任学校的政治指导员。

斯大林作为民族人民委员和公认的东方各国革命问题的权威，将在那所筹建中的大学担任相当于校长的职务。那个学校实际上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从他开头的谈话来看，好象整个计划都是按照我的想法详细制订出来的。我真是喜出望外。可是斯大林接着又谈了一些话，那就使我更加惊喜交并。他坦率承认，我在泛伊斯兰主义的作用问题上与共产国际土耳其斯坦局俄国成员有分歧，我的意见是正确的。他笑了笑补充说，伊里奇也是这样看的；他不是接受我对他那篇《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补充意见了吗？殖民地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即使在印度也是如此。那种运动没有革命的思想。想用武器和金钱去帮助它是无济于事的。必须用一支训练有素的革命骨干来加强它。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就是为了那个目的创办的。

计划成立的训练中心选择了这个名称，使我立刻明白其意义了。这表明我的关于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社会基础的

观点已经得到默认。民族解放反帝运动的革命骨干将来自劳苦大众。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不同意列宁的意见，我的论点是：如果民族主义运动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取得成功，那只是意味着政权要转入本国统治阶级的手里，而不会有什么社会革命。

这个观点直到 1923 年举行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才得到共产国际的正式赞同。但是，和斯大林的会见使我有信心，相信自己是正确的，而布尔什维克党高级人物的意见也正在接近我的观点。

从斯大林脸上那种有趣的表情，我可以推测到他知道我正在想些什么。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斯大林的赢得亲密同事——那些不想得到比他权力更大的同事——信任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乐于接受别人观点中较为合理的部分；为了不激起对抗，又不声不响地修改这些观点，然后再把修正后的结果作为普遍赞成的意见说出来。我还是一个新手，所以这位导师就耐心地帮助我了解他的方法。我在多年以后才体会到，他的坦率是马基雅维里^①式的坦率，是耶稣会教义的^②坦率。但是我对那些年中获得的丰富经验决不后悔；如果没有那些经验，我可能仍然是一个天真的革命者，只知道放火烧汽车，往电车上掷硫酸瓶，而不知藏起几支手枪去打死一个警察，也许是一个英国佬呢。

斯大林又把话题引回到泛伊斯兰主义和我们对共产党人

① 马基雅维里 (Machiavelli, 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他认为君主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译者

② 耶稣会教义的，即阴险的。——译者

与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关系的分歧意见上来。马克思主义者不会相信：任何民族或任何宗教团体会整个地是革命的或者是不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规律决定：只要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受到革命的威胁，他们就会最终地转过来反对革命。但是，只要他们领导反帝运动，他们在客观上就起着革命的作用，因此我们就应当帮助他们。不但应当帮助象印度和中国那样不太落后的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就连伊斯兰国家的封建地主、乌拉马^①和毛拉也应当得到帮助。这是世界革命战略的一个基本原则。我虚心地听完了斯大林的讲话以后，大胆地提出了几句疑问：如果资本家和封建上层阶级掌握了政权，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怎样才能得到帮助呢？这位当代的马基雅维里毫不隐讳地说：不能让他们掌握政权；与农民结成联盟的无产阶级应该成为推动民族解放运动的动力，那样就能使组织在共产党内的革命骨干在适当的时机领导他们把民族解放运动转变为争取劳苦大众的社会解放的内战。

这些话从任何一本列宁主义的教科书上都可以学到；然而能够听到这位“掌握命运的人”^②亲自讲解这个革命的福音，却是一种特殊的荣幸。不久，我进入了领导核心，从那以后，我有许多机会亲眼看到这位伟人从容不迫地、但又以坚定不屈的勇气作出一些具有深远意义的决定。最后，直到我在1929年与共产国际决裂时，我一直被列入“斯大林手下的年轻人”的行列，尽管我与这位大师争论过不止一次，而且也不

① 乌拉马 (Ulehas), 即伊斯兰教国家的“贤哲团”。——译者

② “掌握命运的人” (Man of Destiny), 原指拿破仑一世。——译者

无成功。他乐于尊重独立的见解，只要那种见解不是违背共同信仰的异端邪说。这样的态度使我对他更加敬重。至今我仍然认为：如果不是由于国内外那些追随斯大林的主要人物在智力上懦弱无能、具有哗众取宠的卑鄙欲望和在道德方面阿谀奉承，斯大林的领导本来是不至于堕落成为令人厌恶的英雄崇拜的。

72. 向阿默达巴德大会 提出的呼吁

鲍罗廷因为未能完成美洲使命而被控告，获释以后，被派作苏维埃的代表出席在马德里举行的万国邮政协会会议。那是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成为该协会的成员。在那以前，它和世界其余地方没有邮政联系，也没有邮票。国内邮政业务是免费的——这当然只是对少数享有特权的人物而言。人们寄信时都得出示使用邮政的许可证，邮局才予受理。即使如此，信件也不一定能够到达目的地。重要的信件是通过党和国家拥有的广泛的信使系统传送的。在法律上，私人是得不到这种方便的。但是政府的高级官员和党的高级干部则可以利用那个系统来为个人服务。

在欧洲，鲍罗廷发现有印度报纸出售。他买了大量的印度报纸，带回莫斯科作为珍贵的礼物赠给我。我得到这些报纸，真是高兴极了。那是俄国革命以后第一次运到莫斯科的

印度报纸。我也已有好几年没看到印度报纸了。鲍罗廷带来的报纸刊登了有关印度国大党那格浦尔会议的报道。那次会议上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人民在“官僚们”答应人民的要求之前，不和英国政府合作。根据这项决议和国大党加尔各答特别会议的决议，对威尔士亲王的访问进行了抵制，不合作运动已蔓延到了全国。关于那个运动的一鳞半爪的消息曾经通过英国报纸的媒介传到了莫斯科，但那些报道都是轻描淡写。欧洲大陆的报刊很少刊登这种新闻。俄国报纸根据那些很少的间接报道，编造出一些关于印度反抗英帝国主义的声势浩大的群众革命运动的故事。我自己也写过一些那样的故事。人们就把它们当作详实可靠的形势报告，阅读得挺起劲。但是，没有人比我对于得不到可靠的消息和我自己对于印度实际情况的一无所知，更感到悲伤了。因此，我非常感谢鲍罗廷给我带来的礼物，贪婪地逐行看完了那一大堆报纸；其中有一些已经是几个月以前的旧报了。每种报纸都有几版刊载了国大党那格浦尔会议主席的长篇讲话。那个讲话特别长，又是按照旧自由主义的格式炮制的，因此读起来枯燥无味。鲍罗廷对那个讲话很感兴趣，花了好多个钟点逐行阅读它。最后，他说这种口头上的大炮一定会把英帝国主义吓得浑身发抖。

我对于会议主席的讲话中所表示的个人见解一点也不感兴趣。我详细地阅读了这一大堆报纸，为的是把各种消息综合在一起，好在我的脑海里构成一个印度形势的全貌。报纸上有些关于全国城镇大规模示威的报道。成千上万的大中学生响应国大党发出的不合作的号召，离开了学校。有些律师停止了营业。许多政府雇员也辞了职，使他们的家庭丧失了

唯一的生活来源。那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示威运动，当时是在“忍受和牺牲”这个口号的鼓励下发动起来的。但是这个运动的目的是什么呢？中产阶级人民的生活本来已是一部苦难史，他们那可怜的物质享受也经不起任何牺牲，那么通过他们的牺牲和忍受又能得到什么呢？大、中学生集体离开学校看来只是一个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行动。

使我吃惊的是，这个运动根本没有什么明确的纲领。不合作显然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但目的又是什么呢？“自治”（swaraj）这个字眼在这个国家的政治语言中占着突出的地位；但它的含义笼笼统统，也没有人肯费事给它下个定义。这个运动所反对的敌人是“官僚政治”，这就表明它是不成熟的。它的意思是说，这个运动所要求的并不是结束英国的统治，而是结束行政上的官僚制度。人们设想，大规模的不合作运动将使政府陷于瘫痪。但是用什么来代替瘫痪了的行政制度呢，这一点似乎并没有人想到。我觉得这样的运动不会持续下去；它凭着开始时的劲头，可能会继续一些时候，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目的明确的意识和一个政治、经济建设的具体纲领来加强它，它一定是要失败的。

这个运动最显著的特征是缺乏一个经济纲领。这是由于一种肤浅的政治概念所造成的。中产阶级可能被爱国心感动，民众可能受占据政治舞台中心的一位圣人的宗教号召力的驱使。但是，民众的热情究竟能维持多久？饥饿不久就会迫使那些中产阶级的爱国者，对自己轻率地放弃可怜的一点生活来源而懊丧不已。那些辞了职的雇员那时也会渴望回到失去的乐园。与此同时，那些没有工作的中产阶级人员可能

早已填补了他们留下的空缺。因此，爱国者的牺牲是白费，而受苦受难将把一时的热情扑灭。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大量失业是当代印度社会的一个悲惨现象。通过号召大量的政府雇员罢工以造成政府机构瘫痪的想法，根本就没有看到这个最显著的事实。

民族主义运动突然发展成为群众性的运动。这是一个引起国内外注目的重要事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前，国大党只是一个上层中产阶级要求宪政改革的运动。那些革命的民族主义者藐视甘地以前的自由主义国大党的立宪主义，宣布要用暴力手段驱逐外国统治者，那些人也和群众没有什么联系。第一次大战期间，民族主义运动被镇压了。可是在1918年和1919年，不但民族主义运动复活了，而且在国大党的旗帜下一个群众运动发展起来了。有人将这种不平凡的现象归之于甘地的降临和他的消极抵抗以及非暴力的不合作主义的学说。但是我在对形势作了批判性的分析以后，不赞成那种解释。我探索了这个新发展的其他原因。甘地的品格的确是一个新因素。但我不相信任何个人能够凭空地创造一个全国性的群众运动。

我把报刊上报道的所有事实进行了一番客观的研究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印度出现了一种自发的群众性不满情绪，这就是不合作运动的社会背景。和自由主义国大党的立宪运动不同，甘地提倡用非暴力的群众斗争来反对现政权，这种方法是利用自发的群众不满情绪来支持国大党。甘地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印度的领袖，因为他表达了火热的群众不满情绪。他所宣扬的宗教思想也迎合了群众的中世纪精神状

态。但正是这种思想阻碍了任何革命的群众行动。如我所分析和理解的，形势的实质是一个受反动思想束缚的潜在的革命运动。

英帝国主义镇压了这个政治性的民族主义运动，但它不能完全防止世界上重大事件所带来的影响。为了满足战争的财政需要，它加强了对群众、特别是对农民的经济剥削。这自然在农村造成一种普遍的不安。士兵复员归来，使这种形势更加严重了，因为他们是带着从前线外国战友那里学来的破坏性思想返回农村故乡的。由于有那样的经历，他们已失去印度农民传统的顺从性格，他们已经有了自信心。他们一回到家乡，安静的农村就骚动起来了。他们鼓动不满的农民起来反抗难以忍受的生活条件。结果是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农民起义。

俄国革命和欧洲其他革命剧变的微弱回声也传到了印度，影响了城市下层中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这些人以前是同情革命恐怖主义的。俄国工人夺取政权的消息，鼓励了印度的产业工人起来斗争，反对他们的悲惨的生活条件。早在1918年，就有几个工业中心举行了罢工。如果民族主义运动支持产业工人的事业，那么它就会增加巨大的力量，但国大党领导人却忽视了这一点。1919年甘地居然停止了非暴力的消极抵抗和不合作主义委员会（Satyagraha Committee）的活动，从德里跑到阿默达巴德去阻止产业工人被政治目的所利用。当时在阿默达巴德发生了纺织工人大罢工。

国大党没有以支持改善工农经济状况的要求来发展工农运动。理由是，那种政策本身会损害民族团结。大资本家从

财政上支持国大党，而甘地的宗教思想和托管的学说迎合了地主阶级的中世纪精神状态。他告诫工人不要把他们的雇主看作剥削者，要象对待兄长一样信赖他们。他告诉农民说，地主是照顾他们利益的天然委托人。根据这种学说，甘地谴责了农民不纳税运动，其实这个手段是他自己早就提出过的，它曾经是不合作主义的一个项目。

从民族主义报纸报道中知道的这些事实使我确信：不合作运动尽管表面上声势浩大，本质上却是虚弱得很。只有使这个运动意识到它客观上所起的革命作用，才能消除这种弱点。它需要一种革命思想和一个具体的经济纲领，来吸引工农群众以更大和更持久的热情投身到争取民族自由的运动中。

印度国大党的下一次年会，几个月以后就要在阿默达巴德召开了。C. R. 达斯被选为这次会议的主席。我从新闻报道中推测出，他并不完全赞同甘地的意见，也很怀疑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有成功的可能。如果有人提出一项开展群众革命斗争的方案让他考虑，他可能赞成采取其他办法。参加大会的大多数代表来自中产阶级。由于这些人是现存社会制度的受害者，他们没有民族主义领导人那样的保守主义。如果有人给他们指出一个可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的更有效的斗争方法，可以预料他们是会热情地接受的。基于这些考虑，我想如果我向阿默达巴德大会发出呼吁，建议他们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以及相应的经济和社会纲领，那也许是一个有益的办法。我已经多年没和印度直接联系了。这个经过仔细考虑后发出的呼吁将标志着我在印度人民为自由而战的

革命事业的戏剧中又要起点作用了。

列宁和斯大林都满腔热情地欢迎我的这个想法。我起草了这个呼吁书,并请他们批准。斯大林提出了一个修改意见,使我对印度现实情况加深了认识。在我建议国大党为农民提出的各项要求中,包括废除高利贷,这种高利贷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农民群众生活中最大的祸害,这是尽人皆知的。斯大林说,如果把所有的放债人都从印度的寺庙中赶出去,那么农民到哪里去借耕种田地所需要的钱呢?他们终日劳动,仅够糊口,又得不到低利息的贷款。如果高利贷者没有了,农民就会丧失唯一能够得到的贷款,农业就会受到极大的损害。我原以为废除高利贷是一个强有力的革命措施,它会激发农民的热情。但是斯大林的话使我开了眼界。他建议纲领中的这个项目改为“控制高利贷;利率应定为百分之六”。他用这样一句古老格言来加强他的论点:“不要杀掉下金蛋的鹅。”

呼吁书分析了民族主义运动的社会背景以后指出:印度人口中绝大多数人的幸福和进步,要求在财产关系上进行象欧洲法国大革命所实行的那样的彻底改革。换句话说,民族主义运动的目的是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运动的目的越明确,它的力量也就越大。

呼吁书进一步论证说,要使不合作运动卓有成效,就必须由支撑国家经济命脉的工农群众来开展不合作运动。呼吁书具体指出,铁路工人的总罢工能够随时使国家的生活陷于瘫痪,以至迫使政府听从运动领导人的要求。同时还指出,一个抵抗横征暴敛和压迫人民的组织起来的农民运动,是有巨大潜力的。接着又指出,因为劳苦大众的现实生活极为悲惨,如

果不给他们以及及时得到救济的希望，他们的热情就不能持久。目前他们正在信赖国大党和民族主义领导人，如果国大党和民族主义领导人为改善他们的处境提出某些要求，并计划领导他们进行强有力的斗争来实现这些要求，那么民族主义运动就会由于这些群众的热情和有目的的支持而得到很大的增强。呼吁书最后列举了群众的最低要求，并在结尾时说，希望聚集在阿默达巴德的国大党代表们能够衷心地赞成这些要求，并在回到各自的地区以后，发动一次毫不妥协的群众运动来支持这些要求。

这个呼吁书极大地激发起到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来学习的印度学生的热情，它给他们提供了一幅不久即将在印度进行革命的具体图景。这份由我和阿班尼·穆克赫尔吉署名的呼吁书是在莫斯科印刷的。它是一个版面很大的、四页的传单。印成以后，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它运到印度并广为散布。如果当作密封信件单独邮寄，大量的呼吁书就能寄到收件人手里。但是莫斯科的邮戳将把传单的来源泄露出去。因此，我们打算把大量的传单从欧洲不同的城市寄出去。但那不过是在黑暗中投石子，乱扔一气。纳利尼·古普塔自告奋勇携带一大捆传单立刻到印度去。他自称和 C. R. 达斯有私交，一到印度就和他接触，亲自把呼吁书交给他。他果然说到做到。以前他曾多次往返于英、印之间，因此对路径很熟悉。不久，他果然带着一大捆呼吁书到达印度，完成了自愿承担的任务。在阿默达巴德国大党会议召开之前，就向全国各地散发了呼吁书，也发给了与会的代表们。这个文件自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一些印度报纸部分地转载了这个

文件。

不幸，就在国大党会议召开前不久，C. R. 达斯被捕了。因此，纳利尼·古普塔没有和他接上关系，呼吁书也没有送到他的手里。由于呼吁书有我的签名而且是非法输入印度的，那些有相当地位的民族主义者害怕公开不敢保存和讨论这个文件。但是最后它还是被合法地送到了大会上。有两个阿季米尔的代表用他们的签名重印了这个文件，并提出了一项议案，要国大党讨论这个呼吁书。有人进一步说，这个呼吁书使哈斯腊德·摩哈尼毛拉有这样一种想法：他要在国大党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一个决议：争取完全独立是印度国大党的奋斗目标。

这是呼吁书提出的民族革命纲领中的第一项。国大党会议否决了哈斯腊德·摩哈尼的决议案，不久以后，那位提案人就被捕了。但是，完全独立的理想在国大党的队伍中越来越占上风，尽管国大党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表面上仍然对“官僚政治”进行了战斗。

我在多年之后恢复了与印度革命运动的关系，不过还只是间接的联系。但是我不禁感到满意的是：呼吁书产生了影响，而这种影响将来必然会逐步增长。纳利尼·古普塔不久回来汇报了人们对呼吁书的反应以及它所产生的影响。这个汇报鼓舞我加速执行把我的总部迁到西欧某地的计划，并通过通信和出版宣传材料来和印度建立经常的联系。

73. 马克思主义对印度 历史的解释

I

我在墨西哥居留初期，曾在通神学会做过一系列关于印度的讲演。后来，那些讲演编印成书（用的是西班牙文），书名是《印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那是我第一次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印度历史。那本书是一个还没有彻底觉悟的新信徒的一次尝试，它是试验性的，论点说得并不明快。通神论者，特别是那些从来没有踏上过印度神圣土地的人，对印度古代文化的看法很是教条主义。我在和墨西哥一些主要通神论者的私人谈话中，表示不同意他们那样的观点；我认为，即使在遥远的过去，居住在印度的也不是那些与栖息在喜马拉雅山峰另一边的西藏高原上的神秘的圣人经常交往的里希人和穆妮人。我这种亵渎神明的观点使印度母亲的那些干儿子感到愤慨。不过，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似乎也认识到我的论点给他们的教义戳了一些漏洞，他们觉得必须加强他们的教义，以便对抗这种异端的攻击。他们邀请我去仔细阐明我的观点，好让那些通神学会的博学之士在我每次讲演之后，向我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来对我的观点进行挑战。与那些博学之士对垒，倒是一次奇特的经历。他们对拜认的祖国的历史毫无所知，却以盲目信仰印度为神灵故乡来掩盖这种明显的愚昧。

我承认宗教的思想方式曾统治过印度的古代文化，但我也强调了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真理：居住在印度的也有凡人，他们必然首先关心的是他们的肉体生存所必需的东西。从这个无可争辩的前提出发，我说古代印度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形式同其他任何文明古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形式不可能有本质上的区别。我的观点在逻辑上站得住脚，但我却不能列举事实来作证明，因为那时我手头没有这些证据。可是那些关于印度历史稀奇古怪的想法，却使我感到有必要写一部印度的真实历史。我确信，我的新信仰总有一天能使我写成这样一本书。

那时，我提出了一个关于印度古代文化中的人种起源的看法，那种看法不久便被经验证实了。人们普遍认为古代印度文化是来自雅利安人。但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是：印度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在人种上并不属于雅利安人血统。此外，假如神话式的雅利安人曾到过印度，他们必然带来一种游牧文化。那可能就是早期吠陀文化的最合适的社会基础了。但是没有一个更高发展的文明，印度就不可能产生出一种更为丰富、更为复杂的文化形式。因此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设想：假如雅利安人果真来过印度，那么，在他们到来之前，一个更为文明和更有文化的民族就居住在印度了。如果他们到过印度，他们只能占据北部有限的地区，在那里传播他们的文化。但是一般的印度人都热切地自称雅利安人是自己的祖先，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作为对美国人歧视有色人种的反应，住在美国的印度人都强调他们是白色人种雅利安人的后裔。

那样依靠传说来担保种族地位平等的态度，我看实在有点可笑。因此，在雅利安人到达印度之前，印度已有文化的假设，对我是有吸引力的。在关于印度人种起源的讲演中，我不相信雅利安人的传说，我认为有更有力的证据证明印度人是达罗毗荼人的后裔。我在发现印度河流域文化遗迹的前几年，就提出过我的看法：在雅利安人到达之前，就已经有了古代印度文化。印度河流域文化是属于达罗毗荼文化还是苏美尔文化仍然是一个争论中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文化早于雅利安文化。同样有理由设想：在中亚的游牧民族雅利安人来到印度西北部以前，印度的其余地区也并不是渺无人烟的荒野。正如史诗，特别是《罗摩衍那》^①所说，那里人口稠密有相当高的文明和文化。如果我们如同大多数生物学者和人类学者现在的看法一样，不承认人类一元论的假设，那么达罗毗荼人就可以被认为是最早的人类种族之一。如此说来，为什么又一定要把印度古代文化算到从中亚来的游牧入侵者身上去呢？

由于缺乏所需要的资料，也由于有其他紧迫的任务，我第一次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印度历史的工作不能再进行下去了。但是重新编写印度历史的想法是非常吸引人的。随着我比较彻底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解释历史的方法，我头脑里那种想法也在逐渐增强。1921年，我又继续进行这个尝试了。

我在给阿默达巴德大会的呼吁书中提出印度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时，感到在我的头脑中需要有一幅当代印度社

^① 《罗摩衍那》(Ramayana)，印度古代梵语叙事史诗，是印度两大史诗之一。——译者

会的具体图景。描绘这幅图景的部分素材可以从我当时手头的报纸中搜集到。但是还需要更多的关于印度经济生活的资料。这些资料的唯一来源是政府的出版物。最新的人口调查初步报告也已经发表了。报纸上发表的摘要表明，在这个报告中有关于当代印度社会结构的有价值的资料。通过在伦敦的苏维埃贸易代表团，我订购了印度政府出版的所有的最新书刊，其中包括人口调查报告。值得自豪的是，不久我就有了一大堆包含大量统计资料的蓝皮书。这样，我就能够编写一篇关于当代印度的全国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详细报告了。这个报告可以支持我对印度革命的性质和前途的看法。与流行于布尔什维克党人中的看法相反，在当代印度占优势的社会因素并不是封建主义。因此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一种革命力量是不对的。虽然是齐采林原来要求我写这个报告的，但是我写报告的目的是要使列宁相信我的观点的正确性。报告强调了这样的事实：尽管殖民地经济促进了封建关系，但它却不能完全阻止本国资本主义的成长，也不能阻止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野心勃勃的阶级随之而起。尽管现有的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挫折了资产阶级的野心，但同时那个阶级也与现有的秩序有着利害关系，因此他们不能领导一个推翻这种秩序的革命。

II

其他俄国领导人仔细阅读了这个报告，认为可以加工成书，它也许和列宁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那本书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列宁是在19世纪末叶写那本书的，其目的在于反驳

民粹主义者认为斯拉夫民族的特殊天才可以阻止俄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那本书使列宁获得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声望。列宁的老师普列汉诺夫读了那本书以后，就把列宁看作即将到来的俄国革命的最有希望的领袖。

列宁仔细地研究了 this 报告，告诫我不要凭主观愿望解释事实，然后便建议我下功夫把它写成书，这本书将描绘出一幅当代印度社会的真实画面，并展示出印度革命的远景。这将是一件繁重的工作。我写这本书要用几个月的时间。动笔之前，我必须吃力地读完浩瀚的统计资料，同时还得记住，对统计资料是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的。但那时我已确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绝对可靠的，因此，问题只是有时间和下功夫了。我有充分的时间可以支配，因为我在莫斯科不象在土耳其斯坦那样有实际的革命活动。我对共产国际总部的办公室工作不大感兴趣，在共产主义大学的教学工作一天也不过几个小时。我迫切希望尽快到西欧去。同时，写一部可能与列宁的名著有同样历史意义的书，是一件令人兴奋的工作。

这时，阿班尼·穆克赫尔吉因为受到怀疑，正呆在那里闲着无事。我建议 he 可以利用时间仔细看一些统计资料，以便做出摘要。此人精力充沛，很有抱负，所以他就热情地接受了我的建议，并挑选了有关印度工业发展的出版物供研究之用。当代印度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封建经济逐渐衰败，资本主义正缓慢而稳步地上升，所以我决定把这本计划中的书叫做《过渡时期的印度》。这样就规定了这本书的范围。它不是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印度的全部历史，而只是一幅当代印度社会的画面。书的第一章的题目是“资产阶级的兴起”，这完全是根据阿班

尼·穆克赫尔吉所搜集的统计资料写成的。因为急于完成这本书，我没有核对阿班尼·穆克赫尔吉准备的摘要是否正确。为了酬答他的帮助，我想把他列为本书的合著者之一。但是共产国际出版局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是，如果一个可疑的人的名字和我的名字联在一起，人们就可能对本书的严肃性产生疑问。但我坚持认为：必须公开承认他对我的帮助。于是那本书就以作者 M.N. 罗易，协助人阿班尼·穆克赫尔吉的名义出版了。

这种安排得到共产国际出版局的勉强同意，阿班尼·穆克赫尔吉就此得到了地位和某些名望。后来他却滥用这种地位和名望，做了有损于我的事，但只是枉费心机。他那愚昧的热情确实造成了一些损害。他非常急于要证明印度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分娩阵痛中，因此印度在共产国际中必须享有与德国和英国一样的地位，以至他不惜用变戏法的手段玩弄那些统计材料来显示印度资本主义发展的夸张画面。在“资产阶级的兴起”那一章里引用的数字，有些实际上是错误的；不久，细心的读者就发现了这本书的缺点。我是作者，当然要对那些错误负责，开始我也不想否认那是我的责任。不管怎么说吧，我在使用那些数字之前，应该查对一下。但是后来，阿班尼·穆克赫尔吉因为他的名字没有作为该书的合著者出现而怀恨在心，就指控我盗用了他的全部手稿。于是我不得不把他仅仅与我合作了一章、而且这一章可以说竟把我引进了歧途的事公布于众。可是他还是很固执地、吵吵嚷嚷地指责我偷了他的作品，以至共产国际不得不指令正式调查此事，以便平息纠纷。首先，发现手稿是用我的而不是用他的打字

机打的。他说，打字原稿可能是在我的打字机上打的。他不可能只打一份，这一份他说已经交给了我。但他又拿不出来另外一份来。当对他进行实际考查的时候，他失败得就更惨了。如果他是全书的作者，那么他能够扼要地讲出每章的内容吗？他热情地答应了，但是其结果对他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就每章的主题思想来说，他的观点与手稿中所表达的观点截然相反。不过，任何有地位的人谁也没有把他对我的指控当做一回事。就这样，一次正式调查就结束了这个问题。有人安慰他，建议他再写一本书。他当然压根儿就没有写，他也写不出来。

《过渡时期的印度》的俄译本是在莫斯科出版的。但是，打算主要在印度发行的英文本，则必须在一个不用费多大困难就能把书送往印度的地方印刷。不久以后，我去德国，此书就在柏林印刷，但用了—个虚拟的出版者名义在日内瓦发行。书刚一印好，就分别寄了许多本送给在印度的选定的人物。几乎所有的书都到达了目的地。但是，过了不久便根据海关法禁止这部书运进印度了。不过，相当大量的书已经到了印度，而且不少部已经到了重要的图书馆。直到现在，那里仍然可以找到一些。但是，因为是禁书，它不能随便出售，也不能用其他方法分发。尽管如此，它仍然引起了几位著名的经济学教员的注意。其中一人被公认为是印度农业经济的权威，他把这本书中关于农民的那一章推荐给他的学生，他认为这是对印度土地问题最好的论述。

尽管困难重重，许多认真研究当代历史的学者还是广泛地阅读了这本书。他们全都得到极深的印象。印度共产党的

先驱者都从这本书中受到了实用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教育。也确实受到了革命策略的第一次教育。所有的人都坦率地承认受惠非浅。后来他们居然痛骂我是叛徒。但是，这就是共产主义的为人之道，而使我与那个不道德的迷信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不赞成那种共产主义的伦理观。

在国际上，这本书也很受欢迎。德文版在一年之内就销售了十万册。这本书也用欧洲其他几种文字出版了。它受到了广泛的评论，并在学术界受到高度的赞扬。一位芬兰历史教授和一位阿根廷历史教授都认为，这本书是有批评能力和锐敏眼光的读者所能得到的关于现代印度的第一幅逼真的图景。印度第一次被描绘为不仅是神人和圣者的国土，而且也是居住着凡人的国土。那些凡人象全世界其他人类一样，有着同样的忧伤、希望和志向，因此，他们也是受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支配的。

74. 共产党人在一起的生活

新经济政策不可避免地改变了住在莫斯科的外国共产党人的生活方式。以前，他们都住在一处地方，吃的、穿的等等生活必需品都免费供给。正象许多俄国人家家庭合住的其他房子一样，外国共产党人住的旅馆也有一个公共餐厅，大家都在那里免费用膳。凡是享有权利免费在公共餐厅用膳的人都发给饭票。

新经济政策把这一切都改变了。因为允许小规模的自由贸易，所以咖啡店和饭馆开始了营业，人们可以按自己的嗜好和口味到那里去买饭菜。货币又成了交换手段。几乎向公众开放的全部消费品都由一个国家机构中央合作社独家控制。它在城市里开设了一些货物充实的商店，但只有当地合作社的社员才有权利在那些商店里购买物品。共产党员，工会会员或国家承认的其他专门机构的职员都是合作社的当然社员。

尽管如此，因为金钱再次成为合法的货币，所以它的价值就有了提高，而小规模的自由贸易也无法阻止了。各个城市中突然出现了出卖日用必需品的零售商店，而那些商店的大量顾客都是根据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被剥夺了公民权的那些人。这个原则的含义是，在一个工人的国家里，每个人必须参加生产劳动以获得公民权。但是甚至在十月革命以后，这个国家还遗留下许多不但是属于中产阶级、而且也有属于上层阶级的人。他们既不能、也不愿意参加任何生产劳动。因为他们不可能属于任何专业机构，更不用说共产党了，所以他们也就不能成为合作社的社员了。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那些人的日子很不好过。胆子大一些的人就进行各种各样见不得人的活动来挣得一个极不稳定的生活。例如，一些贵族夫人秘密地开设公寓，因此得以在黑市上购买食品，虽然那时搞黑市买卖是犯死罪的。另外一些人也冒着被严厉惩处的危险偷卖她们的衣物首饰。新经济政策改变了这一切，给那些被剥夺了公民权和继承权的人带来了生活上的一线希望。因此，左派共产主义者担心新经

济政策会帮助资产阶级死灰复燃。

然而，新经济政策的目的是给农民自由贸易的权利，以鼓励他们生产食品并把食品供应城市。可是农民们并不急于卖掉他们的产品，以换取价值仍然捉摸不定的货币。他们想要交换的是日常生活需要的制成品。这就意味着要鼓励小型工业，因为那时国营的大工业还不能生产所有的商品来满足农民群众的需要。资本主义的复活和随之而来的产生新资产阶级的危险，由于控制着城乡商品交换的中央合作社的活动而被防止了。所谓“新经济政策”下的资产阶级分子多半都搞黑市买卖，那是新经济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来的副产品。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外国代表人数大大超过了前两届大会——召开的前夕，外国代表们在莫斯科的住处迁到了一个大得多的旅馆里。这家旅馆以前叫“豪华饭店”，这个老名字还保留下来了。它是一幢很宽敞的三层楼房，坐落在莫斯科的一条主要大街上。在这个新的住所里，外国共产党人不得不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楼的底层有一个饭厅，它的主要入口就对着大街。因此，不住在旅馆的人也可以进来吃饭，但得付钱。

共产国际总部的职员上班之前要吃早茶。从旅馆的锅炉里可以打来开水。茶叶和糖可以买来自己保存。俄国人喝茶一般不加牛奶。他们喝茶加柠檬，现在柠檬随时都可用合理的价格买到了。午饭由共产国际总部的食堂供应，是夹心面包片和茶或凝乳的冷餐。吃主餐的时间是在下班以后。这是俄国人流行的习惯，住在莫斯科的外国共产党人不得不适应这种生活。主餐是在旅馆的饭厅里吃，一汤，一盘荤菜，还有

一种甜食。

晚上还是干工作。共产国际中的高级负责人经常工作到午夜。午夜之后才是休息的时间。工作熬夜也是流行的俄国习惯。一天从早到晚紧张地工作到深夜以后，“豪华饭店”的住客们就享受一种相当喧闹的社交生活，吃晚饭并喝酒助兴。

新经济政策已开始实行工资制。共产国际的官员和其他雇用人员都领取薪金。那时，执行委员会委员每月领五百卢布，这个数目是党的最高薪金。新货币的发行结束了战后多年的通货膨胀。这种货币的单位是“切尔方尼兹”，价值十个卢布。稳定苏维埃通货的奇迹是由索科尔尼科夫创造的。他曾作为土耳其斯坦前线司令官和我一起在中亚工作过，后来成了财政人民委员。说是奇迹，因为当时并没有黄金储备。据说“切尔方尼兹”依靠的是三卷《资本论》。不管怎样吧，这种新货币已不仅仅是传单，而是印刷得很讲究的东西了。“切尔方尼兹”很象十英镑的钞票，它在俄国国内的价值也和十英镑大致相等。新货币是在列宁格勒的一家印刷厂印的。这是一个很先进的机械化工厂；用破布作纸浆，全部工序直至印刷钞票都在那个工厂里完成。我有一次访问列宁格勒时，应邀到那个工厂各处参观。参观后，那家工厂的工人把我选为列宁格勒苏维埃的委员。

虽然金钱已成了合法的货币，而且所有的人，包括苏联共产党的高级人员在內，都靠工资生活，但有些外国共产党人还是因口袋里存钱太多而感到可耻。拿我来说吧，就从来没有到共产国际总部的出纳员那里领过工资。经常都是我的秘书代领。既然日用必需品，包括住旅馆的房租，价格都是控制

的，那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每一个成员的工资的数目就是很大的了。在交付每月的房租和饭店每天的饭费以后，每人口袋里还剩下很多钱。这笔钱他们可以任意使用。我们大部分人每天在工作以后，都利用机会去参加寻欢作乐的社交生活，几乎每天都玩到半夜。在这些场合，来自世界各地但追求共同理想的人，都以普通人的身份相会，他们感情放荡，不受任何传统和思想的约束。自然啦，在那种时刻酒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没有别的东西比酒更能如此彻底地冲破人为的约束，能使甚至最装模作样、傲慢自大的人也现出了本来面目。

俄国革命试行了禁酒。在沙皇统治下，酒是由国家专卖的。革命的宣传断言，那种专卖的目的是要大量供应酒类，以麻痹工人阶级的心灵。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反正俄国工人是好喝酒的。伏特加是一种用黑麦或马铃薯蒸馏出来的烈性酒，俄国人普遍都饮用。事实上，饮酒的习惯确实使产业工人中一大部分人变得很残暴。农民也沉溺于这种恶习。因此，禁酒成了革命纲领的一部分，那就是很自然的了。比较有头脑的、加入了共产党的工人对这种使他们那个阶级变得残暴起来的恶习真是深恶痛绝，以致在执行禁止卖酒和饮酒的法律时常常使用暴力行动。每个资产阶级或贵族居民都有一个贮满了名酒的窖子。革命初期，成队的愤怒的工人袭击了那些酒窖，砸碎了成千上万瓶名酒。我听说就在那次袭击中，一股由香槟酒汇成的激流从糖业大王的公馆——我刚到莫斯科时就住在那里——门廊一直流到门前的莫斯科河里去。不但严禁卖酒，就连在街上发现的喝得酩酊大醉的工人，居然也被送进监狱，有时甚至当场被击毙。

象革命初期所表现的其他各种过火行动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禁酒的法令执行起来也就不那么严格了。这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在贯彻一项经过周密考虑的政策。革命的禁酒法令并没有假道学的动机。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改造嗜酒成癖、自甘堕落的人。事实上，喝酒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禁酒的目的是要消灭那种使人变得残暴的习惯。因此，在严格禁止出售伏特加的同时，政府逐渐允许售卖用葡萄酿造的淡酒。这也是一种经济上的需要。克里米亚、高加索和中亚地区都盛产葡萄，酿酒在那里是一种赚钱的工业。酿酒大部分是私营的轻工业。新经济政策允许酿酒，也允许在市场上自由出售。开始时，酒精的含量限制到很低的百分比之内。但是，就是这样的酒对那些惯于喝烈性酒而又几年没能喝到酒的人来说，也是很不错的了。因此，这种自由出售的淡酒的需要量很大，这就大大促进了酿酒业的发展。保持酒价低廉的政策又助长了需求量。一公升好酒价值六十戈比（相当八安那^①）。酒是专门由合作社商店出售的。饮用伏特加的习惯消失了。过了几年，伏特加也在自由市场上出现，但很少有人再去问津了。它的酒精含量也已减低，开始时是百分之三十。

为了外国同志的方便，在“豪华饭店”的前面开设了一个合作社商店。这家商店货物特别齐全，人们在那儿可以买到各式各样的食品，例如熏鱼、火腿、腊肉、乳酪、奶油、面包、鸡蛋等，还有各种酒类。由于俄国人习惯于下班后在四五点钟的时候吃主餐，晚餐的时间一般都比较晚。因此，食品店直到深

^① 安那 (anna)，印度货币单位，为一卢比的十六分之一。——译者

夜还继续营业。但是，又是为了外国同志的方便，我们旅馆前的商店只是为我们这些人还部分地继续营业几乎到午夜时刻。

到晚上 11 点，住在“豪华饭店”的高级人物就互相打电话了。饭店里每一个房间都有电话。互通电话的结果是：我们中间一两个人跑出旅馆，穿过大街，到那食品店去，那常常恰好是商店拉下窗板的时候。但外国同志一出现，就有一种魔力。商店为他们打开门，但普通顾客是不允许进去的。恰巧商店服务员对我特别优待。因此，午夜购买夜餐食品的义务经常落在我的身上。但总有一两个人陪着我去。

一些外国共产党人，特别是那些在共产国际总部中担任高级职务因而不得不长期呆在莫斯科的人，都和他们的妻子住在一起。他们的夫人大多数也在共产国际总部做点事。她们自然也来参加午夜晚餐会。有些外国姑娘来莫斯科，在共产国际总部担任秘书或速记员工作。这些孤独的人儿也被邀请参加午夜晚餐会，这样往往就使那些聚会搞得非常活跃，有时一直继续到黎明才散。就是在那些场合，来自世界各地的重要共产党人都以普通人的身份互相结识。那是一种很有益的经历。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工作到深夜，他们有些人往往要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某个委员接触商量事情。有时在我们的午夜晚餐会进行的当中，他们打来了电话。在那种场合，我们就敦促俄国同志前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他们也常常照办了。但他们并不都是好交际的。象以前我所提到的那样，托洛茨基照例避不参加这样的聚会，因为在那种场合，要想抑制个人感情必然是不可能的。斯大林在俄国党的核心集

团之外还不很出名，他和共产国际很少发生关系。季诺维也夫在个人习惯方面，是一个守旧的小资产阶级。但布哈林、拉狄克和另外一些不那么出名的俄国领导人却常常参加我们的午夜社交聚会，会上通常有歌有舞，显得十分活跃。我既不参加唱歌，也不参加跳舞，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是邀请我参加那些午夜联欢。有时也常常出现一些颇为有趣的小事件。

有些外国共产党人过于一本正经，反对别人聚会欢乐，理由是扰乱了他们的工作。每逢那样的时候，那些比较放荡不羁的人们便闯入杀风景的人的房间，对待他或她就有点粗暴了。但他们做得轻松愉快，态度又很与人为善。因此，谁也不会生气，肯定是谁也没有受到任何损害。

凡在革命早期有机会住在“豪华饭店”的人都一定会缅怀那段往事，把它当作一生中最丰富的经历之一。共产国际当时已经发展了它的等级制度。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以及书记处的成员都是享有特权的人物。小汽车把他们送到办公室；在那里他们不轻易接见别人。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免有些心胸狭小，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的神气。但在“豪华饭店”里他们都是平等的；而在午夜聚会中我们都平等相待；大家都是人，各有优点缺点，有优点不必抬高身价来加以美化，有弱点也不必为之感到惭愧。

V.B.卡尔尼克的跋

罗易没来得及把他一生的经历全部讲述出来就去世了，这真令人不胜慨叹。他的一生充满了冒险和成就，经验十分丰富。这部《回忆录》所包括的仅仅是六年左右的短暂时间；这多少可以作为后来他那多事的一生的开场。凡是读过这部《回忆录》的人，都会因为罗易没有写出当代历史上那些重大事件的始末而总是觉得遗憾。如果他写了那些重大事件，这本书就会成为一份引人入胜的文件，而且也会给现代世界增添非常宝贵的文献。

罗易一向不愿意谈论自己，也不愿写他自己的事情。这种性格给孟买杰出的医生和理性主义者 A. S. 埃鲁尔卡尔博士以很深的印象。他在罗易的《狱中来信》的导言中写道：“从罗易自己和他的生活中也很难探出一些事实情况。如果说，连他在社会活动中的亲密同事也对他所知无几，这也不算言之过甚。由于这种特有的沉默，好事之徒和爱加评论的人都说他是印度政界的‘神秘人物’。我认为这种沉默一点也不象是有意作态。对于一个投身于历史潮流而又以不断斗争来改变其进程的人来说，这是极为自然的事情。像他这样一个少有的把工作和自己融为一体的人，除了谈论工作时涉及自己外，当然不可能专谈自己的事。”^①

^① M. N. 罗易：《狱中来信》，导言，第 ii 页，加尔各答，复兴出版社版。

说服罗易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写下自己的经历，这真不容易。在那以前，他对请他写自传的一切要求，甚至诱人的稿酬，都一概拒绝。他在狱中时，就曾有个美国出版商提出过那样的稿酬。但是，他厌恶写自己的事情。他在一封从狱中写的信里说：“我认为把自传作为客观事实的来源，是极不可靠的。几乎可以肯定没有一个人（不管是男的或女的）能够就自己的切身经历讲实话，而且只讲实话。我实在不理解为什么有理智的人竟会冒冒失失地写起自传来。这样做就是一个值得从精神分析上加以研究的问题。别人作传那是另一回事了。可是自撰的传记又如何呢？我虽然相当尊重作家们的忠诚，还是照样怀疑他们的作品究竟有多少历史真实性和心理上的价值。但是那些作品作为文献，也许还是有价值的。这不是一个诚实或正直的问题，而是十足的‘无意识’。有谁能摆脱得了弗洛伊德学派的上帝的支配呢？我确实不怕说出这种反对崇拜偶像的意见：写自传就是在弗洛伊德的神庙里做礼拜。甚至最诚实的人也难免无意识地将一些谎言塞进他的自传。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合情合理地解释这种冒险的做法了。一个能思想并能表达其思想的人，他能使文化成就的共有宝库里增添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这种人不难发现有那么多的其他题目可写，而没有在写自传时所必然感觉到的那种束缚。谈论自己吗？啊，我想这是一个爱好的问题。”^①罗易的朋友们终于打破了他的顽抗，说服他写下了自传的一些片断，《回忆录》的读者们将为此而感到高兴。

毫无疑问，读者们可以阅读《回忆录》本身。但是我们觉

^① M. N. 罗易：《狱中来信》，台拉登，印度复兴协会版，第201—202页。

得,如果介绍一下作者早期和晚期的生活情况,《回忆录》就会给人增添更大的乐趣和更多的教益。罗易的传记还有待于撰写。这项工作需要巨大的劳动、充足的素材和非凡的能力。在这个传记写成以前,人们就只能依靠这些所能得到的片断资料了。下文就试图把其中一些片断串连起来,可以使读者对他那丰富多采的生活略见一斑。

马纳本德拉·纳特·罗易于1889年^①出生于加尔各答附近一个村庄的婆罗门家庭。^②罗易不是他的原名。他在《回忆录》中说,这是他在寻找武器的过程中到美国后用的化名。他的原名叫纳伦德拉·纳特·巴塔查尔亚。他父亲既是学校教师,又是宗教师。正如罗易所说:“他教了一辈子梵语,教的是那些想当秘书的人或未来的律师。”^③他虽然是个宗教师,却具有革新思想。他在早年离开了米德纳普尔区的家乡,到24-帕尔加纳斯地区的一个村子里安家落户。纳伦德拉·纳特就出生在那里。纳伦德拉·纳特在本村学校里接受了早年的教育。后来他又到奥罗宾多·戈斯创办的国立大学读书。不过,他对学术研究并没有多大兴趣。甚至在学生时期,他就参加了不少与民族运动有关的政治活动。革命青年的领袖维纳亚克·达莫达尔·萨瓦卡尔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吸引纳伦德拉·纳特的政治不是请愿上书,而是争取祖国解放的武装斗争。当时正是分割孟加拉的时候,也是为了纠正那一严

① 一说出生于1887年。——译者

② G. P. 巴塔查尔吉:《M. N. 罗易和激进人道主义者》,孟买, A. J. B. 瓦迪阿出版社版。

③ M. N. 罗易:《狱中来信》,第204页。

重错误而引起了民族斗争的时候。一般民众采取的斗争方法是不买英货和政治抵制，可是在青年中那些更加热切而坚定的人们却采取武装斗争的方法。性情好动而又勇猛的纳伦德拉·纳特加入了那些青年的行列，成为那一时期孟加拉的两个革命组织之一“新时代”小组（“尤根塔尔”小组）的成员。

当时的一位同事后来描述了纳伦德拉·纳特第一次参加革命运动的情景。他写道：“纳伦德拉几乎还是个孩子，不满十四岁，却精力充沛，满怀革命热情。他闯进一个小房间，我们正在那里漫谈当时我们在孟加拉和其他地方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他同我们谈了一次话以后，就提出，他要全力以赴地投身于使印度摆脱外国桎梏的解放事业。他起誓说，他准备干最难办的事；因为对于一个革命者说来，没有什么事不可能办到。不久以后，他就同我们一起干起来了。后来事实证明，他对我们的运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具有人类伟大领袖才有的稀罕品质。”^①

纳伦德拉·纳特与警察的第一次交锋是在1907年。他因为参加袭击家乡的火车站被捕了。组织那次袭击是为了取得为革命活动在车站募集到的金钱。纳伦德拉·纳特受到检举，但地方法官认为他那样年轻，不可能参与那么严重而大胆的活动，便把他开释了。从那以后，他无法再在村里呆下去，就迁到了加尔各答。在加尔各答，他因参加各种革命活动而一再被捕，但每次都由于证据不足，警察无法给他定罪。1910年，在所谓“豪拉阴谋案”中，他和其他四十名青年一起被带到加尔各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受审。法庭根据印度刑法第一百

^① M. N. 罗易：《向前看的人》，第8页。

二十一款 A 条，指控那些青年阴谋对国王进行战争。此案的被告之一是“新时代”小组的领导人贾廷达·纳特·穆克赫尔吉。纳伦德拉·纳特作为案件的一个被告人，以在审犯人的身份被迫在监狱里度过了二十个月的时间。在那期间，有九个月的时间是单独囚禁，其他三个受同样处罚的犯人被逼疯了。以后，纳伦德拉·纳特被牵连进其他两个著名的武装土匪抢劫案中，即花园区抢劫案和贝利阿加特抢劫案。两次抢劫都是革命者干的，目的是夺取金钱购买武器。

在狱里，纳伦德拉·纳特阅读了一些宗教书籍。这些书给他的印象很深，因此他决定去做传教士。出狱后，他就当起托钵僧来。他还在拉姆克里什纳布道团干了一个时期。他作为托钵僧，徒步往来于印度北部和东部的许多地区，因此能仔细观察人民的生活。可是，他很快就厌倦了宗教迷信和偏见。由于他争取祖国政治解放的愿望更加强烈，所以他重新投入了政治活动。

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有效地开展推翻英国统治的斗争的新机会已出现在所有革命者的面前。他们希望从德国人那里弄到武器，用来同政府进行斗争。当时，贾廷达·纳特·穆克赫尔吉是“新时代”小组的领导人，而纳伦德拉·纳特就是他最亲密的战友之一。1915年初，各派革命工作者聚集在一起开会，拟订了协作的行动计划。他们决定和在远东的德国代表建立联系，并从他们那里获得武器。纳伦德拉·纳特被派往巴达维亚执行这一任务。他以C. 马丁的化名前往那里。在一本关于罗易的书中对那一情况有如下的叙述：“‘马丁’一到巴达维亚，德国领事就把他介绍给特奥多尔·黑尔夫

里希。黑尔夫里希说，满载武器弹药的货船正开往卡拉奇，帮助在革命中的印度人民。‘马丁’便极力要求船队转驶孟加拉。这一要求在请示了驻上海的德国总领事后终于获准。‘马丁’随即返回，安排在松达班斯河的赖曼加尔接收由名叫‘小牛号’的轮船装载的货物。据说船上载有三万支步枪，每支枪配有四百发子弹，此外还有二十万卢比。与此同时，‘马丁’又给加尔各答的哈里父子公司（这是一个著名的革命家所开设的虚设商号）发去电报说，‘生意顺利’。6月至8月间，黑尔夫里希从巴达维亚向加尔各答的哈里父子公司连续汇款，总计四万三千卢比，革命者收到其中的三万三千卢比后，印度当局就发现了这桩事。‘马丁’于6月中旬返回印度，同谋者贾廷达·穆克赫尔吉、贾杜·戈帕尔·穆克赫尔吉、纳伦德拉·巴塔查尔吉（马丁）、博拉纳特·查泰尔吉和阿图尔·戈什正着手计划接收‘小牛号’上的货物并加以充分利用。他们决定把武器分为三部分，分别运往：（1）哈提亚，供巴里萨尔党人所领导的东孟加拉各区使用，（2）加尔各答，（3）巴拉索尔。”^①几天之后，警察发现了这个密谋，逮捕了许多同谋者。此后“小牛号”轮船不能来了，要搞武器就得另想门路。因此，纳伦德拉·纳特再次被派遣出去执行同一使命。他带着这项使命开始了他那环游世界的旅行，这就使他离开印度竟达十六年之久。

《回忆录》就是从这个阶段开始的。它首先讲到在荷属东印度、在日本、中国和美国寻找武器而一无所获的情况。它讲到“M. N. 罗易”这个名字的产生，讲到他的新思想的开端和

^① M. N. 罗易：《向前看的人》，第20—21页。

他在墨西哥的革命活动。它还讲到罗易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之一出现的情况，他怎样同印度民族运动重新建立联系，以及他怎样努力使那个运动具有一个革命的方向。《回忆录》结尾写到罗易如何企图对印度国大党分别在1921年和1922年所举行的阿默达巴德会议和加雅会议的评议与决定施加影响。但这只是罗易作为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而工作的开端。在以后的年代里，这种工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同时也使他同共产国际的俄国领导人发生了冲突。他只有另开一条新路。为着追求自己的理想，他在世界上漫游了十六年之后，又回到印度，按照那条新路工作起来。尽管他单枪匹马，并遭受到警察和莫斯科偶像的盲从者们两方面的迫害，但他还是组织起了一个强大的政治运动。他在不断寻求自由和真理的过程中，同时却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发展了激进的人道主义哲学。这是令人神往的发展，人们本来都希望罗易能以其无与伦比的风格把这些过程写下来。但他没能来得及完成这部《回忆录》，这永远是一件令人非常遗憾的事情。

罗易在参加共产国际的最初几年里，他的主要工作是发展印度的革命运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纲领，奠定了这项工作的理论基础，而罗易的补充纲领，可以说又改进并丰富了列宁的论点。罗易在《过渡时期的印度》一书中对印度局势所作的令人信服的分析，进一步指导着印度的革命运动。此书于1922年出版。这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印度状况的第一次尝试。它显示了作者对印度局势的透彻了解和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熟练掌握

握和运用。这本书之所以值得注意，是由于他在写作此书时还没有人知道马克思有过关于印度的著作。后来人们发现马克思有关这方面的著作时，才知道罗易在许多论点上竟然和马克思的结论不谋而合。自从这本书写成以来，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就连罗易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这本书作为马克思主义对印度问题的研究，依然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这本书已被译成好几种欧洲文字。

罗易试图一方面通过印度国大党，另一方面通过工人、农民以及知识分子的独立组织，来发展印度的革命运动。他和民族运动的领袖建立了联系，又和那些对圣雄甘地及其工作纲领和斗争方法日益不满和失望的青年知识分子也有了接触。他集中力量要说服他们接受一个明确的民族革命纲领。为了这一目的，他出版了一种名为《先锋》的刊物。这个刊物后来改称《前卫》，以后又改名《群众》。这个刊物不得不一再变更名称和出版地点，正如罗易由于警察采取对付他的手段而不得不屡次更换住处一样。在那四、五年期间，他先后被驱逐出德国、瑞士和法国。在法国，他险些落在英国警察手里。那时由于在印度的共产党人活动的增强，英国警察正加紧搜捕他。在这个时期，罗易出版了三本关于印度政治形势的书，书名是：《不合作的一年》，《不合作的后果》和《印度政治的未来》。此外，他还写了无数的信件、声明和宣言。其中许多后来在坎普尔和密拉特共产党阴谋案中被拿了出来当作起诉的证据。罗易的这些著作有助于使印度知识分子第一次熟悉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把一个具体的社会经济革命纲领摆在他们的面前。它们对大批青年人的思想有着持久的影响。

罗易出版的刊物、书籍和其他作品是不容易进入印度的。其中多数在刚一出版时就遭到查禁，而根据海关法令也严禁其输入印度。然而大量的禁书还是通过迂回的渠道流进印度。那些刊物有的是公开或伪装成无害的宗教小册子通过邮局寄来，或由信使带来。各家报纸也时常收到那些刊物，并转载了其中许多文章。英国的新闻检查工作效率并不很高，所以不能完全阻止罗易在欧洲许多地方大量出版的作品流入印度。

由于罗易的努力，共产主义小组于20年代初期在孟买、加尔各答、坎普尔、拉合尔和马德拉斯等许多地方发展起来。他又努力使这些小组联合起来成为一个严密的组织。一个共产党已在外国成立。罗易坚持不懈的努力使本国的共产党人和在外国工作的共产党人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由于警察的迫害，通讯联络十分困难。其次，印度国内的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还比较生疏和无知。他们还互相嫉妒和竞争。甚至在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印度流亡者中，也有许多人对罗易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飞黄腾达感到嫉妒。他们多次对他的代表资格提出异议，企图把他撤换下来。罗易的态度是很坦率的。他说，他并没有自称代表任何人，而且准备同所有接受共产国际纪律的人一道工作。那种反对他的宣传起初丝毫也不起作用，但后来意见分歧扩大时，有人就利用那种宣传作为反对他的武器了。在印度国内，各种共产主义小组及其成员也互相嫉妒和竞争，因此运动的发展就只能慢下来了。

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始阶段即使规模很小，也使英国当局

感到惊慌。他们企图把所有与这个运动有关的嫌疑分子统统逮捕法办，把运动消灭于萌芽状态。较早的共产党阴谋案是拉合尔案件和白沙瓦案件。在塔什干和布哈拉同罗易有联系的一些人都被牵连在这些案件里面。更有名的案件是分别于1924年和1929年发生的坎普尔和密拉特两次共产党阴谋案。这两个案件中主要的被告都是罗易；其他人都是以同他合谋对国王进行战争的罪名而被起诉的。他们从他那里收到的书信和文件都成了起诉人用以证明他们参与了阴谋的主要证据。两次审讯时，都未能把罗易带上法庭，因为当时英国警察对他是鞭长莫及的。可是，对他的控诉和他发出的逮捕状继续有效。若干年后，他刚一被捕，于是就立即给他定了罪。坎普尔阴谋案使革命工作瓦解了，但并没有使运动停顿下来。S. A. 丹吉、穆札法尔·阿马德、尚卡特·乌斯曼尼和纳利尼·古普塔都是案中的被告。前三人获释后立即恢复了活动。他们在罗易的指导下工作，许多地方很快出现了活跃而又有影响的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党人当时与国大党交往密切，不少人在国大党里身居要职。他们在工会和农民运动中也很活跃。1928年，他们在许多重要工会中很有影响；一些成功的大罢工都是他们搞起来的。

共产党人日益增长的活动和影响是不合政府以及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心意的。他们都企图多方阻挠共产党人；但是在罗易的指导下，共产党人越战越强。许多人对罗易在那个时期的工作表示高度的敬意。其中之一出自一份非常出人意料之外的来源，但这个来源对于了解事实真相却最有帮助。现摘述如下：“M. N. 罗易这个印度共产党的头号领袖人物是

由莫斯科精心挑选出来要把共产主义引入印度现实政治的。他除了具有领导才干外，还有一个印度爱国者和恐怖主义者炽烈的反英热情和对于殖民地阶级关系的深刻理解。从一开始，他就在共产国际受到尊敬。他在无须争夺和钻营就被置于领导地位之后，便信心十足地提出自己的观点，甚至在共产国际的大人物面前，他也坚持那种观点。他施展了密谋者的手腕，把新的学说传达给精选出来的在印度的青年，并激励他们镇静地、慎重地、有系统地并无情地进行组织革命的新尝试。密拉特阴谋案的记录证明，罗易已在印度纠集了一帮忠实的共产党人，他们已开始在工人阶级中确立了影响，并且证明他们有激发战斗精神的能力。”这段话引自印度政府中央情报局编写的印度共产党史。正是由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这样惊人的成长壮大，政府才认为有必要加以打击。这就是大肆搜捕全国的共产党领袖，并在密拉特共产党阴谋案中对他们提出起诉。可是，在共产主义运动迅猛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罗易，因不在印度就不能被捕，他的活动也不能受到限制。但是，令人吃惊的是，印度政府无法办到的事，却由共产国际完成了。共产国际大约在那时抛弃了罗易自1921年以来就一直奉行的路线，而采取了一条新的极左的暴动路线，这样就结束了罗易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在印度的工作。

我们在谈论罗易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冲突，以及他如何孤军奋斗而使由于自身的冒险主义政策和政府的镇压而瓦解了的革命运动获得新生的那段时间之前，有必要先把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占有的地位简单叙述一下。他在他第一次参加的国际会议上就崭露头角。这就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

会。在这次大会上他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领袖列宁交了锋。上文已经提到罗易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回忆录》生动而详细地记述了此事的始末。从那以后，罗易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青云直上，令人眼花缭乱。1922年罗易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4年当选为正式委员。他不仅在执行委员会的一般会议和全体会议上，而且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都发挥了杰出的作用。人们总是注意倾听他的发言，尊重他的意见。这些会议使罗易和俄国领导人以及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这些个人间的接触使他后来能够栩栩如生地描写其中的许多人物。有些接触后来发展成为深厚的友谊。身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罗易被卷入了列宁逝世以后俄国党内立即开始出现的派系斗争。从性格和感情上来讲，他本来是会站在托洛茨基一边的。他所主张的政策一般被认为是左倾的。但他是一个头脑清醒的革命家，因此，他深信斯大林的政策而不是托洛茨基的政策将更能使世界革命巩固它在苏俄的根据地。罗易本来想以明智的、合乎政治家风度的方式来辩论和决定这些政策问题；然而派系争论很快就以自相残杀的战争形式出现了。斯大林胜利了，但在这场战争的过程中，斯大林改变了俄国党和共产国际的性质，把俄国变成了一个残酷暴虐的独裁国家。俄国革命吞噬了许多英勇的儿女。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十年之内发生的。罗易在他写的《俄国革命》一书中叙述并分析了这一令人痛心的发展过程。这本书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返回印度之后写的。派系斗争在初期搞掉了托洛茨基和他的支持者，以后又搞掉了许多老的布尔什维克

党的领导人如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等人。罗易也是这场斗争的受害者。

在罗易失宠以前，他被派到中国执行一项极其重要的使命。那时中国正处在革命分娩的阵痛中。领导革命的是国民党。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结成了联盟，由于这一联盟，共产党为自己建立了强大的阵地。建立这种联盟的根据是，当时发生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因此，资本家、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这四个阶级结成的联盟，应该共同战斗，以完成这个革命。中国共产党奉命参加国民党，并同它合作。那时迈克尔·鲍罗廷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驻在中国，正给予中国以必要的政治指导。那里还有由布吕歇尔将军（中国称他为加仑将军）率领的许多俄国军事顾问。1926年初，国共合作开始破裂。这年3月，蒋介石将军发动政变，逮捕了许多共产党工作人员。于是就出现了共产党是否应该继续同国民党联合的问题。指导中国革命进程的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有着严重的意见分歧。从中国来的报告也互相矛盾。最后共产国际决定，不要和国民党决裂，而要继续同它合作，特别要同它的左翼合作。然而形势继续恶化。结果，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解决全部问题。在共产党的文献中，这次会议叫做第七次全会。会上通过了一个新的提纲，并派罗易率领一个新的代表团前往中国，根据新的路线去组织行动。这次全会事先已把罗易选入共产国际主席团，并选他为中国委员会委员。

罗易在1929年写的《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中，就这个提纲和他去中国的使命作了如下的叙述：

“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新提纲，它的中心论点是：从那时起中国革命必须发展为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们却持有与此不同的意见。他们依然主张应该帮助民族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为了民族团结，不应该强调阶级斗争。只有我一个人提出不同的观点，说中国革命已经到了危急关头，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途径，而不应该盲目迷信与国民党的联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采纳了我的观点。斯大林本人在开始时曾反对这个观点，但后来他被说服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通过的提纲是我草拟的。随后，我就立即动身前往中国去了。”^①

会后不久，罗易就取道海参崴和广州，到了中国去。同行的有前往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雅克·多里奥和汤姆·曼。^②早在罗易到达以前，关于新纲领的消息就已传到了中国。人们对新纲领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事情很清楚：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分歧。”^③继续往下讨论，就更清楚了：有些中国同志对这个新纲领感到苦恼，对于在中国农村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土地革命极为犹豫。正如蔡和森所记述的，在后来的几个月中，共产国际

① M. N. 罗易：《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加尔各答，复兴出版社版，第538页。

② 罗伯特·诺思与津尼亚·尤丁：《罗易去中国的使命》，第44页。

③ 同上书，第44页。

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了。^①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反对，使得罗易在中国的工作进行起来非常困难，而鲍罗廷的反对更加剧了这个困难。鲍罗廷那时仍居显要地位，掌管金钱，他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罗易在广州耽搁了三个多星期，然后起程前往汉口。据同伴中的一个人讲，原来是打算用飞机把他送到国民党的首都汉口去的；但是，发动机发生了故障，他们一行人就坐着由苦力抬着的轿子在陆上旅行了五个星期。当然，早在十年以前罗易就曾到过中国，但对中国农村有这样切身的体验，还是第一次。在去汉口的路上，他看到为革命而斗争的中国农民被吊死在树上。

“1926年4月1日^②，罗易和他的随行人员到达长沙，受到湖南省政府和农民、商人、学生和工人等组织的代表们的欢迎。一家国民党报纸对这件事作了如下的描述：‘十万人冒雨上街，欢迎（共产国际）代表。今天政府设宴招待罗易先生。他定于午夜乘专车离开长沙，明晨到达汉口。陪同他前往的是农业部长谭平山先生。’”^③

罗易和鲍罗廷意见的分歧在于扩大革命还是加深革命这个问题上。鲍罗廷主张前者，罗易则赞成后者。鲍罗廷认为共产党应该支持国民党左翼提出要发动的第二次北伐战争，而把土地革命推迟到夺取北京以后再进行。罗易反对北伐，认为北伐“充满着严重的危险”。他告诫说：“目前我们只须对

① 罗伯特·诺思与津尼亚·尤丁：《罗易去中国的使命》，第45页。

② 这个日期疑为1927年4月1日之误。——译者

③ 同上书，第59页。

付蒋介石。但是我们却在抛开他而进入陌生的地带，在那里我们很可能要碰到许多象他那样的人物。”在他看来，土地革命是斗争的强大动力。他断言：“中国革命要么通过土地革命取得胜利，要么就根本不能胜利。”与鲍罗廷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相反，罗易建议：“通过(1)推进土地革命，(2)在农村建立农民政权，(3)创建一支全然不受拥有土地的将军们摆布的革命军队来组织、集中和巩固革命力量。”^①

1927年5月^②在汉口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为解决这些分歧做了努力。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以后，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在文字上接受了罗易的观点，但是并没有付诸行动。他们仍然不愿意开展工农的独立行动，理由是，这样就会吓坏并疏远国民党左翼。与此同时，发生了许多起农民暴动，但都没有得到共产党人的支持。这些暴动都被国民党左翼的军阀残酷地扑灭了。如果共产党人在这个时刻采取有力的行动，他们本来是能够扭转局面的。罗易不断地激励他们，但他的一切建议和忠告都被他们当作了耳旁风。作为最后的手段，罗易只得转向斯大林，请他下达明确的指示，要中国共产党遵循一条革命的行动路线。斯大林发来了符合罗易愿望的电报指示。然而这也无济于事。鲍罗廷认为那个指示“荒唐可笑”，就回电说：“命令收到。一旦可能，即遵照执行。”^③

此后不久，就发生了这样的结局。国民党左翼争论说，共

① 罗伯特·诺思与津尼亚·尤丁：《罗易去中国的使命》，第62—63页。

② 应为1927年4月。——译者

③ 同上书，第107页。

共产党人阴谋反对他们，煽动农民造反，一心要为自己夺取政权。这些罪状的凭据就是斯大林的电报。后来就有人指责罗易，说他把电文副本交给国民党左翼领导人汪精卫是犯了轻率的错误。但是实际上，电报只是一个借口。当时，国共关系已经很紧张，国民党左翼已经不打算再同共产党人合作下去了。他们宁愿跟蒋介石言归于好，同他携手联合。接着就发动了反共攻势，把共产党人驱逐出国民党。大批共产党人被逮捕和杀害，余下的人只得逃走，以保全性命。这个事件发生在1927年7月。国民党要求鲍罗廷和所有其他俄国顾问返回俄国。“罗易于7月底或8月初离开汉口。共产国际准备了三辆大旅行车，都装有重型钢板，登车板上都捆着汽油罐。司机都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安部的特工人员。车队从汉口出发，向西北行进，越过蒙古沙漠，取道库伦前往苏联。”^①罗易在莫斯科稍事停留后，就前往他在柏林的总部去了。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他忙于给共产国际写报告。在这一期间他还写了《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该书的德文版于1931年出版，但成了希特勒野蛮行径的牺牲品。它的英文版于1945年在印度出版。罗易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好象是1929年在莫斯科用俄文出版的。这本书罗易一本也没有保存。1960年在美国一个图书馆里发现了那本书。1963年罗伯特·诺思与津尼亚·尤丁二人合译的英译本出版。书名为《M.N. 罗易去中国的使命》，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包括罗易在中国那些风云多变的日子里的许多讲演和声明以及其他文件。

^① 罗伯特·诺思与津尼亚·尤丁：《罗易去中国的使命》，第126页。

中国革命的失败对罗易在共产国际中的生涯是一个打击。然而这打击发生在事过一年半多以后；而且这次打击并不是由于中国问题引起的。看起来，斯大林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对罗易起诉，因为在每一个阶段中，他自己也都牵连进去了。如果谴责罗易，就意味着谴责他自己。再说呢，那样一做，托洛茨基就更振振有词了。因此，斯大林不得不等待时机。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体会议于1928年2月在莫斯科召开。罗易出席了会议，并做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罗易认为他的报告会被共产国际接受，他在中国的作用也能得到斯大林本人的赞同。但是，斯大林——罗易对他怀有好感——从中国革命失败后就拒绝见他。随着会议的进行，罗易逐渐认识到他在共产国际中的生涯实际上已经完结了，他的性命和他的前途一样，都很可能处于危险之中。的确，当他几周后离开莫斯科时，他觉得有必要在夜间秘密地旅行。等他越过苏联边境以后，才能肯定说他已安全逃出来了。”^①

对罗易的攻击开始于1928年9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罗易因病没有出席这次会议。罗易后来在他那著名的《我的罪状》一文中写道：“库西宁在他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报告中，攻击我是所谓‘非殖民地化’理论的鼻祖。据他讲，我曾经提出过这样的观点：英帝国主义将逐步引导印度人民走向自由。根据这种说法，他在报告和提纲中把我描绘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在经过修改以后的报告速记和提纲的最后定稿中，他的口吻稍为缓和了一些。”^② 罗易后来在

① 罗伯特·诺思与津尼亚·尤丁：《罗易去中国的使命》，第128页。

② M. N. 罗易：《我们的分歧》，加尔各答，萨拉斯瓦蒂图书社版，第27页。

向共产国际提交的一份关于非殖民地化的声明中，清楚地表明，这种指责是毫无根据的。^①那只是一种借口而已。共产国际的政策既已决定急剧转变，那么，牺牲罗易就有必要了。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急剧地向左转了。这个决定是根据当时俄国的情况采取的。那时俄国已经决定开始实行迅速工业化和强制执行农业集体化的纲领。同样，快速的步伐也被强加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上。“共产国际放弃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尽管形势并不许可这样突然地改变政策。”^②罗易完全不同意共产国际关于印度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的那条新路线。

要在印度推行的新路线，据说是根据在大会上露过一次面的一个印度代表团的建议通过的。这个代表团作了一个反对罗易的报告，说他是“一个在印度默默无闻的人物，同革命运动从来没有什么联系”。然而关于那个代表团的有趣事实是：“这个代表团中只有一个成员被允许回国。据说其余的不久都被怀疑为英国间谍，并被当作间谍对待。”^③

尽管罗易根本不同意共产国际的新政策，他还是保持了差不多一年的沉默。但在此期间，许多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在德国，危机尤其严重，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有经验的领导人被驱逐出党，共产党人越来越脱离广大的工人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罗易向德国共产党持不同政见的领导人所发行的一家刊物，投寄了一系列关于共

① M. N. 罗易：《我们的分歧》，第 44—114 页。

② 同上书，序言，第 i 页。

③ 同上书，序言，第 ii 页。

产国际危机的文章。这就给了共产国际领导人一个借口，他们抓住这一机会，把罗易正式排斥于共产国际之外。此事发生在1929年初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上。根据会议决议，由于罗易主张“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集团的机会主义政策”并“向布兰德勒派的叛徒们办的刊物投稿”，他本人已把自己置于共产国际之外了。

罗易在他所写的《我的罪状》一文中，生动地叙述了第十次全会是怎样作出这一决定的。引用其中一段那将是很有意思的：“我站在这‘神圣的断头台’前已有一些时候了。这种疯狂滥用断头台的作法正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严重的破坏。我处于那个地位将近一年了，并没有因为害怕丢掉脑袋而战战兢兢，却给篡夺了运动领导权的那些人的无能吓得目瞪口呆，我对这些既无能力又不负责任的领导人把运动推向毁灭的鲁莽行为感到震惊。最后终于轮到我了，但此事延搁至今，真令人百思莫解。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上，温文尔雅的库西宁以他特有的推卸责任的态度，来要求我的不值钱的脑袋了。在谈到我向德国反对派刊物投稿这一最新‘罪状’时，他怀疑一个人在犯了这样的重罪之后，是否还配称作他所代表的那部分人的一个同志。开除我的场面已经布置好了。‘群众’响应了。从阴暗的角落里发出了经人提示过的叫喊：‘把他送上断头台’。一个几乎在共产国际一创立就同它发生联系、多年来积极参加革命运动、一向因犯所谓‘左倾’错误而被怀疑和批判的人，就被人们无动于衷地撵弃于共产国际的大门之外了。洛索夫斯基和舒宾之流显然在俄国代表团授权之下对我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攻击之后，马努伊

尔斯基指责我是‘叛徒’，就此作了结论。程序非常简单，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说明一个历来的‘左派’怎样一变而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没有说明一个积极为革命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人，后来又怎样突然变成了‘叛徒’的。只是库西宁简单地宣称，我提出了与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结成集团的政策，于是马努伊尔斯基就断然地把我叫做‘叛徒’了。”^① 罗易的文章最后强有力地阐明了他的立场。他写道：“我并没有犯强加于我的那些罪行。我的过错是认为自己有独立思考的权利，这在当时共产国际正在经历的危机时期是不允许的。只要我不说出我的反对意见，我就不会被宣布为‘叛徒’而被赶出共产国际的大门。他们把那个使人缄默的口衔强加于我，这个威力无比的东西就剥夺了我的一切表达手段。换句话说，假如当初我不敢大胆地发表我的意见，他们也许会不动声色地把我打入冷宫，以惩罚我的独立思考这一不可饶恕的罪行。但是一个革命者的责任有时要越过专横纪律的狭隘界限，……我被置于这样的一种境地，我觉得参加反对派，反对正在毁灭共产国际的现领导，是我的革命义务。”

“我不同意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所有的决议，不仅是不同意有关印度问题的决议而已。如果错误只限于在某一个特殊问题上，那不妨等待一下，希望这个错误终将得到纠正。但是在印度推行的错误路线，只不过是一个重大错误中的一小部分。因此，保持沉默是不能允许的。共产国际已经陷入了危机。它的领导班子的组成情况和行动就表明了这

^① M.N. 罗易：《我们的分歧》，第 25—26 页。

一点。”^①

甚至在罗易被驱逐出共产国际之后，他仍一如既往继续进行他那促进印度民族运动的活动。事件发生之后，大多数经罗易培养和教育的印度共产党人背离了他，而且遵从共产国际的命令，开始痛骂他为叛徒和反革命分子。不过也有那么几个敢于坚持自己信念的人支持罗易。此外，罗易同国大党和工会运动的一些人还有一些联系。他通过那些联系进行工作。1929年12月印度国大党在拉合尔召开重要会议。这次大会同意把民族完全独立作为国大党的当前目标。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宣言。为了欢迎这一宣言，罗易发表了题为《拉合尔大会的教训》的小册子，并借此机会向国大党成员提出了一个民族革命的具体纲领。这个纲领包括以下项目：“（1）建立一个具有先进民主宪法的印度联邦共和国，总统对由成年男女普选产生的单院制议会负完全责任；（2）邦在地方事务中享有自治权，为了确保语言和宗教尽可能的一致而重新划分各邦，建立如中央政府那样的民主政府；（3）根据民主民族国家的法令，授权农民没收土地，无偿地废除土邦与地主制度；（4）土地收归国有，耕者拥有占用权，但须向政府交纳不超过净收入百分之十五的单一土地税；（5）废除向农民征收的其他一切捐税（例如灌溉税），以及间接税（盐税、消费税、保护关税等）；（6）对依靠‘非经济性产业’而生活的农民完全豁免捐税；（7）如农民无力偿付，即取消其农业债务；（8）制订限制高利贷的法律（年息不得超过百分之十）；（9）由国家帮助建立农业银行，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10）矿产资源及公用事业收归国

^① M. N. 罗易：《我们的分歧》，第42—43页。

有；(11)制订法律，规定雇佣劳动者每日工作八小时；(12)由法律固定最低工资的数目，以保证工人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3)对失业、疾病、老年和生育实行社会保险，其基金的百分之七十五由雇主和国家支付；(14)制订有关工会，工人有权罢工和组织其阶级政党的法律；(15)实行出版、言论和结社自由；(16)实行宗教和信仰自由；(17)保护少数民族；(18)给予携带武器的权利；(19)实行初等免费义务教育。”^①要在动员群众进行斗争来实现其迫切要求的基础上完成这个纲领。罗易从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时候起，就一直提倡这条路线，甚至在同共产国际决裂之后，他还继续这样提倡。1930年5月工党与社会党国际在柏林召开了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英国工党杰出的领导者出席了这次会议。当时罗易向执行委员会委员们散发了《一封公开信》，提醒他们注意工党为镇压印度的独立斗争而采取的手段。^②大约也在这个期间，他同其他许多印度人一起积极努力在德国组织印度国大党支部。这样，他与印度事态的发展继续保持着经常不断的联系。

由于共产国际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执行了极左政策，很多国家的共产党发生了分裂。那些拒绝执行冒险主义路线的人都被驱逐出党。其中很多是资格很老的领导者，曾经做出过值得赞扬的功绩。他们当中最杰出的是德国的海因里希·布兰德勒和奥古斯特·塔尔海默。罗易同这两个人的关系特别密切。他们既是他的朋友也是他的向导和顾问。在罗易的《狱中来信》里，多处提到这两个人。罗易返回印度之前，

① M. N. 罗易：《向前看的人》，第199—201页。

② 同上书，第220—221页。

一直同他们密切合作。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曾多次打算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一开始，吸收那些被共产国际开除的人来组成。罗易不赞成这个意见。他劝告他们耐心等待共产国际的领袖们认识错误，回到明智的道路上来。1935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改变了策略，实际上采用了罗易和他的朋友们所主张的路线。但这次大会既没有光明磊落的风度，又没有宽宏大量的胸怀，把那些由于前次大会采取错误路线而与之分道扬镳的人们再请回来。

印度的局势也急剧恶化起来了。1929年初，所有老资格的共产主义工作者都被政府逮捕了。他们的职位被一些既没有经验也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年轻人所取代。这些人盲目地追随共产国际的新路线。因此，他们与在印度国大党旗帜下发展起来的民族运动处于对立的地位。在工会运动中，他们奉行组织罢工和分裂工会的政策。他们认为革命即将来临，因而只谈论和筹划建立苏维埃的事情。结果，国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几乎被毁灭了。罗易从报纸和其他报道得到所有这些消息。他看到在他的指导下六年来所做的一切有益的工作遭到这样的肆意破坏，心里十分痛苦。他很想插手去挽救这个局势。而且很明显，一个民族运动的新高潮也正在兴起呢。他想亲临其境给这个运动指出革命的方向。但是对罗易来说，返回印度谈何容易。两张逮捕状——一张有关坎普尔密谋案，另一张有关密拉特密谋案，在等待着他。只要一踏上印度国土，他就会被捕。因此，他有必要提高警惕，防备警察发觉他的行动。罗易和他的密友，特别是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讨论了此事。他们不赞成他这个意见。布兰德勒认为时机并不

象表面所显示的那么成熟，因此，他劝告罗易不要冒险。后来，罗易承认布兰德勒对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但又不愿承认自己的行动是错误的。正如他在的一封信中所说的：“这是整个过程的一个阶段，不管后果如何，非走这一步不可。”^①最后，罗易决定立即行动了。他经过一番必要的准备，于1930年11月14日动身前往印度。他在欧洲的最后一周，是和埃伦·戈特沙尔克（她后来在1937年旅行到印度，成为他的妻子和助手）在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山中避暑地度过的。罗易在他的《狱中来信》中曾温情脉脉地多次提到那山中避暑地的生活。

罗易为返回印度准备了一些条件。他同在欧洲各教育中心学习的印度学生进行了一些接触。其中三人，即，塔亚布·沙伊克、孙达尔·卡巴迪和布拉杰什·辛格，同他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接受了他的观点，并答应帮助他在印度工作。他们比罗易提前几个月回到印度，并做了一切必要的安排。罗易于12月中旬到达印度。他在卡拉奇登陆，然后旅行到孟买。他这次离开欧洲和来到印度，都安排得十分巧妙，以致他到达印度约有两个月，警察还一无所知。因为罗易必须避开警察，他不得不秘密地生活、活动、工作。他知道总有一天他会被捕。他对这一点有所准备，但是想尽量推迟这一天的来临，以便他能有时间为他的工作打下基础。同时，他又不愿意躲藏在安全的地方而不能做任何工作。人们给他提供了很多这样的安全的地方，其中有些是著名的国大党员提供的，但他都谢绝了。

罗易到达孟买没有几天他就聚集了一群年轻而热情的政

^① M. N. 罗易：《狱中来信》，第1页。

治工作者在他的身边。他们属于许多组织，例如青年团、工会和国大党委员会，等等。罗易见多识广、才气横溢，把这些政治工作者迷住了。而且他还为这些人指出一条明确的革命道路。起初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显赫的人物是谁，只是后来才发现他们集体的核心人物马茂德博士就是举世闻名的革命家M. N. 罗易。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罗易就取得了他们政治上的信任以及个人的友谊和忠诚。罗易还会见了许多国大党的领袖和其他组织的领导人。他跟这些人谈论了政治和社会革命问题以及为帮助革命的发展所需要做的一些工作。尽管他不能得到他们的直接支持，但在许多情况下，他至少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他们的思想。

罗易出席了在卡拉奇召开的印度国大党会议。在那里，他得以会见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苏巴斯·钱德拉·鲍斯，并同他们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讨论。通过这些讨论才产生了国大党关于社会和经济目标宣言的概念。这个宣言以决议的形式出现，后来称之为卡拉奇决议。这是国大党关于社会经济计划的第一次诺言。决议的措词与罗易无关，但毫无疑问，决议的主旨和精神都来自罗易。然而，他没有能够使左翼在国大党里作为一支突出的力量出现。罗易对遭到共产党人破坏了的工会运动的复兴和团结同样感到非常关切。在他的指导下，他那个组织的一些成员开始到工会工作。罗易也制订了“团结纲领”，这一纲领后来便成为工会运动的团结基础。他并不把自己的活动局限在城市中。他也到农村访问，并参加了一些农民的会议。他以班纳吉博士的化名，特别到联合邦去做了大量这样的工作。

早在罗易到达印度之前，共产国际反对他的宣传就已传到了印度。印度共产党人听到这种宣传马上就相信了，因为对他们来说，共产国际的话就象上帝的话一样神圣。他们拼命向全国各地散播这种宣传。由于那时共产主义和共产国际对左翼分子和进步人士具有巨大的魅力，这种宣传也就被许多非共产党人相信了。因此，罗易工作起来十分困难。他必须同共产党人的恶毒宣传以及许多人对世界革命中心的感情依附作斗争。这些共产党人并不仅以宣传为满足，他们还积极阻挠罗易信仰者的一切活动。其中一些人公开宣扬，马茂德博士就是罗易，这就给警察局提供了关于罗易下落的线索。从此以后，罗易就无法在公开场合活动了。

警察得知马茂德博士就是罗易以后，便拉紧了搜查网。1931年7月21日，罗易终于在孟买被捕了。他的一些同事因窝藏逃犯的罪名也同他一起被捕。所有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罗易被捕的消息。警察局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功绩，因为这个使他们在世界各地寻找了长达十六年之久的人终于落网了。消息传来，印度这个民族主义者占优势的国家大为震惊。虽然人们对罗易信奉的新哲学还不甚了解，但由于他在国外的辉煌业绩都对他从内心里感到敬佩和爱戴。他的朋友和同事们自然都受到很大的打击，经过相当时间，心情才从震惊中平静下来。

罗易立刻被转移到坎普尔。坎普尔共产党阴谋案这一旧案又要重审了，罗易被控参与了这一案件。提交地方法官的关押手续很快就完成了。高等刑事法庭的审判则拖了好几个月，最后罗易被判处十二年流放。这一处罚太重，也太残酷

了。后来经过上诉，减刑为严格监禁六年。罗易在法官面前和在高等刑事法庭都为自己进行辩护。他辩护的理由颇为特别。他辩论说，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非法的，因此企图推翻这种统治不是非法的行为。他对印度刑事法典的合法性提出疑问。后来这次辩护词刊印成书，书名是《我的答辩》。这个辩护看来惹怒了高等刑事法庭，这就可以解释罗易被判重刑的原因。在上诉中，K. N. 卡特朱博士为罗易进行辩护。虽然判决减轻一半，但是比近来的密拉特共产党阴谋案中最重的判决还厉害得多。

判决宣布以后，罗易就立即被转移到巴雷利监狱关押。他的大部分狱中生活就是在那个监狱里度过的。监狱的条件非常苛刻，令人难以忍受。他被当作乙级囚犯对待。每月只允许他收一封信，发一封信。他定期把这封信写给埃伦·戈特沙尔克。她在罗易监禁期满时来到印度，同罗易结合，成了著名的埃伦·罗易夫人。罗易那些信件的一部分后来出版了，书名是《狱中来信》。这些信件是很有价值的文献，它反映了罗易广泛而多样化的兴趣。他对哲学和科学就象对文学和艺术一样热中。他总是使自己跟得上现代科学的一切进展。他对社会与政治事件也同样十分熟悉。这些信件也表达了一个敏感的人的痛苦，这种人受到世界上残暴行为和罪恶的折磨；但他又永不休止地寻求自由和真理。这些信件使人看到罗易的知识异常渊博，但他仍然渴求扩大自己的知识范围。按规定，罗易每月可以有一次会见外人，但他却被剥夺了这种权利，理由是他没有亲属，而根据规则只有亲属才可以要求会晤。对于罗易要求得到书籍这一问题，监狱作了许多限制，在

文具的使用方面限制就更严格了。他们曾经多次拒绝给罗易书籍和文具,这是对他的最大的折磨。

巴雷利夏天非常炎热。因为罗易在气候比较寒冷的国家里生活了十五年以上,所以他几乎忍受不了这种酷暑。但他不得不忍受这种磨难。结果他的身体垮下去了。正如在他出狱后人们看到的那样,他的健康所受到的摧残是永久性的。罗易健康很坏的消息传遍了国内外。很多人焦急地询问罗易的健康情况,这给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由于那种压力,后来政府作了这样的安排,夏季将罗易转移到阿尔莫拉,夏天一过,马上押回巴雷利。在最后的两年中,罗易才能利用这种安排。他最后一段的狱中生活是在台拉登监狱度过的。1936年11月20日罗易经过了五年零四个月的监禁后,从那里被释放了。罗易终于成为一个自由人,他可以公开地,积极地为祖国的解放而自由地工作了。

罗易的监禁并没有使他中断在他返回印度后那段短时期内所开创的活动,以及他所从事的力所能及的地下工作。聚集在罗易身边的工作者,在他被捕以后仍然继续活动,并开展了工作。他们逐渐被人称为罗易小组,在政治和工会运动中都表现得很为突出。罗易小组逐渐被人们认为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尽管这个小组一直遭到正式的共产党的强烈反对,它还是确立了它自己的地位。在那段时间里,罗易小组和共产党之间为了在民族运动和工会运动中夺取重要的地位而展开了一种竞赛。由于时常受到罗易的正确指导,罗易小组在竞赛中遥遥领先。在印度政府编写的印度共产党历史中就已经承认了这种形势。书中写道:“共产国际担心罗易会充分

利用他的政治才智、组织能力、领导能力，尤其是他那非凡的人格，将把左翼分子吸引在他的身边，从而削弱‘正式的’共产主义运动。这种担心证明是正确的。尽管几乎所有在印度经罗易培养的来自欧洲的特工人员都效忠于共产国际而抛弃了他，但到1934年年底，罗易新的追随者已经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他们巩固了在全印工会大会的地位，争取了四十多个劳工组织参加那个大会，并在加尔各答建立了常设办事处。全印工会大会逐渐恢复了它以前作为国家工会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的地位。”书中另一处写道：“只有罗易的天才才能使他在返回印度的短暂时间里，单枪匹马地完成那样多的工作。他甚至还从监狱里鼓励和指导他的追随者。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在以后几年所取得的进展，就表明了罗易所主张的策略是多么正确。假如共产国际曾经指示印度共产党参与1930至1932年的不合作运动，今天的共产党人至少也不会被人指责，说他们避不参加国家独立斗争。他们也就很可能以他们的思想、热忱和纪律对今天的政治领导留下很好的影响。”

罗易经常同他的小组保持联系。尽管监狱戒备森严，监狱当局密切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但他还是找到了各种途径，同外界保持联系。罗易在交结朋友并博得他们的忠诚和效劳这一方面，很有本领。政治犯帮助他，普通犯人帮助他，看守和狱吏也帮助他。他们帮他偷送消息、信件以及进行别的联络。他通过他们送了几封信给罗易小组的成员。他也给印度国大党的领袖们写了好几封信。在这些联系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建立国民大会社会党的信件。他力图劝说组织者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纲领以及应该发展什么类型的组织。这封信后来以《致

国民大会社会党的信》为题发表了。一个完整的论中国发展的小册子也被偷偷地带出监狱，这本书后来用《中国在造反》这个书名发表了。

罗易一直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在狱中尽管处在恶劣的条件下，他还是写了很多作品。他的名著《法西斯主义》和《伊斯兰教的历史作用》就是在狱中写成的。同样，他与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审判长沙·苏利曼爵士的论战也是在狱中写的。后来这个论战以《二十世纪的异端邪说》这个书名发表了。此外，还有许多尚未发表的材料。这些材料特别涉及现代科学的哲学成果，这是罗易在监禁期间特别专心致志的一个课题。在每一封狱中来信里，罗易一直要求得到一些有关这个课题的更多的书籍。在那期间使他最感遗憾的是，他不能同一些在欧洲的有资格参加讨论的朋友们讨论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想法。这本著作到现在还没有发表，真是可惜得很。

印度所有民族主义者对于罗易的释放出狱都感到欢欣鼓舞。只有一种人例外，那就是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同路人。那些人一想到必须公开对付罗易，他们就很不高兴。对于他们来说，罗易是一个需要用各种方法与之斗争的敌人，因为他不准备象他们那样，盲目地、毫无疑问地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训令。他们仍然象以前一样，深恶痛绝地反对他。罗易刚被释放便立刻投身于民族运动中。他已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取得了联系。尼赫鲁邀请他参加在他释放后即行召开的联邦国大党大会。罗易在监禁期间经过深思以后已经决定参加国大党，并通过国大党实现他那争取祖国政治和社会解放的理想。在那次会议上，他正式参加了国大党成为党员，并立即

被选为来年的国大党年会的代表、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委员和联合邦国大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罗易小组的成员都已团结在他的身边。除了他们之外，在国大党中，罗易现在又有了一些准备按他的纲领工作的共事者和合作者了。

罗易获释后访问了许多地方。每到一地，他都受到了热烈的接待。人们都渴望见到这位在很多国家的革命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并倾听他的讲话。他已成为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政治工作者都开始聚集在他的周围。在印度国大党费兹浦尔会议上，他是人们注意的中心人物。在那次大会上，他详细阐述了他关于制宪会议的意见，以及如何通过发展人民为实现他们的迫切要求的斗争，使各国大党委员会成为斗争的机构，并于最后发展成为权力机构。详细说明这样具体的革命行动纲领，在国大党中还是破题儿第一遭。这种说明使所有为民族自由事业而斗争的严肃而富于战斗性的战士都听得入了迷，联想翩翩。会后，罗易参加了马哈拉施特拉邦、卡纳塔克邦和安得拉邦的国大党竞选活动。

促使国大党行动化与民主化，是罗易为了使国大党成为民族革命的有效工具而一心想要追求的目标。他在出狱以后的头三、四年间，一直为实现这个目的而坚持不懈地努力。不过他不得不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进行工作。国大党的右翼反对他，这并没有使他感到意外。使他奇怪的是国大党的左翼也反对他。国大党左派正在追求乌托邦式的梦想和不切实际的想法。他们不准备屈服于严峻的现实，制订一个切实有效的纲领。这种态度使他们和罗易为了在国大党内发展新的领导力量而想要采取的政策和策略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本文作

者在 1937 年写的一篇文章里，曾把当时的形势描述如下：

“关于罗易同志出狱后应该做些什么，那些所谓的左翼分子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要他高高站在不切实际的理论和浪漫梦想的奥林匹斯山顶。他们要他远远避开发动和组织激进力量的实际工作，而只充当一位同情者、一位顾问和一颗指路星斗。如果罗易那样做了，他们就很有可能把他当作英雄来崇拜，当作伟大的革命家来吹捧。但是罗易同志有他自己的想法，他不愿扮演那些害怕被他胜过的人所派给他的角色。他一贯是个积极的革命家，于是直接投入了组织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艰巨工作中。他不欣赏受人热烈喝彩却又不起作用的英雄角色。他坚决不肯把自己孤立于奥林匹斯山顶上。他加入了人民的行列，在他们中间活动，想他们之所想，表达他们的感情和愿望，担负起把他们组织起来这一朴素而又必要的工作。

“罗易提出的许多观点和口号一开始就遭到了一阵猛烈反对。那些所谓的左翼分子诋毁他的观点和口号，说它们是反动的和反革命的。他们对他肆意谩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证明罗易同志的分析是正确的。他的每一个观点和口号甚至都被那些曾经激烈反对过它们的人们普遍地接受了。”^①

这时，罗易已经在孟买创办了自己的独立周刊，叫做《独立的印度》。现在它以《激进人道主义者》的新名字在加尔各答出版。罗易通过这个周刊每周向人民提出他对当前问题的

^① M. N. 罗易：《我们的分歧》，加尔各答，萨拉斯瓦蒂图书社版，第 143—144 页。

见解和他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独立的印度》很快就成了一个有影响的、有见解的刊物，吸引了广大的读者。罗易还创建了激进国大党人同盟，以推进国大党行动化和民主化的工作。他在全国许多地区作广泛旅行，在大多数地区受到大部分公众的支持。但我们遗憾地指出：他为了发挥革命潜力所做的一切努力，既没有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或苏巴斯·钱德拉·鲍斯这两位公认的全国左翼领袖那里，也没有从国大党左派那里，得到应有的支持。这些人都不准备和甘地式的思想方式与斗争方法断然决裂，而这种决裂是包含在罗易的行动纲领之中的。

在印度的民族主义领袖当中，唯独罗易一人强调哲学革命是完成政治和社会革命的必要的先决条件。他认识到一个文艺复兴的必要性。他在国外时就曾经写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他刚一出狱就发动了一场蓬蓬勃勃的运动来宣传这个思想。这个运动是他发动的全部政治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上面引证过的那篇文章中写道：

“罗易同志在政治战线上为了建立一个有效的革命运动并纠正激进分子侈谈理论和幻想的风气而进行斗争的同时，一直在思想战线上对正统民族主义的反动观点进行着系统的战斗。在政治斗争的一片喧闹声中，他却预告一场哲学革命的来临。他的哲学著作和讲话除了表明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以外，还大大有助于澄清当时烟雾弥漫的学术空气：赞颂旧传统，宣扬印度人民特有的天才，以及印度负有特殊使命。他无情地剖析了旧观念的反动性，大胆地坚持必须学习西方国家的经验，这就使他在正统的民族主义者群众中不得人心。但

是他还是要冒这个风险，他确信革命运动不可能建立在反动思想的基础上。‘不得人心’这个幽灵和群众所崇拜的偶像们的那种皱眉，都不能阻止罗易致力于我国革命运动的根本任务。他以非凡的勇气一直在宣讲造反的使命——造权威的反，造传统的反，造无法忍受的生活条件的反。他一向极力使人们理解的中心论点是：精神上和理智上的反抗是政治和社会反抗赖以成功的条件。”^①

关于这个问题，他写了许多书和文章。其中重要的是《唯物主义》和《科学的政治学》。后来他还创立了一个叫做“印度复兴学会”的新组织，用来进行使全国熟悉文艺复兴思想的系统工作。罗易获得了公开进行工作的自由以后，就立即发动了文艺复兴运动，这一运动最后发展成为罗易晚年全力从事的激进人道主义运动。

1939年9月1日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印度的政治局势发生了革命的变化。人民中间有一种强烈而广泛的反英情绪，人们普遍觉得应该利用英国政府陷入的困境来推进印度的独立事业。国大党内阁各部长因为总督没有征求印度人的意见就把印度拖入大战这一争端而辞职。人们要求发起并开展一个反对战争和抵制战争的运动。圣雄甘地发动了个人的不合作运动。政府镇压了这一运动。但是战火愈燃愈烈，随着日本在东南亚的惊人胜利，战争就越来越逼近印度了。英国政府企图安抚印度的舆论，但并没有成功，因为英国不准备承认印度独立，而没有这个条件，民族主义运动就不准备为战争努力而进行合作。最后，甘地在1942年8月发起了“退

^① M.N.罗易：《我们的分歧》，第157—158页。

出印度”运动，这一运动实质上使全国陷入反抗政府的叛乱中。由于这一叛乱是自发的、无组织的，而且主要是非暴力的，所以政府没费多少气力就把它镇压下去了，但余波未息，人们怀恨在心，冲突时起。国大党的这些反战活动和运动都得到了很大一部分公众的支持。

罗易必须逆着这股强大的舆论潮流而行。他对这次战争的反应是与众不同的。他把这次战争看作是人民的战争，反法西斯的战争。1940年初，战火刚刚蔓延到欧洲时，他就认识到战争的这种性质。战役在一个接一个地进行，这种性质就更加明显了。他确信战争很快就会把苏俄卷进去，正如1941年6月发生的情况那样。因此，他认为这种战争应该得到所有热爱自由的人们的无条件的支持。他深信只有通过支持战争的努力，印度人民才能为自己的解放竭尽全力。这些观点是离奇的、异端的，非常不得人心的。甚至在他的亲密的追随者当中，这些观点也没有立即获得赞同。他只好平心静气、不厌其烦地和他们讲道理，进行辩论。经过极大的努力，他才说服了他们。他们一旦被说服了，马上就开始与他一道为战争努力的成功和为说服人民热情而又果断地投入战争而奋斗。这些活动是不受欢迎的，并且使罗易和他的追随者遭到肆意谩骂和痛斥；人家骂他们是英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罗易在《独立的印度》和其他刊物上广泛地写了有关大战问题意见分歧的文章，其中部分文章刊印成书出版了，书名是《印度与大战》。

关于战争问题的这种意见分歧使得罗易被国大党开除了。开除的近因是在大战爆发一周年的时候罗易派组织了拥

护战争反对法西斯的示威游行。面对着禁止他们进行拥护战争的活动这一事实，罗易和他的同事不得不离开国大党而建立另一个政党。于是在1940年12月，激进民主党就组织起来了。这个党是由激进国大党人同盟的成员以及其他相信罗易行动路线是正确的、并准备依据这个路线进行工作的人所组成。在随后的几年中，该党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工会运动也因同一问题发生了分裂。在民族主义者的影响下，全印工会大会决定对大战采取中立态度。这对那些认为支持战争并赢得战争胜利是符合工人利益的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因此，他们退出了全印工会大会，建立了一个名为印度劳工联盟的新组织。罗易被选为联盟的总书记。这个联盟很快就成为工人中重要的中心组织了。

战争年代是罗易非常活跃的时期。他必须在全国培养一种拥护战争的思想感情，并竭尽全力帮助进行战争活动。为了这个目的，他组织了很多一般性会议和专门性会议。他必须参加其中许多会议，并发表重要演说。他必须从事激进民主党和印度劳工联盟的建设工作。为了使人民更有目的地投入战争活动，他还试图建立一个更加广泛的阵线。这个阵线采取了民族民主联盟的形式。

所有这些活动，使罗易的健康受到很大的损害。他在狱中多年，备尝艰苦，身体不受重视，因此健康状况本来就不好。甚至在获释以后，罗易过的仍然是艰苦生活。他从来没有固定的收入。写作固然使他有点进项。但他还得经常依靠朋友们的接济来补贴生活。因此，罗易总不能随时获得所需要的医疗。在这个期间和以后，台拉登是他的总部。他最初到台

拉登时所住的房子坐落在莫希尼路十三号。后来这幢房子被买过来作为印度复兴学会的会址，于是那里就变成了罗易信仰者一切政治和社会以及哲学和思想的活动中心。许多非常重要的讨论和会议都在那里举行。许多人都到那里去请教当代许多有争论的政治问题以及许多哲学和科学的问题。

在这一时期，罗易写了很多书和小册子。其中一些是关于现代政治问题的，例如《民族主义——一种过了时的迷信》和《民族政府还是人民政府？》。有些象论述苏联革命和中国革命与反革命那样的著作则具有比较永久性的价值。《人民的计划》也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这本书不是罗易自己写的，但是书中表示的愿望以及它所体现的思想，都完全来自罗易。另一本重要的出版物是《宪法草案》。这是由他起草的，它体现了罗易对于国家独立之后应该采取什么政治结构的观点。他还主编了一个高水平的季刊，专门讨论和研究哲学和意识形态问题。这个季刊创办时取名为《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后又改为《人道主义的道路》。他的一些写作活动是和他的多方面的政治以及其他活动同时进行的。

在大战快要结束的年代里，罗易那永不停息而老是追根究底的头脑才开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不足之处。那时民主力量的胜利已成定局。法西斯主义的危险被排除了。对希特勒及其法西斯匪帮可能蹂躏欧洲、奴役世界的恐惧也已消失。考虑战后会发生什么情况的时候已经到了。罗易早已预言世界将围绕着两极——美国和苏联——旋转。如果要保持和平，如果要人民能够向着进步与繁荣的道路前进，就必须避免这两极之间的冲突。对于局势的答案既不是

资本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早已证明了它的破产，共产主义也已使一切希望落了空。另一方面，共产主义意味着不仅在一国范围内，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都有战争的威胁。因此必须超越共产主义，发展一种既能保证自由与平等，又能保证安全与自由发展的意识形态、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顺着这条思路，罗易悟出了新人道主义的哲学。

罗易花了几年的时间才发展并钻研出这些思想。此外，他还得向他的同事及合作者亮出那些思想，并取得他们的同意。讨论会在著名的夏令营举行，这种夏令营每年在台拉登或穆索里定期举办。最后，这些思想被普遍接受了，后来编成了包括二十二篇论文的册子。1946年12月在孟买举行的激进民主党大会上讨论了这些论文。号召一个政党来讨论关于人类和社会的起源和成长，关于思想的发展以及关于能够适合20世纪人类需要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等这样具有高度理智和哲理的论述，这还是一个创举。但罗易建立的这个政党是一个性质不同的政党。这个党冷静而又理智地讨论并通过了这个论述，只做了几处更动。受大会委托，罗易根据二十二篇论文中包含的社会和政治观点草拟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将成为人道主义者宣言。后来它以《新人道主义》为题出版了。

孟买会议上通过的声明有其逻辑上必然的含意。人们认识到在新人道主义里没有政党的任何地位，认识到政党妨碍人民行使他们的主权，政党是民主的障碍。既然得出了这些结论，就必须解散激进民主党。而要作出这个决定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几年来这个党已经发展起来了，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成立了党的支部，而且拥有一大批精明强干、忠诚无私

的骨干工作人员。他们在党的旗帜下，为政治和社会工作而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他们在任何艰难情况下都支持党。罗易想到了对他们将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以及他们对党解散的意见会有什么反应，这些问题使他担忧了好几个月。他不愿意把任何决定强加给他们，但那些想法是有其原动力的。在一年左右的期间，大多数党员也都有了同样的看法。他们认识到，如果要做激进的人道主义者，他们就必须解散他们已经建立起来的政党。1948年12月，党的会议在加尔各答举行了，会议决定解散党的组织。这又是一个十分独特的决定。人们几乎没有见过一个组织(特别是一个政党)决定自己解散自己。一般总有这样一种倾向：甚至在不能再起什么有用的作用时，也要坚持继续存在下去，何况激进民主党还不至于全无用处呢。按惯常的标准说，在此后不短的时期内，这个党还有大量有益的工作可做。它之所以被解散，是因为它不符合激进人道主义的政治观点和社会目的。获得全体党员接近一致的同意解散党组织，这必须归功于罗易。取得这种胜利的，是他那令人信服的逻辑和他那思想的力量。在这期间，罗易写了大量的文章，论述没有政党的政治这个问题。其中一些文章在他死后编集成册出版了。

党的解散并不意味着罗易退出政治或公共生活。他对国内外社会和政治的发展继续怀有以前那种强烈的兴趣。他通过他的更名为《激进人道主义者》的杂志以及许多别的报纸，把自己关于社会和政治局势的坦白直率的意见发表出来。罗易不属于任何党派了，因此人们比以前更乐于听取他的观点。他也得注意激进人道主义运动的发展。但是他的主要工作是

细心钻研和巧妙发挥激进人道主义的思想并使之臻于完善。在这段时期，他写了最后一部巨著《理性、浪漫主义和革命》。这本书分两卷出版，一卷出版于1952年，另一卷出版于1955年，也就是他逝世后的第二年。

罗易以专著形式撰写的书为数甚少，上面谈的那部书是其中之一。他的其他书籍大部分是他随时写的文章选集，或者是他在各种场合所发表的演说汇编。在这部书中，罗易阐述了他关于“现代文明的文化和道德危机”的观点，并根据他对各种哲学的批判研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建议。他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在用人道主义解释文化史的基础上，本书力图概括说明一种把社会和政治实践同理性与伦理的科学形而上学联系起来综合哲学。”^①罗易发展了一种新哲学；但它不是一种纯粹冥想的哲学，而是一种社会和政治行动的哲学。罗易在叙述新人道主义哲学的本质时说：

“新人道主义强调这样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人是他的世界的创造者——这里所指的人，是有思想的动物，而人只有作为个人，才成其为有思想的动物。大脑是思维的工具；而脑子是属于个人的。它不能为集体占有。有天才的个人所抱的反对崇拜偶像者的思想就是一切革命的预兆。人与人的友爱之情受到冒险思想的吸引，具有追求自由的强烈意识，受到自由人的自由社会美景的鼓舞，并受到改造世界的意志的启发，以至于要恢复个人至上与尊严的地位。这样的友爱之情将为摆脱现代文明的当前危机指明出路。

“归根结底，公民教育是改造社会使其有利于共同进步与

^① M. N. 罗易：《理性、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复兴出版社，序言。

繁荣，而不侵犯个人自由的必要条件。新人道主义提倡通过精神上解放了的有道德的人们的通力合作，来对世界进行一番社会改造，使其成为自由人的联邦和友爱社会。

“新人道主义是世界性的。一个由精神自由的人们所组成的世界性的联邦将不受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或其他任何类型的——疆界的限制，因为在 20 世纪人类复兴的冲击下，这些国家将逐渐消失。”^①

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罗易患有严重的脑血栓病。他和这种疾病进行了严酷而英勇的斗争。只要病稍有好转，罗易就马上恢复写作以及指导激进人道主义运动的工作。他在病榻上为《激进人道主义者》写了许多文章。《回忆录》有些篇章也是在这个期间写成的。1953 年初，他的健康好象完全恢复了。于是他又重新开始了他平日的许多活动，甚至计划作一次旅行，但这并没有实现。在这一年的年底，他旧病复发，两个月后，他的末日便来到了。罗易，这个为自由而斗争的伟大的革命战士，非常卓越的思想家兼作家，于 1954 年 1 月 25 日晚在台拉登他的寓所溘然长逝了。

在叙述罗易的时候，如不提及埃伦·罗易——他的夫人、朋友和合作者，那么叙述就是不完整的。只有在她的帮助下，罗易出狱以后才能够做他所做的那些工作。罗易死后，他的妻子继续了他的工作。这是一个勇敢的尝试。可是，那个尝试由于她在 1960 年 12 月 13 日黑夜里死于非命而中断了。这显然是一个谋杀事件。但是无论罗易的逝世还是埃伦·罗易

^① M.N. 罗易：《理性、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第 2 卷，第 310 页。

的被害，都没有中止罗易创始的事业。激进人道主义运动正在全国发展壮大，而罗易对自由民主社会发展的贡献，特别是在思想领域方面的贡献，正在得到越来越大的承认。

V. B. 卡尔尼克

罗易著作目录

缩写名称

- BN 国立图书馆, 巴黎
- CBI 累积书目索引(纽约, H.W. 威尔逊公司)
- CU 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 伯克利
- HL 有关战争、革命与和平的胡佛图书馆, 加利福尼亚州, 斯坦福, 斯坦福大学
- IOL 印度局图书馆, 伦敦
- IRI 印度复兴学会, 台拉登, 印度
- LC 国会图书馆, 哥伦比亚特区, 华盛顿
- LSE 伦敦经济政治学院, 伦敦
- NYPL 纽约公共图书馆
- PC 私人藏书
- RH “罗易著作目录”, 《激进人道主义者》, XIX(1955年1月23日), 第4、5期, 第50页
- M 密执安大学总图书馆——到1961年3月15日止

书 目

下列书目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加利福尼亚大学南亚研究中心搜集。经加利福尼亚大学威尔逊先生许可重印于此。

《不合作的后果》 The Aftermath of Non-Co-operation

伦敦,英国共产党,1926年,136页。

CU (1)

《全印反法西斯工会大会》,M.N.罗易的会议主席讲话 All-India Anti-Fascist Trade Union Conference

拉合尔,1941年11月29—30日,M.A.汗(1941?),16页。

IRI (2)

《全印糖厂工人会议》,M.N.罗易的会议主席讲话 All India Sugar Mill Workers' Conference

1938年4月30日及5月1日在哥拉克普尔召开(1938?),17页。

IRI (3)

《反对共产党及苏联的国际盟国》 Les Allies internationaux de l'opposition du P.C. et de l'U. R.S.S.

巴黎,编辑发行出版局,1927年,40页。

BN (4)

《法西斯经济学入门》(对印度经济发展的孟买计划的批判) Alphabet of Fascist Economics (a critique of the Bombay Pla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India)

加尔各答,复兴出版社,1944年,104页。

LC (5)

《抉择》 The Alternative.

孟买,沃拉公司,1940年,83页(《独立的印度》丛书,第6期)。

IOL (6)

《亚洲与世界:罗易的声明》 Asia and the World, a Manifesto by M.N. Roy

于亚洲事务会议召开时发表(德里?),激进民主党,1947年,11页。CU (7)

《在共产主义之外》 Beyond Communism

M.N.罗易与菲利普·斯普拉特合著,加尔各答,复兴出版社,1947年,184页。

CBI 1943—48年(8)

《印度政治的未来。工人党还是人民党》 Buduschchee Indiskei Politiko. Rabochaia partiia ili narodnia partiia

莫斯科,苏联国家计划“计划经济”出版社,1926年,95页。按俄语字母直译书名。同25,48。

(9)

《坎普尔阴谋案:致J.R. 麦克唐纳阁下的一封信》 Cawnpore Conspiracy Case: an Open Letter to the Rt. Hon. J.R. MacDonald

伦敦,印度保卫委员会,1924年,11页。

LSE(10)

《共产国际》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德里,激进民主党,1943年,73页。

CU(11)

《现代科学的因果关系概念》 The Concept of Causality in Modern Science

《人道主义的道路》文选单行本,台拉登,印度复兴协会,(194一年?),15页。

CU(12)

《国会与农民》 The Congress and the Kisans.

(193一年?),已遗失,列于“罗易著作目录”内(13)。

《国大党面临抉择》 Congress at Crossroads

孟买,独立的印度同盟,(1934年?),18页。(《独立的印度同盟》小册子,第1期)

IRI(14)

《自由印度的宪法》(罗易起草) Constitution of Free India

第二次印刷,德里,激进民主党秘书V.B. 卡尔尼克,1945年,42页。

CU(15)

《同上》

伦敦,印度激进民主党,1945年,36页。

CU(16)

《印度宪法草案》 Constitution of India, a draft

德里,V.B.卡尔尼克,1944年,46页。

HL(17)

《文化面临抉择：自由的文化必要条件》 Culture at the Crossroads;
Cultural Requisites of Freedom

加尔各答，左翼读书社，(194一年?)，177—192页。(《现今时代与印度》，研究班讲座第14讲。)

CU(18)

《法西斯主义的哲学、宣言与实践》 Fascism: Its Philosophy, Professions and Practice

加尔各答，D.M. 图书社，1938年，153页。

IRI(19)

《法西斯主义的哲学与实践》 Fascism: Its Philosophy and Practice
第2版，加尔各答，复兴出版社，1943年，153页。

CBI 1943—48年(20)

《自由还是法西斯主义?》 Freedom or Fascism?

(孟买?)，激进民主党，1942年，110页。

LC(21)

《从野蛮到文明》 From Savagery to Civilisation

加尔各答，文摘书屋，1940年，140页。

选自“Amrita Bazaar Patrika”连载文章。

IOL(22)

《同上》，第2版，加尔各答，复兴出版社，1944年，140页。

CBI 1943—48年(23)

《印度民主的未来》 Future of Democracy in India

1945年10月6日子勒克瑙市政厅召开公开集会时讲稿全文。

德里，激进民主党，(1945年?)，27页。

CU(24)

《印度政治的未来》 The Future of Indian Politics

伦敦，R. 毕晓普(1926年?)，118页。

CU(25)

《社会主义的未来》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加尔各答，复兴出版社(1943年?)，18页。(学生俱乐部传单第

1号)1943年11月对加尔各答学生俱乐部的谈话。

CU(26)

《中产阶级的未来》 The Future of the Middle Class

1944年5月29日在年度春季讲演会中于浦那发表的讲演。

巴特那,激进民主党,(1944年?),24页。

CU(27)

《甘地对罗易》 Gandhi vs. Roy

包括罗易同志致甘地的信,甘地的答复,和罗易的答辩。

孟买,V.B.卡尔尼克(1939年序言),18页。(《独立的印度》丛书第5期。)

PC(28)

《甘地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 Gandhism; Nationalism; Socialism

加尔各答,孟加拉激进俱乐部,1940年,130页。(研究社丛书,第1期)

IRI(29)

《二十世纪的异端邪说》,哲学论文集 Heresi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hilosophical Essays

第2版,孟买,复兴出版社;独家代理商:沃拉公司,1943年,172页。第1版于1939年出版。

CU(30)

《伊斯兰教的历史作用》(一篇论及伊斯兰教文化的论文) The Historical Role of Islam (an Essay on Islamic Culture)

孟买,沃拉公司,1937年,106页。

LC(31)

《同上》

第2版,孟买,复兴出版社,独家代理商:沃拉公司,1943年,84页。

LC(32)

《历史不是如此创造的》 History is not made this way

对西姆拉会议的专题论丛(罗易与别人合著)

加尔各答,复兴出版社,(1945年?),45页。转载自《独立的印度》。

CU(33)

《革命史》 The History of Revolution

(194一年?), (《科学的政治》丛书), 已遗失, 由《科学的政治》转载。

(34)

《“我的控诉”》 “I accuse”

M. N. 罗易在印度坎普尔法庭开庭受审叛逆罪时被封锁的声明。
附阿斯万尼·库马尔·沙尔马的导言。

纽约, “印度保卫罗易委员会”出版, 1932年, 30页。在印度以《我的答辩》为名出版(见65项)。

HL(35)

《I.N.A. 与八月革命》, 附考蒂尔亚(笔名)著附录I.N.A. and the August Revolution

● 加尔各答, 复兴出版社, 1946年, 105页。

CU(36)

《一个革命者的理想》 The Ideal of a Revolutionary

(194一年?), 《科学的政治》丛书, 已遗失, 由《科学的政治》转载。

(37)

《印度妇女的理想》 The Ideal of Indian Womanhood

(台拉登?), 复兴出版社, 1941年, 152页。(《一个囚犯的日记片断》, 第2卷。)

CU(38)

《印度与大战》 India and War, M.N.

罗易与别人合著。勒克瑙, 激进民主党, 1942年, 585页。

CU(39)

《过渡时期的印度》 India in Transition

与阿班尼·穆克赫尔吉合著, 日内瓦, J.B. 塔格特, 1922年, 241页。

CU(40)

《印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La India: su pasado, su presente y su pervenir

墨西哥, 1918年, 189页。

HL(41)

《印度劳工与战后建设》 Indian Labour and Post-war Reconstruction

勒克瑙, A.P. 辛格, 1943 年, 58 页。

CU(42)

《同上》

纽约, “太平洋事务学会”国际秘书处, 1942 年, 17e., 油印品(“太平洋事务学会”, 第八次会议, 魁北克, 蒙特里勃兰特, 印度论文第1辑)

CU(43)

《印度复兴运动》 Indian Renaissance Movement

三次演讲, 加尔各答, 复兴出版社(1944 年序言), 39 页。

《印度通讯》 India's Message

第二次修订本, 加尔各答, 复兴出版社, 1950 年, 307 页。(《一个囚犯的日记片断》, 新版本, 第 2 卷)

CU(45)

《印度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India's Problem and Its Solution

(无地名, 1923 年?) 55 页。

NYPL(46)

《印度》 Indien

M.N. 罗易与阿班尼·穆克赫尔吉合著, 由维利·舒尔茨从英译本转译, 汉堡, 共产国际出版社, 1922 年, 191 页。第 40 项的译文。

CU(47)

《印度政治的未来》 Indiens politische Zukunft.

汉堡, 柏林, 卡尔·霍伊姆出版社, 1927 年左右, 132 页。(《国际时事与争论》, 第 10 卷), 第 25 项译文(?)。

CU(48)

《反共党派的国际盟国》 Die Internationalen Verbundeten der Opposition in der KPdSU

汉堡, 卡尔·霍伊姆出版社, 1928 年, 30 页。

HL(49)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Jawaharlal Nehru

德里, 激进民主党, (1945 年?), 61 页。

LC(50)

《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 Kitaiskaia revoliutsiia i Kommunisticheskii

internatsional

材料论文集,莫斯科,列宁格勒,国家出版局,1929年,207页。

CU(51)

《自由的最后战斗》 Last Battles of Freedom

1944年12月27—30日激进民主党加尔各答会议报告。德里,激进民主党,(1945年?),107页。

M.N. 罗易著:《为自由的最后战斗》(23—41页);《对批评者的答复》(84—100页)。

CU(52)

《拉合尔国大党大会的教训》 The Lessons of the Lahore Congress

(1929年?)已遗失,系一本小册子,由罗易、塔亚普·沙伊克、昆韦尔·布拉杰什·辛格等人署名,曾在《先锋》刊登,由尤苏弗·梅赫拉利编辑,由M.N. 罗易摘抄为印地文,198页。

(53)

《罗易致国大党的信》 Letters by M.N. Roy to the Congress Socialist Party

写于1934年,孟买,复兴出版社,1937年,78页。

IO, PC(54)

《狱中来信》 Letters from Jail

阿布拉哈姆·埃鲁尔卡尔博士写的导言,(台拉登?),复兴出版社,1943年,228页(《一个囚犯的日记片断》,第3卷)

CU(55)

《大海兽与章鱼》 Leviathan and Octopus

德里,激进民主党(1947年?),19页,转载自《独立的印度》。

CU(56)

《印度的民族解放》 La Liberation Nationale des Indes

巴黎,国际社会版,1927年,108页。

BN(57)

《革命者必读书目》 Library of a Revolutionary

M.N. 罗易编辑以供认真研究政治的书目。

勒克瑙,印度复兴协会刊印,台拉登,勒克瑙大学,新生活俱乐

部, 1942年, 40页。

LC(58)

《人类与自然》 Man and Nature

著名科学家对现代知识的专题论文集

由 M.N. 罗易著导言, 台拉登, 印度复兴协会, 1940年, 227页。

CU(59)

《唯物主义; 科学思想史大纲》 Materialism; an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

台拉登, 复兴出版社, 1940年, 280页。

NYPL(60)

《唯物主义》 Materialism

第二次修订本, 加尔各答, 复兴出版社, 1951年, 259页。

CU(61)

《唯物主义与唯灵论》 Materialism and Spiritualism

M.N. 罗易在 1937年7月25日于马德拉斯召开的马德拉斯管区激进派青年会议上的主席讲演。

孟买, R.D. 纳德卡尔尼(1937年?), 24页。

IRI(62)

《一只猫的回忆录》 The Memoirs of a Cat

台拉登, 复兴出版社, 1940年, 96页。(《一个囚犯的日记片断》, 第1卷。)CU(63)

《我的罪状》 My Crime

孟买, 拉梅什·纳德卡尔尼(1937年?)

转载自《独立的印度》, 1937年6月27日。在《我们的分歧》中第25—43页转载, 附标题为《致共产国际成员们的一封公开信》。最初以德文在《Gegen den Strom》《反潮流》第2卷第37期(1929年9月14日)第9—11页发表。

IRI(64)

《我的答辩》 My Defence

我被禁止在坎普尔(联合省)法庭发表的声明。

本地治里, “独立行动委员会”(1932年序言)13, 114页。前言由阿

斯万尼·库马尔·沙尔马署名,见第 35 页。

IRI(65)

《我与国会的分歧》 My Differences with the Congress

孟买, V.B. 卡尔尼克, 激进国大党人同盟书记(1940年?), 16 页。

1940年 11 月 27 日在阿拉哈巴德大学讲演, 转载于《印度与大战》, 第233—241 页。

IRI(66)

《我在中国的经历》 My Experiences in China

第 2 版, 加尔各答, 复兴出版社, 1945 年, 70 页。1938 年第一次出版。CU(67)

《民族政府还是人民政府?》 National Government or People's Government?

加尔各答, 激进民主党; 经售代理商, 复兴出版社(1944年?) 106 页。

LC(68)

《同上》

第 2 版, 加尔各答, 复兴出版社, 1946 年, 84 页。

CU(69)

《民族主义: 过时的迷信》 Nationalism; an Antiquated Cult

孟买, 激进民主党(1942年?), 84 页。

LC(70)

《民族主义, 民主和自由》 Nationalism, Democracy & Freedom

孟买, 激进民主党(1942年?), 102, 76 页。

LC(71)

《地方自治问题的一种新尝试》 A New Approach to the Communal Problem

1941年2月22日马德拉斯国际联谊会上讲演。

孟买, V.B. 卡尔尼克(1947年?), 24 页。

IRI(72)

《新人道主义》宣言 New Humanism, a manifesto

加尔各答, 复兴出版社, 1947 年, 67 页。

LC(73)

《同上》

第二次修订本,加尔各答,复兴出版社,1953年,111页。

CU(74)

《一个新方向》 A New Orientation,有关国际形势的一项声明

德里,V.M. 塔尔昆代,激进民主党,1946年,23页。

IRI(75)

《新的方向》 New Orientation

1946年5月8日至18日在台拉登举行的政治研究野营会上演讲,

由菲利普·斯普拉特写前言。加尔各答,复兴出版社,1946年,255

页。CU(76)

《一个新方向》 A New Orientation

为争取民主自由、经济繁荣和文化进步的新世界秩序的国际斗争的回顾与展望。由1946年5月18日在印度台拉登召开的印度激进民主党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

加尔各答,普罗博德·巴塔查尔吉代表激进民主党出版,孟加拉,1946年,27页。

CU(77)

《新道路》 The New Path

激进民主党的宣言和宪法。

孟买,V.B. 卡尔尼克,(1940年?),16页。(激进民主党发表,第2期)发表时缺作者的说明;在《罗易著作表》里认为是罗易的著作。

CU(78)

《同上》

(刊于另一期)勒克瑙,A.P. 辛格(1940年?),9页。

IRI(79)

《关于地方自治问题》 On Communal Question

M.N. 罗易与 V.B. 卡尔尼克合著。

勒克瑙,A.P. 辛格(1940年?),31页。(《科学的政治》,第2期)

IRI(80)

《在步出监狱的时候》 On Stepping out of Jail

孟买,V.B. 卡尔尼克(1936年?),15页。

IRI(81)

《关于国大党宪法》 On the Congress Constitution

加尔各答,《独立的印度》办事处,(1938年导言),59页。

CU(82)

《从阿默达巴德到加雅之间一年来的不合作》 One Year of Non-co-operation from Ahmedabad to Gaya

M.N. 罗易与埃伦·罗易合著。

加尔各答,印度共产党,1923年,184页。

CU(83)

《国大党中激进主义的根源》 Origin of Radicalism in the Congress

勒克瑙,S.S. 苏里,勒克瑙大学新生活俱乐部总书记,1942年,45页。

1940年6月激进国大党联盟在台拉登组织的 A.I. 政治研究野营会上讲演与讨论总结。讲演者有 V.G. 库尔卡尔尼,V.B. 卡尔尼克和罗易(22—45页)。

CU(84)

《我们的分歧》 Our Differences

M.N. 罗易与 V.B. 卡尔尼克合著。

加尔各答,萨拉斯瓦蒂图书社,1938年,184页。

内容包括: 第一部: 导言——我的罪状——关于印度问题——致共产国际的一封信

第二部: 论罗易主义, V.B. 卡尔尼克著: 罗易的立场是什么——反潮流

CU(85)

《同上》

第2版,加尔各答,复兴出版社,1940年,183页。

CBI 1943—48年(86)

《我们的问题》 Our Problems

M.N. 罗易与 V.B. 卡尔尼克合著

加尔各答,巴伦德拉图书社(1938年序言),274页。

LC(87)

《我们在印度的任务》 Our Task in India

无地名,印度工人阶级革命党孟加拉委员会(1932年?),124页。
孟买,尤苏弗·梅赫拉利图书社。

(88)

《规划一个新印度》 Planning a New India

加尔各答,复兴出版社,(1944年?),64页。1943年2月至1944年1月间发表的讲演。

CU(89)

《政治书简》 Political Letters

苏黎世,“先驱”书店,1924年,52页。“罗易著作目录”列为《致印度民族主义者的信件》。

CU(90)

《战后远景,对未来的窥视》 Post-war Perspective: a Peep into the Future

德里,V.M. 塔尔昆代,激进民主党总书记,1945年,15页。“激进民主党出版社”。

CU(91)

《贫穷还是富足?》 Poverty or Plenty?

G.D. 帕里克撰导言。

加尔各答,复兴出版社(1943年序言),156页。

CU(92)

《罗易于1941年3月22日和23日在浦那举行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激进民主党会议上的主席讲演》 Presidential Address by Com. M.N. Roy at the Maharashtra Provincial Conference of the Radical Democratic Party held at Poona on 22nd and 23rd March,1941
孟买,V.B. 卡尔尼克(1941年?),32页。

IRI(93)

《罗易于1939年6月27日和28日在浦那举行的第一次全印激进国大党人同盟会议上的主席讲演》 Presidential Address by M.N. Roy at the first All-India Conference of the League of Radical Congressmen, Poona, 27th and 28th June 1939

孟买(1939年?),14页。

IRI(94)

《罗易的主席讲演》 Presidential Address of Com. M.N. Roy

1938年1月1日及2日在贝阿瓦尔第一次印度中部学生会议。孟买(1938年?), 18页。

IRI(95)

《罗易的主席讲演》 Presidential Address of M.N. Roy

1937年5月29日及30日各省青年联合会议, 孟买, 锡塔普尔, R.D. 纳德卡尔尼(1937年?), 36页。

IRI(96)

《激进派民主的原则》 Principles of Radical Democracy

1946年12月26日至29日在孟买由印度激进民主党第三次全印会议通过。第2版, 德里, 1947年, 31页。

封面副标题: 二十二篇论文, 无作者说明, 认为系罗易所作。

CU(97)

《激进派民主的原则》, Principles of Radical Democracy

二十二篇论文

加尔各答, 普罗博德·巴塔查尔吉, 1947年, 26页。上书的第一版本(?)。无作者说明。

IRI(98)

《自由问题》 The Problem of Freedom

加尔各答, 复兴出版社, 1945年, 140页。

HL(99)

《印度革命问题》 Problem of the Indian Revolution

孟买, 拉贾拉姆·彭代, 1941年, 27页。(《科学政治》, 第10期)

CU(100)

《激进民主党会议开幕讲演》 Radical Democratic Party Conference

Inaugural address

孟买, 1946年20日, 21日, 22日。

孟买, V.B. 卡尔尼克(1947年?), 25页。

IRI(101)

《激进民主党致苏联电函》 Radical Democratic Party's Message to

the U.S.S.R.

加尔各答, D. 古纳瓦尔德亨(194—年?), 19页。

IRI(102)

《激进人道主义》 Radical Humanism

新德里(1952年序言), 55页。(《东方经济》小册子, 14期)

CU(103)

《理性、浪漫主义和革命》 Reason, Romanticism and Revolution

加尔各答, 复兴出版社, 1952—55年, 两卷。

CU(104)

《印度自由斗争中各阶级的关系》 The Relation of Classes in the Struggle for Indian Freedom

巴特那, 比哈尔激进民主人民党(1940年?), 50页。(《科学的政治》, 第4期)

CU(105)

《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

加尔各答, 复兴出版社, 1946年, 689页。

CU(106)

《同上》 Revolution und Konterrevolution in China

保罗·弗罗莱希自英文手稿转译, 柏林, 社会科学出版社, 分类 930.9—478页。结尾各章根据第 51 项。

CU(107)

《宇宙的节奏》 The Rhythm of Cosmos

1952年2月9日至10日在特纳里召开的第二次全印理性主义者会议上的开幕词。特纳里, (1952年?), 17页。

CU(108)

《罗易主义解说》 Royism Explained

M.N. 罗易与 K.K. 辛哈著

达尔马达萨·古纳瓦尔德亨和戴巴萨兰·达斯·古普塔编辑, 加尔各答, 萨拉斯瓦蒂图书社, 1938年, 65页。文章转载自《独立的印度》。CU(109)

《俄国革命的回顾与远景》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 Review and the Perspective

加尔各答, D.M. 图书社 (1937年?), 104页。包括第111项的第1节。

PC(110)

《俄国革命》 The Russian Revolution

加尔各答, 复兴出版社, 1949年, 631页。

CU(111)

《不合作主义和国大党的潜势力》 Satyagraha and the Potentialities of the Congress

罗易与别人合著(阿季米尔?) J.N.穆克哈尔吉代表激进民主党, 阿季米尔, 1941年, 40页。(《科学的政治》丛书)

CU(112)

《科学与哲学》 Science and Philosophy

加尔各答, 复兴出版社, 1947年, 206页。

CU(113)

《科学与迷信》 Science and Superstition

台拉登, 印度复兴协会, (1940年序言), 164页。

CU(114)

《科学、哲学和政治》 Science,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谟拉达巴德, J.S. 阿加尔瓦尔(1940年?), 54页。(《科学政治》, 第1期)CU(115)

《科学的政治学》 Scientific Politics

1940年5月及6月全印激进国大党人同盟主持在台拉登召开的全印政治研究野营会上的讲演。

台拉登, 印度复兴协会, 1942年, 226页。同时曾分别发表; 见下列各项: 34, 37, 80, 100, 105, 112, 115, 119, 124, 132。

LC(116)

《同上》

第2版, 加尔各答, 复兴出版社, 1947年, 315页。

CU(117)

《中苏条约》 Sino-Soviet Treaty

加尔各答,复兴出版公司,1945年,50页。

LC(118)

《发动群众的一些基本原则》 Som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Mass Mobilisation

加尔各答, D. 古纳瓦尔德亨(1940年?), 37页。(《科学的政治》, 第7期)。

CU(119)

《各邦的人民斗争同国会》 States' People's Struggle and the Congress

(193一年?), 已遗失, 列于“罗易著作目录”中。

(120)

《这次战争同我们的防卫》 This War and Our Defence

卡拉奇, 信德省级激进民主党(1942年前言), 24页。信德激进民主党出版物, 第1期。

IRI(121)

《这条通向自由之路》 This Way to Freedom

1942年12月举行的激进民主党全印会议上的报告。德里, 1942年, 100页。

罗易: 《我们今日的任务》(24—34页); 《通向革命的新途径》(35—45页); 《走向工作》(58—67页)

CU(122)

《特里普里及其后》 Tripuri and After

纳西克, M.R. 达尔维为激进国大党人同盟印行(193一年?), 32页。(《独立的印度》丛书, 第4期)

IRI(123)

《二十世纪的雅各宾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民主革命中的任务》 Twentieth Century Jacobinism; Role of Marxism in Democratic Revolution

巴特那, P.M. 森, 比哈尔激进民主党(1940年?), 26页。(《科学的政治》丛书)

CU(124)

《印度之声》 La voz de la India

墨西哥, D.F.(1917年?), 80页。

CU(microfilm)(125)

《战争与革命: 国际性的内战》 War and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Civil War

马德拉斯, 激进民主党, 1942年, 118页。

CU(126)

《亚洲的前途》 The Way Ahead in Asia

无地名, 195—年? 10页。东南亚英国情报局转载自《激进人道主义者》。IRI(127)

《我们想要什么?》 What Do We Want?

J.B. 塔格特图书社版, 1922年, 43页。“罗易著作目录”中书名为《怎么办?》。

(128)

《马克思主义是什么?》 What is Marxism?

第2版, 孟买, 1943年, 32页。

NYPL(129)

《哪条道, 勒克瑙?》 Which Way, Lucknow?

一位激进国大党员(M.N. 罗易)著。孟买, M.R. 谢蒂(193—年?), 11页。

IRI(130)

《欧洲向何处去?》 Whither Europe?

孟买, 沃拉公司, 1940年, 68页。

IRI(131)

《世界危机》(国际局势) World Crisis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M.N. 罗易及别人合著

阿哈默达巴德, 古季腊特激进民主人民党, 1940年, 40页。(《科学的政治》, 第5期)

CU(132)

《你们的未来: 致知识阶层中产阶级呼吁书》 Your Future: an Ap-

peal to the Educated Middle Class

激进民主党出版, 勒克瑙, A.P. 辛格, 激进民主党书记(联合省委员会), 1944年, 16页。

无作者说明, 估计为罗易著作。

CU(133)

译名对照表

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A		King	
阿博尔人	Abors	阿默达巴德	Ahmedabad
阿卜杜·拉布	Abdur Rab	阿纳乌阿克	Anahuac
阿卜杜拉·萨夫达尔	Abdullah Safdar	阿萨姆邦	Assam
阿尔瓦拉多, 将军	Alvarado, General	阿什哈巴德	Ashkhabad
阿瓜斯卡廉特斯	Aguasca- lientes	阿扎腊	Acharya
阿季米尔	Ajmer	阿周那	Arjuna
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	Allaha- bad High Court	阿兹特克人	Aztecs
阿利加尔大学	Aligarh Univ.	埃贝莱因, 胡戈	Eberlain Hugo
阿利明	Alimin	埃米尔	Emir
阿利波尔炸弹事件	Alipore Bomb Case	埃莫西略	Harmosilla
阿列金	Alekhine	艾伯特, 弗里茨	Ebert, Fritz
阿曼纽拉, 国王	Amanullah,	《爱的宗教》	<i>Religion of Love</i>
		安集延	Andijan
		安纳托利亚	Anatolia
		安娜·卡列尼娜	Anna Kare- nina
		奥贝杜拉, 毛拉	Obeidullah, Maulana

奥夫雷贡, 将军 Obregon, General

奥克萨斯河 Oxus River

奥里萨巴 Orizaba

奥里萨邦 Orissa

奥伦堡 Orenberg

B

巴本, 冯, 上尉 Papen, Capt. von

巴勃罗·卡萨尔斯 Pablo Cazals

巴达维亚 (今名雅加达)

Batavia

巴伐利亚 Bavaria

巴格万, 辛格 Bhagwan, Singh

巴克曼, 亚历山大 Barkman, Alexander

巴枯宁 Bakunin

巴拉巴诺娃, 安捷里卡

Balabanova, Angelica

巴黎大学 Sorbonne

巴塞罗那 Barcelona

巴士底狱 Bastille

班纳吉, 博士 Bannerji, Dr.

班纳吉, 西布纳特 Bannerjee, Sibnath

般金·查特吉 Bankim Chatterji

鲍罗廷, 迈克尔 Borodin, Michael

鲍斯, 苏巴斯·钱德拉 Bose, Subash Chandra

贝多芬 Beethoven

贝克, 莫里斯 Baker, Maurice

本巴奇 Bombacci

本地治里 Pondicherry

彼得大帝 Peter the Great

彼得格勒 Petrograd

比尔斯, 卡尔 Beals, Carl

比利亚, 潘乔 Villa, Pancho

比利亚集团 Villistas

毕苏斯基 Pilsudsky

槟榔屿 Penang

波甘伊, 约瑟 Poganyi, Josef

勃兰特 Brandt

博尔迪加 Bordiga

博斯, 拉希·比赫里

Bose, Rash Behary

伯恩施坦 Bernstein

布哈拉 Bokhara

布哈林 Bukharin

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

Brahmaputra Valley

布赖恩, 威廉·詹宁 Bryn, William Jennings

布赖恩特, 路易丝 Bryant, Louise

布兰德勒, 海因里希

Brandler, Heinrich

布兰特温 Brantwein

布朗基传统 Blanguist tradition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
Brest-Litovsk, Treaty of
布利特, 威廉 Bullit, William

C

蔡特金, 克拉拉 Zetkin, Klara
查巴塔, 埃米莉亚诺 Zapata,
Emiliano

查克拉瓦蒂, 博士 Chakravarty, Dr.

查普尔塔佩克 Chapultepec

查托帕迪阿亚, 维伦德兰纳特
Chattopadhyaya, Virendranath

察里津 Tzaritzina

昌德纳戈尔 Chandernagore

《纯粹理性批判》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D

鞑靼人 Tartars

达罗毗荼人 Dravidians

达斯 Das, C. R.

达塔, 布彭德伦纳特 Dutta,
Bhupendranath

德纳姆 Denham

“德意志号” *Deutschland*

德克萨斯石油公司 Texas Oil
Co.

丹东 Danton

邓尼金, 将军 Denikin, General

迪特曼 Dittmann

迪亚斯, 波菲里奥, 将军 Diaz
General Porfirio

蒂维尔 Tivel

东方被压迫民族代表大会
Congress of the Oppressed
Peoples of the East

E

恩济利 Enzeli

恩维尔[帕夏] Enver Pasha

F

法伊祖拉赫 Faizullah

泛都兰主义 Pan-Turanianism

泛伊斯兰主义 Pan-Islamism

非暴力的消极抵抗和不合作主义
委员会 Satyagraha Committee

菲利普斯, 查利 Philips, Charlie
腓特烈大帝 Frederick the
Great

吠陀文化 Vedic Culture

费尔干纳 Ferghana

封建庄园 Haciendas

福尔利奇, 保罗 Forelich, Paul

伏尔加河 Volga

伏尔泰 Voltaire

伏龙芝 Frunze

弗雷恩纳, 路易斯 Fraina,
Louis

弗洛雷斯, 胡安·巴普蒂斯塔

Flores, Juan Baptista

佛罗萨尔, 保罗 Frossard, Paul

富克斯, 爱德华 Fuchs, Eduard

G

《盖尔杂志》 *Gale's Magazine*

甘地 Gandhi

高尔基 Gorky

戈德曼, 埃玛 Goldman, Emma

戈麦斯, 曼努埃尔 Gomez, Manuel

戈斯, 奥罗宾多 Ghose, Aurobindo

戈特沙尔克, 埃伦 Gottschalk, Ellen

葛兰西, 安东尼奥 Gramsci, Antonio

格拉马茨基, 博士 Gramatsky, Dr.

格兰德河 Rio Grande

格兰威治, 欧文 Granwich, Irwin

格林坦坎普, 亨利 Glintenkamp, Henry

格鲁曾伯格 Gruzenburg

共产国际拉丁美洲局 Latin America Bureau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古拉尔斯基 Guralsky

古普塔, 纳利尼 Gupta, Nalini

古普塔, 希瓦·普拉萨德

Gupta, Shiva Prasad

古契柯夫, 伯爵 Gutchkov, Count

瓜达拉哈拉 Guadalajara

瓜达卢佩山脉 Guadalupe, Sierra de

瓜马斯 Guaymas

果戈理 Gogol

果特, 赫尔曼 Gorter, Hermann

《过渡时期的印度》 *India in Transition*

《光天化日下的黑暗》 *Darkness at Noon*

H

哈布斯堡王朝 Hapsburg Empire

哈达 Hatta

哈迪阿尔 Hardyal

哈里发运动 Khilafat Movement

哈伦-阿尔-拉希德 Haran-al-Rashid

哈斯腊德·摩哈尼毛拉

Maulana Hazrat Mohani

哈特腊斯(印度北方邦)

Hathras (U.P.)

海德门 Hyndman

海得尔堡会议 Heidelberg Conference

豪华饭店 Hotel Lux
豪拉阴谋案 Howrah Conspiracy Case
赫尔茨, 马克斯 Hoelz, Max
黑尔夫里希, 特奥多尔 Helfferich, Theodor
黑格尔辩证法 Hegelian dialectics
黑龙会 Black Dragon
亨蒂希, 冯, 男爵 Hentig, Baron von
胡亚雷斯, 贝尼托 Juarez, Benito

J

基尔·哈迪 Keir Hardie
基尔吉斯 Khirgiz
基发 Khiva
基马尔[帕夏] Kemal Pasha
季诺维也夫 Zinoviev
吉尔吉特 Gilgit
加拉赫, 威利 Gallacher, Willie
加里宁 Kalinin
加米涅夫 Kamenev
加香, 马塞尔 Cachin, Marcel
贾杜·戈帕尔 Jadu Gopal
贾廷达 Jatinda
捷尔任斯基 Dzerzhinsky

K

喀琅施塔得 Kronstadt

卡巴迪, 孙达尔 Kabadi, Sundar
卡帕夫兰卡 Capablanca
卡德尔党 Gadr Party
卡恩克霍杰 Khankhoje
卡尔曼努尔 Carmagnole
卡尔尼克 Karnik, V. B.
卡冈诺维奇 Kaganovitch
卡拉汗 Karakhan
卡拉森 Kharasan
卡兰沙, 贝努斯蒂安将军 Carranza, General Venustian
卡鲁索 Caruso
卡马, 夫人 Cama, Mme.
卡普, 博士 Kapp, Dr.
卡萨斯 Casas
卡塞尔 Kassel
卡特朱 Katju, K. N.
卡耶斯, 普卢塔尔科 Calles, Plutarco
卡扎耶夫, 法伊祖拉赫 Khazaev, Faizullah
凯撒 Kaiser
凯斯特勒 Koestler
坎普尔 Kanpur
康德 Kant
考茨基 Kautsky
柯伦泰, 亚历山德拉 Kollontai, Alexandra
柯尼希, 冯 Koenig, von
科里, 刘易斯 Corey, Lewis

克拉斯诺伏斯克 Krasnovodsk
克莱因 Klein
克兰斯基 Klansky
克雷斯皮恩 Crispian
《克雷塔罗宪法》 *Querretarro
Constitution*
克里米亚 Crimea
克利希那韦尔马 Krishnaverma
克鲁泡特金 Kropotkin
克伦斯基 Kerensky
克南科杰, 马哈拉斯特里安
Knankhoje, Maharashtrian
孔辛嫩 Kunsinen
寇松 Curzon
库恩, 贝拉 Kun, Bela
库尔巴斯 Kurbas
库丘汗 Kuchuk Khan
库特-艾马赖 Kut-el-amqra
《快乐寺院》 *Ananda Math*
奎尔奇, 汤姆 Quelch, Tom

L

拉狄克, 卡尔 Radek, Karl
拉丁美洲同盟 Latin America
League
拉杰帕特赖 Lajpatrai
拉金 Larkin
拉柯夫斯基 Rakovsky
拉科西, 马蒂亚斯 Rakosi,
Matias
拉姆克里什纳—维夫坎南达布道

团(纽约) Ramkrishna—Vi-
vekananda Mission (New
York)
拉斯科尔尼科夫 Raskolnikov
拉思伯恩, 休 Rathbone, Hugh
拉特格斯 Rutgers, J.
拉欣巴耶夫 Rahimbaeff
劳芬贝格, 海因里希 Laufen-
berg, Heinrich
莱维, 保罗 Levi, Paul
莱维特 Levit
赖斯纳, 拉丽莎 Reisner, La-
rissa
雷, 拉拉·拉杰帕特 Rai, Lala
Lajpat
雷芬特洛夫, 冯 Reventlow,
von
累发尔 Reval
里德, 约翰 Reed, John
里姆斯基-柯尔沙科夫 Rymski-
Korsakov
里希人 Rishis
李卜克内西, 卡尔 Liebknecht,
Karl
李维诺夫 Litvinov
梁赞诺夫 Ryazanov
列金, 卡尔 Legien, Carl
列赞诺夫 Rhezanov
卢哈尼, 古拉姆·阿姆比阿·汗
Luhani, Gulam Ambia Khan
卢卡奇 Lukacs

卢那察尔斯基 Lunacharsky
卢森堡, 罗莎 Luxemburg, Rosa
鲁德祖塔克 Rudzutak
鲁登道夫 Ludendorff
“鲁西塔尼亚号” *Lusitania*
吕特维茨, 将军 Luettwitz, General
罗伯斯庇尔 Robespierre
罗拉特委员会 Rowlatt Committee
罗兰-霍尔斯特 Rolland-Holst
罗蒙诺索夫 Lomonosov
罗斯默, 艾尔弗雷德 Rosmer, Alfred
罗易, 巴森特·库马尔 Roy, Basant Kumar
罗易 Roy, M. N.
洛杉矶 Los Angeles
洛索夫斯基 Losowsky

M

玛雅文明 Maya Civilization
马德雷山脉 Sierra Madre
马德罗, 弗朗西斯科 Madero, Francisco
马丁, 神父 Matin, Father
马基雅维里 Machiavelli
马克西米连, 皇帝 Maximilian, Emperor
马林 Marring
马茂德, 博士 Mahmud, Dr.

马努伊尔斯基 Manuilsky
马什哈德 Meshed
马什哈德—基达公路 Meshed—Quetta Road
麦尔夫 Merve
麦克唐纳, 拉姆齐 Macdonald, Ramsay
迈尔, 埃内斯特 Meyer, Ernest
曼, 汤姆 Mann, Tom
曼纳海姆 Mannerheim
曼萨尼略 Manzanillo
曼苏尔, 穆罕默德 Mansoor, Mohammed
梅林, 弗朗茨 Mehring, Franz
门罗主义 Monroe Doctrine
米尔巴赫, 冯 Mirbach, von
密拉特阴谋案 Meerut Conspiracy Case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
Theses on National and Colonial Questions
莫勒洛斯 Morelos
莫里娜, 埃纳 Morena, Erna
墨克西特 Mexite
墨菲 Murphy, J. T.
墨西哥港 Puerto Mexico
穆哈吉尔 Muhajir
穆罕默德·阿里 Mohammed Ali
穆罕默德·萨菲克 Mohammed Safiq

穆克赫尔吉,阿班尼 Mukherji,
Abani

穆克赫尔吉,达纳戈帕尔
Mukherji, Dhanagopal

穆克赫尔吉,贾廷 Mukherji,
Jatin

穆克赫尔吉,贾廷达·纳特
Mukherji, Jatindra Nath

穆妮人 Munis

N

内华达山脉 Sierra Nevada

尼赫鲁,贾瓦哈拉尔 Nehru,
Jawaharlal

尼塔杰 Netaji

诺加累斯 Nogales

诺斯克 Noske

P

帕夫洛娃 Pavlova

帕洛阿尔托 Palo Alto

帕坦人 Pathans

潘克赫斯特,西尔维亚
Pankhurst, Sylvia

潘尼凯克,安东 Pannekoek,
Anton

培尔,皮埃尔 Bayle, Pierre

皮克,威廉 Pieck, Wilhelm

皮莱,钱帕克拉曼 Pillai, Cham-

pakraman

皮亚特尼茨基,奥西夫

Piatnitsky, Osif

片山 Katayama

普拉塔普,摩晒陀王公 Pratap,
Raja Mahendra

普列汉诺夫 Plekhanov

Q

齐采林 Chicherin

奇特拉尔 Chitral

奇瓦瓦州 Chihuahua

契卡 Checa

恰帕斯州 Chiapas

乔丹,戴维 Jordan, David

乔菲,阿道夫 Joffe, Adolf

切霍夫 Tchekhov

S

萨地亚 Sadiya

萨杜尔,雅克 Sadoul, Jaques

萨杜尔,夫人 Sadoul, Madame

萨法罗夫,格奥尔基 Safarov,
Georgi

萨卡特卡斯 Zacatecas

萨利纳克鲁斯 Salina Cruz

萨罗吉尼·奈杜 Sarojini Naidu

萨马拉 Samara

萨马翁 Samaoen

萨瓦卡尔,维纳亚克·达莫达尔

Savarkar, Vinayak Damodar

塞拉蒂 Serrati
 塞万提斯 Cervantes
 桑蒂瓦涅斯, 伊格纳西奥
 Santibanez, Ignazio
 桑坦德 Santander
 桑絮西 Sans Souci
 沙赫里尔 Sjahrir
 沙希尔, 博士 Shaheer, Dr.
 沙伊克, 塔亚布 Shaikh, Tayab
 舍恩, 冯 Schoen, von
 圣安赫尔 San Angel
 圣安东尼奥 San Antonio
 圣彼得堡 St. Petersburg
 圣迭戈 San Diego
 圣战 Jihad
 舒宾 Schubin
 施拉加特 Schlageter
 施利普金, 鲍利斯 Schlipkin,
 Boris
 施略普尼柯夫 Shlyapnikov
 史沫特莱, 艾格尼丝 Smedley,
 Agnes
 斯巴达克同盟的成员 Spartakists
 斯内夫利特 Sneevliet
 斯坦福大学 Stanford, Univ. of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Stanislavsky
 斯塔尔-亨特 Star-Hunt
 斯维尔德洛夫 Sverdlov
 苏达尔桑纳 Sudarshana
 苏拉耶, 阿富汗皇后 Suraya,
 Queen of Afghanistan

苏里茨 Suritz
 苏美尔人 Sumerians
 索科尔尼科夫 Sokolnikov
 索诺拉州 Sonora

T

塔尔海默, 奥古斯特 Thalheimer, August
 泰戈尔 Tagore
 泰拉特[帕夏] Talaat Pasha
 坦·马拉卡 Tan Malaka
 坦皮科 Tampico
 唐贝努斯蒂亚诺 Don Venustiano
 唐曼努埃尔 Don Manuel
 特勒耳奇, 恩斯特 Troeltsch, Ernst
 特纳, 杰克 Turner, Jack
 特万南人 Tehuanans
 特万特佩克 Tehuantepec
 通神学会 Theosophical Society
 «通往世界持久和平之路»
El Camine Pala la Paz Duradera del Mundo
 头山满 Toyama
 屠拉梯 Turatti
 土耳其青年党 Young Turks
 土耳其斯坦 Turkestan
 土库曼人 Turkomans
 托尔斯泰 Tolstoy
 托洛茨基 Trotzky

W

瓦尔加 Varga
 瓦尔帕来索 Valparaiso
 瓦列斯基 Walecki
 瓦列斯卡娅, 万达 Waleskaya,
 Wanda
 威尔逊, 总统 Wilson, President
 威吉库普, 戴维 Wijcoop, Da-
 vid
 威尔士, 亲王 Wales, Prince of
 韦尔塔, 将军 Huerta, General
 韦腊克鲁斯港 Vera Cruz
 维夫坎南达, 斯瓦米 Vivekanan-
 da, Swami
 维辛斯基 Vishinsky
 魏刚, 将军 Weygand, General
 魏利, 柯曾 Wylie, Curzon
 魏玛共和国 Weimar Republic
 《我作为造反者的一生》 My
Life as a Rebel
 沃尔夫施泰因, 弗里茨
 Wolfstein, Fritz
 乌拉马 Ulehma
 乌里茨基 Uritsky
 乌普萨拉大学 Upsala Univ.

X

西蒙 Simon
 《熙德之歌》 *The Song of the Cid*
 昔卡浦人 Shikarpuris

希法亭 Hilferding
 《消息报》 *Izvestia*
 肖卡特, 乌斯曼尼 Shaukat,
 Usmani
 谢德曼, 菲利普 Scheidemann,
 Philip
 《先驱报》 *El Heraldo*
 辛格, 布拉杰什 Singh, Brajesh
 欣策, 冯 Hintze, von
 兴登堡 Hindenburg

Y

雅利安文化 Aryan Culture
 雅利安人以前的文化 Pre-Aryan
 Culture
 亚美利亚 Armenia
 《夜店》 *Night Lodging*
 伊达尔哥 Hidalgo
 伊凡大帝 Ivan the Great
 伊格列西亚斯 Iglesias
 伊玛目 Imam
 伊斯门, 马克斯 Eastman, Max
 印德密谋案 Hindu-German
 conspiracy case
 《印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India's Past, Present and Fu-
 ture*
 印度革命委员会(柏林) Indian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Berlin)
 印度国大党 Indian National



2 030 0228 6

Congress

印度神秘主义 Hindu Mysticism

印度自由党 Indian Liberal

Congress

《英帝国衰亡史》 *Decline &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英国何去何从?》 *Whither Britain*

英印军 British Indian Army

尤登尼奇 Yudenitch

《尤根塔尔》(新时代) *Yugantar (New Era)*

尤卡坦 Yucatan

约翰逊, 杰克 Johnson, Jack

Z

扎德, 苏丹 Zade, Sultan

扎卡里阿 Zakharia

再浸礼教徒 Anabaptists

泽克特, 冯 Seeckt, von

《真理报》 *Pravda*

《震撼世界的十天》 *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